



文革史话

（上）第一部山雨欲来

上 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这是让一代人亢进，迷惘、失落、不堪回首，却无法忘怀的十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永远不可能磨灭的十年。

谨以此书献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五十周年

文革史话

之

第一部

山雨欲来

上 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写在前面

掌上千秋史，
胸中百万兵，
眼底六洲风雨，
笔下有雷声。
唤醒蛰龙飞起，
扑灭魔炎魅火，
挥剑斩长鲸。
春满人间世，
日照大旗红。

抒慷慨，
写鏖战，
记长征。
天章云锦，
织出革命之豪情。
细检诗坛李杜，
词苑苏辛佳什，
未有此奇雄。
携卷登山唱，
流韵壮东风。

这是山东大学高亨教授景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主席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

毛泽东，这位被中国共产党副主席林彪誉为“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的天才，一生中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伟业。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更以世人罕见的气魄和胆略，发动了一场前无古人，后难有来者，史无前例的，旨在打烂自己政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历史上留下了千古回味的话题。

目 录

写在前面	1
引言：敌人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伟业赋予谁，忧虑重重难寐	1

◇上 卷◇

第 1 回：说起源，游泳池旁谈“四清” 讲“矛盾”，两位主席起争端	7
第 2 回：急召唤，陈伯达夜半领命 发感慨，生日宴伏笔玄机	15
第 3 回：执《宪法》，一番话寓意深长 再通知，众书记重返北京	21
第 4 回：生活会，刘少奇诚恳检讨 难求索，毛泽东重上井冈	29
第 5 回：反特权，部队取消军衔制 忆往昔，胸中已酿万丈澜	35

第 6 回:说海瑞,吴晗领命几多变 觉端倪,遍京城难觅知己	41
第 7 回:交任务,姚文元慨然受命 七易稿,陈丕显亦当信使	47
第 8 回:易德怀,大会堂拒不从命 亲相约,颐年堂促膝而谈	55
第 9 回:众相劝,“大将军”离京入川 批海瑞,九州地欲起风雷	63
第 10 回:“窃听器”,陈年旧案终未了 换“总管”,杨尚昆调任南粤	70
第 11 回:风乍起,似吹皱一池春水 未知情,望神州风云莫辨	76
第 12 回:单行本,看京沪南北较劲 姑苏城,副主席再三挽留	82
第 13 回:难放心,风起于青萍之末 众丘八,群起攻总政主任	89
第 14 回:罗瑞卿,医院先探刘亚楼 “要通气”,林彪也拿出党章	97
第 15 回:抓机遇,叶群慨然飞杭州 婆留城,面“圣君”侃侃而谈	106
第 16 回:急落实,中宣部调度安排 招成武,毛泽东再问详情	114
第 17 回:不服气,彭真又找刘少奇 事态迫,众常委齐聚华亭	122

第 18 回:寻长子,谢富治未见前任 闻危言,众头领惊诧申城	132
第 19 回:难落实,不承认“死无对证” 满腹冤,与卓琳泪眼相形	140
第 20 回:谈道德,北京城回避政治 点要害,西湖畔谈天论地	147
第 21 回:变策略,吴晗作自我批评 赶紧跟,中宣部哪敢稍停	159
第 22 回:广播局,周恩来部队调人 没商量,关锋说“一字不改”	167
第 23 回:苏州行,江青春节请尊“神” “耳朵聋”,郭沫若恳请辞职	174
第 24 回:看电影,不夜城座谈文艺 交锋疾,五人组讨论方略	183
第 25 回:赶《提纲》,许立群彻夜未眠 示上方,一千人飞赴江城	190
第 26 回:游东湖,彭真发《二月提纲》 上三线,寻“海瑞”再作逍遥	197
第 27 回:改《纪要》,陈亚丁三飞上海 贯彻难,议《提纲》争执不停	204
第 28 回:再批判,罗瑞卿实难承受 三一七,第一次杭州会议	210
第 29 回:回首望,将军一跳身名亡 匿名信,陆定一又出问题	219

第 30 回：“女状元”，谁曾想出此下策 终敲定，《座谈会纪要》完稿	228
第 31 回：抓警卫，总理再查广播局 “大革命”，“上海谈话”震北京	236
第 32 回：急转弯，京城内一片慌乱 抛邓拓，是否能躲过此劫	244
第 33 回：出简报，许立群进退失据 齐声唤，批罗会再起波涛	252
第 34 回：写《通知》，新成立文革小组 聚西湖，二次开杭州会议	260
第 35 回：送彭真，飞机内一路无语 批李达，工作组进驻武大	269
第 36 回：表决心，发誓欲焚平生作 集北京，政治局开扩大会	275
第 37 回：“三家村”，呼“万岁”彭真不服 回羊城，陶铸中南局部署	282
第 38 回：飞上海，毛泽东紧急召见 绘蓝图，《五七指示》述心愿	289
第 39 回：部署忙，北京城调兵遣将 说政变，全党上下皆震惊	296
第 40 回：万念灰，邓拓家中辞世去 遭诘问，彭真会上检查难	303
第 41 回：怒难耐，林彪痛骂陆定一 保晚节，周恩来会上发言	311

第 42 回：批朱德，政治局小起波澜 设专案，田家英接受审查	318
第 43 回：难承受，永福堂悲剧呈现 闻噩耗，董边如五雷轰顶	326
第 44 回：忙喝止，安子文阻董再谈 华北会，袁振揭山西省委	334
第 45 回：泪洗面，昭衡廿天愁白头 翻烙饼，北大社教问题多	341
第 46 回：调查组，未名湖畔泛涟漪 怎么办？燕园左派串联忙	348
第 47 回：细斟酌，挥笔书就大字报 遭围攻，聂元梓匆匆离去	354
第一部上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361

引言：敌人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 伟业赋予谁，忧虑忡忡难寐

三国期间，诸葛亮尚未出山就预言天下将是三分之势，他与刘备的这次对话，成为后人广为流传的、著名的“隆中对”。

时隔 1700 余年后，公元 1945 年的夏天，抗战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与著名教育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黄炎培在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次对话——“延安窑洞对”。黄炎培同样预见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政局走势。

巍巍宝塔山下，潺潺延水河边，他们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彻夜畅谈，黄炎培对毛泽东讲：

“延安的作风明显的不同于国民党的重庆：艰苦，团结，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正如毛先生所说：打倒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要向老百姓学习——你们主张有些书本知识的人，快回到实际工作里去；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政府对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好像都负责的，这句话做到，在政治上更没有其他问题了。总之，在你们这里，有一种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

“是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吗。只有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人民才会拥护我们。”

“变化往往在胜利以后。”

“哦？”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

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黄炎培似已料到，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对抗中，中国共产党会取得最后胜利，执掌全国政权。但是，他的经验告诉他，历史上，小到一人，大到一国，开始的时候，不管条件怎样艰苦，都会努力奋斗，有一种精神支撑着。而一旦胜利，就会松懈，懒惰，以至腐败下来，一发而不可收拾。从中国的历朝历代，到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没有一个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率吗？

毛泽东当即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真的能做到吗？

1949年3月23日，太行山深处的西柏坡。武器落后，不足百万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即将打败了由美国支持和装备的800万国民党军队，正像4年前黄炎培所预料的那样，中共中央将在今天从这里走出大山，进入三朝古都——北平，执掌中国的政权。

当毛泽东走出门外，迎面遇见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

“主席没有休息好吧？”周恩来抬了一下手问。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边掏烟边说。

“多休息一点时间，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周恩来对毛泽东说。

毛泽东答道：“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在场的人都笑了。

周恩来点点头：“是啊，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李自成，明末的农民起义英雄，带领一批饿得活不下去的灾民，转战十几年，九死一生，历尽艰辛，终于打败了明王朝，在老百姓箪食壶

浆欢迎下,走进了北京金銮殿。然而,他的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就被满清军队赶出了北京,惨死在河南九宫山。

李自成是毛泽东心目中的英雄。却又非常为他的结局痛惜。早在1944年,文学家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的这段历史。这本书,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每个高级干部手里,他不希望他领导的党成为第二个李自成。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另外4个书记: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坐在吉普车上出发了。曲曲弯弯沙路上扬起烟尘。他们的前面是北京,是即将耸立起来的共和国的远景……

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暗暗地流泪。毛岸英问他为什么流泪,他说,他想起了与黄炎培的谈话。

时光如梭,转眼到了公元196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了15年的风风雨雨……

在此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和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在朝鲜打了一仗,居然迫使美国在朝鲜三八线上停战。美军司令克拉科将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时说:

“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在没有胜利的协议上签字。”

中国人扬眉吐气,世界为此而瞠目……

在此期间,中国经历了三年罕见的自然灾害,全国缺粮,没有饭吃,饿死了多少人……老百姓居然没有造反,跟着共产党一起挺过来了……

建国之初,也出现了共产党干部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现象,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毛泽东坚决、严厉、毫不手软的给压下去了……他不想成为李自成。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普及和教育,大公无私、先人后己之风日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好人好事层出不穷……雷锋、王杰、欧阳海,可谓是英雄辈出的年代。

共产党统治坚如磐石,毛泽东威望如日中天。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跳出了黄炎培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

然而,位于中国政坛最高峰的毛泽东,似乎并没有被这些现象所迷惑。此时的他更加忧心忡忡。他愈来愈强烈的感到,在“坚如磐石”

下面，“周期率”在涌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斯大林死后发生的一切，让毛泽东觉得，此时的苏联政府，和他年轻时立志推翻的旧中国的政府，其实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他们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是剥削、压迫人民的工具；五十年代的波兰、匈牙利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暴乱，他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包括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都说那是美国和欧洲敌对势力的颠覆和煽动，其实，毛泽东很清楚，还不是因为共产党当权者脱离群众，搞特殊化，蜕变为剥削老百姓的新的资产阶级，老百姓不满意，造反了！

“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变，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以上这段话，是毛泽东亲自加在与苏联共产党论战文章“九评”上的。

同样都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难道中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其实已经出现了，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就有那么多的农民要分田单干，党内又有那么多人支持这种做法。田都分了，社会主义还要不要？和旧中国又有什么区别？还是列宁英明，他说，小生产每天都在产生新的资产阶级。怎么这么多的共产党人就看不到呢？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教育农民和干部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不要分田单干。

这次运动中反映上来的材料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从工厂到农村，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干部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他们已经成为剥削群众的新的资产阶级了。

谁来监督他们？答应给予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又怎么保证？“三反”“五反”虽然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高官，但毛泽东清楚：那只是治标，没有治本。朱元璋当年不也杀了很多贪官，朱家坐了200多年天下，最后还是亡了——“周期率”。

延安时期的边区政府哪去了？解放初期人民政府的形象似乎越来越遥远。旧的资本家不存在了，但是，这些靠人民供养的政府官员不为人民服务，只为政府官员服务，为自己的亲朋好友服务，为一小部分利益集团服务，这不就是新的资产阶级吗？这样的政府越巩固，是否就意味着强大的官僚机构越巩固？

毛泽东的担忧日益加剧：

农村的包产到户，企业的物质刺激，教育的双轨制，公共卫生事业集中于城市，文艺上的传统题材和表现形式，等等。这些政策，在毛泽东看来，正滋生着新的不平等、特殊化、特权阶层和不满情绪，也就是滋生着“修正主义”。尽管毛泽东采取过一些措施，希望阻止上述情况的发展，但是，情况并不理想。他不满中央一些部门的迟缓行动，他怀疑自己的一些主要助手半心半意，缺乏热情。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最大危险不是国外进攻和威胁，而是国内的资本主义复辟，正如列宁说过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如果修正主义者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篡夺了权力，就可能发生资本主义复辟。

1964年2月2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内，毛泽东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亲切交谈。

毛泽东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我们党就有可能出修正主义。”

参加会见的朝鲜代表团中有人交头接耳。毛泽东接着说：“所以，我们要向全体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

金日成忍不住问：“中国将来情况会怎样？”

毛泽东说：“为了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掌权，从现在起就要大讲特讲反修防修的斗争问题，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担心，我死以后，中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

金日成：“有这种可能吗？”

毛泽东熄灭手中的烟头，摆一摆手说：“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现在我还没有死，我们党中央内部就有人敢公开提出来搞分田单干，提倡少支援世界革命；如果我死了，这些人还在，他们还不闹翻天？为了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才讲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会晤结束后，毛泽东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睡不着觉，仍在深深的思索着……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药，看到毛泽东忧心忡忡的样子，劝慰说：“主席，休息吧。”

毛泽东却说：“小吴呀，你不晓得，我对国内许多事情放不下心哪，党内要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在政治局会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不听，但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我们国家，为了我们这个党，将来改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才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坐到沙发上，点了一颗烟，接着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第1回：说起源，游泳池旁谈“四清” 讲“矛盾”，两位主席起争端

1964年冬天的北京，虽然和往年一样，干燥、寒冷。北风咧咧的吹过城市，却没有在城市中刮起太多的尘土。大街小巷依然是那样干净，甚至连一片树叶也看不到。人来车往的长安街，还是那样的忙碌。行走匆匆的人们脸上，已经看不到几年前的饥饿菜色，闪烁的是一双双自信和亢奋的目光。人们可以感到，这个国家正在被一种精神凝聚起来，就像水泥将一盘散沙凝聚起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中南海游泳池内，温暖潮湿的温度和外面的气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毛泽东正在这里游泳，这是他的一种休息方式。说起这种休息方式，还有一段故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后的几年中，毛泽东日理万机，殚精竭虑更甚以往，经常是废寝忘食。即便稍有闲暇，也总是拿一本书，倚在床上，作为休息。这种状况让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于是动员毛泽东出去散步，或者跳舞，总之，想尽办法要让毛泽东多走出办公室活动活动。

一次，医生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知道生命的起源在哪里吗？”

毛泽东觉得奇怪，马上反问道：“你要干什么？”

“考考你呀？不能总是你考别人，也应该让别人提点问题呀。”医生说。

“哦，当然是起源于大海。”毛泽东答道。

医生又问：“那么，生命的最佳运动是什么？”

毛泽东试探性的回答：“是散步？”

医生说：“不对，是游泳。游泳可以直接与大自然接触，是一种全身运动，锻炼心肺，而且老少皆宜，好处很多。”

毛泽东明白了，他说：“是要我游泳呀，可以考虑。”

医生看到毛泽东松口了，马上自告奋勇的说：“主席您就放心的游泳吧，有我保护，您保险出不了事。”

“喔，出了事怎么办？”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道。

医生拍拍胸脯：“我救你。”

“是吗？我过去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么大本事？”毛泽东笑着对医生说，随即站起来说：“那就走吧。”

到了游泳池，医生拉着毛泽东要从浅处下水，毛泽东没有理他，径直朝深水区走去。

“不行，不行！凡事要由易而难，先从浅水开始。”医生急忙拦阻。

“深水为什么不行呀？”毛泽东问医生。

“危险呀！”

“不是有你保护吗？难道你害怕啦？”毛泽东边说边下到深水区。只见他一会侧泳，一会儿仰泳，潇洒自如。此刻，医生方才如梦初醒，原来毛泽东的游泳技术是这样的娴熟。

毛泽东对愣在那里的医生说：“我家门前就有个池塘，小时候我就在那里游泳。那时，你这个生命还没有起源呐。”

从此，毛泽东喜欢上游泳这种休息方式，他说：“游泳这种休息好，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不想事，让大脑很好的休息。吃安眠药、散步、看戏、跳舞都不行，就是游泳可以做到，因为一想事就会下沉，就会喝水。”

后来，中央办公厅在中南海游泳池的旁边盖了一个室内游泳池。毛泽东常到那里游泳，有时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因急于处理公务，也会追到游泳池来找毛泽东商议。

这天，护士长吴旭君来到游泳池边，对池内游兴正浓的毛泽东喊道：“主席！少奇同志和总理他们来了！”

“好啊，他们来了，咱们就上去。”毛泽东说着，就向池边游过来。

上岸后，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已经走了进来。毛泽东和他们一起围坐在游泳池边的藤椅上。

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说：“主席，前一阶段‘四清’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斗争过火的‘左’的错误……”

毛泽东打断刘少奇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四清”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简称，是河北省保定地区在1963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中，通过对农村基层的账目、仓库、财物和农民社员和农村干部的收入工分进行清理，发现和解决农村基层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这种方式，非常直观、具体，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很快就得到推广。由于这种方式是以清理账目、仓库、财物、和工分为基本内容，所以被简称为“四清”。多吃多占的现象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公愤，因此，在运动中，出现了打人、捆绑罚跪、吊人等极端现象，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左”的错误。此时，他接着毛泽东的话说：“是的，我们想利用这次开人大会的机会，各大局的书记都在北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纠正前阶段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

毛泽东看看周恩来和邓小平说：“是你们大家的意见？既然大家都沒有意见，那就开吧。”

12月1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这里召开。会上，中南局书记陶铸、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东北局书记宋任穷、西北局书记刘澜涛、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华东局魏文伯、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先后发言。可能是受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一句话影响，从这些共产党“封疆大吏”汇报上来的材料看，中国大陆的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了，可以说，大陆基层的政权已经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都不在共产党的手里了。

这年的5月15日至6月17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6月8日，毛泽东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后的20多天后第一次在会上讲话。当周恩来、彭真插话介绍了下面被敌人掌握政权的不少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接着说：“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

刘少奇接着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我的注意。”

那次工作会议结束一个月后，7月14日，刘少奇来到南京，坚持不住设备完善的中山陵高级招待所，而是在省委办公大楼一间办公室住

下。他在南京讲了两个下午，在报告中强调“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占基层干部的多数，并提出近一年的城乡社教都没有搞好。

于是，12月17日，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时说：“我们的调查情况，西北地区328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149个，占总数的45.6%。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和反革命，有的自己可能就是反革命。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

18日，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发言说：“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的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张家口地委整个都烂了……陕西省属于夺权问题的有26个。河北永年县我在的那个大队就要夺权！”

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说：“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农村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中山县22个大队，已经烂掉有11个，占50%，公社一级，烂掉的和基本烂掉的不少于三分之一。基层干部中没有剥削的很少！”

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我们那里有一个县，全县21个大队，几乎全部不在我们的手里，可以说，是在国民党手里。”

19日，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从调查情况看，包产到户对贫下中农损害很大；好水田都被干部包走了，干部还利用职权搞腐化，两极分化严重；安徽省是单干占优势！”

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夺印》，就是讲述苏北的一个农村政权被地主在幕后实际掌控夺权的故事。这部电影在当时十分轰动。如今，通过会上汇总的情况更让人感到，基层政权被坏人掌控的现象已如此普遍，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

那么，这种现象究竟是什么性质？应该如何应对呢？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

刘少奇问：“陶铸同志提出，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讲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

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搞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那些当权派，干部，从来没有搞过，没有搞臭过。他是当权派，又是共产党，他又给定工分，上面又听他的，群众拿他们就没有办法。所以，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他们骑在群众头上，群众就不好过，就穷的要死！我们要先打豺狼，再整狐狸。不能只打狐狸，不打豺狼。”

刘少奇似是附和，似是坚持的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并不认同：“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的看法，其实也是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干部的看法，也是电影《夺印》所要反映的看法。他们认为：基层政权的演变，主要是地主、富农这些仇视共产党的人在背后起作用。共产党的敌人是谁？是国民党，是地、富、反、坏、右，他们要改变共产党的政权，这是顺理成章的，就像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很容易理解，因此，运动的矛头就应该指向地主、富农。

而毛泽东的看法则不然，他认为，地主、富农在农村早已经被斗臭了，没有权了，因此，在农村形不成气候。现在农村能够欺压、鱼肉百姓的只能是那些在台上掌权的干部、当权派，群众最有意见的不是地主、富农，而是这些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因此，农村的主要矛盾是群众与干部之间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也应该是整这些变质的当权派。

应该说，毛泽东的看法似乎不很合逻辑，但却更符合实际，也是更接近群众和老百姓的想法，但一时却又很难让各级领导理解和接受。

不管是理解也罢，不理解也罢，只要是毛泽东说的，那就是真理，大家就听，谁也不会去反对。接着，大家就按着毛泽东的提法，开始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应该对他们采取怎样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的意见，打击面不要过宽。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

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建议：“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还是‘四清’。”

在这里，毛泽东已经赋予“四清”一个全新的概念了，其外延已比原来的“四清”大大地扩展了。

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说：“赞成！”

刘少奇是真的没有明白毛泽东的含义，还是已经意识到毛泽东的提法可能对整个政权带来的震撼？

毛泽东说了一句答非所问的话：“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彭真接着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刘少奇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掉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

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的地主当权的。”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

他又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

李先念：“不整当权派，最后就整到贫下中农的头上了。”

毛泽东：“根本问题就在这里。”

刘少奇：“一次搞不清，以后还会发生。”

毛泽东：“只要隔两三年不搞，就又来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漏划，一个新生，一个烂掉，那是当权派，要搞主要的。杜甫《前出塞》九首诗，人们只记得‘挽弓先挽强，用箭先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其他记不得了。大的搞了，其他狐狸你慢慢地清嘛！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不要他当部长，下去当经理，擒下马来，然后改造。”

刘少奇：“重点是党。”

毛泽东：“重点在党。冶金部是党委，白银厂是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支委。抓住这些就有办法。你高扬文开始到白银厂也是庇护的，一蹲点变了。你王鹤寿庇护，变了吗？”“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刘少奇说：“‘四清’与‘四不清’交叉，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赶紧附和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还在坚持他的“交叉”理论：“政治、经济、思想、组织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毛泽东不说话了，只是吸烟……

第二天，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当毛泽东说到“这次运动的主要矛盾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时，刘少奇插话说：

“恐怕不能太绝对吧。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矛盾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为好……”

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打断刘少奇的话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的交叉？什么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吗！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一锤定音。

就在这天夜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是红色机要电话，他拿起电话，里面传来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的声音：

“是伯达同志吗？”

“是我……”陈伯达刚刚服了安眠药躺下，拿着听筒迷迷糊糊的答应着。

“我是徐业夫，主席让您来一下。”

第2回：急召唤，陈伯达夜半领命 发感慨，生日宴伏笔玄机

对领袖的召唤，陈伯达不敢怠慢，他赶紧对徐业夫说了声：“好的。”就匆忙下了床，穿上衣服，赶了过去。

看见陈伯达进屋，毛泽东对他说：“打搅你的好梦啦？”

“没有，没有……”陈伯达赶紧回答。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起草一份会议的纪要，你来负责。”

“好的，好的……”

“纪要的提纲你看这样写好不好？”

于是，毛泽东开始述说，陈伯达摊开本子就记……记着，记着，安眠药的药力发作了，他只觉得眼皮越来越沉重，努力强打精神，也只能机械地记下毛泽东的一条条意见。终于，他听见毛泽东对他说：“就这样吧，你回去整理一下，整理好后咱们再研究研究。”

“是。”陈伯达赶紧收拾好纪录，回到家中，倒头便睡。

第二天一早醒来，安眠药的药力退去，陈伯达连忙翻看昨夜记录，不由一阵叫苦不迭：昨夜迷迷糊糊记的笔记，连他自己也看不明白了。

陈伯达赶紧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王力打电话。

王力参加过当时中共与苏联论战文章的起草工作，是由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推荐的。他还执笔完成中共中央以林彪的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曾在大陆轰动一时，在台湾和美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从1964年起，王力受命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陈伯达的电话打进来时，王力还在睡觉，一听“大秀才”找他，连忙赶了过来。

陈伯达把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向王力简略地传达完后，又不无担忧地说：“看来，毛主席是对刘少奇有意见了。”

王力闻言，大吃一惊，忙说：“这怎么可能呢？”

是啊，刘少奇向来以毛泽东的马首是瞻，是党内公认的毛泽东的接班人，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曾多次予以肯定。此时，刘少奇的大幅照片已取代朱德的照片与毛泽东的照片一起悬挂。“刘主席万岁！”也已成为各种集会时的必喊口号。

陈伯达接着对王力说：“毛主席说，刘少奇想当秦始皇，我看还不够格。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他是瞎指挥嘛，不了解中国的实际。在社会主义革命上，他代表不了无产阶级，代表的是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下去，只能作革命的绊脚石。”

王力一听，也着急了，忙问：“你怎么看呀？”

陈伯达说：“方针政策我同意主席的意见。但是，少奇同志是很纯洁的共产主义者，两个主席意见不统一，对党对国家都很不利呀。”

王力表示同意，他说：“那是否想个办法，在两位主席之间调解一下。”

陈伯达点头说：“是啊，是啊……”

接着，陈伯达说了几个办法，都被王力否了。最后，王力说：“我看你办不了这事，还是靠别人吧。最好和彭真、陶铸他们说一下，让他们想想办法。”

陈伯达听了，默默的想着，半晌没有吱声。

随后，王力帮助陈伯达整理会议纪要，他到底比陈伯达小 17 岁，很快就从纷杂的记录中整理出了大概的眉目。

第二天，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讨论会议的纪要。

12月23日，陈伯达拿出会议纪要的第一稿完成，题目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 16 条。后来又加了一条：“以上各条原则适用于城市的‘四清’运动。”成为 17 条，于是这个文件后来被简称为“十七条”。

24 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毛泽东批示：“照办”、“照发”。

但是，毛泽东对“十七条”中的一些提法还是觉得不很满意。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就先发下去吧。

12 月 26 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

生日,但这次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他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还有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

这天下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要散之前,服务员分别通知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散会后就地稍等。”

会议结束后,大会代表和其他主席团成员纷纷离去,只有他们4位在原地等待着。不一会儿,周恩来从后台走来,向他们招手。他们随周恩来到后台北边一间休息室内,朱德已坐在那里。周恩来将这4人一一向朱老总作了介绍。

周恩来问邢燕子情况怎么样?

邢燕子说:“会议多、兼职多,与群众一起干得少了,这个我们受不了。”

周恩来说:“不能层层会议都让你们参加,要与有关部门联系,叫他们给挡一挡,保证你们在基层的时间,千万不能脱离群众,这不仅是你们的要求,也是党中央的希望。”

接着,周恩来又问陈永贵:“你家属住协和医院我去看过两次,向医生讲了要尽力治疗,现在怎样?”

陈永贵的妻子患乳腺癌,曾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周恩来的关心让陈永贵十分感动,他说:“感谢总理的关怀,现在情况还可以,请总理放心。”

周恩来看了看表后,对大家说:“跟我走吧。”

周恩来、朱德肩并肩在前面走,他们4人在后面跟着。又转了几个弯,大家在一间小宴会厅走廊内停下来。只见里面临时摆放的几张藤椅上坐着陈毅、贺龙、董必武、陆定一等领导人,他们正谈笑风生。周恩来向大家介绍陈永贵他们4人:“这几位是主席请来的客人……”

室内品字形摆了3张桌子,每桌中间放了一大盘苹果。陈永贵他们4人这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主席请他们吃饭,这太令人惊喜了!

没过几分钟,周恩来陪着毛泽东走进宴会厅。老人家穿一件白布衬衫,衬衫束在长裤子里,满面红光、精神抖擞。

这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走了进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握手一边对李富春说：“富春来了，你们好啊，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搞独立王国！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就是你们计委系统。”

大家不知道毛泽东这是什么意思，谁也没敢吭声。好在李富春和毛泽东是老乡，又一起革命多年，彼此十分了解，只当是毛泽东对他的批评，笑了笑，没有分辨。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左右两边分别是邢燕子和董加耕，邢燕子右边是陈永贵，董加耕的左边是王进喜。他们这桌还有曾志、钱学森、彭真、罗瑞卿、谢富治。而刘少奇、共青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和各大区书记以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则分坐另外两桌。

这时，董加耕瞥见毛泽东白布衫后边还有一块不小的补钉，这使他吃惊！

毛泽东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三同’吧！”

“三同”就是指共产党的干部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孩子们要来，我没有让她们来。我说你们没有资格。他们没有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为革命做出贡献，所以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领导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又挨个询问了回乡知识青年代表邢燕子、董加耕读了几年书，接着又问余秋里，余秋里回答：“3年小学。”

毛泽东说：“3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就不错嘛！不要像有些人，书读得越多，越蠢，猪碰了壁知道回头，有些人比猪还蠢，碰了壁不知回头。”

老人家转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

“50岁。”

“五十而知天命。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毛泽东又问董加耕：“你在乡里能看到《参考消息》吗？”

董加耕说：“一个公社只有一份《参考消息》，只有一把手能看到，并且一看完还要封起来退到县里。听说要保密。我是党委委员，偶尔

从书记那里看到《参考消息》，就是字太小……”

听到这儿，毛泽东马上对周恩来说：“《参考消息》要多印一些，纸（字）要大一些。反面教材就是反面教员，可以教育人，我们也可以出蒋介石选集，可以教育我们。”

彭真插话：“从孙中山开始就反对贪污腐化，至今也没有反对得了，贪污腐化也是反面教员，也可以教育我们……”

开始上菜了。桌上放着红、白、黄3种酒，大家是分餐制，每道菜是一个小搪瓷盘。除了一盘盐水虾外，基本都是黄瓜、苦瓜、青辣椒、包菜、还有胡萝卜等一些蔬菜。

毛泽东接着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是我的生日，过了年就71岁，我老了，也许不久就要去见马克思，所以今天请大家来吃顿饭……”他给陈永贵和钱学森递烟，然后继续说：

“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党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女儿嫁给一个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他们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5月、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还担心党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产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兴起。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依靠他们。”

毛泽东喝下3杯茅台后，大声称赞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

众人都神情紧张地听着。毛泽东似乎觉察到了拘谨的气氛，换了口气劝大家吃菜，并问身边的陈永贵：“湖南菜，辣啊，习惯吗？”陈永贵赶紧频频点头。

席间，毛泽东还不断给邢燕子、董加耕夹菜。当毛泽东知道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时，便问他：“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并向他竖起两个手指。董加耕直直地盯着毛泽东，怔了神。他心里想：“我们那里水乡桥很多，怎么只有两桥呢？”他一时没听懂毛泽东话的含意。

毛泽东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

董加耕一下子想起来了，便高兴地回答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

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起来。

这一餐饭吃了大约两个小时。散席时，毛泽东和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当看到曾志时，他又向钱学森和陈永贵介绍曾志说：“曾志同志，井冈山的，现在井冈山没有几个人了。”他在怀念井冈山的岁月。

散席后，汪东兴召集董加耕4人立即把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下来，董加耕在4人中学历最高，高中毕业，就由他执笔，大家一段段、一句句回忆。当晚一式三份，交给汪东兴，由国务院、团中央、中央办公厅存档。

第3回：执《宪法》，一番话寓意深长 再通过，众书记重返北京

28日下午，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中央工作会议，仍然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会前，他向工作人员要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文件》，一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将其带入了会场。今天开的会议，既不讨论宪法，又不讨论党章，毛泽东带那两本小册子来干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诧异。

在外交部长陈毅及总参谋长罗瑞卿、公安部长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讲话，对“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是写运动的性质，是这样写的：

“几种提法：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认为还是第三种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也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所以，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1962年，北京一个月，北戴河一个月，搞出一个公报，就是讲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

“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了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再次更加明确的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的这番如此明白清晰的发言，并没有引起与会者的积极响应。接下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发言，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但是，对运动的性质都没有再说什么。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开始说话了：“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

周恩来答：“算集会。”

毛泽东：“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

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批发了中央811号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十七条”。

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在这一天闭会，于是，各省委书记也开始陆续返回。但是，通过“十七条”和闭会时，毛泽东没有参加。

这天晚上，毛泽东的夫人江青请陶铸和陶铸的夫人曾志看她组织

改编的现代京剧《红灯记》。曾志是毛泽东前妻贺子珍的老战友,井冈山时就跟着毛泽东,与毛泽东无话不谈。陶铸是中共上层有名的直爽人,笔杆子也可以,一贯紧跟毛泽东。江青每次到广东都受到陶铸和曾志的热情接待,陶铸和江青说话也不拘束,是党内高层中为数不多的敢在大庭广众面前数落江青几句的人。

开演前,休息室内,毛泽东见到陶铸就问:“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尿!我虽然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吗!”接着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

“有的已经走了。”陶铸回答。

毛泽东斩钉截铁的说:“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这时,服务员走了进来说:“主席,演出快开始了,入席吧?”

“好的。”毛泽东一边答应着,一边和陶铸他们向大厅走去。

戏开演了,江青一边向陶铸介绍着剧情,一边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

又是一个“有人”!指谁呢?陶铸和曾志隐约感到是说刘少奇,可又不敢往这方面多想。当年高岗就是因为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以为刘少奇不行了,四处联络,想取刘少奇而代之,结果被搞下去了。

但是,需要把毛泽东“通知省委书记返回”的意见转告刘少奇。陶铸毕竟只是地方大员,还不能召集各省的领导进京开会。于是,演出结束后,他先找了主持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并约了彭真一起来到刘少奇的家中,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劝告刘少奇,要注意尊重毛泽东。

刘澜涛等人也深为毛泽东和刘少奇二人的关系而担忧,毕竟关系到党内的团结。他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求助于开国元勋朱德元帅和贺龙元帅:

“朱老总啊,您看主席为少奇同志在会上插话生气了。这样下去会影响工作,您是不是和少奇同志谈谈,以大局为重啊。”

朱德和贺龙一起来到刘少奇的家中……

12月30日,毛泽东将《十七条》中关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一段话作了修改:“这些当权派有在幕前、有在幕后的”,“在幕后的,

有在下面的，有在上面的”，“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12月31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说：“照改的（第二面倒数三行）文字，重印。请少奇同志阅后交机要室办。这是伯达同志建议的，我同意。如你也同意，则请交办。”

刘少奇同意，中央办公厅发出了814号文件，通知停止执行中央811号文件，称：这个文件“中央尚在修改中，请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

1965年1月3日下午，毛泽东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会议选举刘少奇连任国家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国家副主席。

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确定：国务院副总理林彪排名第一，取代了二届人大在副总理中排名第一的陈云。陈云退为其次，邓小平名列第三。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四清”情况，通知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也参加。再次当选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走进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时，发现夫人在场，愣了一下。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是讲《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是王光美在1963年11月至1964年4月间，带着河北省的“四清”工作队，在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宕公社桃园大队总结出来的经验。他们采取战争年代开辟新区的做法，先“访贫问苦、扎根串联”；进而在此基础上从小到大“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进行清查，“洗澡放包袱”；再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后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桃园经验，报告的题目是：《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1964年8月1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

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8月27日，毛泽东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及有关材料，又拿到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讨论。大家都同意发出。自此，《桃园经验》风靡全国。

根据《桃园经验》的做法，工作队一开始就以对待“阶级敌人”的方式对待基层干部，因此，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会扩大打击面，越搞越“左”，极大地伤害了农村基层干部。

在1965年1月3日晚间的会上，毛泽东一上来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15000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刘少奇解释说：“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

毛泽东严厉批评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40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毛泽东说的这个小县是河北省新城县，这是王光美正在抓的一个“四清”点。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新城工作团，下去前，毛泽东对他们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化个假名；二是不要当官；三是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因此毛泽东对新城的情况十分清楚。

他继续说“你一个新城县，28万人口，下去15000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搞人海战术不行。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

“……没有虱子不要硬找。没有虱子能找出虱子来？这样集中力

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顿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

“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在斗争中群众会选出自己的领袖来。面上，有灾的救灾，无灾的清工分。要注意分配，抓冬季生产，‘四清’放在后面。有不清者清之，无不请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运动的方法，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的最厉害的。干部有的不要撤职，而是调职，还可以到别处革命去嘛！总而言之，第一依靠群众，不能依靠我们这些工作队。”

毛泽东说：“要那么多工作队干什么，小站有一个陈伯达就行了。”转脸问刘少奇：“你在安源不是一个人吗？”

刘少奇说：“有群众。”

毛泽东接着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当刘少奇说“四清”运动的结果就是贫下中农占优势和建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时，毛泽东说：“这就行了。工厂里也是可靠的工人占了优势，就行了。”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大家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

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检讨。当他说道：“毛主席讲话时我不该插话，这是对主席不尊重的表现……”时，毛泽东说：“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原则分歧——修正主义与反修正主义的重大分歧！”

1月5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

“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月6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毛泽东1月3日、1月5日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一些人已经意识到，这次要讨论的可能不仅仅是工作方法问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现在看来，有些问题是比较明白了，但还不是全都明白了！还得再听听，看看。总之问题是较大的，不只是方法问题。”

中南海迎春堂陈伯达家，几位“秀才”聚集在那里，由陈伯达执笔，整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纪要。

门前，一辆小轿车随时准备出发。

“秀才”们讨论一阵，陈伯达写出几页，马上让通讯员乘小轿车出发，驶出中南海西门，来到约一公里左右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立即付排。

小轿车回到迎春堂时，按照前几页手稿排出来的清样，已由通讯员带回来了。如此这般，陈伯达在紧张地进行“流水作业”。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以高质量排版，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准排错。

文件全部写出，排好，陈伯达亲自步行给毛泽东送去。

从9日起，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第4回：生活会，刘少奇诚恳检讨 难求索，毛泽东重上井冈

1月13日下午15时30分，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17人。刘少奇在会上主动做了自我批评，检讨了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自己在思想上与毛泽东的差距，并对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刘少奇是中共党内享有很高威望的领导人之一。开这样的生活会，使会议参加者深受感动。王任重当天日记的标题就是“难忘的一天”。他写道：“党的领袖和他们领导下的干部在一起开党的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在全世界党的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经过毛泽东改定后的文件在1月14日交会议讨论通过后，便以中共中央名义印发全党。这份文件，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意志，否定了刘少奇的意见。文件的标题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总共二十三条，后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和“十七条”最大的不同，是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性质的认识：

在“十七条”中，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有3种提法：(1)“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这3种提法包括了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不同意见。

“二十三条”则明确指出：“十七条”的“前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这两种提法，不说是什么社会里的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说是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也不说是什么历史时期、什么阶级内容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从字面上看

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可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可能用;所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什么历史时期也可能用;这些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后一种提法,概括了问题的性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同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城乡社会主义的阵地。”这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提法,批判了刘少奇的提法。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又找毛泽东谈话,作自我批评,并连续在家中举行部分中央领导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在不久后举行的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当着许多中央领导人的面说:“我批评少奇同志了,但你们今后还是要听他的话哟。”

众人心中提起的千斤巨石落了地。

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结束。

随着“二十三条”的下达、贯彻,“四清”运动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得到了纠正,解放了大批基层干部,受到广大基层干部的欢迎,城乡一度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和,有的地方出现新的生产高潮。同时,各地在开展运动中,强调突出政治,强调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四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从而构成了这一阶段运动的独特景观。“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逐渐成为“四清”运动的重点。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业已感到,已经开展的“四清”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政权的巩固问题,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谁来监督这些当权者?他对这场运动逐渐失去了兴趣。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毛泽东已透露出这种想法:“你只要不触及全面问题,枝枝节节、修补补不行。”

毛泽东在思索,他希望冲破现有的体制,找出一种方法,能给予人民最广泛的民主,监督当权者的权力,确保共产党的事业千秋万代继

承下去……

他翻阅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企盼能找到答案；他研读了中国历代帝王留下的浩瀚文献，希望能从这些治国方略中获取灵感。

他似乎得到了某些启示，仔细想来，又很茫然……

老祖宗没有给他留下多少现成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描述甚少；列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还没有来得及建设就过早的离开了人世；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遗志，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巩固和建设起来，可惜，却发展成了一个为少数人服务的、新的官僚国家机器。在苏联，马克思、列宁所期望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荡然无存。

看来，还是要靠自己。

1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国务院主抓工业的副总理薄一波的一封信上做了批示。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而像我们这些领导人，官僚主义又很严重，对下面这些严重情况又不能及时发现。这就是在夺取了政权之后一个十分严重的危险。”

薄一波在旁边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

毛泽东批道：“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陈正人在信中还写道：“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和群众生活距离如果不逐步缩小，群众是必然会脱离我们的。”

毛泽东在旁边又写了一段批语：“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劳动），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陈正人在11月25日《关于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报告》上谈到，这个厂和农机工业部门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业的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对于敌情估计不足，对于企业内部存在的严重问题认识不足，特别是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毛泽东在陈正人报告的这段话后批注：“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在印发这段批注的时候，薄一波在“这些人”的后面加了一个注释：“指那些企业领导人中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陈正人是井冈山老战士，1928年任中共江西遂川县委书记，新中国第一任江西省委第一书记。1964年10月上旬，时任国务院八机部部长的陈正人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龄大、身体有伤、蹲点时间较长，安排他住宾馆，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绝，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和工人们住在一起。白天以装配车间工段作为劳动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队吃大食堂，没有丝毫的特殊化。他在工厂学会了开拖拉机、操作和修理机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们的爱戴和拥护。

毛泽东深深赞同这位井冈山战友的认识，这几年，他感到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做起了老爷……因此，他强烈要求领导干部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实行“三同”。但是，他觉得，他的话在北京很难真正的贯彻下去，很多人都是在应付他。

“官官相护呀！”他气愤，又有些无奈，还有一种大权旁落的感觉。

1965年3月，毛泽东离开了令他感到郁闷的北京，他的专列沿着京广线风驰电掣般地向南方驶去。3月16日下午，毛主席专列到达武昌，悄悄停靠在余家头一所战备物资仓库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省长张体学早已在此恭候，看见毛泽东下车，他们大步迎了上去，说了声：“主席好！”

毛泽东笑着和他们握了握手。

没有寒暄，也没有其他人迎接。毛泽东不喜欢那一套。几辆小车轻车简从、毫无张扬，驶出军用战备用品仓库。经小东门、中北路，开往东湖路，从东湖路驶进湖北省委东湖客舍大院，过“百花”、“南山”，最后停在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

沿途没有戒严，也没有一个武装人员。湖北省公安厅警卫处接到中央警卫团关于毛泽东将来武汉的指示后，只是迅速启动了一级警卫。所谓的一级警卫，就是省市公安厅、局、各区公安分局、派出所、户籍民警和居委会四级联网，对辖区内普通老百姓任其自由活动，“五类分子”，即当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劳改释放犯、右派都给予不动声色地监控，对外来人口予以疏散，布置“三红”，即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监控“五类分子”。不用任何行政成本，效率极高。

梅岭一号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湖北省委修建的一处平房。内有十间大小不等的房间，空间比较高大，内部装饰朴实无华。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到武汉，都在此下榻过。此时，毛主席一跨下车，迎面几张熟悉的面孔便开出灿烂的花瓣。梅岭一号的工作人员金文骏、邬素英、王天亮、化验员小周，站在大门口，像迎接亲人一样迎接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则高兴地伸出右手，笑着说：“同志们好啊！”

“主席好！”“主席好！”几个青年人握住毛泽东的大手，笑得非常高兴。

王任重、张体学陪同毛泽东走进梅岭一号，穿过接见厅、小会议室，在书房里坐了下来。汇报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打道回府，没有在梅岭用餐。梅岭一号、二号也没有任何“接风酒宴”。毛泽东坚决反对地方搞迎送接风这一套，谁也不敢献一点儿“殷勤”。

一天，毛泽东和几个工作人员漫步登上湖北的洪山，眺望山下滚滚东去的长江，他又陷入了沉思……

突然，警卫人员惊呼，“对面山上的房子着火了！”

沉思中的毛泽东望着熊熊燃烧的草屋，忽然冒出一句：“烧的好！”
随行人员十分不解，忙问：“为什么呀，主席？”

“不破不立嘛。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草屋烧了，可以盖瓦房，盖高楼。”不打碎现有的旧体制，人民享有真正民主的新体制又怎么建立起来呢？可是，要打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成果，又会是怎样一种心情？

毛泽东面对滔滔江水，随口咏出：“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

“主席又要写诗吗？”跟在身后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问。

毛泽东说：“不是。这是王安石的诗，是讲后继有人无人的问题。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考虑江山将来变不变色呀。现在苏联已经变色了，我们党内也有修正主义……”

张耀祠说：“中国的老百姓在旧社会受苦受难深重，就是有人想叫他们走回头路，恐怕也难……”

“问题不是这样看，”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深重，一旦过上好日子，也会忘乎所以。”

44天后他离开武汉到长沙。

5月21日，刚刚在长沙游完长江的毛泽东再从长沙出发，经株洲、醴陵、攸县、茶陵、莲花、永新、宁冈，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之路重上井冈山。

井冈山，毛泽东的事业真正的起步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井冈山就没有毛泽东的今天，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今天。站在井冈山黄洋界上，毛泽东望着茫茫云海，漫山杜鹃，心潮澎湃。38年前，他将一支濒临破碎的共产党武装带到了这里，那时，是何等的艰难，多少人不辞而别；多少人壮烈牺牲；他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硬是将这支弱小的武装由小到大发展起来，这才有了今天的政权。如今，他担心自己和战友们亲手创建起来的政权会重新变成欺压人民的政权。怎样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是否需要打碎自己亲手创建的政权另起炉灶？有多少人会赞成和支持这样做？他不知道。

但是，他仍然要努力！否则，井冈山的路不是白走了吗？38年前那么困难都走过来了，现在比那时候的情况要好许多。

第5回：反特权，部队取消军衔制 忆往昔，胸中已酿万丈澜

在去井冈山的列车上，毛泽东特地邀请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和他的妻子唐慕兰到他的专列休息。

毛泽东兴奋地望着窗外一望无际的农田，在微风轻抚下，荡漾着层层叠叠的绿波。他心情舒畅地说：“今年的早稻收成会不错吧。”

张平化认真地回答：“主席对农业恢复时间的判断是正确的。”

毛泽东说：“问题不在于谁的判断正确，在于包产到户还是农业集体化。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如果无产阶级不加强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包产到户，短期内可能会增加一些粮食，时间长了，就会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就会重新起来，剥削劳动人民。”

“所以主席在北戴河会上说，搞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是一种阶级斗争。”张平化答道。

“对。客观上就是阶级斗争。现在有些人不愿意承认它。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存在，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讲阶级，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还有没有阶级？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在无产阶级掌权了，不让资产阶级复辟。资产阶级掌权，不让无产阶级起来，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剥夺你，这就是阶级斗争嘛。不过形式有所不同，资产阶级嘴里不承认，实质一样。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毛泽东继续说。

张平化用力地点头。

毛泽东笑了，吸了一口烟说：“我的人生第一课也是阶级斗争。1906年底这条铁路上萍乡、浏阳、醴陵等地爆发了起义。声势很大，涉及周围十几个县，衡山、平江、万载、宜春、修水，好几万人，连韶山小山

沟都震动了，我父亲做小生意半路打道回府。可惜不到一个月起义失败了。火车运来清军，抓住造反的人，挖心而食，杀人像割稻子一样。起义军有个领袖叫刘道一，是个同盟会会员，20多岁，后被人出卖，宁死不屈，头被砍了四次才落下，惨烈得很。我从小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件事，官逼民反。”

毛泽东的目光依然静静地注视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伸向远方……他缓缓地回忆起1927年在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忆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他的声音带着一种苍凉，一种深情。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慢慢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转回来，当年安源大罢工吸取了萍浏醴起义失败的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也是接受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失败的教训是什么？毛泽东严肃地告诉张平化：“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张平化陪同毛泽东来到了井冈山。他本来准备在井冈山陪毛泽东多呆几天，因有会议，需要提前下山。他们夫妇前来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将他们一直送到门外。当张平化提出：“湖南的同志想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上照张相”时，毛泽东欣然同意。照完相后，湖南的小车队缓缓起步，这时，张平化从汽车的后视镜中突然发现，毛泽东也一步步地走下宾馆的台阶，随着已经启动的车队走起来。

“老人家是要步送我们下山，这如何担当得起。”张平化赶紧叫停。他下了车，跑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这可使不得，您一夜没睡，还是赶紧回房休息吧。”

毛泽东挥了挥手说：“有得关系。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步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泪对毛泽东说：“请主席保重！”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

毛泽东大声地对他说：“上车吧。你不要忘记我在火车上对你说的话，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

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泽东,大声地回答说:“主席,我懂了。”

湖南的小车队再次启程下山,张平化回头看见,毛泽东的大手还在摆着,大步还在走着……泪水在张平化的眼眶中转悠。

送走张平化后,下午两点多钟,在井冈山茨坪宾馆,毛泽东又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王卓超谈话。他说:

“昨天散步回来想了很多。井冈山道路的探索是中国革命最关键的一步。为了创建这块革命根据地,不少革命先烈牺牲了。他们是一批有信仰、有抱负的年轻人。牺牲时都只有二十多岁呀!”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道: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的政权变了颜色,苏联党内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利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还要打击迫害。”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甚至比较严重,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但报喜不报忧,这也是官僚和封建东西。做官有特权、有政治需要、有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

“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当然,像‘二十三条’讲的,这里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还是个认识问题、教育提高的问题。怎样教育提高?”

“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远新在哈军工读书,他们那个学校高干子弟比较多,有些还是保送的。毛远新高中毕业时也被保送到哈军工,我不赞成,才又去考。考上了清华,第二年转过去。陈赓那时还活着,当校长。他们放假回家,黑龙江省委还请哈

军工高干子弟吃饭，工农子弟就不请嘛！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这和我们井冈山时期提倡的东西不一样。条件好了，共产党掌权了，过去的优良作风还要不要继承？怎样继承？”

他若有所指地说：“主要是看路线对头。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汪东兴回答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

“你们再想想，”毛泽东说，“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从制度方面想。”

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泽东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他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他说：“全国都需要实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用请教的语气问：“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泽东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逐步缩小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这两条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就在这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能

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特权吗？……

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在井冈山上写下了这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抒发着自己的情怀：

“可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如此大的气魄和胆略，还怕什么呢？困难是会有的，越是困难越要试试，“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在井冈山时要向他汇报一下湖南省“四清”运动的情况，毛泽东说：“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毛泽东要为他的理想奋斗和拼搏，此时，在他心里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的风暴……

第6回：说海瑞，吴晗领命几多变 觉端倪，遍京城难觅知己

1965年8月，北京中南海游泳池，江青拿着一摞稿件来到毛泽东身边，对他说：“主席，这是上海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您看看。”

“哦？”毛泽东接过江青给他的稿件。

“这可只给你一个人看啊，你不要跟别人讲。”江青嘱咐说。

“为什么？”毛泽东问。

“总理、康生一知道，就要告诉刘少奇他们，他们会不让这篇文章发表的。”江青说出了她的担心。

毛泽东没有说什么，开始翻阅姚文元的文章。很快，他就被姚文元的文章所吸引。文章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海瑞罢官》中的问题，特别是结合1962年以后出现的“单干风”、“翻案风”进行批判，这和他的思路是一致的。最近，他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也是要向全党、全社会回答的问题，那就是：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复辟的问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资本家被消灭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没有了，资本主义为什么还会复辟呢？毛泽东的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还存在，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尤其是在文化领域、教育领域，这都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而这些知识分子大部分是解放前培养的，是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培养起来的，因此世界观还是资产阶级的，这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来源。要改造他们，不仅是要改造他们的思想，还有他们的理论、学说。因此，要在这些领域进行革命，就要触动这些权威、专家。

他叫来江青，对她说：“文章写的还可以，不过，有些地方还需要修改……”

吴晗，北京市副市长、著名的明史专家、教授、民盟副主席，为人谦

虚、收敛、低调，解放战争时期就支持共产党，多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曾在家中请他吃过饭，邓小平常请他到家里打桥牌，他与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均关系甚佳。

说起他写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还要从1959年4月6日说起。那天，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毛泽东主席的秘书胡乔木，约吴晗到他家，对他说：

“八届七中全会昨天刚在上海闭幕。在这次会上，毛主席赞扬了明朝的海瑞，号召大家学习海瑞敢于批评嘉靖皇帝的精神，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还特别指示我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方法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教授是明史专家，我想请你为《人民日报》写一篇介绍海瑞批评皇帝的文章。”

吴晗闻言，赶紧说：“哪里，哪里，我哪是什么专家，只是多看了几本书。既然毛主席号召向海瑞学习，我一定响应。回去我就写一篇，也是我的学习体会。”

吴晗很快写出了《海瑞骂皇帝》一文，用刘勉之的笔名，发表在1959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刊登不到3个月，就发生了庐山会议彭德怀事件。参加庐山会议的胡乔木一回到北京，马上又找到吴晗说：

“毛主席这次在庐山会议上讲了，我们提倡的是‘左派’海瑞，不是‘右派’海瑞；是真海瑞，不是假海瑞。为了表示我们同彭德怀假海瑞的区别，是否应该说明真海瑞与假海瑞的不同，划清海瑞与彭德怀的界限。”

吴晗明白了胡乔木的意思。很快，他又写了一篇《论海瑞》的文章，发表在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文章的结尾，吴晗特别注明：“我们今天需要的海瑞和封建时代的海瑞在社会内容上有原则的不同。……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太阳里面找黑子，十个指头里面找那个有点毛病的，不及其余。”

吴晗是按照“庐山会议”的精神，不点名的批判彭德怀。在文章中，吴晗还特别指出，彭德怀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根本不是什么

海瑞”，以示与彭德怀的区别。

吴晗的这些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一番关于海瑞的讨论热潮。后来，在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的再三恳求下，吴晗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创作出《海瑞罢官》的京剧剧本，于1961年发表并正式上演。毛泽东看了演出后，在家里请主演海瑞的马连良吃饭，对他说：“戏好，演的好。海瑞是好人。”

毛泽东还对马连良说：“《海瑞罢官》的文字写的也不错，吴晗头一回写戏，就写成功了。”

那天晚上，马连良回到家里，特地给吴晗打电话，告诉他毛泽东的夸赞，这让吴晗激动了好长时间。

既然毛泽东都赞扬了吴晗写的《海瑞罢官》，江青为什么还要批判呢？因为她发现了问题：

1962年7月6日，江青应邀观看了北京京剧团演出的《海瑞罢官》。演出结束后，她一言不发就走了，有心人似乎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果然，江青觉得这出戏像是影射彭德怀的事情，因为在戏院，她听见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就是现在的海瑞……”

回到家，江青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主席，我看《海瑞罢官》有问题，像是含沙射影讽刺我们。现在社会上正埋怨缺粮缺菜，没有肉吃。他们偏偏这个时候在舞台上搬出海瑞，臭骂皇帝，是什么目的？这是借古喻今，要批判。应该停止公演。”

江青一上来就要停止公演，毛泽东甚不以为然，对她说：“你说停演就停演？”

“那是在攻击我们！”江青强调。

毛泽东没有接她的话，而是说：“有工夫你还是多看几本书吧！我还想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呢。”

“那我保留意见总可以吧？”江青执拗的坚持自己的看法。

“你保留意见当然是可以的。”毛泽东也很民主。

由于长期与毛泽东一起生活、工作，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思路了解得肯定比其他人更多一些。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四个正副部长陆定一、周扬、姚溱和许立群，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化工作的意见：“现在舞台上、银幕

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问题严重；应该很好的组织批判。”

陆定一、周扬等人均表示一定认真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

这时，江青又谈起《海瑞罢官》这出戏。她问陆定一等人：“你们对《海瑞罢官》怎么看？我个人认为很有问题，也应该好好组织批判。”

陆定一想了想说：“对海瑞进行研究是毛主席提出来的，吴晗是一名历史学家，能够跨行业写京剧剧本，也是一次尝试，还是挺勇敢的，不说批就批吧。”

江青马上摆了摆手说：“既然你们不同意，那就以后再说吧。”

一天，江青来到康生的家里商量京剧改革的问题。谈话中间，她突然问康生：“有一出新编历史剧，叫《海瑞罢官》，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不知道康老看过没有？”

康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资深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此时他听到江青提到《海瑞罢官》，说：“我知道他们写了这个剧本，但是还没有看过这出戏。你看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笑了笑说：“等你看完我们再讨论吧。”

康生很快就让人安排看了《海瑞罢官》。当江青再来到康生家时，康生已经有了自己的意见。他对江青说：“《海瑞罢官》这出戏，严重地违反历史事实。历史上的海瑞可不是那样的。尽管海瑞是一个清官。对清官我们现在也要作历史的和阶级的分析。他对明朝的嘉靖皇帝可是忠心耿耿呀！”

江青笑了笑说：“看来你这个肃反专家还是没有看出根本问题所在。在我们党内，有一个人可是自称海瑞的，你知道是谁吗？”

康生说：“那还用问吗？彭德怀嘛，这是个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他有什么资格自称海瑞？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王莽似的人物。这一点，我曾经和主席说过，彭德怀好像王莽。”

江青说：“不管彭德怀是什么人，党内可是有人把彭德怀当海瑞了。我就亲耳听到过这样的议论。我在这出戏上演的时候，在剧场里就有人说彭德怀就是当代的海瑞，总有一天会有人给他平反的。”

康生马上回答说：“彭德怀够格吗？根本不够格！”

想了想，他又说：“但是这说明了党内路线斗争的复杂性。我早就

听说，彭德怀要翻案，我们政治局里也有人支持他站出来工作。”

江青点点头说：“许多人在主席面前吹风，主席把这个问题压了很长时间。看来这个问题未必能压得住。因为国内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上上下下的谣言很多。不是有一出叫《窦娥冤》的戏吗？那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的名作。说窦娥被冤枉处斩时，发下三桩誓愿，一是血溅白练，二是六月下雪，三是让楚州地亢旱三年。我们国家从1960年开始也是连续三年历史罕见的大旱，有人就把自然现象加到彭德怀一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原因上了，说我们反右斗争是冤枉了他们。于是，也冒出一些自称要学关汉卿的所谓秀才和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写戏、拍电影、出小说，等等。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代表人物平反、翻案。”

康生马上说：“我同意你的看法，对文化界的这场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可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呀！”

随后，他又补充说：“不过，眼下批这出戏还不行，时机不成熟。”

1963年一次开会时，周恩来见到吴晗，突然问他：“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的《海瑞罢官》有影射，是这样吗？”

“没有！没有！怎么会影射呢？”

“这样吧，你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周恩来说。

“好！”吴晗回家后，立即将写作《海瑞罢官》的前后过程写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周恩来。

时光很快到了1964年，康生来到毛泽东的书房：

“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过，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由此，我想到当时演的一出戏，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

“哪出戏呀？”毛泽东一边问，一边抽出烟递给康生。

“就是《海瑞罢官》。我考虑两三年了，这出戏似乎跟彭德怀有关系。海瑞在戏中逼着土豪退田，当时彭德怀不是也嚷嚷着要我们准许农民单干吗？59年庐山会议我们批判了彭德怀，这出戏却把彭德怀说成是海青天，这是在为彭德怀鸣冤叫屈，是要翻案哩。”

起初并没有太注意的毛泽东，听到这里，神色变得严肃起来。

康生看到毛泽东面部表情的变化，他沉默了，想听听毛泽东的意见。等了一会儿，毛泽东仍然没有说话，只是盯住香烟上的一点火光

在思索，康生考虑了一下，又说：“这只是我的一点想法，不一定成熟，提出来供主席参考。”

1964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党内县一级单位，其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材料发下去后，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江青看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这是位年轻的文艺评论家，1954年，在他大学刚毕业，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时，就能勇敢的站出来批判著名“红学”权威俞平伯，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一时名扬天下。江青看到他很高兴，就和他谈起了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希望他还能像当年一样，站出来批判《海瑞罢官》。

李希凡很高兴，但他当时正有别的任务，抽不出时间，而且他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根本不了解。江青只得作罢。

江青曾想找中央办公厅的戚本禹一起来写的。但当时他正在参加批判李秀成的讨论。

江青在北京又找了几个人，都不理想。

7月29日，江青和毛主席一起乘车前往北戴河。30日下午，二人一起登门探望在北戴河养病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他也是深受毛泽东倚重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不过，此时的柯庆施已身患癌症，在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4月20日做手术，6月初出院，7月14日晚饭后离开上海，坐火车来到北戴河休养。

第7回：交任务，姚文元慨然受命 七易稿，陈丕显充当信使

江青将她的想法和柯庆施说了，果然得到柯庆施的支持。他指派张春桥具体负责此事。

张春桥抗战期间，曾在柯庆施手下任《晋察冀日报》副主编，很受柯庆施赏识。全国解放后，柯庆施将张春桥调到上海，任上海《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1957年，张春桥为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起草的政治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毛泽东曾拿着这篇文章问周恩来：“这样的文章你能写出来吗？”

周恩来摆摆手说：“我写不出来。”

1958年，根据柯庆施的提示，张春桥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他在郑州会议上把张春桥和陈伯达并提，声名鹊起，他也由此被柯庆施提拔为上海市委常委。

1961年6月31日，《北京晚报》发表廖沫沙赞扬昆曲《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江青看后认为是大毒草，这一想法也深得柯庆施赞同。于是，由张春桥组织，在1963年5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这是江青最早发表的文艺批判文章之一。而后，张春桥又积极配合江青开展革命现代戏的创作，深得江青和柯庆施的信任。

对于柯庆施和江青这次交办的事情，张春桥十分认真。从此在他的办公桌上又多了一套《明史》，这曾使一些干部纳闷，张春桥怎么忽然对明史感兴趣？

不过张春桥这次没有亲自动笔，而是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姚文元是旧上海著名文化人姚蓬子的儿子，曾写过批判胡风、冯雪峰、丁玲、巴金、艾青等许多中国著名作家的文章，此时已是上海著

名的左派文艺评论家，在文化圈里有些名气。1957年，毛泽东在《文汇报》上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十分欣赏，在一次谈及文艺界问题的讲话中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由此引起了大家注意。

1957年反右斗争中。姚文元凭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写出了《录以备考——读报偶感》的千字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他的这篇文章又被毛泽东看到了，当即通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上加编者按予以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摘要播发。全国各地报纸也相继转载了这篇文章。从此，他一跃成为上海作协党组成员，反右派领导小组成员。柯庆施特别召见了姚文元，并将他调入市委，任上海市委《解放》杂志编辑部文教组组长，直接由张春桥领导。

姚文元还是个理想主义青年，他于1958年9月11日曾经写信给出版社，要求出版社不要再给自己寄稿费。他在给出版社的信中写道：

“上次你们收入论‘约翰·克里斯多夫’一文，汇来了稿费。这次务请不必再寄钱来了。一篇文章出版社成集又拿一次钱，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是资产阶级稿费制度的残余。如果自己将来成书，岂不又多拿一次钱。有什么工人生产一样产品‘拿两次’钱的吗？不发稿费，书的定价也可以低些。如果寄来，我也可以退回的。如果说这是‘制度’，那我就例外一下吧，这个制度反正可改的。”

1965年3月的一天上午，姚文元刚进《解放日报》社上班，张春桥电话就来了，要他马上过去一下。

姚文元答应道：“好，我给报社打个招呼。”

张春桥说：“不用了，你直接来吧，如果报社领导问起，你到时找个理由就是了，此事要保密。”

姚文元于是便找了一个理由，骑着他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来到上海锦江饭店。当他走进张春桥告诉他的房间，看见张春桥正极为恭敬的和一位带着眼镜、神态严肃的中年女人谈话，看见他进来，张春桥立即站起来，向那位女士介绍说：

“江青同志，这就是姚文元。”

随后,他又向姚文元介绍说:“这是江青同志……”

姚文元不敢相信,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

江青站起来,一边和姚文元握手,一边上下打量着眼前这位34岁的年轻人。虽然他身着略有泛白的蓝卡其中山装,足蹬草绿帆布胶鞋,朴素中略显寒酸,但是,那双透亮的金鱼眼睛和已显秃顶的大头,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着颇深文学造诣的人才。

出身上海小开的姚文元没有一点大少爷气息。他在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信仰共产主义,深受共产党革命传统的影响,日常生活十分朴素,甚至有些落拓。他常年穿一身蓝卡其中山装,脚上不是绿胶鞋,就是一双圆口布鞋。肩上的草绿色背包里,除了书以外,时常可以翻到早上吃剩下来的面包等点心。他就以这身装束,到处走动,有一次,曾经步行到上海锦江饭店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在大门口就被“挡驾”了:不让进。

江青一边打量着姚文元,一边说:“哦,姚文元同志,听主席几次提到过你,是无产阶级的红秀才、金棍子。最近在研究什么?”

江青让姚文元坐下,和他聊了起来。

“没有研究什么,按照市委的布置,对一些旧戏和作品组织批判。”姚文元略显惶恐的回答说。

“哦?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吗?”江青颇有兴趣地问道。

“还没有。”姚文元如实回答。

江青随手将一本登有吴晗《海瑞罢官》剧本全文的1961年1月号《北京文艺》,交给姚文元说:“这是吴晗写的《海瑞罢官》剧本。你看看。看完后我们再交流。”

从江青那里出来,张春桥向姚文元交代了江青召见他的目的和任务,并对姚文元说:“你可以先接手下来,至于具体工作中有什么困难,到时给市委反映。”

姚文元感到十分的荣幸,这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亲自给他下的任务。同时,他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批判的对象不同于过去那些文化人,吴晗毕竟是北京市的副市长,弄得不好,会是什么样的结果还很难说。这些顾虑,可能就是中宣部不愿意接受任务的原因。但

是，姚文元曾将自己与李希凡做过比较，他说：“李希凡是搞学问的，我是搞政治的。论旧学底子，我不如他，他毕竟是科班出身；论政治敏锐性，他不如我。我最大的兴趣是写杂文。李希凡是属于学者类型，我只想做一个革命战士。”

姚文元接受了批判《海瑞罢官》任务，他立即向《解放日报》社请假：“市委要我写个东西，要花些时间。报社的工作就顾不上了。”

在此之前，张春桥已给报社领导打了电话，说姚文元一段时间在市委有一定的“任务”，让他们不要安排他的工作。

但是姚文元对明史不熟，他希望再有个熟悉历史的人，帮忙查阅和核对资料。几天后，张春桥告诉姚文元，人已选好，是朱永嘉，复旦大学历史系青年讲师，对明史很熟，当时借调在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任组长。

姚文元直接来到丁香花园——上海市委写作班所在地找到朱永嘉，说市委布置他写文章，请朱永嘉帮忙。

朱永嘉最初是与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另外两个青年教师王知常、朱维铮一起，用“罗思鼎”的笔名，即做革命的螺丝钉之意，写了一些关于清朝乾嘉学派的文章，发表在报刊上。后来，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吴瑞武也加入进来，自发组成了一个写作集体。1964年，他们被上海市委集体借调到华东局内刊编辑部，让他们写一篇与当时中苏论战有关的历史论文，内容是关于中国疆域的形成，以反驳苏联学者齐赫文斯基有关中国古代疆域以长城为界的论调。与他们一起借调去的还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时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的金冲及，担任他们的组长。这篇文章发表在华东局内部刊物《未定稿》上，用的也是“罗思鼎”这个笔名，从此它就成了这个小组的集体笔名。当时兼管华东局的内部刊物的是上海市委文教书记石西民。因为《内刊》编辑部没有历史组，文章发表后，他们被集体留下来。1964年，石西民调到北京文化部工作，金冲及也被他带走，这个写作组由张春桥接掌。因为张春桥不兼华东局的工作，上海市委属下的写作人员就与华东局《内刊》分手，单独成立了上海市委写作班，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是徐景贤。写作班有三个组，文学组由徐景贤负责，哲学组由复旦大学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郭仁杰负责，“罗思鼎”就成了写作班的历史组，由朱永嘉担

任组长。

在此之前,朱永嘉对姚文元早闻其名,但未见其人,这是第一次见面。听姚文元这么一说,便很痛快的答道:“你有什么要求就说。”

姚文元说:“市委让我写明史方面与海瑞相关的文章,请你帮助找些资料。”

朱永嘉知道,姚文元这是奉市委之命,也就是以组织的身份来找他的,实际上也是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

朱永嘉并不知道姚文元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和批判的对象,当时国内公认的明史权威当然是吴晗了。而且,1963年冬,吴晗为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一事到上海开会,曾和朱永嘉有过直接接触。这个会议是在锦江饭店举行,朱永嘉也参加了。会议期间,白天开会,晚上他有时间与吴晗聊天。作为明史权威,吴晗主要研究元末明初这一段。而朱永嘉研究的重点是明朝后期特别是明清之际。他向吴晗谈了自己对晚明和明清之际历史的一些基本看法,如明末的社会问题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明王朝覆亡的原因,明王朝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与庞大的官僚机器内部的重重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吴晗听得认真,并称赞朱永嘉对于明史的看法。之后他对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图集》的负责人谭其骧说,愿意收朱永嘉做他的学生。谭其骧将这话告诉了朱永嘉。但朱永嘉觉得自己在复旦已有老师陈守实,如果转而去拜当时担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为师显然不太合适,所以没答腔。但吴晗对朱永嘉的印象确实不错,让朱永嘉以后到北京就去找他。

于是,朱永嘉首先给姚文元找了一本吴晗编的《海瑞集》,因为这本书将关于海瑞的基本资料都收进去了,另外还有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接着,朱永嘉又将从图书馆借出《明史》、地方志和自己笔记中的相关资料交给姚文元。

姚文元不是搞历史的,在看了这些材料后,就要朱永嘉给他谈谈如何看待海瑞这个人,谈谈嘉靖隆庆年间的历史背景。于是,朱永嘉又给他讲了海瑞的主要生平,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并讲了海瑞这个人耿直,敢讲话,廉洁,为老百姓做过几件事,还谈了学术界对海瑞的评价。

姚文元还求助于父亲姚蓬子为其指点。

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第一稿于1965年6月间完成。江青为此以观看现代京剧《林海雪原》为名特地来上海，亲自审稿。她对这个初稿不满意，认为没深度，不能就事论事批判。她要姚文元再修改。

以后，江青又几次来上海，审阅姚文元的稿子，与张春桥一起提出修改意见。

张春桥也多次将稿子夹在《智取威虎山》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去北京江青处。历时数月，七易其稿。1965年8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终于摆在了毛泽东面前。

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江青非常高兴，她立即通知上海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修改。

1965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接到通知，准备参加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临行前，已是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找到陈丕显说：“陈书记，这是姚文元修改后的批判《海瑞罢官》文章，麻烦你带给江青同志。”

“好的。”陈丕显接过了稿子。

对于江青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的事情，陈丕显是知道的。1965年4月，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病逝，上海市委的工作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负责，江青曾经找到他：

“阿丕呀，我要向你借两个人啊。”

“行啊，借谁？”

“张春桥、姚文元。”

“哦？”

“我让他们准备批判《海瑞罢官》文章。柯老对此事很支持，希望你也能支持我呀。”

“我怎么会不支持呀。”

“那就谢谢你啦。不过，这事要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要讲，特别是不能让北京市委的人知道。”

“写文章还要保密？”陈丕显心里想。但是，江青这人总喜欢搞点新花样，先对外保密，待发表时再一鸣惊人，让大家佩服她，这也难说。

江青与陈丕显关系很好。五十年代江青到上海养病，一直是住在陈丕显家里。陈丕显想：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她这样做，一定有她的道理，也没有多问。

如今，文章写出来了，陈丕显又要担任“通信员”，他有些不安：吴晗毕竟是北京市副市长，由上海出面直接批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却不向北京市委打招呼，会不会影响两市的关系？

陈丕显悄悄将此事告诉了同行的魏文伯，魏文伯也觉得不大妥，两人商量来，商量去，觉得还是找机会向周恩来或他们的老上级陈毅汇报一下。

到了北京，陈丕显没敢耽搁，很快将把稿子交给了江青。第三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介绍了抗美援越的问题，然后各中央局书记汇报。当西北局书记刘澜涛汇报时，毛泽东突然问大家：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

北京市委书记彭真随口说道：“中央出了，你们地方不出，不要紧。中央几个大人，把他一革，就完了。至于地方出了，中央照样出，那就不好了。”

彭真当时在党内的地位非常重要，除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 7 个政治局常委，就要数他了。他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排名于邓小平之后的书记，受命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一身而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真可以说是身负重任。后来，1965 年 10 月 1 日天安门上，有一张照片是彭真与毛泽东并排走上天安门，刘少奇明显的在彭真后面。这张照片，引起中共上层很长时间的议论，以至有人传言，认为彭真要当毛泽东的接班人了。

毛泽东这时把头转向彭真，问道：“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

面对毛泽东的问话，彭真愣了一下，没有马上反应过来。但他到底是在中央工作多年，经常与毛泽东见面，马上就回答说：

“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的代表团，在朝鲜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显然，彭真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问话，他对毛泽东这句话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

陈丕显和魏文伯对视了一下，他们知道，毛泽东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判《海瑞罢官》的。毛泽东的提问，既是征求彭真的意见，也是在给彭真和全体参加会议的人打个招呼。

会后，魏文伯对陈丕显说：“阿丕，这下不用担心了，毛主席都问过彭真了，我看咱们也不用再找总理和陈老总汇报了。”

第8回：易德怀，大会堂拒不从命 亲相约，颐年堂促膝而谈

此时的毛泽东也在想这个问题：姚文元的文章已经修改三次，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能否通过这篇文章，对当前文化、教育和思想领域有所触动呢？他想试试。不过，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批彭德怀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这位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任司令，前任国防部长就一直在北京闲居。毛泽东心里很清楚，彭德怀对庐山会议的决议是不服气的，而且，党内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和彭德怀是一样的，包括一些批判彭德怀很积极的人，他们的思想本质其实是和彭德怀一样的。搞民主革命，打土豪，分田地，这些人是真心实意积极拥护的。但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就不一定了。很多人恐怕连什么是社会主义还不很清楚。这些人积极批判彭德怀，不是因为他的思想和路线，而是由于彭德怀平时性格粗放，树敌太多，所以对他有意见。当然，很多人也是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崇仰，他们未必真的理解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区别。因此，要帮助他们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包括彭德怀。彭德怀曾经要求给他安排工作，刘少奇和党内很多人也同意，于是，毛泽东找来刘少奇和周恩来。

“是不是可以给彭德怀安排些工作呀？黄克诚已经安排了吧？”毛泽东问。

“是的，他现在山西省当副省长。”刘少奇回答说。

“彭德怀呢？是不是也可以安排呀？”毛泽东继续问。

“我看可以。”周恩来表示同意。

“可以，让他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嘛。”刘少奇一边思索一边表示赞同。

“安排什么工作呀？”毛泽东问。

“彭德怀一直想搞农业……”刘少奇刚说了一半，便让毛泽东打断了：

“我看还是让他抓一下‘大三线’建设吧，将来打起仗来也熟悉情况。”

毛泽东知道，彭德怀对庐山会议的结论一直是不服气的，让他去搞农业，说不准又闹出什么事来。

“这个意见好。”刘少奇表示赞同。

“同意。”周恩来也没有意见。

196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来到挂甲屯吴家花园彭德怀的住处。庐山会议以后，彭德怀就一直在中央党校学习。

“彭总啊，中央要和你谈话，通知你去人民大会堂。”贾震对彭德怀说。

“是吗？那就走。”

彭德怀扔下手中的锄头，和贾震一起坐车来到人民大会堂。当他们走进江苏厅时，看见彭真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已经等在那里。

互相握手问好后，彭真说：“今天我们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希望你能到西南去抓大三线建设，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彭德怀看了彭真一眼，说：“要是不去呢？”

彭真说：“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彭德怀倔犟地说：“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还在，我彭德怀已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被批臭了，这怎么干工作！”

彭真与乔明甫一时沉默无语。

彭德怀接着说：“自从平江起义喊出‘我们起义了！为工农服务开始了！’以来，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我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光明磊落，扪心自问，自己从未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在党内也从来没有任何‘小集团’。1962年6月，我曾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信，从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的遭遇，到出走当兵，平江起义，井冈山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部长，庐山会议，我什么时候搞过‘小集团’？刘少奇说我里通外国，要有根据吗。我为什么给主席写信，就是希望党中央全面审查我的历史，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中

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对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进行了甄别和平反，并安排了工作，唯独对我，既没有被通知参加大会，也没有对我的问题提出来进行重新审查，刘少奇还说我有里通外国的问题。我怎么里通外国了？出国访问，在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对质调查吗？现在让我出来工作，我怎么工作？……”

彭德怀讲完这些之后，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对彭真说：“我只会带兵打仗，不懂工业。”

彭真说：“西南三线的工业，就是与打仗有关呀！”

彭德怀说：“我早已跟军队脱离关系了。作为一名党员，理应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再说，我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我不去三线，还是让我去农村吧，我到农村搞调查研究，到贵州的农村也行，那里没有外国人。”

彭真劝道：“彭德怀同志，这可是毛主席的意见哟！中央也是考虑了你的实际情况，将来战争起来，你也熟悉情况吗。”

“是啊，还是去‘三线’吧。”乔明甫也劝彭德怀。

“的确，我对工业不熟悉，我不能干这差事，我不去，要去也去农村。”彭德怀倔犟的坚持自己的意见。

“那先这样吧。回去我们向毛主席汇报一下。”彭真见无法说服彭德怀，只得作罢。

回去后，彭真打电话向刘少奇作了报告，并让贾震、乔明甫二人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

回到吴家花园的彭德怀也安静不下来。9月21日，难以入眠的彭德怀披衣起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允许他回到老家或到外地的国营农场去劳动，当一辈子农民，自食其力，不再拿饷，以减轻国家负担。

彭德怀自从被罢官后曾给毛泽东写过几次信，最后都没有结果，他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答复。

当天下午，彭德怀的信已放在毛泽东的案头上。

看到彭德怀的信后，毛泽东知道，只能由他亲自同彭德怀谈了。

23日早上7时半，刚刚在挂甲屯果林中散步回到屋里的彭德怀，就接到了毛泽东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毛泽东要与他直接通话。

甚感意外的彭德怀，很快就听见了毛泽东那浓浓的乡音。

“德怀，你有时间吗？”

“时间总是有的嘛！”彭德怀答道。

“你马上来一下，我等你。”毛泽东说。

“你工作太累了，还是另找时间吧！”此时的彭德怀，已经不是抗美援朝时不顾三七二十一，推开警卫员，直闯毛泽东卧室，掀毛泽东被子时的彭德怀了。他谨慎了许多。

“叫你上午来就来吧！”毛泽东坚持。

已经整整6年未听到这熟悉的湘潭乡音了，彭德怀显得有些激动，他没有说话。

毛泽东见彭德怀没有答应，在那边接着说：“你赶快来吧，我们好好谈一谈。”

彭德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6年来，他给毛泽东写了几次信，朝夕都盼望着这一天，现在毛泽东主动向自己发出邀请，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就是自己不愿意到西南大三线去，那也是应该在毛泽东的面前实事求是地讲清其中的原因，以及自己思想上所顾虑的问题，希望毛泽东能给予自己以帮助和理解。

这天，秋高气爽，艳阳高照。

彭德怀换上了一件中山装，便赶往中南海丰泽园。

一夜未睡的毛泽东早已来到了颐年堂前，当看到彭德怀走出汽车的时候，他向彭德怀走了过去，伸出了右手，彭德怀也赶紧迎了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

毛泽东拉着彭德怀坐了下来，当他的目光扫过彭德怀黑瘦的面容，斑白的两鬓，似生伤感：“几年不见，你显老了。”

彭德怀勉强笑了笑：“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咯。”

毛泽东看着这位老战友认真严肃的表情，笑了：“我这里不是什么三宝殿，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来。”

接着，又说：“早在等着你，还有得睡觉，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也高兴得一夜有（音‘卯’湖南土语，没有的意思）睡着，一清早就给你挂电话……”

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

信就写 8 万言。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来参加。周总理要去接西哈努克，不能来啦，我们一起谈吧。”

彭德怀说：“主席没有忘记我，我很感激。”

毛泽东听后很高兴，然后独自点燃一支香烟。

这时彭德怀也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来点上。

毛泽东一见，感到十分奇怪，就问道：“德怀，我记得你不是早就戒烟了吗？”

彭德怀猛吸了一口，慢慢地将烟雾吐出：“可是，自从庐山会议之后，我却又抽上了，而且越抽越凶。”

“庐山会议”，彭德怀在这里首先提出了一个双方都不愿提到，但却又是不得不提的事情。他们吸着香烟，看着在面前飘散着的淡淡烟雾，各自都陷入了沉思。

良久，毛泽东站起来，十分大度的对彭德怀说：“德怀呀，你还是政治局委员嘛，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哪怕拍桌子骂娘都可以。你这人呀，就是脾气犟，平时也不来找我，电话也不挂一个，总喜欢写信，而且一写就是上万言，你花了力气，我却不一定全看得明白，你不满意，我也不满意，这是何苦呢？”

彭德怀说：“主席，我彭德怀现在是一个农民了，每天种地、看书，但心中憋得慌，就把那些话都写下来了，那也是光明正大地向党反映问题吧！”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庐山会议已经过去了，可不能庐山一分手到底哟！你也不要发牢骚，也许真理在你那一边，也许对你的批评过了头，或者说是错了，那就只有让历史来做结论吧，相信历史是最公正的。你我从湘潭出来干革命后，风雨中共事几十年，我不会忘了你，日久见人心嘛！这次派你到西南去抓三线建设，我也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你。西南是主要的战略后方，你去把它建设好了，我就放心了，万一将来发生战争，你还可以带兵打仗嘛！”

彭德怀一听这话，倔劲又上来了，他说：“我不去，背一身臭名我去干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臭了也可以香起来嘛！我们之间在一些看法上有分歧，这不要紧，但要顾全大局，在大局面前要先将个人的问题放在

一边。”

毛泽东希望彭德怀会服从大局,听从自己的安排。可是,这次彭德怀却没有服从,而是提出了一个令他没有想到的问题。

彭德怀说:“主席,我在庐山会议上是向你做过三条保证的,我得遵守我自己的保证。”

毛泽东想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哪三条?我记得好像只有两条?”

“三条。”彭德怀认真地说,“一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反革命,二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自杀,三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那就回乡务农,自食其力。”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我就记住了后面两条。不过这没有关系,让你出来工作是中央的决定,你搞军事工作多年,大西南的建设又与军事密切相关,你去是比较合适的。”

彭德怀固执地说:“我还是回乡当农民好,去西南不合适,我这样去怎么接触群众?群众又怎么敢接触我?”

毛泽东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两支香烟,递给彭德怀一支,两人各自点燃自己的香烟。

毛泽东简单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又将鉴于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准备建设大小三线的方案告诉彭德怀,并强调了西南大三线建设的重要性,以及自己对“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战略后方的构想,可说是情真意切,彭德怀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

毛泽东又说:“我们井冈山就在一起,革命能有今天不容易,我们大家要团结。庐山会议,也许真理在你那一方,这没有关系,错了的我们就改,你今天能来,我很高兴,你还是去西南吧,你怕工作不好做,我让少奇、小平召集西南地区的同志开个会,把中央的意图讲清楚,让他们积极支持你的工作。你要给我写信,让他们不得有误,赶快给我送来。

“现在要建设大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区是适当的。将来还可带点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彭德怀答:“我搞工业是外行,完全无知,而且,我现在的情况,政治上也不好做工作。”

8时40分左右，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先后来到了。毛泽东说：“彭德怀同志去三线也许会搞出名堂来。建立党的统一领导，建立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李井泉为主，彭德怀为副。还有程子华。”

彭德怀还是不愿接受：“我去搞工业是外行，时间紧迫，恐有所负，我还是去边疆搞农业吧。”

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一起劝他，说搞工业大家都不懂，都在摸索。

毛泽东环视在座的人，斩钉截铁地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区，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支持他也是衷心诚意的。”

毛泽东这几句话深深感染了彭德怀。

毛泽东继续说：“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

他谈起了往事：“立三路线时，三军团的干部反对过赣江。彭德怀说，要过赣江。一言为定，即过了赣江。在粉碎蒋介石的一、二、三次‘围剿’时，我们合作得很好。反对张国焘分裂的斗争中，也是坚定的。解放战争在西北战场的成绩也是肯定的，那么一点军队打败国民党胡宗南等那样强大的军队，这件事使我经常想起来。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就要否定一切呢？我的意见：既往不咎，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树立威信……”

毛泽东转头对坐在身边的刘少奇说：“请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彭德怀不好再坚持了。他抬起头说：“好吧，主席，我听你的，去三线。”

刘少奇高兴地说：“老彭，你看主席是没有忘记你呀！重新振作起来，去大西南干出成绩来，我们也为你高兴。关于个别同志的看法，主席已经讲了，我们要打招呼，我一定照主席的要求，把西南的会议开好，让西南的同志都支持你的工作。”

邓小平说：“老彭，主席支持你去三线，就是相信你。一定要扔掉包袱，轻装上阵，重振昔日彭大将军的雄风。你去三线，肯定会干出名堂来的！”

彭真也对彭德怀说：“主席是关心你的，我早就说了，你迟早会想通。”

谈话进行了五个半小时。毛泽东工作一夜之后，还没有吃早饭，于是，留彭德怀和在座诸人共进午餐。饭后，彭德怀才依依不舍，起身向毛泽东和大家告别。

回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仍然激动不已，“毛主席还是了解我的。”他似乎又有了以往那种豪气和自得。其实，在与毛泽东告别时，毛泽东曾经问他：“你在中南海游泳池对我说过要斗刘少奇同志，恐怕你是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吧？”

彭德怀当时没有在意。

没有看到周恩来，彭德怀总有些心不甘。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他给周恩来处打电话，说周恩来不在家。

他放下电话，颇为伤感：“个个都忙，总理更忙。可我彭德怀却闲呆了6年，惭愧呀！”

这天，他正在吃午饭，周恩来亲自打来了电话，请他马上去中南海西花厅。彭德怀立即叫车，可司机不在家。他急得团团转，只好给周恩来回电话：

“总理，我的车驮不动了，改日再拜访你吧！”

周恩来在电话里说：“你的车驮不动，就用我的车去驮你，这叫舍车保帅嘛！”

在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热情地款待彭德怀，询问了他6年来的生情况。彭德怀把同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叙述了一番。周恩来听后很高兴，感慨道：“是啊，庐山的事过去6年了，教训会使我们清醒过来。我们要认真地总结总结。主席说得对，不能分手到底，要团结。‘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我们前面有很多很多的大事业等待我们去完成。”

彭德怀说：“这6年来，我日日夜夜都盼着能早点出来工作，我实在是闲不住啊！”

翌日，彭德怀正在一个农户家里拉家常，突然一名警卫战士跑来叫他回去接电话。

电话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打来的，通知他立刻到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去开会。

第9回：众相劝，“大将军”离京入川 批海瑞，九州地欲起风雷

彭德怀赶到会场一看，到会的大都是西南局以及四川、云南、贵州和中央各部委的负责人，其中有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省长李大章，中共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铁道兵司令员吕正操，国家计委副主任程子华等。

主持会议的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他见彭德怀来了，就立刻站起来向他招手，让他到前面去坐。

参加会议的人看到邓小平招呼早已被批臭了的“反党集团头子”彭德怀进来，都感到有些奇怪，没有一个人敢和他打招呼。

彭德怀也不理会这些人，按照邓小平指定的位子，到前面坐了下来。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委托召开的一次特别会议。首先邓小平让三线建设的负责人汇报了情况，主要是由程子华汇报三线工厂的搬迁，吕正操汇报铁道兵对于成昆铁路的建设进度，李井泉等人汇报对于三线建设的支援情况。

听完汇报之后，邓小平宣布：“由刘少奇传达毛主席有关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建设担任职务的指示。”

刘少奇说：“让彭德怀出来工作，到西南三线去，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希望到会的同志们能认真执行，积极支持彭德怀的工作。”

“毛主席说了，如果彭德怀同志要给他写信，请井泉同志给下面的同志打个招呼，不准阻拦，要尽快地送到北京来，送到他的手里。彭德怀同志去工作，有什么困难，你们要支持他，给他的工作创造条件。特别应该注意，彭德怀同志对于工作中有什么意见，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想法和建议，都要让他提，让他直接送到北京来。这是毛主席的意见，让我在这个会上传达给大家。”

刘少奇说完之后，邓小平接着说：“你们三线建设的同志们表态，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的决定，欢迎彭德怀到三线来工作？”

“同意！”

“拥护！”大家纷纷表示了赞成。

10月28日，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奉命送彭德怀去四川任“三线建设”第三副总指挥。临行前，毛泽东特地找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三线建设”总指挥李井泉，向他交待：

“彭德怀同志到三线去，是中央的决定。他去了以后，你们要支持他的工作，三线的企业他都可以去，不要对他保密。要让他有实际权力，有职有权。彭德怀这个人，让他有职无权他是不干的。”

彭德怀走了，开始投入三线建设的战场。他本想把自己的余生都献给这里的土地和事业。却不曾想到，一场更加巨大的政治风暴再次将他推上浪尖。

彭德怀到达“三线”后就开始了解情况，就在他独自在三线成都听取汇报时，在西南重镇重庆，却在召开另外一个会议。

这次会议是由中共中央西南局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西南三省的负责人、三线建委的领导，以及部分三线建设重点工程的负责人。会议地点选在较为偏僻的潘家坪宾馆。

李井泉手中拿着一支粗大的雪茄烟，然后慢慢地点着，猛然地吸了一口，向到会的人员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任命彭德怀担任西南大三线建委第三副主任的决定。

“彭德怀？”与会者都有些不敢相信，三线不是最需要保密的地方吗，连工人都要审查祖宗三代，怎么能让一个早已被全国人民批倒批臭的“反党集团头子”来参加指挥呢？

陡然的变化使许多人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整个会场静得连针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

李井泉接着说：“让彭德怀来三线工作，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决定，我们要服从。他到什么地方去，大家都向他汇报情况……但是，对于他的指示，认为不正确的也可以不执行。有关军工方面的事情，就不必向他汇报了，更不能让他接触，这是我们应当注意的……”

这些，都是彭德怀不知道的。

北京,已经听到风声的吴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彭真的办公室:

“市长,听说有人要批判我……”

“是吗?批判你什么?”彭真问。

“我写的京剧《海瑞罢官》。”

“没有啊,我怎么没有听说。”

“说现在正在准备呢。”

“吴晗同志,你是共产党员,应该相信组织,不要听小道消息。你的工作,总理、小平和我,都是清楚的吗。你要是有了问题,我这个市长不就是总后台了吗。放心吧,老吴,回去好好休息,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不要杞人忧天!”

“可是,我听说这次搞我,是有来头的。”

最近已经听到一些传闻的彭真,正为此事恼火,一听吴晗的话,有些激动:“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你不要理他们,脚正不怕鞋歪嘛!”

送走吴晗后,彭真给邓拓打了电话,让他晚上到家里来一下。

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负责文教的书记、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著名的诗人、学者。曾任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社长兼总编,因为办报风格不对毛泽东的思路,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不得不辞去《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的职务,到北京市主管文教、宣传。但是文人秉性难改,到北京后,创办了北京市委刊物《前线》,亲任总编。

彭真一见邓拓,便问:“吴晗上午找我,好像有什么事情,你清楚吗?”

邓拓说:“听说上海有人要批判他写的《海瑞罢官》。”

邓拓是听张春桥说的。他们是老相识,抗战时期,邓拓担任《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时,张春桥任副总编辑。因此,张春桥在北京曾向邓拓私下透过姚文元要批《海瑞罢官》的风。此前,张春桥曾给邓拓打过电话,邓拓当时不在办公室,没有联系上。

彭真又问邓拓:“是谁要批?”

“江青。”邓拓回答,他又接着说:“她在北京找过几个人,可能没人

答应写。所以，又到上海找人去了。”

“《海瑞罢官》有什么批判头？”彭真似乎有些不以为然的说：“吴晗不过就是一个学者嘛，能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再说了，海瑞精神也是毛主席提倡的，有什么错？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邓拓听到彭真征求他的意见，立即答道：“我也是这个意见。吴晗咱们都了解，政治上可靠，人又老实。批判他说不过去吧。”

1965年11月8日，上海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此之前，市委已经讨论过几次。这次参加会议的有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市长曹荻秋、主管此事的文教书记张春桥、分管教育卫生的候补书记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王少庸等，加上作者姚文元，协助姚文元写作的朱永嘉，还有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徐景贤。

会议在康平路165号楼上朝北一间大会议室里召开。曹荻秋站在那里，很仔细地将姚文元文章看完，在资料引用上提了几个问题。陈丕显则在会议室里来回踱着步，对张春桥说：“这是件大事，非常重要，你要好好抓，抓好了是有功劳的！”

张春桥也站着，没坐。

分管教育的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问：“你准备给吴晗带什么帽子？”

姚文元的文章中没给吴晗定性戴帽子，姚文元回答说：“看事实吧。是什么就是什么，何必我们给他戴帽子呢。”

杨西光又对姚文元说：“吴晗是秘密党员，你是否知道？”

姚文元答：“这就不管了。”

11月9日，《文汇报》北京记者站的负责人艾玲接到上海《文汇报》副总编辑陆灏打来的电话：“明天将要发表一篇大的文章，是一个叫姚文元的写的，你们‘北办’在文章见报后就出动，收集一下有关人士对此文的反映，”还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上海市委让《文汇报》刊登的，但对外不能说，只能说是姚文元向《文汇报》投的稿……”

11月10日，经过毛泽东3次修改，由上海市委讨论同意的姚文元署名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终于发表在上海《文汇报》第一版。文章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作者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

复地主、富农的统治。”

文章发表时，姚文元自己并不知道。11月10日一早，姚文元还在睡觉，一个电话打到他家。他妻子金英拿起电话，没想到电话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打来的，告诉说，姚文元文章今天在《文汇报》发表，他向姚文元表示祝贺。

这天，《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即出动人员采访了北京有关部委和领导。

艾玲和记者李根第去采访了吴晗。吴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生气，说《海瑞罢官》不是他要写的，是毛主席叫写的。两人又去了《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的同行们也都普遍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王若水就向艾玲表示很反感。李希凡说，江青原来叫他写这篇文章，他表示自己是搞《红楼梦》研究的，对海瑞了解不多，江青就说那让别人来写。艾玲熟悉的一些老领导、老同事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在对待批判《海瑞罢官》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的问题上，观点认识不尽相同。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赞同批判《海瑞罢官》的是左派，不赞同的是右派”。对这些反映，“北办”没有太在意，他们把这些情况反映汇总上报给上海《文汇报》编辑部。

那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每天都一个邮包装上他们手写的情况汇报，通过民航班机送往上海。报社有什么文件也通过这个邮包给“北办”。

当天，北京的彭真也接到了报告。虽然已有耳闻，但他仍然觉得不能接受，气得拍着桌子说：

“批判北京的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姚文元的文章简直是胡说八道！纯粹是学阀腔调！”

他立即给刘少奇挂电话，是王光美接的电话，问他有什么事？

“上海刊登了批判吴晗同志的文章，我想征求一下少奇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彭真问。

“少奇同志还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再说他对吴晗同志不大熟悉，很难发表什么意见。”政治上已经十分成熟的王光美圆滑的搪塞了彭真。

放下电话，她问刘少奇：“彭真来电话，问你对批判吴晗《海瑞罢

官》的意见。你看,我这样回答可以吗?”

刘少奇说:“现在只能这样回答,《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对外人讲话要格外谨慎。”

彭真在刘少奇那里不得要领,又找到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一见彭真就问:“教授最近怎么不来打牌了?”

吴晗曾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教授,所以人们习惯称他为“教授”。

彭真回答:“有压力嘛。姚文元写文章批判他,吴晗现在心理负担很大。”

邓小平说:“就是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吧?我看过了,没什么错嘛。咳,现在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住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有什么意思?你告诉教授,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哦,有一点要注意,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很危险,会堵塞言路的。”

忧心忡忡的吴晗又到邓小平家打牌了,邓小平一见吴晗就说:“教授,不用这么长吁短叹的,凡事都要乐观嘛。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

吴晗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

邓小平继续劝道:“我今年61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由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来来来,打牌。”

其实,文章发表前,陈丕显和曹荻秋都提出向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打个招呼,张春桥不同意,也就算了。

这天,《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听到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后,马上给市委分管《北京日报》工作的书记处书记郑天翔打电话请示:

“郑书记嘛?我是范瑾。《文汇报》第一版刊登了一篇姚文元的文章,是批判吴晗副市长的,我们要不要转载呀?”

郑天翔还不知道此事,忙问说道:“是吗? 我还不知道,我先看看,

你们那里有这份报纸吗？”

“没有。我已经安排他们马上空运过来。”范瑾回答。

“等我看完后再给你打过去吧。”郑天翔说。

“好吧。”范瑾答应道。

郑天翔拿到报纸后，匆忙看了一遍姚文元的文章，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给范瑾打电话说：“行啊，你们明天就转载吧。”

可是，第二天《北京日报》没有转载，郑天翔给范瑾打电话问：“范瑾吗？你们今天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啊？”

“对。邓拓同志不赞成登，他说不能轻易登，等请示彭真同志再说。”

“彭真同志什么意见？”郑天翔问。

“他不在北京。”

“那好吧，就先按邓拓同志的意见办。”

邓拓不同意转载，是因为他已经得到彭真不让转载的意见。当他和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一起去请示彭真要不要转载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时，彭真当即告诉刘仁：“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此时的彭真已经从邓小平那里回来了，他觉得心里有了底，还进一步指名道姓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草？张春桥说《海瑞罢官》是毒草，上海不是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第10回：“窃听器”，陈年旧案终未了 换“总管”，杨尚昆调任南粤

就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同一天，1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由汪东兴接替。

早在送走彭德怀的一个星期后，1965年10月29日上午10时30分，周恩来、邓小平、彭真3人约杨尚昆谈话，对他讲了中央的决定：免去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让他到下面工作两、三年。任命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局长李质忠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是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10月29日，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上午10时半，周、邓、彭三人约我谈话。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谈话，十分值得记着，永远不要忘记！中午未睡好，下午也忐忑不安，去富春同志处谈了今天谈话的事！……”

第二天，杨尚昆“心情不安，什么东西都看不下去”。第三天，杨尚昆依然“整天没有精神，无心看什么”。

11月5日，彭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宣布杨尚昆工作调动，离开北京到广东工作。

对于这次免职，杨尚昆似乎早有准备，自从1961年发生了震动中共中央高层的“窃听器事件”后，他就有一种预感，不知什么时候会离开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个他工作了近20年的岗位。但是，真的事到临时，他还是有些突然，好像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委屈。他想在临走前和毛泽东见一次面。凭他几十年在中共中央中枢机关的工作经验，他预感到，如果这次不能和毛泽东做一次谈话，一旦离开了中南海，恐怕就再没有机会见到毛泽东了。

3天后，9日，中央办公厅召开厅务会议，宣布杨尚昆调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免去其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杨尚昆办理完工作移交

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您好!

.....

办公厅工作,我已同汪东兴同志谈过两次,昨天又约汪东兴、田家英、曾三、李质忠等同志开会作了交代。今天已在办公厅厅务会议(有办公厅多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上,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我在中央机关工作已近 20 年,没有把工作做好,还犯了错误,辜负了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期望。想到这些,我的心情是很沉重也很惭愧的。感谢主席和中央这次给我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和改造自己的机会,今后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全心全意地把党分配给我的工作做好。以后还希望主席能经常给予指示和鞭策。

我打算把办公厅工作交代完了后去陕西省长安县原来我蹲点的大队(牛角村)看看,听说那里生产搞得不错,今年粮棉收成比去年增产 40% 以上;本月底即去广东省工作,近几天来因风湿性背痛正在治疗,还有几天才能走。

在去广东之前,如果主席有空,我很希望见见主席,得到主席批评指示。”

第二天上午,就是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的当天,毛泽东约见了杨尚昆。

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你出去到哪里了?”

杨尚昆回答说:“我到广东去。”

毛泽东对杨尚昆说:“下去锻炼两三年有好处。你下去,我给你个任务:第一、看中央和国务院下达的政策措施,有没有不适于当地实际情况的,如果有,你给我写个报告,提出你的意见;第二、中央各部门下达了些什么东西,有没有同中央、国务院相矛盾的,如果有,你给我理一下。就这么两个调查研究的任务”

“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可能完不成,我努力去做就是了。”杨尚昆答。

毛泽东问:“你决定到广东去?广东那么热,你跑那里去干什么?”没等杨尚昆回答,毛泽东又说:“既然你已经定了,你去两年到三年,把这个任务完成,先在珠江流域;以后,我把你调到黄河流域,再搞两三

年,主要是了解党政机关是不是按中央精神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工作的,更主要的是条条下达的任务是不是打架。我知道有些架打得是很厉害的。”

“我努力吧。”杨尚昆说。

谈话将近1小时30分钟。

11月17日,杨尚昆奉毛泽东命,去看望王稼祥。次日,同样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他又去看望了陈云。

11月19日,他到西华厅向周恩来辞行,顺便将这两次探望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汇报。杨尚昆对周恩来说:“由于我工作岗位特殊,涉及面很广,做了些工作,也犯过些错误。许多事情你都了解,有些问题只有你知道,我没有向中央其他同志说过;但也有你不了解的,我不愿意多说。只要你知道我是坦白的、无辜的,我就心安了。我决不计较个人利害,也不愿意说不应当说出的事。”

然后,他终于十分焦虑地问道:“照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可能将来要处分我,甚至开除我的党籍吧?”

周恩来一直静静的看着杨尚昆,当听到他说这些话时,不得不安慰杨尚昆说:“不至于如此吧,你放心。”

杨尚昆在看望过王稼祥、陈云后的第三天,专门就此次探望给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

让杨尚昆担忧的“窃听器案”,发生在1961年。

1961年4月初,毛泽东前往湖南长沙。一天,毛泽东在火车上跟专门负责冲印照片的摄影组胡秀云聊天。专列停靠在车站时,小胡从专列上下来,遇上机要室会议科的录音员刘吉顺,小刘笑着对她说:“小胡,刚才你在主席那里说了什么,我全知道。”接着他说了一点他们谈话的内容,使小胡非常惊讶。

小胡将此事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非常震惊。因为是在旅途中,毛泽东没有立即追究。

在长沙,毛泽东要接见外宾,汪东兴向他汇报哪些人随行。当汇报到还有搞录音的小刘时,毛泽东发了脾气。

到了上海,毛泽东说:“这件事马上给总书记打电话,让他查。”

1961年4月26日晚,正在河北省保定市做调研的中共中央办公

厅主任杨尚昆突然接到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的电话，要求杨尚昆务必于第二天下午赶回北京。当晚，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脑子中很乱，整夜未睡好。”

4月27日下午17时20分，杨尚昆回到北京。在永定门车站，他当即向邓小平、彭真简单谈了一下情况。

当晚，杨尚昆又找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周恩来秘书康一民了解情况。第二天上午，他又和龚子荣、中办副主任兼中央档案馆馆长曾三、中办副主任兼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邓典桃、中直机关党委秘书长李鉴等人谈话。

4月29日上午，杨尚昆找中办机要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3人谈话。下午15时至17时，杨尚昆召集叶子龙、康一民、王敬先和毛泽东秘书高智、罗光禄及中办副主任龚子荣等人，商谈“关于录音问题的情况”。

4月30日上午，叶子龙、康一民和机要室副主任、刘少奇的秘书吴振英3人写出关于录音问题的报告，杨尚昆看了后，提出修改意见，让康一民再去改正。当天，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惟心情紧张，极易疲乏。”他一改平时凌晨2时睡觉的习惯，当晚12时便上床了。

5月1日，根据汪东兴的通知，康一民、机要室副主任赖奎乘专机到上海汇报情况。毛泽东让人把从专列上拆下来的秘密录音装置放在一张桌子上，让卫士长在一张纸上写上“违反指示，非法录音”八个大字，压在录音机下作为背景，让康一民、赖奎、刘吉顺3人站在桌子边上，由新华社记者吕厚民拍照留存。当时共拍了4张照片，另外3张，一是汪东兴、徐业夫、康一民、赖奎、刘吉顺5人的合影；二是刘吉顺的单人照；三是录音机的照片。康一民、赖奎曾多次向汪东兴提出要“直接向毛主席汇报”，汪东兴没有同意，说他已经“受毛主席委托处理这个问题”。

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到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3日、4日，杨尚昆两次与康生商谈“录音事件”的情况及其报告；差不多同时，杨尚昆也多次找叶子龙、康一民谈话。也是在这几天，杨尚昆染上感冒，身体畏寒，直到11日尚未痊愈。

5月8日晚，杨尚昆抱病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第二天上午，杨尚昆乘火车，再去河北保定调研。16日下午返京。

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做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5项规定。中央书记处的这个会议，没有通知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参加。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中央书记处批评中办机要室，并决定分别给予该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严重警告处分，副主任吴振英警告处分。

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录音一事发这么大的脾气？此时还要从1958年说起。

当时，中央办公厅觉得毛泽东的讲话有时记录不全，于是，时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兼中办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提出用录音机录下来后再进行整理。为此，他曾多次向上司杨尚昆和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汇报过这个建议。

他的建议似乎得到了领导的同意。毛泽东本人好像也是认可了。他曾对叶子龙说：“录音要搞个规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嘛。”根据这一指示，中办机要室对录音范围和内容做出明文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召开的大、中型会议和其他重要会议上的报告、讲话；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与地方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中央召开的电话会议；中央领导指定的需要录音的内容。毛泽东看过这个规定，表示同意。

中办机要室自1958年11月始，对毛泽东外出时的一些重要谈话进行了录音。

然而，有些会议，恐怕不能录音，或中央领导人不愿意录音。如：1959年11月，中央在杭州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讲到中苏关系时，关照大家不要做记录。当时胡乔木插话：“还有录音呢。”

毛泽东当即质问说：“是谁让录音的，搞这干什么？”

叶子龙立即让录音员停止了录音。从此，机要室就再没有自行派录音员跟随毛泽东外出录过音。

既然 1959 年 11 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毛泽东外出录音,为什么 1961 年春季又发生了“录音事件”?

1961 年 6 月中旬,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 月 24 日下午 15 时 30 分,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震动一时的“录音事件”,又称“窃听器事件”,似乎就这样过去了。但是,杨尚昆的政治生涯似乎也开始走下坡路了。

第11回：风乍起，似吹皱一池春水 未知情，望神州风云莫辨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三天，1965年11月12日，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在第二版转载了这篇文章。也就在这天，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乘火车南下。

到了天津，毛泽东向前来汇报工作的河北省委副书记林铁、省长刘子厚简单询问了一下“四清”的情况，然后问道：“我最近有什么指示吗？”

林铁和刘子厚不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意思，刘子厚答道：“备战，备荒，为人民。”

毛泽东显然不很满意，说：“为人民讲了多少年了吗。”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清’好？”

林铁回答：“显然是搞‘四清’好。”

毛泽东又问了三线建设和机关精简的情况。

接着，毛泽东离开天津继续南下，经过济南、徐州、蚌埠、南京，17日到达上海。像往常一样，沿途都找当地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大家所谈的，几乎还是集中在农业生产和粮食、备战和三线建设、领导方法、教育制度这些问题上。毛泽东10月在北京讲的：“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是感到要出问题。”一路上都没有听到这方面的反应。19日到达杭州。

这几天，北京可是风生水起。

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谁有那么大的胆子？如果批判吴晗真是毛泽东的意见，不紧跟那是要犯错误的。即使是毛泽东要批吴晗，为什么要批？批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清楚，执行起来，也是容易犯错误。

11月13日，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召集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北京日报》总编辑范瑾等人开会，研究是否转载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一文的“转载”问题。研究的结果是，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如

果姚文元的文章是毛泽东定的,《北京日报》就登,否则就不登。

但是,他们从《文汇报》那里没有获得任何消息。

邓拓决定还是请示正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彭真指示仍然是: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再定。

中共中央机关党报《人民日报》对姚文元的文章也十分关注。突然点名批判北京市的副市长,此事非同小可。《人民日报》社内部,不少人看出姚文元文章大有来头。副总编辑李庄看了姚文元文章后说:“迷迷糊糊感到要出什么大事了”。其他编辑也有这个感觉,觉得好像应该转载,又怕承担不起责任,于是,都来请示总编辑吴冷西。

对“是否转载姚文元文章”的请示,吴冷西答复说,他要请示中央。但他没有像以往那样,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而是请示了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兼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是1964年夏天由毛泽东提议成立的。当时在毛泽东那里开了一次会,有彭真、陆定一、康生和周扬、吴冷西参加。毛泽东在批评中宣部和周扬之后说:

“我看,文化部要彻底整顿。陆定一、彭真、周扬,你们3个同志组成一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指导全国的文化革命。由陆定一同志主持,任组长。”

陆定一赶紧说:“主席,我见事迟,不能当这个组长。”

毛泽东笑着问:“那谁当组长呢?”

陆定一建议:“我看,还是由彭真同志挂帅吧。”

彭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毛泽东说:“那也可以。”

过了一会,康生也谈到文化部的事情,毛泽东立即说:“叫康生和吴冷西同志也参加小组工作。”

彭真在1964年7月7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决定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组成“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小组的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化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指示。”

应该说,吴冷西请示彭真是正常的。但是,面对一篇极不正常的文章,却用极正常的程序解决,对于处在政治漩涡的人来说,本身就已经不正常了。而且,吴冷西在接替邓拓任《人民日报》总编后,凡事都

是请示毛泽东定夺。然而,到了1965年,又恰恰在这件事上,他没有请示毛泽东,而是请示了彭真。

正为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而恼火的彭真,在吴冷西请示的时候,十分肯定的要求:“不予转载。”

于是,吴冷西回复《人民日报》说:“不转载。”理由有三条:

一、姚文元的文章是上海市委搞的,不是中央的意思;

二、姚文元的文章联系“翻案风”、“单干风”,把学术问题拉到政治问题上,太勉强;

三、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1959年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和《论海瑞》,这两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胡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要慎重。

《人民日报》编辑部还派出多名经验丰富的记者,四出活动,探听消息,重点自然是上海和北京,但所获甚微。

中共中央刊物《红旗》杂志的工作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负责的。由于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比较清楚毛泽东的思路。姚文元的文章,在政治上,他已经感到很有背景,只是事前他这位“大秀才”对此事竟一点也不知道,让他感到有些失落和气愤。现在,他急于要弄清文章出台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他手下的几位笔杆子都是支持姚文元的。

《红旗》杂志编委关锋对姚文元的文章十分赞同,他读了姚文元的文章后连声说:“好!”还表示:“要干起来,我们一定支持姚文元。”

戚本禹说:“历史学界一定要来个大风暴,否则,就触不动这些人。看来,学术界也是面临着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形势。”他还讲:“若有人攻击姚文元,我们就出来反攻。”

由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由陈伯达主编的《红旗》,也没有对姚文元的文章做出直接反应。但是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安排发表了戚本禹的一篇“左派”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对姚文元文章的一种呼应。

当时,《文汇报》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在“北办”记者李根底采写的情况汇报中,发现关锋、戚本禹,还有学部的尹达,是支持姚文元文章的少数几个人,就把他们的观点编入了给上海的报告之中。一

天,陆灏电话通知艾玲,设法把关锋、戚本禹二人秘密安排到上海。行动要绝对保密,不能让中宣部知道,也不能让“北办”的其他人知道,总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于是,艾玲亲自通知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向《红旗》杂志社称父亲病重,要请假回老家;戚本禹则以为《红旗》杂志组织工农兵学哲学文章的名义,前往上海。为了掩人耳目,艾玲不能用“北办”的车,又不便借用其他单位的车。想来想去,她只好向在军委机关工作的丈夫求助,请他派部队的车子送关、戚二人去机场。

时值冬季,艾玲半夜出发,乘军车悄悄开到关、戚家的附近等候。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关、戚二人分别上车后,直奔首都机场,飞往上海。

事后,陆灏表扬艾玲这件事办得好,干净利落。

与北京相反,继11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后,11月24日,浙江的《浙江日报》、山东的《大众日报》、江苏的《新华日报》、福建的《福建日报》,而后是25日的《安徽日报》,26日的《江西日报》,这些受华东局领导的几个省市的报刊,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

而北京,按照彭真的指示,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其他地区也没有反应。

很多人在揣摩上边的“意思”。例如:天津。

各报纸的请示报告堆积到天津市市长胡昭衡面前:“姚文元的文章,天津要不要转载?”

胡昭衡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人民日报》,等待《人民日报》的反应。

《人民日报》没有反应,却迎来了一位相交已久的老乡加战友、《光明日报》总编穆欣。

穆欣给胡昭衡带来了陈伯达的忠告:“伯达同志让我转告你,不要转载。”

穆欣私下同胡昭衡咬耳朵,“姚的文章是江青在上海搞的,背景还不清楚。北京的中央领导都不清楚,北京各报决定不转,你们也不要转,还不摸来头……”

胡昭衡很快通知天津各报:“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九天，康生来到天津，住进“新三号”。胡昭衡马上赶去看望，并且作陪吃午饭。

午饭结束时，胡昭衡感到气氛已经松快些时，才谨慎地问：“姚文元的文章康老看了吗？”

康生脸上毫无表情变化，自顾自地说：“章士钊写了本书，想发表。他请主席看，主席叫我也看看，提提意见。”

胡昭衡只好随康生的话题转：“什么书？”

《柳文指要》。”康生说着便立起身，这是谈话结束的意思。

以后几天，胡昭衡又看望几次康生。康生还是闭口不提姚文元的文章，只是谈正在读《柳文指要》，或者是《红楼梦》。

康生走了，周扬年底过来了。

周扬关心的是敏感话题。他说：“评李秀成也罢，评曹操和秦始皇也罢，现在评海瑞也罢，都是学术讨论，学术批判，不能硬拉到政治上。往政治上生拉硬扯会产生许多严重后果……”

胡昭衡点头。

周扬走了，陈伯达过了年来到天津。

“有什么消息？”陈伯达一边握手，一边就问。

“朱老总来了，我上专列去汇报三线建设情况，又陪他参观塘沽码头，他对军工方面的研究生产作许多指示。”胡昭衡略一犹豫，接着说，“总理在八省会议上表扬了天津，治碱挖渠……”

“总理表扬的是天津市市长。”陈伯达显然早已打听清楚这个消息，他做手势阻止胡昭衡讲谦虚话，不用讲陈伯达也可以明白胡昭衡会怎么讲。他继续问：“还有什么消息？”

“北京的万里、郑天翔、邓拓和范瑾来过，我看他们，谈了京津协作，联手赶上海的问题。”

“还有什么？”

“去年穆欣来，说了姚文元文章……”

陈伯达做个停止的手势表示亲近地靠拢胡昭衡，竭力跟上胡昭衡的步子走：“夫子，你还得帮我开个座谈会。题目是两个：干部参加劳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要找明白人。”

陈伯达在津几天，除了谈干部参加劳动和农业机械化问题，就是

拉胡昭衡看美国或欧洲的电影，当然也不忘去逛古籍书店和艺林阁。

胡昭衡始终不得要领。

四川的李井泉对于是否在《四川日报》转载，也很伤脑筋。于是打电话给邓小平，邓小平不在。于是又给贺龙打电话。贺龙明确回答说：“不转载。”这样一来，《四川日报》一直拖到12月14日才转载。

1965年11月中旬，已经来到杭州的毛泽东在《光明日报情况简编》中的两篇文章上作了批注：

一篇是第362期中《吴晗看了姚文元批评〈海瑞罢官〉一文后的反映》，里面讲到吴晗在11月14日说：“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了。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

他还说：“我不准备写答辩文章，正在给市委写个报告，直接送给彭真同志，只要领导了解就行了。我不怕。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谈历史？”

毛泽东在这篇材料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这些都送江青一阅。看后，着人送杭州。”

另一篇是第367期《关于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反应续闻》，里面说：“翦伯赞认为，现在学术界的顾虑并未解除，姚文元乱来一通，不利于百家争鸣。”

毛泽东看后在旁边画了三个圈。

第12回：单行本，看京沪南北较劲 姑苏城，副主席再三挽留

11月22日，毛泽东因为有外事活动来到上海。正在上海的江青，拿着一叠厚厚的材料，急匆匆地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主席，这是各地报上来的材料，说明有人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几乎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你有没有找过康生、伯达。”毛泽东问她。

“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也感到北京的压力很大。”江青说。

毛泽东说：“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北京市委现在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江青生气地说。

毛泽东倔强的说道：“是吗？那我偏要摸！”

毛泽东想了想，又对江青说：“我给你请尊‘神’吧。你去找林彪谈谈，看一下部队文化工作方面的事情。”

他对随后进来的陈丕显说：“北京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

然后，毛泽东在陈丕显、江青的陪同下走进了锦江饭店的接待室，参加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

这是毛泽东离开北京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由于长时间没有和外界接触，世界各地有许多关于他的谣传，有说生病的，也有说病危的，毛泽东听到后只是淡淡一笑。他有意安排了这次外事活动，这样

在公开场合露一下面,让谣传不攻自破。他邀请了几十名外国朋友到锦江饭店与他共同进餐,庆祝美国左派战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生日。

毛泽东仔细地观赏墙壁上的一幅竹雕,神情专注,旁若无人。欣赏够了,然后移到第二幅作品前,又走向第三幅作品。满屋子里的人全都站着,等他开口说话。

毛泽东走向已经准备好的午餐桌前,点燃一支香烟,慢吞吞地说:“医生让我戒烟,可是我不听那一套,从未想到过戒烟。”说着他笑了笑,请在场的客人同他一起吸烟。果然,有人掏出了烟卷,气氛活跃了许多。

过了一会儿,他发现吸烟的人不多,就大声说:“不要担心我们是少数派,放心大胆地抽好啦——真理有时候在少数派一边。”

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毛泽东擅长穷经据典,常常使他的听众如入云山雾海,不知所措。嬉笑怒骂皆文章,是真名士自风流,即使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语,毛泽东也保持他独往独来的风格。

在场的外国客人中有不少是他的老朋友,对毛泽东独特的语言表述方式很熟悉了。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在极力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朋友斯特朗面前,毛泽东对越南战争只字不提,他所谈到的所有国际问题,矛头全部指向苏联。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国的头号敌人已经由“美帝”变成了“苏修”。1965年9月,他写了一首辞锋犀利的诗词: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这首《念奴娇·鸟儿问答》是应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的请求写的。从中可以清楚地体会到毛泽东对苏联融于嬉戏之中的愤怒。

11月24日,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单行本的数字。

北京市委书记邓拓一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

真，彭真沉下脸说：“我们一本也不订！”

恰巧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也在那里，他从邓拓手里夺过那张征定单，撕了个粉碎，说：“电报都不回，看他怎么办！”

彭真接着说：“中央开会，没有一个决议批判吴晗同志。为什么我们非要跟着上海跑不行？我们听中央的招呼，而不看什么人的眼色。”

在上海新华书店的几次催问下，北京都没有答复。

11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罗瑞卿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一起飞到上海，准备陪同毛泽东主席会见柬埔寨副首相、国防部长朗诺。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到机场迎接。周恩来上车后，陈丕显让罗瑞卿坐到自己的车里。罗瑞卿在中央分管警卫工作，陈丕显在上海市也分管警卫工作，彼此工作来往很多，非常熟悉。

在车里，陈丕显问罗瑞卿：“最近《文汇报》登的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你看了吗？”

罗瑞卿说：“没注意。”

陈丕显：“是江青组织写的。文章登出后，除了我们华东地区的几家报纸转载了，北京和其他地区的报纸都没有转载。主席很生气，让我们出单行本。还不让跟其他人讲。这样下去，矛盾激化起来，主席不是更生气吗？我想让总理知道这事，你罗长子不是外人，你看是我直接向总理汇报，还是由你向总理汇报呢？”

罗瑞卿想了一下说：“我看还是由我来先报告总理为好。”

第二天清晨，陈丕显到锦江饭店南楼，周恩来和罗瑞卿正在吃早点，一见陈丕显进来，周恩来就站了起来，握着陈丕显的手说：“你让罗总长转告我的那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感谢你，丕显同志！”

11月26日下午，罗瑞卿在会见朗诺前，先去见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主席，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找了一份，还没看。”

毛泽东悠悠的抽着烟，脸上略有笑容，没有说话。

参加完会见朗诺，周恩来同毛泽东谈起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文章一事，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回去告诉彭真，要支持左派的文章。北京的报纸要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好的，我回去就安排此事。”周恩来回答说。

晚上，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杭州，罗瑞卿送毛泽东，先去看看江青。

江青一见罗瑞卿就发牢骚：“北京报纸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罗瑞卿立即表态：“我马上通知《解放军报》转载！”

从江青那里一出来，罗瑞卿就给《解放军报》社打电话，要求他们立即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要加“编者按”。

然后，他又给北京彭真打了电话：“是彭真同志吗？”

“是啊。”

“我是罗瑞卿……”

“罗长子，在上海吗？”

“是啊，有件事想和你通通气。《文汇报》登了姚文元的一篇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你知道吗？”

“听说了。”

“我同主席提起这件事，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了。我已经要《解放军报》转载了。你考虑一下，北京其他报纸能不能同时转载？如果不能同时转载，是否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这样吧，我安排一下。”

彭真放下罗瑞卿的电话，心里挺别扭，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吴晗？他不清楚。但是，他不希望吴晗被打倒。北京市的副市长被打倒，他就没有责任了？想了一会儿，他给康生打个电话：“是康生同志吗？我是彭真。上海姚文元的文章你看了吗？”

“看了。”康生说。

“你知道上海发表这篇文章的背景吗？”彭真问。

“一无所知。我也是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康生回答。

“上海张春桥前一段时间总往北京跑是干什么呀？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呀？”彭真又问道，

“噢，他来是研究《智取威虎山》的修改和上演问题。他找我谈话都是说京剧革命，没有谈起批判《海瑞罢官》的事。”康生说。

“看来上海搞这些名堂连你也瞒着，这成什么话？老让我们处于

这样的被动状态,我们还怎么工作?”彭真对康生说。

“那你就赶快变被动为主动嘛,也开始批判那出戏算了。《海瑞罢官》确实有问题,我听好多同志反映过这出戏的问题,起码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康生回答。

“好吧,那先这样。”话不投机半句多,彭真听康生没有向着他的意思,就不再说什么了。

上海火车站,罗瑞卿按照他当公安部长时的习惯,一直把毛泽东送进车厢,然后,向毛泽东请示:

“主席,我准备明天去苏州,看看林副主席,汇报一下最近的工作情况。您还有什么指示?”

“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休养,要养得像 7000 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 3 个小时的报告。”毛泽东说。

罗瑞卿应道:“我一定把主席的话转达给林副主席。”

毛泽东又说了一遍:“告诉林彪,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开 7000 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 3 个小时的报告。”

“是!主席,我一定带到。”一句话,毛泽东重复了两遍,罗瑞卿心中不免有些困惑……

列车徐徐开动了,站在站台上的罗瑞卿向毛泽东的专列敬礼送别。毛泽东隔着玻璃窗向他挥了挥手。他们都不曾想到,这一挥手竟会是二人之间的永诀。

11月27日,刚从上海回到北京的周恩来立即给彭真打电话:“是彭真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是总理啊,我是彭真。”

“我刚从上海回来。毛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

“总理的意思……”

“现在不是听我的意思,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明天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好吧,我来安排。”彭真回答说。

11月26日,罗瑞卿在上海火车站送走毛泽东,第二天,11月27日

即赶往苏州去见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他的直接领导林彪。

到了林彪住处，林彪的秘书悄悄告诉罗瑞卿：

“林副主席还没有吃午饭。”罗瑞卿点点头，知道待的时间不宜太长。

一见面，林彪照例拉了拉罗瑞卿的手，然后让罗瑞卿坐下，还叫秘书拿奶糖出来招待罗瑞卿：“吃几块糖吧，这是上海的‘大白兔’”。

“林副主席身体好吗？”

“还可以。”

“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我最近在广东和广西跑了跑……”

罗瑞卿把最近几个月部队的情况，战备工作的情况向林彪做了简要汇报。特别转达了毛泽东的嘱托：

“毛主席再三嘱咐，让您好好休养，要养得像开7000人大会一样，能做3个钟头的报告。”

林彪点点头说：“好，好，谢谢主席的关心。”

罗瑞卿怕影响林彪的休息，就要起身告辞：“林副主席先休息吧，我明天再来。”

“不慌，不慌，再坐坐，再坐坐，多谈谈，有什么问题一次谈完，不用再留了。”林彪一再挽留。

罗瑞卿有些奇怪，近几年，由于林彪对他的意见越来越大，两人的矛盾日益公开，向林彪汇报工作成为罗瑞卿一件很头疼的事，汇报细了，说他干扰林彪的休息。汇报少了，又说他封锁消息。像今天这样热情招待和挽留是近几年很少有的。

于是，罗瑞卿又坐了下来，把他在广东、广西察看地形的情况及沿途部队情况、北京批判肖向荣、11月11日空八师飞行员李显斌驾机叛逃等情况向林彪做了详细汇报。林彪很平静，话仍然不多，只是偶尔点一下头说：“就是要突出政治。突出政治就是突出革命。突出革命，他就不去反革命了。”

最后，罗瑞卿问林彪：“林副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林彪说：“没有了。”

“那我先走了。过段时间我再来看望林副主席，向林副主席汇

报。”罗瑞卿起身告辞。

这时，林彪突然问罗瑞卿：“你最近身体怎样？”

“还好，只是常闹牙疼。”罗瑞卿捂了捂脸说。

林彪一边起身相送，一边关心地说：“牙痛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痛，一吃这个就好了。”

“谢谢林副主席的关心，我回去以后，一定按照林副主席说的方法办。”

第13回： 难放心，风起于青萍之末 众丘八，群起攻总政主任

罗瑞卿一回到住处，就接到他妻子郝治平的电话：“跟林副主席见了吗？”

“见了。”

“谈了吗？”

“谈了。”

“谈的怎样？”

“感觉谈的还可以，比较轻松。”

“林副主席身体怎样？”

“看上去还可以，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要好多了。”

“噢，那我就放心了……”

郝治平“放心”的是林彪的身体吗？显然不是。当时，总参和军委机关里，针对罗瑞卿的议论越来越多，诸如“罗瑞卿有野心，不尊重老帅”、“总是突出自己”、“有事不跟林彪商量”、“不尊重林彪”、“对罗长子要警惕”等等。

无风不起浪，作为妻子，郝治平担心的是罗瑞卿的政治前途。

罗瑞卿的能力和原则性都很强，这在中共党内是公认的。因此，他很受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赏识。刘少奇曾经说：“将来国防部长的接班人就是总参谋长罗瑞卿嘛。”

罗瑞卿的兼职很多，又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军衔虽然是大将，但见报时他的位置有时排在几位老帅之前。

他是军委秘书长，中央和军委开了什么会，要他去向各位老帅报告，实际上是传达。他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列席参加政治局常委会。同时他作风生硬的缺点也十分突出。毛泽东在延安时就送过罗瑞卿一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就是对罗瑞卿这个人“原则性过强”的劝导。而他工作起来又从不推诿，因此，锋芒过露，

特别是在大比武、原子弹爆炸成功等一些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上，国防科委工作的归口分工，以及前不久召开的全军作战会议上，都引起了诸多非议，尤其是一些老帅的不满。最近，更有不少人到负责军委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林彪那里反映罗瑞卿的问题。

在诸多老帅中，罗瑞卿和林彪、罗荣桓的关系曾经是最为密切的。早在红军时期，他们就在一起共事。罗瑞卿一直是林彪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11师的政委。林彪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途中，他们曾同台演戏。到陕北后，林彪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1949年平津战役后，林彪就想调罗瑞卿到四野工作，因为中央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没有调成。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出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又主动向毛泽东提议调罗瑞卿任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

1962年秋，林彪的夫人叶群向中央反映，林彪指挥部队入闽，累病了，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在林彪生病期间，由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贺龙元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要罗瑞卿多向贺龙请示工作。罗瑞卿因此同贺龙交往多了起来，来往也日益密切。

有一次，林彪在同罗瑞卿谈话时，突然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罗瑞卿不太明白林彪的意思。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对他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而和别的元帅接近得太少啊？”

1964年8月，毛泽东将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罗瑞卿叫到北戴河，商量军队高级干部减薪问题。讨论中，贺龙建议：“是不是连军衔一齐取消算了？”

毛泽东立即回答：“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

回京后，罗瑞卿立即打电话给林彪的秘书，向林彪报告此事并请林彪指示，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经几次催问，两天后，秘书回电话说：“林总同意。”

林彪所以迟迟才表态，决非对取消军衔有异议。对军衔制，他的态度和毛泽东是一样的，本来就不很赞成。红军时期，连军饷也没有，队伍也没有散，我们也胜利了。但是，对于如此一件大事，贺龙、罗瑞卿越过他直接向毛泽东建议，他是极不满意的。

在此之前，1964年6月，罗瑞卿和贺龙在全军搞了一次“大比武”，毛泽东、刘少奇等在京的中央领导都前往观看，大加赞扬。报纸、电台纷纷做了报道，还摄制了电影，搞得十分热闹。当时，林彪正在养病，没有参与此事。

1964年10月间，为了检查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执行情况，总政治部组成三个工作组分别到南京、成都、武汉三个军区检查工作，然后集中到武汉，由总政副主任刘志坚主持研究起草调查报告。

刘志坚是随叶剑英到长沙参加推广长沙政治学校政治建校的现场会后，来到了江城武汉，在这里召集各路工作组汇总情况。他跟罗瑞卿通了一次电话，提出：根据工作组目前掌握的情况，要形成一个全面估价部队贯彻落实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报告，材料还不够。罗瑞卿说：“那就继续了解嘛，再找一些部队蹲一蹲。”

于是，工作组决定不返回北京，继续下部队。刘志坚拿起电话同广州军区一位领导协商，那边说：“去红军团吧，这个团各项工作不错，在军区比较拔尖。”

这个红军团历史上威名显赫。十大元帅从这个团出去的有四个，还出了百多名将军。林彪曾在这个团的“红二连”当过连长。于是，刘志坚带领一个工作组来到广州军区某师379团。他自己蹲在“红一连”，兼跑“红二连”，派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蹲在团直，《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带一个组在七连，总政宣传部副部长姜思毅带一个组蹲在四连。这一蹲就是两个来月。那时工作组下部队很少在团以上机关活动，依当时的话说：“一个猛子”就扎到连队了，和战士吃住在一起，没有什么专门的汇报，全靠直接同官兵接触中掌握第一手材料。

调查快要结束时，叶群带了三个秘书参加进来，并让三名秘书分别下到一、四、七连，组织干部战士座谈，召开民主会，了解了许多大比武的情况，发现了许多问题。叶群亲自找战士谈话，还与饲养员一起谈心。

12月24日，叶群离开部队到广州，向已在广州的林彪汇报。28日晚，林彪在广州召见刘志坚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时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

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恢复比武以前的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

最后，林彪说：“今晚上把我讲的整理出来，明天我去上海之前送给我。再抄三份，一份给黄永胜；一份给罗总长，听听他的意见；一份你拿着，找五个军区级领导，给他们看看，看他们什么意见。”

刘志坚连夜整理了林彪的谈话记录，天一亮，送到了林彪那里。吃过早饭，他又给罗瑞卿拨通电话。先口头传达了林彪昨晚上的谈话内容。

罗瑞卿听了感到非常不安，也很不服气，当即对刘志坚说：“那今年我们不是犯了路线错误？”

12月29日晚21时50分，罗瑞卿主持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指示。在会上，罗瑞卿为自己辩解说：“我理解林彪同志的指示是指局部而言，不是指全体。如果那样，那就是路线错误了。”

当晚23时，林彪在广州再次召见刘志坚、唐平铸，讨论、审定了由林彪了提出的《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未定稿。林彪说：

“1964年全军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很大的，部队的政治情绪高，作风好，干劲大，毛主席思想红旗举得高。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现在出现了不好的苗头，军事训练搞的太突出，时间占的太多，军政工作比例有些失调，冲击了政治。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把其他一切东西冲垮，也会把军事训练本身冲垮。要敲警钟，如果听其自流，不加纠正，那就不得了。明年的工作要突出政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在全军掀起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最根本的必修课。要赶快采取措施，使军政工作比例正常化，恢复一九六二、六三年的正常训练情况，纠正最近一个时期出现的失调现象。”

《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指出：

“我们是毛主席创建和领导的军队，是以政治为特点，政治统率军事。毛主席一向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其他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我们从来认为，军事是主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政治。我军政治上一塌糊涂，敌人来了向后跑，即便军事技术上再好，有什么用！一定要突出政治，使政治思想工作真正成为我们全盘工作的基础。政治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才能搞好，军事训练也才能搞好。军事训练、生产等和政治工作发生了矛盾，要给政治工作让路。”

1965年《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罗瑞卿在北京准备了一个初稿，标题是《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更高举，使创造四好连队运动落实再落实》。

这篇社论充分肯定了1964年军训成绩，肯定了郭兴福教学法。稿子送到广州后，林彪很不满意，让刘志坚、唐平铸重新修改，加进了“突出政治”的内容。

于是，军报便出现了两个元旦社论的稿子。《解放军报》工作人员将罗瑞卿主持，由《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等人起草的稿子称为“北稿”，而由林彪授意，《解放军报》副总编唐平铸等人修改过的稿子称为“南稿”。

“南稿”送到北京后，罗瑞卿召集华楠等人研究，感到两稿很难统一，罗瑞卿打电话给刘志坚和起草“南稿”的唐平铸等人，对他们说：“你们的稿子看到了，和原来的稿子差距很大。你们赶紧回来一下，和华楠他们再研究研究。”

刘志坚觉得很为难，修改稿是按照林彪的意见改的，很多地方都是林彪亲自写的，他们回去怎么好擅动呢？于是就说：“林总这边现在离不开呀。”

罗瑞卿说：“你们不回来怎么办？两种意见走不到一起了。”

12月30日，刘志坚等人赶紧回到北京，当天“南稿”、“北稿”起草人会合在人民大会堂研究修改问题。到31日，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因为第二天就要见报了，罗瑞卿便拍了板，以“北稿”为基础，肯定1964年军训的成绩，同时参照“南稿”，加上了“一定要突出政治”，同时删去“军事、政治、生产等各方面，如果发生矛盾，要让政治突出，其他的让路”这样的文字。

1965年1月4日，军委以[65]1号文件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至军以上党委。

1月3日至5日,在北京连续召开3次军委办公会议,传达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广州军区蹲点的情况,讨论《1965年国防建设工作纲要(草案)》。

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对林彪指示和工作组的汇报,进行了热烈讨论。讨论的题目集中在如何评价1964年军训的成绩、如何看待大比武,如何落实毛泽东政治建军的思想和林彪突出政治的具体指示。

对于毛泽东政治建军的思想,军队的各级领导是衷心拥护的,因为他们都是跟着毛泽东一步步走过来的。没有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今天。他们每个人的亲身经历都告诉他们,只有毛泽东是正确的,其他人都不行。

对林彪,他们是从内心佩服的,“跟着林总打胜仗……”四野的干部、战士从东北的黑土地一直唱到广东的海南岛;抗战期间,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解放战争,出关20万,入关100万,这些都是全军全党有目共睹的。何况,林彪的指示是代表了毛泽东的思想,因此,大家在发言时一致表示:“拥护林总的指示”。

但是,涉及到对大比武的具体评价和前一年度工作中的成绩和问题,议论就多了。

当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说到:“去年的大练兵,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影响了四个第一,方向偏了。十三陵的军事表演是各地拼凑尖子,弄虚作假,欺骗主席……”

这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拍案而起,指着肖华问到:“哎、哎,哎,你给我讲清楚,谁说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我们济南部队来的尖子哪个是假的?民兵表演,祖孙三代上靶场,爷爷假还是孙子假?全是真的!他们打靶,一枪一个,百发百中,凡参加的人都口服心服,怎么是假的?谁说假的我就跟他辩论!”

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也不甘示弱,跟着站起来说:“你们说大比武以后不比了,我就比!不比就没个高低上下,就分不清先进后进”,他扯开嗓门冲着大家说:“去年底军事训练真的打破了教条框框啦,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没有过的高度。谁向林副主席反映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那是别有用心!”

对战功显赫，全军著名的“三羊（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开泰”肖华不敢正面交锋，但对这些资历相同的老大哥，他这个小弟弟也是从不示弱的。他说：

“你们就是用大比武挤占了政治教育的时间，用军事冲击政治！”一面指着主管军事训练的副总长张宗逊上将批评：“在这个问题上，你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检查！”

和林彪同为黄埔四期出身的张宗逊也不是好惹的，一听肖华批评自己，心想：“你算老几，批评起我来了。我可不能被这个黑锅，弄不好是政治问题。”他马上站起来大声反驳：“我检查什么？我们安排的训练时间又没有冲击政治。既然你提出军事冲击了政治，那好，你们看看到底是谁冲击了谁？”

他向所有与会者展开了训练时间表：“军委有规定，军事政治的训练时间是三七开，政治三，军事七，现在实际情况怎么样呢？我这里有统计，政治占了60%以上的时间。你说是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

“是啊，你说到底谁冲击了谁？”

“十三陵大比武怎么欺骗主席了？谁这样说才是欺骗主席！”

丘八们在一起就爱起哄，沈阳军区政治委员赖传珠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中将、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黄新庭中将等各总部各大军区负责人纷纷响应，对肖华群起而攻之。

会议情况很快就传到了林彪那里。第二天，1月9日，林彪对罗瑞卿说：

“1964年的军训发动了群众，贯彻了以我为主的军事训练的方针和方法，打破了教条主义框框，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成绩是主要的。”

他提出，由罗瑞卿组织一个班子，广泛收集下面对林彪指示的意见，对这一指示作进一步修改。

毛泽东虽然对“大比武”也有热情，但是，他的思想核心还是“突出政治”。在这一点，林彪和毛泽东是一致的。政治上的远见，罗瑞卿显然比林彪差一截。1962年7000人大会，罗瑞卿曾为林彪准备了一份

发言稿,林彪看后认为不能用,自己用了3天时间,只列了一个提纲,在会上讲了3个钟头,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和与会者的好评。

下来后,毛泽东问罗瑞卿:“听说你们给林彪准备的发言稿他没用,林彪的这一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实实在在的回答:“我讲不出来。”

毛泽东:“讲不出来就要学嘛。”

罗瑞卿感叹的说:“可能这辈子也赶不上林总。”

对于“大比武”,罗瑞卿付出了很大的心血,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绩,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许多人的好评。罗瑞卿不甘心轻易就否定了它。他顽强的坚持自己的观点,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与林彪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第14回：罗瑞卿，医院先探刘亚楼 “要通气”，林彪也拿出党章

林彪在突出政治方面是很下功夫的。早在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军队工作后不久，他就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提出了“四个第一”，即：武器和人的关系，人的因素第一；军队各种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的关系，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关系，活的思想第一。后来，人们把它概括为：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同时，他还将当年毛泽东为抗日军政大学题写的校训作为解放军的“三八”作风明确下来，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林彪说：“我们要树立一个作风，就要提出要求，就要有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八个字。”

在林彪的鼓动下，全军掀起了大兴“三八作风”运动，这一运动对当时军队的建设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毛泽东高度赞扬了林彪提出的“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他说：

“四个第一是个创造。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了，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始终把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和突出政治作为军队的中心工作来抓。

1月12日，林彪1964年12月28日与刘志坚等人的谈话记录，由罗瑞卿修改后，经林彪同意，冠以《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题目，于1月13日，由林彪报送毛泽东。同日，军委办公厅发出《转发〈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重新印发的通知》，收回军委[65]1号文件。

1月15日,军委以[65]4号文件转发毛泽东当日对《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批示及林彪1月13日给毛的信。毛泽东的批示是:

林彪同志:

此件早已看过,完全同意,照此执行。执行中逐步总结经验,大约一年总一次,至多两次也就够了。这是就军说的。中、下级单位,则要一年总结多次。

1月18日,刘少奇对林彪指示做出批示:

此件前次已经看过。完全赞成。退军委总参。

1月31日,适逢遵义会议三十周年,邮电部今日特发行一套共三枚纪念邮票,图案分别为毛泽东像和《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决战前夕》两幅油画。其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为彭彬根据毛词《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画面是毛泽东与林彪长征途中在遵义娄山关上的形象。这当然是虚构,但却是首次将毛泽东、林彪并肩战斗的艺术形象公开呈现在全国公众面前。1月出版的《人民画报》1965年第一期,亦以两版的显著篇幅刊载了此画。

2月9日,军委以内部文件形式,重新印发经修改后的《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公布了毛泽东1月15日及刘少奇1月18日的批示,公布了军委1月12日的《通知》:

林彪同志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是一个很适时、很重要、抓住关键问题的指示。正如林彪同志指示中所说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各项工作都获得了很大成绩,成绩是主要的,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是,有些部队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林彪同志及时地敲起警钟,不使那些偏向得以发展,这是很重要的,应当引起全军的严重注意。全军一九六五年的各项工作,都应根据林彪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来进行安排,务必使之落到实处。

该文件要求发至连,向战士认真传达,组织讨论。

2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等接见出席海军干部工作会议、《解放军报》编辑记者会议的人员和第三批战士演出队时,毛泽东说:

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

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这是个发明。我们以前是靠解放军的，以后仍然要靠解放军。

“四个第一”是林彪在1960年首次提出的在军队政治工作领域中要正确处理的四个关系：人和武器相比较，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种工作相比较，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事务性工作和思想工作相比较，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相比较，活的思想第一。

林彪不希望罗瑞卿成为他的对立面。

1965年2月，罗瑞卿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林彪让他先去医院看看当时的空军司令刘亚楼。

刘亚楼，解放战争期间，在林彪手下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与林彪朝夕相处，配合默契。和罗瑞卿一样，刘亚楼也是红一军团出来的干部，也是军内十分能干的高级将领，俩人性格上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个人之间友情也是很深的。早在1929年刘亚楼由福建老家参加红军，编在红四军，罗瑞卿在四军任支队政治委员。有次刘亚楼的父亲来部队看望儿子，不巧，刘亚楼带部队外出执行任务，没有见到。老人离开部队时，罗瑞卿给了刘亚楼的父亲一些银元，让他回家度日。对此刘亚楼对罗瑞卿一直是很感激的。长征后期，毛泽东率红军一、三军团出草地后改编为陕甘支队，刘亚楼任二纵队副司令，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成立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是一科学员。红大改为抗大后，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庐山会议后，刘亚楼听说林彪要回部队主持军委工作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在第一时间里告诉了罗瑞卿，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罗瑞卿回到军队后，两个人交往有加，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刘亚楼当时患肝癌住在上海华东医院，已经是晚期。罗瑞卿正好也想去看他，就先到了刘亚楼那里。

卧在病床上的刘亚楼看起来情绪不怎么好，显得有点烦躁。他见罗瑞卿进来了，便要坐起来。罗瑞卿快步赶到床边，将他按住：

“躺着吧，亚楼，别动了。早想来看你，一直脱不开身。这次正好来向林总汇报工作，他要我先来看看你。”

“坐吧，长子。”刘亚楼无奈地笑笑，躺下了。

“亚楼，我看你气色不大好，别着急，要想得开些，好好养病。”

“没有什么”

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刘亚楼说：“总长，你跟林总的事，林总跟我谈了。不过，谈通了，结果出乎意料地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

我对林总说了：‘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

罗瑞卿说：“你放心，我不会误会。”

刘亚楼歇了一会儿，又说：“我听他这样讲，也向他表示：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说完，刘亚楼叹口气，显出凄然的神情。

罗瑞卿伸出手去，握住了刘亚楼的双手。

“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肖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

罗瑞卿说：“亚楼，我能跑到哪里去呀？大家不都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这件事不用再提了，现在既然已经谈通了，你到他那儿就只管汇报工作吧。”

刘亚楼正在艰难地走着人生的最后行程，心情十分沉重。他沉吟良久，又对罗瑞卿说：“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也许不该说的话。”

罗瑞卿紧紧地握住刘亚楼的手，说：“亚楼，你在病中，不要考虑太多的问题，要把心胸放宽，身体要紧，养病要紧。”

罗瑞卿看过刘亚楼后，林彪约见了他。一见面，林彪就问：“怎么样，跟刘亚楼谈的还好吗？”

“没有谈什么事，只是简单地聊了聊。”接着，罗瑞卿开始汇报工作。

林彪听完了汇报，问道：“完了吗？”

“完了。”

罗瑞卿不说话了。

林彪看出罗瑞卿没懂他的意思,看到罗瑞卿情绪低落,便用安慰的口吻说:“64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罗瑞卿认真地不做声地做着记录。

林彪又说:“你这个人优点突出,缺点也突出,以后你要做好两点,一个是心胸要开阔,容忍不同的意见,吴法宪说你独裁,不见得对,可是也有一点。第二,要养好病,身体保养好,继续跟着主席革命。论能力,你在大将中第一。”

在罗瑞卿看望刘亚楼之前,叶群已经多次去过刘亚楼的病房。

刘亚楼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不久,林彪也打破从不探视病人的习惯,亲自来医院探视。随后,经常打电话询问刘亚楼的病情和治疗情况,写信要刘亚楼好好养病,还经常送些画刊和革命歌曲的唱片等给刘亚楼,以调剂生活。他希望通过刘亚楼做通罗瑞卿的工作,能够使罗瑞卿站到他这边。当然,他也做好了罗瑞卿站不过来的准备。

1965年4月12日至5月底。全军作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罗瑞卿主持。作战会议开了几天后,由上海迁居苏州的林彪电召杨成武去,提出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样式的主张:采用又红又大又鼓的五角星作为帽徽,并配以两个鲜红的平行四边形的领章,作为突出政治和革命化的象征。基本与井冈山时期红军的领章和帽徽样式是一样的。

4月28日,罗瑞卿、杨成武陪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于作战会议的方针给予了肯定,对林彪建议的领章、帽徽样式非常满意,当即批准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罗瑞卿一行向毛主席汇报后,回到北京后,罗瑞卿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叶群,请她向林彪报告:“已向主席汇报。”并请示林彪,是现在还是过几天再去请示。叶群在电话中立即一迭声地说:“应该马上来,早就该来了,请杨副总长一起来。”

5月2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上海去向林彪汇报,因为已接到刘亚

楼病危的报告，两位总长的夫人同行，准备一起再见一下刘亚楼。

到上海后，他们与林彪取得联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立即去见林彪。进屋后，看到桌子上醒目地摆着毛泽东选集和党章。罗瑞卿刚落座，林彪就没头没脑地对罗瑞卿说：“要加强通气！嗯，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強，这是组织原则。”

说完，他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几段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又打开党章，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段落。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林彪念完后，把书放到桌上，摆整齐，窝在沙发里，用柔和中透着森严的语气说：“要加强通气。现在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接着，林彪捻着手指说：

“第一条，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第二条，我在北京时，10天通气一次；第三条，我不在北京时，一个月通气一次；第四条，重大问题，立即通气；第五条，来我这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随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接着，林彪批评了罗瑞卿在最近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罗瑞卿默默地、仔细地用笔做着记录。合上笔记本后，他坐正身子说：“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你能做到，就好。”

5月3日晚上，罗瑞卿约杨成武在锦江饭店花园里散步，他对杨成武说：“昨晚我没有叫你，自己先去看了林总，林总见到我发了一通脾气，批评我，骂我，说我一是封锁他，总参封锁他，办公厅、总参作战部、政治部的文件不送给他。二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电影片子的解说词中，只提了在周总理和罗总长的领导下，没有提毛主席、刘少奇主席，没有提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老帅。三是在为庆祝原子弹爆炸成功举行的宴会上，将自己安排在首席——第一桌上，把各位老帅安排在第二、第三桌上。

林总对我说，今后要加强通气。对如何向他通气，规定了五条，主要精神是：如果林总在北京，要10日汇报一次工作，如果在外地，要1月汇报一次，我到他那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时

可去。

林总的桌子上还放着毛主席著作和党章。在批评我向他封锁时，还引用党章和毛主席的话，一句句念给我听。我感到他这一次态度非同一般。”

杨成武说：“如果总参的文件没有送给他，有不妥的地方，我应该负责，因为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管常务的副总长，我要作检讨。”

“不，我负责，我是总长。”罗瑞卿说。

5月4日上午，他们又一次去医院看望刘亚楼，这时刘亚楼已昏迷不醒，脸如黄蜡，医生正在忙于抢救，他们等了一些时候，见刘亚楼尚未清醒过来，想和他再说一句话已感到无望，大家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离开了医院，回住地去了。

当晚，罗瑞卿对杨成武说：“明天我们回北京。”

杨成武向罗瑞卿建议：“是否去林总那里看一看。”

罗瑞卿因为刚挨了林彪的批评，有点情绪，说：“一去他就发脾气，我不想去了。”

杨成武说：“正因为林总发过脾气，你还是再去看一下好，否则他又批评我们总参不辞而别，更被动。”

罗瑞卿听后，想了想，说：“那你陪我一起去吧！”

“可以。”杨成武答。

第二天，他们让两位夫人由锦江饭店直接去机场，罗瑞卿和杨成武同车去林彪那里。

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主持作战会议。

5月19日，林彪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作战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在听取汇报时，罗瑞卿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事先已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向中央常委提意见，所以在发言后，各军区代表也相继发言，当即受到林彪和其他中央常委的严厉批评。因为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泽东请示报告过。毛泽东完全同意林彪的意见。

会议临近结束时，有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并将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月25日深夜，罗瑞卿刚踏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记录的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

“作战会议只能以主席、中央常委和会议多数人的意见和会议文件作为结论，不准任何个人以总结的名义讲话。元帅、总长和副总长都可以发言，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63号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提法不对，要具体进行的问题，以后可以逐步用军委常委或军委办公会议的名义发出指示。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瑞卿心里一阵阵发凉：“关于作总结发言的事，要出问题……”

是啊，关于这次作战会议，军委主管训练的叶剑英元帅已经作了很长时间的准备，最后却由罗瑞卿来总结。此事自然又被告到林彪那里。

1965年6月29日，在罗瑞卿家中讨论林彪为总政再版《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当讨论到前言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时，罗瑞卿皱了皱眉头，他清晰地记得，1961年4月30日，罗荣桓和林彪在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就是因为此事发生争论。林彪当时不是已经同意不这样提了吗？怎么现在又写上了？罗荣桓也是毛泽东信任和倚重的人，毛泽东对此事是什么看法？他示意大家停一会，到另一个屋里去拨通了给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的电话，想从田家英那里了解毛泽东的想法：

“是家英同志吗？我是罗瑞卿。”

“是罗总长，你好！”田家英问。

“你好！有件事要向你这个大理论家请教啦：我们听到一种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的顶峰。’这种提法准确吗？”罗瑞卿把遇到的问题向田家英讲了一遍。

“请教可不敢当，不过你提的这个问题提我觉得不确切。我和陈伯达、王任重、陶铸几个人在长沙协助润色毛主席的几篇文章时，大家曾考虑不用‘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臭马克思主义’此类对仗性的词语，恐怕‘最高最活’的话也不宜用。这种提法也不好理解，外文怎么翻译呢？”田家英讲了自己的看法。

回来后，罗瑞卿兴奋得对大家说：“我问过家英同志了，理论家也

说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最好不用。最高,那么今后再不能高了?是不是还有次高啊?最活难道还有次活?马列著作都是死的吗?也不是裹足不前的……说是顶峰,也不科学,到了顶峰,难道不能再发展了吗?从辩证法原理上,这话难讲通。”

当有人提醒这是林彪讲过的话时,罗瑞卿说:“林总说的也不一定对,谁有真理听谁的。而不是谁官大听谁的。”

1965年7月14日,《解放军报》起草了一篇社论,标题是《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罗瑞卿在主持讨论这篇社论时,发现里面也写上了“最高最活”,就问社论起草人:

“这个提法是不是林副主席的原话,还是你们的记录?以前公开见报没有?”

大家回答:“这是林副主席在上海说的原话,报上也用过。”

罗瑞卿走到另一个房间,这次,他没有问田家英,而是直接给中央当时分管理论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常委康生打电话:

“喂,是康老吗?我是罗瑞卿……”

“是罗总长,有事吗?”康生问。

“是这样,现在有一种提法,说‘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拿不准‘最高最活’的提法是否妥当,中央是否有这种提法?想请教一下康老。”罗瑞卿说。

康生不知道“最高最活”出自林彪,便表示:“这是新的提法,恐怕应该问问中央常委,最好还要请示一下主席。”

“那您个人的意见呢?”罗瑞卿继续问,康生未正面回答,想了一下说:“还是按中央原来的提法稳妥。”

于是,罗瑞卿回到会场,将“最高最活”这句话删去了,并在旁边批示:“这样的提法,毛主席知道也不会同意的。”

当林彪知道这些情况后,气得大骂罗瑞卿“太狂妄了”,“太不自量力了”。

林彪开始在军队一些单位设立联络员,让他们直接同叶群联系。

第15回：抓机遇，叶群慨然飞杭州 婆留城，面“圣君”侃侃而谈

10月25日，就在罗瑞卿到苏州向林彪汇报的前一个月，林彪收到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送来的一份材料和附信，信中写道：

林副主席：

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62年5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1962年5月到今年7月，从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直到今年7、8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¹。他不仅骄傲懒散，根本瞧不起军委常委的其他同志，而且对您有反感，竟然还想在文中造成和您并驾齐驱，甚至超过您的形式。

雷英夫曾是毛泽东推荐给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长期在叶剑英元帅身边工作。1938年8月，在6大队一队学习的雷英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1月份，他与同在抗大学习的学生学员张清化一起到抗大总校参谋训练队报到，在这里学习的干部几乎全是经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像他们二人这样的学生出身的学员极少。

后来，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叶剑英已经在重庆展开工作，眼下南方局工作任务艰巨，他那里急需两名得力的参谋帮助工作。”

毛泽东拍拍前额，然后又用手轻轻梳理几下长长的头发，似乎是经过深思熟虑地说：“那好吧，我给你推荐一个。”毛泽东点着头说：“抗大参训队有个18岁的娃娃，他叫雷英夫，很好，很突出，对军事有一定研究，特别在理论上很有前途……你看怎么样？”就这样，1939年8月，雷英夫和张清化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到，给叶剑英做参谋，对外的公开身份是18集团军的参谋。

在重庆期间，雷英夫执笔为叶剑英在蒋介石召集的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上的发言稿，和“皖南事变”后，给《新华日报》写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文章，深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赞许，曾轰动重庆山城。朝鲜战争爆发前，他又被调到周恩来办公室任军事秘书。

虽然没有亲自带兵打过仗，但是由于自身的才智和长期在统帅部工作的经历，使雷英夫具备了极好的军事造诣和潜质。1950年朝鲜战争期间，他和几个参谋人员最先预测出来美军仁川登陆的作战计划及登陆时间，因此，一直深受毛泽东的信任和喜爱。他的这封揭发信，其份量可想而知。

收到雷英夫的信后，林彪没有立即送给毛泽东，他考虑了很长时间。

罗瑞卿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素有毛泽东“大警卫员”之称。自从中共中央进入北京以后，凡是有毛泽东的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罗瑞卿的身影。对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是言听计从，坚决执行。从批胡风，抓潘汉年，到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只要是毛泽东说的，罗瑞卿就千方百计的落实做到。毛泽东喜欢游泳，为了他的安全，不会游泳的罗瑞卿虽然年已50岁了，仍然学会了游泳。以后，凡是毛泽东要到一个生疏的地方游泳，罗瑞卿总是先下水试探。难怪毛泽东说：“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可以看出，罗瑞卿对毛泽东是忠心耿耿，而毛泽东也把罗瑞卿看成是自己的学生和弟子，对他十分信任。

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军委办公厅兼国防部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宣布犯有“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和林副主席‘唱对台戏’的严重错误”，责令停职检查。

18日，被免去一切职务。杨成武任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路扬任第一副主任，增加金涛、郑汉浩为副主任。并明确军委办公厅又是国防部办公厅，又是总参谋部办公厅。

11月27日，就在罗瑞卿与林彪见面的那天，林彪又收到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联名给林彪写的一封信，主要是讲1963年以来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对海军工作的影响，共10条，矛头直指罗瑞卿和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海政军委苏振华。这封信是叶群授意写的。

初秋的一天，叶群给李作鹏打电话说：“首长要我给你打个招呼，罗长子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要首长让贤休养。”又说：“罗长子要首长不要干涉军队工作，军队工作由罗负责。”她说：“老帅们对罗的意见也很大，罗的情况主席和首长都知道了。”“他正在组织新班子，又是提级，又是提职。”她提醒李作鹏：“对当前局面提高警惕。”

李作鹏当即表示：“请转告林总，请放心，我决不会做出对不起林总的事情。”

叶群又说：“你们那个姓苏的是反‘双一’的。”

李作鹏心里明白姓苏的是指苏振华，但反“双一”是什么意思，他未听懂，因此反问她：“什么叫反‘双一’？”

叶群解释说：“就是反一方面军、一军团。”

她又说：“你从海军角度看到有什么问题，可以写点材料送来。”

叶群的电话之后，李作鹏找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到他家，把叶群电话精神告诉了他们，并商量写材料问题。张秀川当即谈了海军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围绕罗瑞卿搞军事大比武，与林彪“突出政治”相对立和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的意见分歧等等。李作鹏马上就让张秀川在他的办公桌上将他说的这些写出来。写完后，李作鹏看了一遍，然后交给王宏坤看，俩人都没有提出更多的意见。李作鹏说：“就这样吧，整理出来，用我们三人名义送去，以后想到什么问题再写。”

时隔不久的一天，叶剑英找李作鹏到西山他家里谈工作，说到罗瑞卿的问题。

叶剑英说：“这个人很霸道，目空一切，到处伸手，要注意哩。过去我们想巴结他，也巴结不上，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

稍后，叶剑英又提到肖劲光，说：“那也是个老虎屁股。”

李作鹏静静的听着，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林彪对肖劲光是有好评的。

叶剑英接着又说：“苏振华这个人不错。”

李作鹏还是静静的听着。

再说苏州的林彪，此时他手里有了包括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王宏坤、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等4名高级干部和叶群布置林彪的秘书等人写的9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

罗瑞卿从苏州走后，林彪急召正在苏北参加“四清”的叶群回苏州。

当叶群急急火火的回到苏州，林彪不紧不慢的对她说：“让你带上雷英夫、李作鹏他们的材料去向毛主席汇报，敢不敢去呀？”

叶群听说林彪让她直接去见毛泽东，不禁怦然心动，血往上涌，表面却不动声色的说：“那有什么不敢。”

林彪提醒她：“这可是有风险的。”

“那我也不怕。”叶群非常坚决。

“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你到杭州后，不要和其他人联系，直接找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跟主席约好时间，把这封信亲自面交毛主席，懂吗？”

“知道。”

“此事宜早不宜迟，让吴法宪派飞机送你去杭州。杨成武现在杭州休养，到杭州后，有什么问题，可以让杨成武想办法帮你解决。”

“行，我这就找吴胖子安排。”叶群立即给空军司令吴法宪打电话。

11月30日，叶群带着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11份材料，在吴法宪的陪同下，飞到了杭州。毛泽东知道叶群到了杭州，让她先等几天。于是，叶群按照林彪的安排，找到住在杭州空军疗养院的杨成武，说：“林总有一封信要交给毛主席，你能不能和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

“可以。”杨成武立即给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打电话，约他下午来空军疗养院。

张耀祠当天下午就来到杨成武的住处。俩人在会客厅还没有说

几句话，叶群就笑容满面的走了进来，对张耀祠说：“张局长，辛苦你了。我这里有一封林彪同志给毛主席的信，请你转交给毛主席，行吗？”

“行。我一定交给毛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手里的信，放在口袋里。

“那你们先谈着。”叶群出去了，她来到另一个房间，拨通了苏州的电话

.....

过了一会儿，叶群又返回来，对张耀祠说：“我给林彪同志打了电话，他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

张耀祠说：“可以。”从口袋里掏出信还给了叶群。

杨成武见状，赶紧说：“很久没见毛主席了，我也很想看看他。”

张耀祠说：“行，我回去向毛主席报告一下。”

回到毛泽东的住地汪庄后，张耀祠将这些情况分别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噢”了一声，没有说什么话。

晚上，叶群又来到毛泽东住处，特地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条子，交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要求与毛泽东面谈。

第二天早上5点钟，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通知张耀祠，“给叶群打电话，主席要见她。让她快点来。”

张耀祠给叶群打完电话，不多会儿，叶群就到了。张耀祠迎了上来，告诉叶群：“谈话别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

叶群走进毛泽东的书房。工作了一晚上的毛泽东起身和叶群握了握手，让她坐在对面的沙发上。

叶群努力抑制住内心的激动，慢慢地说道：“主席，这是林彪同志让我面交给您的信。”

毛泽东打开了信，信中写道：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月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

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

毛泽东让叶群谈谈情况。

过了两个小时，张耀祠看叶群没有出来，就走进毛泽东的书房说：“主席，该休息了。”毛泽东没有说话，仍在专注地倾听着叶群的汇报。张耀祠悄然无声的退出来。

又过了一个小时，张耀祠再次进去提醒毛泽东该休息了，毛泽东还是没有说话……

叶群已经同毛泽东谈了4小时零20分钟了。实在耐不住的张耀祠又第三次走进毛泽东的书房，这时，他听见叶群正在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过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他。林彪的位子让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权’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眼盯着这个位置的……”

事情如此严重，张耀祠哪里还敢吱声，赶紧悄悄地退出来。

叶群汇报了4小时55分钟，终于走了出来。毛泽东立即叫来汪东兴，对他说：“你用我的车，亲自将叶群送回苏州。路上要注意安全。”

“是，我这就去办。”汪东兴答应后，用毛泽东的专车亲自将叶群送回苏州。

叶群走后，毛泽东仔细阅读了她带来的材料，然后叫来徐业夫：“你了解一下，少奇同志现在在哪？”

“少奇同志病了，现在在北京。”徐业夫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很惊讶：“噢？厉害吗？”

“听说是感冒了，发高烧。现在烧已经退了，正在玉泉山休息。”徐业夫说。

“那就算了，你给总理挂个电话，我要和他讲话。”

“行。”

“叫叶帅来一下。”毛泽东继续吩咐，“杨成武在杭州，他想见我，你也安排一下吧。”

徐业夫一一记下了毛泽东交办的事情。

12月2日，毛泽东在林彪送来的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情况的报告》的报告上批示：

“林彪同志：

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种、各兵种大同小异。请你考虑，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如何，请酌定。”

林彪在报告上是这样请示的：

“主席：从这份文件中可看出，如果战争爆发，其他部队情况可能是与这个部队近似。”

同日，毛泽东在和浙江省委书记江华谈话时说：“我认为这是突出政治和反对突出政治的斗争深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坚持四个第一，反对抓政治思想的人还有。譬如你们浙江省有个信用社主任说：‘政治就是理论，理论就是会说，会说就是吹牛。’但是这种人不多了。公开提出业务第一，数字第一的人大大减少了。他们学得比较聪明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突出政治，不愿放弃单纯业务观点这根‘腊肉骨头’，不是突出政治。形势逼人，于是就改头换面，来个折衷主义。”

在政治和业务关系上，有三种摆法：第一种摆法是政治第一，业务第二，政治统帅业务；第二种摆法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政治为业务服务；第三种摆法，政治和业务都第一，叫两个第一。这三种摆法，第一种是正确的，第二种是错误的，这很明显。第三种摆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不用说，是错误的。但是有些人就分辩不清，为什么有些人对‘政治和业务都第一’的错误观点模糊不清？这是他对折衷主义的面貌还认识不清的缘故。”

毛泽东还说：“罗瑞卿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林彪同志带了几十年的兵，难道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

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都是政治仗。要恢复林彪突出政治的原则。罗把林彪同志实际当作敌人对待，罗当总长以来，从未单独向我请示报告过工作，罗不尊重各元帅，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凡是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拉几个人在一起。”

“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么！也不是军委副主席么！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么！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做总结？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他领导看过？大将也不只他一个么！现在许多元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了？党政军的工作就靠罗长子一个人干？中央的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上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

第16回：急落实，中宣部调度安排 招成武，毛泽东再问详情

再说北京这边，按照27日周恩来与彭真的电话约定，11月28日下午15时，周恩来、彭真和中宣部三位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

彭真一进来就问邓拓：“吴晗现在怎么样？”

邓拓据实回答：“吴晗现在很紧张，这次批判有来头。”

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周恩来面带笑容的说：“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用谩骂和恐吓，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

邓拓说：“姚文元的文章就是这种谩骂和恐吓的典型。”

周恩来望着邓拓说：“那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不予转载呢？发表出来让大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而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却对我们的文章怕的要死，拼命封锁。这能挽救他的失败命运么？”

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关键是写好编者按。”

邓拓：“我担心这样一来，吴晗的压力会更大。”

周恩来问：“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邓拓回答说：“很紧张，他很清楚姚文元文章的来头。”

彭真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得说：“又是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周恩来注意到会场的情绪。他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讨论就此结束。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周恩来望着彭真问：“你看会议是不是就到此结束？”

彭真点了点头，没有说话。随后，他把《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社的负责人叫到身边说：“你们必须赶写几句按语，要写出水平来。你们一定要在历史唯物史观上下功夫。凡点到吴晗名字的时候，一律在后面加上‘同志’，这是分清敌我的大事。明白吗？”

大家点头同意。

为了让北京主动些，大家又商定，11月29日《北京日报》先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其它报纸转载。

从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回来后，中宣部负责全国学术批判工作的副部长周扬立即部署，安排中宣部科学处组织写批评吴晗的文章。他约了中宣部科学处的龚育之和林润青到他家具体商议此事。

周扬很清楚，在批判《海瑞罢官》的问题上，中宣部还欠着江青一笔帐呢：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时，江青提出要批《海瑞罢官》，中宣部几个部长没有理她；1964年毛泽东指示将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发到党内县一级单位，其中就包括吴晗的《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编写的《燕山夜话》等材料，中宣部还是一直没有动作，这次必须要动了。

28日下午，在周扬家的客厅里，周扬对龚育之和林润青说：“根据彭真同志的意见，我想组织三篇文章，一篇是批评《海瑞罢官》的，支持姚文元的文章；一篇是批评吴晗的历史观，一篇是批评吴晗的道德继承观，从学术角度展开讨论。你们看行吗？”周扬的考虑可谓面面俱到，即紧跟着毛泽东的思路，又兼顾了彭真的安排。

“没有意见。”“可以。”龚育之和林润青都表示同意。

“不过，姚文元的文章对历史上的清官全盘否定，学术界似乎有些看法……”龚育之提出了他的看法，似乎对支持姚文元的文章有些想法。

“去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星宇’写的《论‘清官’》评价挺好，分析比较全面。”林润青说。

“是啊，你还给我和陆定一同志推荐过。这个星宇是哪个单位的？”周扬问道。

“人民大学的，是个笔名，集体写的。”林润青回答。

“主笔是谁？”

“戴逸。”

“那就把他先借调过来。”周扬拍板定案。

“第一篇由龚育之执笔，再把科学院的林甘泉、邢贲思和人民大学的戴逸借调过来，你们5个人，怎么样？”周扬征求龚育之和林润青的意见。

“行。”龚育之和林润青二人表示同意。

“再请《红旗》杂志的戚本禹写第二篇，批判吴晗的历史观。他对历史很有研究，写的《为革命研究历史》主席很赞赏。第三篇，约请《红旗》杂志的关锋写。”周扬接着说。

“姚文元的文章中说《海瑞罢官》有政治影射，这个问题怎么写？很多人认为姚文元文章中联系现实政治中的‘单干风’、‘翻案风’过于牵强……”龚育之又提出了新的忧虑。

周扬若有所思的说：“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应该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呢？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不能这么写。不过，姚文元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

“但是要写政治问题呀？”林润青提出。

“能不能这样设想，影射不写得那么实，那么死，可以从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从这个角度来写，写得活泛些。”龚育之建议。

“那这种思潮的性质是什么呢？”林润青问。

“当然是反社会主义了。”周扬回答。

“你要从政治上批评吴晗反社会主义，可是他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建国后也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说他反社会主义，怎么说呢？”林润青又问。

“列宁说过：‘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本来要到的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自以为‘也是马克思主义’、‘也是社会主义’的房间；这走进了的另一个房间，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实质’的房间。这样，既肯定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是‘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反社

会主义’的，又不否认他本来要到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房间的主观动机。”龚育之提议。

“这样很好。”周扬十分赞同。接着，他又十分感慨地说道：“咱们这篇文章中还要批判田汉和孟超的错误，田汉是我少年时代心目中崇拜的偶像呀，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不仅是我，当时多少进步青年都很崇拜他们。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和迅速，这些同志跟不上啦。”

“这篇文章用什么笔名？”

“用‘方遒’吧，毛主席诗词中：‘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遒’字不好认，还是用要求的‘求’吧。”

“正好，咱们总在会议室讨论修改文章，影响他们在会议室打乒乓球，‘方求’，妨碍打乒乓球。”

11月29日，《解放军报》抢先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各自都加了“编者按”。

《解放军报》根据罗瑞卿的指示，写了一篇540多字长篇按语。作为中央军委的机关报，这篇编者按语，将《海瑞罢官》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又说：“《海瑞罢官》这个戏的出现，正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要求读者“不仅要善于在战场上进行阶级斗争，而且要善于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阶级斗争”。

彭真对《解放军报》的“编者按”很不满意，他在1966年1月2日的一次会上批评说：“《解放军报》在讨论没有展开之前，就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谁还敢发表不同意见？”

《北京日报》的“编者按”是经过彭真亲自修改审定的，不表示支持姚文元的文章，而是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讨论应该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看到《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光明日报》也赶紧请示中宣部是否转载？中宣部答复说：“彭真同志考虑，如果北京各报同时转载，震动太大，决定《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迟一天转载，即11月30日见报，可以先写好转载时编辑部用的按语送

去看看。”

《光明日报》立即将事先已起草好的按语送中宣部审看。

当天晚上,中宣部将审改后的《光明日报》“编者按”清样退回《光明日报》,并通知说:“《光明日报》可以再晚一天,12月1日见报。”

11月29日,《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亲自主持,集体起草转载姚文元文章的“编者按”,并送康生看过,由周恩来最后修改定稿。

11月30日,《人民日报》在第94期《学术研究》版“学术研究”专栏里,转载了姚文元文章,并刊出编者按语。“编者按”指出: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11月30日夜,中宣部又给《光明日报》打电话:“《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应再推迟一天。”于是,《光明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比《北京日报》迟了3天。

《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后,华东以外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陆续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及人民日报编者按语。

也是在这种形势下,11月29日,北京新华书店复电上海,同意定2000本《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单行本。作为中国的首都,中国第二大城市,2000本的订单实在只是象征性的。当江青听到张春桥的报告后,生气地说:“我们这些人到底还有个讲话的地方没有?”

12月3日,林彪致信毛泽东:

主席:

十二月二日主席有关五十五师突出政治一文的批示已经收到,主席的批示对于即将召开的政工会议与明年和今后的政治工作将是一个强大的推动。军队如不加强政治工作,不但打仗经不起考验,而且投敌事件还会更多的发生。其他如破坏军民关系等坏事还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决遵照主席指示送北京少奇、恩来、彭真同志阅和军委常委阅,然后发师以上党委。

祝主席健康并致敬礼。

这天,在杭州的杨成武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的电话,说毛泽东

要见他。一会儿，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来亲自用车将杨成武送到毛泽东的住地。

徐业夫让杨成武先在客厅里坐着，然后他去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出来了，杨成武赶紧站起来向他敬礼说：“主席，您好！”

“好，好。”毛泽东一面笑着说，一面用手指了指沙发，示意着：“坐下，坐下。”

毛泽东走到对面的大沙发上坐下，中间放着一个圆茶几。服务员随即端来两杯清茶，一杯送到毛泽东面前，一杯放在杨成武面前。毛泽东随即点燃一支烟，他一面吸烟，喝茶，一面和蔼地问杨成武：“到总参工作几年了，情况怎样？”

“从北京军区出来后，就一直在总参……”杨成武扼要地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和杨成武很随意地聊起了部队的情况，当杨成武紧张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后，毛泽东问道：“各位老帅怎样？”

“老帅都有分工，刘伯承元帅负责军委战略小组，我协助他，贺龙主管航空和常规武器的研制，聂帅管尖端技术，徐向前任民兵组长，叶剑英抓训练。林总由于身体不好，在北京时间很少，大部分住在外地，上海、苏州等处。军委的日常工作，根据您的指示，由贺老总和聂帅主持。”杨成武如实向毛泽东作了回答。

“罗瑞卿的情况怎样，你们熟吗？”毛泽东换了个话题。

“熟。都是红四军的，开始他当支队政委，后来任纵队政委……”杨成武开始向毛泽东报告罗瑞卿的情况

“罗瑞卿和林彪的关系怎样？”毛泽东接着问。

“二位都是我的老首长，近来可能有些误会，”杨成武将5月3日罗瑞卿同他的谈话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报告。

毛泽东听后对杨成武说：“我都知道了，找你之前，也找许世友谈过。”

12月5日，毛泽东到了上海，住进上海“414”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因其门牌号为“414”而得名，位于上海市西郊长宁区一个僻静的花园地带，占地面积达1133亩。它有山有水，建有牡丹园、翠竹园、桂花园和腊梅园四个漂亮别致的园林区，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在浓

密的树林中，掩映着三幢别墅楼，三楼连成一体。



毛泽东住的1号楼是一幢单层的湖绿色的别墅，横卧在绿树丛从中，宛如绿浪中的一个小岛。湖绿色的玻璃门，两侧是两排长长的玻璃窗。窗外看不见里面的陈列。

走进会客厅，绿色的窗帘、门帘和地毯与自上而下光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光感效应。会客厅里放了一大圈单人沙发和茶几。

毛泽东住下后，立即让秘书找周恩来赴上海。

周恩来刚从上海回京时间不长，又让秘书准备飞机去上海，邓颖超问：“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

周恩来说：“主席召见。”

“大概要多长时间？”

周恩来回答：“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回来。”

秘书从他俩的对话中估计时间不会太长。只是带上了洗漱用具，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6日深夜，与周恩来谈完话后的毛泽东寝食不安，他让徐业夫发出紧急通知，要中央政治局常委们8日都赶到上海毛泽东的住处开紧急会议，并点名让叶群参加会议，要在会上发言。

第17回：不服气，彭真又找刘少奇 事态迫，众常委齐聚华亭

《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12月6日这天，同时报道了全国各报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情况，并刊登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语。《文汇报》把《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语《一株大毒草》登在前面。

彭真的火又上来了，他拉着刘仁一起去找邓小平。

邓小平11月3日到大西南视察，12月6日才从昆明回到北京。彭真向他汇报说：“你说要把政治和学术分开，有人就是要在主席身边吹风，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这就混淆了学术和政治的界限嘛。”

邓小平说：“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政治结论呢？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进行，混在一起是最危险的。”

“你看现在怎么办吧。”

“咱们问问少奇同志。”

邓小平、彭真又一同来到刘少奇那里。

彭真对刘少奇说：“不光是我，文化界有相当多的同志对姚文元的文章很不理解，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搞。”

刘少奇沉思着说：“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才好。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棍子，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千万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将来说我们！”

邓小平说：“少奇同志强调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党内出现过王明、张国焘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了。”

“是，我回去就安排布置。”彭真回答说。

彭真回来后，叫来邓拓、李琪、范瑾，对他们说：“你们说姚文元的文章不好，我们能不能写出一篇好文章呢？比如从理论上，也就是从学术上分析一下吴晗同志的戏剧观、历史观，用具体的材料、具体的事事实回答一下人们关心的问题。像封建道德能不能继承，古代社会有没有清官？到底是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把这些问题辩论清楚了，对大家的理论水平不也是提高吗？”

邓拓，你在这场‘学术讨论’中不要消极观战，而要积极参战，北京的理论工作者要走到各省、市前面去！”

已经接到开会通知的林彪此时已来到上海，他坐在一件昏暗的房间里流泪，他是为即将召开的上海会议流泪。哎，1938年3月1日凌晨，那个倒霉的阎锡山士兵的子弹，从林彪的前胸穿过，擦伤了他的中枢神经，使林彪落下了这么个怕光，怕风，怕水的怪毛病，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12月7日，毛泽东几次批示身边工作人员，通知一些领导到上海：

“请用电话，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在杭州）、谢富治四位同志，于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谈。”

“宋任穷、陈锡联（东北）、李雪峰、杨勇、廖汉生（北京）、杨得志一架飞机共七人，于八日上午来此。”

实际上毛泽东此处列出来的是6人。

毛泽东还写到：“贺龙、董必武、王尚荣、李天佑、张爱萍、雷英夫、徐向前、刘伯承（如卧床，可不来）、朱德，共八人，于十二月八日上午来此。”

“许世友、韩先楚、陈毅、陶铸、王任重、李井泉、刘澜涛七人于十二月八日来上海。”

“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三同志：请于本日或明日到上海一谈。在四川，由成都转告。”

这天，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通知空军司令吴法宪：“毛主席决定，从八号开始，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要你去上海参加会议，并准备飞机，把北京的一些主要领导人送到上海去参加会议。”

这天，正在北京玉泉山陪刘少奇养病的王光美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从上海打来的电话，通知刘少奇和周恩来马上到上海开会。第二

天，他们同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

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刚停稳，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就直接登上飞机，将两份装有会议文件的文件袋分别交给刘少奇和周恩来。

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飞机旁迎接。他首先陪刘少奇来到兴园路别墅招待所。贺龙和叶剑英两位元帅也住在这里。

走进院子，刘少奇看见贺龙就问：“这次开什么会？”

贺龙惊讶的反问：“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陆续赶到上海。刘少奇、周恩来等是从北京来的。邓小平是从昆明赶来的，林彪是从苏州坐汽车过来的。8日上午，“紧急会议”在毛泽东住处继续进行着。毛泽东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

他对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

会议中间，周恩来、邓小平从开会处出来，找到在外面待命的陈丕显说：“阿丕呀，中央马上要在上海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罗瑞卿的问题。你看能不能找一个地方给罗瑞卿住。他不能和大家住在一起。要分开。这个地方的安全、警卫工作由上海市委负责。房间里不要装电话，房门不要上锁，其他需要注意的问题，你们再仔细考虑一下。总之，要保证罗瑞卿的安全，不要出问题。此事要保密。”

听着周恩来、邓小平交待任务，陈丕显头皮一阵阵的发麻：“这是监护性居住啊，罗瑞卿出什么问题了？”他不能多问，更不敢怠慢，立即找了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公安局局长梁国斌和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局长王鉴，具体落实了几处地方，周恩来看了都说不合适。最后他们找到了建国西路168号，以前的波兰领事馆，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后，波兰领事馆撤消了，这个小楼就一直空着。这是一个独立的庄园式建筑，与锦江饭店和丁香花园都很远。小楼坐落在院子中

央，与周围的围墙有一定的距离。周恩来看了后，认为可以。最后确定，罗瑞卿来了就被安排住在这里。

空军司令吴法宪一到上海，刚刚在锦江饭店住下，杨成武和肖华就来通知他，说林彪要找他谈话。紧接着，吴法宪接到叶群的电话，要他立即到她那里去。

吴法宪立即赶往林彪的住地。上楼时，恰巧碰到雷英夫从叶群的房间出来，他们打了个招呼，吴法宪就急忙走进叶群的房间。谁知刚进门，叶群劈头就问：

“吴法宪，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你要好好考虑考虑！”

吴法宪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喃喃地说：“我跟林总，我当然是跟林总啦！”

叶群：“你跟罗长子跟得那么紧，你能跟他划清界限？”

吴法宪急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连忙表白说：“我怎么不能跟罗瑞卿划清界限，我会的，一定会。”

叶群说：“好，那你在会上要做自我批评，而且在会上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听到刘亚楼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也要交待出来。只有这样，才能表示你真正同罗瑞卿划清界限。”

叶群告诉吴法宪：“毛泽东决定召开这次上海会议，主要就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吴法宪十分震动，想不到庐山会议才几年的功夫，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竟然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他不禁问叶群：“罗瑞卿究竟有什么问题？”

叶群说：“我告诉你一点材料，你好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第一、罗长子反对林总突出政治的观点，说什么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政治、军事都重要，搞折衷主义。第二、长期以来不向林彪报告工作，对一些重大的问题不商量、不通气。有的事情林总根本就不知道。例如在北京十三陵搞的那次大比武，林总当时在外地，罗瑞卿就没有报告他。这种作法林总是根本不同意的。第三、逼林总交权让贤。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来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大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说什么‘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就应该让贤，不要挡路’。把林总气得差一点晕过去。第四、罗瑞卿曾经对

刘亚楼讲了四条意见，包括要林总退居‘二线’，或者只搞中央工作，至于军委的工作，放手让罗瑞卿去管等等。还有，林总让我去参加‘四清’，好得到第一手材料来向林总汇报，但是罗长子就是反对，还说‘你何必去搞什么’‘四清’，主要是保护好林总的身体就行了’。”

她还说：“现在知道这些材料的只有杨成武、肖华、雷英夫和你，别人都还不知道。你们几个人要在会议上带头发言，把这些材料捅出去。”

吴法宪赶忙说：“感谢林总、叶主任对我的信任，告诉我这么多的情况和材料。请叶主任放心，我一定会在会上好好发言，向大家揭发罗瑞卿的罪行，决不辜负林总和叶主任对我的期望。”

罗瑞卿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身兼党、政、军13个职务，又曾担任首任公安部部长，如果真像叶群所讲，他有野心，那么，是否有政变的企图？如果有，其政变的准备工作进行到何种程度？都有哪些人牵涉其中？这些情况，尚不得而知。为慎重起见，这次上海会议的内容严格保密，除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开会人员也是分批通知，陆续到达。

吃完中午饭，刘少奇接到叶群打来电话：

“是刘主席吗？我是叶群。林彪身体不好，毛主席让我向刘主席汇报。”

刘少奇表示同意，说：“行，那你下午过来吧。”

当院子里响起叶群的汽车声，王光美出门迎接：“叶群，你好！”

“你好！”叶群和王光美热情的握手，俩人寒暄着走进刘少奇的会客室，王光美让服务员给叶群送上茶水，正要离去，叶群拉住她的手说：“我一个女同志不方便，你也留下吧。”

于是，王光美也坐了下来。

叶群向刘少奇谈了她受林彪委托向毛泽东反映罗瑞卿问题的过程。刘少奇仔细的听着，没有说什么。谈完后，叶群问刘少奇：“我可以用一下你房间的电话吗？”

刘少奇说：“可以。”

叶群要通了林彪住处的电话：“找101。”

一会儿，林彪接听了电话，叶群只说了一句：“谈得很好。”就挂了电话。

这时，已经到了吃晚饭时间，王光美对叶群说：“开饭了，你好不容易来一次，吃完饭再走吧。”

叶群愉快的答应了。

“走，咱们洗手去。”王光美带着叶群来到洗手间，叶群兴奋地对王光美说：“中央就转发过两个女同志的文件，一个是你写的《桃园经验》，一个是我在广州部队的《连队调查》报告。碰巧咱俩还是同学。”叶群和王光美都是北京师范大学附中的第一批女学生。

晚饭后，送走叶群，刘少奇和王光美顺道去看看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的贺龙，恰巧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也在。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常工作的，这件事，你应该事先知道的吧？”

贺龙摇摇头说：“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么紧急，我以为是东南沿海的防务会议，这不，让秘书把作战地图都带来了。”

刘少奇甚感奇怪，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

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我和小平在昆明，还等着罗瑞卿一起去三线看看呢。罗瑞卿还没到，就接到开会的通知，这不，我还给罗瑞卿带了一筐桔子，昨天才送去。”

刘少奇吸着烟，自言自语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

大家又是一声叹气。

12月8日下午，正式会议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参加这次上海会议的除政治局常委外，还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各大区书记、公安部部长、总参、军委、各军兵种负责人，一共73人，还有一种说法是61人。其中政治局常委6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陈云未到会；政治局委员7人：董必武、陈毅、李富春、贺龙、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彭真在京留守未到会，刘伯承请假；政治局候补委员5人：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6人：谢富治、徐子荣、吴冷西、汪东兴、李质忠、刘宁一；各中央局负责人6人：陶铸、刘澜涛、宋任穷、王任重、陈丕显、李雪

峰；军委、总部、军种和大军区负责人 28 人：徐向前、叶剑英、肖华、杨得志、张爱萍、吴法宪、李作鹏、苏振华、王新亭、张国华、秦基伟、刘志坚、邱会作、韩先楚、黄永胜、李天佑、杨勇、梁必业、张达志、黄新廷、杨成武、陈锡联、肖劲光、许世友、廖汉生、陈再道、张宗逊、郭鹏，聂荣臻请假，肖向荣未到会；另外还有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林办主任叶群 3 人。

开会前，接替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休息室转来转去，没有看见他前任的高大身躯，有些奇怪，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来？”没有人回答他。

他又朝另一群闲聊的人群走过去问：“罗总长怎么没来？是不是忘记通知他了？”

“主席不会忘事的。”叶剑英听见谢富治到处询问罗瑞卿，就回了他一句。

毛泽东没有出席正式会议，会议由林彪主持，先向与会者分发了会议材料，包括雷英夫的揭发材料；李作鹏等人写的关于海军两种思想斗争情况的材料，对“八六海战”和“一一一四海战”以后罗瑞卿、肖劲光的表现进行了揭发；还有其他人的一些揭发材料。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和那 11 份材料均作为会议文件印发。

接着，邓小平宣布了会议纪律，他说：“事先不知道开什么会，这样吧，分几个组，先分头开小组会。材料已经分给大家了，分组讨论。宣布一下这次开会的纪律：会议内容不能外传，不要纪录，文件由中央机要处处长直接交给大家，材料要自己拿着，不准交给秘书，当天看完当天交。会议期间不准对外打电话……”

会议印发了十一份材料：

1. 1965 年 11 月 30 日林彪给毛泽东的信；
2. 1965 年 4 月 15 日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
3. 1965 年 5 月 20 日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
4. 1965 年 6 月 张秀川《罗总长对突出政治的错误看法》；
5. 1965 年 10 月 15 日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6. 1965 年 10 月 25 日雷英夫给林彪的信；
7. 1965 年 10 月 25 日雷英夫《我对罗总长的几点具体意见》；

8. 1965 年 11 月 27 日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的信；
9. 张秀川《罗总长对主席思想的错误观点》；
10. 雷英夫《罗总长对待主席指示的几个问题》；
11. 1965 年 12 月 6 日雷英夫电话报告纪要。

会议分为 3 个小组，据杨成武回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担任 3 个小组的小组长。还有一种说法是：第一组召集人是邓小平、陈毅，第二组召集人是谢富治、李井泉，第三组召集人是周恩来、贺龙。

杨成武回忆：周恩来这个小组有董必武、朱德、贺龙、陆定一、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杨成武、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叶群等人。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分三次讲了约 10 个小时，说得有声有色：

“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 101，当面谈。”

翟月英是原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夫人。

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也揭发了罗瑞卿的不少材料。

事情太突然了，大家都十分惊愕，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当晚就由主持第二小组会议的周恩来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其他两个小组就不像叶群所在的这个小组，冷场了。

刘少奇这个组看完材料后，长时间没有人发言。最后还是陈毅打破沉闷，指着分在这个组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爱萍，你在总参工作，总长出了问题，你这个副总长应该清楚嘛！你就先给大家说说吧！”

张爱萍和叶群一样，也是刚从苏北“四清”农村赶回来的。11月23日，林彪还在苏州听取了张爱萍关于苏北方巷大队“四清运动”的汇报，充分肯定了张爱萍的“四清”经验。张爱萍从9月到方巷，已有近4个月没有回家了，不知道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好说：

“我不清楚这些情况，给我的感觉，林总对罗长子是很信任、很放手的，罗也总是说哪件哪件事都是经过林总同意的。谁晓得会出这种事，我是第一次听到。”

邓小平这个组开始也没有人发言，于是，他指着编在这个组的吴法宪说：“听说吴法宪了解一些情况，你先讲吧！”

吴法宪无奈，只好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一万多字的揭发材料，小声的念起来。

邓小平耳朵背，让吴法宪过去和他坐在一起。

吴法宪说完后，邓小平问：“没有啦，就是这些？”

吴法宪说：“我就是知道这些，别的确实不知道。”

于是，会议就冷场了。后来在邓小平的一再启发下，大家这个讲几句，那个讲几句，但都讲不出什么名堂来。时间刚到11点，邓小平就宣布散会了。

当天，周恩来找吴法宪谈话。吴法宪刚到周恩来住房的门口，正好碰到雷英夫从里面出来。吴法宪一进去，周恩来就问他：“罗瑞卿是怎么反对林彪的？”

吴法宪很惊讶，反问他：“你也不知道吗？”

周恩来也不了解情况。于是，吴法宪就把叶群告诉他的事情又说了一遍。说完后，他还补充说：“听说海军有一些材料。”

这天晚上，周恩来还向吴法宪交代任务，要他派一架飞机，配备最好最可靠的机组，到昆明把罗瑞卿接到上海来。周恩来特别交待，要吴法宪亲自掌握好这架飞机，作好应变措施，飞机只准往东飞，不准往西飞。

周恩来一再强调，罗瑞卿到上海的事情，要严格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听完周恩来的指示，吴法宪当即报告说，准备派空军运输13师的副师长时念堂去驾驶这架飞机。

周恩来表示同意。

吴法宪又告诉他，罗瑞卿曾经从昆明打电话到北京找他讲话。

周恩来马上问：“接电话了吗？”

吴法宪说：“没有接，我已经离开了北京，是留在家里的秘书打电话告诉我的。”

周恩来听了后说：“不要紧，就说你不在家。”

吴法宪刚要离开周恩来的房间，秘书进来告诉他，说是彭真从北京来电话找他。

吴法宪准备去接电话，周恩来阻止说：“不要接，就说找不到你。他可能是来了解会议情况的。”

吴法宪有些不解，心想：“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为什么不告诉他会议的情况？难道彭真也有了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只好带着这个疑问离开周恩来的房间。

第18回：闻危言，众头领惊诧申城 不及防，罗总长应声落马

12月8日，空军专机师的时念堂接到吴法宪下达的飞行任务：

一、明天上午从上海飞到昆明，后天上午11时30分准时回到上海虹桥机场落地，不准提前，也不准延迟。

二、罗到昆明机场后，要立即起飞，不准在昆明机场停留。

三、直飞上海，中途不准转弯，更不准降落，需要调整时间，也不准盘旋。

四、绝对保密，不准对任何人谈起此事。

五、要绝对保证安全。

吴法宪还特别交待说：“这次专机飞行，配发给你们几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你们要监视他们的行动。”

就这样，专机组配发了4支手枪，分别发给时念堂和另外3个机组成员。

为了让参加上海会议的与会者更好的了解情况，会议决定让叶群到各组发言。就这样，叶群先后作了3次长达10多个小时的发言，嗓子都有些沙哑了。但是她还是充分把握这次在中央高层的露脸机会，充满激情的说：

“同志们，因为我刚从‘四清’点上赶来，没有做好准备，只讲一点我所了解的情况。”

“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有想到他和林彪的关系搞得这样紧张。以后，我发现了一些问题，又不敢轻率上报……”

“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他。他当了国防部长又会要求更高的地位，这是无底洞……

1964年以后，罗瑞卿就逼林彪同志退位。国庆节后，他到我们家见林彪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听完就让他走了。他在走廊里就大

嚷大叫：

‘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不能干扰，让贤！让贤！’

出门后又大声喊：‘不要挡路！’

林彪同志气的昏迷过去。我家里的人从走廊上路过，听到了罗瑞卿讲的这些话。

.....

前空军司令刘亚楼生病期间，曾让我转告林彪同志‘四点意见’，他对我说：

‘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总长交代的。四点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总的身体。三、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亚楼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彪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谈的问题。’

刘亚楼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彪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总长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

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

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亚楼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

回家后林彪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这时林彪同志才说：‘罗长子是个野心家！’

.....”

12月9日上午，刘少奇又找吴法宪谈话。吴法宪又把叶群告诉他的话说了一遍。到了中午，刘少奇请吴法宪一起吃饭，吴法宪在吃饭时把在太仓搞“四清”的一些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刘少奇听了很高兴，当即作了一些指示。回来后，吴法宪马上将刘少奇关于军队“四清”工作的指示进行了整理，并报告了总政治部。总政治部将这个材料下发全军。

叶群听说周恩来、刘少奇都找吴法宪谈话，也特地跑到锦江饭店

八楼吴法宪住处了解情况。

12月8日,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常委各同志都去上海开会去了!”开什么会?他不知道。作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没有通知他到会。以他当时的处境,当然也不会通知他到会。

12月10日,杨尚昆整装登上南下广东的火车。怀着半是凄凉、半是感慨的心情,杨尚昆在日记中写道:“16年的北京生活。今天开始变了,一切只能等时间!”

杨尚昆的突然调动,在中共中央的上层又平添了一份神秘紧张的气氛。

12月9日,罗瑞卿和他的妻子郝治平按照原来的计划飞往云南看地形。对正在上海召开的会议,他还浑然不知。

12月10日,中央常委根据小组会的情况,认为很多事情需要向罗瑞卿核实,于是决定:通知他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说:“罗长子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

邓小平觉得:“这样会不会使罗瑞卿感到太突然?”

周恩来提议:“还是让陈丕显和他爱人谢志成去机场接吧,他们是东道主嘛。”

毛泽东说:“好,那就这样吧。”

邓小平找到陈丕显,对他说:“通知罗瑞卿明天来上海开会,你和谢志成到机场去接。”

陈丕显忙问:“罗瑞卿要问我开什么会,怎么回答呀?”

邓小平想了想说:“你先不要告诉他开什么会,就说总理和我在住地等着他,到那里会和他谈。”

罗瑞卿正在昆明接见昆明军区的干部。这时,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接到上海打来的电话后,来到军区大礼堂的主席台上,对正在讲话的罗瑞卿说:“中央通知你马上去上海开会。”

罗瑞卿扭头问了一句:“开什么会?”

阎红彦说:“我也不清楚。”

散会后,罗瑞卿给在北京留守的彭真打电话,问是什么会?彭真

说：“我也不清楚。这样吧，我问一下总理。”

过了一会儿，彭真给罗瑞卿打回电话说：“你去吧，去了就知道了。”

罗瑞卿想了想，如此紧急和保密，可能是军事方面的会议。他让秘书准备飞机。

第二天上午8时，罗瑞卿来到昆明机场，轻松自如，谈笑风生。过会儿，他被告知，飞机定在上午10时起飞。罗瑞卿很奇怪，飞机起飞时间应该由乘机领导定，这次是怎么回事？对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的他，这次也不例外，让秘书问一下为什么？机场回答：“上海虹桥机场有英国人的飞机要降落，碰上了不好办。所以定了这个时间。”罗瑞卿没有多想，坐上飞机后，看到飞机上多了几个空军的人，罗瑞卿也没有多问，又按他的老习惯批改文件。

飞机准时到达上海上空。郝治平碰碰罗瑞卿说：“不要看了，上海到了。”

罗瑞卿朝机舱外瞅了一眼，放下笔，伸了个懒腰说：“好快，这就到了嘛。”

他离开小桌，让秘书将文件收了起来。

这是上海初冬很阴冷的一天，天空一层灰暗的云霭。飞机停稳后，罗瑞卿走出舱门，朝机场四周扫了一眼，发现今天的机场异常平静。由于他身兼13职，每次到上海，总有一大群人到机场迎接，今天却只有陈丕显和吴法宪两个人孤零零的站在飞机前。

罗瑞卿见到陈丕显的第一句话就是开玩笑的说：“有劳大驾。”

陈丕显却表情平淡，没有说话，也没有精神。

罗瑞卿又开玩笑地说：“大战通宵，没有精神了？”意思是说陈丕显又打了一夜的麻将。

陈丕显回答说：“上车慢慢说。总理、小平同志在等你。”

同机来的还有陶铸的夫人曾志。一下飞机，郝治平就忙着给曾志安排汽车，吴法宪在一旁说：“不用你管，不用你管，有人来接她。”

这让郝治平有些奇怪。吴法宪一贯谦恭，每次到机场迎接罗瑞卿，连开车门，脱穿大衣这些警卫员做的事他都要亲自做，而且次次如此。他甚至对郝治平说：“苏联人把斯大林称作他们的父亲，我们这些

人还没有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只能将林总和罗总长称作父亲。”今天，他怎么像是换了一个人？

大概是由于同机有一位空军师长一路“陪伴”，加上陈丕显、吴法宪一改平日作风，罗瑞卿觉察到有些不对劲，所以一上车便问陈丕显：

“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

陈丕显指了指前面的司机和警卫，意思是车上不方便讲话。但是又不能干坐着，一路上只好东拉西扯地谈谈天气啦、庄稼啦，工业生产等等不着边际的话。

罗瑞卿每次来上海都住在锦江饭店，快到目的地时，陈丕显对他说：“这次不住锦江饭店了，那里住满了，另外为你们找了一个地方。”

郝治平心里疑惑起来，觉得不对劲。她看看罗瑞卿，罗瑞卿没有说话。汽车很快开进建国西路 168 号。

罗瑞卿钻出车门时，看见二层小楼前有人站岗。陈丕显很尴尬地对他说：“你们就住在这个楼里。总理和小平同志在里面等你。”

这句话让郝治平的脸呼的热了起来：“不是来参加会议吗，怎么要先个别谈话？”

按照经验，个别谈话一般不会是好事，尤其是有两个领导参加的个别谈话。好事一个人传达就行了。坏事或难事就要有两人以上参加了，以免谈不下去或有人作证。

陈丕显把满腹狐疑的罗瑞卿送进会客室，便转身到里屋，对等在那里的周恩来和邓小平说：“总理、小平同志，罗总长到了。”

“那好，我们过去。”周恩来说。

“那我先出去了。”陈丕显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点了点头，然后和邓小平一起来到了会客室。

与此同时，郝治平也被人叫到楼上。她看到楼梯口和会客室门口都站着一些工作人员人员，虽然穿着便衣，但是，凭着她和丈夫在公安部工作 10 年的经验，她知道，这些都是保卫人员。上海市公安局主管内保的副局长王鉴也在场。她清楚自己和丈夫已被看管起来了。此时，院子里面的警卫人员都是周恩来、邓小平从北京带来的，小楼外面才是上海当地的警卫人员。这些工作人员有明确交代，罗瑞卿不能随便走出院子，出去、动用汽车这样的事情都要请示周恩来批准才行。

郝治平想听楼下会客室的动静，听不见。她想下楼，被工作人员拦住了。她知道祸事临头了。

罗瑞卿的秘书邓丁按照罗瑞卿一贯的作风，准备给罗瑞卿安装保密电话和挂作战地图。警卫人员请示陈丕显，陈丕显立刻把这一情况告知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周家鼎直接给邓丁打来电话：

“是邓秘书吗？到上海啦？……好，到了好，先休息，罗总长的电话先不要装了，地图也不用挂了，让罗总长好好休息吧。”

邓丁秘书一下子愣在那里，半天没有说话，电话拿着好久才放下。

过了一会儿，他才走过来对郝治平说：“主任，他们说不让安电话。”

因为罗瑞卿的习惯，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

心乱如麻的郝治平对秘书摆摆手说：“不让安就不安吧。”

郝治平在楼上等啊、等啊，一直等到天黑，大约19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她知道，这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已经走了。她急忙往楼下跑，在楼梯口，看见罗瑞卿正要上楼。只见他脸色灰暗，浑身疲惫，站在楼梯前迈不开步子。王鉴上来搀扶他，被他轻轻推开。他想自己上楼，可是一点力气也没有。郝治平三步两步跑下来，扶着他上了二楼房间。

两个人面对面地坐着，罗瑞卿轻轻的喘息着，一句话也没有。过了好一会儿，郝治平问罗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罗瑞卿看了看桌上的茶杯，想拿又没拿，缓缓的说：

“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罗瑞卿声音大起来，满腔冤屈地说道：“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说着说着，罗瑞卿眼泪夺眶而出。他神色有些激动：

“我没有反对林副主席，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杀了我的头也不能承认这些。我要见林彪！”说完，他叫来秘书说：

“你跟他们讲，我要和总理讲话。”罗瑞卿觉得，周恩来能够替他说说话。在会客室时，周恩来讲了这次上海会议的内容，随后转述了叶

群代表林彪在会上对罗瑞卿的指责，也传达了毛泽东说的话：罗瑞卿“反对林，还没有反对我。”

邓小平也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一、情节是严重的；二、同彭、黄有区别；三、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的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准许革命。”

看着罗瑞卿痛苦的样子，郝治平心里难过极了。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她也不禁痛哭了一场。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稍微感到轻松一些。

周恩来的电话通了，罗瑞卿来到楼下警卫室，拿起电话，急迫地说：“总理，我要求去见毛主席，去见林副主席，我相信，我能把一切解释清楚。”

“这样不太方便吧……”周恩来字斟句酌的劝说道。

“如果不能见面，我现在就给林彪打电话……”罗瑞卿坚持自己的想法。

周恩来有些激动，他大声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很少有人看见周恩来这样讲话，罗瑞卿反而平静了下来。

周恩来接着说：“你不要激动，不要到主席那里去，也不要到林彪那里去。你要到什么地方去，要告诉我们一声。”

“好吧。”罗瑞卿答应道。

周恩来又说：“这次开会，为了避免历来开会的副作用，采取背靠背的办法，你可以不参加会。”

放下电话，罗瑞卿默默地回到楼上。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事先已经对罗瑞卿的住处采取了一系列保卫措施：门锁被拆下了，在楼下铺垫了一些草垫子。在周恩来、邓小平与罗瑞卿谈话的时候，还不时让服务员和保卫人员送些茶水、毛巾以观察动静，预备好万一发生紧急情况时，立即采取措施。

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还在继续，周恩来和邓小平特意安排一些与罗瑞卿熟悉的人，如陶铸、李井泉等大局第一书记去看望罗瑞卿夫妇。

陶铸也是和罗瑞卿性格相近的中共上层领导人之一，解放战争时

期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一直非常支持林彪在东北的方针、政策，和林彪关系很好。上海会议的内容让他很惊讶，他去看望林彪时，特地问林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林彪对陶铸说：“1960年，罗瑞卿对我的合作是好的。但是从1961年起，就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

陶铸见到罗瑞卿时，向他转达了林彪这一段话。罗瑞卿十分委屈的说：“我什么时候反对过他，封锁过他呀？每次他批评我，我都注意改正了……”

李井泉来看罗瑞卿。罗瑞卿不解地问：“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办法？我到底犯了什么错误？”

李井泉情急之下冲口而出：“太突出，你太突出了呀！”

是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也许，这些古谚会让罗瑞卿的痛苦平缓一些。

第19回： 难落实，不承认“死无对证” 满腹冤，与卓琳泪眼相形

上海会议的第四天，大家继续揭发罗瑞卿，发言的人比较多起来。

这天，12月12日，中央军委在上海开会，由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和林彪都参加了。军委会上，免去了罗瑞卿在军内的职务，军委秘书长由叶剑英兼任，总参谋长由杨成武代理。

这天，叶群突然来到贺龙住处。薛明赶紧上前招呼。

客气了几句，叶群说：“林总已跟叶帅打了招呼，说这次会议与叶帅无关，所以，林总也要我跟贺帅打招呼。”

大家闲谈几句，叶群就告退了。叶群走后，薛明问贺龙：“叶群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来干什么？”

“谁知道。”贺龙也不清楚。

隔了一天，薛明前往林彪处回访。叶群也十分热情，拉着薛明的手，亲热得不得了。

其实，薛明与叶群二人矛盾很大，由来已久。

叶群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积极参加学校共产党组织的学生活动，特别是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积极，于1935年底，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组织吸收，成为共青团员。

1936年夏天，叶群考入天津师范学院继续高中学业。她的组织关系也转入天津。在此期间，叶群考取了国民党的广播电台，担任广播员。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平津抗日学生南撤流亡。叶群也于1938年从天津出发南下，先到了南京，在南京参加了国民党青训班学习。在青训班期间，她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演讲，而且获奖；还为国民党CC派办的壁报

写过稿，是个活跃分子。

很快，叶群又来到武汉，在那里通过党组织的安排，终于在1938年到达延安。

薛明就是在随平津学生南撤南京时认识的叶群。薛明也是1936年3月入党的党员，在天津担任地下党交通员，负责天津学联、民先、妇救会的联络工作。1938年，她随平津南下流亡学生到南京，当年夏天就到达了延安。

1942年延安整风时，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方针，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写自传，包括党的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在内。作为曾经与叶群一起南下流亡的同志，薛明认为叶群对自己在南下流亡期间的这段历史语焉不详，于是找叶群谈南京的事。叶群承认自己在南京参加过讲演，内容是三民主义，并说过“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惟一的领袖”的话。但当薛明要她去向组织上作交待时，叶群马上否认，死活不去。薛明硬把她拉到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王鹤寿那里。后来，薛明还将叶群在江西期间的表现，如：表达自己对蒋经国的崇拜之情，和当地县长李林的关系很近等事情，也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书面报告。

贺龙知道薛明的这份书面报告后，不以为然，批评薛明说：“你搞的什么名堂，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时过境迁，此时，当叶群满面笑容地拉着薛明的手时，薛明脸上笑，心里却对叶群十分警觉。

叶群对薛明说：“今年8月1日《人民日报》上登的贺总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是林总决定以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林总对贺总印象很好，说贺总干了许多工作。”

薛明说：“感谢林总对贺总工作的支持。”

叶群把话题一转说：“贺总这人哪儿都好，就是爱骂人，所以我不敢去你家，怕贺总骂我。”

薛明说：“这怎么可能呢？贺总怎么能骂你呢？”

叶群想起什么似地说：“过去你说了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你不说，我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见叶群这么一说，心里很恼火，此时的她已不是延安时期的年轻学员了，只是微微一笑，没有答茬。

又过了一天，叶群再次来到薛明住处，对薛明说：“你知道吗？林月琴的弟弟是军统特务。听说你们来往很密切，还把党内文件给他们看。”

林月琴是罗荣桓的夫人，也是老红军。贺龙与罗荣桓同住在一个院内，彼此关系密切。薛明听了叶群的话后吃了一惊，随即解释说：“那是肖华让送给林月琴看的。”

叶群说：“我是关心你们才告诉你们这件事。”

薛明少不得说几句感谢话。叶群走后，薛明把叶群来的事告诉了贺龙。贺龙听了沉吟说：“不要小瞧这个女人，怕是来者不善啊！”

上海会议的第五天，大家讲得差不多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于是小组会宣布休息。同时，也宣布了纪律：不准上街，不准会见朋友。

第六天下午，在锦江饭店顶楼餐厅开大会，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到会，只有毛泽东和林彪没有露面。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邓小平做总结发言。他说：

一、这次会议初步揭发了罗瑞卿的一些问题，会议暂时告一段落；

二、罗瑞卿的主要问题是军事路线、组织纪律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错误；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没有坚决执行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犯了折衷主义的错误；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关于罗瑞卿篡改林彪对1964年大比武冲击政治的批评，邓小平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恢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原稿。”

三、会议上揭发批判罗瑞卿的一些问题，将转达到本人，给他一点时间来认识错误；

四、对罗瑞卿的问题，不能扩散，只限到会人员知道；

五、会后怎么办，回京以后由中央研究解决。

邓小平一共讲了半个小时。他讲完话，其他人全都没有再讲什么话，宣布散会。

这天，12月14日，毛泽东约中央办公厅新任命的副主任、中央机要局局长李质忠谈话说：“机要保密、警卫工作很重要，要保住党的机

密，不要被修正主义利用，并防止内部出修正主义，打起仗来要警惕牛鬼蛇神会出来破坏，要把这个意思告诉中央机要局、机要室，还要告诉军队的机要局、广播事业局的负责同志，都要注意”。

上海会议上，大量的发言是这种会议必不可少的表态。也揭发了罗瑞卿的很多问题，主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有个人野心和向党伸手；还有就是“不尊重老师”等。也有人揭发了罗瑞卿工作作风中的问题，主要是说他揽事太多，锋芒太露，得罪了一些人。对于叶群提出的刘亚楼的四条和逼林彪让贤这两个问题，前者是死无对证，后者是无可对证，因为罗瑞卿不承认，又无第三者在场。

邓小平说：“请军队与地方的负责同志来，不是来人作一个决议，而是审查够不够？对不对？有出入的都可以提。谈到罗瑞卿伸手要权问题，林彪同志说有，罗瑞卿说没有，刘亚楼已死，死无对证嘛。”

会上，也有些人没有表态。还有些人，虽然表了态，但心里依然充满疑虑，只是在会上不好讲出来。

贺龙会下对薛明说：“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好像罗瑞卿马上篡党篡军了，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

即使有些人想为罗瑞卿辩护也无从开口，如：邓小平，仅“死无对证”四个字，显得十分苍白。就是罗瑞卿自己，也是有口难辩。

对雷英夫提供的材料，刘少奇说：“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因为身体不好，会没有开完，刘少奇就先回北京了。

朱德从上海开会回去后也是忧心忡忡，当他妻子康克清问他：“是不是因为上海会议”时，他叹了一口气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他在屋里低头踱步，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

15日，周恩来嘱咐陈丕显和谢志成夫妇以东道主名义请罗瑞卿夫妇吃饭。

但是，罗瑞卿夫妇哪有心情吃啊。席间，他们很少说话，陈丕显夫

妇也不知该说些什么，这顿饭就是在这种压抑和沉闷氛围中度过的。

吃完饭，陈丕显夫妇立即赶到锦江小礼堂。上海市委正安排周恩来等人在这里跳舞。周恩来一见陈丕显夫妇进来，立刻对正在陪他跳舞的舞伴说：“对不起。”然后来到陈丕显夫妇跟前，对谢志成说：“我们跳一曲吧？”

谢志成由于多年患梅尼尔氏症，不能转圈，赶紧对周恩来说：“总理，我可不行，不能转圈……”

周恩来说：“小超大姐不能跳舞，你也不能跳舞，你向小超大姐学习啊？”

谢志成不好意思，只好陪周恩来跳了起来。周恩来一边和谢志成慢慢的踱着舞步，一边认真地询问谢志成：“罗瑞卿他们吃饭时都说了什么吗？”

“说话不太好，罗瑞卿看上去很沉重、很沉默. ……”谢志成将吃饭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

16日，会议结束。邓小平只说了一句：“罗瑞卿的问题还要继续调查研究，搞清楚。散会。”

这次会议，确定了处理罗瑞卿问题的五条意见：

“一、性质严重，手段恶劣。二、与彭、黄有别。三、从长期看，工作有一定的成绩。四、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只要认真地改，仍然允许革命。”“处理两步走，调动职务，不搞面对面，冷处理。”

会后成立了罗瑞卿专案组，组长由周恩来担任。

散会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又来到罗瑞卿的住处。他们受毛泽东委托，同罗瑞卿进行第二次谈话，向他传达了会议的精神：

“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罗瑞卿问：“别的还有什么呀？”

“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呀。这次会上，大家还从人际关系、作风、

工作、政治、组织等五个方面对你提了很多意见，你应该好好检查。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他还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邓小平叫他的夫人卓琳坐同一辆车也来了。周恩来、邓小平和罗瑞卿在楼下谈话时，邓小平让卓琳上楼找郝治平。

郝治平一见卓琳，拉着她的手就问：“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摆着手对她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正如卓琳所说，这次会议的规定非常严格，与会的大部分领导和工作人员都住锦江南楼，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会议严格保密，以防走漏风声。首长去开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谁也没估计到会开得这么长，也没想到这次会议会有这样严格的规定，连街都不能上。他们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脚上的袜子只有一双。当时是冬天，上海不断地下小雨，较厚的尼龙袜，当晚睡前洗了，第二天又不会干。没有办法，上海接待处经请示会议批准，临时在锦江北楼设一小卖部，以便买一些换洗的衣、袜。工作人员也可以借去小卖部的机会，到院子里透口气。

郝治平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

她还特别对郝治平讲：“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看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郝治平满怀冤屈的对她说：“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她拿出随身带的大本《毛主席语录》，翻到关于要做老实人那一段话，让卓琳看：“毛主席说：陈独秀、张国焘等等不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没有好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老实人。”

她说：“我说我这几天就靠这一段过日子，要是没有这句话，我这

日子过不了。”

卓琳劝她：“不要想那么多，还是照顾好罗总长的生活吧。”

说着说着，两人都掉下了眼泪。

海军是司令员肖劲光、政委苏振华和副司令员李作鹏3人参加上海会议。邓小平在小组会上，对李作鹏等人揭发罗瑞卿问题的材料，曾插了一句话：“海军那个材料没有什么重要问题。”

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肖劲光接到林彪秘书打来的电话，说林彪请他去谈一谈。

对上海会议的内容，肖劲光事先一无所知，但对罗瑞卿有错误的议论，他却有耳闻。尽管如此，此次会议对罗瑞卿问题的性质定得如此严重，肖劲光一点也没有思想准备。在上海会议上，也揭发了肖劲光的一些问题，他很想与林彪谈一谈自己的思想，一方面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错误，同时对李作鹏等人揭发的问题当面向林彪作一解释。

待肖劲光如约到达林彪住处的时候，接待他的却是叶群。她说林彪近些天来身体很不好，正在睡觉，委托她来谈一谈。

对林彪避而不见，肖劲光心有不快。而且，他感到有些问题也不便与叶群谈。所以，当谈到李作鹏等揭发的肖劲光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时，叶群说肖劲光这些年来在突出政治问题上反对林彪，希望肖劲光起来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肖劲光只是泛泛地说：“自己在工作上是有错误的。”同时，对李作鹏等揭发信中的一些情况做了些说明，请叶群转达林彪。

临走时，叶群对肖劲光说：“你身体不好，工作上的事情就不要多管了，让李作鹏他们干去。”“你放心，李作鹏不会夺你的权。”

在这次会议上，除了涉及海军内部的问题以外，空军也卷入其中，因为当时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提到已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这在会议上影响极大。刘亚楼去世时，评价极高。他与林彪的关系也是非同一般的好，人死了才半年，居然爆出这么大的事情，如果他也牵涉其中，那还有谁不会有问題呢？

接替罗瑞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在会议期间，代表中央打招呼说：“除了罗瑞卿问题，各单位自己的问题不要在会上扯。”会议结束时，又决定牵涉海军、空军以及高级将领的问题一律不向下传达。

第 20 回：谈道德，北京城回避政治 点要害，西湖畔纵论天地

在“上海会议”紧张进行的同时，北京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也没有稍歇。根据彭真指示，1965 年 12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论》。

这篇文章是经过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定稿的，中心思想就是，不要把对吴晗的批判，硬拉扯到政治问题上去。

紧接着，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等长篇文章也相继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刊登，由此引起了对“道德继承”、“清官”、“让步政策”、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历史研究等学术问题公开、热烈的大讨论。

12 月 14 日，彭真在国际饭店开北京市委工作会议时，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彭真还通过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线》，连出了几期增刊，刊登了一些学术权威反驳姚文元的文章和北京京剧团提供的材料，证实吴晗写《海瑞罢官》不是自己主动的，是被北京剧团硬拉上马，不得已才写的；《海瑞罢官》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给毛泽东看的。彭真直言不讳说：刊登这些材料的目的“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12 月 16 日，毛泽东结束了上海会议，又回到杭州，住在西湖西南岸边的刘庄。

刘庄位于杭州西湖西南湖畔，丁家山南麓，坐落在西湖西面的杨公堤上，现辟为“西湖国宾馆”，包括“水竹居”、“康庄”、“蕉石鸣琴”和丁家山等。

这里又名水竹居，是刘庄最初的雅号。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县富豪刘学询所建的别墅，故称“刘庄”。

刘学询是光绪年间的二品花翎举人。他在离京归途中游览了杭州西湖，感叹“故乡无此好湖山”，于是就于 1905 年在此购地构筑“水

竹居”,还特地从广东祖居搬来刻有篆隶文字、钟鼎图案的楠木门窗,红木家具等,装饰西湖寓所。

“水竹居”背山濒水,环境幽静,与苏堤隔湖相望。内有梦香阁、望山楼、湖山春晓等楼台水榭。曲桥亭廊、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园内设置浑然天成,独具东方园林特色。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庭院里到处飘扬着浓郁的花香。四季美景,生趣盎然,历来就有“西湖第一名园”之誉称。

1953年,“水竹居”的最后一位主人、刘学询的八姨太范媛英将刘庄献给国家,刘庄遂被定为浙江省第一招待所。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率领宪法起草小组的成员胡乔木、田家英等抵达杭州,第一次住进刘庄1号楼。毛泽东在此期间,调集了国内的各种专家,在刘庄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草案。1954年3月14日,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初稿在这里诞生。





西湖刘庄





刘庄一号楼

一个月前，1965年11月19日上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到杭州，提出要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5位秀才到杭州讨论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当时，毛泽东住在西湖的汪庄。

汪庄位于西湖南屏山雷峰塔之北，夕照山东北麓，南山路37号，原名青白山庄，又称今蟋还琴。广约20亩，背山面湖，风光秀丽，景色宜人，始建于1927年，原系安徽籍茶商汪裕泰茶庄老板王赐予的别墅，属私家园林。与刘庄、蒋庄齐名，列为西湖三庄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汪庄主人只剩下妇孺，当家的姨太太艰难撑着家业，终因家道中落，于第二年将这座已经破败的庄园捐了出来。1958年，国家在此投资建设了5801工程，开始接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



西湖汪庄





汪庄 1 号别墅

21 日,几位“秀才”乘专机赶到杭州后,不巧,毛泽东感冒了,就让大家先分头看看那 6 本书。第二天,毛泽东去上海参加外事活动,26

日回到杭州，没有几天，发生了叶群揭发罗瑞卿的事情，毛泽东又通知陈伯达，再次前往上海，出席上海会议。

陈伯达开始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到了上海，会议紧张的气氛，使陈伯达想到 1959 年批判彭德怀的庐山会议。

在杭州的田家英、胡绳、艾思奇等人，并没有感到政治空气的骤然变幻，在等待毛泽东的一个月里，优哉游哉。田家英带秘书逄先知，重游了 1961 年搞调查去过的嘉兴等地，艾思奇与关锋结伴游览了杭州，胡绳则到上海探亲。

终于，12 月 21 日上午，毛泽东又召集 5 位“秀才”开会了。关于为 6 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毛泽东还是要按照原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这天，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关锋 5 人，走进客厅，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你们都来了，坐吧。”

老人家的兴致很高，他点了一支烟，坐了下来：

“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于是，他和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

话题还是从选书和写序开始，逐渐谈到中国古代的几次战争，谈到中美关系，谈哲学，谈当时的思想界，也谈到了《海瑞罢官》。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当面聆听毛泽东的教诲，大家都很珍惜，几乎没有插话，只听毛泽东一人侃侃而谈：

“我在火车上，从服务员手里，才看到《毛主席语录》。那是军队编的。

“听说，中宣部要编，老夫子也要编。要编那么多的《语录》？”

“这一期《哲学研究》（指一九六五年第六期工农兵哲学论文特辑），我看了 3 篇文章。你们搞哲学的，要写实际的哲学，才有人看。书本式的哲学，难懂，写给谁看？

希望搞哲学的人到工厂、农村去跑几年，哲学体系改造一下，不要照过去那样写，不要写那样多。

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参加了四清以后，写了

一些文章，讲历史工作者必须下乡去，登在南京大学学报上。他做了一个自白，说：我读了几年书，脑子里连一点劳动的影子都没有了。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道：本质就是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话，我也没说过。现象是看得见的，刺激人们的感官；本质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隐藏在现象的背后，只有经过调查研究，才能发现本质。本质如果能摸得着，看得见，就不需要科学了。

要逐渐地接触实际，在农村搞上几年，学点农业科学、植物学、土壤学、肥料学、细菌学、森林学、水利学，等等。不一定翻大本子，翻小本子，有点常识也好。

现在这个大学教育，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怎样做买卖，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姊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子，一直到7岁，接触社会很多。两岁学说话，3岁哇喇哇喇跟人吵嘴，再大一点，就拿小锄头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

大学的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

“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现在有个孙达人，写文章针对翦伯赞所谓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只有反攻倒算，哪有什么让步？地主阶级对太平天国就是没有什么让步，义和团先‘反清灭洋’，后来变为‘扶清灭洋’，得到了慈禧的支持。清朝被帝国主义打败了，慈禧和皇帝逃跑了，慈禧就搞起‘扶洋灭团’。《清宫秘史》有人说这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为什么有人说他是爱国主义？无非以为光绪皇帝是个可怜的人，和康有为一起开学校，立新军，搞了一些开明措施。”

在这里，毛泽东又一次不点名的批评了刘少奇。因为，1950年2月，影片《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后，很多报刊上作了宣传。毛泽东曾在一些场合多次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资本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当时担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几次提出要批判《清宫秘史》。但是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却进行了抵制。江青质问胡乔木：“你为什么要扼杀文化战线上这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重大斗争？主席的这个意见你们向中宣部党组汇报了没有？”

胡乔木说：“这个问题，我请示过少奇同志，他给我讲过：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既然是爱国主义的影片，你要批判，怎么向少奇同志解释？”

江青沉默了，她只能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刘少奇在与胡乔木谈话中认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看来现在不好再批这部影片了。”

毛泽东笑了：“大概刘少奇是看到光绪皇帝可怜吧，现在不批就欠下账了。凡是错误的东西，100年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这个问题先放一放吧！”

这次，毛泽东是要算这笔账了。他接着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

“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于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当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艰苦，没有东西可拿，就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轻徭薄赋’的政策对地主阶级有利。”

他提到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上，戚本禹写的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3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

毛泽东望着大家问道：“你们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什么？”

不等大家回答，他接着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了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40天娘，我骂你们20天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

“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

“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

高中毕业后，就要先做点实际工作。单下农村还不行，还要下工厂，下商店，下连队。这样搞他几年，然后读两年书就成了。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大发明家瓦特、爱迪生等，都是工人出身。第一个发明电的富兰克林，是个卖报的，报童出身。从来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很多都不是大学出来的。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

.....

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黄埔军校只学几个月，出来的人就能打仗。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综合就是吃掉敌人。我们是怎样综合国民党的？还不是把敌人东西拿来改造？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大部分补充我军。武器粮秣、各种器材，统统拿来。不要的，用哲学的话说，就是扬弃，就是让杜聿明这些人——。吃饭也是分析综合。比如吃螃蟹，只

吃肉不吃壳。胃肠吸收营养，把糟粕排泄出去。你们都是洋哲学，我是土哲学。对国民党的综合，就是把它吃掉，大部分吸收，小部分扬弃。这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把黑格尔哲学的外壳去掉，吸收有价值的内核，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对费尔巴哈，吸收他的唯物主义，批判他的形而上学，继承还是要继承。马克思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好的吸收，坏的抛掉。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分析商品的二重性开始。我们的商品也有二重性，一百年以后的商品还有二重性，就是不是商品，也有二重性。我们的同志也有二重性，就是正确和错误。你们没有二重性？我这个人就有二重性。青年人容易犯形而上学，讲不得缺点，有了一些阅历就好些了。这几年，青年有进步，就是一些老教授没有办法。吴晗老当市长，不如下去当个县长好。杨献珍、张闻天也是下去好。这样才是真正帮助他们。”

.....

写哲学能不能改变个方式？要写通俗的文章，要用劳动人民的语言来写。我们这些人都是‘学生腔’。”

陈伯达插话说：“主席除外。”

毛泽东接着说：“我做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国民党运动，做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工作，所以稍微好一些。”

谈话一结束，陈伯达就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转告了正在上海的江青。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很高兴。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虽然也是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完全不同的态度，江青很高兴，她马上和陈伯达商量道：

“主席的谈话很重要，应该赶快传达下去才对。”

“好的，我马上跟田家英讲一下，让他尽快整理一个谈话既要。”陈伯达表示赞同，随后就找到田家英，对他说：

“家英，你把那天主席的讲话记要整理一下，回来向中央汇报。”

田家英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那天只记了些要点，整理纪要就不全了。于是，他赶紧求助于艾思奇和

关锋：

“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帮我整理一下主席的谈话纪要。”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第二天上午，就把整理出来的谈话纪要交给胡绳、田家英看。后来田家英说，关于彭德怀这一段和主题无关，不要吧，就勾掉了。艾思奇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提醒田家英说：“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吧。”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

他最终还是删去了毛泽东评价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

其实，田家英在1959年在庐山上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不是毛泽东保他，恐怕也和周小舟等人一样，被打倒了。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很有看法，毛泽东曾要田家英看吴晗的《海瑞罢官》剧本，田家英看后对毛泽东说：“看不出《海瑞罢官》有什么问题”！

第 21 回：变策略，吴晗作自我批评 赶紧跟，中宣部哪敢稍停

第二天，12月22日，毛泽东又在同一房间里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人谈到《海瑞罢官》的问题。他说：“我又看了吴晗的若干材料，《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嘛。”

彭真马上插话说：“主席，我们认真地进行了调查，吴晗与彭德怀没有任何组织联系和直接联系。”

“噢，康老，你说呢？”毛泽东征求康生的意见。

康生扶扶眼镜，想了一下说：“组织上没有联系不见得思想上没有共鸣，起码是政治问题……”

彭真激动地打断康生的话说：“怎么会是政治问题？充其量不过是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嘛。”

“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就没有联系吗？搞阴谋还要订个君子协定吗？”康生问。

毛泽东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彭真还要争辩，康生提醒他说：“彭真同志，你是在主席面前，态度还是谦虚一点！”

彭真不说话了，他可能也意识到了，简单的死保吴晗是不行了，弄不好，自己也要搭进去。从毛泽东那里一回来，他就给北京的邓拓打电话：

“邓拓吗？我是彭真。你跟吴晗谈一下，让他写一篇自我批评的文章，争取主动吧。”

然后，又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要求和毛泽东单独面谈。徐业夫很快给彭真回了电话，毛泽东同意彭真第二天去他那里。

12月23日，彭真如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主席，我还想谈谈吴晗的问题。”彭真说。

“好啊，说说看吧。”毛泽东没有反对。

“吴晗同志，您和总理都是了解的，解放前就一直坚定的站在我们一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蒋介石的斗争都很坚决。解放后很快就入了党，历次政治运动都表现很好，反右时是坚定的左派……”

在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吴晗解放前后的表现以后，彭真说：“如果抓住吴晗的几句错话，就肯定他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么戚本禹、关锋、姚文元都有问题。他们写的一些杂文，上了纲都可以定反党。”

此时的彭真已经开始收集这些人的材料。

毛泽东认真听彭真的谈话。他深思一阵说：“看来，有些问题是不能马上做个结论的。吴晗的问题，最快也得两个月后才能作政治结论。我回到北京，再找少奇、恩来、小平他们议一议。”

毛泽东提到调查罗瑞卿问题，要彭真回北京后找公安部和中央军委的人谈，注意“地下活动”，并说：在党内军内永远不准搞地下活动。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彭真逢人就讲：“主席说了，吴晗的政治结论两个月以后再讲，现在还是学术批判。”“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分开。”

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亦鸣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后感”，文章指出：“姚文元同志说，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影响很大，流毒很广’。这个结论下得未免轻率。

海瑞，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他一生所作所为的客观效果是冲淡了当时的阶级矛盾。”

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杨金龙的文章：《对农民形象的歪曲》，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12月26日，彭真跟毛泽东一起来到上海。当上海市委向彭真汇报工作，谈到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时，彭真当面批评张春桥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也不打招呼？党性到哪里去了？”

张春桥随即答道：“姚文元的文章是根据9月中央工作会议时毛主席指示发表的。”

彭真接着说：“对姚文元的文章也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说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目前还是要坚持‘放’的方针，吴晗问题要作为学术问题讨论。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谈。”

然后又批评上海市委说：“《文汇报》刊登首都各报的编者按语，偏

偏把《北京日报》放在最后,为什么?”接着,问张春桥:“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张春桥拿出一份讨论《海瑞罢官》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北京转载姚文元文章后,张春桥召集朱永嘉等人在他的办公室一起讨论和制订的,基本是按照彭真“学术讨论”的思路安排的。彭真看了很高兴,称赞了张春桥:“这个计划不错,你们就按这个计划安排吧。等这件事情搞完了,我请张春桥到北京吃烤鸭!”事后,张春桥曾对朱永嘉他们说,他将上海组织讨论的计划和报纸上的按语都给彭真看了,彭真看了很满意。

为了能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起来,张春桥是很下了一番功夫的。11月29日,上海《文汇报》第二版以《读者来信要求讨论〈海瑞罢官〉问题》为通栏标题开始刊登讨论文章。《文汇报》为此刊发的编者按语是张春桥亲自写的,说要“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这篇编者按连续登载了6天,这种做法是很罕见的。那天《文汇报》发表的有复旦大学历史系、华东师大历史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来信,主要介绍了各自单位对姚文元文章的各种反应,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几篇文章都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事先组织好的,待北京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时才刊登出来。接着几天《文汇报》刊登的主要是不赞同或不完全赞同姚文元观点的文章,以期引起争辩,将对《海瑞罢官》的讨论开展起来。12月6日《文汇报》又在第一版将各地报纸转载姚文元文章的时间排列出来,并转载了《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的编者按,以这种方式将对待姚文元文章的不同态度显示出来。12月7日起,《文汇报》开始陆续刊登吴晗《海瑞罢官》的剧本和赞扬这出戏的文章,作为反面教材。为此,张春桥又专门写了编者按。

12月26日是毛泽东72岁生日。这天晚上,毛泽东请彭真、陈丕显,张春桥等人和他一起吃饭。吃饭时,他特意把张春桥拉过来坐在自己的身边,说:

“让我们这位红秀才坐在我旁边。他是我们的理论家,批判《海瑞罢官》就是他和姚文元研究、组织的,我很赞赏他的文章风格。”

张春桥不失时机地说：“可是，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北京好长时间没有转载。”

彭真解释说：“北京未转载，是想看看动态。再说，对姚文元也要一分为二，他的文章也不是没有错误嘛。”

张春桥说：“《人民日报》那篇以向阳生名义发表的文章也有问题……”

彭真马上接过来说：“那是我让他们写的！主席说了要放，我们就要放他一阵子，政治问题以后再说也不迟嘛。我可以保证刘仁、邓拓是左派！”

12月27日，《北京日报》在彭真的多次催促下发表了吴晗两万多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在自我批评中说：

“我忘记了阶级斗争”、“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效果是十分恶劣的”。对彭德怀的问题，他没有提及。

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这篇文章的后边加了《后记》：

“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

就在方求的文章快要定稿时，周扬隐约的听到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讲话，他赶紧给龚育之打电话：

“小龚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准备的怎么样啦？”

“基本写完了。”

“那好，你们辛苦了。罢官问题写了吗？”周扬问。

“不是说不写吗？姚文元的文章中没有提，我们也不提。”龚育之赶紧回答。

“我想，还是要写上，政治影射最大的问题是罢官，你们一定要加上，要抓紧。”周扬嘱咐说。

“行。”

方求文章送去发表的时候，听说了《北京日报》要发表吴晗的自我批评。中宣部赶紧请示周扬，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

思潮》是否按原计划发表？还是看看吴晗的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周扬和中宣部的人事先都没有看到吴晗的这篇自我批评，但是，周扬认为，中宣部的文章不能再等了，毛泽东这几年本来就对中宣部的工作不满意，已经不止一次的点中宣部的名了，再拖下去中宣部就更被动了。于是，他说：“你们的文章照发吧，来不及研究他这篇自我批评后再作修改了。如果有必要，就再写一篇吧。”这就有了方求文后的《后记》。

文章中，将吴晗的问题上纲为“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其中将《论海瑞》、《海瑞罢官》称为“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

由于文章中也捎带批评了田汉和孟超，周扬在与龚育之、林甘泉、邢贲思、戴逸等执笔者谈话时说：“在我少年的时候，田汉在我心目中还是崇拜的偶像，孟超也是上海左联时代的人物，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多么深刻，这些同志跟不上啊。”

不久，中宣部传达了毛泽东 12 月 21 日在杭州讲《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的谈话内容。为了紧跟毛泽东的指示，周扬指示中宣部又赶写了一篇评吴晗自我批评的文章，题目就叫《不能回避要害问题》，仍然署名方求。

12 月 30 日，《人民日报》按照彭真的要求转载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

中国大陆就在这样一片扑朔迷离的政治风云中迎来了 1966 年。但是，老百姓对上层的这些角逐并不知晓，他们依然意气风发的“走在社会主义大路上”，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参加当时对海瑞的批判。此时，一部歌颂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的小说——《欧阳海之歌》风靡内地，大喇叭下，常常可以看见聚集的人群如痴如醉的收听播音员关山正在播讲的《欧阳海之歌》。舍身救人的解放军战士王杰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之风仍然在神州大陆上劲吹。人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个理想的社会一定会到来。

政治斗争依然按照自己固有的轨道前行。1966 年元旦后的第二天，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 30 多人参加

的关于学术批判工作的会议，彭真特别点名要《红旗》杂志社的关锋、戚本禹参加。

会上由胡绳传达毛泽东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精神，主题是提倡读马、恩、列著作，着重谈了哲学问题，也谈到了对《海瑞罢官》和翦伯赞史学观点的批判问题，他特别解释说：“毛主席说的没点名，是说戚本禹写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批评的是翦伯赞，但没点翦伯赞的名。”

胡绳传达后，彭真说：“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关于意识形态斗争的最新指示，大家要好好学习讨论。”“现在的问题是要展开，把各种不同的观点‘放’出来。像什么历史观、道德观、清官问题等等，都要讨论，扯得越宽越好，要扯多宽就扯多宽，要扯多久就扯多久。”

“过去五人小组曾经规定：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同意，批判的调子要以中央报刊为准。还规定过对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吴晗、茅盾几个人不点名。对郭老不点名、范老不点名，有的就保护不了了。吴晗已经被点名，看来翦伯赞不能不点了。但是，还是要有党性原则，点名一定要按规定请示报告。”

他又说：“戚本禹的文章写得好，缺点是没有点名，郭沫若可以不点名，范文澜要保护，其他人就保护不了了。吴晗、翦伯赞要点名，吴晗要批判，两个月后再作政治结论。毛主席说，这一次同资产阶级思想、封建思想，要好好作一场斗争”

彭真特别指出：“任何人的文章都可以一分为二。我在上海讲，你《解放日报》、《文汇报》自己也发表了不少错误文章，也应该清理清理。”

这时周扬插话：“《解放日报》推荐《海瑞上疏》是加了按语的。”

彭真接住话头说：“上海只批评《海瑞罢官》，对《海瑞上疏》不作检讨，这也不对，有错误都要批评吗，首先要做自我批评。对于他们的错误，中央报纸也可以批评。”

“《北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按语写得不那么凶，而《解放军报》的编者按直接点出《海瑞罢官》是大毒草，是对的。但是这样一来，就使得人们不敢说话了。这样就不好，你都下结论了，还怎么‘放’呀？。”

“关于政治问题，主席说了，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

陆定一接着说：“是呀，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我也不知道，这样不好。应该先同中宣部打个招呼嘛。”

“……当前的讨论实际上是一场大争论，主要是思想范围内的争论，是学术性的。可以列出一大堆问题，如道德继承、形象思维等等，其中包括历史、哲学、教育学、美学在内。社会科学、文学方面的题目多得很。对古人的评价、历史主义、现实主义、形象思维、美学，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来，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

陆定一明确提出：“就这次的讨论方法上来说，学术批判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搞。一扯到政治问题，讨论就展不开。

“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一部分（指揭露《海瑞罢官》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就更好了。”

随后，康生讲话，他说：“批判吴晗要同庐山会议结合起来。庐山会议前，吴晗写了《海瑞骂皇帝》，9月间写了《论海瑞》，以后又写了《海瑞罢官》，年底，也就是彭德怀罢官以后，开始着手写《海瑞罢官》。毛主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就是海瑞。因此，罢官问题是我们的批判的重点。学术界有资本主义思想、封建思想的人很多，没有清算过，也不是一次清洗得完的，要清算多久，至少一百年。”

他又说：“目前吴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批评实际上是自我批准、自我开脱，他的要害是‘罢官’。”

会议结束后，彭真将戚本禹和关锋留下来。一年前，彭真曾将关锋和戚本禹请到家里吃饭，这时，他像老朋友似的对他们说：“我们又见面了。”

戚本禹开玩笑说：“你又要请我们吃刀削面了？”

彭真说：“不，今天太晚了，不打扰你们了，咱们不吃饭。咱们就说一件事。这次，我在上海见到江青同志了，江青同志叫我来看看你们。江青同志特别嘱咐，要你们两位积极参加这场学术争论。”

彭真接着说：“吴晗一直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我们跟他关系很好，有些问题我也是经常批评他的。他这次又受了批评，态度尚好。姚文元同志那篇文章，提了很多问题，也引起我很多思考。对主席讲的吴

哈文章和彭德怀罢官的指示，我的理解还不深透。猛一下听了主席讲话，很吃惊，我以前没那样想过。你们好好研究研究，把它写清楚。”

对彭真的这一席话，戚本禹以为是他谦虚，可关锋却不这样认同。从彭真那里出来后，他对戚本禹说：“不对，他是不同意主席的意见。他其实是在暗示我们，让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要有分寸。”

关锋是《红旗》杂志社编委，戚本禹一直都很尊重他的意见，但此时觉得他的这个看法可能有点过分了。

1月9日，彭真批发《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

陈伯达、江青看到纪要，发现里面没有“要害”问题的内容，非常吃惊，继而震怒。

江青打电话问身在杭州的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毛泽东不解地问：“哪段话？”

“就是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话。”

“我没有删。”毛泽东在电话里对江青说：“谮言如水，渐以成之”。

谮言，诬陷、中伤的言语；谗言。“谮言如水，渐以成之”的原句为“谮人之言，如水之浸润，渐以成之。”这是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在批注《论语》“子张问明”时，解释“浸润之谮，肤受之愬”这句话时说的，意思就是谮言如水，渐渐滋润，令人接受而不自知。

陈伯达也去问关锋：“主席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的那一段话，怎么删掉了？是谁删的？”

关峰回答说：“是田家英删的，他说是谈文艺问题的，和整个谈话关系不大。”

“主席的讲话怎么能随便删掉呢？”陈伯达埋怨说。

“是啊，我和艾思奇也是这样想，艾思奇当时还提醒过他呢。”关锋很有同感。

在陈伯达和江青的坚持下，“要害”问题的一段话后来又加进了《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但是，田家英删改毛泽东的讲话，追究起来可不是一般的问题……

第 22 回：广播局，周恩来部队调人 没商量，关锋说“一字不改”

罗瑞卿和郝治平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因为家里正在修房子而暂时住在钓鱼台，孩子们都在学校寄宿。

他们在钓鱼台住了几天，罗瑞卿觉得自己目前的身份，住在那里很不方便，便向中央办公厅提出搬出钓鱼台，于 12 月 28 日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

位于北京西郊翠微路附近的新六所是 20 世纪 50 年代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盖修的五栋小楼；加上工作人员一栋，共六栋，因此称作新六所。

罗瑞卿携家人住进新六所后，就闭门不出，也没有人登门拜访。以前家中高朋满座，门前车水马龙的情景已然没有。与外界的电话联系几乎中断，只有和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的电话还能够接通。

罗瑞卿偶尔在孩子的陪伴下，到院子里散散步，听孩子讲讲学校里的事情。有时候，他也漫不经心的讲一些自己的身世和经历，但言语间不像在讲给孩子听，倒像在细细地过滤往事，检点自己的行迹，整理自己的思想脉络……他觉得他能够说清楚自己的是非对错。于是，提笔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写了一封申诉信。他在申诉信中写到：

“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

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作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代。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

条(加挑拨)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没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确有其事,那算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

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才听说。”

1月5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了南昌。他同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省长方志纯等人谈到了罗瑞卿的问题时说:

“这个人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要调动一下,可以到地方上去做些工作,也不一定调到江西来。”

“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统率经济。”

1965年12月28日至1966年1月18日,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陆海空军、公安部队、高等院校、科研机关等军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或政治部主任,以及部分师政治委员。会议中心议题,是研究如何贯彻执行林彪在1965年11月18日提出的《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

林彪在《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中指出:

“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帅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出席会议的人员。各报纸发表解放军举行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消息,提出“把毛主席的指示,当成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林彪题写的雷锋日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传遍全国,家喻户晓。

上海会议结束后,贺龙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和董必武等人一起到广州休息。随后,毛泽东交给他一个任务,让贺龙到四川西部

“三线”的攀枝花钢铁厂和正在施工的铁路隧道等地视察，直到1966年4月9日才回到北京。

1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以军委秘书长职务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1月14日，周恩来约广播事业局局长、党组书记丁莱夫，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谈广播电台的安全保卫问题。周恩来说：“广播事业局要成立电台安全保卫小组，要从部队调一个现职参谋长专管电台的安全保卫工作。”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王若水用“思彤”为笔名的文章《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第一次在报纸上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庐山会议。

1月13日至17日，经周扬确定，约请关锋、戚本禹写的文章，陆续交到了中宣部。本来，中宣部约他们写的是批判吴晗道德观和历史观的文章，是想把批判约束在学术批判的范畴里。但是，戚本禹送来的文章，标题就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本质》。文章一针见血的指出，吴晗《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关锋则送来两篇文章，一篇是批道德继承论的，一篇是与林杰和写的，标题是《〈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也是专讲要害问题的，都上升到很高的政治问题的高度。

三篇讲要害问题的文章，政治上都有很重的分量，能不能发，发不发这么多，中宣部没有把握。周扬这时被诊断为肺癌，住院准备作手术，全国学术批判工作由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接手负责。龚育之和林润青去向许立群汇报：

“关锋和戚本禹的文章，讲要害问题讲得很明显，明显到在讲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搞影射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即‘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字呼之欲出了。你看怎么办？能不能发表？”

是啊，姚文元的文章还没有点彭德怀的名字，许立群为难的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我作不了主，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哩，三届人大会议时，军委的同志讲彭德怀的问题，只给人大代表听，列席的政协委员都不让听。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我要向上面请示。你们把关锋和戚本禹讲要害问题的文章，还有

你们自己写的那篇《不能回避要害问题》的文章中,有关要害问题的提法做出摘要,送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请示。”

龚育之接着说:“还有,关锋批道德观的文章,把吴晗讲道德继承,比之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吴晗不管怎么说,是反蒋的呀,怎么能把他同蒋介石等量齐观呢?”

“我看,把这段文字删了吧。”林润青建议说。

“行吧,你去征求一下关锋的意见。”许立群表示同意。

过了一会,与关锋通完电话的林润青黑着脸走了过来说:“关锋说了,一个字也不能改。”

“怎么这么霸道,还一个字也不能改。”龚育之和许立群听了,都十分生气。

“既然一个字不改,那么,这篇文章从政治上考虑能不能发表,我们没有把握,无权决定,要请示。你们也作一个摘要,向五人小组报告吧。”许立群说道。

这时,龚育之好像想起什么事,突然说道:“对了,我曾经读到过关锋用笔名‘何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杂文,题目好像是《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是讲道德继承的。他关锋也讲过道德继承嘛,为什么你讲就没有问题,吴晗讲就是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我们是不是把这篇文章也摘录上,作为上述请示的附件。”

“你怎么断定何明就是关锋?”许立群问。

“北京学术圈子里都知道是关锋,一查就查出来了。”龚育之和林润青回答说。

“向中央反映情况,事实得查准确。”许立群说。

“我们让图书馆找一本关锋的杂文集,看看里面是否有这篇文章。”林润青建议。

“对。”龚育之表示赞同。

一会儿,图书馆就送来了一本关锋用真名出版的杂文集《边鼓集》,里面果然有几篇关锋在报纸上发表时,署名‘何明’的文章。

“那好吧,把这篇文章也作为附件送上去。”许立群表示同意。

接着,他又说:“还有,咱们部里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曾经摘录过关锋用庆云的笔名写的文章《从陈贾说起》和邓拓

(马南邨)的《伟大的空话》，认为它们都有影射现实的含意。你们再印一下，连同上面的材料一起上送。”

“听说《宣教动态》反映以后，关锋在《红旗》杂志作过自我批评，如果这样，那还上送吗？”龚育之问道。

“问问胡绳就知道了，他是《红旗》副主编。”许立群说。

龚育之给胡绳打电话：“是胡绳同志吗？我是中宣部小龚，向你了解一个情况，《宣教动态》登了关锋同志的一篇文章，《从陈贾说起》。听说关锋为此在《红旗》杂志社作了自我批评，有这事吗？”

“没有，关锋对此事很有意见，认为《宣教动态》的记录歪曲了他的原意。”胡绳在电话里回答。

许立群一听，就说：“那好，这次全部照送，一字不漏！”

许立群接手全国学术批判工作后，从上到下明显有两种声音：在上面，一边是毛泽东、康生的声音：《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一边是彭真、陆定一的意见，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要分开，不要把吴晗的问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

在下面，一边是来自基层和左派年青理论家的呼声，急切地希望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与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以改变学术界由学术权威一统天下的局面；一边是那些学术界泰斗战战兢兢的辩白：我们有错误可以检讨，但决没有政治问题，我们不反共产党，不反社会主义。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是学术问题，那还可以讨论；如果是政治问题，那就和右派一样，在这个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了。即使共产党不说打到你，老百姓的唾沫星子也会淹死你。

许立群倾向于彭真的意见，他不想看到这些学术权威一下子全被打倒。但是，来自基层和左派的呼声那么强烈，他只好在1月17日召集《人民日报》王辑、《北京日报》范瑾、《光明日报》穆欣、《红旗》杂志杜敬、《前线》杂志(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李筠、《新建设》杂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的吉伟青6个报刊负责人开了一个座谈会，希望将最近学术批判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汇总一下上报彭真，请求指示。

许立群的意见仍然是：“学术批判目前还是要坚持‘放’，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先不要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要同时讨论历史人物评

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让各种思想都反映出来,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

会后,许立群将林涧青和龚育之留下,对他们说:“你们二位辛苦一下,把咱们这次讨论提出的问题整理一份简报。今晚就整理出来。”

林涧青说:“这好办,就按你最后讲的整理出来就行了。”

于是,他们将在学术批判中遇到的问题归纳、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放”和击中“要害”的问题,在落实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时如何掌握?在发表揭露吴晗政治性错误的文章时,应该把握到什么程度?文章发多少?怎么发?什么时候发?

二是关于讨论步骤和战线扩大问题。《人民日报》原来计划,《海瑞罢官》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剧问题、道德问题,逐个问题讨论,这样安排是否合适?《光明日报》和《新建设》反映,《海瑞罢官》问题已经联系到让步政策;对吴晗历史观的批判必然牵涉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宁可,《新建设》已经收到批判宁可的文章;对吴晗道德观的批判,已经联系到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和朱光潜。《光明日报》还收到文章,批评《十五贯》中对况钟的美化。这些问题是一个一个讨论,还是现在同时进行?

《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体育报》都向中宣部请示,他们是否应该参与《海瑞罢官》的讨论?怎样参与讨论?

三是面向群众的问题。《北京日报》反映,许多工人和干部说,文章太长,太深,没法看,文科师生现在已经下乡或正在讨论下乡,看的人也少。《人民日报》反映许多干部只看文章题目。

四是关于发表文章的数量与质量问题。

许立群将这四个问题综合成一份简报,上报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题目是:《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關於〈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

春节后,许立群亲自给张春桥打电话,通报了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会的情况。

张春桥在电话中对许立群讲:“是啊,现在有些人竭力想把郭沫若、范文澜拉出来;还有人想批评戚本禹。”

“批评戚本禹什么问题？”许立群问。

“因为戚本禹在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中也有一篇文章。”

“哪篇文章？”许立群又问。

“《孙承宗》，是明末的一个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

“哦。”

“另外，许多人对方求《〈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思潮》和向阳生的文章有不同意见。”张春桥接着说。

“是吗。”许立群未置可否。

随后，他找来龚育之，对他说：“你去找一下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看看里边是不是有一篇戚本禹写的《孙承宗》的文章，看看有什么问题。”

龚育之很快找到了这本书，看了后，觉得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就将书交给了许立群。

第23回：苏州行，江青春节请尊“神” “耳朵聋”，郭沫若恳请辞职

1月21日，是1966年的春节。但是，在北京和上海两地的中共中央上层人物却没有一点过年的意思。北京的彭真、许立群在忙着安排引导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上海的江青也在春节过后，驱车前往苏州，拜访正在那里养病的林彪。当然，她不是去给林彪拜年的，而是遵从毛泽东的旨意前去请“神”的。

当江青来到苏州林彪的住处，早已恭候在门外的叶群立即迎了上去：

“哎呀，江青同志，大年初一您还过来，真是太感谢您了。”叶群边说边将江青迎入院内。

“我是受主席委托，过来看看林总。”江青继续着战争年代对林彪的称谓。

“太感谢主席了。主席身体很好吧？”叶群问。

“好……”说着，他们走进了林彪的会客室。已经在里边等候的林彪看见江青进来，站了起来，和江青握了下手，说：“欢迎你……”

“林总，身体好吗？我在上海，你怎么不来看我？”江青边握手边问。

林彪犹豫了片刻，回答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养病。”

江青向林彪提出想在上海召开一次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表示支持，他对叶群说：“你给肖华打个电话，让他安排一下，一切按照江青同志的意见去做。”

“行，我马上布置下去。”叶群说。

江青临走时，林彪对她说：“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找刘志坚联系。”

其实，两个月前，1965年11月，罗瑞卿在上海时，江青就和向他透露了在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想法，并邀请罗瑞卿参加。罗瑞卿出事了，江青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直接来找林彪。

第二天,2月1日,北京东城区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的住宅内响起了电话铃声,秘书告诉刘志坚:

“是苏州‘林办’的电话。”

刘志坚赶紧接过了电话:“喂,我是刘志坚……”

电话里面传来叶群的声音:“是刘志坚吗?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

“好,我马上落实。”

叶群接着说:“101有几句话要转达给江青,你记一下,

接着,她一字一句地念了林彪的话,然后问:“都记下来了吗?”

“都记下了。”刘志坚答道。

“你念一遍,咱们再对一下。”叶群说。

“好……”刘志坚逐字逐句与叶群作了核对。

“都对。101特别交待,你到上海后,首先要当面把林彪的话转达给江青。清楚吗?”叶群再一次叮嘱刘志坚。

“知道了。”刘志坚答应说。

放下“林办”电话,刘志坚立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

“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派谁去呢?”刘志坚和肖华商量开会的人选。

“文化部的谢镗忠、陈亚丁,两个正副部长,还有宣传部长李曼村,再加上你,正好四个人。”肖华说。

“行。再派两个工作人员吧,《星火燎原》编辑部的编辑黎明,正好熟悉三大战役的情况。还有秘书刘景涛,可以作一些文字工作。”刘志坚建议道。

“我看可以。回来开党委会再通过一下再往上报。”肖华表示同意。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确定了下来,报给了叶群,叶群又报给了江青,江青同意这几个人去参加

座谈。

没过几天，刘志坚就接到江青秘书的电话，通知他们2月2日到上海开会。刘志坚立即向肖华作了汇报，并安排了会前准备工作。

临行前，肖华又特意对赴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你们这次去上海，还要特别注意三点：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对她的话要多听少说，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对地方文艺工作情况，不要随便表态。清楚吗？”

肖华又再三嘱咐：“江青同志是个病人，她对部队文艺工作有什么批评，你们不要当面辩解……”

此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召开。会上印发了揭发罗瑞卿问题的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即罗瑞卿于1965年1月9日上午在军委办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年4月3日在42军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与此同时，揭发罗瑞卿的材料越来越多，内容集中为两点：

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

二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证据有三条：

1. 反对林彪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2. 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3. 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会上，要求继续批判罗瑞卿的呼声甚高。

1月24日，回到北京的林彪在会上作了报告，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书，是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信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对我军来说，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突出政治不是一项任意的政策,不是可以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这是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所提出的根本措施。不突出政治,就是违反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林彪报告的第二天,1月25日,全国各报刊登了林彪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

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大年初二他同张春桥通电话的内容。并把戚本禹在《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那本书,随函送了一册给彭真。

1月18日至27日,由于一直未见批要害的文章发表,戚本禹接连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批判吴晗政治要害问题的文章为什么还不发表?

许立群答复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关锋、戚本禹认为是中宣部许立群扣发了他们的稿件,于是,越过许立群,又把他们攻要害的文章直接送给彭真审查,彭真叫他的秘书打电话说:“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1月28日,许立群又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送上一份材料,《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其中方求一篇,关锋、林杰一篇,戚本禹一篇是讲“要害”问题的,另外关锋送中宣部林涧青的一篇是讲道德论的。许立群认为,方求的文章,比较妥当,问题不大;关锋和戚本禹的,联系庐山会议很明显,问题比较多,发表出去担心影响大,需要请示。许立群特别将文章中的一些段落摘录持下来,请他们审阅,对政治性的提法,在分寸上应当如何掌握为好?这些文章何时发表为宜?请他们指示。

恰在此时,许立群收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一封辞职信,请求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及其他一切职务。

郭沫若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诗人、文学家、戏剧学家、五四运动的先锋,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在中国乃至世界都很有影响。涉及历史领域的学术批判,不可能不涉及他。统战部的《零讯》

和《光明日报情况简编》，刊登了一些人主张批判郭沫若写的《武则天》、《蔡文姬》的文章。这两个内部材料，郭沫若都可以看到。而且，他还在海南岛祭拜过海瑞的墓，写过两首关于海瑞的诗。春节前哲学社会科学部负责人向他汇报工作时，曾说过历史学方面的学术批判，还要扩大发展下去。春节的科学院团拜和政协常委团拜，郭沫若就不愿意坐到台上了。春节后，他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递交了一封辞职信，信中说：“……自己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怀愧抱愧，每每坐立不安。因此，早就有意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务请加以考虑，并转呈领导上批准。”郭沫若的辞职信经中宣部科学处处长于光远转交到许立群手里。许立群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了彭真。

1月31日，张劲夫根据中央的指示，以征求郭沫若对科学院工作意见的名义，登门探视。郭沫若表示，自己的辞职和中科院的工作无关，只是从最近批判《海瑞罢官》运动开始以后，两相对照，感到自身问题很多，继续担任这些领导职务，怕影响不好。原来也考虑过辞职，最后才下决心写了这封辞职信。对组织没有什么意见。另外住这么大的房子，心中也常常感到不安。自己还考虑过是否应该下去锻炼锻炼，当个中学老师。

张劲夫当即表态说：“你的问题和吴晗等人性质不同，组织上希望你继续在中科院工作。”

中央收到罗瑞卿回到北京后写的申述信后，于1月30日，委托周恩来、邓小平和李富春在怀仁堂约见罗瑞卿，转述了一个多月以来一些高级干部对罗瑞卿的意见，大家基本都认为罗瑞卿过于骄傲。

罗瑞卿再次提出要见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对他说：“你现在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副主席。主要是考虑自己的问题，好好写检讨。”

“我没有伸手，没有反对突出政治，也没有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怎么检讨？我什么时间说过‘军事就是政治’，‘政治、军事同等重要’，‘政治、军事要轮流突出’了，拿出证据嘛，我可以检讨。”罗瑞卿委屈地说。

“没有三条，就有什么就检讨什么嘛。比如：关系问题啊，和老帅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周恩来耐心的做着工作。

第二天，1月31日，周恩来审阅关于批判罗瑞卿“错误”的文件时，建议文件“改由总政直接发下，作为内部文件，还可稍留余地”。同日，他又让秘书查查罗瑞卿申诉中提到的“军事就是政治”等三句话的出处。秘书去问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刘志坚查后答复：“军事就是政治”是林彪概括出来的，罗瑞卿在若干次讲话中讲过这一类话，但没有这样概括的说法。

1月31日，由于一直没有得到彭真的具体指示，许立群又给彭真写了一封长信。

2月1日，彭真将许立群的信及几次报送他的7份材料作为附件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陆定一、康生、吴冷西阅。这7份材料分别是：

一、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人座谈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

二、汇报张春桥电话中的意见；

三、汇报关锋等人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

四、关于郭沫若一封信的汇报；

五、关锋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在1962年写的一篇杂文；

六、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

七、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

彭真在材料上写了一个注：“拟于后日召开五人小组会讨论后向中央提出意见。”

2月5日，毛泽东在这7份材料的目录页上写了如下批语：

江青：

这批材料阅后，暂存你处。

毛泽东

二月五日

2月1日至4日，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第51次常委会议。据参加

这次会议担任记录的时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在《工作记录本》上的记录，出席的军委常委有：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会议由肖华汇报关于罗瑞卿问题和1966年1月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情况，由杨成武传达毛泽东1965年12月22日、林彪25日关于罗瑞卿问题等的指示。杨成武说：

“主席说，他又犯了彭德怀的错误，对林、老帅不尊重。罗在高饶问题上实际上陷进去了。罗是个野心家。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林带了几十年兵，难道他还不懂得什么是军事，什么是政治？军事训练几个月的兵就可以打仗，过去打的仗都是打的政治。要注意防止罗的地下活动，注意搞八司马。（去年二十二号说的）主席问许世友有多少兵，答有五十万。靠不靠得住，营以上干部靠不靠得住，北京发生政变怎么办？人家把主席、刘主席暗杀了怎么办？什么人看林总，什么人哭了，他都知道。

主席说，要恢复突出政治的原稿。康生你怕的三个人，你说对了（饶、罗）。他对特务老婆讲，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你要我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解放以后又和她见面了。（在南京市当小学教员）罗什么△△问题不向林报告。名单、领导小组、执行小组，三个步骤都是主席批准的。要产生一个决议。罗就是个人独断，从当总参谋长来未向我单独作过请示报告（林说他从来没有作过创造性的建议，都是吃现成饭）（罗说黄埔军官学校只培养了两个学生，一个林彪，一个罗）虐待公务员，罗搞这一套，总有几个人在一起，与外国的关系有些可疑。

刘主席说他没有阶级性，没有党性，反对林，反对中央。总理说反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

杨成武传达毛泽东讲话中提到的“高饶问题”是指高岗、饶漱石；

“八司马”则是前指唐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后指整风反右期间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八名年轻科级干部因向室领导提意见挨整受批，毛泽东曾称之为新的“八司马事件”；

“特务老婆”是指罗瑞卿延安时期的前妻拱平。

出席军委第51次常委会议的与会者对罗瑞卿问题发表了看法和意见。

叶剑英说：“我们在战略上藐视，他是纸老虎。在战术上要当作真老虎打，这个家伙是很厉害的。我们作自我批评，作了自我批评，并不是和罗一样，是认识问题，要划一条线。”

贺龙说：“这个人很坏，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得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对他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销毁证据。他要儿子学射击，家里那么多电话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卫工作，特别是林的安全。”

“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人。”

聂荣臻说：“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看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要变色，适当的时候要作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个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刘伯承说：“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陈毅说：“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是伸手。”

徐向前说：“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都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2月8日，林彪就罗瑞卿问题作出指示：“这是个危险人物，他是不会承认错误的，承认了也是假的，不会真正的承认。他跟一般的好同志不同，他要报复，反扑的。这个炸弹不搞掉，将来第二次爆发更难说。在战争爆发时，在党和国家发生困难时，他要造反的。这个人比彭、黄危险得多。不要小看，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性。他到处欺负人。他的思想与阶级本质是农奴主，野心很大，先夺军权，然后夺政权，元帅都不在话下。他要造反的，不能放松警惕。要长期管制，到下面去，在党和群众的监督下进行改造。放松了警惕将来会出乱子的。他跟其他同志犯错误不一样。如果第二次爆炸，他要炸掉我们的国防，炸掉我们党的团结。要打他的张牙舞爪，要消毒。把材料整理出来，军

一级都要看。有些材料编出来，搞十条、二十条。批判以后不要留在北京，下放，不要放在大三线，十年也不能来北京。这是个危险人物，危险的炸弹。毛主席、刘主席健在，他搞野心阴谋，如果党发生了困难，他就会造反、出乱子的。”

第24回：看电影，不夜城座谈文艺 交锋疾，五人组讨论方略

2月2日上午，刘志坚一行六人从北京西郊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

到了上海后，他们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对外名称是“延安饭店”，是专门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出入那里的人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的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几份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张春桥就来了。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1963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是来接刘志坚去江青的住地——华山路丁香花园。这里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在拥挤不堪的上海市中心，这里却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显得那样的幽静和高雅。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就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则是学习雷锋的意思。

刘志坚在张春桥陪同下，走进江青住处。江青一见他们进来，立刻笑容满面的站起来和刘志坚握手，说：“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快坐。”

坐下后，江青接着说：“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子了。让帝王将相、洋人死人统治了。毛主席的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我的意见就更没有人听了。”

她又抱怨道：“我没有办法呀，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

助于林总。要请解放军这座‘尊神’支持我。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坐下后，立即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对江青说：“这是林副主席让我转达的一段话，也是对总政的指示。”

接着，他逐字逐句地向江青念道：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这就是临行前，叶群让刘志坚记下的那段话。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使江青非常高兴，她马上说：

“请你转达我对林总的感谢，谢谢他的支持。同时，也对刘志坚同志为筹备这次座谈会做了大量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哪里，都是工作需要。在文艺工作方面，您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我们这次来就是向江青同志学习。”刘志坚谦虚地说道。

“我们之间就不客气了。这次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江青谈了她对座谈会看法的意见，然后说：“好吧，我们先去锦江小礼堂和同志们见见面。”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在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1959年春天，以21天的神奇速度建成的！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

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共候补委员不过 161 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 200 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的了。

当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当天下午 17 时，江青在张春桥的陪同下，在锦江小礼堂跟来自北京的一行 6 人正式见面。

江青首先宣布了几条会议“纪律”：

“我们这次开会，不要记录，也不要外传，先不要跟北京讲，要注意保密。你们都是军人，军人是最遵守纪律的，是不是呀？你们有人带窃听器了吗？就是那种录音机？不要带那个东西，中央有规定的，开会不要搞那个东西，容易泄密，给坏人机会。你们能遵守吗？”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山东诸城人，十几岁从济南到青岛，以后到上海。同主席结婚后，在延安时当协理员，进了北京主要是给主席当‘文艺哨兵’。为了搞调查研究，我经常自己亲自买票下剧场看戏，戴着大口罩到戏院……这时我发现牛鬼蛇神、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我们舞台，一塌糊涂。我就把这些情况报告了主席，于是才有了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

她接着说：“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现在已 24 年了，就是推不下去，文艺界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舞台，主席多次批评，他们就是不听，文艺界基本上不听主席的，听周扬、林默涵、夏衍这些人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了很久，想通了，这是在文艺方面，有一条与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建国 17 年来他们一直在专我们的政。”

“你们都看了发给你们的材料了吗？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 1944 年 1 月 9 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

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 1944 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此时，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才知道，“座谈会”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 6 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 1962 年出品的故事片，是讲 1946 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然不是部队电影厂拍摄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指出这部影片的问题：

“你们看，这里边就是这样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

座谈会就这样在上海开始了，按照江青的安排，前后看了 30 多部电影和 3 场戏。期间，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后来，陈伯达来到上海，偶尔也来看看。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由于不准记录，刘志坚他们只能下来后，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回忆，由陈亚丁追记，以免日后忘掉。

2 月 3 日，解放军报发表《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

此后，解放军报又于 2 月 9 日、2 月 14 日、2 月 18 日、3 月 2 日、3 月 23 日、4 月 5 日接连发表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各大军区领导人纷纷表态，各部队层层进行突出政治的检查。

2 月 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云松的文章：《田汉的〈谢瑶环〉是一棵大毒草》。这篇文章突破了彭真设置的不准谈政治问题的禁区。

2 月 3 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开会，讨论由批判《海瑞罢官》引起的问题。列席这次会议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姚溱，《红旗》杂志副总编胡绳、范若愚、王力，北京市委第二书

记刘仁、书记处书记郑天翔等。会上印发了许立群上报的7份材料：《北京六个报纸、杂志编辑部负责同志座谈關於〈海瑞罢官〉讨论的情况和问题》；《1月26日许立群给彭真的一封信》；《汇报关锋等同志四篇稿件政治性的提法》；《关于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的汇报》；《关锋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几篇杂文邓拓同志在一九六二年写的一篇杂文》；《关于〈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的材料》；《报刊发表参加演出〈海瑞罢官〉的演员的检讨文章》。彭真先让许立群介绍情况。

许立群根据彭真会前的特别交代，按照1月31日他写给彭真的信件内容汇报了几份材料的情况后。他首先肯定了一番当前这场学术大批判的成果，随后便转述存在的一些问题，他说：

“……目前的情况大致如此，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现在应该展开讨论，创造百家争鸣的空气，如若一谈政治问题，许多人就不敢讲话了……”

另一个中宣部副部长胡绳也附和道：“61年和62年都曾采用借古论今的形式，影射是可以的，但是具体指什么，很难说。”

许立群接着说：“还有很多问题不好掌握，戚本禹和关锋、林杰一直追问点要害的文章为什么不发表？我担心，发表后会对‘放’的方针有影响……”

“有些人反映，左派也不是没有问题，关锋1962年写的几篇杂文就有错误，应该批评。另外，《海瑞上疏》和《海瑞背纤》等其他写海瑞的戏是否都要批判？《文汇报》刊登了京剧演员谭元寿、马连良等人演海瑞戏的检讨，是不是其他演过海瑞戏的演员都要检讨？”

陆定一举了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犯了过火错误等例子，告诫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我们不能靠给人家戴帽子来解决问题，政治上戴帽子，是阿Q式问题，我们没有胜利，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康生则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吴晗的《海瑞罢官》是政治问题，要害在罢官，要联系庐山会议的背景来谈。……”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康生接着说：“这次斗争就是要把锋芒指向吴晗，要打击右派，依靠左派，培养左派理论队伍。”

他指着许立群问：“你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为什么那么有兴趣搜集左派的材料？关锋他们是左派，是我们依靠的力量，必须保护。你也写过不少坏文章嘛，是不是也应该把你当成右派？……”

彭真最后作了总结，他先是肯定了许立群、胡绳等人的发言，然后说：“现在有些文章火气大，妨碍自由讨论，是一个偏向，不能发展下去，要纠偏……”

“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吗……”

“目前还是要以‘放’为主。已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吴晗是根据毛主席1959年4月上海会议上提出要学习海瑞精神，并在《人民日报》向他约稿的情况下，动手写文章的。那个时候，庐山会议还未开呢。庐山会议是在上海会议三个月之后才开的，也就是1959年7月才开的，而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上，才罢了彭德怀的官。从时间上说，两个会相差几个月。虽然《海瑞罢官》这出戏的剧本，是在庐山会议之后发表的。但动笔确实在会议之前，这是事实。《海瑞罢官》这出戏上演之后，毛主席还把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请到家里做客，主席当面称赞马连良演得好，剧本也写得好。这些并不是凭我脑子里想出来的，而是从调查中来的。我认为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

“还有人要批判邓拓。邓拓是左派，他署名向阳生的文章是我叫他那样写的。邓拓同志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嘛，长期以来是坚定的。郑天翔同志对邓拓同志的情况比较了解，他可以证明这一些，你说是不是呀？”这时，他转过头问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

“是的，邓拓同志是一个坚定的左派，他是坚决拥护三面红旗的。”郑天翔连忙回答。

彭真又说：“为了‘放’，不要提庐山会议，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像郭老这样的人都很紧张了，因此，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

陆定一支持彭真的意见，他说：“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会有反复，一定要慎重。”

其他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最后,彭真说:“为了加强对当前学术批判的领导,我建议:成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许立群和姚溱负责,许立群任主任,将今天讨论的意见向政治局常委汇报。”

“同意。”吴冷西立即表示赞成,其他人纷纷表示同意,康生也未反对,只是强调了一句:“会议记录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会后,彭真将许立群、姚溱留下,对他们说:“你们今晚就不要走了,到钓鱼台,根据这7份材料,连夜整理一份汇报提纲。我让人安排一下警卫工作,不让别人干扰你们。一定要抓紧。《汇报提纲》要简明,要快。今晚一定要搞出来。”

“好的。”许立群答应道。

晚上,彭真让他的秘书给许立群、姚溱打电话,将他们二人唤到自己的家中,彭真向他们讲述自己对于《汇报提纲》的意见,两位副部长一边认真地听着,一边在小本子记下了要点。谈话进行了几个小时。

谈话结束后,他俩走出彭真的家门时,姚溱对许立群说:“这次谈得比较深,我们只照彭真一个人的意见写就行了,别人的意见就不要管了。”

“当然,我们宁愿在政治上犯错误,也不要在组织上犯错误,即使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还有个组织负责嘛。”许立群表示了赞同。

随后,他俩分别乘上自己的轿车赶回钓鱼台。

深夜23时许,彭真又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

“行是行,只是会上意见不集中,不知怎么写法好。”许立群说。

“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彭真停了一下,又道:“要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这样做比以我个人名义发表的好。”他再次强调:“要快,要快些写出来!”

“好吧,我一定尽力而为。”许立群答道。

第 25 回：赶《提纲》许立群彻夜未眠 示上方，一千人飞赴江城

许立群、姚溱没有辜负彭真的期望，经过一晚上的突击，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提纲》共分六部分，核心是第一部分，即“目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其他诸如方针、队伍、组织领导等，都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表述。它强调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要准许和欢迎犯错误的人和学术观点反动的人自己改正错误”。“对于吴晗这样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待历史和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在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各种学术理论的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如果最后还有不同意见，应当容许保留，以后继续讨论。”而第四部分则明确谈到“左派要互相帮助”。这里说的“左派”，包括吴晗、邓拓及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人，因此需要“互相帮助”。《提纲》还特别强调：

“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关批准”；

“左派学术工作者”要“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彻底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的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整风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增加免疫力、抵抗力。”

由于这份《提纲》是二月份写的，以后就被简称为《二月提纲》。彭真把《提纲》看了一遍，非常满意，立即叫打印几份，发给 2 月 3 日会议的参加者人手一份。同时向刘少奇报告，要求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

2 月 5 日，北京的天色阴沉沉的，凛冽刺骨的寒风，在华北平原呼

啸着，虽然临近立春，气温仍低至零下十几度。这天下午 15 时 30 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中南海听取彭真关于“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对当前学术讨论的意见汇报。

由于毛泽东还在武汉，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临开会前，彭真将《汇报提纲》送给每个常委一份，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匆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

会上，先由许立群和胡绳做口头汇报，彭真不时断断续续地插话：

“现在不敢写文章写戏是个问题，新华社每月收到文章很少，坏人不写是好事，好人不写就不好，范文澜、郭沫若都很紧张，他们写东西多，问题就多，但我们从政治上看，不批判他们。”

“有的人根本不研究学问，但批判起别人很带劲，借批判别人出名。学术批判要自己清理，别人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批判应当是同志式的，不要把别人当台阶使。”

汇报刚结束，刘少奇就问：“吴晗和彭德怀究竟有没有组织上的联系？”

彭真说：“怎么可能呢？吴晗是 1959 年 4 月应《人民日报》之约写的文章，彭德怀是在 1959 年 7 月被免的职，中间差了好几个月嘛。他们两人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上的联系。”

“这样吧，先吃饭，吃完饭，我们再研究，”刘少奇说。

当天晚上，刘少奇继续主持政治局在京的常委在中南海家中开会。

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少奇、小平同志，你们对这份《提纲》还有什么意见吗？”

刘少奇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说：“没什么意见了。”

邓小平一边抽着烟，一边说：“对这个《汇报提纲》，我表示赞同，现在很多人，不敢写文章，怕犯错误。戏也如此，只能演兵。电影有的基本是好的，也不叫演，这怎么行？……什么叫红专结合？学物理的不懂物理，只读毛著怎么叫结合？很多人忽视读书，批判冯定为什么要用 12 个星期？……”

冯定是北京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副校长，著名的哲学家，是北京大学唯一的一位由毛泽东亲自点名进入北京大学授课的，也是北京大学

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1964年7月,当文艺界大批判的浪潮涉及到其他领域后,作为哲学界的代表人物,冯定的两本书《平凡的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也受到了群众的批判。邓小平指的就是这件事。

大家对《提纲》没有再提出反对意见。

会议结束时,彭真请示刘少奇:“这个提纲已经在京常委讨论同意了,是否可以根据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

刘少奇马上回答说:“可以,就这样向毛主席汇报。”

2月7日,《二月提纲》以电报形式发给在武汉视察工作的毛泽东。

这天,王力给彭真打来电话说:“听说在送主席的文件中附了关锋、戚本禹和邓拓同志的材料?这事可要慎重啊。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

彭真一听慌了,赶忙说:“你提醒得对,我赶紧追回来。”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

后来,王力建议彭真:“还是要注意和关锋、戚本禹处理好关系,别搞得太僵。”

彭真说:“你讲得对,等我回来吧。”

2月8日早晨,北京西郊机场,一架专机已在那等候。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许立群、胡绳、田家英及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和龚育之等人共同乘机飞往武汉。一下飞机,他们就看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已在机场迎接。彭真等人没有停留,从机场直接乘车前往毛泽东住处汇报。

毛泽东住在武汉东湖的梅园宾馆,垂柳婆娑。乳白色的平房隐现在水杉马尾松、棕榈广玉兰、桃梅竹丛中。湖西,是湖北省委、政府的一片红砖灰粉建筑,以及党政军领导居住的茶港小区;湖南岸的珞珈、桂子,绿染岗峦起伏,金黄琉璃点翠,为参差不齐的高校房舍。碧波粼粼的东湖及周围的苍松翠柏给人一种幽静的感觉。午休后的毛泽东正在庭院里散步,他已经接到彭真要来汇报的电话,正在考虑如何对待这次汇报所要谈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不

能不慎重从事。



武汉东湖

几辆汽车鱼贯驶入宾馆。彭真带着五人小组的康生、陆定一、吴冷西以及胡绳、许立群、田家英等同志，来到梅园宾馆。

“主席，彭真他们来了。”秘书向毛泽东请示。

“让他们进来吧！”毛泽东点点头。转身返回屋里。

毛主席的秘书将彭真一行人领进客厅里，毛泽东从里屋走了出来，彭真立即迎上前去，问候道：“主席身体好吧？”

毛泽东和彭真握握手说：“好。”

接着，毛泽东又和康生他们一一握手。

在彭真他们坐定后，彭真开门见山地说：“主席，我们这次来，是想把提纲的内容，向您汇报一下。”

“噢，你们谈吧。”毛泽东说。

“许立群、胡绳，你们先介绍一下情况。”彭真仍然让许立群和胡绳二人先讲，自己在一旁插话补充。

当汇报中谈及“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时，毛泽东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郭老、范老当然要保护，但是，他们两位还是要在史学界工作，有个适当的自我批评表示为好。郭老和范老就不要批了，不过，还是要做一点自我批评，表示一点主动。”

谈到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时，毛泽东问彭真：“《海瑞罢官》问题和彭德怀是不是有联系？吴晗这个人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则马上做了否定的回答：“根据调查，没有发现他们有联系。”

毛泽东说：“我说过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去年12月，我就同陈伯达、康生说过，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说：“2月5号，我们在北京向少奇同志汇报的时候，也提到您的话。少奇同志说，没有发现吴晗跟彭德怀有组织联系……”

这时，毛泽东看了看彭真说：“这是康生向我讲的，是康生的发明权。”

康生急忙解释道：“不，不是我的发明权，是毛主席的发明权。”

毛泽东再次说：“吴晗文章的要害是罢官，这是康生的发明权。”

康生没有说话。

毛泽东又问：“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说：“吴晗过去是反蒋的，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也好，只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有点不满意。”

“邓拓怎么样呀？”毛泽东接着问道，

彭真回答：“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

“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再次问道，

“那他总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罢了官的人一边，不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边，可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在毛泽东巨大的威望面前，彭真不敢再坚持了，他婉转的回答说。

彭真停顿了一下，又说：“解放以来，我们曾经多次展开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但这些批判都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这一次我们要做政治结论……”

毛泽东打断彭真的話，缓缓地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绝不是匆促作一个结论就可以解决的。”然后接着

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讨论就可以放了吧？不同的意见可以‘放’出来，可以比较鉴别。你们可以放，让不同的意见放出来。”

毛泽东也作了退让。是啊，他知道，这不是一两个人的去留问题，而是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要让全党都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斗争。

许立群接着汇报说：“何明也写了不少坏文章，例如他在 62 年 88 期《中央宣教动态》上刊载的《从陈贾说起》这篇杂文就有严重的问题……”

“写点杂文有什么关系？何明的文章我看过，还不错。写篇把杂文讽刺一下也可以嘛。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毛泽东说。

彭真接着说：“我认为左派也要进行整风，警惕他们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这样的问题以后再说。”毛泽东依然这样说。

许立群又接着汇报，毛泽东没有再说什么。

听完许立群、彭真等人的汇报，毛泽东说：“好吧。关于我的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你们既然都同意搞，那就搞吧。不过，我不同意‘顶峰’和‘最高最活’一类说法，你们去上海的时候，顺道到苏州同林彪同志谈一谈。”

“我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王任重他们这次帮助做了些修改，主张发下去。我想再看看。你们的意见呢？”毛泽东又问彭真。

“我觉得还是发下去好，对全党都有教育意义。”彭真说

“那好吧，你们这次正好也帮助做做修改工作。”毛泽东说道。

“好的。”彭真回答说，接着又问：“这个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是不是写一个中央批语，请主席看过，发全党？”

毛泽东说：“你们去写，我不看了。”

下午三、四点钟，许立群回到招待所，高兴的对龚育之等人说：“现在好了，问题都解决了！《汇报提纲》主席同意了。只提了两点意见。一个是关于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毛主席说，两个月以后也做不了结论。一个是关于不要批评郭老和范老，毛主席说，他们两个还要在学术界工作，表示一点主动，做一点自我批评好。主席的精神是宽，对两边都是宽。”

从毛泽东那里一回来，彭真认为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常委对汇报提纲都没有提出异议，立刻让许立群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草拟了转发《汇报提纲》的批语：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党委，总政治部：

中央同意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将这个提纲发给你们，望照此执行。

这个提纲的内容，应当向党内主管学术讨论工作的同志，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同志传达并组织讨论。在讨论时，应当把毛泽东同志一九五七年三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作为学习文件。

中共中央

第 26 回：游东湖，彭真发《二月提纲》 上三线，寻“海瑞”再作逍遥

从北京去武汉的一干人没有谁再为《海瑞罢官》批判的事情操心了。吃完饭，他们三三两两，沿着湖边散步，漫谈，海阔天空，无边无际。业余时间，逛逛旧书店，转过珞珈山。王任重他们还请陆定一去看了八七会议的旧址。陆定一是八七会议的参加者，八七会议的旧址大体已经认定，当时还有些争议，要陆定一再去看看。其他人也跟着去了。陆定一到了那里，边看边忆，记忆不很清晰，房子的内外格局也多有变化，但还是可以确认就是这个地方。

1966 年 2 月 3 日，就在北京“五人小组”讨论通过《二月提纲》的同一天，毛泽东把他 1962 年 1 月 30 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送给王任重阅读，并提出：“请考虑加以修改。”

王任重阅后，从文字方面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于 2 月 4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把这个讲话“重新印发给县委一级，由县委组织公社党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学习”。

2 月 6 日，毛泽东在王任重的信上写了一个批语给彭真：“请商在京常委及康生、定一、伯达诸同志修改一遍，并考虑是否应中南局的要求印发给县团级同志看（只发中南局，作为试点，别地不发）。看来此问题很大，真要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且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王任重同志的修改是好的。”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彭真就地在武汉，找康生、陆定一，还有王任重、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一起来做这“修改一遍”的工作。彭真主持会。大家对于“只发中南局”，觉得不好理解，不好办理，认为像这样的文件，还是发全党。对于讲话稿连同王任重的修改意见，大家边读边议边改，主要是文字，也涉及内容。

原稿中有一段话：“去年六月十二日，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

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

龚育之在议论时提出:“毛主席那次讲了自己的哪些缺点和错误?要不要在这里简单说明?不然干部看了会说,毛主席都讲了不应当隐瞒,可是现在还是没有告诉我们。”

彭真看了看龚育之,沉吟了一下说:“就是讲高指标、高征购那些。”就没有再说什么,其他人也没有置理。龚育之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层次的文字整理工作,是个新手,因此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其他人也不便跟他解释什么。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客舍听取康生、田家英汇报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随后,吴冷西受在京常委委托,向毛泽东汇报外事工作。汇报时,他提到:“国际上对毛泽东思想有多种多样的提法,国内最近也有新提法,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活的马克思主义’,在京常委都不同意上述两个新提法,请主席考虑是否仍然按照1960年3月天津会议的提法,即一律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说:“外国人怎么说法,我们管不了,由他去,但我们可以仍然按照天津会议的决定办,林彪的两个提法都不妥。”

毛泽东指定彭真和康生离武汉时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说清楚这个问题。

当天,彭真从武汉飞到上海,陈丕显前去迎接时,彭真把一份材料交给陈丕显说:

“这是‘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给党中央起草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北京经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并专门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过的,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你和曹荻秋同志可以先看看,然后交给江青同志。”

陈丕显问:“魏文伯是华东局书记兼秘书长,是否让他也看看?”

彭真说:“可以。”

陈丕显和魏文伯、曹荻秋阅后,即在当天下午送给了江青,并告诉江青,彭真准备晚上同她面商。

当时江青正在和刘志坚他们开座谈会，也就是看电影。她翻看着文件，电影结束后，江青对刘志坚等人说：“我有些事，座谈会暂停几天，你们先休息休息。”

随后，江青找到陈丕显，责怪他：“你也没个条子说明和手续就把《提纲》送给我看。”

陈丕显转交的《汇报提纲》，江青虽然只是只简单翻看了一下，但已经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她立刻让陈丕显安排她赴武汉去见毛泽东。

刘志坚和李曼村也利用这段时间，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

彭真当天晚上没有见到江青，自然也没有听到她对《提纲》的不同意见。彭真将为中央草拟的关于转发《汇报提纲》的批语连同《汇报提纲》修改件送请政治局常委批转，却未将批语送给毛泽东审阅，而是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修改稿送给毛泽东。

2月12日，毛泽东在送去的七千人大会讲话修改稿上批道：“彭真同志：都已看过，照此办理。”

这天，中央加上批语，把毛泽东这篇讲话整理稿发到党内。也是这一天，中共中央同意彭真写的批语，正式批转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

这天，彭真在听取上海市委汇报时说：“《汇报提纲》是常委讨论过，毛主席同意了的，问题都解决了，也不需要跟你们谈了。”

张春桥提出：“《提纲》中‘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等提法是否还需要研究。”

彭真没有回答，继续他的讲话。第二天，2月13日，彭真让胡绳同张春桥谈话。

胡绳说：“春桥同志，我们不能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也不要联系庐山会议，这是毛主席的意见。”

“毛主席不是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吗？怎么能不联系到庐山会议呢？”张春桥反驳说。

“这是彭真同志要我对你讲的，我们还是要按中央的指示办嘛。”胡绳解释说。张春桥不说话了。

随后，彭真等人回到了北京，立即组织安排在全国传达讨论“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

17日晚,许立群打电话给彭真说:“明天就要开会传达《汇报提纲》,你看应该如何传达?”

彭真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道:“你按《提纲》讲,一切照《提纲》办吧,主席是同意这个提纲的。对吴晗的批判,不要联系庐山会议,不要提到彭德怀的问题,你就说吴晗是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罢了官的一面的……”

第二天,2月18日,许立群、胡绳召集北京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约80人开会,传达《汇报提纲》。会后,分四个组讨论,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被指定为第一组召集人,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为第二组召集人。

许立群在传达时说:

“毛主席完全同意《二月提纲》的方针。”

“主席说,还要宽些。”

“主席还说,能说他(指吴晗)是反社会主义的吗?”

随后,2月20日至28日,彭真又带着许立群和胡绳到三线参观去了。许立群在临走前对中宣部的同事们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让他们讨论讨论就行了。”

中宣部的人们也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了,彭真他们是去“三线”作“逍遥游”了。

彭真临行前,还没有忘记王力的建议,特别请关锋和戚本禹吃了顿饭。饭后,戚本禹给彭真写了封信,说过去对彭真了解不够,这次接触后改变了印象。他夸赞彭真有伟大的政治家的胸怀,等等。

是的,彭真也以为这次他又成功了,《二月提纲》批转全党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于是,让副市长万里出面安排吴晗,化名李明光,到昌平大东流村去搞“四清”。而邓拓在讨论《二月提纲》时,则当了“第一小组的召集人”。但是,彭真还有一件工作要做。他还没有心情和时间作“逍遥游”。

他赶到成都永兴巷7号,已被“罢官”的彭德怀就住在这里,他现在是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

见到彭真,彭德怀非常激动,连声说:“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还未等彭真坐稳，彭德怀就问：“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批判《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你别着急，我们五人小组搞了个《汇报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彭真将《二月提纲》递到彭德怀的手里。

彭德怀一口气看完并连连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讲话。不过，我的问题和吴晗的《海瑞罢官》有什么联系？”

彭真向他介绍了吴晗的情况，然后严肃地对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么？”彭德怀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着彭德怀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会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我坚持立场！”

这次三线行，彭真可以说是无功而返。

刘志坚和李曼村 16 日接到江青通知，重回上海，继续开座谈会。

2 月 19 日，江青对刘志坚和李曼村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座谈会开完了，刘志坚觉得，看了十几天的电影，听江青断断续续的讲了许多话，总得整理出来，回去好向林彪和总政党委汇报。于是他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一起，根据江青多次谈话的“追记”，逐段逐句进行了讨论，并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成《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这个《纪要》写了三个部分，约 3000 字。第一部分写召开座谈会

的经过；第二部分写江青在座谈中谈的“许多极为重要的意见”；第三部分写为了使江青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落实”，准备采取的措施。

20日晚，这份《纪要》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30份。

要不要把《纪要》送江青过目？刘志坚又陷于踌躇之中。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着她搞，不告诉她？要是给她一份呢，事先未跟她打过招呼，而且这份记录只是供汇报用的，她不一定会满意。怪罪下来怎么办？

他和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4人反复讨论，以为还是送一份《纪要》给江青为好，因为江青迟早会知道此事。于是，在21日，刘志坚把一份《纪要》交给了江青。

22日，刘志坚一行6人乘飞机路过济南，给住在济南南郊宾馆的林彪送了一份《纪要》，并简要地汇报了座谈情况。林彪听了汇报，表示满意，说道：

“这个材料搞得不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林彪如此一说，刘志坚心情轻松许多。23日上午，刘志坚跟其余5人一起乘飞机由济南返回北京。

飞机在北京机场着陆后，刘志坚刚走下飞机，机场工作人员就跑过来通知他：

“刘副主任，上海来了长途电话，让您去接！”

刘志坚闻言，立即一拐一拐的跑向电话间。他的腿在抗日战争时受过伤，成了瘸子。刘志坚进了电话间，拿起电话，一听，是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中说：

“刘副主任，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认为根本不行，歪曲了她的本意。没有能够反映她的意思，给她闯了大祸！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

电话内容无疑给刘志坚泼了一头冷水，好在从政数十年，已经经验丰富，他冷静的回答道：“噢，好的。”

江青的秘书接着说：“江青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另外，请你们也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

修改。”

这一突然变化，使刘志坚等感到意外。他马上给肖华挂了电话。当天下午，刘志坚一行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决定派陈亚丁去上海，因为每次谈话的回忆笔记是他整理的，由他去比较合适。

肖华再次关照：“江青要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有什么问题，回来再说。”

这样，陈亚丁在北京只逗留了一夜，第二天，24日，又匆匆再飞上海。这是他一个月内，第三次飞往上海。

第 27 回：改《纪要》，陈亚丁三飞上海 贯彻难，议《提纲》争执不停

陈亚丁返回上海后，张春桥立刻把他接到锦江饭店，商量修改《纪要》的事。江青见到陈亚丁就说：

“你来了，很好。我把你们搞的那个东西，请伯达、春桥推敲了一下，伯达有些意见很好，我要他写出来，他一会就来，一起商量一下。”

陈伯达到后，江青就主持讨论修改问题，陈伯达不愧为“理论家”，他拿出写好的几张纸，谈了修改意见，主要是两点：

第一，陈伯达说：“17 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 30 年代地下党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地认清解放后 17 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

第二，陈伯达又说：“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京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江青听后高兴地说：“伯达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要害，很厉害。这一来有些人就不好过了！”

陈亚丁根据江青的意见，连夜把陈伯达写的和张春桥改的，还有他根据“追记”补充的，改写在一份稿子上。第二天和第三天，又讨论过两次和多次修改。这次修改稿，题目仍叫《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结构仍分三个部分，但内容作了很大增删、改写，加进了许多座谈时没有谈过的东西。全文由 3000 字增加到 5500 字左右。

这次最重大的改动，是按照陈伯达的意见，对“文艺黑线专政”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修改稿在“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的后边，增写了“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 30 年代文艺的结合。

‘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的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中间人物’论、反‘火药味’论、‘时代精神汇合’论，等等，就是他们的代表性论点。而这些论点，大抵都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批判过的。电影界还有人提出所谓‘离经叛道’论，就是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革命战争之道。”这实际上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夏衍、秦兆阳、邵荃麟等人的一些论点。接着在下边还加了一段：“在这股资产阶级、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逆流的影响或控制下，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上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对 30 年代的文艺，也专门增加了一大段论述：“要破除对所谓 30 年代文艺的迷信。那时，左翼文艺运动政治上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组织上是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文艺思想实际上是俄国资产阶级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戏剧方面的斯坦尼斯拉夫的思想，他们是俄国沙皇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思想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左翼的某些领导人在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影响下，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这里又是不公开点名地点了周扬等人的“问题”。

根据陈伯达的意见，修改稿还增写了江青亲自抓样板戏的内容，全文近 900 字。

这次修改，还有一个重要的改动，就是将“江青同志极为重要的意见”，改为与会者的“共同认识”或“座谈的成果”；把落实“江青的意见”改成了落实“座谈会的成果”。

这一改动非常重要，江青尽管是毛泽东的夫人，身份特殊，但是她在党内没有担负任何职务，有些话，如果说“江青同志的意见”，别人会认为是她个人的意见，要是以中央军委这样一级组织提出来，其分量就大不一样了。

《纪要》稿修改结束后，江青把它铅印后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很重视，亲自作了 11 处改动。其中最为重要的改动是在原文“我们一定要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一句之后，毛泽东加了一句：“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而且，还再次批示“请陈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

3月10日，刘志坚按照江青的通知，再度和陈亚丁飞来上海。一见到江青，她就说：“你们给我闯了大祸。”

张春桥接着说：“因祸得福嘛！”

江青给刘志坚看了毛泽东对《纪要》的修改。于是，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刘志坚、陈亚丁一起，又对《纪要》逐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全文由5500字增加到10000字左右。这次的修改稿印出后，江青又送毛泽东审阅。

2月19日晚，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2月21日下午、22日上午，在长沙听取叶剑英、杨成武等人汇报军事工作。在汇报到全军总定额及其他军兵种等问题时，毛泽东说：“省公安部队拨归省军区领导，这个办法我赞成。单独搞一个公安部队，搞两套，这是从苏联搬来的，我从来不赞成。”

2月28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第407次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康生等出席，谢富治、林枫、叶剑英、杨成武、肖华、汪东兴等参加。会议决定：“经请示主席批准后，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城市可留一部分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具体问题，由杨成武同志和谢富治同志商办”。据此，中央成立了由谢富治、杨成武、李天佑、杨奇清、徐立清、李天焕组成的公安部队整编小组，负责提出整编实施方案。

也许是大动荡前的征兆，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邢台发生6.8级地震，8000余人丧生。当天晚上，正在天津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生活会的周恩来总理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行救护、救灾工作。第二天一早，即乘直升飞机赶往余震频繁的邢台灾区。

江青在上海组织召开军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这段时间，彭真组织的《汇报提纲》也在全党有条不紊的布置传达。随着《汇报提纲》的下发，由姚文元的文章引起的又一轮大批判高潮，逐步呈现出学术讨论的趋势，局面趋于平稳。然而，表面的平稳下面，正酝酿着更大的风暴。

在北京学术界贯彻《二月提纲》座谈会的小组会上，《红旗》杂志

社的关锋明确提出：“前一段的政治批判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请学术批判办公室的同志指出来。政治批判还让不让搞？能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二月提纲》的问题所在。

3月1日，林涧青和龚育之向许立群和胡绳汇报座谈会情况，首先就谈了关锋的质问。

许立群说：“肯定不能联系庐山会议，这是主席当面点头同意了的。”

胡绳说：“关锋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主席上一次谈话，说吴晗要罢官，这一次谈话，重新考虑，又说吴晗不罢官了？主席这样站得高。关锋这个同志，思想太偏狭。”

胡绳这话，有很大的分量，他是亲自听到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人。第一次是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谈话。那个谈话讲到《海瑞罢官》的要害在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胡绳、关锋都参加了这次谈话，许立群没有参加。第二次就是武汉这一次，胡绳、许立群都参加了，关锋没有参加。

胡绳还说：“按照武汉谈话的新精神，那四篇送审的文章，都得彻底改写。”

这天，在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的名义发出的《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中说：“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中央这样直接地抓学术问题，过去还不多，说明中央很关怀，并且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3月3日，许立群召开座谈会的召集人会。会上，关锋批评许立群：“许立群同志说，‘放’不是钓鱼。这种说法不对……”

许立群大声说：“我讲的话，可能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错误，如果是四六开，那就了不起。讲得不对的可以批驳。如果听到一点不同意见就蹦起来，那不就是‘学阀’吗？”

《汇报提纲》中提出“左派整风”，“警惕左派走上学阀的道路”，已经成为敏感的话题。此时，许立群又这样说，当然是话中有话。

3月8日，关锋又找林涧青说：“我的文章是根据毛主席的南方谈话写的，怎么不能发表呢？”

林涧青向许立群作了汇报，许立群有恃无恐的说：“他有一个‘南方谈话’，我也有一个‘南方谈话’！我那个‘南方谈话’还在他那个‘南方谈话’的后头呢！”

许立群接着说：“关锋自以为通天，自以为一贯正确。哪有什么一贯正确！你关锋一贯正确？你有个《从陈贾说起》。你邓拓一贯正确？你有个《专治健忘症》。我许立群一贯正确？我说过包产到户可以考虑。都有错误的时候嘛！”

陈伯达参加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修改工作，因此，对毛泽东的思想了解得更为透彻，他负责的《红旗》杂志没有受《二月提纲》的太大的影响，3月2日，依然发表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尹达题为《必须把史学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这篇文章也曾被中宣部压了一年半。3月25日第四期《红旗》杂志又刊登了戚本禹、林杰、阎长林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红旗》杂志社工作的关锋敢在中宣部组织的座谈会上与许立群公开争论，其背景也就可想而知了。

上海的张春桥对《二月提纲》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这份提纲明显是与毛泽东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本意相悖的。但由于这个提纲是由中共中央发下来的，又是经毛泽东看过的，究竟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还是彭真有意曲解毛泽东的原意，或者就是反对毛泽东，张春桥一时还没有把握。而且，彭真作为当时权倾朝野的中央领导人之一，他会反对毛泽东吗？他为什么要反对毛泽东？有什么根据说他反对毛泽东呢？这些问题不搞清楚，就无法把握对《二月提纲》的态度。如果彭真是反对毛泽东的，积极地落实《二月提纲》肯定要犯错误；如果是毛泽东改变了态度，《二月提纲》就是毛泽东的意见，那反对《二月提纲》就是犯错误。当然，张春桥觉得，《二月提纲》应该不是毛泽东的本意，这里面一定另有隐情。上海市委没有把握，让宣传部部长杨永直将上海传达讨论《二月提纲》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汇总后，去北京找中宣部请示汇报，以便决断。

杨永直到北京后，找到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胡绳等人，反复询问《二月提纲》中提到的“学阀”是否有所指，均不得要领。

许立群将杨永直提出的问题作了认真的记录，答应请示后即给答

复。杨永直觉得也只能如此了，准备返回上海。

3月11日，许立群将杨永直提出的问题向彭真作了汇报。

许立群说：“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真：“你给杨永直打电话，就说我彭真说的，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立群又问：“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

彭真：“为什么？”

许立群：“因为有大腿……”

彭真：“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立群：“杨永直还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真生气地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发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

然后，又怒气冲冲地补充说：“你问他们，上海市委的党性那里去了！”

许立群立即将彭真的答复用电话转告了杨永直。

当杨永直把电话内容向张春桥报告后，张春桥清楚了，他认为：“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的矛头是指向姚文元的，也是指向毛主席的……”张春桥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江青。

1966年3月11日，林彪给“工业交通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会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思想，才能保持旺盛的革命干劲，才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毛泽东思想，反映了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劳动人民自发地产生的，而是毛主席在伟大的革命实践基础上天才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是综合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经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28回：再批判，罗瑞卿实难承受 三一七，第一次杭州会议

罗瑞卿按照中央的要求写检讨。第一篇检讨交了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行，认为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罗瑞卿实在检讨不下去，邓小平又来做工作：

“你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罗瑞卿觉得这样还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看看书，想想究竟是怎么回事。

但是，好景不长，2月22日，遵照邓小平指示，杨成武陪同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关于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准备并听取指示。二人汇报说，准备召开小型会议，面对面地批判罗瑞卿的问题。叶剑英汇报了会议领导小组的组成、会议的开法和主要解决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无组织纪律、个人主义思想作风三个方面问题，并做出结论。杨成武报告了2月上旬在广州出席军委第51次常委会议的常委对罗瑞卿问题的看法和意见。毛泽东表示同意。

3月1日，林彪指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其他问题甩开，集中力量开好这个会。肃清党内的危险分子，去掉军内、党内的大炸弹、大地雷。”

3月3日，邓小平和彭真约见罗瑞卿，告诉他：“关于政治挂帅问题，军队政治工作会议对你反映很强烈，常委考虑要开个会，彭真报告主席，主席说，他考虑也要开个会。会议将于明天开始。你可以参加。”

邓小平担心罗瑞卿经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激烈场面，提醒他说：“我对挨斗争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

邓小平此处所说“挨斗争”是指在中央苏区他因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被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而挨整。

第二天上午，在邓小平主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在怀仁堂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以及罗瑞卿本人，共42人。

据参加此次会议的《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的记录，邓小平说：“小组成立会，开张，还不是正式进行工作。小组42个人。为什么成立小组，为罗的问题。”

“12月中旬在上海谈了这个问题，根据主席指示，背靠背的方法，罗没有跟大家见面。常委指定恩来和我与他谈，把会议情况告他，要材料看，没有记录。这次会议就有记录，上海会议个人也不搞记录。开始讲了五点，常委、主席说的，一个是问题性质严重的；二是区别于彭黄；三是一分为二；四是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五，主席说有内疚，要负责任。常委同志说，书记处说，也有责任。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察觉，感到有责任。告诉了罗。罗对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见，主要是对抗林总、政治挂帅、封锁，与老总的关系。有很多理由说不是事实。即使那方面的问题不说，罗在五个方面有错误，一是关系问题，二是作风问题，三是思想意识问题，四是工作做得不好，五是组织纪律。这五点，每点都承认有缺点，但都有辩驳。在上海，常委、主席决定，不谈上面那问题，就这五点，担任军队工作不适当，多方面的工作不适当，同志意见也很多。方法是调离军委系统的各项职务，罗本人写了封信，后来发了个通知，没有讲任何理由。

这问题不能说已经完了。上海三个小组分别进行，但是没有完。常委、主席指示周、邓、彭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帮助罗认识错误改进错误。在上海说过，还有谢富治、陶铸、李井泉也说过。回北京后，彭真、富春、恩来和我都谈过几次，帮助他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军队的同志传达了这个问题。政工会议势必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很强烈。罗也觉得不是如大家讲的那么严重，总觉得有出入，实际上带委屈的情绪。这个问题怎么办？根据党内向来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讲清楚嘛。罗区别于彭黄，彭黄的问题也采取这个态度，对王明采取这个态度。”

这里的“彭黄”是指彭德怀和黄克诚。

邓小平说：“可允许同志们把对罗意见讲完，也允许罗把自己意见讲出来。最后怎么样，这总有一个统一的看法，中央做出自己的

决定。”

“还背靠背就扯不清楚了，”“不如花一点时间，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在主要问题上搞清楚，枝节问题、无关紧要的问题，扯多了没有意义，特别是对方针、原则性的问题，大家要扯清楚。根据常委的讨论，向主席报告了，主席同意，考虑需要两步，一步上海式，一步是在一起谈一谈，包括各方面的负责同志，各军区都有人，说清楚对军队的工作也有积极的作用，对毛泽东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有益处的。”

“实事求是，对罗也是一看二帮，任何人准许革命，允许他们申辩。”“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不同意就不同意，党从来不强制哪个人承认错误。”

“42个人小组，并不是哪个为一方，罗也是小组成员之一，有话就讲。”

“会议的进行，中央决定由彭、叶、我三个人主持会议领导小组。我们事情多，到外面去跑，总理要出去，不能靠我们天天搞。另外成立工作小组，叶、谢、肖、杨、王、廖、刘共7个人。叶领班。我们有空就听听汇报。”

邓小平说的三人小组，由邓小平任组长，组员是彭真和叶剑英。由于邓小平、彭真不能经常到会，军委还设立了一个7人会务组，叶剑英兼组长，成员有叶剑英、谢富治、杨成武、肖华、王新亭、廖汉生、刘志坚。

邓小平继续说：“已经发了十个文件，看一看。开始有些同志讲一讲，领个头，然后罗讲一讲，停一两天。两面的意见提出来，大家好议。”

接着，叶剑英说：“会议的指导思想，小平同志讲得很清楚，我们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向罗提出意见”，“主要抓大的问题，枝节问题扬弃掉。这个问题解决，对罗是教育，对我们建军有非常之重大的意义，对全党全军的意义。希望罗真诚地站在党的利益上来，我们不是个人的意见，个人的恩怨，要抓住原则的方针。”

彭真谈了海军肖劲光、苏振华和空军刘亚楼的问题：“关于肖苏的问题，与主席交换了意见。海军工作是有缺点的，这几年有改进，领导同志有不同意见，这是另一个范畴问题。肖是个好同志，工作中有问

题是另外问题。苏是好同志，彭黄问题是站在中央方面的。苏与罗不是一个问题，工作问题是另外的问题，海军的工作是另外一个问题。与林总商量过。

刘亚楼的问题，从一生来看，是坚决执行主席的路线的。个人毛病相当大，后来有一段罗、刘之间不是没有问题的，一度受了骗上了当，最后向党报告。空军工作总的来说是好的，也要一分为二。吴法宪是个好同志。”

贺龙说：“这个人很坏的，什么怪事都可以干得出来，林总和中央的安全要注意。他在公安部搞了什么，要防止暗杀，主席指示很重要，看得高，看远，看得深，主席的话是灵的，要大大怀疑，防止出事。他的阶级本质是农奴主，在公安部就有问题。贺说不应让他搬回去，怕他灭证据。（他现在要严看）要儿子学射击，家里有26个电话机子。还有一个无号码的机子，十几条枪。总参、总政要抓警务工作，特别是林总的安全。”

肖华说：“这个人是没有改造的大地主。有些枝节问题不要在会上讲，重要问题是突出政治，组织纪律，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讲的问题，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的态度和立场要非常明确，不能有任何自由主义，不能有任何的幻想。这个人是个纸老虎。戳穿了就是这么回事。他讲得不对头，可以插话。几个主要发言，其他同志可以补充。有些可以从正面说明，有些可以从反面说明。”

叶剑英：“揭露这件事是空前的，这件事的危险也是空前的，事情的恶劣性质也是空前的。公开在林总面前要国防部长，病人要像病人的样子，不要挡路啊！我是当接班人拥护的，林告我后，我对他的认识一百八十度转弯。这种人拿了军权就要拿党权，已经是书记，副总理，还要什么，这是大地主的集中表现。要用这件事情教育全党全军，要靠四十二条柱子撑着。”

叶剑英说的“四十二条柱子”是指参加中央工作小组第一阶段会议的42人，包括罗瑞卿本人。

叶剑英继续说：“要把这个仗打好，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三个主题，其它问题就不搞了。材料要一件件落实，做到无懈可击。要明瞭罗的本质，明瞭罗的事实，还要明瞭中央的意图。主席说，搞这种事情

的人，总有一伙人，刘、杨、杨、肖四个人经常去。”

叶剑英这里说的“刘”应该是指刘亚楼，肖应该是指肖向荣，二杨不知所指。

叶剑英说：“不可能希望他会好转，这不是一般性的批评自我批评。这个人不能拿枪杆子，也不能做单独负责的工作，只能在党和群众监督下做些具体工作。要看透他的本质，要到劳动中去改造。要狠狠地斗，对这种人就是要残酷无情，他对我们、对林总残酷无情嘛！我们自己有了错误，就作自我批评。通过自我批评揭发他更有力，搞得才深。”

聂荣臻：“这个人的弱点，长期以来看得很清楚，过去谅解，现在不是作风问题，他自己不舒畅，我想找他说，说不进去。”

“我们按党的组织纪律办事。对罗丝毫不能存在幻想，丝毫不能让步，让步军队就会变色，适当时候要做出结论，将来下放不能到大三线。不要看他的表面，要看到他的本质，他是危险人物，要防万一，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陈毅说：“到一定时候要面对面的斗争，要搞突出政治，两条路线的斗争，第二伸手。”

刘伯承：“对这个人不要低估了。”

徐向前说：“这是个危险人物，林总不在话下，我们更不在话下。专门出风头，到处演讲。”

这次会议改变了上海会议“背靠背”的方式，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罗瑞卿也天天出席。

当天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当罗瑞卿来到会场时，大家对他形同路人，没有一个人上前同他打招呼。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即和李富春去“三线”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后来他自己说，是有意逃避了。

叶剑英首先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和要求，要求罗瑞卿主动交代问题和深刻检讨，并要求其他与会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还规定要对会议的内容保密，任何人都不准外传。

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

“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瑞卿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有一条

是一条，是三分不讲成七分，是七分不讲成十分。”他还针对在会上有些人表现得很激动的情况说：

“现在慷慨的人，将来冷静下来是会后悔的，人在火头上和冷下来的时候不一样。冷下来时，人们还想说什么，很难说。”

但是，罗瑞卿仍然没有估计到，会议对他的批判斗争竟是那样无情和残酷。

在第一天的发言中，以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发言对罗瑞卿的震动最大。在发言中，许光达对罗瑞卿在延安的一些言行进行了揭发。罗瑞卿对此很吃惊，也很生气，想对质，叶剑英没有同意。

当罗瑞卿听到揭发他擅自组织大比武，没有向中央报告时，他申辩说：“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

但是，当有人当场质问他：“是哪一天写的？”他一时哪里想得起来。让秘书给查，秘书此时也要和他划清界线，不给查。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

有人揭发罗瑞卿在抗大任教育长时，作风霸道得很，“为此主席到抗大去开座谈会”，在学校工作的谭希林、张爱萍、王智涛、韩振纪等人对他意见很大，说他高高在上，他的马吃的马料比教员伙食还高，并说罗瑞卿常往女生队跑，马掌都换了几副。会后有人提醒发言人说：“你老兄嘴上没站岗的，那时林总是校长，提议罗为教育长，你是不是说林总护短呀，你是不是借古讽今呀？！”

会议的第二天，叶群从苏州给吴法宪打来电话，问他发言了没有。吴法宪说：“没有。”

叶群叫他赶快发言，同时在电话里再一次重复了上海会议时所讲的“四条”内容。她说，当她再次去刘亚楼那里核实这“四条”内容时，有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在场。因此，她要吴法宪立即去找翟云英了解情况，还嘱咐他带上秘书，准备在一旁作谈话记录，以便作为旁证。她还叮嘱他，谈完话，一定要翟云英在记录上面签字，然后把这个材料立即送到苏州林彪那里。

吴法宪带着秘书找到了翟云英。没想到翟云英说，她在上海没有听见刘亚楼说到有关“四条”的事情。但后来她又说，当刘亚楼和叶群谈话的时候，她曾经看到刘亚楼伸出过四个手指。这次谈话，吴法宪

叫秘书作了记录，经瞿云英签字以后送到了苏州。

会议期间，叶群经常同叶剑英、杨成武、肖华保持联系，了解会议上的发言情况。

在叶群的再三催促下，3月12日，吴法宪和空军政委余立金都在会上发了言。吴法宪在会上扬着那张胖脸，指着罗瑞卿的鼻子怒斥道：“你就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你准备……你……你必须再次做出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吴法宪发言后，很多人认为他是放了一个“原子弹”。

当天，罗瑞卿作了长篇检讨，他在检讨中主要谈到了大比武问题和反对突出政治的问题，承认“这次大比武是我个人擅自决定的。现在看来，重开一次那样兴师动众的南京现场会议，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且把军委主管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大比武带来的严重恶果，刘志坚同志归纳了八条，张宗逊同志归纳了四条，全军比武资料上归纳了十条，邱会作同志特别讲了经费、物资、弹药的惊人浪费，在军内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检讨中，罗瑞卿还谈到了对叶剑英等老帅不尊重等问题。

虽然他对问题上纲很高，什么“严重的路线错误”、“反党性质的错误”等等，说：“我的错误是十万分严重的！有的同志说是犯罪，也不过分，党给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同志们这次所揭发的大量材料，我如果还不觉悟，不在真理面前低头认罪，就太不像样子了。”还表示“请求党重新宣布撤销我有关军事工作的一切职务，撤销我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把我放到领导强的基层单位去改造我，考验我！……”最后大声说：“请同志们继续批判我！揭发我！”

但是他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篡军”等帽子，均不认同。

罗瑞卿的检讨依然没有通过。有人站起来说：“罗瑞卿，你讲的这些都是‘小鬼’，你要把篡党篡军这个‘大鬼’亮出来。”会议要求罗瑞卿重新检讨。

罗瑞卿离开了会场。大会继续开，并自由发言。有的人提出，要罗瑞卿到会，面对面的接受批判，有的人对罗瑞卿的发言则加以赞扬。

接着，叶剑英讲话。他说：“罗的发言比在上海有进步，承认了错误，也有些自我批评。对罗的发言，要表示欢迎的态度。……对罗还是不搞面对面的批判，不到会也不妨碍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从 12 日以后的几天里，大家纷纷发言批判“四条”，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罗瑞卿的“野心”。会议的气氛较之“上海会议”更加紧张，与会者的情绪也更加激烈。对罗瑞卿的揭发和批判已从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上升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党篡军的高度。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出来了。例如：说罗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猫踢了一脚，大声说：“走开！”

而且，还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妻子、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还提出，坚决要求开除罗瑞卿党籍。

在党内斗争中一直是紧跟毛泽东斗争别人的罗瑞卿，真的站在被批判的位置上，面对昔日的好友、同事、部下对自己无情的批判、揭发和斗争，他无法承受，他的头脑快要爆炸了，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而且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他，他感到太难受了！

最让罗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本来林彪说罗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罗瑞卿还能顶得住。因为他觉得毛泽东是最了解他的，这一切一定是林彪告的状，毛泽东是会把这些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会议时，毛泽东就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我。”还讲“没有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可是现在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尤其是“反毛主席”的罪名更是他无论如何接受不了的。罗瑞卿生性刚烈，参加革命以来没有经受过这种侮辱。要他承认反对毛泽东，那真是生不如死。

他又听了两天发言，揭发牵涉的问题越来越多，所列举的材料也不少，但罗瑞卿此时手中无材料可查，又无法申辩。要他作第二次检讨，他实在写不出来，于是，给 7 人小组写了一个正式报告，请求会议发言结束后，停开若干天，给他写检讨的时间。

7 人小组的书面答复很快就回来了，说不行。会议一定要在两个礼

拜左右结束，要求罗瑞卿一边听会，一边准备检讨提纲。白天没有时间，可以晚上在家里准备等等。叶剑英把大会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和梁必业副主任的记录稿，及罗瑞卿爱人写给林彪的信等都给了罗瑞卿。

至3月16日，与会者发言批判罗瑞卿的已有23人。3月17日，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

批判罗瑞卿的会议在北京开得风风火火，江青在上海对那个座谈会《纪要》的修改工作也紧锣密鼓的进行。3月14日晚，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因为陈伯达同志乘的是下午四点多的火车，我托他带给你的那份座谈会纪要，没有来得及看，他走后我才发现没有加红杠。他那份大概没有来得及加。现送上加红杠的一份，请示。双红杠是你改的，单红杠是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和我一块商量着改的。好处是有些问题比前一次说的充实一些，缺点是长了些。此外，也恐有不妥之处或不够策略的地方，请指出并修改。我只是不安，怕影响你的睡眠。志坚同志明天回京，亚丁同志尚在这里等。你不要赶，他们的创作会议四月初才开。”

毛泽东收到江青的信和稿子后，再次对稿子作了修改。并于3月17日对江青的信和报送的《纪要》稿作了批示：

“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同志的意见。”

3月16日，刚从邢台回到天津的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秘书从杭州打来的电话，通知他们到杭州开会。

3月17日下午17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杭州刘庄毛泽东住处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和彭真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及中共六大区书记，还有主管文教宣传工作负责人康生、陈伯达、吴冷西等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一些军区派人参加。到会人数由42人增至95人。邓小平没来，他和李富春、薄一波等人，视察崇山峻岭中的三线建设去了。中央常委中，陈云也没有出席。

这天，主要谈罗瑞卿问题。

第 29 回：回首望，将军一跳身名亡 匿名信，陆定一又出问题

3月的北京，大风蔽天，风沙遍野，天昏地暗。从外面往室内看，连日光灯的灯光都变蓝了。罗瑞卿的心情就和这天气一样，灰暗到了极点。

3月18日，这天例外的没有刮风，但天仍是阴沉沉的。上午刚吃完早饭，会议打电话通知罗瑞卿说：今天会不开了。

难道会有什么转机？罗瑞卿苦笑着摇摇头。战时，打完一仗就要进行休整。休整完了，还要再打仗。会议停开，无非是一种休整。下一次开会还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羞辱会降临他的身上。他怕开会，因为这种会让他有口难辩。但是，此时他更怕不开会，因为开会是大家批他一个人，不开会就更糟，因那意味着会议的主持者们又在研究下一步的计划，意味着对他的批判又要升级。

4个月来，罗瑞卿的脊背上已经承受了太大的压力，随时都可能倒下，他尽力支撑着。如果说，罗瑞卿一直期望着向毛泽东说明事实的真相，但是从这一刻起，从他接到再次暂时休会的通知这一刻起，他却忽然明白了，这一切是不可能的。不是因为事实真相无法替他辨清，而是他似乎感到是那些关键的人物根本不愿意承认这些真相。

这真是一种悲惨的经历。虽然他的感情仍然眷恋着那些他信仰了一辈子的东西，但是他的理智却指着活生生的现状告诉他，那一切都破灭了。他的灵魂的支柱，他的精神的殿堂，他赖以立脚的基础突然之间都哗啦啦地坍塌下去，变成一片废墟。他奋斗了一辈子的东西忽然变得无法理解。他一生中最珍爱的一切忽然变得面目狰狞。生命就是这样在一霎间失去了意义。他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毫无希望。此时，种种屈辱、冤枉统统涌上心头，他有口难辩，感到已陷入无可名状的痛苦深渊，他突然想到了死。想求得永久的解脱。除此之外，别无出路。”

郝治平看见罗瑞卿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面，就走进去跟他说：“怎么搞的，看东西也看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住，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罗瑞卿说：“我也是这个样子。”

郝治平想让罗瑞卿松一松心，就对他说：“现在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

罗瑞卿对她说：“你觉得那个书好，你就去看那个书吧，我一个人坐在这里想一想。”

郝治平拿着书到隔壁去了。

看到郝治平走出房间，罗瑞卿伏在桌子上写了一张字条。随后，将这张字条放在抽屉里，便到公务员房中取安眠药，尚未将药片从药瓶中倒出，公务员回来看到了，他又把药瓶放回原处。高岗自杀是他负责料理的，他很清楚，公务员要是反映上去，更不得了。于是又回到了郝治平的房间。此时郝治平还在看书，他深情地看了她一眼，说一句：“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便走进卧室，脱去外衣，换了一身洁净的睡衣，然后轻轻地走上了通往这座三层楼的顶层的楼梯。

顶楼是储藏室，很少有人来，到处都积满了灰尘，有一扇窗户通往顶楼的平台，他推开小窗，高大的身躯费力地钻了过去，然后从三楼纵身跳下……

郝治平听到屋外有人喊：

“跳楼了！”

“快来人！”

“叫救护车……”

她心想不好，赶紧往楼下跑。当她跑到楼下院子里的时候，救护车已经开进了门。

昏迷不醒的罗瑞卿被送到了北京医院，经过检查，他的肋骨断了两根，因为是两脚朝下直着落地，180多斤的重量都压在两条腿上，两个脚跟骨粉碎性骨折。

此时，五内俱焚、孤立无援的郝治平跟着人们把他送往三楼，迎面碰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叫住郝治平对她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这几

条对罗瑞卿也适用,请你转告。”

心慌意乱的郝治平一边答应说:“噢,”一边往楼上走。汪东兴又追了几步对她说:“你还是早点回家吧,我还有事要找你谈。”

郝治平答应着,还是先来到了罗瑞卿的急救室。她等到罗瑞卿慢慢苏醒过来,立即把刚才汪东兴说的话告诉了罗瑞卿。但是,罗瑞卿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只是对郝治平说:“我的抽屉里有东西,是给你的。”

汪东兴见到罗瑞卿的秘书傅国祯,对他说:“你是老秘书了,你要注意,防止郝治平自杀!”

下午15点多钟,郝治平看到罗瑞卿的情况平稳一些了,就赶回家。她惦记着抽屉里的东西。

回到家里,汪东兴已在那里等候。看到郝治平,他又把上午讲的那三句话说了一遍,然后就对郝治平说:“先去吃饭吧。”

郝治平摆了摆手,她哪里还有心情吃饭。

汪东兴见此情景,就对她说:“那你先坐会儿。我上楼看看。”

郝治平突然想起罗瑞卿说的放在抽屉里的东西,就说:“我和你一起上去。”

汪东兴阻拦说:“你就不要去了……”

郝治平不同意,她说:“我就是要上去看看,这有什么关系吗?”一边说一边就向上走,走到三楼的楼梯口,汪东兴又拉住郝治平,说什么也不让她上去。是呀,毛泽东让他转达给罗瑞卿的话,是要罗瑞卿知道,他毛泽东还没有把罗瑞卿看成敌人,还是要用他的。希望他能经受住这次考验,不要做“傻事”。结果汪东兴还没有转达到,竟出了今天这件事,万一毛泽东追究起来,如何是好?

郝治平以为只是组织上对罗瑞卿的物品例行检查,只好作罢,站在楼梯口等着。

汪东兴等几个人上去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话,下来后,就坐上汽车走了。郝治平赶紧上楼,跑到罗瑞卿的书房,来开抽屉,急着找罗瑞卿给她留的东西。可是翻了几个遍,什么也没有。

郝治平跑下楼问秘书:“罗瑞卿在抽屉里给我留的东西呢?哪去了?”

“这……这……”秘书支支吾吾得说不出来。

“你说话呀！哪去了？”郝治平心急火燎的催问着秘书。

“我……”

“是不是你们拿走了？啊？说呀！”郝治平大声的逼问。

“我……我……我上交了。”秘书嗫嚅的回答说。

郝治平一听，更急了，她大声地喊道：“为什么？为什么要交上去？那是给我的东西呀！”

“这是组织上的规定。”秘书说。

“那也要给我看看呀！为什么不给我看？啊？我一定要看看！”郝治平坚持着。已经疲惫了一天，心力交瘁的她，此时内心更是上下翻滚，说不出来的滋味。

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见此情景，没有办法，只好向上边汇报。经反复商量，最后终于同意将罗瑞卿给郝治平写的字条拿了回来。

他们对郝治平说：“这就是罗瑞卿给你留的字条。”

郝治平一听，冲过去就要拿。工作人员赶紧将拿着字条的手缩回身后说：

“你别急，你别急。字条是拿来了，但是不能给你。你不能碰。我们拿着，你看。”

“行！行！”郝治平答应道。

工作人员展开手中的字条，只见上面写着：

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

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这是罗瑞卿写的那封绝命书。郝治平此时已经心碎了。

京西宾馆批罗会议的3人小组决定由肖华到医院探望，罗瑞卿对肖华说：“揭发我反对林总，真是天大的冤枉，你把我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一点我反对林总的东西。”

3月18日，杭州会议继续进行，毛泽东又问：“小平来了吗？”

秘书说：“回电报了，在大山里，一下子出不来，要走好几天才到飞机场。”

“那就算了吧。”

在回顾党内斗争历史时，毛泽东说：“我在去年九、十月份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时，专门讲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们怎么办？也不要紧，造反就造嘛，整个解放军会跟上造反吗？”

谈到学术批判问题时，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要打倒什么翦伯赞呀，侯外庐呀等等一批才好，不是打倒多了。这些人都是资产阶级、帝王将相派。”

谈到编辑《毛选》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我也没有写什么，不如第四卷。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

谈到是否参加苏共二十三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去不去参加，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我们不去，旗帜鲜明，不拖泥带水。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目前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

这时，秘书进来叫彭真出去接电话。过了一会儿，彭真回来向毛泽东汇报：“罗瑞卿跳楼，把腿摔坏了。”

毛泽东惊讶的问：“为什么跳楼？”而后，似乎又若有所悟的讲了一句：“真没出息！”

是呀，他知道罗瑞卿性格刚烈，担心他会做出类似于高岗的事情来，特意还关照过邓小平和汪东兴，要注意罗瑞卿的安全保卫工作，结果还是出事了。事情还没有结果呢，自己先挺不住了，毛泽东觉得罗瑞卿真是枉费了他的一番苦心。

大家知道罗瑞卿跳楼的消息，一时群情激愤，纷纷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或批判他自杀的行为。声讨之声不绝于耳，情绪一边倒，与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上海会议”时，大部分人还是被动地听军队工作的一些人员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这次则是纷纷主动搜寻、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光听会上的揭发，罗瑞卿的问题就大了。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此时的毛泽东，即使还想对罗瑞卿留有余地也难了。

叶剑英借用辛弃疾《贺新郎》吟道：“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万里，故人长绝。”

这天的会议结束前，毛泽东突然转向吴冷西，批评说：“吴冷西、胡乔木，我看你们只是半个马列主义者，半个三民主义者。是不是？你们自己作结论，算不算马列主义？”

“《人民日报》登过不少乌七八糟的东西，提倡鬼戏，捧海瑞，犯了错误，要从错误中得到教训。我过去批评你们不搞理论，批评过多次。我说我学蒋介石，他不看《中央日报》，我也不看《人民日报》，因为没有什么看头。你们登学术研究的文章是我逼出来的。你们的编辑也不高明，登了那么多坏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

“吴冷西，我看你是半马克思主义，三十未立，四十半惑，五十能否知天命，要看努力。要不断进步，否则要垮台。批评你是希望你进步。我对一些没有希望的人，从来不批评。

“不犯错误的报纸是没有的。《人民日报》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可能以后还会犯错误，说从此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错了就改，改了就好。《人民日报》还是有进步，现在比过去好，我经常看。但要不断前进。当然，你们有你们的困难，你们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是‘公共汽车’，大家都去挤。中央给你们权力，对有问题的稿件，你们有扣压的权力，不管是谁看过的。解决知识分子成堆的问题，办法是要多下去，要蹲点，多接触实际，参加‘四清’是个办法。《人民日报》要考虑打仗的时候怎么办。打得稀烂，你们还要出报，那时候怎么出？”

大家听着，谁也不敢说话。

毛泽东难道仅仅是在批评他的两个秘书？应该不是。大家在心里猜测，都互相试探一下，了解一些情况，但是谁也不主动，生怕不慎，又卷进一个新的旋涡。陶铸向来以敢讲话著称，这次也很谨慎，没多说话。

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吴冷西的心里是七上八下的，自从他主持《人民日报》工作后，一直小心翼翼的，生怕犯错误，结果还是出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看见周恩来走在前边，赶快追了过去：

“总理，主席这次批评很重，我什么时候好好检讨一下。”

周恩来劝慰说：“不光是批评你，也是对我们说的。”

虽然周恩来这么说，吴冷西心里还是不踏实。回到西冷饭店，他又找彭真，觉得彭真一直是抓这项工作的，又经常主持中央工作，也许能帮助指点迷津。哪知，此时的彭真已经感觉到情况不对了，毛泽东的矛头很可能是对着彭真来的。彭真说：

“主席的批评不仅对你，也是在说我们。以后工作中多注意吧。”

虽然彭真和周恩来都是在宽慰吴冷西，劝说的话也几乎是一样的，但两人此时的心情和想法却是大相径庭。

随后，杭州会议公布了杨尚昆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装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二是把大量的机密的文件和档案擅自提供给别人抄录，严重地泄露党的核心机密。

私设窃听器，是指 1961 年的“窃听器案件”。1965 年 10 月，又发现中央办公厅下辖的中央档案馆有“失密”问题。两事虽相隔 4 年，但账却合起来一起算。杨尚昆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的神秘面纱在中央上层彻底揭开了。

据公安部原副部长凌云 1980 年对曾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说，这次杭州会议后，中央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由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带着，到上海、杭州、武汉、广州等地进行秘密突击检查，没有发现窃听器等问题。

他们在杭州的刘庄、汪庄、南屏和谢家等几个地方，包括毛泽东的座车，都进行了严格的检查，未发现任何问题。随后，要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签字。江华在签字时说：“这支笔有千斤重啊！”“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接着，杭州会议又公布了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情，这又是一件长期困扰中共中央上层社会的一件悬案。

从 1960 年 3 月开始，叶群、林彪总是接到内容淫秽、下流的匿名信。信的内容主要是骂叶群性生活淫乱，是延安著名“托派”王实味的情妇，说叶群同陆定一睡过觉，说林彪的孩子不是林彪的。有的信还寄给林彪的孩子们，描写叶群如何做爱等等。有时干脆写在明信片上。不论林彪一家走到哪里，匿名信总是跟到哪里。

有一次，林彪在上海，匿名信又寄到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的手里，让他转给林彪。

这是一首含有一至十的数字的打油诗：

“搂了一个臭老婆，生了两个兔崽子，封官进爵跳三级，终年四季怕光照，五官不正双眉倒，六神无主乱当朝，七窍生烟抽鸦片，拔（八）光了头上毛，机关算尽九头鸟，十殿阎王把魂招！”

这首打油诗，怎么看都像是在说林彪。他和叶群生有一儿一女，正好是两个孩子。林彪身体不好，害怕太阳晒，传说吸毒，秃顶，又是湖北人，“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不是在说林彪还能是说谁呢？

信末的署名是“基督山”。

这些匿名信搞得林家紧紧张张，不得安宁。

一天，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与叶群在商场发生争吵，严慰冰一气之下跑到总政找总政主任肖华告状。

在此之前，严慰冰曾经为叶群的事情专门找过肖华，要向肖华汇报叶群在男女作风上的问题。

肖华一听，赶紧借故推托。严慰冰汇报的事情，至少牵连到两位政治局成员，而且还势必要涉及到其他领导人。严慰冰的父亲严朴和陈云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严慰冰、严昭姐妹的成长也是受到了陈云的格外关注的。以肖华的政治经验，岂能不知这件事的份量？有的汇报可以听，有的汇报是不能听的。

遭到肖华婉拒的严慰冰锲而不舍，仍旧请求与肖华一晤，不得已，肖华只好找来罗瑞卿一起听严慰冰的汇报。严慰冰的汇报主要就是讲叶群的私生活上的事情，滔滔不绝，从延安一路说到北京，而且，还拿出了有关叶群的照片。严慰冰信誓旦旦的告诉肖华等人说，林立衡不是叶群和林彪的亲生女儿，这不仅让罗、肖二人大吃一惊，而且也感到无所适从。

以肖华、罗瑞卿和林彪家庭的关系，林家的一些生活上的小事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是知道一些的。林立衡和叶群的关系不好，他们也有耳闻。但是，事关林立衡的血缘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一旦传开，对叶群的影响自不必说，关键是当时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林彪的脸面将被置之于何地？因此，肖华立刻制止了严

慰冰的谈话,对她说:

“林彪是政治局委员,陆定一也是,你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你今天给我们谈的这些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和其他人谈了。”

肖华这番话也是为了严慰冰着想,像严慰冰这种谈话的方式和内容无疑是要给她和陆定一带来很多政治上的麻烦。可是,严慰冰并没有听从肖华的建议,此后还把这些同样内容的东西写信寄给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一时搞的军委上下沸反盈天。

第30回：“女状元”，谁曾想出此下策 终敲定，《座谈会纪要》完稿

这次严慰冰是来告状，肖华尽管头痛，也不得不见。

一见面，尚未坐稳，严慰冰就噼啪啪就连珠炮般地说开了。肖华是江西老表，严慰冰讲的是苏州侬语，气头上说话又快，肖华一个劲儿地摇头，表示听不明白她说的话。双方语言交流出现障碍，肖华拿纸过来，让她把事情写下来，于是乎改为笔谈。严慰冰在纸上写了争吵的经过。

当肖华便拿着这张纸去找叶群了解情况，叶群一看字迹眼熟，他们找出匿名信一对，可不，笔迹完全相同！

总政将严慰冰的笔迹交给了公安部。1963年夏，公安部派六局局长来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经专家鉴定，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之手。

其实，此案如果发生在民间，应该不难告破。从匿名信使用的信纸、信封，投寄地点及对林彪行踪了如指掌等诸多线索，都将矛头明白无误地指向中南海内。公安部也已通过对投信邮箱的排查，将作案范围基本锁定在中南海附近。但是，往下该如何进行？没有人吭声了。

更何况，匿名信中常用“王光”和“黄政”及“王光X”的笔名署名，与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只差一字；有的信封地址干脆写的就是：“按院胡同”。

按院胡同是王光美的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

有的信中还写道：“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王光美和叶群曾是北京师范附中的校友，谁敢再往下想？

严慰冰在中南海有“女状元”之誉。她是中共早期的老党员严朴的女儿。严朴出身大地主，和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彭湃一样，家道殷实却醉心于革命，而且首先动员农民分自己家的土地，被周恩来称为“三少爷毁家纾难”，在无锡一带农民中威望很高。曾担任无锡总工

会总务部部长、江苏省委特派员。1929年1月参与领导奉贤庄行农民暴动。1930年夏被调任中共浙南特委军委书记兼红十三军政治委员。1934年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此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二科科长，八路军驻西安、重庆办事处秘书长。1949年6月5日在北平逝世。6月9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严朴同志传略》纪念严朴，并且高度评价了严朴的一生。

严慰冰出身这样的家庭，家学渊源，博闻强记。1937年夏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1938年7月辗转武汉、西安到达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学习。后经李富春介绍，与陆定一结婚。她的文学造诣很深，她写的散文优美动人。建国后，有一次陆定一到毛泽东处开会，中午回家时对严慰冰说：

“今天我们都交了白卷！”

严慰冰问：“怎么回事？”

原来会议间隙，毛泽东问到会的同志：“听说初唐王勃写《滕王阁序》时很年轻，你们谁知道，他到底是多大时写的？在什么地方有这个证明？”

在座的陈伯达、康生、胡乔木以及中宣部、文化部的负责人等众多中共党内的著名“秀才”，竟面面相觑，一时语塞。

严慰冰听了笑着说：“这有何难！一说是王勃14岁时写了《滕王阁序》，有书为证。”

陆定一惊讶地说：“你说有书为证，快拿给我看看。”

严慰冰从卧室的书橱中，翻开15卷的《唐摭言》交给了陆定一说：“你看，这不是。”

陆定一接过书一看，上面赫然写道：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

所言属实。严慰冰催促陆定一：“还不快把书给主席送去。”

陆定一却说：“这是你的答案，还是你送去吧，乘主席现在正在吃饭，快去。”

严慰冰骑上自行车，很快就从他们住的增福堂来到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看到后高兴地称赞严慰冰：“想不到许多大秀才答不出的问题，你能回答。”

他详细问了严慰冰的学历、经历后说：“如果在古时候，你能中个女状元。”

从此，“女状元”作为严慰冰的绰号不胫而走。

但是，很多聪明人的神经也是很脆弱的。

1952年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时，中宣部有人怀疑严慰冰和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的儿媳有贪污问题，在中宣部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上，要她们交代问题。后来事情虽然澄清了，但给严慰冰的刺激很深。

陆定一自1944年起任中共中央宣部部长。1952年9月，突然被降为副部长，中宣部工作，暂由胡乔木副校长主持。陆定一1952年底从苏联回到北京，严慰冰就经常与他吵架。此时中央已调习仲勋任中宣部部长。

严慰冰为什么要写这些匿名信？据说是因她怀疑丈夫陆定一和叶群有关系，说陆定一曾在延安时期追求过叶群。严慰冰先后写了50多封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写给林彪、叶群一家的。

严慰冰和叶群早在延安时期就认识，她们都在延安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只是不同系。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薛明揭发叶群有隐瞒历史、虚报党龄等问题，严慰冰不知从哪里了解到这些情况，也向研究院党组织作了汇报。

后来他们就各分东西了。1961年底，严慰冰去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大儿子陆德，正好林彪与前妻张梅生的女儿，叫林小琳，当时也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由于林小琳和后母叶群的关系紧张，不愿回家，即使放假也不回北京，只能在学校或到处游荡。严慰冰听到了这些情况，更是大写匿名信痛骂叶群及其一家，当然也包括林彪。

到了1963年夏，笔迹鉴定已确认匿名信为严慰冰无疑。此时，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也从北京医院、华东医院严的病历上了解到，从1952年开始，严慰冰就有精神病或偏执性精神病的记载。1961年3月，卫生部保健局电告上海卫生局，通知华东医院院长薛邦祺和精神病科专家粟宗华到北京报到。薛邦祺和粟宗华到京后，又同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同机飞往广州，为当时和陆定一一起正在广州的严慰冰看病。粟宗华根据薛邦祺介绍的严慰冰病情和体检结果，以及自己所观

察到的，做出严慰冰患有“更年期精神病”的诊断。

根据这些情况，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凌云和公安部六局副局长海宇都认为严慰冰的行为是病态，口头向彭真做了汇报。彭真也同意他们的看法，就把此事放下了。

1963年11月，陆定一带严慰冰赴上海治病，仍由薛邦祺和粟宗华负责为严慰冰会诊医治。薛邦祺、粟宗华诊断严慰冰患有“多疑性精神病”，并和一位医生在陆定一的住所，为严慰冰做了50次胰岛素休克治疗。陆定一向薛邦祺透露了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的行为。

说话到了1966年2月。一天，彭真约陆定一到他家，将一叠材料交给他，对他说：

“这是公安部转来的一批匿名信的照片。他们经过长期调查，认为这些匿名信是严慰冰所写。这些信绝大部分是写给叶群一家的。”

彭真接着说：“林彪是党的副主席，写他的匿名信，这个问题就被认为是政治问题。许多信署名王光X，发信地址是用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方，自然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而且，不少信是用明信片写的，等于公开的传单。”

陆定一对彭真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根本不知道。林彪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今天看了匿名信才知道，以前不知道。她怎么会写这些匿名信，真是不可想象。有些字迹显然是严慰冰写的，有些字看不出来。为了确证，我可以去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请您给公安部核对。”

“好吧，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彭真说。

下午陆定一回到家中，若无其事的问严慰冰：“你现在临帖有进步吗？给我看看你写的字。”

严慰冰拿了她写的毛笔字交给陆定一。陆定一看了一下，放在写字台上。

随即，严慰冰又拿了一张用钢笔写的字，这是一封未写完的信，也给了陆定一。

陆定一显出几分严肃，问严慰冰：“你知道不知道王光美母亲托儿所的地址？”

“我不知道。”严慰冰回答。

“林副主席有几个孩子，叫什么名字？”

这些严慰冰知道，一一说了。

“你是否常用明信片写信？”

“只写过一封，是给瑞儿学校里的。”

“写过匿名信没有？”

“没有写过。”

“精神好的时候没有写，精神不好的时候写过没有？”

“没有。”严慰冰似乎有点紧张。

第二天，陆定一把这些字迹送到彭真家里。过了几天，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完会后，彭真拿了公安部退回的字迹给了陆定一，说：

“公安部已查对，匿名信确是严慰冰写的。中央常委讨论过，认为严慰冰是危险分子，但决定保护你，要你离开严慰冰，住到医院去。”

陆定一说：“家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应当引咎辞职。我无大病，没有理由住医院。”

彭真说：“中央相信你不会参与此事，现在不要考虑辞职。你还是住院好，由卫生部通知你。”

陆定一回家后，把彭真退给他的字迹还给了严慰冰，其中一页的一角因彭真批字后撕去了，严慰冰问为什么被撕，他推说是他不小心撕破的。

2月4日，彭真打电话给卫生部长钱信忠，说严慰冰和陆定一吵架，陆定一没法工作，要他安排陆定一住院。

2月8日，陆定一同彭真、康生等人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汇报提纲》的事情，严慰冰也到机场送迎。回北京后陆定一直接住进北京医院，未回家中。陆定一本来就有消化系统不好的毛病，因此严慰冰没有产生怀疑，还常常到医院来探望。

陆定一住院期间，两次到中组部长安子文家，商讨严慰冰问题。

2月18日，根据彭真、陆定一的指示，由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卫生部副部长史书翰、卫生部副部长兼北京医院院长黄树则等人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会诊的目的：（一）“病人”这些表现是思想意识问题还是病态？（二）若是病，是什么病？如何解决治疗问题？（三）对病势的估计如何？（四）治疗方法，在什么地方治疗？病人不承认自己

有病,如何使她接受治疗?

医生根据严慰冰的病史进行讨论分析,都认为严慰冰患有猜疑性(偏执性)精神病,提出可去香山疗养加药物治疗,或用电休克等。

2月20日,陆定一到彭真家向他汇报会诊情况。

2月21日,钱信忠、史书翰通知卫生部医疗处请上海的粟宗华来京为严慰冰会诊。2月22日和23日,仍在卫生部某处为严慰冰会诊。专家们同意严慰冰属于“歇斯底里性格基础上产生的偏执状态”。有的医生“提出是否可以去四清,加药物治疗”,还有医生则建议使用胰岛素休克加电疗等。

3月4日晚,由史书翰出面组织一次大规模会诊,这次会诊专门讨论有关严慰冰的“治疗”安排的问题。会诊后,史书翰亦亲自带领医生去北医三院挑选精神病病房。

1966年3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副局长刘复之和凌云找去,谈严慰冰写匿名信的事。

中央觉得陆定一住在北京总是不便。这时周恩来对他说:“你最好到外地去,时间越长越好。”

陆定一一直想去看看江西的劳动大学,这次他就想先去江西。他对彭真谈了自己的想法和周恩来的意见,彭真同意了。

3月6日,陆定一离开北京,7日到达上海,到车站迎接他的是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春桥和杨西光。陆定一此时还没有忘记和他们讨论《海瑞罢官》的问题。他批评上海说:“你们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不跟中央打招呼是不对的,还是要遵守党的纪律嘛。”

张春桥说:“上海市委已经决定,把所有关于《海瑞罢官》的正反面文章,都在《文汇报》上发表,以引起重视和讨论。”

第二天是“三八”妇女节,陆定一听说上海已能生产坤表,但只有半钢的一种,男用表倒有好几种。他买了一个坤表和一个男表,并写了一封信,连同手表托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顺便带回北京,交给严慰冰。还是夫妻情深,难舍难弃呀。

陆定一在上海只住了一晚,第二天即启程去南昌,这是他第一次来南昌。因此,在南昌安顿下来后,他就去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杭州会议自然是沒有通知他参加了。

3月1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找李富春，李富春不在，又找康生，送上严慰冰会诊情况报告。康生说，中央常委未委托他管此事，叫去找彭真。

11日，彭真打电话叫张子意、许立群去，给他们看严慰冰匿名信照片，指示要安排严慰冰离开中南海。

这就是在杭州会议上提到的严慰冰匿名信问题。

3月18日，江青通知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上海，参加《纪要》定稿问题。

3月19日上午，刘志坚和谢镗忠、李曼村到达上海，下午江青就召集他们和已在上海的陈亚丁、张春桥一起，看毛泽东修改过的稿子，并征求意见。

刘志坚等人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刘志坚只是提出：“‘重新组织文艺队伍’的提法，涉及到对整个文艺队伍的评价，起码部队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队伍也是好的。能否把‘组织’二字，改成‘整顿’。”

江青说：“毛主席已经同意了，不能改了。”并把毛泽东3月17日批示拿给大家看。

张春桥也说：“不要犹豫了，改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我觉得可以了！”

江青说：“如果你们没有意见，这就算定下来了”。并交代说：“斗争很复杂，周扬在苏州养病，听说我在同你们座谈文艺问题，好紧张，跑到上海来看春桥，打听消息，春桥没有告诉他。你们回去后，没有正式传达前不许外传，要保密，这是一条纪律，定下来一定要守纪律”。还说“这个稿子要给林总一份”。

这时，毛泽东在标题上又加上了“林彪同志委托”六字，变成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六个字，使“座谈会”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

既然是“林彪同志委托”，《纪要》必须得到林彪的首肯。于是，江青要陈亚丁为她起草了一封致林彪的信：

林彪同志：

根据你的委托，我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邀请刘志坚等四位同志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后，他们整理了个座谈纪要送

给你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送给我一份。我看了，觉得座谈会纪要整理得不够完整，不够确切。因此，请春桥、亚丁两位同志座谈修改，然后，送主席审阅。主席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并指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我于三月十日至十五日，请伯达、志坚、春桥、亚丁四位同志一起讨论修改后，已送主席审阅，主席再次作了修改，并于十七日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十九日，我又请志坚、春桥、钟忠、曼村、亚丁五位同志一起座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纪要。现将座谈纪要送上，请审批。

此致
敬礼！

江青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九日

第31回：抓警卫，总理再查广播局 “大革命”，“上海谈话”震北京

3月20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谈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问题时说：

“过去我们蒙在鼓里，许多事情都不知道，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那里掌握着。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是区别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这是改变苏区政策。这种区别是很灵的，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是不对的。现在，大学、中学、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富出身的人垄断了。解放后，我们把他们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搞革命。没有五年到十年的工夫批评一下，讲点道理，真正培养、教育出一批接班人，就都要控制在他们手里。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现在要保几个，郭老、范老是要保的，其他的人不要保了。发动年轻人向他们挑战，要指名道姓。他们先挑起斗争。我们在报纸上斗争。

“两种办法，一种是开展批评，一种是下乡劳动、半工半读、搞四清。再一个，我们的政策是不要压制年轻人，让他们冒出来。接班要那些年纪小的，学问少的，立场稳的，坚决的，有政治经验的。”

“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不要怕年轻人犯‘王法’。”

“宣传部不要卡死，不要搞成从前的农村工作部。”

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合作化运动中表现右倾，1962年又主张包产到户，被毛泽东批评为“十年来没做一件好事”，于1962年被撤销。

“……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不然将要出修正主义。出修正主义的就是这一批人，如吴晗、翦伯赞都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俩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在全国二十八个省市中，有十五个省市开展了这场斗争，还有十三个没有动。

“……还有你那个北京刊物《前线》，是吴晗、翦伯赞的前线。廖沫沙是为《李慧娘》捧过场的，提倡过‘有鬼无害论’。阶级斗争展开的面很广，包括报纸、刊物、文艺、电影、戏剧。阶级斗争很尖锐，很广泛，请各大区注意一下，学校、出版、报纸、文艺、电影、戏剧各方面都要管。

“尹达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了，写得好，各报都应当转载。尹达是历史所长，他是赵毅敏的弟弟。他的文章是1964年写出来的，压了一年半才发表。对青年人的文章，好的坏的都不要压。对吴晗、翦伯赞，不要剥夺他的吃饭权，有什么关系。不要怕触犯了罗尔纲、翦伯赞等人。”

在林彪谈到“要学毛主席”时，毛泽东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不要念语录，不能受束缚。列宁就不受马克思的束缚。不要迷信，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

20日上午，杭州会议结束。

23日，北京召开书记处会议，落实杭州会议精神，就是要在思想、文化战线开展文化革命。

林彪在上海收到江青派人送来的信及附来的《纪要》大字排印本，知道毛泽东已经亲自阅定，立即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批转军委常委们。他叫来正在上海的刘志坚，要他代为起草一封给军委常委的信。3月20日，刘志坚让陈亚丁执笔起草了一个稿子送去，林彪认为调子太低，陈亚丁又改了一遍，加上一些对“纪要”评价的话，又送林彪审定。3月22日晚，林彪改毕定稿，全文如下：

贺龙、荣臻、陈毅、伯承、向前、剑英常委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请阅。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十六年来，文艺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文艺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去占领，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极为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搞不好就会出修正主义。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

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把这一场革命进行到底。

纪要中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完全符合部队文艺工作的实际情况，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使部队文艺工作在突出政治、促进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对纪要有何意见望告，以便报中央审批。

此致

敬礼！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林彪向刘志坚等人交待：“你们回去后，把这封信和《纪要》分别送给军委各位常委，看常委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就送给中央，由中央来批发。”

毛泽东又从杭州来到上海，仍然下榻于西郊“414”的花园别墅。

3月24日，毛泽东再次审阅并修改了《纪要》。这次修改，又改动了四处。修改后，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

各件都看了，都同意。只在《纪要》内的几处，增加了少数文字，或者改了几个字。请酌定。现在原件退还给你。

毛泽东

3月24日

毛泽东几次对《纪要》的修改，都是非常认真、字斟句酌的。他在修改时写道：“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3月27日，周恩来在杨成武、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北京市公安总队总队长吕展及丁莱夫等陪同下，再次检查广播事业局大楼的安全警卫情况，当时广播事业局机关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均在同一大楼内。周恩来指示要制定警卫应急方案、指定应急支援部队、播音室前要有战士守卫、大楼院内不能开门太多、广播剧场不能对外，等等。

3月28日及4月12日，周恩来又分别检查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位于北京市郊的两个发射台：双桥 491 台、沙河 573 台的安全警卫工作。

3月28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并共进午餐，康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华东局书记魏文伯、中国日本友好协会秘书长赵安博参加。

这天，康生受中央常委会委托，向毛泽东汇报中日两党代表在京会谈的情况，汇报时华东局书记魏文伯和江青也参加了。康生报告说：

“主席，中日两党联合公报已经商定，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再三坚持，不愿在两党联合公报里点名批判苏共。”

“少奇同志的意见怎么样？他在出国之前，是怎么处理的？”毛泽东抽着烟问，两天前，3月26日，刘少奇偕同夫人王光美和外交部长陈毅及夫人张茜前往巴基斯坦访问。

“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了，认为应当尊重宫本显治的意见，照顾日共的困难。”康生回答说。

毛泽东看了会谈公报的草稿，很不满意地说：“这算什么？无头告示。不点名批评苏修，怕鬼，旗帜不鲜明，不痛不痒。”

毛泽东亲自在公报草稿上做了重大修改。他不仅在公报上，公开点了苏联共产党的名，强调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反对中日两党内的修正主义，并指出有人叫喊反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实质上反对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对毛泽东的修改，宫本没有同意，双方对公报最终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些是后话。

汇报完国际问题，康生搁下手中笔，压低声音道：“主席，还有一点情况，要向您汇报。”

毛泽东问：“什么事？”

“是这样的。”康生把身子倾向毛泽东一侧，低声说：“我觉得，《汇报提纲》下发后，全国的学术讨论方向有问题，不是在搞文化革命，而是向学术方向发展。如果按照这个提纲做下去，全国学术界，就会鸦雀无声，一潭死水。彭真同志是不是还是在保吴晗？”

江青插话说：“是有问题，彭真3月11日通过许立群给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打电话，质问上海发表姚文元的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这分明是整到毛主席头上了嘛。”

毛泽东看了一眼魏文伯问：“是这样吗？”

“是的。”魏文伯回答。

毛泽东听后，猛地吸了一口烟，十分恼怒地说：“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随后，他口气又稍微和缓一些地说：“《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是非不分。当时没有明确指出，以为是常委讨论的，还是要尊重集体的意见。不过，在原则问题上，我是决不让步的。”

3月29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再次会见由宫本显治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康生、赵毅敏、魏文伯、赵安博在座。毛泽东说：“看来公报发不成了。不发表公报没什么要紧，发个消息就是了。公报这种东西，是一种形式主义。你们原先是不愿意发表的，是我们向你们提出的。我说这样不对，应该由你们提。今天如果发联合公报，双方都不愉快。公报不发表了，双方都没有精神负担，轻松愉快。”

这天，毛泽东同康生谈话，说：“北京市委、中宣部包庇坏人，要解散。为什么批评吴晗不能联系罢官，不能联系庐山会议？告诉彭真，不要包庇坏人了，要向上海道歉。学术批判要走群众路线。当然不要像1958年那样否定一切，要发扬58年精神，去掉58年的缺点，要试点。”

3月30日下午，毛泽东又约康生、魏文伯、赵毅敏、江青、张春桥等人过来谈《汇报提纲》的问题。他说：

“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压制群众，包庇坏人，搞这个提纲是错误的。”

毛泽东接着说：“十中全会不是讲过嘛！中央不是决定各省成立反修小组？吴晗写过那么多谈论海瑞的文章，北京各报发表那么多宣传鬼戏文章，为什么中宣部不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搞阶级斗争还要告诉中宣部、北京市委、彭真吗？十中全会做出的进行阶级斗争都不算数了？邓拓、吴晗、廖沫

沙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北京市委为什么不批判？为什么学术界、历史界、文艺界可以不搞阶级斗争？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

“什么叫学阀？那些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就是学阀，包庇吴晗、翦伯赞这些‘中学阀’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学术批判文章不要送审。你是阎王殿，小鬼不上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打倒党阀，解放左派。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宣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我讲的解散中宣部、北京市，你（指康生）告诉彭真没有？也不仅是中宣部、北京市，中央有些部不做事，包庇坏人，统统要取消。有些部长、副部长不做事，科长做事，改成科算了。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地方要多出几个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9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他转过头问魏文伯：“你们怎么不传达？中央出修正主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现在有些人怕孙悟空造反，站在玉皇大帝方面，不站在孙悟空方面，怕字当头，就非垮台不可。我们要站在孙悟空方面，要保护左派，左派写文章，谁不犯错误。

“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改了几次，就是有错误嘛。列宁手稿也改得很多。许立群专门搜集关锋的文章，不搜集吴晗的文章，要批评。我们要保护左派。尹达有两句话是对的，学问少的打倒学问大的，年纪小的打倒年纪大的，历史上都是这样。我最近同乔木谈，书不可不读，多了也没有用。中国历史书太多了，我们有些军区司令，如许世友他们，也不懂宋元明清，但他们会打仗，会阶级斗争。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他们实际掌握了文、史、哲、经、电影、出版等等事业，对他们一个是要驳倒，一个是给他们饭吃，有职无权。我也保过吴晗，但是因为不知道他的底，他少年时代就拍胡适的马屁。斗争要有策略，一个学校批评两三个人，他们就不能不讨论，不要太多。要区别对待。郭老、范老这两个老要保护。郭老是好人，功大于过。胡适讲共产党不懂学术，郭老搞古代史就很有成就。”

有人插话：“郭老在海南岛写了两首诗，发点牢骚。”

毛泽东说：“郭老写两首诗不算什么，他是个杂家、学术批判可找二、三个有代表性的人，不可过多。姚文元关于海瑞修吴淞江的事，海瑞修水利是榜上无名的，修水利还不如张居正。海瑞的平离策要好好批判，他还画了地图，很反动的，要好好加以批判。

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现在写文章的人许多我都没见过。李希凡写一篇文章，调到《人民日报》，做了人大代表，再没有写出好文章。关锋是不是人大代表？……但是也有危险，年轻人要注意，现在学校历史系不出历史，文学系不出文学。报刊编辑、记者很复杂，保皇党很多。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好比孙中山和康梁。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反对修正主义。”

“谁也会犯错误。姚文元，放在市委，这个办法好。文化革命能不能搞到底，政治上能不能顶住？中央会不会出修正主义？没有解决。”

他转向康生，不无伤感的说：“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想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接着，他又十分坚定地说道：

“我这一辈子完不成，你们也要坚持完成，必须进行到底。”他的话深深地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人。江青马上表示：“主席放心，我们一定会进行到底的。”

魏文伯、张春桥也纷纷点头表示赞许。

毛泽东又对康生说：“你告诉彭真，许立群的问题，他必须打电话向上海市委道歉。中宣部没做过好事，总是被动，压制别人的积极性，不准革命。”

“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3月31日，康生从上海回到北京。他不敢怠慢，立即向周恩来、彭真详细汇报了毛泽东的谈话。周恩来非常重视，指示康生，马上召开书记处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彭真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他本能的为自己分辨一句：“我没有要包庇吴晗，我只是主张‘放’的方针，‘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

一下。”

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左派队伍。他连夜又向钓鱼台的写作班子作了传达，并且，把王力留下来，帮助整理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作为他向中央政治局传达的蓝本。

这时，王力提醒康生说：“现在是彭真在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主席的讲话是批评彭真的，他怎么主持传达？还是要请邓小平同志回来，由他主持传达。”

康生想了一下，马上拿起电话，向正在宝鸡视察三线建设的邓小平报告说：

“小平同志吗？我是康生。主席有重要指示，是关于彭真同志的，……对……请你回来主持传达……是……”

还没有说几句，邓小平就回答说，他马上回来。是啊，如果说1965年12月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上海会议”是中国政局上层的一次强烈地震，那么，这次康生带回北京的“毛主席上海谈话”就犹如是放了一颗“政治原子弹”，对北京引起了更大的震撼。

第32回：急转弯，京城内一片慌乱 抛邓拓，是否能躲过此劫

3月31日晚，周恩来听完康生的传达后，又赶往石家庄、宁晋、冀县等地，视察并部署抗旱和邢台地震后的救灾工作。但是，他并没有忽略毛泽东的上海谈话。4月2日，他给毛泽东打电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主席的指示康生同志回来后已经向我和彭真同志传达了。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指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我已经安排康生同志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

当晚，他在邯郸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信中说：

“31日康生回京，传达主席指示。与彭真、康生商定，拟开书记处会议，遵照主席指示，提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彻底批判文史哲方面的反动学术思想，彻底揭露这些学术权威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拟按此方针，起草一个中央通知，送主席审阅。”同时，周恩来在信中指出：“前送主席审阅的五人小组报告是错误的，拟由书记处召开五人小组扩大会议，邀集上海、北京有关同志加以讨论，或者进行重大修改，或者推翻重写。”

“我31日晚到石家庄，4月1日到第二次地震重灾区五个地方看望群众和伤员，晚到邢台……2日到6日在邯郸，视察各地打井抗旱春播生产工作，拟每隔10日回北京一次。如有急事，当由彭真同志告我赶回。”

4月1日，彭真指示刘仁、万里召集市委常委兼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宣传部长李琪、《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等人在北京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北京市委书记万里在会上传达了彭真的話：

“‘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不解决不利，否则更被动，对邓拓的本质要有一个认识，这是个好人，但是世界观有许多不正确的认识。”

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

文松、李琪、范瑾、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

“三家村”是北京市委刊物《前线》在1961年开设的一个专栏，由邓拓发起，联络吴晗和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3人主笔，全名叫《三家村札记》。

毫无疑问，解决“三家村”的问题，就是解决邓拓的问题。

邓拓，年仅24岁就完成了第一部《中国救荒史》，署名“邓云特”，被列入商务印书馆著名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中。他在26岁那年当上《晋察冀日报》总编辑，37岁成为《人民日报》总编辑，是中共党报史上最出色、最富有个人魅力的人物之一。当时传说要邓拓去给毛泽东当秘书，被他谢绝了。邓拓私下说过一句：“伴君如伴虎。”但中央还是决定让他列席政治局会议，以便了解中央精神，及时在报纸上宣传贯彻。

可惜好景不长，1956年春夏之交，刘少奇、周恩来意识到经济过热，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导致财政赤字和原材料紧张。于是，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明确经济发展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实际上是以反“左”、反冒进为主。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按照会议精神写篇《人民日报》社论。

中宣部对《人民日报》的社论初稿很不满意，组织人重写，陆定一部长亲自在部里召集讨论，多次修改后送刘少奇、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亲笔做了修改，并提出一些斟酌意见。陆定一根据这些意见又把社论打磨了一遍，最后呈报刘少奇、毛泽东审定。

毛泽东在社论清样自己的名字处画了个圈，批下4个字：“我不看了。”

面对毛泽东退回来的社论清样，邓拓犯难了。以往只要是《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送审，毛泽东都会发表意见。富有党内工作经验的邓拓当然明白：这一回毛泽东是不赞成发表这样的社论。但不发吧，反冒进又是刘少奇和周恩来以中央工作会议做出的决定，《人民日报》加以宣传义不容辞。最主要的是，邓拓本人内心是同意社论观点的。

想来想去，最后邓拓下决心从中央的两种声音中做出选择，发表社论，只是悄悄留了个心眼：过去社论排4号字，他改成了较小的5号

字，避免特别醒目。

社论在1956年6月20日刊出，仍然深深地惹恼了毛泽东。他后来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解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地针对我的。”

1957年春天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这两次会上都作了讲话，以一代雄才的胆略，借“百家争鸣”，鼓励“大鸣大放”，号召对共产党进行整风。

邓拓依照党内传统理念，不能接受这种体制外的“大鸣大放”。当《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民主党派报纸畅所欲言，热议时政的时候，《人民日报》在宣传造势上表现得十分消极。对毛泽东鼓励“鸣放”的最高国务会议报告只发简要新闻，不发社论；对毛泽东在中共宣传工作座谈会的另一篇讲话，连新闻都没有发。还发表了不赞同“鸣放”的文章。

这年的4月10日，毛泽东对邓拓的积怨终于发作了。他在中南海召见《人民日报》几名负责人，对邓拓劈头盖脸一顿痛骂：

“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

毛泽东说，《人民日报》对他的最新讲话精神“按兵不动”、“无动于衷”，是“同中央唱反调”。

邓拓解释说：“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打断邓拓的辩解，不留情面地说：“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根本没有抓！”

毛泽东当面质问几位副总编为什么不出来造邓拓的反。他越说越生气，指着邓拓的鼻子尖刻地评价道：“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事已如此，邓拓只好提出辞职：“我不知道自己像不像汉元帝，不过我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难以胜任，希望主席撤掉我的职务。我几次诚心诚意提出过这个请求。”

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你那么诚心诚意！你只知道汽车进、汽车出，养尊处优。”

时过不久，5月，邓拓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杂文《废弃“庸人政治”》，开篇即说：“看到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唐朝的陆象先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我们有的同志，不知道为什么，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做的事情。他们不管对什么都不肯放手，都要抓，而且抓得死死地。”

他说：“凡是凭着主观愿望，追求表面好看，贪大喜功，缺乏实际效果的政治活动，在实质上都可以说是‘庸人政治’。”

接着，他引用陆游的诗句“庸医司性命，俗子议文章。”将“庸人政治”与误人的庸医相提并论，批评“那些天天怕出乱子，天天喊叫‘放不得’的人”是“庸人自扰”、“瞎操心”。

在他看来，“一切主观主义，不可一世的夸大地才，其实不过是真正的庸人而已。”矛头所指，清晰可见。难怪此文一发表，邓拓又向胡乔木作了检讨。

1957年底，毛泽东将吴冷西从新华社调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邓拓改任社长，实际上是靠边站，不让他管事了。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在邓拓走进会场时，毛泽东当着与会者，又批评邓拓是“教授办报、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当年8月，他即被免去《人民日报》社长职务，调到北京市委担任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

1959年2月，在报社为他举办的欢送会上，他当场吟诵了《留别人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邓拓对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不以为然。他离开《人民日报》后，有一次《人民日报》理论组编辑王若水和一个同事去看他，谈到1957年被批评的事，他仍然耿耿于怀，激动地说：“将来历史一定会做结论的！”“反右”之后，邓拓也曾私下说，幸亏《人民日报》当时“按兵不动”，不然，还不知道报社有多少人犯错误、被打成右派呢。

到了北京市委，邓拓办报之心难移，又亲自主办了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

1961年,邓拓应《北京晚报》的要求,在该报上开设了一个专栏:《燕山夜话》,署名马南邨。邓拓曾解释说:“燕山是北京的一个主要的山脉;夜话,是夜晚谈心的意思。”

《燕山夜话》开篇文章叫《生命的三分之一》,在这篇短文的最后,作者说:“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燕山夜话》创办以后,颇为读者称道。受此启发,邓拓又打算在他主持的《前线》上开设类似专栏,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问题有所针砭。

1961年9月的一天,《前线》编辑部邀请吴晗和廖沫沙到北京四川饭店聚餐。在座的人并不多,除邓拓、吴晗、廖沫沙3位之外,只有《前线》编辑部的人。

入席前,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邓拓似乎很随便地谈起:“《前线》也想仿照别的报刊‘马铁丁’‘司马牛’之类,约几个人合写一个专栏,今天就是请你们两位来商量一下。听说‘马铁丁’他们是3个人合用的笔名,我们也照样是3个人取个共同的笔名。既是3个人,就干脆叫《三家村札记》行不行?”

三家村,原指偏僻的小乡村。出自宋代诗人苏轼《用旧韵送鲁远翰知洛州》:“永谢十年旧,老死三家村。”

他所说的“3个人”,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

3人合用的笔名如何取法,最后确定一人出一个字,吴晗出“吴”字,邓拓出“南”字,因为邓拓的笔名叫“马南”,廖沫沙出“星”字,廖沫沙当时的笔名是“繁星”。专栏的名称与合用的笔名“吴南星”就这样定了。

从1961年3月19日“夜话”发表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到1962年9月2日发表《三十六计》为止,邓拓在短短一年半中就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专栏,发表了152篇杂文。从1961年到1964年,他还在自己主编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开辟“三家村札记”专栏,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以“吴南星”的笔名发表杂文随

笔,其中他写了大约 18 篇。这些杂文都是在“大跃进”之后、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背景下发表的,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虽是借古讽今,却遮掩不住批判的锋芒。

1962 年 9 月,“三家村”中的邓拓以“把业余活动注意力转向其它方面”和“为了避免自己对自己老有意见”为由,首先中断了《燕山夜话》专栏的写作。1964 年,“三家村”中的另外两家吴晗和廖沫沙,也分别因主张对传统道德应批判地加以继承和称赞了昆曲《李慧娘》,遭到批判。《三家村札记》被迫停止。这就是“三家村”的由来。由于“三家村”的锋芒过漏,很早就有人提出批判。同时又因为其文笔极好,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此时的北京,毛泽东的“上海谈话”不仅让彭真紧张和慌乱,《人民日报》社的吴冷西听了康生的传达后,同样惶恐万分。4 月 1 日,他也赶紧向《人民日报》社透露:“彭真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说《二月提纲》是完全错误的。”

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感到不可理解。自从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吴冷西一直是紧跟彭真的,《人民日报》也是按照彭真的意见执行的。虽然很多人隐约感到姚文元文章的后面可能有毛泽东的支持,但是,彭真毕竟是在主持书记处的日常工作,应该是代表中央的。如果彭真这次犯了错误,吴冷西也危险了,《人民日报》怎么办?

联想到 3 月份杭州会议毛泽东的批评,吴冷西后背一个劲儿的发冷,他很着急,现在能做的,只有和彭真一样,赶快在工作上做出姿态,紧跟毛泽东的指示,减轻自己的错误。他通知《人民日报》:

“要赶快抓从政治上批吴晗,从‘罢官’要害上批《海瑞罢官》的文章。五人小组办公室扣压了两篇左派文章,《红旗》和《光明日报》很快要发表,你们赶快派一位副总编辑亲自去《光明日报》商量,《人民日报》力争要同时发表。”

“《光明日报》要是不同意呢?”编辑部的人员考虑到《人民日报》此时的处境,为难的说。

“唉,我找康生同志商量一下吧。”吴冷西叹了一口气说。

由于康生出面,4 月 2 日,《人民日报》总算求到与《光明日报》同

日见报。这篇文章就是戚本禹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的反动实质》。

中宣部更加紧张，许立群慌忙找吴冷西商量，希望尽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周扬在去年底布置“方求”写的那篇攻“要害”的文章。

此时，已经听到消息的邓拓也在4月2日找到彭真，询问毛泽东对他的看法，彭真劝慰他说：“事情并没有最后下结论，我还要再向毛主席解释，希望他能调查研究，改变他的看法。”

此时的彭真还要抓紧准备他自己的检查。4月2日下午，他亲自打电话叫来了吴冷西、胡绳，一起长谈了两、三个小时，商量修改彭真的检查。修改后，彭真立即派人把它送交毛泽东。

4月5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红旗》刊出的关锋、林杰写的《〈海瑞罢官〉和〈海瑞骂皇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红旗》杂志在刊载这篇文章时特别在结尾处注明文章的完稿日期是1966年1月。告知世人，这篇文章被人扣押了两个半月。

4月5日这天，彭真在他家里开会，与会者的名单都是他亲自圈定的，有许立群、吴冷西、姚溱、胡绳、李琪、万里、郑天翔、陈克寒、林默涵、范若愚、王力、张文松等17人。彭真心情沉重地对大家道：

“我在合作化、镇反、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四清’搞得也可以，唯独学术批判没有抓紧，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

他说：“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吴晗的问题出来后，总想再放出来些，想再放出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

“现在看，新的观点不容易放出来了。‘放’的时期过去了，已经放得够了。现在要分头把过去各方面放的尖锐的东西清理一下。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对于左派，他说：“左派是革命的，有时发表一些错误意见，是难免的。小平同志讲，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百分之八十正确就够了，斯大林还三七开呢。不要把次要的东西当作主要的。邓拓政治上拥护总路线，但思想上相当乌烟瘴气，对他还是要一分为二。他在1月5日开始检讨，不是个别的问题。多少年来写了许多文章，总会有错误

的。钓鱼台写反修文章，还写六七稿，修改十几遍呢。”

晚 19 时 30 分，北京市委书记处开会，由郑天翔主持，通过了北京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在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又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第33回：出简报，许立群进退失据 齐声唤，批罗会再起波涛

4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方求”那篇攻要害的文章。但是删去了文末所署的一月的日期。这是吴冷西的意见，他觉得，如果现在强调中宣部那时就写了攻要害的文章却不发表，对中宣部不好。此时，他还想着关照许立群。

但是，发表“方求”文章并没有为中宣部争得多少主动。报刊上再次掀起高潮的批判运动，其部署和组织，完全把中宣部抛在了一边。还传来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道消息。

许立群十分沮丧，紧张。他叫来中宣部具体负责学术批判的工作人员龚育之和林润青，郑重其事地对他们说：

“毛主席批评了《汇报提纲》，也批评了我。毛主席说，杨耳从前的尖锐性哪里去了？”

杨耳是许立群用过的笔名，当年贾雾、杨耳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两篇文章，是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的发难之作，它的尖锐性大概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龚育之和林润青追问许立群：“在武汉汇报的时候，毛主席到底是怎么说的？”

许立群支支吾吾地说：“我可能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是我没有听懂毛主席的意思。”

许立群还想：“康生还批评我，说我专整左派的材料，不整吴晗的材料，为了整关锋，还用了考据学的方法，考证‘何明’就是关锋。”

龚育之赶紧说：“吴晗的材料部里科学处整过的呀！”

许立群一听，忙说：“是吗？你们赶快拿来我看看。”

当龚育之和林润青将材料拿来后，许立群一看，又叹了一口气，说：“整了这些材料，又不署名，人家怎么知道？你们立即把这些材料开一个目录，注上整理的单位和印发的时间，印在这一期上送的简

报上。”

没有想到,这期简报又惹了麻烦。康生指责许立群说:“批评你不整吴晗的材料,你就送来这样的简报,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抗拒批评!”

这些批评,让许立群更加不知所措,简直有点精神恍惚。

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文章:“吴晗同志写《海瑞罢官》的政治目的是什么?”

暂且放下社会上批判《海瑞罢官》不表,回头再看军队的“批罗”情况。由于罗瑞卿自杀未遂,3月22日,北京的“批罗”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人和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人。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95人。这一阶段的会议,由于罗瑞卿不能到会,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叶剑英在会上作了题为“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主要发言。

其他人的发言也都是有准备的,言辞更加激烈。从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3人在这次会议上的联名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篡军反党的阴谋》中可见一斑。该联名发言材料称:

“罗瑞卿同志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罗瑞卿同志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很多同志已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大家都讲得很好,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同志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

“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

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林彪同志让贤、让权。……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联名发言举了众多事例，对罗瑞卿“在组织上的滔天罪行和伸手夺权等”九个问题作了“分述”。

公安部长谢富治在会上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说：

“我完全拥护中央这次会议对罗瑞卿的反党活动所作的彻底揭露和严肃批判。对于罗顽固地坚持反党立场，拒绝党的教育，可耻地用自杀的背叛行为来同党对抗，我们十分愤慨。”

谢富治的发言全盘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在建国初期10年的成绩。他说：

“罗在公安部工作了10年。他在公安工作中也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现在，我就下面几个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一)‘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

1958年，罗大搞‘十无’，……他在很多地方、很多场合，极力鼓吹和推行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之类的‘十无运动’。

(二)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

(三)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

(四)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

(五)以罗为鉴，接受教训

罗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他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走上了反党的道路，是不奇怪的。”

会上除批判罗瑞卿外，还捎带批判了刘亚楼、中央军委原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3人。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在会议发言时说：

“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同志的工具”。“还有肖向荣同志，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在罗瑞卿同志的包庇怂恿下，帮助罗瑞卿同志干了很多坏事”。“梁必业同志和罗瑞卿同志的关系也是很不正常的”，“梁必业同志跟罗瑞卿同志跟得很紧，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罗瑞卿同志一唱一和，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

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名发言，与叶剑英、谢富治、肖华在同一会议上的发言，构成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报告的主要框架。从罗瑞卿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到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从反对突出政治，搞折中主义，到向党伸手，进行篡军反党活动；从“一言堂”到封锁林彪和不尊重军委常委各位老帅；从这次会议上罗是“假检讨，真对抗，猖狂反扑”，跳楼自杀和遗书问题，到建议撤消罗中央书记处书记、副总理职务等等，全面、系统地揭发批判了罗瑞卿。罗瑞卿的不少事情是他们的发言中揭发出来的。比中央上海批罗会议详细的多。

接到康生电话后，4月4日下午13时30分，邓小平很快从延安乘飞机回到北京。4月5日，他看了彭真报送的处理罗瑞卿问题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草稿）》。4月6日，与彭真一起到周恩来处谈话。4月8日，出席中共中央处理罗瑞卿问题工作小组会议。邓小平在会上说：

“我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我认为，解决罗的问题，是党的一个重大胜利。我们没有察觉，林总首先察觉，很负责地向中央、主席提出，嗅觉比我们灵敏得多。主席亲自关怀、指导这个斗争。罗的问题性质是严重的，比上海估计的还严重得多。我们还是帮，希望他改正错误。开始是背靠背、调离军队，他抵触情绪很大，只有面对面。来了个自杀，自己作了结论，无非是抵抗到底。”“是不是还有不可告人的事，最少说明抗拒到底。”

“让这样没有党性、作风这样恶劣、资产阶级思想充满脑袋的人掌握军队是极危险的。退一步说，即使没有个人野心，向党伸手，凭他那种思想作风也是危险的。他确实是个隐患，拔除这个隐患就是个大胜

利。何况他又有伸手问题。一旦天下有事，那就不堪设想。”

“罗瑞卿的错误性质，同意报告中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军内的反映。”

“罗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者，不是普通的，而是极端的。过去只知道他锋芒毕露。他私心很重，我字第一，个人打算很多，不能得罪他，得罪他一句，成百倍地回敬你。”“他不守纪律是一贯的，走后门，不走正门，走邪道，不走正道，不搞党的正常生活，而且背后搞鬼。在我们党内，一切问题都可以经过党的原则来解决。”“罗的错误也没有什么，改正就行了。十年改正就行了。但是他是不会改的。我们不是因为他十年，犯了军事路线错误，而是他的错误与个人野心结合起来。他在党内不守纪律，发展到狂妄的地步，对林总那样恶劣、伸手。军队的大权已经到他手里了，放手让他工作，书记处也让他工作，希望他搞好，但他有个人打算，发展到伸手。高、彭也是这样的。”

“毛主席所以是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他始终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就不会不断革命。斯大林就是不抓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客观事物的真实反映，不仅现在，一百年，几百年以后还有。”“罗的问题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彭、高、罗的问题都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作为教训，不能忽略这个问题。”

“书记处对罗的问题，失于察觉，只知道一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主席了解得更深，林总提出，主席马上就抓住。”

“对罗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我赞成撤消书记处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彭真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大的胜利。其实他一跳就作了结论，目的是为了消毒。”“军队一定要掌握在忠于党的人的手里，决不能掌握在罗那种人手里。”“这个会开得好，方法好，领导得好。有人说太文了，我们是抓大问题，不抓细节，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严肃性。”“罗善于造谣、抵赖，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也无法抵赖。”“将来是不是罗会说冤枉了他？我看不冤枉他。说他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品质恶劣，逼林总让位，篡军反党，是不是事实？这些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他能推翻哪一条，我们可以取消。但是根本的、主要的问题，恐怕是准确的。”

“一定要守纪律，特别是高级干部靠谁来监督，如果不守纪律，不按组织原则办事，那是极危险的。”“罗喜欢听小话，不走正路，搞阴谋，搞地下活动。如果没有什见不得人的事，为什么要搞地下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纠正，林总在1960年以来就批评过他多次，他不听，有意见也不对总理、总书记讲。”

“胜利以后党内出了不少问题。六年一次，有点偶然性，也是必然的，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一百年，几百年都会有。罗的错误性质是资产阶级性质。”“吴晗这个人是反党的，我和老虎在一块睡觉，也未察觉。阶级斗争反映在各个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是战无不胜的。”

周恩来说：“这个会开得好，同意工作小组的报告。林总揭发了罗的反党问题，主席亲自抓了这个问题。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有修正主义思想，他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他坚持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必然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四个第一，反对突出政治。个人主义到了一定气候就要向党伸手。”

“我支持这个会议，讲一点历史教训。我们党生于忧患，多事之秋，不是太太平平的。不仅帝反修阶级敌人包围我们，也在考验我们。我们生产力的发展也在初期，对自然力、天灾、地灾，我们都还在摸规律，这些都是好事，都对我们是考验。主席引用过一句话：‘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无论对阶级敌人，还是对自然敌人，我们都是在‘备战’，都在战斗。”

“我们党犯过两次右倾机会主义，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前后12年，党还是战胜了，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五次错误中，我在最后两次负有很大责任。武汉时期也有责任，受到教育。党在胜利中前进，在错误中受到教育。使我们认识了领袖。遵义会议，整风，七大，从思想上、组织上取得了胜利，错误不会影响我们前进。”“王明、张闻天这些人是反党的，我们党涌现了领袖毛主席。”

“不但是胜利，错误也从反面论证了主席的正确性，主席、少奇、小平同志都受过打击，历史证明他们是正确的。林总跟主席跟得很紧，有许多发挥，罗都要伸手。”

“罗这个野心家掩盖不住个人的欲望，他不是突然的，是由量变到

质变。在‘遗嘱’中要老婆孩子相信党，自己却不相信。自杀是反党行为，两封信就是反党。党是很信任他的，给他很高很大的职务。常委有责任。我们接触多，没有察觉出来。彭德怀有不同意见还可以保留。罗自杀不仅是向党示威，还证明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双脚下地是不是自杀，还要继续考查。”

“我是犯过路线错误的。我们对罗没有察觉，要提高警惕性。当然也不可神经过敏，无中生有。”

这天，批判罗瑞卿问题的军队系统京西宾馆会议结束。

调往广播事业局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陆军第 63 军参谋长王寿仁于 4 月 8 日这天，乘坐周恩来的专机赶至北京履任。5 月 30 日，中央正式任命王寿仁为广播事业局副局长。

接着，邓小平主持了 4 月 9 日到 12 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亲自参加了这次书记处会议。会上，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 3 月底在上海的谈话，并且，系统地批评彭真在这次学术批判中的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他说：

“这个《提纲》是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党反毛主席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

尔后，陈伯达从政治路线方面批评彭真的‘严重错误’。他系统地‘揭发’彭真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的‘错误’，进而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开展的今天，跟不上毛主席的部署的必然性。在讲到当前的阶级斗争形势时，他说：

“党的最大威胁来自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来自邓拓、吴晗、廖沫沙一类的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是为国际上帝、修、反推波助澜的最危险分子”

彭真和周恩来等到会的中央领导人，做了初步检查，表示“一致同意主席的批评和指示”。

彭真在会上除了作检查，还一再表示：“我只是在这方面坚持我的意见，那就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

最后，周恩来和邓小平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会议初步决定：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王力奉命代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

中共中央通知，1966年2月12日中央批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看了这个《通知》，并且电告在上海的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个《通知》很不满意。他说：“这不说明任何问题，没讲为什么撤销。《通知》不应当是技术性的，应是理论性的。叫陈伯达重新组建班子，另行起草通知。”

陈伯达领会毛泽东所说的《通知》“应是理论性的”，也就是从理论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纲》，他说：“那是要我写一篇大文章呀！”

陈伯达知道，这是毛泽东对他的极大信赖。他选定王力合作，自己主稿，王力协助，两人很快在钓鱼台写出了初稿。

初稿出来后，陈伯达、王力和康生、吴冷西、姚溱又讨论、修改了几次。一次，在钓鱼台8号楼讨论《通知》初稿时，彭真也参加了。康生提出：《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件”。

彭真听到这句话，苦笑着说：“那好吧，要提就提个够吧！”

3月30日，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到了中央：

中央、主席：

军委常委同志一致同意《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认为这是一个在文艺工作方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很系统很完善的文件，部队必须坚决贯彻执行。现送上这一纪要和林彪、江青同志的两封信，请审批。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六年三月三十日

4月1日，毛泽东在彭真送审的中央转发《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指示稿上写下批语：“已阅，同意。退彭真同志。”

到了4月10日，中共中央重新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撤销了彭真起草的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另换了新的批语。

第34回：写《通知》，新成立文革小组 聚西湖，二次开杭州会议

4月12日，书记处会议结束，会议最后决定：

(一)拟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组长由陈伯达担任是毛泽东提议的。当周恩来代表中央向陈伯达提出由他担任这一职务时，陈伯达却忸怩不肯接受，说：“我能力不行，不能胜任，还是换别人吧。”

如此再三，周恩来急了，对陈伯达说：“你作为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

陈伯达赶紧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怕影响党的工作。既然中央相信我，那我就试试，努力做好。”

“好吧。你抓紧拟个名单出来，把小组成员定下来，报书记处研究。”周恩来进一步交代他。

陈伯达想：小组成员首先要有江青，从批《海瑞罢官》到《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能够看出，江青对毛泽东开展文化革命的想法是最清楚的，这次批彭真的《二月提纲》也和江青有关，因此，江青不能少。其次是康生、吴冷西，他们是原五人小组成员，又是毛泽东点名的《通知》修改人员，自然不能少。考虑到以后要大量的起草文件，他把几位得力的“左派”人物王力、关锋、戚本禹、尹达、穆欣列入名单。其实，4月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在上海已经草拟了一份《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于是，又写上张春桥的名字。另外，再加上总政的刘志坚、陈亚丁，他们都参加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起草和修改工作。

很快，陈伯达就将小组成员名单交给周恩来。

书记处会议一结束，吴冷西便找《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关负责人吹风。吴冷西说：“中央正起草一个文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你们赶快写一篇批《二月提纲》的社论。在继续批判吴晗的同时穿插一些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并叮嘱：“以后学术批判稿件不要再送中宣部审定，要自己独立负责。”

吹风一完，吴冷西又飞往上海修改文件去了。

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联名，由邓小平执笔，将中央书记处会议情况及《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一并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

当天，周恩来在视察北京某地电台时，嘱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第一书记丁莱夫把全国的电台布局图，包括中央直属台、战备台，分类分颜色在一张大图上标出送来。

陈伯达重新起草的《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送毛泽东时，康生又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光有通知还不够，应该搞一份大事记作为附件，一起下发。”

于是确定，陈伯达主持起草《通知》，康生负责起草《大事记》。

4月14日，毛泽东对12日报送的《中央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作了一些修改，并写信通知江青：

江青：

送上北京来件二份，请你们研究一下，有何修改？我已请康生、伯达诸同志于今日或明日去上海同你们共同讨论一次，然后由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来此地作报告，最后定案。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八时半

同时，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通知他们：

恩来、小平、彭真同志：

四月十二日的信及附件，收到阅悉。请康生、伯达同志和其他可能去上海的起草小组同志于今天（十四日）或明天去上海，同上海的同志商量一下文件问题，然后请康生、伯达二同志于十六日夜间或十七

日上午来此地。

你们可于十六日来此。

各中央局是否要来人,请你们酌定。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九时

有一些修改,请斟酌。送恩来、小平、彭真、康生同志。

毛泽东

四月十四日上午

当天,周恩来放下毛泽东的电话后,立即把刘志坚叫到钓鱼台8号楼,对他说:

“中央确定你和陈亚丁到上海参加一份中央文件的讨论和修改,你们俩把工作安排一下,尽快去上海。”

从4月10日起至15日,彭真连续召开北京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他们要求所属各级党组织对吴晗、邓拓、廖沫沙进行批判。

北京市委准备在4月16日的《北京日报》上组织批判“三家村”的文章,他们从10日开始就在起草编者按。15日上午,彭真再次召集刘仁、郑天翔、万里“市委三人领导小组”和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的“四人办公室”商定编者按的写法,下午18时许,市委常委又开会议讨论关于“四人办公室”起草的“4.16”编者按。讨论后立即送到彭真的家里,由彭真亲自修正定稿,并决定明日见报。第二天彭真要赶到杭州开会。

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被停止了工作,呆在家里。他和罗瑞卿一样,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期待着有一天能向党说清楚《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创作思路和写作意图。

4月的一天,北京市委机关来了几个人到邓拓家,收走了中共内部仅供高级干部阅读的报纸——《大参考》,同时通知他,以后不再给他送《大参考》了。邓拓问为什么,他们说:是上级的指示。邓拓有点激动,希望今后还能看到《大参考》,来人没有理他,拎着那些《大参考》走了。邓拓跟在他们身后还在说:

“能不能继续把《大参考》给我一份。”

那些人走了,邓拓回到书房里。他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

一本《大参考》，不过是党的高级干部的一种待遇，但此时的邓拓却把它当成是一种象征，一种党仍然信任他、认可他的象征。现在这个象征已不复存在……

从 15 日开始，各大区书记及中央要员陆续接到通知前往杭州开会。

参加杭州会议的人员大部分仍然住在西泠饭店。彭真来的较晚，一到杭州，他就找到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说：“我要求和主席见面，只讲 20 分钟。请你转告。”

但是这次，毛泽东没有单独与他见面。

和彭真一起乘飞机到杭州的叶剑英，在西泠饭店看见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就问他：“这个会议是干什么，3 月不是刚开了会？”

李雪峰说：“我也不知道。”

叶剑英说：“送彭真上飞机时，彭真和我讲了两句，说现在又出事了，他出事了？”

“书记处开会了，毛主席批评了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李雪峰是书记处书记，他讲了一下康生在书记处会议上传达的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然后问叶剑英：“彭真和罗瑞卿的问题有没有关系？”

叶剑英说：“彭真实际上是保罗瑞卿的，这一点，我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没有什么具体的事实。林彪曾经给我打过招呼：要我注意彭真的言行，不要和他拉扯得太紧，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问题。”

4 月 16 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整理发表了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文章，并加了《北京日报》、《前线》的编者按。在编者按中检查了《前线》的发刊词。按语是由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还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北京日报》、《前线》的按语中，把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一些作品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称他们 3 人是“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代表人物”，指责他们“利用学术文章、杂文等形式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是想争取主动，主动检讨，向毛泽东表明他的态度，争取毛泽东的原谅。

当天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未经请示，一早就把《北

京日报》的版面和按语播发全国,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他立即指示通报全国,明令禁止转载《北京日报》的材料和按语。当晚新华社就接到通知,撤销了这份按语,并不再转播。

4月16日,刘志坚和陈亚丁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再一次飞往上海,当天,参加陈伯达、康生、江青召开的会议,讨论修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此时,他们才知道,是毛泽东提议成立了修改《通知》的起草小组,组长是毛泽东提名的陈伯达,起草小组的其他成员早于4月15日就已齐聚上海锦江饭店。陈伯达在会上宣布了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的文化革命起草小组名单: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刘志坚。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吴冷西、陈亚丁、尹达、张春桥、杨永直。

陈伯达首先交代说:“主席指示,请大家来批判彭真、许立群他们写的《二月提纲》,要写个文件把它废除。”“解放以后,将一个中央发的文件废除,并加以批判,这还是头一回。这样做,对中央威信肯定有很大的损害,但也没办法,因为这是原则问题。”

陈伯达做完动员,大家就开始对《二月提纲》逐句逐条地讨论、分析、批判,看哪一条错在哪里,哪一句话错在哪里。这样进行了一天。因为很多东西说起来也是冠冕堂皇的,仅从字面上很难看出错误。这样一句、一条地分析、批判就有点繁琐。于是戚本禹在会上提出:

“我们能不能抓几个主要的问题来进行分析、批判,这样可能工作效率会高点,譬如,把左派当学阀来反对,这条就挺重要。但究竟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我没想好,要请大家来研究。”

陈伯达觉得他的意见有点道理,就让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

王力说:“《二月提纲》就是个纲要嘛。我们是要抓住要害,抓主要问题来批判,一般性的、似是而非、无关紧要的那些东西就放过去,不然这个批判文件就弄得太长了。”

吴冷西接着王力的话题说:“评判谁是学阀,和所谓‘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问题,确实是个要害问题,我们首先要把这些问题辩清楚。”

从这天开始,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参加会议的人几乎一整天都在小会议室里讨论、研究、写作。会议一开就是十几个小时。

陈伯达、康生还要去参加杭州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的起草小组的日常起草工作主要由江青主持。她每天最早来到会议室,看文件比谁都多、都细致。因此,她发议论也多,指令别人看文件和写作的口气也很严厉,每起草完一稿,她立即让人抄清样,由张春桥派专人直送往在杭州的毛泽东。毛泽东修改后将文件返回,由张春桥送回上海,江青立即组织起草小组再讨论、再修改。王力他们笑称张春桥是“秘书长”。

这样几经反复,毛泽东对江青主持起草的文件表示满意,对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也感到信任,因而,就想以参加文件起草小组的人为主,组成一个直接隶属政治局常委的秘书班子,指导今后的文化革命的开展。这个班子的名称最初想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委员会“主任”自然应该是起草小组的“组长”陈伯达了。但是,陈伯达不愿“当官”。他说:

“别当主任了,我还是当小组长吧。”

于是,又改叫文化革命小组。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它是根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宣布:“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社论的发表,极大地震动了文艺界、思想界,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次日,全国各报纷纷转载了这篇社论。

这天,《人民日报》在发表题为《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的学术观点》时,写了一个很长的按语,其中写道:“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首先应当抓住要害,从政治上批判吴晗同志站在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边,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同时也要从学术上清算吴晗同志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一场激烈斗争,是思想战线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这是根据吴冷西的指示赶写的表态文章,但是,已经为时晚矣。

4月19日,中央书记处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因为北京市委毫无

自我批评，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各报按原订计划发表学术批判文章。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彭真的政治前景已然可见。

4月18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及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出访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个友好邻邦国家后从缅甸回到春城云南昆明，住在震庄宾馆，原龙云公馆。当晚刘少奇与坐镇北京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的周恩来通了电话。周恩来话语轻松的说：

“少奇同志，你们辛苦了。”

“还好。中央有什么事情吗？”刘少奇问。

“没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你们出访劳顿，就在春城休息几日再回北京吧。”

“好的，那我们就在那里呆几天。”

4月19日，刘少奇和陈毅准备去西双版纳看看。谁料这天，中央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

在专机未到达之前，刘少奇与陪同他一道出访的陈毅外长在宾馆草坪上一边散步，一边谈着话。

“究竟开什么会呀？什么事情这样紧急？”刘少奇显得惴惴不安。“昨天恩来电话还什么也没说，还叫我们在春城多休息几日，谁知今天中央又来了这封急电。”

“是啊，这样紧急，莫非北边边境发生战事？”陈毅瞅着刘少奇的脸猜测说。他们知道，这几年和苏联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张，战争像搭在弦上的箭，一触即发。

“不知道，恐怕不会吧。”刘少奇陷入于沉思之中。

原来，4月19日，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的电话，立即到毛泽东处。晚上，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通知他速到杭州开会。

刘少奇和陈毅就这样乘上专机直飞上海。

飞机上，王光美对卫士长贾兰勋说：“咱们从国外带回来的水果，你分一下。到杭州后给主席、总理等中央常委们各送一份。别忘了给

彭真也送去一份。”

飞到上海后，毛泽东的专列已经停在上海车站等候他们。因为，从北京调刘少奇的专列已经来不及了，只好从杭州方面紧急调用毛泽东的专列。刘少奇、陈毅同志和王光美上了专列直奔杭州。他们发现，列车上很多地方还没有清扫。估计是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搞卫生。这更增加了刘少奇他们的急迫感。

4月20日，刘少奇他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和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刘少奇介绍这次会议的情况。谢富治主要是谈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匿名信问题的进展情况。

周恩来他们刚到，刘少奇房间里电话就响了。王光美一接，是彭真打来的，说要向刘少奇汇报。王光美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等方便时再找你吧。”

当刘少奇知道这次会议是毛泽东主持，主要就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觉得不便再让彭真单独汇报了，便没再给彭真回电话。

到杭州后，刘少奇的卫士长贾兰勋按照王光美的嘱咐给几位常委送水果。但是，彭真没有住在他在杭州经常住的别墅，谁也不知道彭真的住处。贾兰勋问到警卫局副局长李树指才知道：“住在西冷饭店四层。你去了以后，什么都不要问，看到的也不要对别人讲。”

整个西冷饭店四层一片寂静，见不到一个人。贾兰勋找到彭真的卫士孙孝连时，他惊奇的问贾兰勋：“我的天，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来这里！”

贾兰勋说：“少奇和光美同志让我给彭市长送水果……”

孙孝连赶忙说：“谢谢了！你赶快走吧，我不送了。”

4月19日，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开始，毛泽东谈得很活跃、和缓，他说：

“北京的空气很沉闷，我不愿在那里住，愿到上海来。”

4月21日，刘少奇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因为他从3月26日就不在国内，对这段情况根本不了解，所以会议实际是周恩来主持。在会上，刘少奇点名批评了彭真和陆定一。他在和一些大局长谈话的时候还说：

“彭真在历史上就是反对我的，他是对我搞封锁的。我多次在毛

主席面前说过：彭真这个人可是不好领导呀，动不动就以什么功臣自居，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这一天，毛泽东将一批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批评揭发彭真的简报等7个文件送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亲收，批给北京市委全体委员。第二天，4月22日，刘仁召开市委全体会议，传达这些材料。一直到26日，北京市委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彭真问题。

4月22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不相信只是吴晗的问题。这是触及灵魂的斗争，意识形态的，触及灵魂很广泛。吴晗问题之所以严重，是因为‘朝里有人’。中央有，各大区、各省、市都有，比如文化局、宣传部等等，军队也有。出修正主义，不止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

“斗争要逐步地展开，真正有代表性的，省、市都批评一、两个。军队也有。所谓朝里，不光中央，部门，包括各大区、各省市。朝里那样清？我不相信。”

“2月3、4、5、6、7、5天嘛，不忙那么不忙，一忙那么忙。2月3日急于搞一个五人小组文件，迫不及待。在武汉谈整左派，我不同意。”

“这些材料无非是对、基本对、不对三种。这个通知也是三种：3个月中央翻中央的案，无非是翻、不翻，对、基本对或不对。”

“各地方党委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都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

“过去没有系统管，首先从我起，没有全面地抓。只要你不全面地系统地抓，就不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现在抓嘛！”

“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主要是党、军。多搞一点，都搞干净不可能，如‘四清’一样，清不干净。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不出或出，早出或迟出。搞得好可能不早出。早出也好，走向反面。”

针对《二月提纲》关于“有破有立”的观点，毛泽东说：“先破后立，不破不立，彻底破，破中有立。你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比如马克思破黑格尔就是立，破空想的社会主义就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第35回：送彭真，飞机内一路无语 批李达，工作组进驻武大

4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教育办公室编发的《关于高教部党委召开座谈会部署深入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情况简报》上批道：“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该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

4月24日，杭州会议基本通过由陈伯达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会议确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直接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就在这一天，叶剑英与肖华、杨成武、刘志坚4人联名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报告，揭发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恶劣表现”。

会上，叶剑英汇报了北京揭发罗瑞卿会议的情况，他说：“会议从3月4日开始，4日、5日两天有7个同志发言，对罗瑞卿同志所犯的错误，作了深刻和实事求是的揭发和批判。之后，罗瑞卿同志在准备作检讨发言过程中，提出这样的要求：等到会的同志发言完了以后告一段落，即行休会，让各军区来的同志先回去，等他准备好了，再行召集会议，听他的检讨发言。工作小组同志没有同意他的意见。一直等了6天，到3月12日，罗作第一次检讨发言。这个发言是从上海会议就开始准备的，准备了3个月，但他的发言内容和态度是十分不诚恳的，是十分不能使人满意的。到会同志听了以后，极为愤慨，即席发言作反驳性批评的19人。3月14、15、16日，继续发言的同志有16人，连上次发言的共23人。3月17日，中央指示，扩大会议范围，请中央、国务院有关各部委及各大区中央局和有些军区、兵种、学院等派人参加。会议通知罗瑞卿休会两天后再继续开会，而罗瑞卿竟于3月18日晨跳楼自杀。因为摔伤住了医院，罗就不能参加会议了，以致会议又由面对面，转为背靠背。会议从3月4日到4月8日，共开了一个月又5天，参加会议的共95人。除事假病假外，发言的同志有单独发言的，

有联合发言的，共有 86 篇发言稿。从全部发言中可以看到，同志们对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有揭发、有批判，有建议。差不多全部的发言，都肯定罗瑞卿同志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篡军反党。认为罗瑞卿同志在工作上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又加上跳楼自杀的叛党行为，已经不能继续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了，应下放改造。”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是古人说的话。看来这句话对罗说来，不恰当。罗跳楼前，写了两封没有签名没有月日的遗书，都印发给同志们看了。他说，‘自杀是可耻的’。但是，‘谁为为之，孰令致之？’他竟恶毒地说是会议把他逼死的，说他的可耻行动是被迫的。这简直是对会议的诬蔑，是垂死的反扑。证明罗对自己的错误是想抵赖，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东西，想把错误带进棺材去。”

“批罗”会议军委 7 人会务组代表中央工作组写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于 4 月 30 日上报中央，并由肖华去武汉向林彪汇报，而后林彪带着肖华去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汇报后，肖华留在杭州参加正在召开的第二次杭州会议。

第二次杭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分别与邓小平、聂荣臻、陈毅、李先念、康生等及各大区负责人谈话。这次会议比上海会议还紧张。上海会议还只是叶群和军队的一些人发言揭发罗瑞卿的问题，这次开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彭真。开会期间，与会人员在西泠宾馆吃完饭散步时，六个大区书记没有一个敢和彭真并行，也不和他讲话。即使迎面碰上了，也只能讲些“天热了……”这样的废话，谁也不敢讲正题。

散会时，周恩来叮嘱：因为很快要开政治局会议，大家没有传达的任务。

杭州会议结束后，康生、陈伯达回到上海，参加起草小组的会。康生简单说了说杭州会议的情况，他说：

“到会的每个人都发了言，都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对彭真的问题认识不够，没那么高。都批评了彭真，说彭真检讨不好，过不了关，说彭真作法恶劣，没有经过中央，突然搞了批判邓拓的两个版，以为把邓拓抛出来就没有事了。毛主席说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康生传达时，江青插话，对陈伯达说：“你这个伯达，主席讲《论共产党员修养》是唯心主义的，你还给他修改整理，重新发表在红旗上，

你也真够糊涂的。”

大家听了大吃一惊。康生也很紧张,因为他当时正在主持编辑《刘少奇选集》。

这时,周扬到上海休养,给陈伯达秘书打电话,说“方便的时候想看看伯达兄”。

周、陈二人私交不错,秘书将周扬的话告诉陈伯达,陈伯达问江青,江青生气地说:“你不知道现在要批判他嘛,你还见?”

陈伯达只好对秘书说:“保春,你替我去看周扬同志,告诉他我现在不方便和他见面,叫他好好疗养。”

秘书向周扬转达了陈伯达的问候,周扬说:“谢谢伯达同志,我一定好好休养。”

4月25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杭州会议结束后,中央指定李雪峰和宋任穷与彭真一道乘飞机回京。26日晚,他们在杭州到上海的火车上,27日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都没话讲,3个人就面对面干坐着。大家心里都明白,他们俩的任務是“护送”彭真到北京。

李雪峰刚回到北京,政治局候补委员薄一波、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就相约登门拜访,打听杭州会议的消息。李雪峰得知薄一波、安子文在北京看了杭州会议揭发彭真的7个文件,唯独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通知》草稿,但也不敢透露一点消息。薄一波、安子文很生气,薄一波一拍屁股说:“不说拉倒。”

薄一波、安子文是李雪峰多年老战友,李雪峰作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也不敢造次,可见当时纪律之严明。

从上海会议揭发罗瑞卿,3月会议点杨尚昆、陆定一,到4月会议批北京市委和彭真。中央上层的许多人似乎已经意识到,问题刚刚开了个头,远没有完。谁也搞不清下一步如何发展。这时的北京已经是人心惶惶,大家都很紧张,到处打听消息。

地方各省市中,对毛泽东的意图了解比较透彻的,除华东局外,当属中南局的陶铸等人了。还在北京刚开书记处会议研究彭真问题时,4月10日,广州就召开了“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这个会,基本上还是按照《二月提纲》的要求,以学术批判为主。但在13日的会上,中

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座谈会上讲话时已明确告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反对我们内部的修正主义。”他在阐述了文化革命的形势、任务时，还专门指出在中南地区要挑选主要的批判对象，他点了武汉大学校长、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名，同时也点了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和刘节的名，并与王任重商量向武汉大学派工作组。

李达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1923年秋季，因与陈独秀在建党路线上意见分歧而脱党。他与毛泽东是湖南同乡，关系一直很好。

1927年春，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邀李达讲授社会科学概论。抗战爆发前，李达曾把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寄给延安的毛泽东。1938年初，毛泽东在一次小型干部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让他再寄10本来，你们也可以看看。”毛泽东在信中热情地称赞李达是一个“真正的人”。

1947年冬至1948年春初，毛泽东曾三次电示中共华南局护送李达去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李达。毛泽东致函李达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写得很巧妙，实际上就是请李达速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李达收到毛泽东的密信后，高兴得彻夜未眠。

1949年5月14日，李达安全到达北平后，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5月18日，李达应邀到毛泽东家里叙谈。在谈话中，李达首先向毛泽东检查了他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对此，毛泽东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咎，来者犹可追。”接着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你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是有益的事嘛！只要做了些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当晚，毛泽东就留李达在自己的床上睡觉，自己在桌前批阅了一夜文件。

毛泽东认为，李达思想上一直没有离开马列主义，可以重新入党，并愿意做他的历史证明人。1949年12月，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张庆孚诸人作历史见证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为中共正式党

员，没有预备期。

李达 1953 年 2 月就任武汉大学校长，同时兼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毛泽东每次来武汉，总要见见他。作为东道主的王任重，自然非常清楚李达与毛泽东的关系。

在杭州会议之前，王任重曾试探询问过毛泽东：“能不能批判李达？”毛泽东未置可否。后来，王任重再一次询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对李达进行批判，毛泽东仍未表态。

4 月 18 日，按照与陶铸的商定，湖北省委派出工作组进驻武汉大学。

4 月 19 日，王任重签发了一篇短文，于 5 月 14 日以“王任重”的署名刊登在《湖北通讯》增刊上。王任重在文章中检讨了自己 1962 年在《湖北通讯》（增刊）发表的两个读书笔记。他在文中写道：“审查一下，发现其中也有一些糊涂观点或者错误的观点”；本着“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通通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的愿望，以及四清中提倡的“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的精神，将自己 1962 年读《资治通鉴》的读书笔记序言二则重新刊登在 1966 年 5 月 14 日的《湖北通讯》（增刊）上，“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

1962 年大家读《资治通鉴》是毛泽东带头提倡的，一些省区领导受其影响，欣然从之。湖北省委当时是群贤毕至，秀才荟萃，也一时兴起研读史书热潮。王任重在短文中说，当年发表读书笔记目的是使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也为了“使干部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的民主的重要性”，实际上仍是“资治”之用。不过，“现在看来，当时不写这种读书笔记，而强调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好了。湖北省委是一贯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但是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认识水平”。

4 月 19 日，王任重再次参加杭州会议，他又向毛泽东谈及李达的问题，当询问可不可以对李达开展批判时，并说湖北的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时，毛泽东说了一句：“既然群众有要求，在校内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但不要点名，也不登报。”

王任重从杭州回到武汉，于 4 月 25 日召开湖北省委会议。他一

连3天，派车把武汉大学哲学系助教陆老师接到其百花村住所，听她汇报已经搜集到的关于李达等人的材料，并指示她：要将她当面汇报的材料再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陆老师原在政治系工作，1964年政治系撤销后才来哲学系。应当说，她并不怎么了解李达。但是，这并不影响她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搜集李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材料。

王任重依据武汉大学陆老师提供的材料，点了武汉大学哲学系和中文系的名。他说：“武大哲学系，哲学史学四年，马列主义只学一年，毛主席著作只学六周。”“工农调干学生为反对学哲学史，被迫退了学。这是共产党干的事么？”他断言，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文化教育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目标要针对知识分子，文革的结果之一，就是要查出占总数5%—10%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作为新的右派。

湖北省委确定武汉大学为“教育革命”的试点，4月28日，派省委书记处许道琦和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汉大学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

王任重特别指示：“要把李达斗倒，关键在于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教育革命领导小组根据这个指示，对他们所确定的“知情人”，包括李达的编书助手、秘书、警卫、司机以及与李达有工作关系的教员和干部，日夜追逼，要求他们按已经定下的框框写交待、揭发材料，“拿出定性的东西来”，“一句话也要”。在那种“知情不报就是对组织不忠，对毛主席不忠”的时代氛围下，一些人出于对组织的忠诚，或出于自我保护，都不得不揭发交待。于是，“教育革命领导小组”很快便编印了《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并由王任重加上夹批按语上报中南局和党中央。

王任重在上报党中央的这份材料时又附信请示：“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附信还说：“我看这一场革命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第36回：表决心，发誓欲焚平生作 集北京，政治局开扩大会

4月28日、29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又两次同陈伯达、康生谈话，对彭真和北京市委提出更加严厉的批评，并在党内一些文件上删去彭真的名字。他对康生、陈伯达说：

“你们写了《通知》，我这次的增加，加油加醋。”

“北京市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是向他的反面发展的，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垮台的条件，这是必然的事，是从偶然中暴露出来的，一步一步深入的。历史教训并不是人人都引以为戒的。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他的错误要攻到底！凡是在中央有人搞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攻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彭真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西风吹渭水，落叶下长安’，告诉同志们不要无穷地忧虑。灰尘不扫不少，阶级敌人不打不倒，倒了还要起来反抗。

“我赞成鲁迅的意见，书不可不读，古书不可多读，但经史子集，也要硬着头皮读一下，不读人家会欺负你。

“现象是看得见的，本质是隐蔽的。本质也会通过现象表现出来。彭真的本质隐藏了三十年。”

他严厉地说：“出修正主义不只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出了修正主义就大了。”在毛泽东看来，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必须当机立断，“全面地系统地抓”，发动一场大革命，来解决这个已经迫在眉睫的问题。

5月5日，毛泽东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参加。毛泽东在会见时的谈话中，把自己焦虑心情表露得十分明显，并且说到要在有生之年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他说：

“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

“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

“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他们在做地下工作。列宁说过，被打败了的剥削阶级还强于胜利的无产阶级。列宁又讲，农民、小资产阶级每日每时都生长资本主义。打败了的阶级是哪些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而群众就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还有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包进来了。还有地主阶级的儿女。过去我们的大学生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儿女。工人、贫农、下中农都进不起学校，小学都进不上，进上小学进不上中学，何况进大学？旧的知识分子至少有几百万人。群众的文化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我们没有掌握。那么多小学，我们没有小学教员，只好用国民党留下来的小学教员；我们也没有自己的中学教员、大学教授、工程师、演员、画家，也没有搞出版社和开书店的人员。那些旧人有一部分钻到党内来，暂时潜伏不动，待机而起。等于赫鲁晓夫潜伏不动，待机而起一样。

第二个可能就是剥笋政策，一层一层地剥掉，剩下的是好的，把坏的剥掉。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四十五年了，我们就初步地剥了

一遍,剥掉了不少反动的: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张闻天、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罗瑞卿、彭真等等前后几十个中央委员,还有睡在我们身边没有发现的。”

“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

在讲到邓小平时,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懂军事的,你看他人这么小,可是打南京是他统帅的。打南京是两个野战军,差不多一亿军队。接着打上海,打浙江,打杭州,打江西,打福建,然后他们第二野战军向西占领四川、云南、贵州。这三个省差不多有一亿人口。”

就在第二次杭州会议进行之际,4月1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上,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根据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精神,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报告,向与会人员通报了正在全国进行的文化革命情况。

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颗手榴弹,我也愿意……”

郭沫若的这个讲话,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后,于4月28日在《光明日报》上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标题,全文刊登,立即引起国内外的反响,称之为轰动一时的“焚书”声明。尤其是在日本,郭沫若享有很高的威望,日本的一些友好人士,如松村谦三、黑田寿男、宫崎世民等人,竟然要求亲赴中国,想当面询问郭沫若“焚书”的真意。

然而,郭沫若却一身轻松踏上了西去巴蜀的列车,与主管经贸口的副总理薄一波一起视察、参观成都和渡口,即现在的攀枝花市等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这次行程,他还有一个微妙的私人意图,就是计划回久别 27 年的老家乐山沙湾镇看看。正当郭沫若在参观中准备返乡时,5 月 1 日晚上,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令,回京参加 5 月 4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一个没有党内职务的普通党员,能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显然表明郭沫若的特殊身份。

5 月 1 日这天,北京全城洋溢着一派节日气氛。天安门广场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里,到处都是锣鼓喧天,载歌载舞。这一天的天气也格外晴朗,风和日丽。然而,5 月 2 日,细心的人在报纸上没有发现彭真的名字。

彭真身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自从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1966 年 5 月 1 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

5 月 4 日,星期三。上午近 10 时,一辆辆小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从车上下来的人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走进河北厅。为传达、落实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在北京特别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有关负责人 76 人。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也扩大参加会议。此时江青还在上海。

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他仍在杭州西湖边那幢别墅里,5 月 1 日,他看了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名单及有关材料,并批示:将所有材料都先发给与会人员看。5 月 3 日,毛泽东从杭州来到上海。此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康生每天都会向他汇报请示。

刘少奇主持了会议,他宣布开会后,介绍了会议的起因、议程及出席人员的范围和会议的开法。

会议的第一个议程是讨论通过杭州会议讨论通过的《通知》,但大多数与会人员还不知道为什么要突然发这样一个《通知》。因此,先安排了几天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相关情况。

首先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自1962年9月以来,特别是1965年11月以来的一系列指示,介绍了这次会议将要通过的《通知》的起草经过,也谈了他自己的一点体会。他从5月5日下午开讲,一个半天不够,6日上午又讲了半天,加起来差不多有8个钟头。

康生历数了《二月提纲》下发前后的过程,重点叙述了《提纲》下发后的重大事件。他说:

“4月9日、11日、12日,中央书记处开会。彭真要求首先发言,讲他从来不反主席,没有包庇吴晗,只包庇了邓拓,错误就是主张‘放’。第二天,康生发言批判彭真,从1965年9月一直到1966年3月,主席说北京市连针都插不进去。第三天,陈伯达谈彭真在历史上的问题。

4月22日在主席处开会。

4月28日、29日,毛主席又谈了两次话。林总说,《通知》的最后一段,‘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是惊心动魄的一段。”

在传达1966年3月底毛泽东的三次谈话时,康生说:

“我个人体会,毛主席这三次谈话,概括起来是两条:第一条是批评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压制左派,不准革命;第二条是给任务,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学术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贯穿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义,出了怎么办?现在已经出了,罗瑞卿是一个,彭真是一个,杨献珍是一个,杨尚昆是一个,田家英、邓拓、廖沫沙也是。”

在讲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时,他着重强调:“这次运动要粉碎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个文件的通过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运动的开始。”

他自我检讨说:“王明路线的时候,我犯过错误,当时职工国际有一个文件,说少奇同志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我也相信了,攻击少奇同志在职工运动方面是右倾机会主义,还在《斗争》上登过反对少奇同志的文章,署名为谢康。这个谁也不能怨,只怨自己的思想错误,没有看到少奇同志是在白区代表毛主席的路线的。”“在延安我向你做过检讨,在今天我还要向你检讨,将来还要检讨。不能像有的人,当时反对你,还代替了你,一点检讨也不做。”

康生说:“《通知》可以议一下。可以说原《提纲》是对的,《通知》

是不对的。顺便解释一下：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叫《通知》好不好？我同伯达考虑过。少奇同志和陈总都考虑过。问主席，主席讲，还是叫《通知》。为什么？他没有解释，但他反复讲过，要大家议论：两个文件，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22日会上，主席讲可以允许推翻《通知》，赞成彭真的文件。允许讲彭真那一套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5月6日下午，由列席会议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张春桥在会上介绍情况，他讲了6个问题：

- 1、十中全会以后；
- 2、姚文元的文章发表的情况；
- 3、姚文发表以后；
- 4、彭真同志第一次到上海；
- 5、彭真同志第二次到上海；
- 6、许立群同志的电话。

他从八届十中全会讲起，一直讲到1966年，重点也放到1965年11月以后。他详细介绍了批判《海瑞罢官》的全过程。张春桥说：

“据我知，主席对吴晗的《海瑞罢官》早有意见，但我们也知道北京对此戏评价分歧很大，甚至有人说此戏是根据主席指示写的。我曾问过林默涵到底分歧有多大，他说很大，也未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想研究一下，一研究，就发现海瑞的宣传出乎意料的多，剧种很多，什么京剧、沪剧，各种剧都在演海瑞。上海广播电台64年还在广播此戏，《生死牌》搞了电影。出了盲人故事。中小学课本有海瑞，大学就不要讲，一大堆连环画、小人书，各种宣传工具都用上了。”

“我到北京请江青问主席，是否可以批判。主席说，他没有提倡过写海瑞，只是在湖南彭德怀叫他看《生死牌》，戏里谈到海瑞。主席回来就查明史，说海瑞未在湖南作过官。请同志们看看，如此而已。”

其实，在1959年8月16日庐山会议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说：

“现在听说海瑞出在你们那个里头，海瑞搬了家了。明朝的海瑞是个左派，他代表富裕中农、富农、城市贫民，向着大地主大官僚作斗争。现在海瑞搬家，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我不是在上海提倡了一番海瑞吗？有人

讲，我这个人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欢出现海瑞。那有一半是真的。海瑞变了右派我就不高兴呀，我就要跟这种海瑞作斗争。”

对怎样批判《海瑞罢官》，张春桥说：“我们考虑过，究竟批评哪一个？是《海瑞罢官》，还是《海瑞上疏》？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写得太露骨，应该批判影响大的。”

对于文章发表前为什么没有同北京市委打招呼，张春桥是这样解释的：“还有一顾虑，即和北京的关系。我们当时不敢打招呼。文章一送中宣部就登不出来，我们考虑不必要送审了，主席9月会议已经讲了话，可以批评吴晗嘛，这时如再问彭真好不好？我们反的是资本主义，如彭真说主席已批准，为什么还问我？所以就未打招呼，还有批评周谷城也没给上海打招呼嘛。虽不是副市长，周谷城的地位也很高，也是政协副主席。我们看到批判周谷城的文章以后，因为准备不够，也很紧张，周谷城要自杀，我们毫无准备，但无怨言，因为周谷城应该批评。”

张春桥接着说：“姚文章发表的前3天，先请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等十几个人提意见。他们对最后一部分（关于政治问题），统统反对。这是我们估计到，斗争将是激烈的。文章发表后，反映强烈，除西藏外，全国各地来稿来信达到1万多件。意外地是三件事：

- 1、范瑾、沙英问背景；
- 2、北京各报都不登，这是谁向谁专政？

3、20日决定印小册子，24日印出，北京新华书店不表态。总之，封锁的严严的，姚文进不了北京。不是彭真统一布置，又有谁有这样大的权利，可以这样布置？我们实在气愤极了。”

“《二月提纲》中提到的所谓学阀，不是指姚文元，也不是指上海市委，而是针对毛主席的；所谓‘武断’，还不是指毛主席把《海瑞罢官》同政治问题、庐山会议联系起来，说要害是‘罢官’；所谓‘以势压人’，还不是说毛主席以势压人，上海市委以势压人。许立群的这个电话，是彭真这个党阀的本质暴露。4月1日深夜，彭真同志给曹荻秋同志打电话，……4月2日，市委书记处开会，认为这个电话根本不是道歉的，而是把他说过的话统统赖掉了。我们觉悟到，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了。”

第37回：“三家村”，呼“万岁”彭真不服 回羊城，陶铸中南局部署

就在人民大会堂内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的当天，5月4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指出：

“在当前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战胜谁的激烈而又长期的斗争。必须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以及其它各种文化界中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一件头等大事。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坚决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文，但做了删节。

5月6日，《中国通史》的作者、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致信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黎澍：“运动发展到惊人的程度，问题之广大之深，简直不可想象”。

范文澜请他们对自己匆匆写出的检讨草稿提意见。“高的调门不必减低，说理不妥处可改”。

接着的信，一封比一封更紧张。其中一封信说：“有人从康老那里听说，郭老发表了谈话，得到主动，范某也该主动有所表示才好。我那稿子，比起目前形势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希望嘱打字员快打出来，快派专人送来，以便交康老请批示。”

又一封信说：“昨天我晤陈伯达同志，他直言相告，大意说我倚老卖老，没有自我批评，保封建皇朝，不要以为有些知识就等于马列主

义。郭老批评就主动了。更使我惊心的，是说你年老了，不能要求你有多的马列主义。似乎我要学也不成了。我看情况很不好，昨和黎澍同志谈，请他大大增加自我批评的文字，请他站在敌对方面大加抨击，打倒老朽昏庸之辈。大势所趋，不可有姑息原谅之心。请你助黎澍同志加强批评。愈过头愈好，不过头，别人会来补的，那就麻烦了。”

5月7日上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讲话，仍然是批判彭真。他用“新账老账一齐算”的办法，着重揭发彭真历史上的问题。

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人的讲话给了与会者强烈的印象，极大的震撼着参会人员。许多人没有想到，彭真的问题竟如此的严重，竟然敢反对毛泽东主席？！

5月7日下午，肖华发言批判彭真，共分4个部分：

- 1、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
- 2、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
- 3、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
- 4、彭真和罗瑞卿究竟是什么关系？

肖华说：“我认为是一个反党联盟，是一窝子，几个案子实际上是一个案子。”

在肖华发言过程中，李富春、陈毅、谭震林都插话批判彭真。

5月7日这天，刘少奇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谈话：“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由你去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再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连续3天的情况介绍，使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受到强烈的震动。5月8日、9日，与会人员阅读文件。

5月8日，华北局按照中央的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工作组组长李雪峰，副组长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池必卿。工作组召开大会，号召干部揭发市委领导。市委机关内部开始出现大字报。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部长黄志刚率华北局组织的另一个工作组进驻《北京日报》社。

5月8日这天，《解放军报》这天发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这篇文章是军报的几名编辑奉康生、江青指

令撰写的,重点批邓拓的《燕山夜话》。“高炬”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简称“高举”之谐音,是在那个年代,由军报领导人挂帅撰写重点文章使用的一个笔名。

江青还将《红旗》杂志社林杰等人早已编好的《〈燕山夜话〉摘编》交给军报,要求和高炬的文章同时见报,并交代军报批《燕山夜话》的口径应和《〈燕山夜话〉摘编》及其配发的编者按语保持一致。

文章其实早已写好,但没有马上发表。康生、江青交代:“先放一放,等时机最有利时再发表。”直到5月4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要揭开彭真的盖子了,康生通知军报于5月8日将文章发表。同时还用了两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红旗》杂志的林杰等人编的《〈燕山夜话〉摘编》及其所加的编者按语。

高炬的文章指出:“邓拓是他和吴晗、廖沫沙开设的‘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是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一个头目。他们把《前线》、《北京日报》以及《北京晚报》作为反党工具,射出了大量毒箭,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文章还说:《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它的作者,“他们以谈历史、传知识、讲故事、说笑话做幌子,借古讽今,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对我们伟大的党进行了全面的恶毒的攻击。辱骂我们的党‘狂热’‘发高烧’,说‘伟大的空话’,害了‘健忘症’,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在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极力为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吹捧他们的反党‘骨相’和‘叛逆性格’,鼓励他们东山再起。诽谤无产阶级专政,极力煽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宣扬腐朽没落的封建道德和资产阶级思想,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我们一定不放过他们,一定不放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同日,《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写的《擦亮眼睛、识别真伪》的文章。文章主要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文章说:

“《北京日报》在4月16日,以三版的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

〈燕山夜话〉的批判》这个通栏大标题之下,发表了一批材料,并发表了《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看样子轰轰烈烈,非常革命,并且好像是首先发难,对邓拓和他的《燕山夜话》进行批判。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阶级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必须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千万不要上当。”

“《前线》《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要‘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展开严肃的批判’。这是真的吗?不是,这是假的,是假批判、真掩护,假斗争、真包庇。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是他们一伙的一个头头。可是,编者按却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读者的欺骗”。

关锋在这里重新使用何明的笔名,也是针对彭真、许立群整理“左派”材料一事来的。

《光明日报》还同时刊载了《〈三家村札记〉摘编》,也配发了编者按语,与军报的高炬文章和《〈燕山夜话〉摘编》及按语相呼应。

5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马泽民、阎长贵、周英、滕文生、靳殿良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全国各报立刻转载。这篇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经过毛泽东的亲笔修改。

文章发表的前一天,5月9日晚上,《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马达接到上海市长曹荻秋的电话,让他立即到曹荻秋家里去一下。

一进门,曹荻秋即交给马达厚厚一叠清样稿,对他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

马达接过清样一看,第一页上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

即发,毛

标题要大些

原来的标题比较长:《评反党反社会主义大黑店“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上面有毛泽东用铅笔划掉的笔迹,只留下四个字《评“三家村”》和副标题。毫无疑问,这是领袖的亲笔指示。马达连夜带领报社的干部、职工一丝不苟的完成了毛泽

东和曹荻秋交给的任务。

5月10日下午,500份《文汇报》由上海空运抵京,一辆小轿车已等候在机场。转眼之间,这500份《文汇报》便发到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会人员的手中,人手一份。

1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也登载了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

同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指出:“同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5月10日至14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小组会讨论。

5月1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举行全体会,刘少奇主持。

参加会议的人员发现每人的桌子上都放着一张文件,字有核桃大,是林彪的亲笔复印件,上面的字样是:

我证明:

- 1、叶群在与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
- 2、叶群与王实味根本没有恋爱过。
- 3、老虎、豆豆是我和叶群的亲生子女。
- 4、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谣言。

林彪

这是针对陆定一的夫人严慰冰的,这次会议的文件中就有严慰冰的匿名信。

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坐在第一排,他正在看林彪的证明,彭真来到他身旁,俯身想和他说话,这时,就听到后面有人在念彭真的材料。彭真突然火冒三丈,回身就喊:“谁是第一个喊万岁的!啊!谁是第一个……!”

当年在延安,是彭真最先喊出“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坐在主席台上的刘少奇赶紧予以制止,彭真不说话了。

只见聂荣臻又拿起林彪的证明,生气的冲主席台上的人说:“发这个做啥?收回!”

接下来,开始分组讨论《通知》。此时,与会者已经知道《通知》是“大秀才”陈伯达执笔,由“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一起起草的,毛泽东从4月14日至30日先后对《通知》审阅修改8次才定稿。各小组

的讨论,众口一词,一致拥护。有几人,如郭沫若等,提出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引号等。但是都被陈伯达、康生否定了,可以说是一字不改。

这些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多次播出批判“三家村”的文章,点名批评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各级党组织纷纷布置本单位的人员写大字报,积极投入到批判“三家村”的斗争中,尤其是大、中、小学校都接到通知,组织学生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瞬时间,全国各地报刊的批判文章、各学校和机关单位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大批判遍及全国。一时间,“三家村反党集团”正像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大会上所言,是高山上倒马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当时各地还传唱一些童谣,如:“邓拓、吴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等等……

大批判对全国文化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中国自春秋以来的文化、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作品、当代所有已出版的文章几乎都在接受人们的批判,文人骚客纷纷审查自己的作品,就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也不例外。从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天津市市长胡昭衡等等,凡是在文学领域有所著述的人,都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梳理,作自我批评,或接受别人的批判。

4月27日,陶铸参加杭州会议回到广州,立即召开中南局常委会,决定召开三级干部会议。5月3日,《羊城晚报》的《学习》周刊第五期,以编者按形式,提出学术问题必须和政治挂钩。编者按说:“只有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作为吴晗的外衣和武器的学术观点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

5月9日,陶铸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出席的有各省市委第一书记、文教书记、宣传部长等。会议后一段吸收全区各地委第一书记参加。鉴于全国形势的发展,一日千里,如火如荼,会议圈定了中南各省准备点名批判的名单,决定在广东公开点名批判四个人:容庚、刘节、秦牧、柯麟。

容庚,著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历任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等职。从1952年起,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至今。著有《金文编》、《续金文编》、《商周彝器通考》、《海外吉金图录》等书。

刘节,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任河南大学

教授，后在北平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又任教于燕京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在浙江大学、金陵大学任教。1940年至1944年间，在重庆专心于古代史研究。1953年到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

秦牧，著名作家。1938年开始在广州报刊上发表作品。历任广东省文教厅科长、中华书局广州编辑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

柯麟，1926年加入中共的老党员。1928年，在上海开设达生医院，是为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他本人则为上海中央特科成员。1936年到澳门，先后任澳门镜湖医院院长、镜湖医院慈善会副主席、名誉主席，1949年任澳门南通银行董事长。1952年才返回广州，任中山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这4人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中南区其他内定准备公开批判的人，还包括广西的陆地、河南的郭晓棠、湖南的康濯等。那么，谁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谁是他们的根子？在中南局会议上，赵紫阳突然提出：“秦牧这个人是有后台的，后台就是王匡。”

秦牧是《羊城晚报》的副总编辑，而《羊城晚报》是中南局主管的。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宣传部部长的王匡几乎被这当头一棒打懵了。陶铸怒形于色地表示：“王匡这个人右，长期右倾。”

会后赵紫阳向王匡解释说：“我只是想把广东省委和中南局分开。”

陶铸还特别让人关照秦牧：“不要这么紧张，要有思想准备，文化大革命还是要检讨的。”5月13日，由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高校、报社负责人会议，布置批判“三家村”。在随后召开的文艺界声讨“三家村”大会上，秦牧仍然可以登台发言。

第38回：飞上海，毛泽东紧急召见 绘蓝图，《五七指示》述心愿

中央的《通知》文件起草完后，江青即让戚本禹回北京，并叫他不用再去《红旗》杂志了，直接回中南海，说：“关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

过了五一节，戚本禹去中南海找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已在原来刘少奇住的甲字楼里给他安排了办公室，并在钓鱼台也为王力、关峰、戚本禹他们安排了办公室。

5月12下午，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到钓鱼台找戚本禹，通知他说：“主席要见你们，你和陈伯达、杨成武三个人明天一早赶到上海。”

戚本禹放下电话，马上通知了陈伯达。然后又打电话给杨成武，杨成武说，他也接到徐业夫的电话了，并且已经安排好飞机，让戚本禹和陈伯达明天一早去北京郊区的某军用机场乘专机去上海。

5月13日凌晨3时，杨成武就来电话催戚本禹他们出发。戚本禹和陈伯达坐车来到机场，与杨成武会合。他们刚登上飞机后，飞机就起飞了。

飞机上，戚本禹心里嘀咕：“主席这么紧急地召见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那时正在传说北京有发生军事政变的迹象，这次又有代总参谋长同行，他想，是不是与军事政变有关？

大约飞了三小时左右，飞机抵达上海虹桥机场。徐业夫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在去宾馆的汽车上，徐业夫把几份印好的文件分给他们，是林彪5月6日转呈给毛泽东的解放军总后勤部的一份《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以及毛泽东于5月7日在这份报告后写的一封致林彪的信。毛泽东通过对这份报告的批示，描绘出一幅他心中，也是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心中理想社会的蓝图。信的全文是：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可能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就是后来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的《五·七指示》。

陈伯达他们在车上就看起了文件。清晨7时左右，汽车停在了毛

泽东下榻的上海西郊宾馆 12 号楼。护士长吴旭君叫他们在客厅里先坐下，她去告诉毛泽东他们到了。

客厅不是很大，在客厅的一端是两张单人沙发，对面是一张三人沙发，在两面沙发的边上都各有一把椅子。杨成武硬要让戚本禹坐沙发，他自己坐旁边的椅子。

戚本禹觉得杨成武是老革命，自己一个小青年，怎么可以让他坐椅子，自己坐沙发呢？经一番推让，最后还是戚本禹坐椅子。大家坐下后，依然都埋头继续看文件。

一会儿，毛泽东穿着睡衣从客厅旁边的一间卧室里出来，和他们一一握手打招呼。在和戚本禹握手时，还说了一句：“好久不见了。”因为自 1964 年夏，戚本禹被调去《红旗》杂志社后，就没有再见过毛泽东。

毛泽东又说：“上次讨论哲学问题，让《红旗》派人来，你没有来。”

毛泽东指的是 1964 年秋，他会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后，召集了一些人作了一次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

大家入座后，毛泽东拍了拍他旁边的单人沙发，让戚本禹坐在他的边上。一会儿，江青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戚本禹马上起身要让座给她，毛泽东用手示意，要戚本禹仍坐在他边上，江青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

这时，护士长吴旭君给毛泽东送来了早餐。一杯加了点麦片的牛奶，还有一小碟烤馒头。

毛泽东喝了几口奶，开始说：“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看的文件。从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有什社会发展的长远计划，人类社会发展应该有个远景计划，这才是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批评哥达纲领等书中讲了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具体的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以前谈过张鲁，张鲁是东汉末年的农民领袖，与黄巾一党，他也有共产主义思想，这些想法大概来源于古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古书上那个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的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点，所以张鲁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在张鲁那里治病

不要钱，吃饭也不要钱，但不能乱吃，吃饱就可以了。有的人，例如一些贵族豪富，吃那么多，浪费那么大，总不好！”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是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解放军战士除了军事，可以做工，务农，又能学习文化知识，发展艺术才能。劳动者的劳动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与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做领导的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要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戚本禹注意到，“此前主席虽然说过现在官僚特殊阶级已在形成，但这次说的还是特殊阶层。”

毛泽东继续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一起修改一下。”

随后毛泽东征求他们看了文件后有什么意见？

陈伯达首先发言。他说：“文件刚拿到，虽然是初看，但感到主席的这个批示非常重要。”“我们在大跃进时，探索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这又是一次探索，主席这次的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可行性很大。”“我们不久前提倡的‘半工半读’也是一种探索，不过做起来像是勤工俭学，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理想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太杂，不大可行。”

1958年，毛泽东曾让陈伯达和张春桥去看过嵖岈山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他们回来后对嵖岈山也没有怎么肯定，只是说那公社的书记挺能吹的，态度明显有保留。

陈伯达接着说：“嵖岈山的设想没有主席这个指示好。主席的指示指出了在现在的生产条件下，怎样做到人的全面发展，完全符合马克思讲的在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陈伯达讲完以后，杨成武说：“部队搞生产意义很大，照这样下去，我们都可以不领军粮了，这对战备是很有意义的。”

毛泽东插话说：“我历来主张军队粮食自给。”

杨成武接着说：“战士学文化好，这样军队的文化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部队就是缺文化，又能打粮食又能学文化。这个好。”

他还说：“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总后报告中说的还要好。”

毛泽东让他把那份材料拿来看看。杨成武回答说：“已经送上去
了，可能还没有送到主席这里。”

戚本禹在这之前就抄过毛泽东对《张鲁传》的批语，并看了很多
遍，一些词句已能背诵。此时，他从引述毛泽东《张鲁传》的批语开始
说起，当说到张鲁统治的地区“不置常吏”时，毛泽东插话说：“就是不
要当官的，‘皆以祭酒为治’。”

“祭酒为治”就是由群众公推出的人来管理地方的各种事物。接着，
戚本禹说起在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的时候，看到工厂边上就有很多
土地，如果也能用来搞农业，工人生活就会大大改善。他说前些
天刚去“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没想到，我们的战士也会批判
《海瑞罢官》。原来以为那些古代的事情，战士可能不清楚，哪知道战
士都很清楚。”

毛泽东很注意地听了戚本禹复述的战士的话，然后问：“会不会是
知道你要去，他们指导员事先请人来跟他们讲课，做了些准备？”

戚本禹说：“这我倒不清楚，但战士们有些问题说得很好，比我写
的文章还要好。比如战士们说，那个‘清官’也是压迫人民的，而且有些
‘清官’压迫人民更厉害。因为‘清官’有民望，受老百姓拥护，所以
他们镇压农民起义往往更没顾虑，也更残酷，来了就杀，比贪官更凶
狠，曾国藩就是如此。”

毛泽东听了说：“对！曾国藩杀人厉害，范老（文澜）说老百姓叫他
‘曾剃头’。”

毛泽东还说：“《老残游记》上也讲‘清官’杀人厉害。说‘清官’的
红顶子是用血染的。”

陈伯达说：“太平天国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康有为的《大同
书》，都没主席的批示提得好。”

毛泽东说：“太平天国起初也是有理想的，但在定都南京后，它的
上层很快就腐败了，领导人自己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们还会认真
去搞什么天朝田亩制吗？我们让大家都来批判资产阶级，就是要防止
再搞出新的资产阶级来。共产党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要是脱
离群众，不继续革命，甚至腐化变质，转过来压迫人民，那么人民也会

起来反抗的，也会出陈胜、吴广，瓦岗寨。”

戚本禹接着毛泽东和陈伯达的话说：“主席的设想挺好，人不能一天一天老是干同样的活，一边干活一边学习，学工的可以学农，学农的可以学工，还要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那样人就可以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工厂、公社、机关、学校要都按照主席的这个设想去做，那这个社会就越来越理想了。”

戚本禹感到毛泽东描绘的这种社会前景，比陶渊明的“桃花源”和康有为的《大同书》都好。而且，都是可行的，起码它在解放军的部队里已经实现了。

毛泽东听了笑着对戚本禹说：“你是年轻人，你们只要贯彻不断革命的精神，把革命进行到底，也许能看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曙光。”

到吃午饭的时候了，毛泽东让他们下午修改文件，回去后再向政治局做汇报，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那天，周恩来也到了上海。当晚，魏文伯、曹荻秋请周恩来、杨成武、陈伯达和戚本禹吃饭，周恩来说他晚饭后要去毛泽东那里，陈伯达就让周恩来把他们起草的中央《通知》稿交给毛泽东。周恩来还约戚本禹第二天早晨一起到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呼吸新鲜空气。

第二天早晨7点多，戚本禹去了。没想到，周恩来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了。戚本禹不好意思的说道：“我迟到了，变成贪睡的小张良啦。”

周恩来笑了笑，谈了几句闲话，就问起戚本禹的家庭状况和工作经历，然后对他说，在李秀成问题的讨论中，他看到了毛泽东对李秀成“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的十六字的批示，端正了认识。他对戚本禹说：“这件事情我对不起你，周扬开会批判你是我批准的。我其实也觉得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气势。可他们都要批，讲了好多理由。我也没有好好研究就批准了。幸亏主席及时发现了，不然要犯大错误”。

周恩来说的这件事是1963年，尚名不见经传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由此判定李秀成是“认贼作父”的叛徒。

几乎是在同时，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肯定了一出正在排演的名为《李秀成》的话剧，赞扬李秀成“忠勇”。他自然不能同意戚本禹的“叛徒”之说了，于是指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戚本禹的文章。到了9月14日，中宣部召集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及《新建设》杂志负责人开会，专门讨论戚本禹评价李秀成文章。除郭沫若以外，历史学界在北京的头面人物基本都到会了，如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邓拓、刘大年、李新，等等。大多数与会者不认同戚文，认为不能简单化地判定李秀成为叛徒，应做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尤以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发言最为激烈，他说戚本禹根本不懂得历史。

周扬同意与会者的多数意见。他认为戚本禹的文章是一种“翻案风”。他提出了两个“补救”办法：“第一，由中宣部在内部发一个通知，要各地对戚本禹这篇文章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评论或讨论，随后由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刘大年写一篇正面评价李秀成的文章，仍由《历史研究》发表，作为史学界的基本意见。第二，刘大年的文章写出、发表需要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北京史学界人士先开个座谈会，会后发个消息，在报上刊登一下，表示北京史学界不同意戚本禹的意见。让大家知道，戚本禹的文章不作准。”

这次会议后，中宣部下令，因戚本禹的文章而停演的话剧《李秀成》照旧演出，10月1日国庆演出了三场。

后来毛泽东那“十六字批示”下来后，戚本禹的状况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此时，在上海锦江饭店的顶楼阳台上，戚本禹对党的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事亲自向他作自我批评，十分感动。

第39回：部署忙，北京城调兵遣将 说政变，全党上下皆震惊

此时的中国，尤其是北京，已经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每天声讨和抗议的人群，络绎不绝的涌入位于北京建国门内大街20号的《北京日报》社和位于台基厂的北京市委大楼，院子和楼道内贴满了“打倒彭真”“砸烂独立王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大标语和大字报。

5月14日0时40分，正在上海的周恩来指示广播事业局代管北京市广播电台。当天上午广播事业局研究确定了代管方案，周恩来立即批示同意。

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曾担任党、政、军要害部门的领导，他们接连发生问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4月杭州会议期间，他单独召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提出北京的安全保卫工作问题。而且，彭真的问题出来后，北京市委基本也瘫痪了，此时需要有一个机构把原北京市委的工作抓起来。

5月14日早上，周恩来在锦江饭店顶楼阳台上与戚本禹一起呼吸了新鲜空气后，当天回到北京，请叶剑英到中南海自己的住所西花厅，商讨如何加强首都的警卫工作。商量的结果是：尽快成立一个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解决扩建北京市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他们二人决定选调警卫部队及配备好卫戍区的领导班子。周恩来建议，这个小组就叫“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首都工作组”。

5月14日，毛泽东关于陈伯达、杨成武、戚本禹三人起草的那份《通知》的批复下来了，说陈伯达他们写的东西可用，让他们带回北京。当天上午，陈伯达他们即坐飞机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陈伯达立即向中央政治局作汇报，戚本禹则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杨成武也向林彪做了汇报。

5月1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致通过了陈伯达、杨成武、戚本

禹三人起草的文件，向全党转发了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认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经毛泽东审阅过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摘要公布了这封信的内容。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社论还认为，按照“五七指示”去做，那么，就“能够进一步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能够更快地铲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就可以培养出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全面发展的亿万共产主义新人”。

这是毛泽东对理想世界的一次展望。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紧迫的现实政治目标外，还有他心目中美好新世界给他投下的动力。这里面有着许多中国共产党人曾经经历过的战时共产主义制度的烙印，所以也激起了许多老党员对自己曾经走过的光荣历程的回忆，激发了年轻人对美好社会的遐想和追求，激励他们更加狂热地投入到为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文化大革命中去。

周恩来也在5月15日，和叶剑英联名，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一事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为组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兼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公安部长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首都工作组”组员有：

总政副主任刘志坚；

华北局第一书记兼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

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

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

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副市长万里；

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苏谦益。

5月16日至22日，公安部队党委在北京饭店召开各省、市、自治

区公安总队领导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书记处第407次会议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归解放军系列。

5月16日深夜24时，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向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传达了中央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的指示，并交代了北京军区的任务：调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要调两个师的兵力进京，此事重大而且紧急。廖汉生立即按照杨成武的指令，找到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副司令员郑维山、傅崇碧等人，向他们通报了情况，连夜商讨落实的方案，初步拟定：调第63军第189师和第24军第70师进京，归卫戍区建制。

5月17日下午，廖汉生将北京军区拟出的方案向杨成武做了汇报。杨成武表示：同意63军调一个师，另一个师则可以提出几种方案来，再研究。

5月18日，周恩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及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后，书面报告毛泽东：拟调陆军第63军189师和陆军第65军193师进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区司令员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京后，将对北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

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

与此同时，5月16日上午10时30分，政治局扩大会议全体会议正式通过陈伯达等人起草的，经毛泽东修改的《通知》。该《通知》在“杭州会议”的常委会通过后，即由康生带回北京。但是他没有按惯例交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刷厂排印，而是给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让公安部印刷厂印刷。这是担心泄密，让彭真知道。

在表决通过这份《通知》前，陈伯达首先综合介绍了各小组讨论情况，接着刘少奇又简单解释了几句：“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有人提了些意见，建议改几个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的好，不如原来的好，那就不改了吧。”

接着，刘少奇征求彭真的意见：“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

彭真平静的回答：“一个检查，一个改。”

刘少奇觉得彭真误解了他的问话，又补了一句：“你对《通知》有什么意见？”

彭真说：“没有意见。”

刘少奇又问：“是赞成还是反对？”

彭真低头看材料，没有说话。

刘少奇不再追问，环顾一下会场，说：“现在通过这个《通知》，同意的请举手！”

参会人员都举起了右手，一致通过。

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态。”

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一致通过”，但后者不计入票数。

这次通过的《通知》，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因为是在5月16日通过的。

《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这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通知》号召说：“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最后两段文字，是毛泽东亲自增写的，其分量之重，可想而知。

接着，会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4月30日《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且加了按语，指出：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

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3月18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17日下午，政治局常委召开生活会，刘少奇首先发言，他说过去填表时，家庭成分一直是填富农，后来到花明楼看看，应该是地主。

周恩来也说自己受封建官僚家庭的影响，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对北京的问题事先没有觉察。

邓小平也作了检查，说书记处发生这么大的问题自己都不知道。

林彪最后也讲了几句，他说：“常委同志都检讨了，我没有准备，我的家庭也是地主，问题也看得不那么清楚。”

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安排林彪讲话。他说：

“本来是常委其它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

.....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

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61次政变，搞成了的56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8次，留当傀儡的7次，废黜的11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度尼西亚、叙利亚政变之前。6年中间，每年平均11次。

……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10年、20年、30年、50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接着，林彪列举了中国从周朝至民国发生的一些著名的政变事例，引经据典，讲得有声有色。

他说：“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16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

“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70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岁。”

“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第40回：万念灰，邓拓家中辞世去 遭诘问，彭真会上检查难

林彪还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 64 岁，恩格斯活了 75 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 54 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6 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 10 倍，比俄国多 3 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19 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哪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什么是中心，什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

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19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20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林彪的这些话，后来在文革中都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

林彪继续说道：“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20万人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90岁、100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

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林彪的讲话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在会上再一次引起震动。许多人这才知道党内形势竟是如此的严峻，同时对林彪的发言表示由衷的钦佩。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戚本禹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

在极度的孤独和痛苦中挣扎着、希冀着的邓拓看到这篇文章，如同迎头一棒。这是党报啊，是他曾经工作、奋斗过的地方，是他心目中十分神圣、严肃的地方。如今，党报也如次讲他，说明党已经彻底不信任他了。这对于一个从1930年就参加共产党的老党员，一个为自己的信仰奋斗了36年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很难接受的现实。他曾经两次坐过敌人的监狱；抗战8年，他经历过日本鬼子的铁壁合围，“五一”大扫荡，在枪林弹雨中，他坚持了下来。这是因为党相信他，边区政府支持他。可现在呢？他成了自己党组织的敌人，成了人民的敌人……

邓拓的精神支柱倒了。

那么，邓拓在历史上是不是叛徒呢？戚本禹的这篇文章是与陈伯达、康生、尹达、王力、关锋等人一起讨论写就的。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康生提到：“你们不知道吧，邓拓是个叛徒。”康生说，这是听彭真说的，邓拓在历史上曾经被捕过，在受审的时候，他把共产党的内部情况招供了。康生提出，要彻底批判邓拓，就一定要联系他的历史来批。所以，在戚本禹的文章里要加上“邓拓是叛徒”这句话，在场参加讨论的所有人都表示同意。

邓拓是叛徒一事，戚本禹也听彭真说过。那是1964年末，彭真请他和关锋到家里吃饭，其间谈到了邓拓的文章，戚本禹和关锋都说邓拓的文章写得不好。彭真悄悄跟他俩说：“邓拓以前叛变过，只是没有给党造成什么大的危害。本来八大要选他为中央委员的，是他自己给

中央写信，说他在历史上有问题，不能当中央委员。”

此时，康生又叮嘱戚本禹说：“关于邓拓的变节问题，你要跟安部长核对一下。”

于是，戚本禹就在康生那里用红机子给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打了电话，一位姓陆的秘书接的电话，戚本禹认识她。戚本禹说：

“我想请示一下安部长，现在《红旗》杂志编辑部在讨论一篇批判邓拓的文章，在文章里要指明邓拓是叛徒。这件事需要跟你们核对一下。”“这是伯达、康生同志提出来要核对的。”

隔了一天，陆秘书给戚本禹回电话说：“安部长已经看过档案，据档案材料，他在敌人那里是招供了，所以可以说是叛徒。但是在批判文章中提不提这个问题，这个要由中央来决定。”

戚本禹说：“是要请示中央的，谢谢你的提醒。”

稿子清样出来后，戚本禹特意在“邓拓是叛徒”这句话下面加了横杆，由陈伯达签名后，直接报送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清样上画了圈。

清样退回来后，戚本禹问：“还要不要请示主席？”

陈伯达、康生都说：“不用了。安子文都说是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也看过了，都没有意见，这就是通过了。”

这就是戚本禹文章中“邓拓是叛徒”的由来。

5月18日，对邓拓的妻子丁一岚来说，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她后来回忆说：

“我们家是三间房，我和邓拓分开住，各住一间。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间，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全身都凉了。那时候，他有很多病，身体很不好，经常写东西，手出汗很多，写东西他总用一块手绢擦汗。我拿到他这个手绢，那手绢都是湿的，他当时写遗书时，心里有多么难过，就这样走了。”

邓拓并不知道此时的彭真已经被免职并接受审查，也不知道北京市委即将被改组，他留下了一封6000余字的遗书，是写给彭真、刘仁及北京市委的。

他在遗书中不厌其烦地为自己做着辩解，辩解实际上主要是围绕着有没有影射毛泽东这个主题展开的。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再说了。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

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在遗书的最后他说：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受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胜利万岁！”

给妻子的遗书里，邓拓这样写道：

“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女儿，做毛主席的好学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炎又在纠缠，不多写了。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永别了，亲爱的。”

要说邓拓反对毛泽东，他没有这个能力和胆量。如果说邓拓对毛泽东有意见，应该说，也不冤枉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共产党人，邓拓曾经对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由衷的信仰、膜拜和赞美。他是中共党内率先提出“毛泽东主义”的人。1942年7月1日，他在《晋察冀日报》亲自执笔写的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和掌握毛泽东主义》，称赞毛泽东是“杰出的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伟大理论家”，系统概括了“毛泽东主义”的思想方法、政治科学理论、军事科学理论等。1944年他又主动请缨，主编了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但是，1956年以后，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从50年代私下说“伴君如伴虎”，到60年代写下《专治“健忘症”》等一系列杂文，暗讽毛泽东，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一些做法是有意见的。有一次，他在邀请《人民日报》副总编胡绩伟去潭柘寺散心时说毛泽东这个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己讲过的话，可以翻脸不认账。”

可是，全党、全军、全国信仰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反对甚至怀疑

毛泽东。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之下,他的不满、他内心的真实看法,除了私下偷偷表露一点,还有就是通过含沙射影、含蓄隐蔽的方式,在旧体诗和杂文中有所表达。而这一切一旦揭露,无疑是大逆不道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的这些作品谈古论今、引经据典、才华横溢,传播知识,自然很受读者的欢迎。但是,一旦读者知道他写这些文章是讽刺、反对毛泽东的,其愤慨之情,可想而知,口诛笔伐,自然是铺天盖地。人一旦发现自己成了这个社会的另类,其压力也就可想而知。

1960年夏天,邓拓游历江南风景名胜。途径无锡东门苏家弄的东林书院,当即赋诗《过东林书院》: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邓拓是文革中第一个自杀的高级干部。

5月18日,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专门工作组,负责审查彭真、陆定一、杨尚昆3人的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则归军委审查,由林彪负责。

这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此时,他们都认为:“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已经挖出来了”。

5月19日上午,彭真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查,他说:

“我承认自己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有极其严重的错误,我表示好好地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是,说我搞政变、颠覆中央、里通外国等罪恶活动,我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至于我同罗瑞卿、同陆定一有没有反党的联系,请中央审查。”

康生立即站起来反驳说:“你这个话就是反对中央刚刚通过的通知!通知里面说得很清楚:‘这些人物有的已经被识破了,有的还没有,有的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这话是毛主席亲自加的,是主要的内容。林总的讲话已经发挥了主席的这个思想,你为什么还要这样讲话?你尖锐地同党、同主席、同林总对立!”

林彪:“其实做梦也没有忘记。”“你到处封官许愿,包庇坏人,实际上是招兵买马,招降纳叛,扩大队伍,组织政变的力量。”

刘少奇也说:“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

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

彭真一共只讲了5分钟的时间,却多次被人打断。

陈伯达说:“在我们党里面的一个地下的‘四大家族’,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叫‘彭、罗、陆、杨四大家族’。他们走的是高、饶的老路,对林总、对少奇同志、对恩来同志,他们现在的目的就是要搞掉这3个人,千方百计的攻击他们。”

贺龙说:“主席批评赫鲁晓夫出在我们身边,那还不是批评你呀?你就是没有承认赫鲁晓夫,你是一个大党阀也不假。”

康生对彭真说:“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

张鼎臣、杨成武、李先念、陈毅、薄一波、廖汉生、聂荣臻、蔡畅、余秋里等都做了发言,对彭真的检查很不满意,认为不深刻,没抓住要害,还有对抗的态度。会场上出现了群起而攻之的场面。

彭真陷入孤苦境地。不久,中央派人通知他,停止出席会议。

第41回：怒难耐，林彪痛骂陆定一 保晚节，周恩来会上发言

5月19日下午，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检讨，他是5月8日才从合肥乘飞机回到北京。

还在南昌时，陆定一就看到了中央于4月1日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中的内容使他深为震惊：他很清楚，这个《纪要》和《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他深感问题的严重，立即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许立群，要求在中宣部开展批评，首先是对他自己进行批评，愈尖锐愈好。

这时，严慰冰给陆定一打了长途电话，要他回北京看一个文件，文件是密封的，严慰冰没敢拆开，估计是重要文件。后来才知道文件的内容是关于彭真错误问题毛泽东同康生的谈话。严慰冰要陆定一打电话给康生。陆定一表示不回北京，也未给康生打电话。严慰冰将文件发往南昌，被中央机要局在路上截了回去。

4月18日，陆定一给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写信，声明他不知道严慰冰写匿名信一事。

陆定一从江西来到了安徽。4月3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突然从北京来到合肥，告诉陆定一：严慰冰已作为“反革命分子”于4月28日逮捕。

严慰冰要出事，这是陆定一意料中的。但竟是“反革命分子”，还遭到逮捕？他没想到会如此严重，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张子意和杨奇清还传达了中央的意见，要他遵守五件事，其中有：不要将此事泄漏；不与严家的人（严慰冰的母亲和妹妹等）来往；在外地逗留得久些，不要立即回京。

正式谈话后，张子意又找陆定一个别交谈，建议他写信向中央表示态度。陆定一接受了他的建议，写信给中央，表示拥护中央的措施和遵守五条规定。

就在张子意、杨奇清离开合肥后没几天，5月6日，陆定一接到了汪东兴从北京打来电话，通知他回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问他是否坐飞机还是坐火车？

陆定一回答说：“如果事情很急，就派飞机来；如果不是那么急，我就坐火车回去。”

汪东兴没有透露会议内容和其他情况，只是定下派飞机来接他。

张子意、杨奇清代表中央要他在外地多逗留些时间，汪东兴也是代表中央要他立即回京，究竟北京发生了什么事？陆定一深感不安。5月8日，陆定一从合肥乘飞机回到北京，参加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5月19日下午，陆定一在政治局扩大会上作检讨说：

“我是高级干部，40年党龄。我手里只有笔杆。我年已61，身体不好，眼睛不好，我会搞政变么？似乎不会。”接着，他又说：“阶级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机一到，自己不想复辟，资产阶级也会拥戴你复辟。辛亥革命，武昌起义，黎元洪怕得要死，钻进床底下，被当时的起义者拖了出来，当了领袖。袁世凯做寿，说自己别无所求了，可是，发表了这一通宣言后不久，他就做了洪宪皇帝。我有许多资产阶级思想，说我是定时炸弹一点也不冤枉。把我这个定时炸弹挖去，对党、对人民都是一次大胜利。所以，我对这次斗争，抱着欢迎的态度。”

谈到匿名信的问题时，陆定一再三声明与自己无关。他说：“我同严慰冰生活了25年，她写匿名信我知道不知道？这对于我，是有口难辩的事情。但是我只知道她同我吵架，确实不知道她写匿名信。在庄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不能说假话。现在严慰冰在公安部，请审问她，如果我在看到公安部材料以前，就知道她写匿名信，哪怕只有一封，请把我当作反革命的主谋犯或同谋犯，加重对我的刑罚。”

林彪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开口问到：“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

陆定一回答：“很好。”

林彪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很尊重的。你为什么害我？我这人一直喜欢一点知识分子，对你陆定一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你为什么干这么坏的事？”

陆定一说：“严慰冰干的事，我确实不知道。”

林彪拍了桌子，说：“你老婆的事你会不知道？”

就连平时温文尔雅的周恩来也非常生气，拍着桌子骂陆定一是“伪君子”，说“你老婆干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

陆定一顶撞说：“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情的有的是。”

这时坐在主席台下的李富春走上前来指责陆定一：“你这是什么态度对待我们的总理？这是我们的总理啊！”

大家纷纷批评、指责陆定一，说文人无行、纵容老婆胡闹等等，另外还批评陆定一反毛泽东思想，只反教条主义，思想战线的事都由他负责，中宣部一塌糊涂，成了阎王殿，文化部也一塌糊涂，学术批判他反对上纲，这是给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等等。

对有人指责他组织反党集团、搞复辟，陆定一坚持不承认。

会后，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期间，邓小平走出常委开会的房间，将李雪峰叫了进去，对他说：“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由你和富春同志去跟他谈一下，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了。”

李雪峰说：“好吧。”

李富春对李雪峰说：“你领头吧。”

李雪峰：“你是政治局的，你领头。”

两人站起来，朝陆定一待的那个房间走去，虽然只有几步路，可是谁也不愿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

到了门口，李富春推了李雪峰一下，李雪峰年轻，只好服从。

进门后，李富春又让李雪峰先说，李雪峰推辞说：“你说吧。”

李富春：“还是你说。”

李雪峰对陆定一说：“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

陆定一看李雪峰，大声的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

李雪峰劝道：“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李富春：“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中央《516 通知》的精神迅速在各地引起反响。就在彭真、陆定一在北京检讨的同时，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广州也做了检讨。5

月 19 日,中南局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中南区万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陶铸以中南局第一书记身份,亲自在会上传达贯彻中央刚刚通过的《5·16 通知》和中南局全体委员会的精神,强调“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政府和军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正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并在会上作了一个洋洋万言的动员报告。

在讲到“共产党员必须同一切剥削思想彻底决裂”时,出乎人们的意料,陶铸公开、诚恳地检讨了自己“没有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而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政策和经营管理的办法去巩固集体经济……这样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助长了搞自发、闹单干的倾向。”

他说:“解放 16 年了,我们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处,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给他们一张选票,一个饭碗;他们也表示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和和平平肯定不能解决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哪有什么和平过渡?思想文化领域更是如此,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哪有什么和平过渡?”

回想 5 年前,陶铸曾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1961 年 5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受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规定以后不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陶铸参加了此会,他从北京返粤后,立即在中南地区贯彻会议精神,雷厉风行地开展甄别工作。9 月 28 日,他邀请广东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到从化温泉,参加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这是被广东知识分子称为“久旱逢甘雨”的座谈会。陶铸在会上说:“对于过去批判搞错的,应该平反、道歉,老老实实认错。在什么场合戴的帽子,就在什么场合脱帽子,不留尾巴。凡是三年来斗争批判错了的,我代表中南局和广东省委向你们道歉、认错。如果连这一点也做不到,哪能谈得上新的团结……同时,我还建议,今后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因为这个帽子很伤害人。其次,凡属思想认识问题,一律不准再搞思想批判斗争会。第三,不准用‘白专道路’的帽子……”

过了不到半个月，10月11日，陶铸又主持了中南地区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他在讲话中公开提出：“我们老是讲人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看要到此为止了。现在他们是国家的知识分子、民族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分子。因此，我建议今后在中南地区一般不要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这个名词伤感情。”

此举当时为陶铸本人赢得极高的声誉，而5年后的现在，他又重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对此作了自我批评，认为当时的讲话是错误的。他说：

“自己对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认识更差。1961年到1962年，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产生过右的摇摆，主要表现在1962年春天，田汉在在广东开话剧歌剧工作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了话。那次讲话基本上是错的。一条讲我们党领导文艺所存在的缺点，批评了粗暴的做法，有些批评过分了。第二条讲创作自由，我说了不能写毒草，但是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再一条，对知识分子改造也估计过高了。看来，那次讲话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我要负责任。”

他还重提1958年大跃进，“1958年搞大跃进，缺乏经验，但是方向正确，所以成绩很大。现在看来大跃进的缺点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这一个指头，还是由于我们这些人体会主席思想不深，缺乏经验所致。现在看得很清楚，没有1958年打下的基础，不可能有现在的大发展。而且现在很多经验是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搞群众运动，打破洋框框等等。”

这类争论，早在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上，已经引起过党内思想的激烈动荡，陶铸旧话重提，无非是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渊源。

陶铸继续说：“文化革命不依靠工农兵为主力，不采取大破的方针，就一定要犯原则性的错误，要犯大错误。这也就是不愿彻底革命的错误，不敢彻底搞阶级斗争的错误。”“我们这样破，是不是就破得一塌糊涂了？是不是就天下大乱了？我看不会，不要杞人忧天，天是塌不下来的。相反，如果我们不把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东西彻底破掉，人民的天下就会大乱。”

陶铸的检讨，结合王任重4月19日在《湖北通讯》上主动做的自我批评，在中南局干部中引起很大的震动。

动员大会其中一个内容是进一步部署打倒李达“三家村”。

5月1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为期20天的全体委员会议，传达《516通知》精神。会议认为东北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和激烈。认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长期以来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5月20日：中共吉林省委发出《关于立即在全省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通知》。

北京，5月21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他说：“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

接着，他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在谈到防止政变的问题时，他说：“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以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2月7日那个提纲，5天之内就抓住了。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很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反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攻不攻？不攻，我就发动地方攻，叫地方造反。”

周恩来说：“……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真是大党阀。”

他特别提到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

同林彪一样，周恩来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他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对彭、罗、陆、杨的问题，周恩来说：“彭真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杨尚昆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中央信任，各把一方。”

“罗瑞卿的问题是林总发现的，彭真也是林总发现的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

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是相当高的，罗瑞卿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为林彪同志有病，彭真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

周恩来还高度评价了林彪：“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瑞卿是大比武出现的，陆定一是夫妻老婆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

周恩来特别指出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保持革命晚节，坚定信仰，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他说：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像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不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覃，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返回来读三十本书。”

5月21日，康生通过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情况，请示准备组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及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等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康生在大会上宣布了毛泽东同意组织审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问题的审查委员会。

第42回：批朱德，政治局小起波澜 设专案，田家英接受审查

“首都工作组”虽然成立了，但还必须有一个常设的办事机构。周恩来决定成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5月19日，周恩来找来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谈话，向他们简要介绍了杭州会议批判彭真的情况和毛泽东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内容，并交待了任务：“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够了，要可靠、精干。”这一办公室随即在5月20日成立，进驻京西宾馆13层，以军委总参作战部的人员组成，为了保密，人数开始只有6、7个人。办公室主任由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兼任，副主任由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谭旌樵担任，日常工作由雷英夫主持。在他们下边，有处长左勇、参谋张志民、朱耀华和张民。没过几天，朱耀华因有一位亲属受彭真株连被调走。

5月21日，王尚荣在京西宾馆召开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王尚荣强调：“这既是一项军事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我们都是做军事工作的，但是一定要突出政治。”雷英夫则具体介绍了工作组的主要任务：“由周总理亲自抓这项工作，他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首都工作组’组长是叶帅，副组长是杨成武代总长和谢富治副总理。”“今天我们组成的这个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常设机构，在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的直接领导下，完成保卫首都安全的各项具体工作任务。”“今天我们组建的这个办公室，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办公室，而是在总理和叶帅直接指挥下，完成加强首都警卫任务的一个指挥部。当前的任务是选调部队，下一步是勘查和确定重点保卫目标，部署警卫兵力。”

为了保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外只称“编写组”。

5月22日，朱德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发言时说：

“孔夫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马列的书，非读不可，准备花一两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林彪打断：“毛主席岂止是接受？！是发展到了最高顶峰！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你不要拿外国的东西吓唬（我们）！上海会议上，你就说，‘不能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到了顶峰就不会发展了’你们看他对毛泽东思想是怎么评价的？！他这样讲，就是想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有野心……”

康生接过来说：“反对林总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最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就是反对毛主席思想的，在这方面和彭真等人是一样的。”

朱德辩解说：“我不会反对毛主席的，毛主席的书要读，马列的书也要读……”

康生又打断他的话说：“我希望你学学林总的这些讲话，比你学32本书要好得多。我看你虽然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你是想超过毛主席”。

接着，大家开始批判朱德，有人说他“是党内最危险的人物”，有人说他是“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继续进行，朱德首先按照政治局集体的意见，在小范围内检讨自己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他说：

“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接着，朱德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他说：“几十年跟着毛主席，我的最大的错误就是那两次。”

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在朱德发言时先后插话。陈毅就历史

上的问题对朱德进行了批判。

随后，林彪说：“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和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两个，打败仗没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说：“更奇怪的是他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

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说到这里我是不是有野心？我80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反对毛主席我都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然后王明回来。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南昌起义，我有错误。他听了很为惊奇：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5月23日上午，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大会上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

“（一）停止彭真同志、陆定一同志、罗瑞卿同志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同志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二）撤销彭真同志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同志的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

（三）调陶铸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调叶剑英同志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他们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

（四）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五）上述决定，地方通知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6]278号文件：《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

文件中说：“陆定一同志的妻子严慰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已查明，严慰冰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到一九六六年一月的六年期间，连续写了几十封反党反革命的匿名信，其中百分之九十是集中攻击和辱骂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和他的一家的。这些信中充满了刻骨的反动阶级仇恨。

大量的材料证明，陆定一同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是有密切牵连的。在严慰冰的卧室内书桌上放着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五日写的一封匿名信的四页底稿和寄给叶群同志的信封，时间达一年零两个月之久，陆定一不可能不知道。而且严慰冰写反革命匿名信达六年之久，在写的时候，陆定一几乎全都在家。当陆定一被告知严慰冰犯了反革命罪行时，陆不仅不表示愤慨，还想谎说严患有神经偏执症为严开脱。陆定一在这个反革命案件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专案审查委员会将加以彻底查究。”

此时，陈伯达、江青呈送毛泽东的关于田家英删掉毛泽东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和公安部关于田家英一个特殊问题的报告，已由毛泽东批交中央政治局处理，由于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特殊地位，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彭、陆、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之外，再设一个审查小组，专门审查田家英的问题，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担任，组员有新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工作由周

恩来直接领导。

公安部关于田家英特殊问题的报告是指田家英的海外关系问题。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后没有几天,正在广州的田家英对身边的陈伯达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

陈伯达听了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田家英说他有个哥哥曾在国民党中央社工作过,现在可能在香港。

田家英的海外关系就是指此。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午休时间,周恩来通知戚本禹:“主席意见,由你接替田家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的工作,中央各同志均已同意。你即日把《红旗》杂志的工作交代一下,返回中央办公厅。”

戚本禹说:“我又要写文章,又要整理中央会议文件,还要处理秘书室的工作,恐怕力不胜任,耽误大事。”

周恩来说:“国务院秘书厅的童小鹏即将正式调中共中央办公厅任职,还有我的秘书许明都可以帮助你。”

周恩来还要戚本禹找一下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让他配合田家英审查小组的工作。

5月23日,继邓拓自杀后,在中南海永福堂又发生了第二起自杀事件。

5月22日,是个星期天。上午,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通知戚本禹和王力下午14时30分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安子文对他们说:

“总理交代马上要找田家英谈话,要他停职反省,由戚本禹同志接管他的工作,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不要出差错。”

下午15时左右,以组织部长安子文为组长,王力、戚本禹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小组,突然来到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寓所兼办公室。

习惯于一边散步一边谈事情的田家英,和秘书逄先知溜达到瀛台去了,只有妻子董边在家中。董边是安子文的老部下,两人很熟,她说:“田家英和逄先知出去了,一会就回来。”

于是,安子文他们就坐下来等。董边招待他们喝茶。约莫半小时后,田家英回来了,看到客厅在座的几个人,颇觉意外。这的确是个比较奇怪的组合:安子文,中央组织部的部长;王力,时任中央对外联络

部副部长，此刻已为能够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的中央写作班子成员；戚本禹，曾是自己的下属，原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一个处级干部，现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

看样子他们要谈重要的问题，董边站了起来，打算回避。这时，安子文对她说：“董边，你也是高级干部，坐下来一起听听。”逢先知也留了下来。

随后，安子文对田家英说道：“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本禹，等一会儿就办交接手续。”

安子文又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

安子文讲完，戚本禹问了一句：“主席的手稿有多少？”

田家英说：“主席手稿都退回档案馆了，我这里只有《毛选》第五卷的排印件。

这时，戚本禹接着问：“毛主席关于《海瑞罢官》的讲话记录，在你那里吗？”

“没有。”田家英很干脆地回答道。

田家英扭过头又问安子文：“我从哪些方面开始检查？”

安子文说：“你自己先想想，从庐山会议到现在，自己有哪些错误。”

安子文他们离开组织部前，曾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通过电话，告知他们将去中南海找田家英谈话。汪东兴说：“行，你们来吧，我会通知门卫给你们放行。谈话后有什么问题再找我。”

这时戚本禹在田家英家用中央保密电话红机子告诉汪东兴，他们与田家英谈话的情况，同时让汪东兴派机要人员来协助清点文件。

很快，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机要员王妙琼来了。随后，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也来协助。戚本禹交代他们和逢先知一起登记、清点田家英处的文件。安子文和王力分别乘车返回，戚本禹也去了中央办公厅甲楼，找汪东兴通报谈话的情况。

戚本禹对汪东兴说：“我们只负责接管田家英的工作，永福堂的警

卫、人员出入和田家英的安全还是要由你们布置人管起来呀。”

汪东兴笑了，说：“这些本来就是我们的工作，当然由我们负责了。我早就安排了。”

接着，汪东兴又问戚本禹：“因为中央已决定田家英停职反省，所以我们要在晚上召集中南海各单位科级以上干部开紧急会议宣布此事。你能参加吗？”

戚本禹说：“我还要和王妙琼等一起查对田家英处的文件和《毛选》第五卷的各种资料，恐怕来不了了。”

汪东兴说：“那我们先开着，以后再把开会情况告诉你。”

第43回： 难承受，永福堂悲剧呈现 闻噩耗，董边如五雷轰顶

临近晚饭时间，王妙琼给戚本禹打电话说：“文件已清点完了，他们平时整理得挺好，很清楚。”

“那好，你和逄先知办好交接手续，等星期一上班，把中央文件交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交给我，《毛选》第五卷排印稿存放甲楼。”戚本禹交代王妙琼。

晚上23时多，田家英用红机子给戚本禹打电话，说他又找到一些忘了登记的遗留文件要交给戚本禹。

戚本禹说：“那么我派人来登记。”

田家英说：“不，还是你来，我要亲自给你交代一下。”

戚本禹说：“那好，我马上带王妙琼到那里。”

戚本禹的办公室离永福堂只有200米的路程，一会儿就到了。田家英看到他们来了，就向戚本禹交代遗留的文件。

因为文件交接要经过他的秘书，戚本禹便到永福堂东厢去找逄先知一起来。田家英马上跟过来，在卫生间拐角处紧张地问戚本禹：“究竟出了什么事，是谁在害我？”

这显然是一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他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戚本禹从1950年进中南海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很器重戚本禹，在政治上、生活上都帮助过戚本禹。特别是在1957年“反右”时，戚本禹身陷中南海“八司马案”，田家英帮助过戚本禹。

二王、八司马是唐朝的事。唐顺宗永贞年间，王叔文执政，针对宦官弄权和藩镇割据，他采取了一些革新措施，颇得民心，后人称为“永贞革新”。但革新只进行了146天，随着顺宗逊位，宪宗即位，革新失败，王叔文集团随即垮台。为首的二王：王叔文赐死，王伾遭贬后亦中风死去。麾下的八名干将：韦执谊、柳宗元等，统统被贬至边远地区，担任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而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发生在1957年至1958年全国整风“反右”期间，恰巧牵涉到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8名科级干部，而支持这8人的领导又恰恰是俩人：田家英和彭达璋。毛泽东就把他们比喻为“二王·八司马”，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

1957年全党开始整风，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的群众纷纷给秘书室的负责人、中南海党总支书记何载提意见，贴出大字报，其中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李公绰、吕澄、朱固、沈栋年、马芷荪、王象乾和戚本禹8人最为积极。反右运动开始后，给任何一个支部提意见，都被视为向党进攻，都可定为右派，中直机关为中秘室这8个整风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是否是右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田家英和彭达璋认为他们只是给领导提意见，怎么能是右派呢？1957年9月，“反右”告一段落，何载下放十三陵水库劳动，中办派王刚接替何载主持中秘室工作。

到了第二年的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全国又掀起“双反”运动的高潮。“双反”，很自然地和整风运动联系起来，当时叫“整风补课”。结果，中秘室这8个青年还是被打成反党小集团。

8人不服，毛泽东很快知道了此事，他认为年青人给领导提意见没有错误，为这8人“反党小集团”平了反。

田家英大概就是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才敢如此大胆地向戚本禹打听。但由于戚本禹前几天刚为田家英的问题挨了批评，说他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所以此时更不敢再多说什么。

戚本禹走后，田家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纸质粗糙的小本子，对董边说：“这个交不交？交了是不是会连累你？”

董边说：“交，我不怕。”

田家英特意将小本子在董边眼前举了举，放进要上交的文件堆中。

这个小本子里记得是胡乔木在延安记录的周恩来在整风时期的讲话。建国初，田家英从胡乔木那里借来笔记，让董边帮他誊录了一份，就记在这个小本子里。

文件清点得差不多了，田家英稍稍喘息了一会儿，又打开了一个

此前看了好几眼，却一直没有打开的精制的蓝布面盒子，呈现出来的是—张张装裱得非常仔细、整齐的草书，那龙飞凤舞、气势磅礴的字体，一看就知道是毛泽东的墨迹。这是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后，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一点点收集起来的。有的是毛泽东写给他的，有的是毛泽东当他面写下又弃置不要的，可田家英舍不得丢掉。一方面他酷爱毛泽东的书法，一方面他认为这些文字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派上用场，例如毛泽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就是当年毛泽东写出后感到不满意扔掉，被田家英捡起收藏的。没有田家英的收集，世间将不会流传下毛泽东这首气势如虹的佳作。田家英时常抚摸着精制的盒子，对董边说：“这是咱们的传家宝，也是国宝。”

此刻，他呆呆地盯着盒子，难舍难弃：“是否也要把盒子交出去呢？”思虑良久，他又把盒子放回原处。或许，他认为这不属于“文件”；或许，他太珍爱它们了，不忍交出。

董边见丈夫脸色不好，想到他还一直没有吃饭，就劝他先吃点东西休息，有什么事情以后还可以慢慢说清楚。田家英站着没动，过了片刻，他像是对董边，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的问题是江青、陈伯达陷害的。想不到在毛主席身边工作18年，落得如此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恶人会有好下场！”

5月23日凌晨，心事重重的董边再也睡不着了，既惦记着突然横遭打击的丈夫，又为早已安排好的自己在全国妇联机关党组做检讨一事所缠绕。董边此时是《中国妇女》杂志社总编兼社长，《中国妇女》被认为跟不上思想文化战线发展的形势正在受到批判，她自然是责不可卸。

董边起身到田家英的卧室，见他斜倚在床上，似乎彻夜未眠，陷入难以自拔的思绪，便劝慰他说：“你的情况主席都了解，有什么事慢慢总会搞清楚的。”

妻子的抚慰，使田家英的内心更添一重凄楚，他欲言又止。几十年相濡以沫，他很了解自己的妻子，也很尊重她的观念和自强不息的精神。虽说她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了，可长期从事的是妇女工作，没经历多大曲折。自己在中央核心部门接触的许多复杂的情况，

平时就没有向董边透露，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不曾同妻子探讨，此时此刻此情此背景，更难用几句话给妻子解说明白。他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在一些问题上，无法求得最亲近的人的理解与沟通，这使他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内心分外地痛苦，但他没有让内心说不出的苦涩和凄怆形于颜色，只问了董边一句：“中午还回不回来？”

董边答道：“检查的事情完不了，可能就回不来。”

她感觉丈夫比昨晚似乎平静了一些，便匆匆上班去了。

董边走后，挂着清朝乾隆皇帝手书的“永福堂”小院格外的安静：田家英的秘书逢先知写材料去了，田家英吩咐他的勤务员陈义国出去买香烟。上午8时许，田家英的老友、原朱德的政治秘书何均上班路过永福堂，因听到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便急切地进来看看，想了解更确切的情况。

何均在延安中共中央宣传部时就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并住在杨家岭上的同一排窑洞，一起帮助过毛岸英熟悉中国的国情和党内情况。几乎在田家英任毛泽东政治秘书的同时，何均担任了朱德的政治秘书。建国后，田家英所在的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与何均离开秘书室后任职的中央办公厅“后楼”，都在一个大院落里，仍保持着不时的过往。

何均的本意是想安慰安慰老朋友，可两人心头都被山雨欲来的浓雾所笼罩，而且又都自感躲不过这场风暴，以往见面便滔滔不绝的他俩，竟久久相对无语；偶尔交换一两句，更添凄凉的气氛。他只记住了田家英当时说的一句话：

“士可杀而不可辱。”

何均在田家英处坐了好一会儿，才起身欲走，田家英又将他留下，非要他再坐会儿。可坐下后，两人依旧话语不多。过了片刻，何均又要走，田家英再度挽留，“如是者有三四次”。最后，何均见上班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还有些事情必须处理，就告辞了。

田家英把他送出很远，几乎要到了何均的办公室。

约10时许，陈义国从西单回来。临近午饭时，他叫田家英吃午饭，却找不到人。他找到秘书室副主任陈秉忱，告知“田主任不见了”。陈秉忱与秘书室行政负责人路辉、逢先知经商议后，一面让陈义国继

续找，同时分头往田家英可能去的地方打电话。最后汇集的情况仍是：田家英下落不明。他们有点慌神了。

这时，陈义国惊恐地跑到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报告说：“永福堂毛主席的书房里像有人……”八司马之一的王象乾和行政科负责人路辉等飞快地跑到永福堂西厢，这里是毛泽东的藏书室，门反锁着……

他们顾不了许多，砸开锁进入书房，屏风后的情景顿时让在场的人都惊呆了，田家英将头悬在一根栓在两个书柜之间的绳子上，自尽了。

他们急忙把田家英解下来，松开外衣，用人工呼吸、口对口吹气进行抢救，但终因死亡时间过长，无法起死回生。在田家英的口袋里，发现了用红色铅笔写的遗书，文字并不太多，现在为人所知的部分只有：

“相信党会把问题搞清楚，相信不会冤沉海底。”

人们赶紧打电话向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汪东兴等人报告。

汪东兴接到电话大吃一惊，立即报告会议主持人，随即和安子文、王力、戚本禹、杨德忠等人乘车赶回中南海。当他们确认田家英已经死亡后，商议的结果是马上通报周恩来，再由周恩来转告尚在南方的毛泽东……

下午约14时左右，汪东兴匆匆赶到人民大会堂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叫出周恩来。过了一会儿，会议主持人向在座的人宣布：田家英自杀了。

下午15时左右，惦记着丈夫的董边，刚把机关的事情了清，正准备早些回去，电话铃就响了。董边拿起电话，听筒另一端传来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声音：

“是董边同志吗？请你立即来中南海西楼会客厅。”

“是西楼会客厅吗？”董边问。

“是的。”安子文确定。

“好的。”董边一边答应着，一边想：“西楼会客厅是刘少奇同志接待客人的地方，为什么要我到那里去？究竟出了什么事情？”董边猜测大概是与田家英的事有关，心里怦怦直跳。还没等她理出头绪，汽车已经开进中南海。

走进西楼会客厅，只见安子文、汪东兴、王力等人已在屋里。

安子文代表组织向董边直言宣布：“田家英畏罪自杀。”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如五雷轰顶，董边一下坠入万丈深渊：“这是怎么了，早上还是活生生的，突然就与尘寰隔绝……”她只觉得天旋地转，无语凝咽……

等董边的情绪稍稍安定，安子文问道：“他临死前跟你说过些什么话？”

“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会去死。如果我稍微察觉他有死的念头，我就不会去上班了！”

安子文对董边说道：“我陪你一起去看一看他。你看，要不要到医院去验尸？”

董边此时脑子里已是一片空白，只是机械地回答说：“一切由组织决定，我服从组织。”

从西楼会客厅到永福堂寓所并没有多远，出院墙东门，下高台阶斜对着的就是永福堂西门，但董边已不知自己是怎么走过去的，她无法接受“畏罪自杀”的事实……

院内平日存放毛泽东图书的西房内，田家英平躺在地上，身上盖着那条铺用了多年的蓝色床单。有人拉着董边的胳膊往前拽，非要让她看清楚一点，认可自杀的事实。床单被揭开，董边看到了田家英那僵滞铁青的面孔，双眼紧闭，但舌尖伸出嘴外。她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失声痛哭……

就在这时，董边耳边响起了立刻收拾东西离开这里的指令：“请你立刻离开中南海。”

她匆匆地拿了几件必需的生活用品，比出差还简单，连抽屉里的工资都未带走一分，就这样离开了永福堂。

董边向小院门外走去，看到田家英的秘书逢先知正朝她走过来。他在田家英领导的部门工作了近17年，自从担任田家英秘书后，他们几乎朝夕相处，关系如师长弟子一般。田家英的突然殉难，政治湍流席卷得如此之迅猛，自己随即就可能被牵连、被卷进漩涡，这对一个30多岁的干部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打击。

但当他看见董边后，马上感到董边所负载的悲哀和痛楚，比他更

沉重，可他一时竟想不出适当的语言，更何况身后还有看押他的军人。他慢慢的向董边走过去，在两人擦肩而过时，压低嗓音哽咽地说了一句：“夫子是个好人！”

“夫子”，是中南海里与田家英相熟的同事对他的尊称。因为他博学多识又勤于诲人。他生性活泼，喜与人交往，或清茶一杯，或茅台一盏，品酌之间纵论天下，谈古寓今，于人于己，都是一大乐趣。但从此以后，他的故友至交们，再也无法听到他的侃侃宏论了。

董边被送到丰盛胡同中央办公厅的一座机关宿舍大院里。1965年迁出中南海的杨尚昆家，也在这所大院里。董边在随后的日子里，除了到妇联机关接受群众批判外，还常被中组部、中央专案组找去谈话，要她揭发田家英。问得最多追得最紧的就是田家英攻击中央负责人的言论。

田家英因为工作原因，几乎不同自己的家人谈论工作上的事情，更不会论及中央领导人的长短。因此董边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可揭发的。但出于对党的忠诚，她还是尽力冥思苦想，终于想到了一件发生在1962年的事情：

那是在7000人大会之后的1962年2月25日，毛泽东在杭州嘱咐田家英组织一个调查组，到湖南省的4个地方去再进行一次实地调查，了解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后，农村贯彻《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情况，及农村还存在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这4个地方是：毛泽东的家乡湘潭韶山、刘少奇的家乡宁乡炭子冲、毛泽东的外祖父家湘乡唐家和刘少奇去年下乡蹲点的地方长沙天华大队。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要向少奇同志报告一下，问他有什么指示，他那里有什么人参加调查？”

回到北京的田家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很快组织了一个有17人参加的调查组。临行前，他向刘少奇汇报并请示工作。刘少奇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3月22日，田家英率领着调查组的全体成员来到武汉向住在这里的毛泽东报到。当他们来到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宾馆梅花岭公寓时，毛泽东早已迎候在门口，满面笑容，慈祥和蔼的和大家一一握手。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和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参加了这次接见。

当毛泽东听说调查组中最年轻的宋士堂,时年 28 岁时,说:“历史上从来都是年轻人打败年老的,三国时代赤壁之战时,诸葛亮和周瑜两人的年龄都不大,两个年轻人联合起来打败了一个老曹操。”

这番话,让在座的年轻干部备很受鼓舞。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都是些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好哇!知识分子成堆也不太好。”

他对大家提出了六条要求:“第一,要同当地干部,省、地、县、社各级干部相结合;第二,不要乱指挥;第三,头脑里不要带东西下去,只带一件东西,就是马克思主义;第四,要做历史的调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观点;第五,看到坏人坏事不要乱说,好的可以说;第六,参加点轻微的劳动。”

最后,毛泽东应大家的要求,和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留念。



1962 年 3 月 22 日,毛泽东在梅花岭公寓前与调查组全体成员合影

第44回：忙喝止，安子文阻董再谈 华北会，袁振揭山西省委

毛泽东的耳提面命，令田家英和调查组全体成员深为感动。此前，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托，参与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等文件、指示的起草工作，受到毛泽东的表扬。他说：“六十条”的发明权，是田家英的。此次又派田家英到自己故乡调查，显然也是寄予厚望的。田家英也希望通过这次调查，在如何恢复农业生产上作篇好文章，为中央草拟一个恢复农村经济的政策性文件。

但是，工作组下去数月，群众对要求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疾呼，大大超出他的预料。特别是在韶山，毛泽东的乡亲的呼声，与毛泽东的主观意念，差距甚远。田家英原来也是不主张包产到户的，但他在调查中逐渐转变了原有的观点。当他们的调查接近尾声时，包产到户在全国已呈迅速发展之势，成为党内议论的重点。

田家英派人到最先开展包产到户的安徽无为县，了解推行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反馈的结论是：包产到户对于解救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肯定是有利和必要的。

6月底回京后，田家英立即向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做了汇报工作。刘少奇认为：“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他还向田家英介绍了其他地方反映的情况和当前的形势，明确提出统一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说明要使包产到户合法起来，可以把调查得出的结论在“秀才”中间酝酿。还要田家英在毛泽东回京前，再征求一下其他同志的意见，还特意嘱咐说先不要说是他的意见，听听反应。

田家英在调查中，杨尚昆来电话，说周恩来询问农村的私有部分可否放宽；向邓小平汇报时，他的态度干脆，明确表示支持。经过一圈征询意见后，田家英感到中央主要领导的意见一致，赞同实行包产到户。

田家英急于将在下边调查取得的数据、群众的意见尽快向毛泽东

汇报。当他提出前往邯郸,向在此视察的毛泽东汇报时,那边传过来的答复是:“主席说不要着急嘛!”

毛泽东刚回北京,田家英就到游泳池,系统地陈述调查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他谈得兴致勃勃,可毛泽东却一言不发。

田家英汇报完后,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

田家英一时没有作答,毛泽东又追问:“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跟随毛泽东多年,对他的脾气秉性很清楚。他不轻易发表完全否定他人意见的意见,他若是同意时,会发表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深化问题,揭示主题,阐发其中的道理;但若是不同意时,往往不做声,显出一种思考的神情。

田家英没再讲下去,只是对毛泽东的第二个提问,简单地回答说:“是我个人的意见。”

毛泽东听后没作任何表态,很快就让他走了。

田家英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回到家里,他情绪很不好,烦闷之情溢于颜表,让身边的董边感到他思想情绪明显地异常,便问了一句:“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一向对自己工作避讳不谈的田家英,此时已难控制自己的情绪,脱口向董边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和自己一肚子的苦衷。

也是一方领导,在共产党内生活多年的董边,是个性情直率的人,听田家英这么一说,当即严肃地批评道:“政策上的事情,为什么少奇同志不去和主席说,而要你去反映呢?你只不过是个秘书,怎么能将少奇同志的主张说成是你的想法呢?”

田家英沉重且难过地说:“我是想原原本本地讲的,但主席从一开始听意见,就显出不悦的神情,看来他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早在脑子里考虑过了。他直截了当地问是谁的主张,这不明白地说明他在猜疑这是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吗?我如果再往刘少奇同志身上推,不是让两个主席之间的分歧明朗化,影响他们的团结吗?所以话到嘴边,没有说出来。”

时隔数年,此时的董边想起这桩事情,便向三人小组汇报。不料

刚说了几句，在场的安子文突然一拍桌子喝道：“董边，你不要再说了！”

董边戛然而止，几十年的党性培养，让她立即顺从，没有再说下去。但心里不服：“没的说时，一个劲穷追不舍；刚想到一点，又不让说了。”

临离开时，安子文再次要董边以党性保证，绝不再提此事。

包产到户事件，客观上造成了田家英和毛泽东之间的政治裂痕。在此后整整半年里，毛泽东既不理也不用田家英。田家英心里非常郁闷，有时甚至流露出消极情绪。他曾对董边说过：“搞政治风险大，一不小心就会跌到漩涡里。”他还曾几次同董边认真地商量，提出离开中南海，到下边去当个县委书记，认真搞点调查，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该如何搞。

性情耿直的董边，虽然并不认为丈夫在大的路线是非问题上总是那么正确，但她相信田家英的为人和他的出发点，相信他即便犯了错误，也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她完全赞同支持田家英下去的想法，并愿意和他一起下去。她对他说：“你当县委书记，我当县妇联主任。我也一直在上边工作，很想多接触些基层的情况和同志。”

田家英的要求没有被批准，毛泽东不放他走。酷爱史学的田家英，又向毛泽东表露了离开现岗位，潜心研究清史的愿望。毛泽东说：“噢，你也是搞本本主义！”仍然没有同意。

后来，在整理毛泽东“杭州讲话”记要时，田家英又擅自删除了关于“要害问题”的内容，“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是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了。

田家英自杀后，中央在原来的彭、罗、陆、杨专案小组基础上成立了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下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主任是邓小平。另外又设立了田家英专案审查小组，由安子文负责。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召开的同时，北京，还有一个在中共党史上必被提及的会议正在进行——中共华北局会议。

1966年4月，中共华北局通知下辖的北京、天津两市，河北、山西二省，及内蒙古自治区：5月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重点解决北京、内蒙

的问题。

随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五一六通知》的通过,为了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五一六通知》,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同意,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到第17天的时候,华北局工作会议也在北京前门饭店开幕了。这次会议从5月9日准备,5月20日报到,23日正式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各直辖市、省委和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地委、市委书记,盟委书记和部分县委、旗委、区委书记。两市两省一区的会议代表只有召开大会时才集中在一起,平时则分别住宿和活动在北京饭店和前门饭店两处。北京市在北京饭店召开,内蒙、山西、河北及天津在前门饭店,所以这次华北局会议,史称“前门饭店会议”。

会议按各省、市、自治区分组,华北局书记分别参加。

北京市委参加这次会议的是除彭真、刘仁及已自杀身亡的邓拓之外的其他书记、常委和各区、县、局及“四清”工作团负责人。

山西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省委、省人委的其他领导和各地、市的党政一把手和省直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198人,由省委第一书记卫恒、省长王谦带队。山西的党政大员中,只有省委的书记处书记、副院长武光汤一人留在省内主持一般工作。

内蒙古参加华北局会议的有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和自治区有关部门、部分盟市、旗县和农村、牧区、城市“四清”工作团干部,上上下下也有146人之多。他们是这次会议的重点,早在1966年4月,华北局通知内蒙古准备召开华北局工作会议时,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就带领几位部长、主任亲临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找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们征求意见,同许多人谈话。

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乌兰夫出席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他是直接从会上赶来,参加华北局工作会议。

此时的乌兰夫身兼多职,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少数民族干部中,他地位最高。在地方,他担任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大学校长等要职,集内蒙古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乌兰夫的汉名叫云泽，出生在大青山南麓的土默特左旗塔布村，青年时代即投身革命。从1947年内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后，他便一直担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

尽管常驻塞外边城，但乌兰夫由于在京兼职的缘故，频繁往来于呼市与京城之间，近来尤其关注着北京的形势。他这次先出席政治局会议，再三领会中央精神，对华北局会议心里早有准备，并已悄然做了布置。

在《海瑞罢官》的问题上，内蒙古也曾徘徊过，《内蒙古日报》当时没有及时转载姚文元的那篇文章。为此，主管文教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曾专门为此做过检讨。所以，这一回，乌兰夫决心跟上中央的脚步。

5月份的《内蒙古日报》上已经开始连篇累牍地转载姚文元、戚本禹等人批判吴晗、《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文章。同时，乌兰夫还组织人寻找内蒙的“三家村黑店”。

“黑店”很快找到了，“店主”就是时任天津市市长的胡昭衡。

胡昭衡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此时早已调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胡昭衡在内蒙工作期间，曾用“李欣”的笔名出了一本名为《老生常谈》的杂文集。乌兰夫如获至宝，他带着《老生常谈》，来到北京的前门饭店。他有自己的小九九：胡昭衡是天津市的领导，政治地位低于彭真，高于邓拓。他准备仿照北京的做法，向内蒙古的这株“毒草”开炮！

天津离北京最近，5月20日午饭后，天津市委书记处的书记、常委及各区、局领导共53人一起出发，到北京参加华北局前门会议。

5月23日，李雪峰在与前门饭店仅隔一条街的北京工人俱乐部，向参加华北局会议的全体人员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5.16通知》。之后，又传达了林彪5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接着又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新决定撤消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人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职务，撤消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消陆定一中宣部部长的职务的有关决定。

当与会人员突然听到中央出了一个“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这

些昨日还是位已及天的中央首长,原来都是“反党”份子,其震撼和惊愕可想而知。尽管他们早已都是“运动”老手,但这次会议来势汹汹,前所未有,还是让人们一时摸不准方向,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华北局,质问华北局为什么不声讨邓拓?!

在山西代表团中,时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太原市委第一书记的袁振,第一个紧跟中央,站出来揭发山西省委的问题:

其一,山西省委《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是根据彭真原先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搞的那份《二月提纲》泡制的,《二月提纲》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把严肃的阶级斗争,说成是学术斗争,现在中央发出了《五·一六通知》,省委原先搞的那个《关于开展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就必须收回;

其二,省委对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够放手,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得力,省委给干部发了十五本马列的经典著作,实际上起了冲击学毛著的作用;

其三,省委宣传部在前中宣部长陆定一的影响下,支持举办《傅山展览》,出版了《傅山画集》,而且请“三家村”的头目邓拓为画集写了前言,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傅山是明末清初山西的一代大儒。明崇祯九年傅山为其恩师袁继咸被宦党迫害入狱一事,率山西百余生员赴京伏阙讼冤,使崇祯皇帝终为袁继咸平反。明亡,清廷入关后,傅山于顺治十一年秘密参与反清起义被捕,抗词不屈,出狱后行走江湖,终身不仕,在清康熙十七年由康熙下旨举办的博学鸿词科恩科中,傅山被朝中汉官举荐而拒不参加,被山西地方官员押入京城后以死相抗,表现出一位明末士大夫的气节。其诗书画医在明末清初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被后人称为一代文宗。

袁振在会上还拿出了一个《关于筹划纪念傅山的若干问题》的文字材料,其中点名批判了从中央到太原,共30余位支持傅山展览的领导和专家、学者,说他们“对纪念傅山很热心,在5年多的时间内,一直在大捧傅山,表彰死人,歌颂封建士大夫,造成极坏的影响。”其用意很明白,那就是被中央点了名的“三家村”黑线人物邓拓,在山西有活动,

与山西省委有牵连。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当即在会上对袁振的发言予以反驳：“我们已经按照中央的指示，采取了新的措施，有什么必要再收回那个《通知》呢？北京是北京，山西是山西，硬要把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扯到一起，这究竟是想干什么呢？”

此时的袁振与卫恒相比，显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势单力薄。上海的姚文元、张春桥，那是因为后面有毛泽东。而袁振的发言，并未“上达天庭”。几个回合下来，带头揭发省委的袁振，就被以卫恒为首的山西省委，一举打成了“野心家”和“伸手派”，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指示要对袁振进行严厉批评，会上还有更猛的火力，说以袁振为首，在太原市委有一个反党集团。

为了表示紧跟中央的部署，会议期间，山西省委还决定对山西省副省长王中青、著名作家赵树理、李东为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三反言行在《山西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

山西省委在“前门会议”上出现的情况是计划外的。在前门会议上，河北省对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进行了批判，指责河北省委对文化大革命“按兵不动”，“妥协情况很浓厚，盖子揭不开”，并取消了林铁领导河北组会议的资格。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期间与林铁进行了个别谈话，对他进行了批评。

6月24日至7月15日，由华北局主持召开的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河北省地、市、县党委负责人出席。会议对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河北省委候补书记裴仰山、省委常委胡开明进行揭发批判。河北省委就林铁的所谓错误向中央写了报告。

两个月后，8月25日，华北局通知：中共中央8月16日批准，撤销林铁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华北局第三书记职务，刘子厚接任省委第一书记兼河北省省长、河北省军区政委。

第45回：泪洗面，昭衡廿天愁白头 翻烙饼，北大社教问题多

再看天津的情况。天津组重点是揭发批判市长胡昭衡和宣传部长白桦，主管文教的市委书记王亢之也受到揭发批判。到京第一天，天津市市长胡昭衡便听到对他所写《老生常谈》的批评意见。一星期后，华北局领导正式通知他作检查，并面对面作了“严肃批评”。

5月30日，批判《老生常谈》的简报发下来。接下来的20天，便是4次“触及灵魂”的检查和大会小会的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批判。开始是在天津书记处会议上接受批判，后变成“开天津大会，批判。”从胡昭衡日记上摘几段可见他当时的处境：

1966年6月3日……下午在书记处会议上检查，讲了两个半小时，随后大家提批评意见……

1966年6月4日……下午开书记处会议，对我继续批评……

1966年6月7日……开了一天常委会，继续批评我……几位同志重点批判《老生常谈》与我的作风……

1966年6月8日……下午开常委会，继续听××等三同志对我的批判……

1966年6月11日……上午常委会，对我进行批判；下午常委会对我批判，晚上翻阅批判材料……

1966年6月14日……整日开常委会，对我继续批判……

1966年6月15日……上午写检查材料，下午开天津大会，批判。

1966年6月16日……上午准备检查，下午，大会继续批判，晚继续准备检查……

胡昭衡的小说《一个共产党员的诞生》中有一个党员名叫罗驴驹，有人说这是诬蔑共产党员是骡子和驴的杂种，何其毒也！

这20天，用胡昭衡的话讲：全是在泪水中滚过来。开始独个儿流泪，后来与妻子林以行相对流泪，再后来又加一个秘书崔广兴，3个人

默默流泪……

去北京时，胡昭衡满头黑发，红光满面，不到20天的时间，头发白了一半！他的妻子林以行是天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抗战八年经受了火线上最严峻的考验，这一次她比胡昭衡晚到北京3天，又比胡昭衡早两天白了一长缕头发。传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人人都以为传说不可信。胡昭衡和林以行20天愁白了头，可是与会上百人亲眼目睹。

然而，每天早晨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跑步、做操，晚上仍然可以看到胡昭衡与妻子林以行安详地散步。但只是他们俩人同行，其他人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早已经没有人和他们打招呼、说话了。

内蒙古自治区会议的发展也完全出乎乌兰夫的意料之外，他把形势完全估计错了。

中央和华北局派了一个工作组参加并领导内蒙古组的会议。工作组由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领队，副组长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赵汉，组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还有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李树德等人。

李雪峰也参加过两次内蒙古组全体会议，每次都讲了话。

按照华北局的布置，内蒙古的任务是集中火力向乌兰夫发难，根本没提《老生常谈》这类文艺问题！

本想拿老同事胡昭衡开刀的乌兰夫，发现风向不对，赶紧吩咐妻子云丽文给留在呼和浩特市的自治区办公厅副主任浩帆打电话，“立即把乌兰夫所有的讲话记录严密封装送北京。”

乌兰夫还不放心，又亲自打回电话，命令浩帆收回区党委制定的《1966年上半年工作要点》一文。

5月中旬，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之际，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电话，通知他：中央决定，调他到北京市工作，让他立即到沈阳汇报和交代吉林省委的工作及分管的东北局文教方面的工作。

吴德来到沈阳，见到宋任穷，自然先是谦虚、客气一番，提出能否不去北京？

宋任穷说：“工作需要嘛，中央的调令，不能不去呀。”

吴德又问：“北京现在情况怎样？怎么说改组就改组了？”

宋任穷说：“彭真出了问题。”

吴德十分惊讶，继续追问：“彭真出什么事啦？”

宋任穷不愿多讲，只是对他说：“你到北京后，中央会同你谈的。”

5月24日，吴德到了北京。按照程序，他先去见了邓小平。邓小平对他说：“欢迎你来，中央决定你到北京市委工作，李雪峰任第一书记，你任第二书记。你先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了解下情况。北京的情况由李雪峰同志与你谈。”

吴德因此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前期的会议他没有参加，对陈伯达和其他人的发言听不太明白。

在会上，他见到了刘少奇，刘少奇对他说：“你是北京市委的第二书记，是协助李雪峰同志工作的。希望你们来演一出现代的《八大锤》。”

因为，中共中央除了调李雪峰和吴德到北京外，还分别从山西和华北局还调来了另外6个主要负责人，共8个人。

吴德和李雪峰见面时，李雪峰不无感慨的对他说：“他妈的，这个官儿可不是好坐的，放个屁也会让最高层闻见，我们的一言一行可是要注意呢。弄得不好，就会栽进黑洞里了。北京的问题严重，毛主席批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吴德又去见了叶剑英元帅，因为此时，北京市的工作主要由首都工作组负责，叶剑英是首都工作组组长。

叶剑英对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

5月25日，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做出第一项决定：

中共北京市委决定

(一)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撤销范瑾的社长职务。

(二)成立新的《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编委会，领导《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的工作。新的编委会由翟向东、吴象、林青等七同志组成，翟向东任总编辑，吴象、林青任副总编辑。

(三)撤销《前线》编委会，《前线》暂时停刊，进行整顿。

也是在这一天,北京大学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这天下午,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壁上,出现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宋硕,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

陆平,北京大学校长、党委书记;

彭佩云,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大字报的开篇,十分醒目的写道: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

在这张大字报上署名的有7人,他们是:

聂元梓,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个在1937年,年仅16岁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时年42岁;

赵正义,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

其余5人: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高云鹏、李醒尘,都是中共党员,除了杨克明刚刚调出哲学系外,其他人都是哲学系教员。

一个系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竟然给自己的上级党委领导贴出了大字报?难道仅仅就是因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吗?这张大字报的缘由还要从1964年7月,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说起:

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带了一个工作组,来到北京大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当时《桃园经验》的做法,他们到北大后,扎根串联,分别找各系的总支书记和党员、群众谈话,了解对北大校党委的意见和看法。在调查中,他们听到很多反映,如:北大资产阶级气味浓厚;不讲阶级斗争;学校领导特殊化;不抓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工农干部受打击等等。

根据毛泽东近几年对教育战线的指示精神,张磐石认为,北大正是毛泽东所批判的那种“被资产阶级统治的学校”,执行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和北大学校党委已经和平演变,用

当时“四清”中流行的术语：“烂掉”了。

1964年8月29日，张磐石向中宣部写了《一号报告》，说：“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北大党委的阶级斗争观念薄弱。在北京大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进攻是很猖狂的，特别集中地表现在教学和科学领域之中。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间谍活动，贪污盗窃份子、流氓分子的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党委对这些问题却没有认真抓。”《报告》声称北大党员干部队伍“政治上严重不纯”。《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哲学系聂元梓同志向我们反映，北大党委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提拔和重用一大批政治上不纯的干部”。

张磐石的这份《报告》引起了中宣部对北京大学的重视，决定就在北大搞“社教运动”的试点，并拟定了一份《计划》，准备“从11月起在北大开展社教运动，弄清北大在贯彻中央方针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搞清学校各级组织领导权究竟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还是资产阶级手里，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等五项任务。”

这份《计划》经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批准后，陆续调来中宣部、高教部几位副部长和局、处长、及各省市党委宣传部正副部长、省府教育厅的正副厅长、还有全国各高校正副党委书记和校长、高校党委部长和系总支书记等，总共200多人，组成以张磐石为队长的工作队，领导北大“社教”运动。

工作队浩浩荡荡开进北大后，动员全校师生起来揭发、批判陆平。哲学系首当其冲，作为运动的重点，张磐石亲自抓，先从哲学系入手。在一次大会上，张磐石说：“北大有几个总支的领导权在共产党手里？！人事处、组织部的问题就更乱了。”又说：“哲学系正在进行的大论战，就是一场阶级斗争，是北大阶级斗争的缩影。”他再一次表扬了聂元梓。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及一些青年教师，自然是响应工作队的号召，参加了揭发、批判活动。

北京大学党委在中宣部工作队的沉重压力下节节败退，它的上级领导，北京市委开始出面抗争。彭真派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市委大学部办公室负责人彭珮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副书记，帮助北京大学党委顶住中宣部工作队的进攻。但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寒假过后，一些出身好的学生以家

庭出身划分“阶级阵线”，提前改造了班干部，校园里关于“陆平犯了路线错误”、“北京大学已经烂掉了”的传闻纷纭，甚至一些激进学生还提出退学当兵或退学到农村落户的申请。

1964年底，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制定和通过了《二十三条》，要求纠正前一阶段社教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过“左”的偏差。邓小平和彭真接替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央指导方针以及人事的变化，立即导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转向。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搞“左”了，推翻了原社教工作队的结论，撤销张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副队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等人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原工作队撤离北大。

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对北大的运动专门开了一次会，对北大社教运动提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点呢，是北京大学是办得比较好的社会主义大学；第二点呢，陆平，北大校长、党委书记，是好同志；第三点呢，运动有成绩，但是有问题，主要是没跟北大党的领导结合，把北大当成一个烂掉了、夺权的单位，斗争方式有问题。”

1965年“五一”节前夕，浩浩荡荡开进北大的社教工作队悄悄地撤走了。陆平扬眉吐气，他在工作队进校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在会上发表演讲，大声地说：“我陆平还是好人嘛！”

陆平，黑龙江人，典型的关东大汉，高大粗犷。解放前他是一个北京大学的学生，战争年代失去一只眼，所以平日总戴着一副墨色眼镜。1958年，他由铁道部副部长的任上调到北大担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北大的“社教”翻了“烙饼”，那些响应工作队号召，起来揭发、批判北大党委的老师、学生怎么办？这些曾被称作“社教积极分子”，“左派”的人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下场？

原工作队副队长，时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常溪萍，是最早向中央反映张磐石的做法过“左”，应该纠正的人，在工作队撤离前，他向彭真建议：

“工作队撤走后，不要批前一阶段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和那些被

动员起来给北大党委提意见的同志，不要整他们。”

因为积极分子是工作队动员他们那样做的，错误在工作队，不在群众。但是，彭真不同意，他说：“积极分子为什么批不得？打击都打击得！”

为此，北京市委决定利用暑假把北大的中层以上干部及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集中在位于北京市委附近正义路的国际饭店进行整风，人员的出入都受到监视。会议由彭真亲自主持召开。他在动员大会上说：“要根据‘23条’的精神，要一个系一个系地整，直到思想组织都统一在党的原则上。”彭真宣布，不管是什么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统一了的就回校，统一不了的留在国际饭店继续整，直到统一为止。会上的一切费用由市委承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这次会议上，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和打击，要求他们人人检讨，挨个过关。不论是大会小会，斗争双方都很硬，每天都是唇枪舌战，针锋相对，斗争十分激烈。

聂元梓也是追随原工作组的积极分子，而且是全校的社教积极分子代表人物，自然也在打击之列。她很郁闷，通过爱人找到中组部长安子文，准备调离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反复，激化了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1966年5月11日，毛泽东看到戚本禹呈送的原北京大学教师、此时已调康生负责的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的张恩慈，于5月5日写的《我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的意见》报告。张恩慈与关锋在学术上有过合作，所以将这份《意见》给关锋看过，关锋对他表示了坚决支持，并把这封信交给了戚本禹。戚本禹也觉得写的深刻，即呈送给毛泽东。这份《意见》对北京大学“四清”工作队、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在领导北大“四清”运动方面，以及北大在贯彻教育方针等问题上，提出了不少尖锐的看法。毛泽东审阅时把标题改为《张恩慈同志对北京大学“四清”运动意见》，并批示：“少奇同志阅后，印发有关同志。”

13日，刘少奇批示：“此件请即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同志。”

毛泽东的批示及张恩慈的报告印发政治局扩大会议。此时的彭真，正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

第 46 回：调查组，未名湖畔泛涟漪 怎么办？燕园左派串联忙

毛泽东对张恩慈报告的批示下来后，康生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的名义，组织了一个调查组，由他妻子、中共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任组长，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为副组长，还有马列主义研究院的张恩慈，红旗杂志社 2 人，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 1 人，光明日报社 1 人，共 7 人前往北京大学开展调查。

在调查组人员基本到齐后，康生召集他们到钓鱼台开会，向他们透露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通过的《516 通知》内容，并说：“借调你们来是搞文化革命的调查，主要调查北大，调查批判《海瑞罢官》的情况。你们住在北大调查，不限于北大。”

5 月 14 日中午，曹轶欧带着张恩慈到北大找陆平谈话。

那天中午，陆平下班回到家里，正在吃午饭，书房里的电话铃声就响了，是校党委办公室来的电话：“陆书记，中央理论调查组的同志来我们学校搞调查，他们有 7 个人，由曹轶欧同志带队。”

“噢，我知道了，我就来。”陆平不敢怠慢，放下电话，赶紧吃完饭，乘上轿车赶到学校办公室。一进门就见曹轶欧已在那等他。陆平赶忙说：“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调查组需要了解什么情况，我们准备一下，做个汇报。”

曹轶欧说：“不必了。我们这次来，主要是了解你们学校学术批判的情况。”

陆平问：“你们住下吗？”

曹轶欧说：“住下。”

陆平：“行，我让办公室的同志安排一下。”

陆平叫人将曹轶欧等人安置在未名湖畔的专家楼里，并再三嘱咐：“一定要好好接待。”

晚饭后，陆平按照惯例，又去未名湖畔看望曹轶欧一行，却扑了个

空。屋里没人。经过“社教”风波的陆平，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怀着淡淡的疑虑，陆平缓缓的沿着未名湖畔走着，湖水翻动的微波，也在他的心中泛起阵阵的涟漪……

此刻，曹轶欧正在具体负责北京大学学术批判工作的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法律系主任陈守一家里拜访。

“陈主任，是不是影响你休息了？”曹轶欧先向陈守一表示歉意。

“哪里，哪里，您能上寒舍来，是我的荣幸。快请坐，快请坐。”陈守一忙着让座。

“系里最近忙吗？”曹轶欧问。

“还可以吧。”

“学术批判进行得怎么样啊？”

“目前主要是按照上边的统一安排，组织师生查阅历史资料，为下一步进行学术讨论做准备，同时也兼顾教学进度的需要。”陈守一介绍了法律系及北京大学目前开展学术批判的一些情况。

“为什么还要查阅历史资料，不组织批判呢？”曹轶欧不解的问道。

“市委和校党委都反复强调，学术讨论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搞‘学阀’作风。只有充分的占有资料，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做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陈守一依然按照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的要求向曹轶欧汇报。

陈守一的介绍，安全证实了毛泽东、康生的判断，北京大学就是按照彭真的意图执行的。于是，曹轶欧向陈守一介绍了正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情况，明确指出：

“目前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是有问题的，学术批判方向错了。”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陈守一向曹轶欧请教。

“你应该勇敢的站出来，揭发和批判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领导的错误。”

“这样做不好吧？学术批判有错误，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诿之于人啊。”

曹轶欧耐心地引导他说：“你没有责任，你们这样做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嘛。”

陈守一摇头：“不好这么讲吧。学校党委分工由我负责学术批判工作，有错误，首先是我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不对。”

面对如此书生，曹轶欧哭笑不得，只好起身告辞说：“你再想想，咱们下次再谈。”

曹轶欧、刘仰桥住在朗润园的专家楼，调查组其他人住在一院。不过，曹轶欧、刘仰桥在朗润园的专家楼只住了一晚，以后都是将北大 的人找到马列研究院所在地——西颐宾馆个别谈话。

曹轶欧也找了聂元梓谈话。

“听说你们这些社教运动的‘左派’都被派到农村去了？”曹轶欧问她。

“可不是，我过几天就去怀柔。”聂元梓回答说。

“你先不要走，北大的事情还没有完，彭真已经出问题了，他支持的陆平能没有问题？你应该留在学校里，继续与陆平他们斗争。”

听了曹轶欧的这番话，聂元梓甚不以为然，心想：“前一阶段的运动，是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派张磐石到北大的，连毛主席都说，‘北大社教运动是姓陆的整姓陆的’。邓小平对北大社教运动做了三条指示，彭真却要煞住社教运动的车，调转了方向，顶住了中央和宣传部，召开‘国际饭店’会议，整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这么多大人物都关注着北大，你康生再插手，未必就有多大的能耐？”

聂元梓想到自己前一阶段，头脑简单，紧跟工作队，得罪了陆平，在北大眼看是难以呆下去了，如今已被发落到乡下，估计回校无望，还不如尽快离开这块是非之地，还管那么多事？于是，对曹轶欧说：

“北大的事情，我看谁也搞不了，上边的人发指示，翻过来翻过去，到头来，还不是我们这些小干部们倒霉？”

“那你们就这样算完了？让人家整了一通，放下去搞‘四清’，说走就走，学校的事情不管了？”曹轶欧问。

聂元梓无奈的说：“我有什么办法。”

曹轶欧劝她：“先别急着走，你们都是北大的主人，对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应该关心，积极参加。”

聂元梓勉强答道：“好吧，我考虑一下。”算是给了曹轶欧个面子。

调查组到北大后不几天，除张恩慈外，其余4人每天都到北京市

委摘抄内部大字报。回来抄清后交曹轶欧，再交康生。康生认为这些材料很有用。

5月15日左右，曹轶欧又来电话，约陈守一到西颐宾馆谈话，刘仰峤副部长也在场。

曹轶欧问陈守一：“考虑得怎么样了？”

陈守一问：“你说北大学术批判的方向错了，能具体指出北大错在什么地方吗？”

曹轶欧说：“学术批判不得力……”接着，她问陈守一：

“聂元梓怎么样？你对她印象如何？”

陈守一谈了自己的看法。

曹轶欧又动员他说：“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

陈守一：“学术批判如有错误，首先应是我负责，如果我揭发陆平，我算啥？”

曹轶欧：“你没有责任，是陆平搞的鬼。”

陈守一：“我怎么能这样看问题、处理问题呢？”

至此，曹轶欧没再多说，只是嘱咐陈守一说：“这事不要对其他人说了，应该绝对保密。”

5月17日，《516通知》通过的第二天，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正式向北京大学发函，介绍曹轶欧、张恩慈等7人来校调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

5月20日，北京大学向校党委委员传达了中共中央《516通知》。在此之前对《516通知》已有耳闻的聂元梓，作为北大校党委委员，参加了传达文件的会议。

《516通知》证实了曹轶欧所言非虚，批判矛头所指，首先是彭真。《通知》所用语句之激烈，火药味之浓烈，都大大出乎聂元梓所想象。她懵了，没有想到，建国以后这么多年，党内的政治状况竟然是如此地充满危机，还有人胆敢违抗毛主席的指示，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还组成了反党集团，有文有武，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推翻红色政权！而进行这些反党反毛主席的活动的首领，竟然是近年来在政坛上深受重用又非常活跃的彭真！更加严重的是，按照《通知》所讲，各省、市、党

政军各部门内都有一批这样的人物！

聂元梓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心想：《通知》批判彭真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包庇邓拓、吴晗。那么，在此前的社教运动中他不是也包庇陆平了吗？至于北大，在传达中央的这一系列重要文件以后，并没有再做出什么具体而深入的行动去批判彭真，批判“三家村”。这说明陆平他们是紧密追随彭真的。党中央毛主席发出《5.16通知》，就是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起来保卫党，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聂元梓想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个报告，汇报一下北大陆平等人的 情况。她找到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谈了她自己的想法。赵正义非常支持，准备再找几个“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研究一下。

此时，哲学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也已经感到政治气候的变化，跃跃欲试了。

曹轶欧的调查组进校不久，“社教”后期受过批判的北大哲学系教师宋一秀、高云鹏就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

张恩慈在北大哲学系任教员时，也是“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在“社教”运动后期受到打击。运动结束以后，自己找人，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后又参加康生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现在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这次随调查组返回北大。

宋一秀、高云鹏向张恩慈谈起了他们对北大党委的不满，张恩慈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

“那么，怎样才能打开局面呢？”宋一秀、高云鹏问。

“还是要串联左派。”张恩慈提议说。

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

张恩慈拿不准，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

这天，哲学系的几个教师，宋一秀、高云鹏、赵正义和夏剑豸相约来到杨克明家。杨克明也是原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后期受打击，刚刚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现在

仍然住在北大宿舍。

杨克明已经不是北大人的了，在他家里议论学校党委的事情别人不好干预。他们正在议论时，聂元梓来找杨克明，于是，她也参加进来。他们谈到中央的《516通知》精神和近来的报刊批判文章，认为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批判他们时所依据的观点，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派整风”等等，正是中央《516通知》批驳的观点。北大党委陆平、彭珮云不久前传达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报告，强调学校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等，实际是压制运动，北京大学运动的方向违背了中央的精神。

聂元梓提出她和赵正义的想法：“我和赵书记准备给毛主席、刘主席写一份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你们是不是也都写一份。写信的人多了，反映情况的人多了，毛主席他们总该听一听吧。”

杨克明说：“写什么报告，我跟张恩慈谈过，他说中央的报告太多了，根本看不过来，就写一张大字报吧。张恩慈说了，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教育部都有大字报，还是这样来得快。”

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好。

聂元梓说：“也行。在国际饭店受批判时，我已经给毛主席、刘主席写过报告，反映北大的情况，还是请田家英同志亲自转交的，到现在也没有回音。写大字报，可以让大家都知道，准能反映到上级领导那里去，这可能比给党中央、毛主席、刘主席写信还要管用。”

聂元梓毕竟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有多年党内生活经验，深知大字报的分量。青年教员提议写大字报，她认为不错，但是她觉得还要请示有关领导。

杨克明说：“那就找一下张恩慈，通过他问问曹轶欧吧。”

聂元梓给张恩慈打了电话，说：“我们想给陆平写张大字报，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曹轶欧。”

张恩慈向曹轶欧做了汇报。

第47回：细斟酌，挥笔书就大字报 遭围攻，聂元梓匆匆离去

过了一、两天，张恩慈通知聂元梓：曹轶欧要见她和杨克明。

聂元梓和杨克明按时到达友谊宾馆，曹轶欧和她的秘书及张恩慈都在。曹轶欧问聂元梓：“听说你们找我？”

聂元梓说：“我们听了《516通知》，对北大校党委和陆平的工作有一些意见。想给陆平写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校园里面。因为陆平是北大的党委书记兼校长，这样做，不知道行不行，想请示一下领导。”

曹轶欧说：“行，贴一张大字报，怎么不行呢？中央的《516通知》是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

杨克明曾要张恩慈和他们几个人一起搞。张恩慈说他已被抽调参加到北大的一个调查组，参加北大的事不方便。因为曹轶欧曾嘱咐他：“支持哲学系一些活动时，注意不要太明显，有些场合要有所回避。”

得到曹轶欧的支持，聂元梓他们很快聚到一起，讨论大字报的内容。聂元梓建议写“社教”运动问题，但是年轻一些的教员主张写现实问题，写文化大革命。于是决定从宋硕报告入手，批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

大家商量，由宋一秀在赵正义的一篇批判稿基础上改写。后来感到修改稿不理想，宋一秀重新起草，算作第二稿。接着，几个人又用了两个晚上讨论修改文稿。讨论中有人提议，问题应当提得更尖锐有力，锋芒应当更犀利，要仿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

到了5月24日晚上，大家觉得修改稿还是不行，杨克明就说：“还是我来执笔吧。这天晚上就不再讨论了。我开个夜车，明天早上，我上班时把修改稿留在家里，你们来取底稿就行了。”

杨克明很有把握，成竹在胸，大家就同意了。杨克明在北京大学

24楼112号房间高云鹏的宿舍连夜赶写。他对文章作了很大修改,几乎是重写,完稿已是25日凌晨三、四点钟。杨克明稍稍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件交给高云鹏,就去电工所上班了。

5月25日上午,高云鹏、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在北大25楼204号房间宋一秀的宿舍讨论杨克明的修改稿,集体推敲,边议边改,逐句定稿。快完稿时,聂元梓来了,她看了一遍修改稿,认为可以,只是建议对最后一段做了修改,并且加上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高云鹏和夏剑豸找来毛笔,各自分别抄写了一份大字报。

看到抄写完毕的大字报,聂元梓作为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毫不犹豫,第一个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她不会想到,这张大字报日后给她带来的是曾经无尚的荣誉和永久无尽的灾难……

接下来签字的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当时不在场,由高云鹏做主代签。讨论临近结束时,赵正义去哲学系办事,委托宋一秀代签。再往下是高云鹏。6个人签完名以后,宋一秀又叫来哲学系青年教师李醒尘,说明情况。李醒尘欣然签上最后一个,即第七个名字。

此时已是1966年5月25日下午13时30分左右,大家都还没有吃饭。但是,一种无言的兴奋和激动,也许是一种使命感使他们忘记了饥饿。

因为这天下午,北大校党委准备召开全校大会批判“三家村”,聂元梓他们觉得这是校党委为掩盖前一阶段“假批判,真包庇”的错误,试图掩人耳目,以争取主动。为了不让校党委的这一“阴谋”得逞,聂元梓他们决定立即将大字报贴出去,赶在大会之前,揭露校党委的阴谋。他们没有去吃饭,而是拎着浆糊桶,拿着刷把,来到北京大学大饭厅,把大字报贴到了饭厅的东墙壁上。

贴完大字报,已是下午14时,正是睡午觉起来的学生到教室或图书馆去的时间,他们都要从这里经过。但是,匆忙经过同学们似乎没有太多的人停下来注视这张大字报,只有一人站在大字报前认真的阅读,他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这段期间,他正在市里参与筹备亚洲科学家会议。

周培源的脸面平静,没有任何表情,其实内心在剧烈的沸腾。因

为他对陆平很有意见,认为陆平“乱想、乱说、乱干”,把北大搞乱了,为此,他在北大“四清”运动中,给周恩来写过一封信,告了陆平一状。当他看完大字报,返回亚洲科学家会议筹备处时,便压抑不住自己的兴奋,向同事们说道:“北大爆炸了一颗原子弹!”

大字报确实像一颗原子弹一样爆炸了!它越来越多的吸引了过往的师生,人们一拨又一拨地围观这张大字报,议论纷纷,很快,北大校园内像炸开了锅一样,针对十几天前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讲话中“北大不宜贴大字报”所提出的质疑,这张大字报唤起了师生们的兴趣和复杂的感情。这是自1957年反右以后,北京大学再次出现大字报。

1957年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是质疑学校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是否民主、公开一事。那张大字报,引发了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热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也是促使中共决心开展反右派运动的主要诱因之一。1957年的大字报就是贴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

当年贴大字报的谭天荣已经被打成右派大学生。今天聂元梓的大字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历史的巧合,让人产生联想。聂元梓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学校党委,公开点了校党委书记、校长的名,火药味极浓。有人说,给党委领导贴大字报还不是反党?这是反革命大字报,谭天荣又出现了,写大字报的人不是右派也是反革命!

当然,也有赞成的。本来下午要去上课的学生们,教室也不去了,就在大饭厅外面,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争论得热火朝天,而且像滚雪球一样地,越滚越大,人越来越多。整个下午,大字报前面人声鼎沸,群情激奋。

在贴这张大字报以前,聂元梓在哲学系的一部分教师、干部和学生当中已经讲了,根据中央的《516通知》精神,可以对校、系工作和陆平校长等领导写大字报。因此,哲学系也有不少人写了大字报,都是给校党委提意见,和聂元梓的大字报几乎是同时露面,都贴在大饭厅外面的墙上。而且,随后的三、四个钟头,又有几百张大字报跟着贴出来,绝大部分都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只有六、七张大字报是反对他们的。到了傍晚时分,北大沸腾了,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贴满了大、小饭厅周围。文二(四)的男同学,颇为活跃,扛着贴在木板上支持聂元梓

的大字报，喊着口号，游行到了大饭厅。

面对哲学系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北京大学学校党委立即组织反击，当天下午，北京大学和北大附中召开了内部广播大会，陆平讲话说：“现在，右派又开始向党进攻了”，他号召全校师生奋起反击，等等。他们组织了一批辩论高手到现场和聂元梓他们辩论，在大饭厅里发表演说：

“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 1957 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聂元梓是反党的大阴谋家，是邓拓的忠实卫士，是别有用心的……”

在争夺话筒的过程中，高云鹏还受到一些人的围攻和推打。同时，1500 多张反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快贴在校园内和大饭厅墙上，指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转移群众对‘三家村’斗争的视线”，是“为邓拓一伙开脱”。

北大留学生工作办公室的宋柏年、高艾军等 11 人的大字报的题目是：《请看聂元梓的罪恶勾当——聂元梓大字报是反党的大毒草》，其中写道：“5 月 24 日下午 4 点，党委扩大会上传达了党中央有关文化革命的指示，作为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你是亲自听见了的，你有话为什么不在党的会上说，却在不到 24 小时的时间内，迫不及待地把写有内部情况的大字报贴在大餐厅？你目无组织，目无中央，你还有点党性吗？你还有一点点共产党的气味吗？”

形式陡然逆转。

晚上，哲学系师生正在和郊区一部分工农群众开声讨“三家村”的大会，会议刚开始，一阵口号声由远而近，1000 多名师生拥到会场外，要冲击会场，他们激动地高喊：

“现在已经不是下午的形势了！”

“我们要找聂元梓算账！”

哲学系的人企图把他们拦在门外，双方之间发生了冲突，一群人冲进了会场，他们前、后门都堵起来，要斗争聂元梓，而聂元梓则在支持她的一些学生的护卫下，离开了会场。

接着，反聂元梓的学生数百人又集聚在大饭厅开会，有人登台演说：

“聂元梓一伙人故意在全校声讨邓拓的大会召开前夕向校党委开火,是为了要转移斗争目标,是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对抗党中央毛主席……”

当一些哲学系师生企图为聂元梓辩论时,遭到群众的攻击。

晚上,杨克明回到学校,看到了大字报贴出后的状况,又害怕又着急。他责问聂元梓她们:“是谁把我的名字签在大字报上了?”

高云鹏说:“你走以前不是交代了,要我们替你签名吗?”

杨克明着急的说,“光是同意我们写大字报,她知道不知道这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他是想指责曹轶欧,又不敢明说出来。

“聂书记,是不是赶快把张恩慈找来,看应该怎么办?”杨克明向聂元梓建议道。他的话,引起了聂元梓的共鸣,上一次社教工作队在北大,就是动员干部和教师给陆平、给校党委提意见,人发动起来了,工作队说撤就撤了,留下这些积极响应工作队号召的人挨整。想到这里,聂元梓说:“我去给张恩慈打电话,让他问问中央文革小组,看他们有什么说法。”

聂元梓在电话中对张恩慈说:“我们的大字报贴出来了,学校里乱了,群众对大字报有争论。中央会有什么态度,你能不能帮助我们请示请示。”

张恩慈下午已经知道他的这些老同事们搞出了如此大的动静。接到聂元梓的电话,他不敢怠慢,赶紧说:“你们不要着急,我马上请示。”

张恩慈立即向曹轶欧做了汇报。其实,当天下午,张恩慈就按照曹轶欧的安排,到北大看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拍了照片。此时,北大的情况早已通过不同的渠道陆续传到康生这里:周恩来得知北大大的大字报后,考虑到北大有外国留学生,特别强调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派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到康生那里通报北大的情况;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接到指示,速到北大了解情况,就地指导,临出发前,蒋南翔到康生这里请示汇报,康生告诉蒋南翔,曹轶欧已派人亲自前往北大了解情况。

聂元梓他们要贴大字报康生是同意的,但是,对大字报的具体内容他还不太清楚,而且,大字报引起的紧张局面和陆平他们对大字报

反击之强烈，康生始料不及。中央一班人对大字报的态度虽然还不明朗，但偏袒陆平，反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态度是可以明显感觉到的。康生立即让曹轶欧将聂元梓大字报的底稿迅速送来。

接到聂元梓电话约一个小时以后，张恩慈来到北大22楼杨克明家里，聂元梓他们都在这里守候。张恩慈见到他们后就说：

“领导要你们把大字报抄一份给我，送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党中央看看。”

看到张恩慈，杨克明又发火了，对张恩慈说：“你们现在怎么都不吭声？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会怎么样？”

张恩慈赶紧回答说：“我把大字报带回去，先给中央文革的领导看一看。你们等着我的电话吧。”

当天晚上，聂元梓他们等了很久，张恩慈的电话一直没有来。大家很紧张，心里没有底。对他们写的大字报，他们认为是正确的，首先，大字报内容是根据中央精神写的，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其次，从组织原则上说，他们请示了上级领导；第三，是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不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公心，因此，没有错误。但是，对大字报引发的这种混乱局面应该怎么解决？等待他们的后果是什么？他们茫然不知所措。

陆平等人更是不敢怠慢，他赶紧将大字报的内容和北大的情况分别向新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和高教部部长蒋南翔作了汇报，并在领导的提示下，报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的告急电话接二连三的打到刚上任的“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那里，陈伯达又给新上任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打电话：

“现在北大形势严重，很多人去看大字报，很可能要上街游行，也可能会有大字报上街，你快去看一下。在北大贴大字报要做工作，不要上街。”

李雪峰想，彭真刚出问题，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究竟是对是错？毛泽东是什么态度？谁也不清楚。中央没有态度，去了怎么说呀？于是，便说：“我不能去呀，中央还没有下正式通知呢，我去师出无名啊。”

李雪峰的推脱让陈伯达更加着急，他接连给李雪峰打来三次

电话：

“现在北大形势很严重呀，非你老兄出台不行了。”

是啊，彭真已经免职了，新的北京市委书记是你李雪峰，北京大学党委是隶属于北京市委管，不找你李雪峰找谁呀？

李雪峰还是说：“不行呀，中央没说话，我怎么去呀？”

陈伯达百般无奈，只好说：“要不，我和你一块去。”

陈伯达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又已内定文革小组组长，是负责这场运动的，李雪峰一听，马上就答应了：“好吧，我陪你一起去。”

李雪峰刚放下电话，国务院外事办副主任张彦的电话就打了进来：“我刚从康老那里出来。康老让你和蒋南翔一起去一下北大。他原准备是和我们3个人一起谈。我去后，康老说，既然我来了，就先和我谈，请我转告你。康老的意思是，大字报可以出，但不要搞到各个学校去，不要上街。总理也指示了几条：正面讲毛主席的伟大决定，对大字报要做几条规定，工作要说服，不能压，要负责人亲自去做工作。我先和你打个招呼，康老还要找你。”

一会儿，康生的电话就打过来了：“李雪峰吗？蒋南翔已经过来了，你不来也可以。”

李雪峰：“陈伯达来电话，要我到北大讲话。”

康生：“可以。”

康生的电话才放下，陈伯达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李雪峰啊，你什么时候过去呀？”

李雪峰说：“我等你哪。”

第一部上卷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1回；第2回；第3回；第4回；第5回；第6回；第8回；第9回；第10回；第11回；第12回；第16回；第17回；第20回；第21回；第22回；第23回；第24回；第25回；第26回；第27回；第28回；第30回；第31回；第32回；第33回；第34回；第35回；第36回；第37回；第38回；第39回；第40回；第41回；第42回；第43回；第44回；

杨尚昆：

第10回；

罗瑞卿：

第12回；第13回；第14回；第15回；第16回；第17回；
第18回；第19回；第22回；第23回；第28回；第29回；
第33回；

“首都工作组”：

第22回；第31回；第39回；第42回；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第23回；第24回；第27回；第30回；第31回；

《二月提纲》：

第23回；第24回；第25回；第26回；第27回；第31回；
第32回；第33回；第34回；第35回；第36回；

《三家村》：

第32回；第34回；第37回；第40回；

《五一六通知》：

第33回；第34回；第36回；第37回；第38回；第39回；

中央文革小组：

第33回；第34回；第35回；第39回；第41回；

陆定一：

第29回；第30回；第41回；

专案审查：

第40回；第41回；第42回；

北京大学：

第45回；第46回；第47回；

上海：

第7回；

天津：

第44回；第45回；

华北地区：**河北：**

第44回；

内蒙：

第44回；

山西：

第44回；

中南地区：**湖北：**

第35回；

广东：

第37回；



文革史话

（上）第一部山雨欲来

下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文革史话

之

第一部

山雨欲来

下 卷

刘朝驹 著

中国文化出版社

目 录

◇下 卷◇

第 48 回:讲纪律,李雪峰“内外有别” 搞文革,空军硝烟起正酣	363
第 49 回:保安全,首都工作组开会 跟不上,军报竟指导党报	371
第 50 回:“保旗论”,大院内“炮”声隆隆 陈伯达,亲掌管《人民日报》	379
第 51 回:发社论,群情起举国欢腾 狂潮涌,惊涛声响遍神州	387
第 52 回:昼夜间,北京大学人如海 干革命,中学生岂肯稍歇	395
第 53 回:燃激情,红卫兵亮相舞台 工作组,陈伯达提出异议	404
第 54 回:“不能乱”,刘少奇忧心忡忡 飞杭州,示方略未得要领	412

第 55 回：匡亚明，溧阳县遭遇炮轰 稳局面，回南京汇报结果	419
第 56 回：六月三，青海湖又起波澜 轰领导，动荡在全国蔓延	425
第 57 回：六月六，匡亚明转瞬打倒 西北局，开会也揪“三家村”	432
第 58 回：飞西安，剑英出手援耀邦 义愤起，西安交大风云动	440
第 59 回：打压狠，遗书一封催泪滴 看西南，贵州文革序幕掀	447
第 60 回：六月七，兰州城又生事端 斗老师，学校“池浅王八多”	455
第 61 回：清华园，高干子弟冲在前 霎时间，蒋南翔迅即倒台	462
第 62 回：生疑问，工作组遭遇轰赶 请“尊驾”，众领导再聚杭州	470
第 63 回：激情烧，革命火燃在江城 六一三，南京市党报被围	477
第 64 回：人大反，孙泱辞职仍被斗 评校长，重庆大学闹翻天	484
第 65 回：麻雀方，动荡中不乏幽默 六一八，郑州大学起风波	490
第 66 回：蒯大富，清华质疑工作组 要改革，下通知废除高考	497

第 67 回:六一八,未名湖施暴疯狂 批大富,薄一波辨证清华	504
第 68 回:到一线,王光美亲临清华 六二〇,北京轰赶工作组	511
第 69 回:压不服,各地纷纷出事端 武汉市,“墨水湖中学事件”	519
第 70 回:发简报,陈伯达意见被否 女附中,卞仲耘屡屡被打	528
第 71 回:六二一,吉林省“红旗事件” 出奇文,造反精神万万岁	534
第 72 回:难抵挡,工作组辩论败北 不堪辱,江隆基命陨兰州	541
第 73 回:中科院,发生“应地所事件” 通情况,刘邓见民主人士	547
第 74 回:六二七,北航组织大辩论 陶铸忙,不断指导中南局	555
第 75 回:反压制,广东学校大动荡 急戒备,《北京来信》惊羊城	561
第 76 回:斗韦力,天津一中带头干 齐动员,津城声讨十六中	567
第 77 回:上措施,清华反击蒯大富 多数人,同意开除其团籍	575
第 78 回:不屈服,蒯大富绝食抗议 庆七一,《造反歌》传唱北京	581

第 79 回:邓小平,接见女附中领导 群情奋,吴法宪四面楚歌	588
第 80 回:联名信,要撤换空军领导 竞相同,海军开会批肖、苏	595
第 81 回:军委会,解决空、海军问题 烽烟起,毛泽东回到故乡	602
第 82 回:滴水洞,冷眼向洋看世界 望神州,热风吹雨洒江天	610
第 83 回:抓右派,王任重屡出经验 反鲁迅,任白戈《红旗》点名	619
第 84 回:华北会,乌兰夫真难过关 打游击,云成烈欲上青山	626
第 85 回:做工作,刘、邓亲自出面谈 文革火,熊熊燃烧在青城	632
第 86 回:外事口,工作组四处被轰 分歧大,康、陈顶撞刘少奇	640
第 87 回:访广院,一切权力利归学生 转弯难,北大重评“六一八”	647
第 88 回:游长江,壮志豪情贯苍穹 闻“收尾”,毛泽东颇为惊讶	656
第 89 回:历史所,少数派意外平反 回北京,刘少奇求见未成	664
第 90 回:是危言? 要准备杀头坐牢 责任大,少奇雨夜莅清华	671

第 91 回:撤与留,常委会争论不休 要决议,确定文化大革命	678
第 92 回:再走访,文革组又临北大 微服行,周恩来深入二外	685
第 93 回:听呼声,一行人再访广院 答疑问,陈伯达盛赞江青	691
第 94 回:下决心,阻碍者统统驱逐 是与非,北大万人辩论会	697
第 95 回:争论急,风雨中无人离去 小太阳,彭小蒙备受赞扬	704
第 96 回:张承先,会后急往北大赶 动真情,江青忘情诉家事	712
第 97 回:刘少奇,与康生激烈争论 赴师大,解决工作组问题	720
第 98 回:工作队,诸领导接连被撤 义愤起,人大揪斗郭影秋	728
第 99 回:乱打人,团中央谎报军情 做决定,北京撤销工作组	736
第 100 回:苦难言,老革命遇新问题 红绿灯,工作组撤离北航	743
第 101 回:亲约见,周恩来会蒯大富 开全会,文革再掀新篇章	751
第一部下卷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759

第48回：讲纪律，李雪峰“内外有别” 搞文革，空军硝烟起正酣

放下陈伯达的电话，李雪峰马上找来华北局第二书记解学恭和书记池必卿商量：

“北大的形势看来很严重。一会儿我们过去，我在台上，你们在台下，万一被群众包围，彼此也好联系。聂元梓是太行山的干部，必要时，池必卿可以做做工作。”

安排完后，李雪峰又给陈伯达打过去电话：“伯达同志吗，我是李雪峰。咱们什么时候去呀？”

陈伯达：“我正在改一篇社论，去不了了，你先去吧。”

晚上23时，李雪峰和新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以及华北局的三个书记处书记赶到北京大学临湖轩，陆平正在主持校党委会。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刘仰峤都在。

4个小时前，陆平已经召开了一次校党委会，研究下午发生的事情，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主张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但大多数人不同意。

晚上21时30分，陆平又召开全校党员大会，强调内外有别，要有组织纪律性。

看到李雪峰他们到了，陆平先汇报了北大的情况，又准备重新召开全校群众大会，党团干部集中在办公楼礼堂，校内各单位通过有线广播，组织收听。此时已是夜里24时，李雪峰说：“已经开过了，那就算了吧。”

蒋南翔说：“雪峰同志你既然来了，我们就再开一次。”

在会上，李雪峰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的有关规定，要“内外有别”，运动要有领导地进行等等。他说：

“我们惊动你们，但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是最好的形式，是武器，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

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中央和国务院指示，不要把内部和外部的大字报都贴在一起。

要把这场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修正主义影响是长期的事情。文化领域包括思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是要进行一个长时间的，要5年到10年时间。主席说：我这一辈子不行了，你们再接着来。我们要进行一场尖锐复杂但也是很细致的阶级斗争，这要有坚强的领导。最高司令就是毛主席，最高司令部就是党中央。因为这场革命涉及面很广，所以要一步一步来。要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打歼灭战。现在只是第一个战役刚刚发动。目标就是三家村黑店，别的还没有准备好。”

他还说：“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不要弄得乱七八糟，要有秩序，有纪律。这不是束缚大家手脚。”

“周总理对大字报有指示。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党员要有民主权力，大小字报内外要分开，国内外党内外要分开。外部的外国人可以看，内部的外国人不许看。党内问题，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不要在外面张贴。”

“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可以的，但要内外有别。北大出现了几份故意泄密的大字报，涉及到党和国家机密的，要注意。”

大会开始不久，池必卿在北大副校长戈华陪同下在会场内找到聂元梓，将她叫到楼上。池必卿一见聂元梓就说：“你也是一个老同志，写这张大字报，怎么都不请示领导呢？”他显然是憋着一肚子的气，还在尽量地控制着。

“我请示了。”聂元梓争辩说。

“你向谁请示了？”池必卿问。

“我请示曹轶欧了。”聂元梓将他们向曹轶欧请示的经过向池必卿作了汇报。

池必卿听后，不说话了。

大会快结束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张彦也到了。张彦说：“我是总理派来的。”他传达了周恩来的意见：“贴大字报可以，但是不要贴在外边，应该开辟一个室内的场地，用来贴大字报。因为刚刚过完‘五一’劳动节，一些外宾还没有离开北京，让他们看到大字报，影响

不好。”

从北大回来后，李雪峰怎么也睡不着觉，对他北大的讲话是否合适，实在没有把握。此时的政治形势，让他看不清楚，但有一点知道，这个时候，稍有不慎，就会重蹈彭真或张磐石的覆辙。天还没亮，他就给刘少奇打电话汇报，当说到：“在会上我代表中央、包括总理讲了话，……”

刘少奇马上顶了一句：“你不能代表。”

李雪峰一听，赶忙问：“那怎么办？我马上写一个检讨，需要公布就公布。”

刘少奇：“那也不要。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不能偏离这两个轨道，偏离一点都是错！”说完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北大党委又组织各个系开会，要求赞同聂元梓大字报的老师和同学，都要检讨。学校在第三食堂内拉上了许多铁丝，专门供大家贴大字报。

法律系学生徐昭文等18人联名于5月26日贴出大字报，题目是：《你们是赫秃子式的阴谋家》。大字报指责聂元梓他们：“你们披着‘党干部’的外衣，干着叛党的勾当。昨天你们演出了一出反党反文化大革命的丑剧，我们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你们早已怀上了取消党的领导的鬼胎！”

校办的工作人员周韵，在铁丝上粘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只写着一行字：“聂元梓是个好同志！”粘完大字报后，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但这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大字报是声讨、批判聂元梓的。

之后几天，第三食堂就成了人们观看大字报和表达不同意见的场所。

5月26日上午，北京大学校党委派副校长黄一然在临湖轩同聂元梓谈话。黄一然曾担任驻苏大使馆文化参赞等职，善于辞令，他娓娓动听地劝说聂元梓主动检查，自己去把大字报撕下来，聂元梓沉吟片刻，回答说：

“检查，可以，我检查。不过，把大字报撕下来，我不，我不撕。”

此时，1957年反右斗争的情景不断地在聂元梓的眼前闪现，历次政治运动的阴影凝重地笼罩着她。但是，她总觉得这次她对《516通

知》的理解应该没有错,不能轻易后退,还是要坚持一下。

遂后几天,愈来愈多的人纷纷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的大阴谋家,甚至说是邓拓“三家村”的忠实卫士。

深感政治压力巨大的杨克明打电话问张恩慈:“我们写的大字报到底有没有问题?!”

很快,张恩慈打电话给杨克明:“我带你去见曹轶欧吧。有什么问题你直接问她。”

两人来到友谊宾馆曹轶欧住处,杨克明特地带上了大字报的底稿,曹轶欧看过大字报底稿以后表示:“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不对。”她询问了杨克明的年龄、工作,并说:“做这种事情要谨慎。大字报的底稿先留在我这里吧。”

这份底稿是杨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给其他人讨论的那一份原件,上面有聂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笔迹。

5月27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那几天,江青经常跟戚本禹通电话,询问北大的情况。戚本禹把聂元梓等七个人写的大字报在电话里一字一句地读给她听。

江青问:“小组的人是什么态度?”

戚本禹说:“我们都支持。”

江青又问:“怎样支持?”

戚本禹说:“因为还没有同你商量,所以小组尚没有人出面公开讲话。但小组办事组的曹轶欧带人下去了,他们广泛与学生联系,并公开表态支持广大学生。”

江青说:“光曹轶欧去还不够,她又不知道多少情况。”

戚本禹说:“她知道情况的,康生把北大的情况告诉了她。”江青这才放心。

不久,曹轶欧来电话问戚本禹:“对聂元梓的大字报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戚本禹说:“中央文革当然要坚决支持群众大字报的,你是不是再去请示一下康生同志?”

曹轶欧说:“就是他要我来问你的。”

因为康生知道,江青和戚本禹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

5月29日,北大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正式写报告,汇报“陆平镇压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华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

动荡,岂止在中国共产党和北京大学。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总政治部于当天召开电话会议,向全军传达军委的这一通知,部署在全军开展文化大革命。

这时,空军司令吴法宪和空军副司令成钧正在甘肃省临洮县检查工作。他们是4月下旬赴西北地区执行氢弹投掷任务,完成任务后顺路到西北地区的航校、高炮、导弹和飞行部队检查那里的工作。很快,吴法宪接到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电话,要他和成钧立即返回北京,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商量,对《516通知》要立即进行讨论。

这个电话刚刚放下不长时间,余立金又再次打来电话,告诉吴法宪说:“叶群要我转告你,要尽快赶回北京,否则就会变成‘恩克鲁玛’了。”

恩克鲁玛是当时西非加纳的总统,1966年2月访问中国期间,国内发生军事政变,其政权被推翻,后流亡并定居于几内亚。加纳的这次政变,林彪在“518讲话”中也有提及。

其实,叶群已经直接给吴法宪打了电话。原来,叶群到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家,正好碰到空军副司令员徐深吉也在那里。徐深吉不认识叶群,以为她是家属,所以继续和刘志坚谈空军的事情。他说:“吴法宪躲出去检查工作,迟迟不归,对《516通知》即不传达讨论,也不下发执行。”

叶群回到家,立即给吴法宪打电话,说“你后院起火了,你还不赶快回来。”

吴法宪哪敢怠慢,马上启程返京。

5月26日上午10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周恩来主持了这天的会议,刘少奇在会上再次做了自我批评的讲话。他说:

“首先感谢会议专门给我安排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的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

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但是我们还是要认真学习，努力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刘少奇在讲话中再次对彭真进行了批判，并批评了陈云在1962年提出的包产到户的主张。接着，他从1927年大革命时期，他在武汉同意解散工人纠察队讲起，讲到1949年在天津讲话中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可以发展，1956年反冒进，1962年对经济困难估计严重，一直到1965年制定《23条》时不主张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历数自己参加革命几十年的缺点错误。他还说到：“主席从揭露严慰冰匿名信时就讲政变，问我们会不会发生政变？”

就这样，刘少奇一直讲到下午13时30分才结束了对自己的批判，周恩来宣布散会。

5月28日，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中发[66]281号

中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领导下。现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通知你们。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四大区参加的成员（四人）确定后，另行通知。

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基本是参加《通知》的起草人员。名单中原来有陈亚丁和吴冷西，他们也参加了《通知》的起草工作。但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时批评吴冷西是“半个马克思主义者”，此时的他已经是一“四面楚歌”，无法正常工作了，只能从名单中删除。

而陈亚丁最初是江青提名的，他和江青一起搞过样板戏，也参加过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及会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起草工作。江青说他在这几次活动中的表现都很好，所以提议他参加。但是，刘志坚不同意，说他政治上不坚定，个人作风方面也有些问题。于是换成谢镗忠。因为谢镗忠也参加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

会纪要》的起草工作。陈亚丁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而谢镗忠是总政文化部部长。把陈亚丁列为组员，不列谢镗忠，不合适；两人都列入，则总政方面的人太多。因此，删陈亚丁，加入谢镗忠。

江青、刘志坚任副组长，是陈伯达 4 月 16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通知》起草小组第一次集中的会议上宣布的。

把康生列为顾问，从职务上讲，这是自然的。张春桥提为副组长是因为杭州会议时，确定陈伯达为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推辞，他跟毛泽东说：“主席，这个事我干不了，我是个书生，康生干比我合适，他原来是五人小组的成员，他干比我强。”

毛泽东回答：“你把那个书生气去掉不就可以了嘛！”

陈伯达曾向毛泽东建议让江青当组长。他的建议理所当然地被毛泽东否认了。于是，陈伯达又建议，如果他当组长，最好让江青担任副组长，毛泽东同意了。随后，江青又提议张春桥为副组长，获得通过。这样，江青就是第一副组长。

增加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则是因为王任重是省委书记中的“秀才”，写了不少杂文。而且，他于 1966 年 1 月 24 日在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会上的讲话，关于政治挂帅的论述，颇受毛泽东重视，于 1966 年 4 月 10 日经中共中央批转下发全党。一次周恩来前来看望起草《通知》的小组人员，正好说起此事，周恩来说：“毛主席很信任王任重的。”此时的王任重和陶铸，很受毛泽东的器重。

姚文元进中央文革是戚本禹在上海时最先提出的，江青同意。陈伯达觉得不妥，他说：

“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篷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辫子。”

张春桥没有说话。

周恩来说：“对一个人的评价应该主要看本人表现，不应看他的家庭出身。”

后来，毛泽东在杭州说：“老子反动，儿子就不能革命啊？这是两回事嘛。老子反动儿子革命的很多。陈独秀后来叛党，可他的两个儿子是革命烈士！我们这些人也都是出身不好的，我还是富农家庭出身，还不是照样干革命？”

姚文元参加了《通知》的起草工作。

5月21日,康生打电话向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江青等人提出让姚文元参加文化革命小组的问题,毛泽东同意。于是,“中央文革小组”便多了一名成员:姚文元。

《通知》下达后,中央文革小组并没有马上成立,原因是毛泽东不同意名单中的王力,因为王力是1964年彭真向毛泽东建议他列席中央常委会,并称王力是优秀干部。毛泽东对王力有看法,认为他不合适。可是康生、陈伯达力保王力,理由是:王力是钓鱼台“秀才班子”里的“老人”,起草文件比姚文元要熟练。如果过去的秀才班子一个不留,不好办事。从起草文件到印刷整个过程,新来的人不熟悉。他们请江青向毛泽东谈,说“留一个王力,不然就清一色了。”毛泽东最后同意王力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毛泽东提出,不仅是那些笔杆子要参加中央文革,各大区都要有人参加。华东局的张春桥、中南局的王任重已经是中央文革的副主任了,后来又增补了另外四个大区的成员是:

郭影秋,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华北局;

郑季翘,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

杨植霖,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

刘文珍,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共中央西南局。

第49回：保安全，首都工作组开会 跟不上，军报竟指导党报

5月26日下午，叶剑英主持“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为了保密，这次会议居然是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茶炉室召开，出席会议的人有周恩来、叶剑英、李雪峰、谢富治、郑维山、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等人。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就调兵方案达成共识。扩编调入的部队，与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等商议后报告毛泽东的方案有所变动。

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

周恩来最后说：“今天的会议，研究和决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就这样定下来。卫戍区司令员拟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担任。”

叶剑英强调：“北京卫戍部队的调动是一件大事，不能马虎，要按原则办事，按军委关于军队调动的规定执行，要有严格的程序。今后遇有紧急情况，需要调动警卫部队执行任务时，一定要经总理批准。”

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为了在毛泽东回京之前完成选调部队的工作，“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很快就拟定了一份初步方案：（一）原中央警卫师改称为警卫第1师；（二）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第2师；（三）调第24军第70师作为警卫第3师，仍住怀柔地区；（四）调第63军的第189师作为警卫第4师；（五）卫戍区领导机关相应扩大编制。

5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北京卫戍区部队扩编的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总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63军所辖的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除傅崇碧兼卫戍区司令员外,调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作珍任卫戍区第二政委。

当天,公安部队司令部做出《关于加强广播电台武装警卫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年初以来,根据周恩来总理、总参和公安部的指示,公安部队对加强重要广播电台的警卫工作采取了很多措施。各地98个重要广播电台普遍加强了兵力。各总队对电台警卫工作均指定专人负责。各重要电台的警卫部队还调整加强了干部,并有营以上干部重点掌握。各省、市、自治区对调动电台警卫部队的权限都作了规定,以防止发生问题。加强了通信联络,给警卫部队配备了无线电台。”

两天后,公安部队整编小组向中央提交《全国公安部队整编报告》,经周恩来审核后报告毛泽东,6月6日,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6月7日,军委发布命令:“撤销中国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委决定:除北京市公安总队已于5月27日拨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外,其余全部公安部队自7月1日起,拨归各大军区、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建制领导,原中国公安部队番号撤销。以原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和现炮兵管理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整编为第二炮兵领导机关。

5月31日,周恩来将5月26日的会议情况,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以《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报送毛泽东。6月1日,毛泽东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

6月3日,周恩来对“首都工作组”上报的首都警卫部队调整方案做出批示:

“剑英、成武、王尚荣三同志,同意这一报告中所提的警卫部队的部署调整方案,请即组织实施。望在4天内将部队部署和调整具体落实,并将营连的驻地和机动兵力驻地绘图标出送阅,其它三事均同意。”

当天,首都工作领导小组和北京军区在京西宾馆召开有总理、副

总理、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参加的卫戍区营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主持了会议，杨成武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调整、扩编北京卫戍区的命令，由原来的一个师另一个团，增加到四个师另一个团。调 24 军机械化第 70 师、63 军 189 师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加上原首都警卫师改为警卫第 1 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为警卫第 2 师，共有 4 个师，外加 1 个独立团，1 个军乐团，1 个干部大队，级别为兵团级。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第一政治委员谢富治、第二政治委员由北京市委书记担任、第三政治委员黄作珍。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代表卫戍区全体官兵宣誓：“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

叶剑英也讲了话。他说：“担任首都卫戍任务的部队，同野战部队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小分队执勤和一两个人分散执勤的情况比较多，接触的环境比较复杂，会遇到资产阶级各种各样的诱惑和攻击。所以，必须加强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层，做到每个战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战斗中要发扬孤胆精神。今天在城市里执行警卫任务，我们要提倡孤忠执勤。在任何情况下，要对毛主席、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要成为党和人民的驯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务。”

北京卫戍区扩编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清理整顿首都治安，以保证党中央的安全。

卫戍区重新制定了首都安全方案，清除不安全隐患。“首都工作组”提出了对卫戍区部队的部署调整和整编安排：

一、6 月 10 日前完成保卫重要目标的卫戍部队的部署调整；

二、6 月底以前分步完成师、团干部既担负保卫重要目标的连队的干部调配；

三、6 月中旬大体完成所有卫戍部队的调整。

6 月 3 日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决定：对原北京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公安局局长、现任陕西省委书记冯基平，原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现任公安部十二局局长狄飞，现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原北京公安总队总队长、现任首都警卫 2 师师长吕展，及阎塘、阎前江等人实行隔离反省，对李一平、张烈实行撤职反省，派李钊、

刘坚夫、程诚、马星五等人到北京市公安局，分别任局长、副局长、政治部主任等职。6月5日，在北京体育馆召开的5000名公安干警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的决定。谢富治在讲话中说：“对一些反党分子、坏人撤销职务、停职反省，我们早有这个希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5月31日至6月6日，划归北京卫戍区的63军189师从石家庄获鹿地区进抵北京市郊长辛店、清河、南苑地区。

部队的调动是按临战状态调动，十分紧张。6月3日接到命令后，189师只用了3天时间动员准备，连夜搭乘专列进京。被认为有政治问题干部立即转业。排以上干部大都听到“二月兵变”的传闻，但不知道除了已经知道被“打倒”的人以外，在这次“兵变”中究竟还涉及谁？隐约听说，原北京公安总队总队长兼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现任警卫2师师长吕展已被逮捕，原因是警卫2师参加了“兵变”，189师进京就是接管他们的部分防务。

由于调动严格保密，部队到达驻地后，严禁单独与地方人员接触。

在中央电台等重要设施警卫的部队，都接到这样的命令：“夜间执勤如遇到回答不上口令的人接近目标，不经报告即可开枪阻止。”

结果有个排长半夜出门撒尿，一时没答出口令，就挨了一枪，幸亏打的不是要害处。

6月15日，军委电令陆军第24军所辖第70师自6月3日起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番号不变。从6月20日开始至24日，全部交接完毕。70师的原驻地——北京以东顺义、通县及怀柔一线不变。

189师为北方甲种师编制，辖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坦克团共五个团。

70师为陆军机械化师编制，是陆军第24军以至整个北京军区的主力，辖三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高炮团、一个加榴炮兵团和一个坦克团共六个团。

后来，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在高碑店的112师、在天津杨村的196师、在宣化的193师，必要时也可以由北京卫戍区直接调动。

军事调动在不露声色地部署中……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加强中南海的安全工作,因为杨尚昆在中南海搞了近20年的警卫工作,担心这里会不安全。6月5日,周恩来就中南海、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约周荣鑫、李质忠、童小鹏、汪东兴谈话,做了具体的布置和指示。

其次,“首都工作组”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可能进入的城市地下污水通道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泽东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看了个详细。

“首都工作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用钱,周恩来特地向总后勤部长邱会作进行了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

“首都工作组”实施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清理整顿首都的治安,消除安全方面的隐患,确保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安全。

曾参与“首都工作组”具体工作的邱会作回忆说:“对首都安全的任务暂定了两项:(一)制定对首都的设防、警卫、主要目标控制的方案;(二)准备对首都进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对象包括社会人口、枪支弹药、电台、监狱、侨民等。为了具体进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勘察小组。小组成员有杨成武、邱会作、汪东兴、万里(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李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等,杨成武为主持人。勘察小组对北京城进行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对远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南口、紫金关两个中央首脑指挥工程;房山、长辛店的广播发射台和劳改农场、秦城监狱等。对近郊区曾经勘察过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战时指挥所),象鼻子沟(国务院战时指挥所),西山(中央军委战时指挥所);还勘察过密云、顺义、通县、长辛店等处卫戍区部队的外围部署地区。对城内曾经勘察过的有:电视大楼、电讯大楼、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围的高层建筑。电讯大楼屋顶上,距离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径只有几百米,肉眼看得很清楚。我们就在楼顶开会,研究过对中南海的保卫和安全问题。”

据参与勘察工作的张民回忆,6月上旬开始“首都工作组”对北京

各重要的警卫目标进行实地勘察,明确各部队的具体警卫工作。这次勘察先城区后郊区,首先勘察了广播电台、电视台、中南海周边的高大建筑物,外国使领馆。接着又勘察了广播电台的发射天线、危险品仓库、发电厂、水库,最后勘察监狱和劳改农场。在勘察过程中,了解有关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各种问题,当场决定兵力部署,并提出注意事项和有关要求。

“首都工作组”在6月6日后从京西宾馆搬到中央军委所在地三座门,有关工作全面展开,人员也增加到20多个。此时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下设7个组:(1)部队指挥组,主要负责警卫部队的调动,首都重要目标的警卫;(2)治安组,主要负责社会治安工作,清除和整治各种不安全因素;(3)枪支弹药清查组,主要负责对军队、地方和市民非法枪支弹药的清查和收缴工作;(4)电台组,主要负责对地方团体和民间各种无线电收发机的清查、整顿工作,特别是对私设电台的清查、清理和收缴工作;(5)社会人口清查、清理组,主要对非法居留北京和危险人口的清查、整顿工作;(6)监狱、看守组,主要负责北京市各监狱、劳改场、拘留所和看守所临时关押人员的安全警戒和清查、清理和整顿工作;(7)外事、侨务组,主要负责各国驻京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警卫工作,负责北京华侨的清查和安全工作。

就在北京大学为聂元梓的大字报闹得不亦乐乎之时,《人民日报》社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对《人民日报》不满的群众来信日甚一日。

文化革命开始后,《人民日报》一直没有发表什么对运动有指导意义的文章,只是紧跟在《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甚至《文汇报》后面转载他们的文章,党报在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到了1966年4月,一次《人民日报》送审有关突出政治的社论时,康生发话了:

“以后《人民日报》的社论,要送《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以免出错。”

党报是指导军报的,党报的社论要军报审阅,这是前所未有的怪事,但也决非偶然。

早在2月3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突出政治》的社论后,到4月5日止,又接连发表了论述突出政治的6篇社论,提出毛泽东的指示是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

峰，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各地的报刊纷纷响应。一时间，中国再次出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但是，“七大”以后，中共中央都是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讲过是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在表述上有严格规定：不能同马列主义并提，必须写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间必须是顿号，而不能改成逗号、分号或破折号，也不能用“和”字。

但是，《解放军报》的提法，其实就是林彪的提法，却深受群众欢迎。

面对全国掀起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人民日报》要不要紧跟并引导形势发展？怎样引导？是按照林彪的说法引导，还是按照原有的规定引导？吴冷西没有把握，只好请示中央。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答复是一致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国际意义，要考虑国际影响，怎样讲得更稳妥一点，恰当一点，在中央未做出决定之前，《人民日报》可以暂不宣传。

2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京常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说：“对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要慎重。毛主席过去只同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说‘顶峰’、‘最高最活’不一定很确切，要研究一个确切的提法。”

这次会议结束时，吴冷西问邓小平：“《人民日报》写了一篇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你看了没有，可否可以发表？”

邓小平说：“关于毛泽东思想如何提法，还要考虑，这篇社论不忙发表。现在全国各地关于这个问题有各种说法，地方上怎么说，由他们去说，《人民日报》不能随便跟着说，党内可以各说各的，公开宣传还是根据过去的口径。”

但是，面对全国一浪高过一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人民日报》总是无所表示也不合适，报社内部的工作人员意见纷纷，他们建议吴冷西当面请示毛泽东。

在杭州会议时，毛泽东听了吴冷西的请示后说：

“最高最活，不要那样提。也不要讲顶峰。这种讲法不妥。但报纸已经讲开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

“不妥”，说明中央是一致的，心中有了底。但“不能马上改，以后慢慢改”，操作起来相当困难，编辑部只好凭经验和感觉行事。

从4月6日到22日，为了紧跟形势，《人民日报》也发表3篇论述突出政治的社论。但是，一论突出政治社论中，没有引用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二论突出政治的社论，又说：“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与林彪提出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相左。这些情况，《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都向康生作了反映。这才有了《人民日报》送审三论突出政治社论时，康生要求《人民日报》以后的社论“要送《解放军报》总编辑唐平铸审阅修改”的指示。

4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三论突出政治的社论，送给军报总编辑审时，唐平铸在社论中加了“顶峰”、“最高最活”两句，发表时编辑部有意删去了“最高最活”一句，以示林彪的话也并非定论。这引起了唐平铸等人的警觉，他们再次向康生作了汇报。

第 50 回：“保旗论”，大院内“炮”声隆隆 陈伯达，亲掌管《人民日报》

5月3日午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召开前，为配合会议的召开，《解放军报》给《人民日报》送来社论清样，标题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希望《人民日报》4日与之同天见报。报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不愿听命于军报，于是决意推迟一天，等军报发表后第二天5月5日才登，并以新闻方式处理，将原标题改为新闻标题，并以一版登不下为由，进行删节。这在大抓阶级斗争，处理彭真等人问题的大形势下，无疑是大错特错了。这种做法不仅引起了中央的警惕，也引起了许多读者的不满和质疑。

5月7日，康生主持会议，追查并严厉批评《人民日报》。康生说：“人民日报出此大错并非偶然，同报社领导人长期处于中间状态有关”。

康生要《人民日报》写检讨，并要公开登报挽回影响。检讨由当事人、副总编辑起草，经总编辑两次修改，但是，都通不过。最后还得张春桥主持帮助修改。

5月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几个主要新闻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更加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之后说，考虑到国际影响，可以不在报上公开检讨。

5月18日下午，也就是邓拓辞世的同一天，陈伯达找《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王揖谈话。他首先向王揖询问道：“外界已经对《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批评了，报社内部的反响如何？”

王揖将报社的情况向陈伯达做了汇报。

听了汇报后，陈伯达强调说：“外边对你们《人民日报》社已经有了点压力了，但你们内部没有动，还是一潭死水。”

王揖说：“编辑部同志感到很沉重。”

陈伯达说：“有什么沉重呢？沉重，又不动？你们要内外夹攻，要

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陈伯达在短短的谈话中，至少两次提到，“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揭竿而起”就是“造反”，造谁的反呢？王揖理解，这是指要造总编辑吴冷西的“反”。

陈伯达追问王揖：“你们副总编辑中有没有不同意见？你批评过吴冷西没有？”

陈伯达还说：“国际反修斗争，容易接受。国内、党内的反修，反到自己身边来了，往往下不得手。”

王揖和陈伯达早年在延安就认识，他知道陈伯达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如今听陈伯达如此一说，心中不觉大吃一惊。第二天上午，他找到副总编辑胡绩伟，激动地说：“我参加革命二十几年来没有当过叛徒，对党忠诚，现在也是一点私心杂念也没有，如果有一点就是背叛。”

胡绩伟一听也非常诧异，问他：“你怎么说这些话？”

王揖告诉胡绩伟，陈伯达找他谈过话了，但是他不能说谈话的具体内容。从自己的感觉来说，现在他认为报社应该革命，要“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胡绩伟大惊，问道：“起来革谁的命？”

王揖回答：“这个不能说，你要仔细体会。”

胡绩伟追问陈伯达究竟说了些什么，而且他不愿意相信王揖说的是真的。他认为，吴冷西一倒，《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肯定在劫难逃。

王揖坚持不肯说，两人不欢而散。

胡绩伟是1965年春天去北京郊区房山县五侯公社搞“四清”运动的，1966年5月5日，《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出事后，吴冷西吩咐秘书室打电话要胡绩伟立即回报社，并且派车把他接了回来。胡绩伟以比较“局外人”的身份，开始处理乱成一团的社务。

王揖找胡绩伟谈话的当天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编委扩大会议，总编辑吴冷西传达了《516通知》的产生和修改过程。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当前的中心，要集中力量进行宣传。吴冷西告诉大家，要再开一次编委扩大会议，自己作检查。

王揖看出形势已相当险恶，吴冷西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弄不好，

《人民日报》社的副总编辑们也会被牵连进去，而现在大部分编委成员还都支持着吴冷西，这就使形势更加险峻。

当天晚上，思前想后，王揖怎么也睡不着。20日凌晨2时许，他给胡绩伟打电话，表示经过深思，要向他转告陈伯达谈话的全部内容。

20日上午11时，王揖找到胡绩伟，说：陈伯达认为现在的《人民日报》社一潭死水，按兵不动，应该“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来革命。

王揖告诉胡绩伟，谈话的时候王力也在。王力说，不仅要清算邓拓在《人民日报》社的“阴魂”，更要清算吴冷西的“阳魂”。

下午，胡绩伟召集编委成员陈浚、安岗、潘非、肖航、王泽民开会，通报了上午王揖说的情况。听者非常紧张，纷纷议论说，吴冷西可能已经犯下严重错误，他的错误就是报社的错误。

消息一传出，更加速了《人民日报》社内部的分化。

第二天，《人民日报》社举行编委扩大会议，吴冷西作了检讨。他在一开始就对与会者说：“在这次批评吴晗的斗争中，我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首先，在《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后，我并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的开始，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学术讨论。”

吴冷西说，他在两个问题上存在思想抵触。一是认为姚文联系“单干风”、“翻案风”等来批判，说服力不够。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连同《海瑞骂皇帝》等戏一起批判的话，会牵连到《人民日报》和胡乔木。

5月23日，陈伯达召集首都各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会，再次严厉批评吴冷西。一开始，陈伯达的语气还缓和，他对吴冷西说：“你啊，千虑一失，但是往往失的这一点很重要。”

“《人民日报》对《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不服气是不好的，是政治问题。你不挂帅，别人挂帅，应该表示欢迎。”

陈伯达越说越严厉，他冲着吴冷西说：“看来你的思想堡垒不易攻破，总有个鬼在脑子里没有挖出来，有个根子没有挖出来。要发动群众才能解决问题，不能把问题包起来。要割脑袋，也就是换灵魂，把旧灵魂挖出来，换上新灵魂，不换脑袋，就连人也要换掉。”

吴冷西沉默了，知道再说什么都已经无济于事。倒是胡绩伟还敢于发表意见。他在随后主持召开的《人民日报》编委会议上讲了一段

话,为吴冷西打气:“当我们这只船在大风大浪中,我们千万要沉着,不然会翻船。特别希望我们的掌舵人冷西同志要沉着。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要沉着。工作千万不能急,但是千万不能拖。工作还要适当安排。”

5月24日下午,《人民日报》社召开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吴冷西作了长篇检查,检讨自己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起所犯的错误。他在检查中主要是想摆脱和彭真的关系,结果越说越说不明白。

吴冷西检查之后,常务副总编辑胡绩伟走到前台讲话,心情十分沉重的说:“现在,编辑部处于比较乱的情况下,由于编委会吴冷西同志说的,在这个时候他自己章法乱了,在这场斗争中犯了错误以后,并没有很深刻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勇敢地起来改正自己的错误,戴罪立功,把工作做好,反而在严重斗争面前自己失掉了章法,使得编委会在相当程度上失去领导力量,因此编辑部同志们很焦急,有力气无处使,结果越焦急越乱,越犯错误……”

《人民日报》的错误,我们大家都有份,但最主要是冷西同志,因为中央委托他来领导人民日报社。现在,中央还没撤他的职,中央、伯达同志还这样鼓励他,勉励他,关键在他能够深刻认识错误,勇敢地改正错误,戴罪立功。”

胡绩伟接着说:“中央同志、钓鱼台同志一直感到冷西检讨不深刻。认识错误一不深刻,改正错误勇气就不足,今天听他的检讨也有这个感觉。这就要大家帮助冷西同志革命,真正革掉资产阶级思想。现在《人民日报》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是大家起来革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这是最主要的关键。要动员报社全体同志都来帮助冷西同志革命。”

说到这里,胡绩伟讲了一句在当时很有名、随后又大有争议的一句话:吴冷西在《人民日报》社仍然具有核心地位,“只要他这一杆旗帜站起来,编委会和编辑部其他问题就好办”。此话后来被人们说成“保旗派”。接着,报社党委紧锣密鼓地召开各种会议,组织队伍,统一思想,对报社内有不同意见的群众施加压力,甚至还幻想使用反右时期的“引蛇出洞”老办法,策划搞“民主运动”,提出抓“四条黑线”:彭真

黑线、邓拓黑线、中宣部黑线、资产阶级思想黑线，让人们出来贴大字报，提意见。估计民主运动一起来，有人就要说话，就要行动，那时“黑线就自然出来了”，然后再抓“黑线”，抓“右派”。

随着报社内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有的大字报除了批评吴冷西外，还批评编委会的其他成员，指出编委会中有人不揭发吴冷西，反而散布揭发吴冷西的人的流言蜚语，责问这里有没有阴谋，“如果确有策划这种阴谋的人还站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就请求中央撤换他们，不让他们在斗争中挡道”。

面对《人民日报》和北京大学的局面，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碰头会时商量，是否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原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领导那里的工作。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

会上，邓小平认为，学生运动出问题了，有一些人在攻击党，跟1957年的右派一样。刘少奇也觉得，一些学生的言论与右派没什么不一样。会上基本上没有不同意见，陈伯达没有讲话，只有周恩来说：“我们当年搞学生运动也是有一点偏激的嘛，要让学生讲话，不要给学生戴大帽子。当年我在天津反对的校长其实是个不错的人，但我们的大方向对，校长却不对。当然，陆平也是个好同志嘛！”

当晚，戚本禹把会议情况向上海的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还是总理好。”

为慎重起见，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正式请示派工作组问题。信中说：

“两个月来，《人民日报》的威信大大下降，对党和国家造成不利影响。由于报社编委会不能改变目前的局面，许多人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今天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掌握报纸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5月31日即进报社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报社内部进行整风，学习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

信末附有临时工作组在京人员名单，除陈伯达率队外，这些成员是：《光明日报》社总编辑穆欣、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解放军报》社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朱悦鹏、《解放军报》社通联处处长李久胜、《红旗》杂志社杨丁。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尚未确定。

4小时后，毛泽东于当天深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同意这样做。”

第二天，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召集钱抵千、朱悦鹏、李久胜谈话，对他们：“中央决定组织一个工作组去《人民日报》，工作组由陈伯达负责。中央要军队抽3个同志作为工作组成员，所以挑选你们3个去，希望你们能愉快接受任务，坚决服从陈伯达的领导。明天上午10时，你们去钓鱼台向陈伯达报到。”

5月31日上午10时，钱抵千、朱悦鹏、《解放军报》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尚力科3位解放军总政治部选派的干部准时来到钓鱼台八楼康生住处，接待人员将他们领进一个宽敞的会议室。原定的《解放军报》社的李久胜因有其他任务，改为尚力科。

会议室里，陈伯达和康生以及王力、关锋已在那里。

谈话开始后，康生首先说：“你们已经被指定为由陈伯达担任组长的中央驻《人民日报》社工作组成员。”

接着，陈伯达用他那极难听懂的闽南话说：“下午3点半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由中央领导人宣布中央决定，今晚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

然后，他慢条斯理地讲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说这场革命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这场文化大革命等。

快中午12点了，康生表示同意陈伯达所讲的内容，没再讲什么。

陈伯达又说：“明天6月1日，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

他让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起草这篇社论。

钱抵千问陈伯达：“社论的内容是不是就按你刚才讲的内容来写？”

陈伯达点头表示同意，并对这篇社论的要点和具体写法进行了指

点,特意强调:“社论是报纸的旗帜,是灵魂,今天一定要赶写出来,明天见报,这样使人们能够看到,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以后,报社的情况有所改变,令人耳目一新。”

5月31日下午15时30分,邓小平在怀仁堂召开北京各报刊、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台负责人会议,宣布:“经毛主席批准,中共中央决定,派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今天晚上开始,《人民日报》由工作组领导。”

宣布完中央决定,邓小平接着说:

“党中央和国家的机关报、通讯社、广播电台近两个月不像样子了,读者意见很多,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也在揣测出了什么事。《人民日报》在文化革命方面没领起头,实际上是《解放军报》,某种意义上,《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在领导《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人民日报》上,文化革命兴无灭资不是一点儿没有,可是没有把旗帜打起来。”

“书记处对报纸也没多管。康老管国际宣传方面,成绩很大。”

康生:“我管得也很少,只是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些反修文章。”

邓小平接着说:“主席对《人民日报》还是寄以希望的。文化大革命很多问题出来后,《人民日报》并不是不知消息,本应领导起来搞,找全国能写的写,谁不给写?主要看采取什么态度。转载姚文元文章不及时,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又把重要的东西勾掉,现在,版面撑不起来,靠东凑西凑。”

“从你们大字报看,4月15日以前,比其它报早知道‘二月提纲’有错误,你们4月就可有争取主动的机会却没有争取主动。”

“这不是几个人的问题,是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变成这个现状,人民看不顺眼,国际上也有反映。《北京日报》出了问题,根子在那里?好回答,可以告诉读者在北京市委,写‘过去市委’就交待了。《人民日报》呢?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样子,是不是中央出了问题?”

“这样拖下去不行了。常委决定:还是帮,由伯达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人民日报》,改变现状,改变版面,使它真正成为中央机关报,应

指导和宣传文化大革命，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活，社会主义建设各个方面，改变群众观感，在于改变版面、内容。”

“第一抓业务！大字报可以继续出，精神状态要改变！”

最后，邓小平宣布中央工作组成员名单：组长陈伯达，成员有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杨丁和王力、关锋6人。然后对陈伯达说：“老夫子，你讲讲。”

陈伯达不讲。于是，由康生滔滔不绝地讲了近一个小时。

会议结束时已是下午17时多了，陈伯达来不及在会议上再多说什么，即率领工作组登车前往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

第 51 回：发社论，群情起举国欢腾 狂潮涌，惊涛声响遍神州

《人民日报》社早已得到通知，当一大溜小汽车驶进了《人民日报》社时，人们发现，下车的基本穿着军装，还带来了 10 多名解放军战士。报社人员纷纷猜测：“他们是来干什么的？”

陈伯达带着这群穿军装的人直上到办公楼三楼会议室时，报社部门以上负责人早已集合在会议室等候了。

陈伯达开门见山地宣布：“从现在起，由工作组领导《人民日报》，报社的领导不得插手，各部门的领导也要调整。明天开始，各部干部推选新的部门负责人，报工作组批准。”

会上，吴冷西要发言，刚说了几句，陈伯达便打断了他的话，不让他再说下去。

陈伯达要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 3 人赶快回去吃饭，晚上 22 时以前把社论稿起草好，带到《人民日报》社让他过目。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拿出能让号称“党内第一枝笔”的“理论权威”陈伯达满意的，向全中国、全世界广播的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钱抵千 3 人均感到压力很大。如果现在各自回去吃晚饭，再集中一块写社论，显然来不及了。钱抵千当机立断，邀朱、尚二人就近去他家吃点便饭，在吃饭时边吃边研究，丢下饭碗后立即动笔。

钱抵千当时有“军内才子”之称，中苏大论战时，曾参加起草“九评”的写作班子，与陈伯达、康生接触较多，所以他了解陈伯达、康生在文字上的爱好和性格特点颇为了解，他对另外两人说：“陈伯达有个脾气，他说照他讲的写，你就得尽量做到一字不漏。陈伯达上午讲的，我们各人都做了记录。”当下，钱抵千提议由他按照他的记录口述，朱、尚二人各记一段进行整理，然后串起来统改。

3 人奋笔疾书，字斟句酌，到了 22 时，总算将 2000 多字的社论草

就。但颇费周折,有时为一句话、一个字乃至一个标点绞尽脑汁,搜肠刮肚。

钱抵千拿出林彪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稿,要把林彪讲话中关于政权的那一段加进去。

朱悦鹏问:“这不是陈伯达说的,他会同意吗?”

钱抵千知道底细,他说:“林总这个讲话,陈伯达、康生参加修改过,可以写上。”

于是,社论第四个自然段,关于政权问题的论述,几乎全是林彪的讲话。

当钱抵千他们回家赶写社论时,《人民日报》社的广播喇叭也响了:“全社人员立即到五楼会议室参加大会。任何人不得请假。”

当人们匆匆赶到五楼会议室,只见主席台上几乎全是穿军装的,陈伯达坐在中间。他操着一口闽南话宣布:“党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负责领导报社的全部工作。”

然后,又神秘地向会场扫了一眼,颇为幽默地说:“我在你们报社搞了一个小小的政变。”

当晚22时,钱抵千、朱悦鹏、尚力科3人拿着社论草稿来到《人民日报》社陈伯达的临时办公室,陈伯达、王力、关锋等人已坐在那里等候。

陈伯达看着社论的初稿的题目:《再接再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觉得过于一般化,没有震撼力和号召力。他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在纸上写了一个又一个的题目,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大笔一挥,圈定了其中的一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陈伯达将社论用大号字排出,然后修改。排字工人工作效率很高,不大一会儿,小样送上来了。因为是按陈伯达的谈话内容写的,所以改动不大。他只是加上许多诸如“牛鬼蛇神”、“暴风骤雨”、“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词进行铺垫。果然,这些新名词,后来随着社论的发表,一时间风靡全中国。

社论定稿后,陈伯达特别吩咐:“社论要排楷体字,题目要做通栏,位置要放在头版最上方。”

6月1日,《人民日报》在一版以通栏大标题和从未用过的大五号

字刊出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篇社论把《516通知》的精神和林彪《518讲话》的精神,还有毛泽东近几年的讲话综合在一起,第一次提出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就是后来概括的“破四旧”。社论指出:

“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正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

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

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是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移风易俗的伟大事业。”

这段文字,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形势。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另一篇社论:《用毛泽东思想哺育革命后代》,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培养革命后代,一定要让他们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养成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社论一发表,举国欢腾,几乎整个国家都“疯”了。

6月1日,毛泽东看了周恩来5月31日报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纪要》,批示:“总理:此件已阅,很好。”

这天中午,毛泽东从《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印发的《文化革命简报》第13期上看到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大字报。那么多的高级干部、政治局委员对毛泽东的思路理解得是那样的含糊,而普通的群众却理解得如此透彻,这让毛泽东再一次感到,他和人民的心是相通的,他的想法是代表了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他提起笔来,在简报上面批示道:

“康生、陈伯达同志: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

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中午,他又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他要求当天就在电台广播。

放下毛泽东的电话,康生立即叫来王力、关锋和曹铁欧,对他们:“经毛主席同意,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他又嘱咐曹铁欧说:“你亲自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安排播发大字报的事情。”

然后对王力和关锋说:“按照主席的指示精神,你们还要写一篇评论员文章,配合这篇大字报的发表。”

与此同时,康生还给李雪峰写了一张条子。

李雪峰正在华北局会议上传达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他看到康生写来的条子,内容是毛泽东在杭州对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并说今天就要公布。因为事关重大,李雪峰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条子。

这天中午,陆平正在中共北京市委开会。散会时,吴德通知他:“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今晚广播,明天见报。”

陆平心头一震,“一个小小的系总支书记的大字报还要在中央广播电视台上广播?”他意识到,问题来了。

陈伯达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当即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安排印刷,准备第二天见报。同时考虑如何为大字报配发一篇评论。他还要亲自到北京大学去看一看,王力和关锋对他说:“你留在报社吧,这里现在不能出问题。我们去北大。”

“那好。”陈伯达同意。

当天下午16时,毛泽东的批示从杭州空运到北京,很快就到了康生、陈伯达手中。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联播节目全文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

这时,聂元梓不在学校。她母亲做手术,住在协和医院,她们兄弟姐妹几个人轮流到医院去看护她。这天轮到聂元梓在医院陪床,到傍晚的时候,她哥哥去接替她。当聂元梓从协和医院出来,走在王府井大街上,忽然听到街头的大喇叭响了,在“嘟嘟”地报过晚上20时以

后,一个宏亮的男声响了起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时间。……下面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个同志写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播音员慷慨激昂的声调,让聂元梓不由地驻足倾听。

“在全国人民正以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无限愤怒的高昂革命精神掀起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打垮反动黑帮的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而斗争,可是北大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广大师生的强烈革命要求被压制下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因在哪里?这里有鬼。请看最近的事实吧……”

这大大地出乎聂元梓的意料,她万万没有想到,中央会做出如此惊人的决定,把他们写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进而传到世界各国的新闻界和政界。

白天里总是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这时人已经不多了,但一簇簇的人们,都和聂元梓一样,停下脚步,认真地听着电台广播。

聂元梓此时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几天来围绕着这张大字报的是是非非带给她心头的压力,一扫而光。正是华灯齐放的时候,她的眼前一片光明!

她没有停歇,立即赶回学校。宋一秀他们正在到处找她。

此时的北京大学“炸”了,北京“炸”了,全中国也“炸”了。千百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般飞往北京大学,这张大字报像一个火球投入了干柴,引起铺天盖地的燎原大火,其势如风雷磅礴,难以遏制。

6月1日晚,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学院、福州大学、福建医学院、福建农学院、福建中医学院等高等院校师生听到广播后,纷纷集会、座谈、写大字报,并给《福建日报》编辑部写信挂电话,表示支持“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翌日,厦门大学经济系、中文系、外文系的少数学生贴出大字报,揭发厦大党委在工作中的“错误”和“问题”,点了学校领导人陆维特、张玉麟、朱力工的名。当天晚上,有的学生就把党委书记陆维特揪到系里去斗争。

福州一中部分学生在6月1日当晚即贴出大字报,随后全市40所

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相继贴出大字报。有的单位还连夜发电报到北京,福建二师院一天内就发出 14 封电报,表示拥护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定”,声援北大师生“革命行动”。

吉林大学学生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连夜贴出大字报,锋芒指向学校党委。6月2日,吉林大学、吉林工学院、长春地质学院、吉林工大等院校,贴出大字报,指责校党委和中共长春市委对运动领导不力。

6月1日晚,郑州大学像一锅开水似的沸腾起来。当天晚上,中文系一年级王相海、席占修、刘作舟等 14 位同学率先贴出大字报,题目是《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持什么态度?》。大字报中批判学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弄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这下子,郑州大学文化大革命运动轰地起来了,同学们再也学习不进去,开始关心国家大事了。

接着,政治系 7 人也贴出了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

王相海等同学的大字报,不仅在郑州大学首当其冲,而且也是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郑州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到处出现了。

当夜,校党委书记、代理校长王培育立即派校党委宣传部长祝一清前往省委向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杨蔚屏汇报情况。

杨蔚屏说:“省委是相信郑大党委的”,“你们不是陆平,怕什么?”“1957 年右派搞我们,现在我们搞他们,让他们放出来再说。”

有了省委的表态,王培育连夜召开校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

- 1、要立即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出发点;
- 2、不准进行串联活动;
- 3、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去宣传。

接着,校党委召开全体共产党员和团支书记以上会议,王培育在大会上进行部署,他说:“郑大不是北大,现在像 1957 年那样,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一定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和党委保持一致,特别是对思想落后的学生要严加防范。”

他特别强调:不准在下边进行串联活动,更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

去宣传。

6月1日晚，西安交通大学的师生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后，群情激昂。他们由北大想到交大，周先聪老师连夜执笔写出了一份大字报，他们仿效聂元梓，也有龚华仁、刘安福等7人签名。大字报内容同样是直指校党委书记兼校长彭康。而学校广播台不知什么原因，这天晚上竟意外地打破惯例没有转播。这一现象，很快就引起了同学们的怀疑，认为校党委这是有意“不转播毛主席亲自批示的大字报”。这是什么行为？义愤填膺的学生立即贴出了质疑彭康的大字报。

而此时，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正在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讨论该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凌雨轩的问题，因为凌雨轩曾发表《反对个人崇拜》文章，成为批判的典型。在这次校党委扩大会议上，将凌雨轩的问题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正在主持校党委扩大会的彭康全然不知，此时的校园里，已贴出了针对他的大字报。

最热烈的还是北京。6月1日晚，没有动员，没有安排，没有布置，更没有各级领导的组织，北京各大、中学校的学生自己纷纷行动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校园里铺天盖地贴出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干部”和“学术权威”的大字报。

此时，北京大学内的大字报可谓是漫天飞舞。无论是三角地，或是大饭厅，甚至连图书馆以及各系、室的墙壁、门厅，都张贴着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全校师生一致声讨“陆平黑帮”。成千上万的北大师生包围了校党委，要和陆平等人“算总账”。有些人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冲到陆平等人的家里，跳窗夺门抄了他的家。

有人提议：“既然北大党委烂掉了，我们要求中央给我们派工作组，领导我们搞好文化革命！”

这个建议一出口，立刻受到很多师生的响应，他们又成群结队地拥向北京市委，拥向中南海……

这天下午，正在听传达《5.16通知》的中共河北省委主管文教的书记张承先接到李雪峰通知，晚上到北京饭店参加紧急会议，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领受任务。

晚上19时许，张承先来到北京饭店，看见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

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已经在饭店的一间会议室内就座。张承先发现他们个个面目表情严肃，只有吴德简单地伸手示意其坐下之后，便宣布开会。他对张承先说：

“毛主席决定要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 7 人 5 月 25 日贴出的大字报，广播后北大党委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中央决定任命你为北大工作组组长，由你代行北大党委书记职务。要赶在广播前进驻北大，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大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控制右派”的措施，肃清陆平等人的影响，保证运动回到中央规定的正确轨道上来。

说是要张承先在电台 20 时广播聂元梓大字报前进驻北大，而实际会议一直开到 22 时多才结束。当张承先陪着吴德走出位于紫禁城东侧的北京饭店，来到 10 里长安街时，发现街道两旁的行人已经个个豪情满怀、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第 52 回：昼夜间，北京大学人如海 干革命，中学生岂肯稍歇

6月1日晚23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陆平接到通知，来到校门口迎接中共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带着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32人来到北京大学。此时已焦头烂额的陆平也急切地希望能有人来替他收拾局面。

工作组进校后，立即召开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会议，由华北局负责人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堡垒。同时，华北局负责人向陆平等提出警告：必须老老实实地交代自己的罪行，必须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同时向北大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一、不许搞特务活动；二、不许搞两面派；三、不许搞阳奉阴违。

校党委全体会议结束后，已是6月2日凌晨0时30分，陆平等人在夜幕下陪同华北局工作组来到北大办公楼礼堂，北大党团干部、学生干部早已齐聚这里，等待召开大会。会上，宣布了华北局决定：派工作组进校，领导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发表讲话，表示支持革命，并重复一个半小时前提出的约法三章。此时的陆平还不知道他家里也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6月1日的晚上，中南海，刘少奇已被一连串的电话包围，他赶紧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常委碰头，研究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形势。

邓小平照例先到。

很快，周恩来、陈云、朱德都来了。大家谈起外面轰轰烈烈的情形，都有些吃惊。朱德问：“北大的大字报到底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说：“可能大家都会感到意外的。刚才陈毅同志到了我那里，问为什么这么大的举动不事先给个通知？我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的，看来我们都不了解详细内情。”

陈云静静地听着大家议论，等他们都发表完意见后，他才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加强党对北大和各大专院校的领导，要防止连锁反应，好像北大出了问题了，其他学校也必然有问题，如果都乱了，那就坏了。”

刘少奇说：“李雪峰他们已经给北京大学派出工作组了，其他地方是否也需要派呢？”

常委们觉得这是个好办法。是啊，从土改到四清，共产党不都是通过派工作组来领导运动的吗？

周恩来突然想起什么，他说：“我建议，我们几位常委今天只是商议，不作决定，因为没有文革小组的同志参加。最好在明天或后天召开一次常委扩大会议，吸收文革小组的同志参加，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常委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晚上，王力、关锋从北大回到钓鱼台，向陈伯达报告说：“大字报广播后，北大沸腾了，到处是游行的人群，欢呼、口号声不绝于耳，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康生在家里接到坐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曹轶欧打来的汇报电话：“电台刚播完大字报，采编部的几台电话，便一直没停顿地收到各方群众来电。”

“都有什么反应？”康生迫不及待地问说。

“有支持的，也有质问、抗议之类的。大量的是支持的。”

“这是好事呗，让各类人物都上场表演一番，阵线才见分明。”康生想了想，又说，“你让电台的同志，立即将来电内容整理一下，两小时送来。”

康生放下电话后，他点燃一支烟，一边抽着，一边思索着。过了片刻，他又抓起电话筒，接通中央文革办公室，说：“请王力、关锋、林杰同志立即来一趟。”

王力、关锋、林杰3人匆匆忙忙地赶到了康生的寓所，康生与他们打过招呼后，开门见山地说道：

“评论员文章准备好了吗？明天在《人民日报》和大字报同时见报。”

“康老，报纸这时已截稿划版，而且这文章如何写法尚未有头绪，是否放缓一天？”王力请示说。

“莫说铅版尚未上机，就是报纸印出来了，也可统统销毁重印。现在是什么时候，还容得磨磨蹭蹭！搞文化大革命，也须有当年武装斗争那股劲，拖一天，战机要贻误的。”康生提高了声音道，他想了想又说：

“可能你们的力量弱了些，由伯达同志和你们一起搞，等会我给他去个电话。”

这当口儿，曹轶欧送来了《情况简报》，康生草草地翻阅一遍，就在上面批道：

“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结果。”

然后，他将材料交与王力说：“这份材料，可作你们写文章的参考。明天再打印 200 份，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中央各部委。”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开会，讨论北大聂元梓大字报的问题。

6月2日，北京大学出现了全校师生一致声讨“陆平黑帮”的浪潮。一些参加过围攻大字报作者和支持大字报那些人的学生更是觉得自己被欺骗了，他们表现出更大的愤怒，行动也更为激烈，矛头所向，首先是前几天带领或鼓动他们围攻大字报作者的老师。

6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其火力之猛烈，上纲上线之高，振奋发聩：

“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

“陆平以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以‘组织’的名义，对起来革命的学生和干部，进行威吓，说什么不听从他们这一小撮人的指挥就是违犯纪律，就是反党。这是‘三家村’黑帮反党分子们惯用的伎俩。请问陆平，你们所说的党是什么党？你们的组织是什么组织？你们的纪律是什么纪律？事实使我们不能不出做出这样的回答，你们的

‘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

评论员文章号召人们打破条条框框，向任何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其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是毛泽东亲笔加上的。

同目的《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陈伯达早已准备的系列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宣传《516通知》精神。

《人民日报》是党报，《人民日报》社论代表的是党中央的声音。这天，举国上下，各大、中、小院校纷纷开会支持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北京的院校和一些单位更是潮水般涌向北京大学。先是附近学校的人来，然后是远一点学校里的人来，最后是外地许多大学里的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他们声援聂元梓的大字报，声讨陆平等人。北京大学完全成了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



聂元梓在北大讲演

6月2日下午,康生与陈伯达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到处是游行的队伍和演讲的人群,许多大字报对当天的《人民日报》表示“热烈欢呼”。面对一片轰轰烈烈的革命景象,陈伯达高兴地笑了。在北大30楼与32楼之间的空场上,康生应邀向师生们演讲,他说:“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广播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不仅使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也解放了,更重要的是这张大字报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

这天,全国的形势更加高涨。

6月1日晚上,清华大学的同学纷纷走向与之毗邻的北京大学,支持聂元梓他们的革命行动。蒋南翔当天表态:“清华与北大不同,北大是反动思想的集中堡垒,清华是工科大学,教育改革成果巨大。”

6月2日凌晨1时,清华大学出现了该校第一张大字报。晨3时,清华大学研究生侯启孝以笔名景松贴出题为“关于反右斗争时人民日报摘抄”的大字报,告诫人们当心反右斗争重演。但并没有阻止大字报高潮的到来,很快,热002班的同学率先贴出了《蒋南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大字报,这是清华大学最早将矛头直接指向校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但是,当天晚饭后,清华大学保党委的立即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同时,清华大学还重放蒋南翔5月11日庆祝五四大会上的讲话录音。

6月2日,北京航空学院也沸腾起来。上午,基础部物理教研室的教师写出炮轰院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大字报如雪片般贴满了校园,内容主要是批评院党委不放手组织大家参加文化革命,只是跟着报纸批判“三家村”,而不触及院内存在的实际问题。

当天,贺龙的侄子、北航学生贺兴洲回家向贺龙汇报了北航的情况,贺龙立即向周恩来作了反映。

3日,北航批评院党委的大字报继续增多。下午,开始有人对给院党委提意见的人组织围攻,愈演愈烈。

4日,地质矿产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六系2621班学生孙茜玲贴出一张大字报:《“放”还是“收”》,就一张纸,几句话,贴在八楼旁的警卫连后墙。

4日上午,在北航院党委常委会上,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传达国防

科委指示,主攻方向仍是“三家村”黑帮,并要求在斗争中分左、中、右。国防科委八局副局长赵如璋参加了会议,并发表意见说:“学院的领导是不是黑帮也不要加以限制,要放手让他们讲,也不要怕讲,有人反驳,也不要限制。”“什么时候搞学校的牛鬼蛇神看时机,将来再研究。”“要指定专人去看大字报,指定可靠人摘抄起来,将来斗争是有用的。是不是黑帮将来会做出结论,叫大家放。才能放出右派。”他认为:现在放得不够,“没有七、八十度,牛鬼蛇神不会出来,尤其是是教师有反右斗争的经验,现在温度还不够。”

有些高干子女拿着照相机,拍摄他们认为是“恶毒攻击院党委”的大字报。

6月5日,贺兴洲传达贺龙讲话,让各大专院校党委引火烧身。

当时,北航的干部子弟正在讨论贺龙的侄子贺新洲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由于院党委没有审批贺新洲的入党申请,他们不满意院党委的立场,给国防科工委写信反映情况。6月5日晚,原北京军区政委、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朱良才上将的儿子刘克府,又叫朱新华,联络了国家计委副主任苏静的儿子苏晓前、总政副主任徐立清的儿子徐甘泉、建材部长赖际发的儿子赖锐锐、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儿子李明清、军事科学院副秘书长王智涛的儿子王亚慧、地质部长孙大光的女儿孙茜玲及贺新洲和李新南等12位高干子女,聚集在赖锐锐家写大字报,并于6月6日贴出,标题是:《院党委应当积极领导革命》,点了党委书记王恒、副书记周天行的名字,矛头指向院党委,轰动了北航。这张大字报,从标题到口气,几乎就是后面61回提到的6月5日清华大学高干子女那张大字报的翻版。

6月2日,东北工学院、辽宁大学等院校有人贴出反校党委的大字报。

6月2日,西安交通大学师生贴出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已有万余张。上午8时,上课铃响了,可是西安交大没有一个学生去上课。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人流攒动,学生群情激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他们已经不再把学校领导、老师和学校的规章制度放在眼里,一切都要重新审视、批判。而大部分教职工则怀着惊恐的心情,回想1957年的反右,不敢轻举妄动,不知下一步该何去何从?

6月2日,上海科技大学出现了上海市第一张针对校党委的大字报后,同济、交大、复旦、等高等学校也纷纷贴出揭发党委和党委书记的问题的大字报。这些贴大字报的师生和拥护校党委的师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后来又出现个别武斗现象。有人惊呼:“上海也出现了陆平们围攻左派的事件!”

6月2日,山东大学部分学生贴出大字报,提出校党委书记成方吾是山东大学一切牛鬼蛇神的总靠山。

6月2日起,杭州大学一批师生指责浙江省委大搞“纯学术批判”,转移运动的大方向。3日,浙江大学9位老师贴出了《横扫阻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清规戒律》,揭露批判浙大党委所谓制定清规戒律,压制革命群众革命热情,对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不力等问题。

剧烈的动荡不仅在大学,中学更不安宁。自从毛泽东开始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后,就不断有一些文艺作品,在报刊上被宣布为“大毒草”遭到批判。学校经常组织批判会,布置学生撰写批判文章,并在批判会上发言。在批判“大毒草”的政治活动中,学生们学会了如何运用毛泽东思想的“显微镜和望远镜”去逐字逐句地查找别人作品或言论中的“问题”,也使学生们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养成了“用阶级斗争理论”去看待人和事。

6月2日,北大附中也炸窝了,课没法上了,学生们纷纷拥到校党支部,那里正开会。但学生们依然围住校党支部书记刘美德,愤怒质问她与陆平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诬蔑马列主义大字报是右派向党进攻?

平时威严无比的堂堂学校党支部书记突然变得那么唯唯诺诺,面如土色。等到大家走出党支部办公室时,才发现外面的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了。

6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3个学生党员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贴出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模仿聂元梓,批判该校领导,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这张大字报是由刘进起草,宋彬彬、马德秀共同署名。

刘进的父亲就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刘仰峤,此时他正作为

中央理论调查组的负责人与曹轶欧一起参加北大的调查。在红色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刘进对自己要求严格,积极进步。她每天早起要做一套哑铃操,在高教部家属大院跑三圈,冲冷水澡。6点多到校,再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每年11月入冬前从不穿袜子,下乡劳动同学们挑50斤,她却挑100斤……

曾为没有赶上战争年代,不能像父辈那样投身革命、献身革命而遗憾,后来又为学校不像北京四中、六中、八中那些北京的著名男校一样开展“四清”运动而心有不足的刘进,这次觉得终于有机会可以直接投身于自小就渴望的、轰轰烈烈的、神圣崇高的革命运动中了。

1966年5月,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作了一个报告,凭着平日刻苦学习报纸社论积累起来的政治敏感,刘进等几个学生党员已经可以感觉到宋硕的这个报告是压制革命的,和报刊上的社论讲的精神不一样。当她在党的生活会上谈出自己的看法,党支部的老师善意的提醒她说:“我们应该按照党的安排去做,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所以尽管有意见,我们还是在党内提出和讨论。”

1966年6月2日早上6时,刘进在锻炼时听到早间的新闻正在广播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觉得一股热血上涌:“党中央发出号召,支持我们了,说明我们的意见是对的。看来在党支部内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也可以用大字报来公开表达。”

她内心那个激动呀,连广播都没听完,就跑去找住在同院的马德秀,也是她们学校高三(6)班的学生党员,对她说:“现在党号召了,咱们的意见可以说出来了,你愿意写大字报吗?”

马德秀也很激动,没有片刻犹豫就答道:“愿意!”

她俩一刻也没有耽搁,立即跑回学校。刘进又找到她的同班同学宋彬彬,她是住校生,1966年4月入的党。刘进将她的想法对宋彬彬一说,她也非常支持。

这时,时间还早,很多学生都没有到校,她们就开始写大字报了。因为这些意见都烂熟于心,用不着打草稿,你一言我一语,刘进用毛笔直接写在报纸上,署名刘进、宋彬彬、马德秀,然后贴了出去。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把我们引向何处?》内容以问话为主,头一句话就是“外界革命形势轰轰烈烈,而学校却是死水一潭,学校一心想引导的是

让我们进行高考复习……”大字报针对学校不让他们参加革命提出意见，对宋硕的报告提出意见，指出学校在教育路线上存在问题，等等。

她们原来本以为把意见提出来，然后和学校领导、老师共同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按照毛泽东主席说的，将革命，包括教育领域的革命轰轰烈烈的搞起来就行了。没想到大字报贴出后，学校秩序大乱，同学都无心上课了，这和想象中的革命完全不一样。

刘进她们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校方也慌了，党支部担心影响扩大，主持工作的副校长胡志涛立即召开了全校党员大会，号召党团员站出来保卫党的领导。教师团支部还组织部分团员把给校领导贴的大字报撕去了。

会后，刘进3人被隔离到阶梯教室，党支部派老师们轮番上阵，苦口婆心，帮助3人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希望她们认清形势检讨错误。告诫她们如何危险，将要滑到右派学生的泥潭。

刘进她们很不理解：“广播里都肯定了大字报，说明这就是党的号召，为什么我们给学校贴大字报就成反党行为了？”

那天在阶梯教室内外始终围着很多老师和学生，可以说是群情激愤，既有指责也有同情。

第 53 回：燃激情，红卫兵亮相舞台 工作组，陈伯达提出异议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发表，不仅让学校的学生激动，也让许多群众亢奋。正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几个年轻人再也坐不住了，生怕错过这次革命的机会，他们向戚本禹要求回所参加运动，戚本禹同意。

其实，早在 5 月 23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哲学研究》杂志总编吴传启和林聿时就已率先贴出批判学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杨述《青春漫语》的大字报，在学部引起轰动。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它和中科院的其他学部不同，哲学社会科学部名义上属于中国科学院，实际从 1958 年以后就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学部的主任是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任，同时还兼任历史所所长。他和人称“学部四大金刚”的经济所长孙冶方、文学所所长何其芳、近代史所所长刘大年及历史所实际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尹达，都能够参加宣传部定期举行的部长办公会议。

学部主任虽然是郭沫若兼任，但他实际上并不主持工作。主持工作的是学部党委书记、副主任刘导生。另外还有三位副主任潘梓年、张友渔、姜君辰。那时学部经常召开全体工作人员的大会，作报告的总是刘导生。1964 年 10 月，又调来时任东北局宣传部长的关山复和时任华北局宣传部长的杨述任副主任，关山复代刘导生任学部党委书记，主持工作。

吴传启和林聿时都是学部哲学所的司局级干部，也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与《红旗》杂志的哲学史组组长关锋是熟稔的老朋友。关锋、林聿时和吴传启 3 人曾用“撒人兴”，即“三人行”的笔名在《新建设》和《哲学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哲学史的文章，其中批判冯友兰的文章“量多而质高”。冯友兰在讲课时承认，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关锋的观点，但认为在所有批判他的文章中，关锋的水平是

最高的。

杨述曾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他是1961年1月离开北京市委的，与邓拓、吴晗、廖沫沙曾是同事关系，与北京市委又有密切的关系。《青春漫语》也是在《北京晚报》上开辟的专栏，由一系列散文组成。在报纸上开展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时候，学部就已安排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并向各所印发了相关材料，要求各所召开批判会。

吴传启和林聿时的大字报指责杨述是“三家村”的一员“干将”，与吴晗、邓拓是穿一条裤子的，继而又牵涉到学部党委，说党委书记关山复与杨述是“一伙”的等等。

岂止是在学部，5月25日，国务院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卢正义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副部长刘季平。这张大字报与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同一天贴出的。

卢正义原名卢树生，曾在如皋师范读书。1931年“918”事变后，他作为地下党员、学生领袖，率领如皋师范学生抵制日货。1935年被抓进“苏州反省院”坐牢，出狱后去延安，1945年任大连市教育局局长，1955年调教育部任小学教育司司长，后来任教育部政治教育司司长。他这张大字报和学部吴传启二人的大字报一样，并没有引起毛泽东太多的注意。不过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中，首先贴出大字报的，并不是学生，而是一些政治嗅觉敏感的老党员和老干部。

对吴传启、林聿时的大字报，5月26日，康生在学部党委的一份报告上写下了四点指示：“一、贴大字报难道还要批准么？二、林聿时为什么不能贴大字报？三、学部的问题很多。四、哲学所的问题更多。”

5月27日，文学研究所的第一张大字报也出来了，签名有五、六个人，是1964年入所的陈骏涛为发起并起草的。

5月30日早晨，中宣部的干部们惊诧地发现，在他们平时上、下班经过的办公大楼门厅处，醒目的贴着一张有14个人签名的大字报，标题是：《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不起来？》。这是第一张在中宣部贴出来的大字报，签名的基本是中宣部的工人。紧接着，在同一栋大楼里办公的《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也贴出了质问中宣部领导的大字报。6月2日，在中宣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阮铭贴出了《张子意是阎

王殿的一个活阎王》的大字报。

张子意，时任中宣部副部长。

运动开始升温，大字报先是在中宣部办公大楼内的楼道里张贴。随着大字报越来越多，又在机关大院里拉绳挂大字报。后来，办公大楼的外墙、图书馆楼的外墙统统都贴满了大字报。再后来，通往食堂的道路两旁、花园里的林荫道上，都被砸上木桩、钉上木条、铺上芦席，大字报可着劲的往上糊。

当那几个在《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历史研究所的年轻人于6月2日晚上回到历史所时，这里的运动已经热火朝天。年轻人都很兴奋，当晚就贴出大字报，批判主持历史所工作的尹达，说他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谁知第二天风云突变，一大早办公楼里就贴满了反击的大字报，说这几个年轻人是“右派翻天”。要知道，尹达可是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肯定的左派！这几个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此后几天，他们几个就遭到了大会、小会的批判。批判他们的理由是：尹达是历史学界的“左派”，历史所一直贯彻的是从陈伯达、康生那里来的红线。尹达又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6月2日下午，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十分醒目地出现在清华大学附中五楼大教室，这是学校腾出来专门作为全校师生贴大字报的场所。大字报的题目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大字报全文如下：

党中央、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吹响了冲锋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的后代，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毛泽东思想。对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怀着刻骨的仇恨。在大革命中，我们一定要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一脚踢开一切反毛泽东思想的所谓“权威”，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我们就坚决照办，坚决执行，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

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决战。我们一定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大搞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不准资产阶级在任何领域

中负隅顽抗！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我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持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同志们，革命战友们：

誓死跟着党中央，誓死跟着毛主席，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
毛主席万岁！

红卫兵

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此时的他们，谁都不曾想到，“红卫兵”这三个字，以后会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她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

红卫兵的出现是在5月28日晚上，清华大学附中预651班的几个同学在宿舍楼酝酿他们墙报统一署名用什么名称时，学生张承志说：“我在一张小字报上用过一个笔名，是《红卫兵》。”

他的话引起了周围同学的强烈共鸣：

“红卫兵！……”

“太好了！《红卫兵》，这个名字太好了！”

“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武装工人就叫赤卫队，列宁曾称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今天，我们投身参加的文化大革命，是又一次开创无产阶级新纪元的大革命，我们的名字也会像十月革命的英雄一样铭刻在历史的史册上。”

“对！就叫‘红卫兵’，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今后就用‘红卫兵’署名，”学生卜大华最后总结。

第二天，5月29日傍晚，卜大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陶正、张晓宾、张承志等十来个学生分别避开学校的监视，秘密来到学校旁边的圆明园遗址，继续商议如何在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卜大华说：“目前的形势非常严峻，校领导执行的就是一条修正主

义的教育路线,我们和他们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骆小海紧接着说:“对!为了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我们应该组织起来。”

“我看咱们今后应该告诉全校所有与咱们观点相同的人再写大字报小字报就用同一个签名,同一个笔名。”卜大华提议说。

“对对对,让学校也弄不清我们是谁,有多少人,而且这么一搞就会铺天盖地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骆小海赞同道。

“现在学校的那些小字报上的笔名可多了,什么‘向阳’、‘华峰’、‘卫东’、‘海峰’、‘红心向党’,也不知用哪个好?”

“还是用‘红卫兵’!毛主席党中央的红色卫兵……”

“同意!”

他们于5月30日,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红卫兵小组成立会,一起庄严地宣读了自己起草的《红卫兵誓词》:

“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有人在会上朗诵了当时在干部子弟中流传的毛泽东的一段充满激情的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20多岁的青年,再过2、30年正是4、50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不少人当场热泪盈眶,乃至泣涕不已。

在此之前,5月29日,北大附中以彭小蒙为代表的中学生,已经成立了“红旗战斗小组”。

随后几天,海淀区、西城区各个中学的学生听说清华附中的学生自己组织了“红卫兵”,都纷纷赶到了这里,写出大字报予以声援支持。几乎每张大字报的下首,都歪七扭八、龙飞凤舞地签着“红卫兵”的大名。比如“四中红卫兵”、“三十五中红卫兵”、“人大附中红卫兵”、“北

航附中红卫兵”。

面对如此局面,清华附中学校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高632班的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王家强和高633班的一些人纷纷贴出了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两边大字报都形成了自发的签名。但是,拥护校领导的是多数,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处于孤立状态。清华附中气氛大乱。

聂元梓的大字报也让北京师范大学沸腾了。6月3日早晨,北京师范大学北饭厅廊厅南墙上,贴出《砸烂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向程今吾黑帮猛烈开火》的大字报,是由已在1965年底抽调到《红旗》杂志社帮助工作的政教系五年级调干生谭厚兰领衔署名。

程今吾,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早年即从事教育事业。

紧接着,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反对谭厚兰的大字报一时占了绝对优势,许多人还要找谭厚兰辩论。

大字报规模不断扩大,辩论的人群不断增加。

6月3日这天,刘少奇更不敢稍懈,他于上午11时,再次在他家福禄居的会议室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如何应对目前的局势。参加会议的除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外,还有负责外交口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负责工交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负责财贸口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负责农业口的陶鲁笳、负责军队口的叶剑英、负责宣传口的陶铸和康生、文革小组陈伯达、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北京市委的李雪峰和郭影秋及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克实。

5月2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接替彭真和陆定一的工作。

陶铸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中央调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他的夫人曾志和老部下赵紫阳都不以为然,认为他的性格不适宜担任这项工作。但是,在这风云变幻的动荡时期,能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毕竟是令人振奋的。6月1日,陶铸离开广州坐火车北上,刚到北京,就被急急忙忙地接到这里参加会议。

李雪峰在会上汇报了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他代表北京新市委

提出请求：“我们打算向北京大、中学校派工作组，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是干部不够，能不能从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北京新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

“是啊，现在学校闹哄哄的，出现了乱斗乱批乱揪的局面，一定得控制住！”邓小平插话表示同意。

刘少奇也认同说：“我看可以。”“哪里出事，哪里就派人去”，“各校党组织不但要参加运动，而且要负起领导责任。”

他又对坐在前面的团中央书记胡克实说：“共青团应该发挥作用，中学主要靠团员队伍，克实，还要掌握好形势呀。”

这时，刘少奇收到底下送上来的一个纸条，打开一看，是陈伯达写的，上面这样写道：“目前正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我建议先不要搞工作组。”

刘少奇皱了下眉头，坐在他旁边的周恩来看了看陈伯达的字条，小声对刘少奇说：“是不是让伯达同志谈谈他的意见？”

“时间很紧，以后再让他讲吧。”他把条子递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一看，当众就念了陈伯达的条子，并且不客气地反问道：“伯达同志，你说不要搞工作组，可是你自己现在就是进驻《人民日报》的工作组组长呀？”

面对邓小平的反问，陈伯达一时语塞，他结结巴巴地说：“不是的，不是的，这不是一回事！学校不是机关，学校里的许多情况很复杂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邓小平说：“我看是你自己的头脑太复杂了。我就不信工作组进学校比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城市还困难！你呀，读书太多反而读蠢了，快变成书呆子了。”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同意派工作组，陈伯达陷入了孤立。他见势孤力单，不说话了。

接着，李雪峰提出：“现在搞运动总得有个办法……”他提出了对运动的八条要求：

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

三、游行不要上街；

四、内外区别对待，大字报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能参加运动；

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

六、注意保密；

七、不准打人、诬蔑人；

八、积极领导，坚持岗位。

这就是后来说的“八条指示”或“八条规定”。

邓小平又首先表示：“这样很好，同意。”

陈毅听了也很高兴，他对李雪峰说：“你再说一遍，我记一下。”说着，拿出小本子边听边记。

与会者很快同意了这八条规定。

第54回：“不能乱”，刘少奇忧心忡忡 飞杭州，示方略未得要领

轮到周恩来说话了，他首先分析和汇报了当前的国际形势，接着说：“对政治局所作的各项决定，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不过，在正式行文之前，我主张我们应该请示毛主席，尊重毛主席的意见。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用毛主席思想去提高群众的思想。”

“我已经给主席打过几次电话。”刘少奇说。

周恩来笑了：“我们应该亲自去杭州向主席请示，最好请他回北京来领导这场运动。我觉得，这场运动不寻常哪！”

刘少奇表示同意，他说：“行，小平同志，明天我们就去杭州吧。陶铸、伯达同志也一起去。总理在北京主持一下工作。”

会议同意李雪峰代表北京市委向北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会议要求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抽调干部，作为北京新市委工作组的成员派往各学校。

散会后，刘少奇再次嘱咐李雪峰说：“一定要掌握好北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李雪峰对刘少奇表示：“我绝对不会辜负党中央对我的信任，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刘少奇说：“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回答说：“彭真过去是从来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在指挥我们。”

“是啊，要不怎么说他是独立王国呢。”接着，刘少奇又问李雪峰：

“你对聂元梓的大字报怎么看？”

李雪峰随口说道：“毛主席不是已经说了吗？我还有什么可讲的？不过，我的水平比主席要差太远了，要是我处理这件事情，绝对不敢公开的。这么一来，北京的学生基本上无法控制，我担心这样下去会波及到工厂和农村。全国会不会乱了？”

刘少奇马上激动地说：“绝对不能乱，乱了毛主席会怪罪我的。现在北京这个家难当呀。我已经向毛主席说过，请他回来主持工作。他说：你们不是嫌我碍事吗？你们放手干吧，天不会塌下来的。”

李雪峰附和着说：“是呀，最好让主席回来主持。”

见到走到门口的胡克实，刘少奇一边和他握手一边说：“克实，千万要把局面维持好。”

这天，《北京日报》登载了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撤销陆平、彭佩云一切职务，改组北京大学党委，派出张承先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到该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并代行党委职权的决定。

李雪峰从刘少奇那里开完会，回到北京市委，立即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传达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和八条规定。他针对一些工厂要停工闹革命的情况说：

“工厂写大字报、写信，有的工厂停了工进行声讨。发电厂几百个人也在酝酿停工，搞大革命进行声讨，拥护党中央、毛主席。发电厂一停工我们就开不成会了，我们自己乱了，对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我们不能乱，我们要革敌人的命。因此，我们要作解释，组织工作组，派人到有些工厂，宣传解释，帮助工作。……”

他对市委机关干部说：“和黑帮有关系的，要起义立功。如果不揭露，就不能划清界限。那伙黑帮，要他检查，他是不干的，宋硕就是这样。聂元梓揭露，确实有这个问题，他不但不改，还继续活动。有人现在还活动。我在北大讲一次，话虽不多，有人造谣，这就是阶级斗争。说我讲的和宋硕一样，给我贴了许多大字报。反面的东西贴它一年，对大家是个教育。”

这天，北京市委有人贴出批判李雪峰5月25日北大讲话的大字报，但很快被打成了“右派”。李雪峰提出“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至6月5日，市委机关继续围攻给李雪峰贴大字报的人，收回他

们的大字报底稿。200余人重点挨整，被迫检查。

下午，师大女附中的学生、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回家后，将学校刘进、宋彬彬、马德秀写大字报后的情况向她父亲邓小平讲了。

还在6月2日，邓小平就召见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指示“团中央协助新市委代管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

6月3日上午，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胡克实列席了刘少奇在福禄居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会后，他回到团中央立即召开了书记处紧急会议，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决定组成北京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各区成立工作队，当天就开始向中学派出工作组。

下午一上班，胡克实的秘书侯春山通知团中央的干部张世栋、马娴华、叶礼艳去胡克实办公室。3人被告知，他们将组成北京中学第一个工作组，由张世栋任组长，今晚就进驻北京师大女附中。“胡启立同志也去，但不作介绍，他去看一看。”

6月3日下午，师大女附中学校党支部召开全体会议，同学们都很关切，有不少人堵在会议室门外倾听。会议室里传出老师和学生激烈的辩论声。

当天，北京市委改组的消息传来，师生们突然就像是早就和“旧北京市委”有仇似的，欢欣鼓舞、绕着校园游行，表示热烈庆祝、坚决拥护！胡志涛副校长代表党总支传达新市委的指示：一不上街、二不开大会、三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街上去，要注意内外有别，强调要相信党，相信党支部，相信区委，相信市委。

6月3日晚饭后，团中央候补书记胡启立带着张世栋和马娴华来到师大女附中。他们在校门口，遇见了几个同学，张世栋向她们自我介绍说：“我们是团中央派来的工作组，想见一见你们的校领导。”

一个同学说：“他们在后面的阶梯教室开会斗学生呢！我带你们去。”这位同学就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

他们来到阶梯教室，许多人都围在门口。胡启立他们让打开门，走进阶梯教室，老师们正在批评刘进、宋彬彬、马德秀。

张世栋简单介绍说：“我们是团中央根据党中央指示派出来的工作组，目的是帮助学校党政领导干部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今天先来看一看，明天就进驻学校了。”并当场宣布：刘进等人的行动是革

命的，应该支持。还说“邓小平同志很关心，委托我们来看看。”顿时，刘进她们非常激动。

胡启立听说大家都没吃晚饭，挺生气。说：“不能以这种批斗的方式对待学生，先去吃饭，他们会了解情况后向上级和小平同志反映。”

随后卞仲耘书记宣布散会，胡启立3人在校内转了转就返回了。

第二天一早，工作组正式进校，张世栋是工作组组长，马娴华是副组长，胡启立是西城区中学运动的负责人。欢迎大会上，胡启立、张世栋、胡志涛副校长都讲了话，胡志涛在会上传达了前一天李雪峰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报告。接着，工作组宣称：“教师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法律应该坐班房，应该判处死刑”。

工作组长张世栋在讲话时说：“看到对学生起来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形势，我的心情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他稍作停顿后，说：“欢欣鼓舞！”

台下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高亢的口号声。

6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新华社有关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和北京新市委向北大派出工作组的两篇电讯稿，分别批示“已阅。同意。”

6月3日晚，北京大学工作组进驻学校的消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电讯稿是由周恩来根据政治局常委的决定起草的。工作组原来是以华北局名义派出的，电讯稿中改称“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毛泽东看了这条电讯稿并表示同意。

3日晚，陈伯达再度前往北京大学，看到一批反击聂元梓的大字报。陈伯达气呼呼地说：“保皇党！现在又出现了保皇党！”

6月4日凌晨1时30分，北京大学工作组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大会。吴德到会并作报告，宣布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做出的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的决定。

上午10时，陈伯达在工作组成员张承先、曹轶欧等人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事先，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建议清理一下现场，以确保安全。陈伯达说：“人不必清了，有你们在身边，相信陆平他们也不敢有什么小动作，再说我也想听听大家的真实声音。”

就这样，陈伯达在张承先等人的陪同下，悄无声息地来到了阅看大字报的人群之中。陈伯达看得极为认真，不仅每一张都看，而且每

一行都不错过。当他看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处几名工作人员写的,题为《北大成了资产阶级“权威”贩毒的市场》的大字报后和哲学系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北大黑帮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罪行》大字报后,突然大声对旁边看大字报的学生说道:

“同学们,看了你们的大字报我很受感动,也很受教育。因为你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培养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你们要冲破这个堡垒。”

然后,他又转过脸,对陪同他看大字报的工作组成员说:“你们要依靠群众,组织坚定的左派队伍,要争取中间多数,分化那些少数坏的,打击最坏的。”

6月4日,刘少奇匆忙飞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

在杭州西湖边上的宾馆里,参加汇报的有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伯达等人。刘少奇心情沉重地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党委领导人被揪被斗,党委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北京新市委为稳定学校秩序,依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组的办法,从今天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现在许多学校的学生纷纷涌向中南海、国务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

陈伯达跟着说:“我是提议不要派工作组的。相信群众,才是马克思主义。”

陶铸谈了他的看法:“我是积极主张派工作组的。做实际工作的人都懂得,派驻工作组,是我们党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之一。”

会议出现了两种意见,多数人主张派工作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并不明确表态,他一口接一口地吸着香烟,把自己笼罩在淡蓝色的烟雾之中。依据多少年来的惯例,各种意见发表过了,最后归毛泽东拍板。毛泽东不开口,谁也不好再说自己的想法。

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寂。

毛泽东终于开口表态了:

“可以派工作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

接下来毛泽东又说,派不派工作组只是形式,这个形式也许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于发动群众搞大民主。

刘少奇不无忧虑地请求说：“北京大、中学校的混乱局面，我们确实心里没数，不知下一步运动该怎么搞。希望主席尽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泽东挥挥手，像是要驱散眼前的烟雾，但是刘少奇等人心里十分清楚，毛泽东那个动作的含义决不仅仅只是驱散烟雾：“我暂不回京，运动中的问题你们相机处理吧。”

刘少奇急忙赶回北京，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紧张的讨论。自从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消息公布后，北京许多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地涌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新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组。会上许多人认为，目前大、中学校领导已经或者即将瘫痪，情况非常混乱，必须迅速采取措施，决不能允许学生们无法无天地再闹下去，要尽快结束这种混乱现状。

从6月5日起，北京新市委加快了派工作组的步伐，至6月中旬，共向北京地区51所高等学校和304所中学先后派出了工作组。大学工作组的成员是从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抽调；中学是由团中央抽调。根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团中央成立了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分别由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和惠庶昌担任。6月7日至9日，团中央从北京和全国各地抽调1800多名干部，组成300多个工作组，分成8个工作队，陆续向北京8个区的中学校派出。

6月4日这天，团中央派了两个人到清华附中进行调查。他们分别与包括红卫兵观点在内的各派学生代表进行了几次座谈，红卫兵在与他们的座谈中，感觉受到了鼓舞，斗志更加旺盛。6月5日，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面贴出一张题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开始公开点名批判校领导。

红卫兵还通过他们的长辈寻求支持。红卫兵的核心人物、高631班的团支部书记宋柏林6月5日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就在当天，宋柏林的父亲、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宋维轼也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

孔原，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薄一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6月4日,教育部大院大约有30多名大院子弟也宣布成立“红卫兵”。他们自豪地宣称,教育部干部子女红卫兵是继清华附中红卫兵和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之后,世界上第三支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成员是四中、八中、女八中、三十五中和二龙路学校等校的中学生。最小的上初一,13岁;最大的19岁,上高三。他们大多住在教育部大院里。他们中有近半数成员的家长是司局级干部。教育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对于谁的家长是什么级别,从小便耳熟能详。谁的父母级别越高,谁就越趾高气扬。红卫兵的头头是一名三十五中的高三学生。他的家长级别最高,母亲是部机关党组书记,父亲在海军大院任职。

不久,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二十五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北京矿业学院附中等校中学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

北京市八中,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的儿子陈晓鲁就在这所学校就读。这里的学生们到清华附中抄录大字报后,忽然感到自己已经落到了运动的后面。回到自己的学校后,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将全校所有教职员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听他们的训导:

“老师们,过去你们在这讲台上讲,我们在讲台下听。那是三娘教子,今天是子教三娘。我们对你们是争取团结的;但是你们所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必须彻底清算……”

教职员们虔诚地听着,不时报之以一阵热烈的掌声。看着站在讲台上的那些普通的中学生们,不时还觉得他们只是些孩子,几乎一夜之间,他们长大了、成熟了,如此威严,如此具有震慑力。

学校成立了以学生为主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推举陈晓鲁为文革小组主任。教师们开始还担心1957年的教训会在中学生身上重演,现在变为担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此时他们都自觉地把自己放到革命对象的位置上。

所有的课全部停止了。学生们聚集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唱革命歌曲,讨论革命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训练、游泳等等。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他们纷纷从家中搬到学校的集体宿舍来住宿。双层木床上,塞满了十六、七岁纯阳之体的半大男子汉,充盈的血气和旺盛的精力转换成大咧咧的争吵、唱歌、欢笑和打斗。

第 55 回：匡亚明，溧阳县遭遇炮轰 稳局面，回南京汇报结果

6月2日早晨，南京大学溧阳分校的师生在新闻广播中听到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当天下午，分校学生周冠华、陈云绮、郑立业、王钟元、吴相乔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声援北大聂元梓。接着，二年级学生蔡琼、潘玉玲、李为华、施锐琴、王秀英、鲍玉花、周慧等人又联名贴出了《十问匡校长》的大字报。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学生也纷纷贴出自己的大字报。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造成一股很大的声势。

学生们大字报的主要内容，除了对北大师生的革命行动表示声援外，主要是批判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在一位工人来信上所写的“按语”，并指责匡亚明搞溧阳分校的目的是将南京大学师生下放到农村去，与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隔离开来，用建校劳动冲击革命大批判。

所谓“按语”一事，是不久前在全国“三家村”的高潮中，南京的一位青年工人也致信南京大学党委，批评该校中文系编著的《左联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书，说这本书竭力吹捧“三十年代”文艺传统，抵制毛泽东文艺思想。匡亚明指示溧阳分校政治处印发了这封来信，并亲自撰写了一个“编者按”，一方面指出在群众性的自我教育运动中，“学生可以批评教员，青年人可以批评老年人，群众可以批评任何干部和领导”，另一方面又强调批评“要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弄清大是大非问题，尽可能避免在小是小非问题上纠缠不清”。这个“编者按”与彭真主持制定的《二月提纲》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处。那时的匡亚明，还不知道中央对《二月提纲》的批判。

5月7日，江苏省委召集在宁高校党委书记会议，匡亚明虽然知道了“文化大革命不是学术批判而是政治斗争”，但是“政治斗争”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斗争的对象是谁？斗争究竟如何开展？中央和省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和许多人一样，都不清楚。

5月11日,匡亚明在全校总支书记会议上提出了南京大学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三个步骤:第一是批判“三家村”;第二是开展群众性的“灭资兴无”自我教育运动;第三是深入进行学校教学改革。这些,与当时大家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也是一致的。

溧阳分校又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说,这是南京大学响应毛泽东“教育革命”的号召的产物。1961年7月,毛泽东曾经致信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认为该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的办学模式很好,希望全国学习他们的经验。后来毛泽东又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和批示,主要内容包括减少课堂教学,加强社会实践,学习“抗大”经验,缩短大学学制等。他认为:“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大学如果是五年的话,在下面搞三年。教员也要下去,一面工作,一面教。哲学、文学、历史,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要在大洋楼里教吗?”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南京大学党委在中央高教部和江苏省委的支持下,于1966年1月17日做出了《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提出将文、史、哲三系迁往距离南京市大约90公里,位于宁杭公路边溧阳县属下的一个果园,在那里建立南京大学溧阳分校,将南京大学文科的文、史、哲三系合并组建成“大文科”,实行“半农半读”的构想。

在全国宣讲《关于建立溧阳分校的决定》的大会上,匡亚明雄心勃勃的提出,要让南京大学溧阳分校成为全国高教战线的一面旗帜,与工业战线的大庆、农业战线的大寨并驾齐驱。就这样,1966年2月底,南京大学文科三系师生在匡亚明的率领下,打着红旗,背着行李,走了3天,徒步行军来到溧阳果园,开始在这里建设他们的分校。

溧阳果园没有校舍,师生们就分散居住在当地老乡家中。然后集中3、4、5三个月的时间建了一批“干打垒”房屋,先让学生集中居住下来,随后又陆续建设教室和公用房,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教育改革实践。

建房子没有石头,师生们就到深山里去开采,每天劳动10个小时。拉黄沙,拉石子,都是学生自己干。

劳动的时间太长,不可能有时间上课学习了,唯一的学习就是每天早上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吃完早饭以后马上就要劳动。

劳动太累了,有的同学晕倒在地。

到了1966年6月,在这里参加建校劳动的有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500多位师生。

这里的日常生活也很艰苦,尤其是缺水。当地有一个小水库,原来供应当地几十户老乡的用水,问题并不太大,但是南京大学一下子去了500多人,用水就显得紧张了。地质系有一个找水专家叫萧楠森,匡亚明请他去找水,忙活了几天,就是找不到新的水源。盛夏即将来临,大家开始担心缺水的日子不好过。

还有就是蚊子。溧阳的蚊子比南京的蚊子要多的多……

条件的艰苦使许多学生都想回到南京去。另外,那些毕业班的学生还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毕业分配问题忧心忡忡。这些学生对创办溧阳分校的抵触情绪愈来愈强烈。

作为一个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具有浓厚知识份子气质的大学校长,匡亚明有一整套鲜明独特的办学思想。第一,他主张依靠知识份子办学。第二,他认为高校应该加强科研工作。第三,他主张尽一起可能改善办学条件。第四,他赞同“又红又专”的口号,但是他强调“红”必须体现在努力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上。应该说,匡亚明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学问家。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匡亚明又十分赞同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到溧阳农村去办分校,他认为这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必由之路。

当匡亚明获悉溧阳分校出现针对他的大字报后,立即赶往那里,认真仔细的看完了这些大字报,并用他所掌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央文件精神分析了大字报提到的问题,最后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符合中央指示精神的,是无可厚非的。长期以来形成的“阶级斗争”思维定势和1957年的“反右”斗争经验,使他错误地理解了《516通知》中提到的“政治斗争”的具体含义。他执着地认为,他匡亚明就是“党的领导”化身;对他的任何批评指责就是对党的领导权威的蔑视和挑战。而大字报中那些“指责”就是对共产党的指责,因此,毫无疑问是反党的表现。他不能对学生的胡闹行为听之任之,必须立刻组织有效的反击!

一回头，匡亚明看见一个同学正站在那里，就向那个同学招了招手。那个同学赶紧过去。

匡亚明问他：“同学，你见过右派吗？”

同学答：“我见过，我们系就有一个，到现在还没有分配，一个月就拿18块钱。”

匡亚明说：“我告诉你，我在吉林大学，写我大字报的人都是右派！大概有两三千人吧，这些人写我大字报，都是右派！”

那位同学一听，吓坏了，心想：“哎呀，我也在批匡校长的大字报上签名了。这下惹了大祸了！”

接着，匡亚明在分校召开了党总支扩大会议和全体党员大会，他把学生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成是“毒箭”，布置立即组织反击，并告诫大家“不能手软”。

到了夜里12点，全校紧急集合。各年级的党支部书记向师生们发表演讲说：“我们这里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件，和1957年差不多。”

党支部书记让写大字报的人站到右边来，没写大字报的都站到左边去。这样一来，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无形中就变成了右派。

然后，书记要写大字报的人回去反省，准备做检查。

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哪里还敢睡觉？都坐在宿舍里，边遭受蚊子的叮咬，边写检查。

没有写大字报的同学也纷纷贴出反击的大字报。想入团、入党的同学更积极，他们甚至将大字报贴到了那些写大字报同学的蚊帐口上，使那些同学想睡觉也不敢上床了，因为他们不敢把这些大字报撕掉，只好整夜都在学习分校发给他们的学习材料。

6月3日上午，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再次召集党总支扩大会议，要大家“跟踪追击”，召开“讨论会”批判那些给校长贴大字报的学生和教师。

溧阳分校立即宣布全校停止劳动，召开批判大会。首先批判几个30多岁的年轻教师。因为匡亚明认为，学生们年轻，贴大字报肯定是一些老师策动的。老师批斗完了，就开始批斗学生干部。第一个被批判的是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中文系的胡才基，他的年龄比较大，是调干生，共产党员。第二个受到批判的是中文系的孙家正，他是中文系的团支书。此外还有政治系的学生朱英才等人……。

批判大会声势浩大,残酷恐怖,群众纷纷站起发言,所有的问题统统往批判对象身上扣,上纲上线,甚至有的人开始动手。被批判者平时的各种言行表现,包括个人之间某些极为私秘的问题,统统被揭发出来,使人有一种被剥光衣服、赤身裸体的感觉,批判对象根本没有分辩的余地。

6月3日下午,匡亚明回到南京,立即召开党委常委会,通报了溧阳分校的“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他得意地宣称“粉碎了一次6小时的政变”。他还命令溧阳分校负责人对被斗的师生要“扭住不放”。

从6月2日至5日的4天时间里,在溧阳分校遭到批斗的师生多达70人,其中学生64人、教师4人、工人2人。分校4个团总支书记除1人不在家外,其余3个全被斗了。

溧阳分校的局势控制住了。6月5日,匡亚明踌躇满志的到江苏省委汇报他们学校发生的“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

这时,青海也出现问题。5月29日,青海省积极相应中央的指示,发出《关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精神,继续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这份通知尚未发到每一个基层党组织,6月1日晚20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文章是:《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还有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让人们应接不暇。6月2日下午14时多,《青海日报》总编兼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把报社政文部副主任雷经农和记者陈逸叫到他的办公室,说有一项紧急任务要立即完成。

接着,程光远向他们传达了当时仍属高度机密的中央杭州会议和上海会议的大致情况,详细地复述了1966年4月24日杭州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中通过的《516通知》草稿的内容,特别是其中那段: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历产阶级代理人,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重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睡在我们的身旁。要不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这些领域的领导权。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后，程光远对雷经农和陈逸他们说：“作为党报，要尽快跟上中央的部署，及时发表一篇社论。社论的重点是发动群众，要有很强的鼓动性。”

接着，又对陈逸说：“这篇社论还是由陈逸执笔，雷主任把关。一定要带着感情写，越快越好，争取明天见报。”

陈逸是程光远在《青海日报》倚重的三支“笔杆”之一。另外两位是：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毕业的王振业，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孙正荃。那时，《青海日报》上的一些重要报道和重头文章，基本是由他们3人担任。而在当时那段时间里，《青海日报》的社论几乎都是陈逸写的，几乎达到了一天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两篇。

听完程光远的传达，陈逸依然觉得有些茫然：这“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是谁？“发动群众”起来干什么，要“革”谁的“命”？他都不清楚。好在他已经习惯这样的工作程序了，社论一定要写，否则就是没有完成任务。中央的指示精神必须要宣传、贯彻，否则办党报做什么？

怎么写呢？既然社论重在“发动群众”，就在这方面做足文章，至于“革命对象”，先作为一个虚拟目标，总有其人，且不去管他。按照程光远传达的中央精神写就是了。

从程光远办公室出来，陈逸躲进了报社的值班室，锁上门，一个人开始酝酿、构思。他手上除了那份笔录程光远传达的《516通知》的草稿记录外，就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他觉得，这篇文章的精神和当时全国批斗黑帮的气氛以及他们要写的社论的内容都是很吻合的。

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思考，连续吸了4支烟后，陈逸开始奋笔疾书，题目是《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这题目，也很有气势。

接近下班时间，他写好第一页，立即送给雷经农初审，再由雷经农送程光远终审，陈逸则回值班室继续写。当陈逸写完最后一个字时，已过了晚饭时间。他立即将最后两页交给雷经农。

等雷经农审完后，陈逸也顾不上吃晚饭，拿着最后几页初稿，到省委部长楼程光远家待其签发。程光远在终审时，把雷经农删除部分又全都恢复，还当着陈逸的面，说了一句：“乱改一气，文气都不顾……”

于是，陈逸的原稿几乎是一字不易地照发。

第 56 回：六月三，青海湖又起波澜 轰领导，动荡在全国蔓延

经程光远审定的这篇社论于次日，6月3日见报。社论中说：

“大革命就是大反常，就是要大反资产阶级之常态，踢翻反党分子的‘阎罗殿’，砸烂‘三家村’这座大黑店，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的新秩序、新世界；”“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一句话，当时，正风靡全国。

不曾想到，社论一发表，西宁市便炸了锅。编辑部电话不断。开始，大多数电话还是询问发表这篇社论的意图。因为，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怎么还会有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呢？革谁的命？难道无产阶级要起来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到了第二天，6月4日，情势大异，西宁实验中学女学生李春荣带领一批中学生首先来到《青海日报》社编辑部所在地，省委办公大楼前楼四楼，给报社送来第一张措辞严厉的大字报，声称这篇社论是“大毒草”，要求报社做出“说明”。年轻的中学生们在走廊上高呼口号，要“程光远出来说话”，后经报社人员劝慰，他们把大字报贴在墙上后才离开，临走时还丢下一句话：“我们明天还来！”

接着，一拨一拨地学生、干部、工人涌向报社，有来探询这篇社论的“背景”、“用意”，也有来问“省委有什么部署”，其间也有携带来大字报的。有的认为社论是“大毒草”，也有的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编辑部闹哄哄乱成一片，社论的即时效应如此快捷、猛烈，是《青海日报》创刊以来未曾遇到的。编委中有人忧心忡忡地念叨：“闯大祸了！办报十几年来没有见过……”

当天下午，事态进一步升级，青海省委办公厅来电话质问《青海日报》：“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打扰了省委的工作。”省委宣传部也来电话，要求报社解

释。《青海日报》社气氛更加紧张。

程光远和陈逸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内心的恐慌可想而知。

6月5日、6日，西宁市有更多的人涌进《青海日报》社，大字报越贴越多，青海省各部、委有人也写出了大字报，省委大院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陈逸在上、下班路上已经明显感受到那些奇异、刺人的眼光和在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语的尴尬。他感到要大祸临头了，就去找程光远。程光远让他去和省委宣传部部长午人谈谈，向午人说明社论撰写的真实意图和具体过程。程光远还示意，午人对文中所指，意见特别大。

6月7日傍晚，陈逸来到午人家，向午人详细诉说了社论写作的策划、撰稿过程，特别强调了社论是根据中央杭州会议、上海会议精神，本意是在“发动群众”。同时也检讨了在完稿、发稿中过于仓促、轻率的“错误”。

午人，如同程光远一样，对陈逸的才华一直是很欣赏的，曾以“笔杆子”称许赞誉过陈逸。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5月中旬，午人还亲自命陈逸执笔撰写追查“三家村”后台的长篇批判文章。当时午人对他说：

“目前全国都在批判、声讨‘三家村’、《前线》和《北京日报》，我们青海不能没有态度。你要写一篇重头文章，不要停留在‘三家村’，要挖它的后台……”

作为文人，陈逸对邓拓的才华和文笔是十分欣赏的，但如同“六三社论”一样，对于“三家村”的后台是谁，陈逸哪里知道？既然组织上布置任务要写，那就写吧，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器重。

陈逸熬了几个昼夜，几乎通读了《三家村札记》及当时的《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写出了《擒贼擒王》的长篇批判文章，以两版整版的篇幅在《青海日报》上发表。

但是，这次午人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了，整个谈话过程，他始终板着脸，无论陈逸怎样解释，他都坚持认为“六三社论”是一篇矛头针对省委的别有用心的文章，他还强调“这样重要的社论，为什么不交省委审定，擅自发表？”

陈逸回答：“在最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社论，省委都

没有审看,因而这篇社论也是并不例外的常规做法。”

午人问:“社论里说的‘小脚女人’是谁?‘东郭先生’又是谁?”

陈逸说:“这只是泛指,并不特指哪个具体人。”

但不管陈逸怎么说明,午人始终铁青着脸,并且告诉他,省委很快就要就这篇社论开会讨论做出决定,要他“准备接受处理”。

接下来的几天,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到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楼至四楼都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一排排张挂起来,如同飘舞的蚊帐,还贴出了“小心火烛”的告示。大字报的内容已经是“一边倒”,程光远和陈逸的“罪名”从“政治错误”跃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最后,大字报由前一直延伸到院墙及省委常委楼。

这篇社论也传到了北京。康生看了这篇社论赞不绝口,认为是篇好文章。陈伯达则不以为然,认为社论捅了漏子,是大毒草,还叫办公室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西北局书记杨植霖和青海省委书记王昭打电话,请他们追查社论的作者和报社的责任。

“六三社论”发表当时,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正在西安任中共西北局书记,主持常务工作,而且是西北局派往中央文革的成员之一。第二书记、省长王昭也在北京治病,为当时中央内部斗争而惶惶不可终日。

原来,王昭曾任公安部副部长兼政治部主任,与罗瑞卿关系密切。罗瑞卿当时的处境,使王昭预感自身的危机。西北局领导刘澜涛叫王昭不要回青海,安心在北京治病。可是,青海的“六三社论”引发了如此迅猛、强烈的反响,使他不得不匆忙返青,希望以最快速度解决问题。

王昭,1955年授中将衔,1962年从公安部副部长任内调来青海,是为整顿三年困难时期由省委书记高峰搞乱的青海政局和经济。他一到青海,就大刀阔斧地整查吏治,理顺经济,深入农村、山区,体察民情,在青海群众中有“王青天”之称,威信很高。

回到西宁的王昭了解了当时青海的情况,同意青海省委其他常委

们的意见,于6月11日,青海省委做出《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确定“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

6月12日,《关于〈青海日报〉六月三日社论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经西北局批准。同时,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当天,工作组在报社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由省委副秘书长薛可代理总编辑。同时,工作组决定:

一、程光远停职反省,陈逸监守隔离,雷经农争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

二、由省纪委副书记张全志领导报社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人人表态。

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

四、组织专人专版于1966年6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

五、继续对程光远、陈逸组织内查外调。

这天,陈逸家被抄,他也当场被带走隔离。临走时,他爱人急火攻心,晕倒在地。但是,不允许陈逸稍有逗留,仍然将其立即带走。

祸端一直殃及到陈逸当时正上小学的孩子,他孩子的作文被学校作为“大毒草”组织同学们批判。

陈逸从此开始从早到晚的大会小会连轴批斗。批斗间隙,罚他到省委大院北近湟水的菜地劳动。

与此同时,还勒令陈逸从省委办公厅干部宿舍楼搬到一个临时关押“五类分子”的处所。“五类分子”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这在当时都是人民的敌人,人们都把他们作为另类看待。他们住的地方,条件自然是极差的,终年不见阳光,秋末开始,墙上就结满霜花。陈逸在监管人员看押下,与弱妻幼儿一起吃力地来回搬运家什。

此时的陈逸,一股冤屈不知从何说起。每当他夜半劳动完后,仰

头望着那高原清冷的圆月，一种悲凉之情就会陡然涌上心头，他想到了十七世纪因科场案被流放到宁古塔的吴汉槎，那苦味、苦况使他不止一次地背诵顾贞观赠吴汉槎的《金缕曲》：“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它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薄命长辞知己别，问人生对此凄凉否？……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因文兴狱，劳身苦心，知识分子的命运遭际，大抵古今皆然。

因拥护“六三社论”而被打成“黑帮”，甚至是反革命的，在青海更是不计其数，他们也不同程度的受到与陈逸相同或更甚的遭遇。

6月5日，根据陈伯达两次去北大后的谈话精神，《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从此，“保皇派”一词在“文革”中广泛应用。

动荡仍在全国加剧……

6月4日早上，位于桂林的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部分学生受北大聂元梓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影响，在学院后门处贴出了《李德韩副院长在文革中充当什么角色？》为题的第一张大字报，轰动了全院。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院里，领导当即就组织了一批反击大字报，贴在后门。而学生们见院里贴出反击他们的大字报，马上又写出更多的大字报贴到了学校四周的墙上。

次日，6月5日，广西师院党委根据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的电话通知，宣布停课搞文化大革命。

消息传到柳州、南宁等地，各高校学生群起而动，组团赶到桂林支持广西师院。到了6月中旬，广西大学、广西医学院少数学生也纷纷开始贴出攻击校党委的大字报。

6月4日，福州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并成立“文革办公室”，当天，福州大学党委书记张孤梅、福建师院党委书记曾鸣以及其他领导被群众批斗。

6月4日，辽宁大学有人贴大字报反对校党委。结果，有四、五十人被打成“右派”。

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播出后，山西大学、太原工学院、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太原五中、太原六中等大中学校的学生起而效仿，这些学校的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即成为“炮轰”、“打倒”的目标，不少学校

被迫停课。对此，省委规定：“不准大字报贴在校外”，“不准在大字报上随意点名批判”，“不准随便批斗”，“不准张贴涉及党和国家机密的大字报”，“不准跨校召开批斗大会”，“不准侮辱人格”，力图把运动引入以往政治运动那种模式之中，但是这些规定效果甚微。6月6日，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的部分学生在省委门前张贴大字报，仿效聂元梓的大字报，称“山西省委和北京市委一样”，请求中央改组山西省委。

6月5日，开封师范学院艺术系讲师伍秀芝的住室，被她所教的一群低年级的学生们查抄了。她保存的那些封、资、修的唱片、录音和一些诸如巴黎香水、口红、高跟鞋、海绵乳罩之类的东西，被学生们作了暴光式的展览。学生们批判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贴出了“打倒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武秀芝”的大标语。开封师范学院一下子开了锅。不少学生说艺术系的学生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向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猛烈轰击的第一炮，好的很，纷纷写大字报，大标语表示支持。

校党委的态度则相反，指责他们破坏了学院的教学秩序，破坏了师院文化革命的正常进行。责令参与此事的学生们承认错误，悔过自新，揭发闹事的右派、反革命。要求各系党总支都要切实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排除干扰，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密切注视运动的动向，严密掌握每个学生的基本态度。

学生们不服气，不认输。他们集合起来到院部要求招回在省里办展览的高年级同学，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这又被院党委指责为请愿闹事，遭到围攻和非难。凡是参加请愿的和为请愿活动说公道话的，都被文革小组找去谈话，在班里接受批判。凡是在讨论发言中，涉及对党委有意见的，就一律斥为“攻击党的领导”，不但要给以批判，还要作为政治问题整理专案，内定为右倾学生，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就是开封师范学院文化革命中爆发最早的“六·五事件”。

再看河南省会郑州。6月3日，郑州大学就对那些给校领导贴大字报的学生开始了全校性的反击。那14位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戴上“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三家村黑帮”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王相海、席占修还被拉到桌子上斗争，让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赵文

甫也来到郑州大学作报告,公开提出对有问题的人要组织批判,同时对写大字报的人要进行反击。一霎时,整个校园贴满了“誓死保卫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反对王培育就是反党”等大标语、大字报。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 174 人。一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校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

6月5日下午,太阳快落山时像血一样红。这天夜里,在强大的压力下,郑州大学率先给校党委贴出大字报的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从文科楼六层高的顶端跳了下去,头破血流,横尸楼下。时间已是 6 月 6 日凌晨。

第二天凌晨,数学系青年教师刘光武也跳楼身亡。校内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一片恐怖,人人自危。这时,校党委召开全体党员、团支部书记以上会议,说他们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还说他们“人虽死,心不死,鬼魂还在”,要把他们“批倒批臭”,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甚至派人到王相海的家乡濮阳开批判会,声讨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他那贫农出身的老父亲被吓得浑身打哆嗦,说不成一句话。他妹妹哭喊着说:“俺哥啥时候也不会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没几天,中文系资料室的两位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的老师也相互拥抱着跳楼自杀,引起众多师生的恐慌和不安。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郑州大学就接二连三的死人,校党委无法控制学校的局面。6月6日当天下午,省委急忙派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带领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

工作组进校后,继续斗争学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6月9日,学生、共青团员、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张凤芝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张凤芝写好《绝命书》决定走王相海自杀的路,被同学发现未遂。

6月9日,在河南省委召开的市委书记会议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提出了“不论是什么情况,都不能反击学生”和“运动中不整学生的原则”。

第 57 回：六月六，匡亚明转瞬打倒 西北局，开会也揪“三家村”

6月5日，北京师范大学西北楼男生宿舍，中三的一个班学生簇拥着和学生同住西北楼乔树桐老师下楼梯，边走边喊：“乔树桐！你是什么人？”“你有几条罪状？”

这窝“蜂”在宿舍楼前停住。

乔老师低头站在凳子上，有位女生站在另一凳子边哭边揭发：“四清时，他给我们讲故事，讲猴子和人相爱……”

听众高呼：“打倒大流氓乔树桐！”

很快，画漫画，贴对联，批判乔树桐。

这里正热闹，一阵锣声，人们视线转向北边林荫道上，数学系来了—支人马。一位老教授，纸糊高帽戴着，提一面铜锣，一边敲着一边吆喝：“我是牛鬼蛇神！”

一批批各系的“牛鬼蛇神”纷纷“亮相”，多为右派分子和学术权威，还有个别领导干部。

班长王洪泽是中共预备党员，他在西饭厅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党”，要和学校的“黑党委”一刀两断。大字报纷纷围剿：“你参加的是中国共产党，不是师大共产党！”他这个班长没有再当下去。

6月6日傍晚，孙友渔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师生自发在东校门内外，夹道欢迎。

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召开全校大会，工作组长孙友渔代表北京新市委支持师生革命造反行动，号召大家把斗争矛头主要对准校系“走资派”，“要剥掉程今吾层层老笋皮！”

就在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到江苏省委汇报他们学校“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那天，溧阳分校二把手徐福基突然找那些写批判匡亚明大字报的人去开会，向他们传达了匡亚明的指示，说：“你们写大字报初衷是好的，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把矛头搞错了。匡校长和南

大党委，还有溧阳分校总支，都觉得你们还是我们的阶级兄弟，还是我们的同志。”

听了这话，下面哭声一片，那些写大字报的同学感动异常，当场就有人表态说：“匡校长太宽厚了，我们对不起他。”

那天中午食堂还加餐。大家好几天都没有心情吃饭了，这次算放开了，感到没有事了。吃完饭，大家又继续劳动。

年轻的同学们哪里知道，上边的事情远比下边复杂。早在5月25日前后，省委就派了一个姓杨的干部作为联络员来到溧阳分校。“六二事件”爆发以后，这位杨联络员到处摸情况，然后跑到几里路以外给省里打电话，报告南京大学的校长组织对学生进行批斗的消息。

情况反映到了省里，省里不知该如何处理。匡亚明是1926年入党的老革命，与康生20年代同为上海大学的学生，而且一起加入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康生任中共区委书记，匡亚明任少共区委书记。行政干部6级，比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他们都高，所以他平时对省委领导也不太理睬。省委叫他去开会，他不能不去，去了以后又对会议没有多大兴趣，就带上一本英文的《资本论》，边开会边看。

此时，江苏省委听了匡亚明汇报“六二事件”及处理经过，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央负责处理这些问题的康生，接到江苏省委的报告以后迅速做出批示：“匡亚明镇压学生运动是错误的，必须立即停职反省，接受群众批判。”

6月6日，江苏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

本来省委已经提出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了，是吴天石、孙叔平、陶白、叶子铭这些人，想不到匡亚明为镇压学生自己跳出来了，江苏省立刻抓住不放。

6月8日，江苏省委向南京大学派出联络组。这天，溧阳分校的同学们正在工地劳动，忽然来了两个人，问他们：“你们谁写大字报了？”

同学们不认识他们，没有答腔。

来人又说：“看样子你们是写大字报的，怎么没精打采的样子。”

同学们问：“他们是哪来的？”

他们说：“我们是江苏省委宣传部的。”

同学又问：“他们来干什么？”

来人说：“你们写大字报是对的，你们受委屈了。”

同学说：“你们胡说八道什么东西呀，匡校长都说我们不是右派了，我们都解放了，我们要好好干活，你不要和我们啰嗦。”

写大字报的几个人都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了，感觉对不起党。

这天晚上，学校广播站突然播放《东方红》歌曲，让全体学生到操场集合。省委宣传部戴副部长在会上向大家宣布：“明天你们就看不到匡校长和分校的其他干部了，因为他们犯了错误被调走了。”

他还说：“同学们，你们贴匡亚明的大字报是对的！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你们不是反党先锋，而是革命先锋！”

听到这些话，那些写批判匡亚明大字报的同学都激动得哭了，中文系的团支书孙家正站起来带领大家高呼口号，而批斗过他们的那些同学都呆住了，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是，那几个被批判、被拳打脚踢过的老师还不敢动，他们被搞糊涂了，不敢造次。

突然有人提出：“我们写大字报的人是革命急先锋，那些整我们的人是什么？”

省委的人就讲：“大家参加文化大革命，搞大批判，主要矛头要对准匡亚明，批判《二月提纲》。同学们互相之间不要再纠缠了。”

但是他们的这些话没有多少人听了，此时的溧阳分校实际上已处在无政府状态中了，不知应该听谁的。

第二天，南京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长从南京来到溧阳分校。小轿车一进分校的大门，大家就把他围起来了。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长向大家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第一，匡亚明就是北大的陆平。第二，南大党委不等于北大党委，你们不要把南大党委和北大党委等同了。第三，溧阳分校的同学要坚守溧阳，一面搞文化大革命，一面继续劳动建校。

这时，不知道谁说了一句：“我们要求回校干革命。”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马上就有人坐在小轿车的顶上，强烈就要求回校。

组织部长说：“不能回去，你们要在分校进行文化大革命。”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匡亚明又不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回南大去闹革命。”

还有人说：“怕什么，我们自己走回去。我们学习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

组织部长见控制不住局势了，想溜。同学不让他走，让他打电话反映学生的要求。

最后，江苏省委从南京军区借了几十辆军用卡车，把在溧阳的所有南大师生都接回了南京。

溧阳分校师生回到南京大学的时候，那边早已做好了准备，留在南京大学的所有理科学生都被组织起来夹道欢迎溧阳分校师生“胜利凯旋”。当溧阳分校学生乘坐的汽车开到汉口路的路口，整个南京大学就沸腾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理科的学生，一看到溧阳分校的同学，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欢呼雀跃，真是人山人海！大家一起握手拥抱。

溧阳分校的同学以一种英雄凯旋式的姿态，受到火一般热情的夹道欢迎，心情那个激动呀！许多人都激动的哭了。南京许多单位也敲锣打鼓来到南京大学，对溧阳分校师生“倒匡”表示声援。

6月12日下午，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声讨匡亚明的罪行。除了南京大学师生以外，参加大会的还有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推派的大批代表。

大会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宣布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撤销匡亚明的一切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宣布以后，全场热烈欢腾，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紧接着，分校师生代表胡才基等人在台上以极其愤怒的心情，揭发匡亚明“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校本部学生代表陈季平在大会上发言，对遭到匡亚明打击的师生表示亲切的慰问。

分校学生唐力行、王世泰、杨家玉、张秋良等纷纷表示：省委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是对南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撑腰。

参加大会的各大专院校师生热烈拥护中共江苏省委的决定，坚决支持南京大学革命师生的斗争。

6月13日，江苏省《新华日报》公开报道撤销匡亚明同志党内外

一切职务,还开始了对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陶白、钱静人,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孙叔平等的点名批判。

在此期间,有 20 万人涌到南京大学“声援”批判匡亚明,校园里除大字报之外,还扯起了广播喇叭,操场上搭起了台子,一些人登台讲演,展开大辩论。6 月 13 日,在南京大学大操场召开了批斗匡亚明的大会,中文系的学生胡才基等人是批斗的主力,他们起来揭露匡亚明的“叛徒”问题。就这样开始了对匡亚明进行武斗,戴高帽子,游街,泼墨水,有的学生还让匡亚明“坐飞机”,就是有两个人在匡亚明背后将他的两个胳膊从背后抬起,人也就被迫低头弯腰,形同飞机,或老母鸡,俗称“坐飞机”或“喷气式”。

就在中共华北局“前门会议”沸沸扬扬之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第三次全体扩大会议也于 1966 年 6 月 1 日至 7 月 11 日在西安召开。会议后期扩大到西北五省区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这是西北局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大会。在这次会上,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胡耀邦、陕西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明被说成是“西北三家村”。由于胡耀邦不归西北局管辖,西北局无权公开点名批判,会上公开的提法是“揭发彭、高、习在西北的黑线”,把赵守一、李启明作为彭、高、习的代理人,又把从未同彭、高、习共过事的胡耀邦作为头目,这样就成了一个“彭、高、习黑线”的“西北三家村”。

所谓“彭、高、习”,就是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怎么成了“西北三家村”的头目了?

原来,1964 年 11 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同时保留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原职。

当年的 12 月 1 日,胡耀邦到西安报到。当时西北局十分强调陕西“彭、高、习反党集团流毒很深”,“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很不彻底”。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社教运动中,大批干部和群众被当作敌对分子遭抓捕或被惩办。据统计,1964 年逮捕 6400 余人,拘留 5000 余人,平均每天捕 30 人以上。受到开除公职和开除党籍处分的脱产干部 660 多人。长安县正副区委书记和区长受处分的占 45%,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被撤换的占 76%。这与刘澜涛 1964 年 12 月 17 日在中共中

央工作会议上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西安市一度打击了 9500 多名“投机倒把分子”；陕南凤县连上山砍柴、到集市卖鸡蛋、进城当保姆的收入也被当作剥削收入，都要退赔。在党政机关，政治空气十分紧张，半数左右的省级部、委、厅和各地地委、行署、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被看作是烂了和有严重问题；一批未作结论的厅、局、处长被关押起来“隔离审查”。在文艺界，由于“反党小说《刘志丹》”一案的株连，一大批文艺作品被批判为“大毒草”，许多知名作家、艺术家遭到残酷迫害，不少人含冤而死。

胡耀邦来到陕西后，觉得这种做法对干部伤害过多，处理过重，因此委婉地提议：捕人暂停；“双开”暂停，留待运动后期处理；面上夺权暂停，待重新部署后再行动。根据他的提议，省委、省政府做出了“三个暂停”的决定。

两个星期后，1964 年 12 月 14 日，胡耀邦返回北京，出席于 12 月 15 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 20 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听到的一些意见都不满意，他要求大家“冲口而出”地讲话。胡耀邦连续写了几个晚上，最后在 12 月 24 日完成了《向西北局和中央、主席的报告：〈走马到职报陕情〉》。

在这份 9000 多字的报告里，胡耀邦说：“全省已经清洗了（即双开）660 多个脱产干部。性急了一点。性急了就难免出差错。”又说：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是彻底革命的办法，实际上同样是一种消极的错误政策。”

对于补划漏划地主富农成份的问题，他说：“土改时确系地富成份，但几经沧桑，现在剩下孤老残疾，生活相当穷困的，和虽有劳动力但生活和家底已经一般，本人表现老实的，补划不补划？前一种属于可以不划的，后一种属于可划可不划的，我主张不划。”

显然，胡耀邦的材料与当时会议上各大局书记的汇报精神是相左的，最主要的是，这份材料等于是批评了刘澜涛的汇报。胡耀邦未曾料到，他这份直接向中央主席述说西北局工作中的问题的《走马到职报陕情》，为他在西北的政治命运埋下了伏笔。

会议一散，胡耀邦又马不停蹄回到西安，立即召开了陕西省委工作会议，在传达、学习《二十三条》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

的同时,鲜明地指出陕西社教运动中的“左”的表现,提出了一系列旨在纠偏的政策思想。

2月13日晚,胡耀邦在陕南安康起草了一篇《电话通讯》,于14日凌晨2时写毕,以急电向省委办公厅发出。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书记冯基平,当即征得省委书记处各书记的同意,以电话会议转告到各地、市、县(区)委。这篇《电话通讯》提出了8个方面的方针政策性的问题,其中特别规定了解放干部的4条政策:

(1) 凡属社教以来被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最好选择几个典型,经过大家讨论,重新做出决定,并在大会上宣布。

(2) 凡属停止和撤消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再作结论。

(3) 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包括脱产和不脱产干部),不再在这次会议上“洗手洗澡”。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究既往。

(4) 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只要我们掌握了这四条,我们就不会犯什么“左”的错误,也不会犯什么右的错误。

2月17日深夜,胡耀邦在汉中地委,接到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打来的电话。刘澜涛电话语气严峻的对他说:“我把中央和西北局的意见通知你,你的《电话通讯》提出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

这突如其来的批评,使胡耀邦吃了一惊:如果不同意这四条,可以径直告诉他,为什么还要把中央抬出来,这中央究竟指谁?那一夜他辗转反侧,彻夜不眠。他不知道,此时,《电话通讯》一案已经闹到北京。刘澜涛在见到《电话通讯》后,立即印发给西北局书记并常委,接着以加急电报报给中共中央办公厅,并说:“西北局认为其中的四条干部政策不妥,可能引起翻案风。”

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的彭真看后,觉得那个“四条”不够确切,需要打个招呼。第二天,彭真到毛泽东那里谈工作时说了这件事。毛泽东说:“告诉耀邦注意一下。”

第三天,刘少奇看了《电话通讯》全文,说:“除了‘四条’,从字面

上看,阶级斗争也讲得少。胡耀邦就是搞阶级斗争的嘛,怎么会忽视阶级斗争呢?”

2月27日,胡耀邦又接到刘澜涛的信,信中说:“干部四条是有片面性的,肯定会引起翻案风”。10天时间,从第一次电话中说的“可能”,变为第二次来信写的“肯定”。同一天,彭真也打来电话,传达中央的指示,要胡耀邦“注意一下”。这使胡耀邦感到了紧张。

第 58 回：飞西安，剑英出手援耀邦 义愤起，西安交大风云动

2月28日下午，胡耀邦主持省委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央和西北局的指示。晚上，胡耀邦在会上无可奈何地作了检讨，承认“干部四条”缺乏分析，有片面性。会上决定向地、县发一个通知，要求“正确执行干部四条”。

会后，胡耀邦给刘澜涛写信，检讨了“干部四条”的“片面性”。刘澜涛回信说：“工作中出一点纰漏不要紧，只要认识了错误，就会成为推动工作前进的动力。”

3月3日，省委发出《关于执行耀邦同志二月十四日〈电话通讯〉第二个问题的前两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确实处分错了的，改正过来；处分过重的，减轻下来；但处分正确的，不能随意减免处分。对于有些人的处分问题，如果大家认识不一致，或者一时弄不清楚的，就不要匆忙地改变处分”。

这个通知很快受到西北局批评，西北局认为：这个通知没有彻底否定“干部四条”，没有明确指出胡耀邦的错误，只作了修补；通知发出前也没有报送西北局审查，对西北局不尊重。

1965年3月10日，召开西北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陕西省委1965年1月以来也就是胡耀邦主政以来的工作，邀请陕西省委书记处全体成员和西北局各部、委、办主要负责人列席。正在陕西长安搞社教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也被请来参加。他约胡耀邦作了一次长谈，了解他在安康究竟说了些什么，劝他不要对批评有抵触。

11日会上，胡耀邦汇报了省委一月会议以来的工作。同时，按西北局第一书记的批评作了检讨。

在接下来几天的会议里，批评胡耀邦的气氛不断升高。原来，西北局的书记、部长们事先都准备了发言稿，有备而来。大部分人的发

言都是剑拔弩张，劈头盖脸，对胡耀邦全盘否定，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有人甚至说胡耀邦是反对刘少奇、彭真。

胡耀邦实在忍受不了这些莫名其妙的“批判”。3月14日，他去见参加这次会议的杨尚昆，想向老领导诉诉苦。他说：“西北局这样小题大做，我想不通。”他表示要向中央申诉。

杨尚昆安慰他说：“会议这样开法，我也没有想到。”他劝胡耀邦不要向中央申诉。他说：“要稳住。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四条，我还要发言替你讲话嘛。”

在众人围攻之下，胡耀邦被迫写出《关于〈电话通讯〉中所提处理干部问题四条意见的检讨报告》，于3月15日在会上再作检讨。这已经是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三次检讨了。当时陕西省正召开贫下中农第一次代表大会，西北局又叫他到大会上去向与会的省级厅局党组、党委和各地、县负责人检讨。3月16日，在大会开会之前，胡耀邦出来，忍气吞声地读了一个《口头通知》，说“干部四条”以及省委3月3日发出的《通知》都是“缺乏分析的，因而是错误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他还表示责任由他负，“下面同志不要检讨”。

一连数日，胡耀邦受着揪住不放的围攻、刺激和压力，终于在3月17日病倒了。专家医生们经过两次会诊，诊断为突发大脑蜘蛛网膜炎，需要立即停止工作，住院治疗。

3月18日夜，他忧思难遣，无法入睡。第二天就要住院了，他认为这件事情应该有个了结，于是决定再写一封信，再作一次更全面些的检讨。19日凌晨两点钟了，他披衣起来，扶病奋笔。这封信断续写了5天，直到22日才完成。

3月30日晚，西北局书记处讨论胡耀邦的信，即第五次检讨。刘澜涛对胡耀邦的信表示欢迎，说：“四条，从政治上、思想上说，都是错误的，但是采取了几个措施补救也就可以了。”

3月31日，西北局书记处举行最后一次批胡会。杨尚昆在会上发言，带有居中调停的意思。他对胡耀邦作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说：“耀邦同志确实干劲十足，想把工作做好，想把陕西省农业生产落后于邻近各省的局面迅速改变过来……是不是说耀邦同志的错误已经成为路线上与中央对抗和西北局对抗呢？我看还不能作这个结论。”然而

他认为胡耀邦错误的性质是“政治上摇摆”。杨尚昆还说：3月16日的《口头通知》是个转折点，时间也不长，顶多一个月，没有什么了不起。“总而言之，时间很短，问题不大，问题的性质属于摇摆，不属于路线错误。……省委可以开一次会讲一讲，按胡耀邦的检讨水平写，不夸大，也不缩小，正面提，不提耀邦的名字。”会后，西北局办公厅认为赵守一在会上的发言仍然附和胡耀邦，希望他修改发言稿。赵守一断然地说：“我的发言不改了，我宁肯犯支持耀邦的错误，不犯出卖同志的错误。”

就在同一天，西北局要求陕西省委把胡耀邦的第五次检讨报送中共中央，并加发到陕西省各市、地、县委，把批胡问题在全省公开。

胡耀邦毕竟是“京官”外放，他在西北的状况自然引起了北京同僚和老战友们的关注。一天，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给胡耀邦打来电话，关切的问他：

“听说你在西安出了点事？”

“是，我已经受了几次批判，几次检讨还过不了关。”胡耀邦告诉余秋里。

“你在西安谈不清，你回北京谈，我跟贺老总谈谈。”余秋里给他出主意。

没过几天，叶剑英偕同总参副总长张爱萍和张宗逊来西安考察军事工作。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举行欢迎宴会。在西北局、陕西省委和省政府为叶剑英等人接风的饭桌上，张爱萍望着面色憔悴的胡耀邦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又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

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剑英告辞，叶剑英说：“耀邦，你留一下。”

胡耀邦单独留下后，叶剑英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怎么回事？”

胡耀邦说：“您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6次检讨，还过不了关！”

叶剑英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

胡耀邦说：“我走不脱呀！”

叶剑英说：“我带你走嘛！”

于是，胡耀邦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碍于叶剑英这层关系，只好顺水推舟。6月20日，胡耀邦同叶剑英一行，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就这样，胡耀邦主政陕西总共200多天，其中工作100多天，挨批100多天。

胡耀邦回到北京养病，西北局和陕西省委对他的批判却没有停止。1965年7月13日到8月4日，西北局在兰州召开工作会议，议题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讨论社教问题、计划问题和工业生产问题，但是会议占很大份量的是揭发批判胡耀邦的问题。其后，中共中央鉴于胡耀邦再回陕西事实上已很困难，10月间，免去胡耀邦在西北局和陕西省的职务，调浙江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霍士廉到任后，即被要求召集会议，“肃清胡耀邦的流毒”。稳健的霍士廉推说需要熟悉情况，没有采取行动。文革开始后，胡耀邦还是被当作“西北三家村”的头子端了出来。不过此时，他已回到了北京团中央书记的位置上，西北局也奈何不了他。赵守一和李启明这两个西北局的干部可就没有他这样幸运了。

在此期间，西安还发生了西安交通大学“66事件”。

西安交大自6月1日晚上出现矛头指向校党委的大字报后，到了6月2日，批判校长彭康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数以万计。学校秩序大乱。

彭康二十年代就在上海搞地下革命，曾加入创造社。郭沫若文集中两次提到“彭康后起之秀”。他三十年代被捕入狱，关押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党组织的授意下，写了“自首书”被释放，后任华东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校长是刘少奇。解放后，彭康一直在西安交通大学这个上万人的学校里担任校长，几乎没有听到过批评他的声音。6月1日晚，他主持校党委扩大会，并不知道校园里已贴出了针对他的大字报。6月2日，他来到办公室，看见学生的大字报已经贴到自己办公室的大门上了，气愤异常，立即召开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党员站稳立场，小心上当受骗。会后，学生会主席唐素等一批学生干部很快贴出“誓死保卫校党委”的大字报，但是，已无法扭转大势所趋。大学生在新闻

舆论的鼓动下,已经学会了自己用毛泽东的思想去观察和检验事情,而不是听从其他任何人的指挥。

当晚 23 时许,陕西省委紧急抽调正在西安参加西北局会议的西北 5 省部分县委书记,共 300 余名县团级以上干部,组成由省委书记处书记严克伦亲自率领的工作团进驻西安交大,领导学校的文化革命。

严克伦的工作团刚进校,受到了大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严克伦随即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要求全校同学辩论“校党委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同时,校长彭康宣布停课 3 天,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然而不到一天,工作团就受到学生的怀疑。

因为在 6 月 4 日工作团组织的现场质询会上,学生提出的许多问题,如:

“文化革命如何搞?”

“彭康有什么问题?”

“工作组对当前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等等。

工作团这 300 余名县团级以上干部,是在西北局会议刚开始一天,就仓促来到了西安交通大学。他们没有很好的准备,也没有时间认真的学习《516 通知》,所以,他们自己还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又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

面对学生们提出的一个个问题,工作团一时不知如何应对为好。但又不能在学生面前说“我不知道?”只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应付搪塞。

学生们当然要穷追不舍。

建国十几年来,一直是命令、指示别人该如何去做的省委书记严克伦,什么时候受到过普通学生如此的诘问?在学生的轮番逼问下,他终于恼羞成怒,开始摆架子、训人,这更加引起了学生的不满。本来就在四处搜寻黑帮线索的大学生们简单推理认为:北大——陆平——北京市委是一条黑线,西安交大——工作团——西北局、陕西省委也可能是一条黑线?!

6 月 5 日晚,工程物理系二年级学生、班长李世英,首先带领本班

学生贴出题为“坚决赶走工作团”的大字报。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迎来更多的大字报响应。

工作团立即组织另一部分学生对李世英等人进行围攻。激烈的辩论,昼夜不停。

第二天,6月6日,工程物理系810(41)班学生也贴出大字报,列举工作团“十大罪状”,说陕西省委工作组是冒牌的,省委里有反革命黑帮。

这天上午,一部分学生与工作团辩论,一些学生则组织赴京代表团,跑到机场、车站,要去北京向党中央汇报,还有几十个学生冲出校门,分别到西北局、陕西省委、新华社、陕西日报社提出省委工作组有黑线、省委有黑线的问题,并到电报大楼贴大字报。有的到电信局,打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派人来校处理问题,其中一份电报有1683人签名。工作团慌忙阻拦,校园内一片混乱。

到了下午,学校一遍又一遍的广播西北局、陕西省委《给交大全体员工的一封公开信》。信中说:西北局、省委和省委派到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团都是革命的,交大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西北局完全可以解决。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信中将这天西安交大发生的事情称为“六六事件”,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晚上,工作团开会认为:“漂”上来的一批闹事尖子,说明有一批牛鬼蛇神出笼了,要组织队伍追根子,并在《陕西日报》上点名批判。李世英等5个带头闹事的学生成了反革命分子,李世英则被工作组拘禁。

陕西省委听了情况报告,认为这是一起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

面对西安交大的动乱,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陕西省委指出:西北局、省委和省委派到西安交通大学的工作团都是革命的;交大所发生的一切问题西北局完全可以解决。

事情报到北京,刘少奇、陶铸同意中共西北局、陕西省委的意见,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右派。对陶铸的这一指示,陈伯达没有执行。

西北局、陕西省委向西安市各个单位下发文件通报此事,说交大

校内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图反党，颠覆社会主义。

6月7日早晨，西安交大校园行政楼前又新贴出一张大字报，标题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可笑！》，只有短短几十个字：

“昨天学校广播中声嘶力竭地反复大喊‘西北局、陕西省委是革命的’，这不由得让人想起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故事，西北局、陕西省委的真面目不是不打自招，昭然若揭了。”

写这张大字报的是女学生刘维娜，她个头矮小、天真稚气。此时跳出来，一下子成了第六个反革命分子。

接下来的三天，驻西安交通大学工作团将闹事的“尖子”李世英、杨克剑、刘维娜、赵瑛、王永婷等8人打成“反革命分子”，召开会议进行批斗，要他们“查上当，放包袱”，并将李世英、王永婷、杨克剑、刘维娜、沈丙辰、赵瑛、白天勇等人戴上高帽子在校园内游街。

6月8日，工作团宣布接管西安交大全部权力。此后，在工作团的领导和组织下，从6月初到7月在全校师生员工中，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挖“六六”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全校1000多人被批斗，44名处级干部有29人被定性“黑帮”，912名学生干部中有680人被定性“反革命”。

第 59 回：打压狠，遗书封封催泪滴 看西南，贵州文革序幕掀

李世英等人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得不检讨，但是要承认自己反党，实在有违心愿。无可奈何下，6月9日中午，李世英留下三封遗书，服安眠药自杀，被发现后经医院抢救脱险，关进医院隔离监禁。他在给党组织的遗书，给他的父亲母亲的遗书中说：他不埋怨党，而且告诉他的家庭也不要埋怨党。

第一封遗书是《最后几句话》：“……对每个同学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可是现在说不成了，将来永远也不能说了；假若我的细胞组织不破坏，我会永远怀念你们的！永远永远地怀念你们！！永远，永远，永远怀念你们！！！”

话像一眼泉，涌涌流不断。现在必须要断了！永别了！永别了！！永别了！！！祝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战斗中成长，成为党所需要的共产主义的红色接班人！

老实讲，后台老板，我的确是没有后台老板。硬要说，可以说是党中央、毛主席！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没收了我的《毛主席语录》，这给我打击很大。”

第二封遗书是《终前碎语》：“我感到太离奇了，这些天事情发生得生硬而又自然，痛苦而又有趣。连我自己也很难想象……倒是别人都受了我的骗了，是我‘拉别人下水’，我成了现行反革命……现在，他们（指工作团）都是对的，都是从这个目的出发的，而我倒是从另一个反动的、反革命的目的出发了！事情是这样的离奇！……最奇怪的是，怎么我过去所作的一切事情都成了坏的……不过倒好笑，这几天使我增加了不少生活经验，增加了忍耐能力——可谓涵养者。也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不作贼，则心不虚。无论他们大会斗争，小会斗争，游街，戴高帽子，加上挨拳头，口号的高呼，震耳欲聋，一个个紧握的拳头，直指眼前，可谓群众力量大矣。我丝毫不怕，因为我并没有反革命

思想，在斗争的过程中，戴高帽子的过程中，我也暗暗地说：‘同志们，你们斗错了！你们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心情十分平静，这时，我的头脑也相当地清醒……

谈这些还有何用呢？现在还是考虑考虑我现在的心情吧。恋恋不舍呀！祖国壮丽的河山；恋恋不舍呀！社会主义的宏伟建设；恋恋不舍呀！共产主义伟大远景；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同学；恋恋不舍呀！亲爱的妹妹；恋恋不舍呀！年迈的父母；恋恋不舍呀！熟悉的校园；恋恋不舍呀！今后我要做的事情；恋恋不舍呀！……

然而留恋无益，我也考虑过：活下去今后为革命事业还能尽力，但却还要人家监视我，这样，消耗别人的力量比自己贡献出的还大。所以留下来无益，还是去的好！马上就要发生一个质变了，这是生死的质变。迎接它吧，不过心中不舒，因生为革命人，死后却成了被戴上反革命帽子的鬼了！呜呼，呜呼，此冤何时伸也！去了，去了，远了，远了，永别了……冤枉啊！问题算不清，死难瞑目！”

第三封遗书是《给父母亲》：“……我一向不关心家里事，父亲、母亲操劳、教育二十余年，然未得粒米之报，盖不会感到吃亏吧，不要紧，我自己已将自己二十余年大部分贡献给党的事业。孩儿作得如此不好，父母亲该责孩儿不力！望父母亲多辛苦，自力更生。望……勤教三个小妹，使她们更好地成长。望……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不可再舍不得自私的想法。望……在儿死后，不要埋怨党，不要埋怨同学，不要埋怨组织，心胸开阔，健身长命。千言万语，忍心截止。”

工作团要求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赵瑛考虑自己的前途与下场，赵瑛写出一首诗歌《前途与下场》作了回应：

“前途！前途！谁要这个前途！

为了个人前途，可耻！可耻！

个人主义是毒辣的怪物

它使人说话与事实不符

它使人费尽心思达到可耻的目的

它使人忘掉国家的前途！

受到打击我心中痛苦

但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光明大路

看到了敬爱的毛主席像
我痛苦就完全消除！

我
对毛泽东思想无限崇拜信仰
伟大的思想给了我巨大力量
在一片喊打声中
我不能倒下
倒下了
我要爬起来！
起来！
一定要起来！

不顾个人利益
不管名声多臭
计较名声不是共产主义者
计较这些不是革命者
为了党的利益
为了共产主义
有什么可计较的呢？！

下场！下场！
管他个下场不下场
革命者不应该管自己的下场
若要考虑这些
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呸！个人下场，呸！个人前途
虽然我只有二十岁
但我要它们滚蛋！

过去的胆小鬼

今日却一切都不顾
什么缘故？什么缘故？
因为我信仰毛泽东思想
心中有了共产主义，有了革命
一切不顾走革命的路！”

7月9日，西安交大的校学生会劳动生活部部长王永婷，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往日的同学朋友都疏远了，反目成仇来揭发自己，更不能容忍的是，把自己的私人日记和与情人的通信公开亮出，进行人身攻击，王永婷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她忍无可忍，从宿舍三楼翻身跳下，以死抗争，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对她的死，工作团说：“一个反革命的死是咎由自取”。即把责任推到王永婷身上，又强迫学生要保密，不准乱说。可是纸怎能包住火，王永婷的死很快传遍全校，震惊了广大学生。一个学生，不过就是给工作团提了些意见，至于把人逼死吗？学生们非常愤怒，但还是敢怒不敢言。其实工作团这时也已惊惶万状，毕竟出了人命。他们立即决定停止批判学生，抛出彭康“自首变节”的档案材料，召开全校批判叛徒彭康大会，以此转移学生对工作组的愤怒。

在西安交大发生“66事件”的当天，贵州也发生了著名的“66事件”，从而拉开贵州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6月5日下午，贵阳师范学院召开大会，省委宣布撤销该院党委书记、四清工作队队长、文化革命工作组长黄辅忠的一切职务，由省委统战部长王林岗任贵阳师院文化革命工作组组长、四清工作队队长、代理党委书记。但不到24小时，王林岗就被轰下了台。

因为6月6日上午，贵阳师范学院师生召开声讨贵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兼《贵州日报》总编辑汪小川大会，批判他直至1965年12月19日才刊登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但同时又刊登反面文章为《海瑞罢官》辩护，有意把政治斗争淡化为学术性讨论。当天的《贵州日报》用三个版面刊登了长篇署名文章《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编辑部文章《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

声讨会结束前，刚刚代理学院党委书记的省委统战部长王林岗在

作总结发言时,不知不觉的讲起汪小川的光荣革命史,说汪小川是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的宣传干事,他犯错误就是“毛主席的书读少了,钻到廿四史等古书堆里面去了,工作之余喜欢写点东西”。

王林岗尚不知道,他的话已经引起了广大师生的公愤。下午,声讨王林岗的大字报便雪片般飞来,“立即撤销王林岗代理党委书记”、“斗倒斗臭王林岗”的大标语也刷出来了。

省委立即派人来看大字报,各系纷纷召开紧急会议,这些都如同火上浇油,师院师生怒火越烧越旺,广播室反复播放声讨大字报、呼喊“打倒王林岗”的口号。一些系的同学还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到大街上。

晚饭后,系与系之间开始串联,声势更大,调子越升越高,不少大字报的矛头指向省委。他们到省委贴大字报,质问省委,到省广播电台要求电台播送他们的大字报,向西南局、中央发电报反映情况,上千人到《贵州日报》社张贴大字报,提出“要彻底揭露省委‘舍车保帅’的阴谋”,“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要求邮局停售当天《贵州日报》。

晚 24 时,学院广播室播送了省委撤销王林岗一切职务的决定,全院沸腾。

事情并没有随着王林岗的撤职而平息。6月7至8日,贵州工学院、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贵阳五中、贵阳二十中、省机械厅以及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等都出现了这样的活动。机关干部、厂矿企业职工也有不少人参加进来,许多人跑到报社、电台和省委去送大字报,给中央发电报、写信。

随着《贵州日报》向全省各地的传播,“66”风暴很快席卷黔贵群山,各州县也飞来了炮轰《贵州日报》的信件。

中共贵州省委向西南局汇报,说学生要“捣毁报社”、“破坏电台”、“上街闹事”,并叫公安厅派人前往省广播电台制止学生闹事。

6月8日下午,省委常委召开紧急会议,他们按照1957年反右斗争的逻辑推断:攻击省委、攻击党报的,就是反党,就是“现行反革命”,把向省委和报社写“质问信”、贴大字报等行动定为“66 反革命事件”,决定进行追查、处理和反击。于是,“68 反击”开始了。

省委抽调干部 130 人组成 7 个工作组,1 个观察组分赴 8 所大专院校,其中贵阳医学院进驻观察组。

贵阳市、遵义、毕节、安顺、铜仁、兴义等市地和省级各厅局所属学校,开展文化大革命共计 153 所,向这些单位共派出工作组 147 个,704 人。

省委派工作组进驻贵州大学,从 6 月 10 日开始反击“66 事件”。据统计,贵州大学公开攻击《贵州日报》的有 119 人,公开煽动、议论的有 135 人。工作组组长刘震东宣布:“凡是参加了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人,都是参加了反革命。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其中有的是主谋策划,有的是充当帮凶打手,更多的是盲从盲动,要区别对待。”工作组点名,中文系教师曲沐是学校里攻击党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物理系党总支委员会是攻击党报的委员会。系总支书记张同生成为物理系的主要批斗对象。物理系主任黄润荣、物理系 62 级同学刘庸都被列为攻击《贵州日报》的“现行反革命”。贵州大学的打击面,占当时在校学生数(不含下乡四清尚未返校学生数)的 50% 以上。

贵阳师范学院学生杨文华在他日记中的这样写到:

6 月 8 日

晚自习时系上通知要交待重要事情,先通知几个人去开会。我们等到十时,工作队的老徐非常严肃地到班上宣布 6 月 6 日我院发生的事是“反革命事件”。我一下子蒙了,啥? 我们热血沸腾参加的是反革命事件?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刘某(我班参加刚才小会的同学)拿出一张大字报底稿念起来。这张大字报点明写质问省委大字报的余生是反革命。另外几个参加开会的立即附和。刘某叫大家签名却没人响应,毕竟把一个同学打成反革命可不是件小事。

质问省委的大字报虽然不是我写的(如果当初的分工是我写质问省委、他写顾惠之的大字报,那当反革命的就是我了,好险!),但我积极地帮着贴、帮着挂,干系是少不了的。我冥思苦想了好久,决定连夜写一张检查。

6 月 9 日

一清早把检查贴了出去,走了十几步又忽然想到,这样做岂不是不打自招,自投罗网。管他的,反正贴大字报的不止我一人,等等看。

我返身把检查撕了下来。

上午的全院师生大会再次把六月六日师院发生的事定为反革命事件，大会发言人声色俱厉，简直把全院师生都当成反革命训斥。他详细介绍了六六那天我院校内校外的情况，这些情况有的知道，甚至自己是目睹耳闻者、参与者，有的则闻所未闻，但忍不住想如果自己在场会参加吗？总之头皮发麻，心有余悸。会场周围有不少从未见过的人在巡视，据说学院已被公安厅的人包围了。真可怕！

下午各系追查反革命，除上午系的大会点的五个人外，又追查出了不少人，我班就有余开生、沈某、黄某、孙某等五人。我也很紧张，紧张得昏乱了，想不起自己在质问省委的大字报上签了名没有，想不起那天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一天要去看几次大字报，唯恐自己被点名，被揪出来。

贵州医学院二年级学生李同庆在6月8日帮助贵阳五中一位同学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到贵阳五中，内容是批评贵阳五中按兵不动、冷冷清清、甚而压制群众运动，而且，写大、小字报要经党支部批准才能贴出。大字报号召“五中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字的有18个学生。

这张大字报被认为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四清后留在医学院主持党委工作的省委工作组负责人陈远吉通知公安局在6月8日当天将李同庆逮捕，并对签名的18人进行斗争。与此同时，医学院一些贴过单位领导、政治辅导员大字报的教师、学生也被打成反革命。院党委规定“每个班都要挖出牛鬼蛇神”，口号是“绝对信任党委”、“依靠工农子女，依靠革命干部子女”。严密封锁与校外、班与班、小组与小组、人与人的联系。检查来往信件、规定活动范围、不准交头接耳、不准外出，亲友来访需经党委批准，学院气氛恐怖，被隔离审查的有100多人。学生人人提心吊胆，写了大字报集体推敲，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贴出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若听说有人批评，一寝室的人围着哭。有的同学把衣服、洗漱用具带在身边，随时准备坐牢；有的半夜梦中惊叫：“我不是反革命！”

到7月10日，贵阳地区被迫自杀的达189人，其中身亡107人。拘捕206人。在省级八个系统和贵阳市的3万多干部中，打击面达8.

1%。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共有 7200 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对他们开批斗会,还私设监狱关押,遣送农场劳改。仅贵阳医学院在“66 事件”中抓“反革命”受株连 273 人,被逼自杀的有基础部主任朱清干和生化教师林敦英等 2 人,被逮捕的有 3 人。

第 60 回：六月七，兰州城又生事端 斗老师，学校“池浅王八多”

说完了西南，再回到西北，早在 1966 年 4 月杭州会议期间，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就和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商量如何在甘肃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们确定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为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批判重点。

江隆基，1927 年入党，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著名教育家，1959 年调兰州大学，在教育界和社会上有很高的声望。文革初期，他代表学校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提出“五点意见”，想将运动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5 月 20 日，中共甘肃省委先后召开各种座谈会，号召各界积极行动起来，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 月 24 日，省委第一书记汪峰到兰州大学，批评了江隆基。5 月 28 日，他在兰州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批评江隆基所提出的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是“糊涂观浆子观”，说文化大革命中不存在什么“左”的问题，而是一直要反对右倾。于是，5 月 31 日，兰州大学历史系一些学生响应汪峰讲话的号召，贴出《驳“不准质问校领导”之怪论》大字报，还给省委写信，反映校领导有右倾思想，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力。这时，聂元梓的大字报还没有广播。甘肃省委正在兰州饭店召开甘肃省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会议，兰州大学历史系推荐李贵子参加这个会议。

李贵子是兰州大学历史系五年级的学生，来自农村，正在积极要求入党。6 月 2 日，他和历史系一些学生又贴出《我校领导的严重右倾保守思想必须立即纠正》的大字报。

6 月 4 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甘肃省委向兰州市各高等院校派文化革命工作组。以张韬为组长的 7 人省委工作组来到兰州大学。

6月4日到6日，省委副秘书长程萍召集兰州高等学校一些学生在省委座谈，称李贵子为“左派”，并向他“交底”，表明省委对江隆基问题的态度。

6月6日，进驻兰州大学的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动员参加文化大革命。江隆基在会上检查了自己的右倾思想。

6日下午，程萍到兰州大学学生宿舍和李贵子谈话，授意“相同观点的同学可以打破系、班的界限，自动联合起来作战，并用滚雪球的办法逐步扩大自己的力量”。当晚，李贵子找物理、现代物理、生物等系一些学生开会，成立了“联合战斗小组”，后被称为“李贵子小组”。李贵子由于不是党员，被选为副组长，但始终由他和省委保持单线联系，后来担任了组长。

第二天，6月7日，李贵子小组就贴出《江隆基公开诋毁毛泽东思想》大字报，直接点明批判江隆基校长，当即在学校引起强烈震动。许多同学早就对李贵子等人攻击江校长的行为不满，认为他们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贴出大字报反驳。此时，还有大批学生拥到办公楼前进行辩论，并请了江隆基本人出来表态。由于人群越聚越多，后来辩论改到大礼堂内进行，省委工作组组长张滔主持，李贵子等人受到围攻。工作组正副组长相继发表讲话。副组长李磊甚至说：“你们斗争李贵子不如斗争我！”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李贵子。但是，同学不服，工作组直到下午18时收不了场，校长江隆基出面才解了围。

此时，院内师生议论纷纷，空气异常紧张，已有一些同学开始怀疑工作组。当天晚上，有学生向中央发电报、打电话、写信，反映学校的情况，还有200多名学生跑省委去争辩。他们在电报中说：“甘肃省委派来的7人工作组在领导运动中有严重问题，他们不依靠广大的革命师生，却站在少数的别有用心的人一边，造成我校运动的严重混乱。”

李贵子等人当晚也在工作队保护下到省委报告，并连夜写了《关于我校文化革命运动近两日状况向省委的报告》。省委当即准备反击。工作组长张滔布置记下写反对工作组和省委大字报的人名。在西安开会的汪锋打电话给省委传达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六点意见：

一、兰州大学的工作组加强为工作团；

二、叫江隆基来谈话，指出他的“五点意见”是反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今天江在会上的讲话是支持右派；

三、分析明天会出什么事，准备对策；

四、给来省委请愿的学生照相，准备秋后算账；

五、搞一个文告，“指出江的错误，加强领导，放牛鬼蛇神出笼”；

六、若有学生给中央打电话、发电报，要将电话内容记下，将电报底稿留下。

根据刘澜涛、汪锋指示，主持省委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胡继宗、马继孔等连夜召集会议，做出决定：

一、“67事件”是江隆基煽动右派学生赶走工作组，反对省委的严重反革命事件；

二、抽更强大的工作团进驻兰大，发布“文告”；

三、如学生在发布“文告”后不服上街“闹事”，拟调工人对付；

四、到军区动员部队，不带武器，劝阻可能上街的学生。

以上各点，除去军区未同意调动部队外，其余皆迅速组织实施，争分夺秒，和指挥作战无异，只是要对付的敌人是学生。

6月8日清晨4时起，甘肃省委陆续派了150人的庞大工作团进校。8时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后来称之为“六八文告”的公告。公告中说：“李贵子等同志批评学校领导严重右倾，及时揭露牛鬼蛇神破坏运动的罪恶活动，都是正确的。”

从此，对“67事件”中反对过李贵子、反对过工作组、怀疑过省委的师生进行疯狂的迫害。各系各班追查每人在“67事件”中的表现。大批师生被打为反革命。学校设立“自首台”，各处张贴“通缉”大字报，上面详细描绘了“67事件”中的“牛鬼蛇神”容貌特征。

北京，6月6日，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在工作组主持下，成立了“革命师生代表会”，其中，教师代表2人：数学老师李松文和生物老师陈大文；学生代表5人：刘进、宋彬彬、马德秀、耿丽兰、尹斐。刘进是学生代表会主席，其他4人为副主席。当天宣布复课，恢复正常秩序。所谓复课，就是学生每天在教室里读报纸、学社论，上下课铃照常响。老师不教课了，组织起来也是学社论。工作组的指导思想是让运动有序进行，先揭发，再慢慢梳理，找出问题的重点。

很快，工作组制定了从“普遍揭发”到“重点揭发”两大步骤的计划。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学校的老师和负责人都成了被“揭发”的对象。老师学生之间不再讲礼貌，学生对老师，直呼其名，进而咒骂喝斥。整个学校贴满了大字报，攻击学校原领导人和教师。几乎每个教师都被大字报攻击。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

在大字报上，揭发校长卞仲耘的一条“罪状”是参与前中共北京市委“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且不论是否有这样一个军事政变阴谋，即使有，也怎么会让一个中学女校长知道呢？但当时没有人发出质疑，也不准本人辩解。

卞仲耘的另一“罪状”是“反对党的阶级路线”，主要证据之一是，在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曾经因两分之差未被师大女附中录取，后来进了北师大一附中。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重点中学有录取分数线，对入线的学生，优先录取高干子女。尽管这个分数线相当宽松，刘少奇的女儿仍然差两分达不到分数线。学校请示了中共北京市委和教育局，按照上级指示不录取。

卞仲耘还有一条“罪状”是“反对毛主席”，证据之一是，1966年3月北京的邻近地区发生地震，为学生的安全，学校领导告诉学生，若地震发生，要赶快离开教室。有学生问，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挂的毛主席像带出来，当时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都挂有毛泽东的像，她未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没有说要也没有说不要，只是告诉学生说要尽可能快离开教室去室外空旷的地方。

工作组大力支持，推波助澜，大字报越写越多。这些大字报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并用蜡纸刻写后油印出来，装订成册。

6月8日上午，清华附中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出现了黑压压的一片自行车队伍，他们是海淀区的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地质附中、北航附中等学校以及城区的四中、六中、八中、十三中、二十六中等学校300多人，相约前来声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那时候，自行车是中国家庭上下班的主要交通工具，普通老百姓几乎没有可以给孩子买自行车上学，只有工资收入较高的高级干部家庭才可能让孩子骑自行车上学。由此可见，这次来的几乎全是干部子弟。清华附中的学生

和学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他们怕出事，便以“维持秩序”为名关了校门。前来声援的学生进不去学校，都拥挤在校门外。清华附中副校长、党支部书记韩家鳌，前两年刚刚切掉一个肺，此时不得不冒着烈日到校门外劝解外校同学回本校去，不要无组织地串联，以免发生意外。他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大声呼吁：“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

根本不起作用。

“17 级干部，我们家有好几个呢！”这是攒动在人群中的一句调侃的名言。在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干部子弟心中，是没有把他这个校长放在眼里的。在群情激昂的人群里有人开始对校长推推搡搡，这一下激怒了那些拥护学校领导的学生。高三二班工人出身的宣夏芳，就是在这种激昂的气氛中愤而站出的一位同学。她以“宣战”为笔名写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致×中的干部子弟们》，并且当众朗读，她说：

“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虽然宣夏芳出身没有问题，却为此在其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外校的学生在校门外坚持了 10 个小时后，终于被允许进入校园。他们与清华附中红卫兵一起，在校园里刷了许多大字报、大标语。为了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好几个学校的学生都在自己写的大字报和大标语上署上了 XX 学校红卫兵的字样。其中，人大附中红卫兵和四中红卫兵分别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副对联，一幅写的是：

“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另一幅写的是：

“为革命，纵一死，又有何惧？！捍专政，复永生，血染河山！”

这天，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给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刘晋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 21 时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当晚，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没有声张的进驻清华附中。工作组组长章建华，组员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地团干部，工作组一共 15 人。同时，刘晋也常驻清华附中，指导工作。

次日，6 月 9 日晚，工作组在学校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刘晋在

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称红卫兵是坚定的革命左派。他严厉要求以万邦儒为首的附中党支部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

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大凡当老师的都有个臭毛病，喜欢学习成绩好、举止文明的学生，而不喜欢那些学习成绩差、上课调皮捣蛋、三天两头缺课逃学的学生，所以，在选拔学生会干部或班干部、评三好学生等方面，总是有意无意地偏向前一类学生而排斥后一类学生，并经常给予训斥、歧视。直到这类事情被写上了大字报，很多老师和学校领导才大吃一惊地发现，原来他们一贯喜欢的那些学生有很多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他们不喜欢的甚至惩罚过的那些学生，原来有很多是工农家庭出身的。这是什么“阶级感情”？这些校领导和老师们爱什么人？恨什么人？他们要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他们希望哪个阶级的子女学好文化知识以便将来骑在哪个阶级子女的头上？

学校自古以来就是学习的地方，因此，许多学校领导和老师只强调学习好而不关心政治。他们树立的榜样一般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在课堂上宣扬最多的肯定 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思想。那还要不要“突出政治”？

当时学校的中年以上教师基本上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在讲课时或平时与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接触中，难免说出一些带有封建思想色彩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色彩的言论。在课堂上宣扬“封、资、修毒素”的案例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招生中只重考试分数而不重阶级成分，把若干升学考试中成绩优秀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优先招进了学校，自然，相应地就把那些成绩较差的工农子女关在了学校大门外。这是什么阶级感情？

有的老师在上学期间参加过国民党的“童子军”或“三青团”；有的人当过国民党政府的公务员，并且在当公务员期间为了保住饭碗而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有的人在解放前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还加入过共产党的地下党或外围组织，但由于逃难、迁居、家人劝说（当时参加地下党活动是要杀头坐牢的）、党组织被破坏等原因而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了组织，主动或被动地停止了参加地下党活动；有的人在解放前

当过报刊编辑或记者,而在文革中被学生查出其在解放前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有歌颂“蒋委员长”的语句,或“值此勘乱建国时期”、“共匪”之类字样,等等。

当这类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被大字报揭露出来时,人们发现,隐藏在教师队伍里的阶级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感到触目惊心。而这些现象,恰恰印证了毛泽东3月“杭州讲话”中提出的问题。于是,有人就在大字报上写下了这样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也有人画出了本校的“百鬼图”。至于教师队伍中何以有这么多的“阶级敌人”,原因自然被归结为是学校领导“长期招降纳叛”的结果,如果学校领导者本人也有历史的或现实的“问题”,那结论自然就是:该校领导是个混进党内的阶级敌人,长期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企图在学校实行资产阶级统治。这些“问题”,在当时的各大、中学校里是普遍存在的,几乎没有哪个学校是无懈可击的,没有哪一个学校的领导人是可以全身而退的。运动发展到这一步,几乎每个学校都发出了打倒校领导的呼声。

学校里批斗老师、领导、甚至学生的情况非常普遍,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清华附中高六三二班团支部书记王家强、高三二班的宣夏芳几乎每天都会被批斗,而且很残酷。学校无人管理,打人的现象越来越多,先是打学校领导和老师,后来又有打学生的。

第61回：清华园，高干子弟冲在前 霎时间，蒋南翔迅即倒台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李雪峰提出：“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

刘少奇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还要规模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针对各地纷乱的局面，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相机处理”的指示，在会上拍板说：“哪里出了事，就往哪里派工作组，要像消防队员救火那样快。”

6月9日，高教部部长蒋南翔被宣布打倒。虽然6月2日，清华园已经出现了责问高教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大字报。但是，6月3日，蒋南翔依然对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说：“周总理要我负责高教部、教育部两个部文化大革命工作，还要我亲自过问一下西安交大的运动。”似乎颇有信心。

到了6月4日上午8时,清华大学传达李雪峰的报告后,大字报内部馆开放。自控系廖先湜的大字报“清华党委是三家村黑店的分号”,再次将矛头指向清华大学校党委。

当晚19时,清华大学自9班学生刘涛等7人给校党委贴出大学报:《这些事实说明了什么?》

刘涛,刘少奇的女儿。

到了第二天上午9时,清华大学又出现贺鹏飞、乔宗淮、刘涛、胡劲波、袁塞风等高干子弟贴出的大字报:《清华党委应采取积极态度领导文化大革命》。虽然他们只是要求党委站到运动的前列,但大字报的语气却是居高临下,命令式的。

在人们的心目中,党委从来都是至高无上的,有谁敢于对党委发号施令?

贺鹏飞,贺龙的儿子;

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儿子;

胡劲波,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的儿子;

袁塞风,总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袁光的儿子。

一批高干子弟带头反对校党委,使许多人预感到清华党委可能要垮台。随即,清华大学贴出700多张大字报批评校长蒋南翔和校党委紧跟旧北京市委,反对文化大革命。但是,很快又有一万多张大字报反对批判蒋南翔,提出“保卫蒋校长、保卫校党委!”

上午11时,全校召开大会,听蒋南翔《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充分发动群众,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蒋南翔在报告中认真检讨,并表示要积极主动领导运动。下午,校党委组织“你这几年的成长说明了什么?”的讨论,以证明其一贯正确。实习工厂的工人师傅贴出拥护党委的大字报。

6月5日晚,就在北航12位高干子弟聚集在赖锐锐家写大字报的同时,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也在家里由他妈妈陪着写了一夜大字报,还由贺龙秘书帮助修改。

又过了两天,7日,工程物理系04班班长阎淮和阎承志、顾逸东、王国力等4名干部子弟团干部,贴出《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批判校党委为压制运动而采取的各种做法。有同学贴出“清华的聂元梓站出

来了！”的大标语以示支持。这天，清华大学一些干部子弟：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的女儿刘菊芬、刘少奇的女儿刘涛、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再贴大字报，反对蒋南翔和校党委。他们依然遭到大多数党员和党外群众的反对。多数派师生与少数派学生展开了大辩论。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杨涛不顾工作组的劝阻跑到清华大学张贴反对清华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声援批判蒋南翔，“揭露”蒋南翔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班开学典礼上颂扬邓拓的“罪行”，与清华学生发生争论，而后升级到西阶、大礼堂成为辩论会。会上，邓晓岚、黄志冲、寇世琪、遇平静等发言成围攻杨涛之势。辩论会大长保蒋派志气，到12时30分方散。清华大学派人把杨涛等人押送出校。

到了6月8日，清华大学反蒋、保蒋的大字报、大辩论愈加激烈。一场关于清华党委是“延安”还是“西安”的争论趋于白热化。

这天，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接到北京新市委的电话通知，晚上工作组进校。清华大学党委3位副书记刘冰、胡健和艾知生接待了工作组负责人、时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周赤萍。周赤萍到清华大学的当晚即宣布：次日工作组将接管清华大学，校党委停止工作。

6月初，以教育部办公厅主任赵秀山、司长肖克杰为代表的左派们率先开始批判高教部长蒋南翔。但随后，他们这些炮轰蒋南翔的少数派在本司局都受到了压制。蒋南翔还在教育部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宣部代部长张际春对教育部文革的几点指示。

然而，好景不长，6月8日晚，中央派人召集高教部、教育部两个部的司局以上干部开会，联合批判蒋南翔，批了一夜，说他是黑帮。

6月9日一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张际春的夫人罗屏于来到教育部“辟谣”说，蒋南翔所传达的所谓张际春几点指示纯系谣言。

初夏的这天天气炎热，人们簇拥着、呼喊着“罗屏同志”，争着和她握手。曾经反过蒋南翔的左派们一下子都成了风风光光的英雄，他们扬眉吐气地见到了救星。而保过蒋南翔的“保皇派”则声泪俱下地痛表反戈一击。人们情绪激昂地喊着“向罗屏同志致敬！”“罗屏同志的到来大长无产阶级志气，大灭资产阶级威风！”。蒋南翔闻讯赶到时，罗屏正在院子里热烈地讲演和慰问遭迫害的左派们。蒋南翔例行公

事地试图与罗屏握手，周围教育部大院自发组织的小红卫兵们急得满头大汗地喊，“别跟他握手！他是坏人！”罗屏立即缩回了手。从此，这些教育部大院红卫兵以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形象开始在教育部文革的舞台上显露头角。

这天，张际春在高教部宣布：蒋南翔是黑帮，已被停职反省。

蒋南翔成为中央定性的走资派，是文革前“十七年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总后台”。从此，他成了教育部大院里的头号敌人，被大会批、小会斗。在各司局和全部的批斗会上，他先是弯腰低头接受批判，后来被喝令跪下，常被推来搡去。教育部大院里批蒋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一次，一个初一的女红卫兵厉声质问蒋南翔：

“说！你和蒋介石什么关系？”

蒋南翔莫名其妙的回答说：“没有关系。”

“胡说！你不老实！你们都姓蒋，你们都反党反社会主义！怎么没关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红卫兵怒斥道。

有几位小学三、四年级的小学生，也写了大字报贴在和乐堂后墙上。大字报全文是：“蒋南翔，大坏蛋，白吃人民大米饭”。那稚拙的字体得到了人们的啧啧称赞：“这孩子的革命精神多强！”“文化大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呀！连小孩都发动起来了！”

6月9日，北京市委派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叶林为组长的528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接管校内一切大权。霎时间，清华园内风向大变，反蒋的大字报占了上风。

6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停止蒋南翔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并令其反省。清华少数派倍受鼓舞，欢呼雀跃，许多学生、教师认为自己受了蒋南翔的骗，纷纷起来揭发、批判蒋南翔和校党委，广大群众则对迅速变幻的局势茫然不解，多数派内部迅速开始分化。

这天，在学生宿舍附近的一条小路上，清华大学团委书记方惠坚流着眼泪对工程力学数学系的学生叶志江说：“我犯错误了，也连累你犯了错误。”

叶志江是当时清华大学闻名的高材生。他于1963年秋季入学。1964年上半年便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关于火箭

运行轨道的计算,另一篇是《对“正项级数判敛的一个方法”的进一步讨论》,他提出了自己的推论(定理)并加以证明,而国外一位知名数学家在1954年提出的同样的定理时则未加证明。杂志编辑对此表示了特别的鼓励。叶志江因此受到学校和北京市领导人的关注和接见,并被清华大学树立为“又红又专”标兵。他的事迹刊登在全国十几家报纸上,与当时另一位全国“又红又专”标兵,南京大学的温元凯齐名。

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后,方惠坚和叶志江几乎“形影不离”。在方惠坚的指导下,叶志江贴出保卫清华党委的大字报,受到了主管校共青团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艾知生的大会表扬,说他的大字报“很有说服力”。现在,这一切都已成为叶志江的罪状。年仅21岁,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叶志江无法猜测“犯错误”后会面临何种命运,但他知道很快会失去自由。于是便匆匆赶回家中看望了父母,然后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图书馆,在石凳上默默地躺了几个小时。当他回到学校时,清华园已再次沸腾起来了,人们开始大规模批判蒋南翔。一夜间,各级党政干部,学术权威,乃至部分学生和教师都仿佛去阴曹地府领了封赏,一个个都头顶纸糊的高帽子,成了大大小小的牛鬼蛇神。叶志江这个闻名全校的“高材生”,校党委的“红人”也被册封为“叶鬼”,除了批斗,就是被关押在宿舍里供人观赏和羞辱。

6月11日上午,清华大学工作组副组长召集全校干部大会,宣布工作组来清华“夺权”,并要到会干部“老实交代”。系总支书记、支部书记全由工作组兼任或指派他们心目中的“左派”。工作组提出:“清华大学修正主义是一棵黑树,树干是校党委,树枝是下面所有的干部”,因此,应该“全部打倒”,否则“不能根除”。

于是,学生在教师、干部吃饭的食堂门口贴了一幅对联:

氦氖氩氪氙惰性十足

吃喝玩乐睡不问国事

横批是:一群混蛋

到底是理工科的骄子,巧妙地用元素中期表中的惰性气体讽刺教师和干部。

工作组刚进校,有同学贴出对干部的《十条通令》大字报,工作组说这张大字报“长无产阶级志气,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并在全校

广播,分别在各系宣布、传达到全体干部。这《十条通令》的主要内容是:

- (1)必须彻底交代“黑组织”;
- (2)必须交代假起义,交代幕后策划人;
- (3)6月14日以前向工作组交出“黑名单”;
- (4)没有工作组的许可,都留在宿舍里,随叫随到,等待审问;
- (5)绝对服从工作组的命令;
- (6)不准动工作组同志一根毫毛。

这样一来,所有干部一律靠边站,都被关在屋子里,置于先“上楼”检查、再“下楼”过关的境地。所谓“下楼”,就是以“检查错误,交代罪行,自觉上纲,挖出黑心”为标准,人人检查,逐个过关。于是,干部们整天写检查,写思想汇报、活动汇报,交代材料。出校门要请假,连学生辅导员、级主任也不例外。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做法基本是采用“四清”时《桃园经验》的做法,群众形容是:“游街一大串,斗争会一大片,劳改一大队。”

6月12日,党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前高教部长、前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停职反省。北京大学师生前往声援时,张承先驱车前往,要求师生们返回学校并以“如不马上回校,就记下你们的名字”相威胁。

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接管学校各级组织后,将112人定为走资派,16人打成反动学术权威,50多人当成牛鬼蛇神。

清华处于混乱、瘫痪状态。从11日开始,清华园内出现乱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这是学习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介绍的农民斗地主时给地主戴高帽子的做法。系里同学抢不到校级大黑帮,就把系领导和支部书记等小黑帮,以及一些辅导员和学生成干部分等保皇派,戴高帽子游街示众,甚至出现谩骂推搡等野蛮行为。12日,游街现象愈演愈烈,从早到晚,清华大学到处是自发游斗“黑帮”的散乱人群,工作组多次劝阻不能奏效。直至深夜,工作组还在通过广播台广播,劝说同学们回去睡觉。

6月13日,叶志江第一次被学生揪出去带高帽子批斗。因为他不老实,故意弄坏三顶戴在头上的纸帽子,数力系的一个学生将一个装

了墨汁的痰盂扣在他的头上。他从头到脚都被泼上了墨汁,真正成了一个“黑人”。叶志江悲愤莫名。但就在此时,他看到站在面前的低年级学生陈育延眼中充满了同情的眼光,心中生出很大的安慰。

14日,工作组为了结束基层的无组织状态,各班选举文革小组,系里选拔文革委员会。

15日,在工作组和各级文革领导的共同努力下,清华揪斗乱象迅速得到制止,谩骂和人身攻击的漫画和杂文被禁止。清华园恢复了平静。至16日,清华大学有103名干部被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

工作组力图把清华文革运动纳入他们的领导轨道,他们不同意学生们揪斗干部并将干部戴高帽游街的做法。一些工作组组员批评那些搞戴高帽游街的学生觉悟太低,没有政治头脑,是一群乌合之众。工作组的努力受到一些师生的反感或抵触。

起初,反对校领导的学生们对工作组进校是热烈欢迎的。因为,工作组一进学校,便宣布接管学校的党政大权,致使原先的校领导处在接受审查的地位,事实上“靠边站”了,这对反对校领导的学生来说,是重大胜利。其次,在中央和地方党政组织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的同时,也对少数在前一阶段的“揭批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中被证明是“罪行”严重,且“民愤”很大的某些校领导做出了组织处理决定,例如:原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匡亚明等,被停职反省或撤销一切职务,而这些组织处理决定通常是由进校后的工作组宣布的。因此,工作组进校后,在全国校园中普遍又掀起一轮新的批判校领导的高潮。

但是,很快工作组就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十分矛盾尴尬的境地中。

首先,他们在任何公开的场合都必须表明自己是热烈地、无条件地拥护文化大革命的,是支持革命师生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否则的话,派出他们的前提条件就不存在了。而实际上,工作组甚至派出他们的各级党政领导人,绝大多数不清楚发动这场运动的意图和运动发展的方向,不知道这场运动到底该怎么搞,甚至对这场运动本能地有一种恐慌。正像刘少奇对李雪峰说的那样: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

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

把矛头指向吴晗一类人，实际上是指向所有的知识分子及受这些知识分子教育、影响的学生。因此，工作组进校后，普遍在师生中“摸底”，对师生进行“左、中、右”排队分类，秘密召集所谓“左派”学生开会，或指派“左派”学生悄悄搜集其他师生的言行材料，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了学生们的怀疑和不安。

第62回：生疑问，工作组遭遇轰赶 请“尊驾”，众领导再聚杭州

6月2日，北京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3人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学生们议论纷纷，有人质问工作组“是从哪里来的？”派遣机关“是新市委还是旧市委？”“为什么不带介绍信？”

工作组成员马上回答说：“这就派人回去取介绍信。”

这时又有学生登高大呼：“他们想逃跑！”

当天，工作组和校党委被包围，校党委自认“瘫痪”，无法召集会议，各系联系中断。直到6月6日，学生对工作组的怀疑仍未消除，工作组的一言一行都有人记录下来，更有甚者，还把工作组的讲话录音，然后逐字逐句予以批驳，并派代表携带录音到新市委和中央机关告状。

工作组进校伊始，各校都发生了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两派相互之间的辩论、指责和批评，双方互不相让，对立情绪极重。拥护工作组派人多势众，既有《毛主席语录》为依据，又有工作组的支持，一时间占尽上风。反对工作组派势单力薄，但一方面他们也从毛泽东的讲话中找到武器，另一方面有中央报刊不断的鼓舞，虽然受压却绝不屈服。他们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根据《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精神，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八条指示”限制了师生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有人甚至援引宪法，认为学生应该享有言论和成立学生组织的自由，即使上街游行也是合法的。

某中学的大字报栏中贴出这样一张大字报，开头援引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下文据此论证说，学生组织是合法的，上街游行也是正当的权力。这张大字报被人框上了一副对联，上联为：奇文共欣赏；下联为：疑义相与析；横

批是：新天方夜谭。

校园里群众中的两派开始逐渐形成。工作组面临着相当严重的形势。拥护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终于在部分学校引发了一场“驱逐工作组”运动。

6月4日，北京邮电学院的学生喊出“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此时，该校工作组进驻时间仅仅4天。愤怒的学生赶走工作组的原因，是因为工作组公开要保校党委。少数学生高喊：“保皇的工作组快滚他妈的蛋！”有的学生把工作组的行李扔到墙外，连脸盆都砸扁了。

很快，邮电部又派出以邮电部政治部主任朱春和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该校。中央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6月13日到北邮讲话，说明工作组是革命的。结果招致部分学生给他贴了一批大字报。

继北京邮电学院赶走工作组之后，几乎所有学校都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许多学生引用毛泽东《送瘟神》的诗词，在操场上、饭厅前焚烧纸糊篾扎的“瘟神”，高唱“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与此同时，一些学校的学生还刷出了大标语，如“革命不需要保姆！”、“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等。

但是，这些反工作组的学生们并不知道，工作组以及站在工作组背后的上级党政领导人早就张网以待，就等着“右派”学生们自己跳出来了。

6月10日，北京金融学院金融系10名青年教师和系里的一部分学生组织群众集会，揭发院系领导的问题，并把矛头指向了商业部派来的工作组。院党委书记陈如龙和工作组说这是“向党猖狂进攻”的反革命事件，10名青年教师被打成反革命。工作组召集金融系的教师干部在当天下午和晚上连续两次组织斗争会，强迫这10名教师承认自己是“反党”、“反革命”的行为，要求他们交代“反党纲领”。宣布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在工作组和校党委的鼓动下，许多群众不分昼夜到那些被打成反革命的教师和学生的宿舍围攻、声讨、斗争、示威，在楼道走廊、宿舍内外、床上桌子上、书上，到处贴满了“打倒XXX”，“反革命”，“反党分子”，“混蛋”等标语、口号，甚至把标语、漫画贴在他们的背上。学校还让同学昼夜站岗放哨，拿着木枪、木棍看守他们，对他们实行隔离，限制自由，不准他们找

人谈话，监视他们的一切行动，即使到了半夜一点钟以后，还有人每过一会儿来敲打一次门，不让他们睡觉。

北京最早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力求最大限度地稳定学校的局势，以保障运动按照上级的意图发展。鉴于北大党委及所属党总支，除聂元梓掌握的哲学系外已全部陷于瘫痪，工作组首先吸收了原北大党委副书记戈华和原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张承先认为戈华、崔雄和陆平“黑帮”不是一伙的，在旧党委内，与旧党委是进行斗争的、受排挤的。

紧接着，中央又从国务院部委、各省市和海军航空兵领导机关抽调大批人员参加北大工作组，进驻校、系两级机构。6月7日，从校到系已全部实现了工作组的领导。到6月10日止，北京大学工作组已有成员208名。其中地方干部122人，军队干部86人；13级以上高级干部62人，14至17级干部83人，18级以下干部63人。

由于6月1日后，来北大声援、参观、看大字报的人群络绎不绝，从未间断。6月7日，北大工作组规定：外校人员不得自由出入学校内部。当天，北大校门口贴出公告，要求“外单位声援的代表和队伍，一律在学校门口接待室接待，请不要进入学校内部。校内大字报正在整理，暂不开放。”

这一公告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

6月9日，张承先在给李雪峰上报《北大文化大革命一周基本情况和初步打算》中表示：“要彻底摧毁北大这个被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的反动堡垒”，把“领导权夺过来”，“批判和清洗好那些混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报告的最后，张承先指出：“北大当前斗争的焦点是要挖掉钻入党内的以陆平为首的这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黑帮。”“集中力量对准反革命黑帮的核心集团大揭、大批。”

然而他并没能控制住局势……

6月10日，北京大学的大批判开始从大字报的文字批判发展到人与人面对面地批判、揪斗、乃至动手打人的现象，首当其冲的是陆平与冯友兰、冯定、翦伯赞、朱光潜等人。他们被学生批斗、抄家后，又被关进了牛棚。从6月初到6月中旬，北大各系各单位发生的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从戴高帽子、挂黑牌、推搡，发展到揪头发、坐

“喷气式飞机”、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张承先让工作组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无济于事。据当时的北京大学工作组秘书处统计，到6月17日止，被乱打乱斗的干部、教师、学生达178人，其中有“黑帮分子”45人，有错误缺点的120人，属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这“五类分子”的7人，斗错了的好人6人。

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前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出来交代问题，稍有不顺，便以拳脚相加……

张承先忧心忡忡，深怕矛盾升级，再度发生更大的武斗。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6月7日，周恩来电话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准备9日来杭州，毛泽东同意。

这天，康生电话请示毛泽东：有些文章提到周扬问题，要点周扬名。毛泽东说：“待常委同志来后再商定。”

当天，毛泽东还批复同意邓小平6月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陶铸调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后，书记处各书记调整分工的报告。报告说：邓小平负责中央调查部，陶铸负责中央办公厅、中央宣传部及文教办公室、中央组织部，李富春负责工、青、妇及中央统战部，康生负责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谭震林负责中央监察委员会，李先念、叶剑英、李雪峰因主管专门工作，故未分工管理中央部门。

6月8日凌晨1时，毛泽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6月7日关于重新调配中宣部副部长等问题的报告上批示：“九日会议拟请陈伯达、汪东兴及各大区负责人都参加，是否可以，请酌定。”

6月9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再次由北京飞往杭州，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陶铸等汇报有关工作，研究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问题。

会上，刘少奇恳请毛泽东回京亲自主持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谈笑风生，却说暂时不能回京。往年，他喜欢在冬日去杭州，毕竟江南暖和，气候宜人。如今，已是初夏了，他反而要住在杭州。他从1965年春离开北京后，几乎没有再回北京。

汇报时，刘少奇说：“学校的文化革命准备采取三种办法，一是夺

权,这是少数,也就是像北大那样把黑帮黑线篡夺的领导权夺回来;二是批判学术权威,如批判像翦伯赞、匡亚明那样的反动分子;三是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系列的问题。城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可以和四清结合起来搞,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比 1957 年反右派的规模还要声势浩大,所定的右派人数要超过 1957 年。学校单位的夺权斗争基本上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要涉及到中学。”

康生似有不同意见,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否重点是整一些右派?值得研究。如果只是在学校和单位像 1957 年那样抓右派,是否扩大了打击的范围?也未必符合主席这几年来的指示。”

毛泽东说:“听听群众的意见吧,我们不忙着下结论,也不要匆匆忙忙地派人下去。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之前,任务是讲不清楚的。牛鬼蛇神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搞了一些什么名堂?你刘少奇知道吗?你们这些常委们就都清楚?也不一定,我是不清楚的。但是群众清楚,人民清楚。只有把他们发动起来,把政策交给群众,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才能搞好。过早地派工作组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利。”

“这场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他们一定要和我们较量,你想避免也避免不了。我这人一直奉行三条政策:第一不为天下先,即不打第一枪;第二退避三舍,讲究一个‘让’字;第三礼尚往来,君子动口不动手,小人动手我也动手。”

“吴晗这些人搞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也可以。社会很复杂,只搞社会主义而不让搞资本主义,不是太单纯了吗?不是没有对立统一,只有片面性了吗?我看就让他们猖狂进攻,也可以上街游行,拿上枪来搞政变、搞叛乱,我都赞成。事情都是要有一定的限度的,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出现。出现了也好,也是正常的,我们无非退出城市,再到农村打游击,或者叫我们的后代再搞一次革命罢了。”

刘少奇认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极而言之的,无论如何不能让运动搞到那个地步,所以,该怎么办,一定要有决心和办法。当毛泽东说道:“所以派不派工作组不是主要的,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不

要急于派工作组。你们看怎么样?”

刘少奇则坚持说:“还是不要乱,一乱就难以收拾了。最近西安交大也发生了一些事。工作组进校以后,引导学生们批判‘三家村’黑帮,但个别人对此不感兴趣,总想把矛头对准校党委。工作组让他们讨论校党委究竟有没有问题,是红还是黑时,他们又想搞工作组。”

“胃口越来越大!”陶铸说。

邓小平说:“对这些人来说,他们就不是要斗黑帮的问题了,而是要斗垮我们整个的党。”

“我就不信他们会整垮我们的党。”毛泽东说,“不过也有例外,就是我们党自己烂掉,像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那样。他们名义上还是叫共产党,其实已经变成社会民主党了,和我们的国民党差不多。所以,我们下决心要搞这场文化大革命,不能让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6月10日,毛泽东在周恩来、林彪、邓小平、伍修权陪同下,会见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心。毛泽东讲了他对当时的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说了一些更加振聋发聩、令人深思的话。他说:

“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73、84。我明年73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杜甫有首诗说:‘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

“我劝你,你们的人不是都忠诚于你的。忠诚的可能是大多数,但小部分可能是只在口头上叫你‘万岁’,实际上是希望你早死。他叫你‘万岁’时,要注意,要分析。越是捧你的越靠不住。这是很自然的规律。一个党不分裂?没有那回事。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The division of one into two,对立统一。这不是我发明的,是列宁发明的。什么是我的发明呢?明明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说的。事物总是有两个对立面。你们党如果只有完全的团结,没有对立面就不符合实际。全世界的党都分裂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料到他们的接班人伯恩斯坦、考茨基成为反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立和领导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等,在他们死后就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这条不注意,要吃亏的。”

“中国现在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都是你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你不是问，以前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是知道的……罗瑞卿的问题，1959年整彭德怀时，有人提议他当总参谋长，我们有些人不赞成。后来，提他当总长的同志就挨他整，一共整了六年时间。提他的人是他的上级，现在反过来挨他整。”“彭德怀是国民党的团长，同我们打过仗，后来投机；历来都犯路线性的错误。罗瑞卿是同彭德怀合作过的。彭德怀、罗瑞卿、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他们都是一伙，为什么这么久才揭露？我们是要看一看。他们还里通外国。”

第63回：激情烧，革命火燃在江城 六一三，南京市党报被围

6月11日，刘少奇在杭州文化革命汇报会上对李雪峰等人说：

“中央常委们的意见，是在北京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搞夺权。这是新的反右斗争，在局势明朗的情况下，学校党团组织可以及早改组，即整党整团。当然，这里主要靠我们抓对工作组的领导，没有工作组，我们的领导就断线了，学生中、教师中的那批右派分子就会翻天。政策还是要注意，对问题较少的干部要帮助，无非是检讨，尽量不掉进三类，内外有别要注意。”

李雪峰问：“学生中的右派要定多少？”

“不要定框框，有多少就定多少。”刘少奇明确回答。

当晚，毛泽东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先问各大区负责人，群众的情况，大家都在作什么？各大区书记相继作了汇报。

西北局刘澜涛汇报，毛泽东不太感兴趣。

华北局李雪峰的汇报，毛泽东也没有什么表示。

各地的汇报都一样，就是讲如何派工作组下去解决问题。

运动已经发动了，刘少奇讲要放手发动群众，谁放手？放手放到谁的手上？各大学的党组织都没有了，如何领导运动？对这些问题，各大区的负责人都不清楚应该怎么办。

当大家问到是否派工作组时，毛泽东态度和缓的说：“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组。”他说：“大乱一下再说。我们规定一下政策，现在还产生不出来，还看不清楚吧。”

他接着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不一定派工作组，右派捣乱也不可怕。北大一张大字报，把文化革命的火点燃起来了！这是任何人压制不住的一场革命风暴。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凶猛，左派特别活

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但一般不占优势。打击面宽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后分类排除。”

“要在运动中把左派领导核心建立起来，使这些人掌握领导权。不要论什么资格、级别、名望，不然这个文化阵地我们还是占领不了的。在过去的斗争中出现了一批积极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涌现了一批积极分子，依靠这些人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针对学校中发生的动手打人现象，毛泽东指示说：“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今后不许打人，要摆事实，讲道理。在同学中取消保皇派这个名词。”

他还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

6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搞法时，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中央要搞个高中、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办法是学校推荐和选拔相结合。初中还要考试。今年大学招考推迟半年，闹半年文化大革命。高中、初中不变。教材要重编，初中、小学语文课本中，有毒的要去掉。过去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搞不动，改不了。这次要趁此来个大改革。大、中、小学如何教法，都要有典型。大学师生要互教互学。学生不读书了，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

当有人谈到文革这样搞下去涉及的人会不少时，毛泽东说：“打击面也不会太多，百分之五就不少了。”

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广播和印发，同样引起武汉各高校的轩然大波。许多学校纷纷贴出大字报响应。

6月2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一年级学生游华生贴出大字报，批评院党委对运动缺乏热情。

华中工学院则流传：“北大有鬼，我院也有鬼！”

.....

由于各学校均产生了对文革运动和领导做法的种种猜疑，6月3日，湖北省委指示各大专院校党委，要积极掌握运动的主动。

这天，武汉大学召开全体师生员工的紧急动员大会，传达了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报告。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庄果在作动员报告时正式宣布：“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党办主任）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连陈独秀都敢顶的李达当然不服，动员大会后，他向庄果要他的“罪行”材料看，几经要求，6月5日，庄果终于将学校“教育革命领导小组”5月初整理的那份“初步材料”交给李达。李达看了三遍，逐条反驳。他说：“材料绝大部分是造谣，他们把话变了样，王任重看过加了按语，只听他们的，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不听听我的情况。”“他们讲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反动派，我怎么能承认？我到死也不能承认是反动派！”

6月7日，在省委驻武汉大学教育革命领导小组的主持下，召开了全校三级干部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揭开武汉大学阶级斗争的盖子，将目标集中对准校长李达、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3人。

从此，李达再也没有安宁过。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写书，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着他的助手们也被强制性地“集中”起来，强令写出揭发检举李达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电话被剪断，北京的来信也被拿走。

8日，王任重召集湖北省文化革命工作会议，并且重新提出1957年湖北省委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几点意见，作为当前文革运动的指导。王任重说：“文化革命是全党的事，工人、农民的事。运动的打击锋芒主要是知识分子。”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开贯彻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会议，决定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和文化艺术界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指出要把革命斗争的矛头指向“‘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但是,仍然有人按照自己对聂元梓大字报的理解,查询毛泽东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锋芒所指。武汉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学生、正在咸宁县参加四清工作队的工作队员杨家志在读了王任重刊于5月4日《湖北通讯》增刊上的文章后,颇认为王任重有些“煞费心机来遮遮盖盖”,于是在6月8日给王任重写信,下定决心公开批评王任重在“1962年的右倾”和1966年的企图“混关”,直书王任重书记,从“仅仅是美化帝王将相吗”、“你忘了阶级斗争没有”、“不准散布历史唯心论”、“是清理,还是混关”四个方面,穷追王任重的自我检查,认为他生怕触到事情的本质,并谈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革命激流中,来洗洗自己的头脑,这对我们都是必须的。你何乐而不为呢?你说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结果,杨家志同学被开除了团籍和工作队员资格,批斗一周,继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6月9日,武汉二中学生贴出大字报《炮轰党支部》,消息在全市中学界不胫而走。省、市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24小时内派出600人的工作组奔赴部分中学,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到这时,分赴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业已组织,陆续出发。至6月中旬,省、市委紧急动员派出的各类文革工作组组员已逾万人。

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决定将李达与武汉大学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作为武汉大学的“三家村”。这是全国所有高校被“揪”出来的第一个“三家村黑帮”。

6月11日,武汉中原机械厂附属技工学校学生贴出针对武汉市委书记宋侃夫的大字报《敬告宋侃夫》,对市委表示不满;第一冶金公司附属第一中学学生,成立了“革命行动小组”。省市委对此感到十分震惊,他们最直接的本能反应,就是学校里出了反革命分子。宋侃夫亲自去了中原机械厂,省委派出160人的工作组到一冶一中,力图压制造次的中学生。

11日,陶铸匆匆指示中南局:“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不过他的这个指示精神,并未传达到湖北基层群众,在中层干

部、教师、学生群众里对此仍然存在歧义和激烈辩论。

6月12日上午，湖北省委工作组的李凤祥组长，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师生员工大会上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传达了毛泽东《五七指示》中的一段话：“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话音刚落，没有任何人暗示或指点，集中在院体育馆里的3000多听众，轰地一下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并发出了长时间的“呵…呵…”的欢呼声。一种与天庭豁然贯通的神圣感，抽紧了大家的心，很多同学的眼边挂着泪花。

工作组进驻水利电力学院的7天，是不眠的7天。这里就像一堆干柴，轰然起火；沿校区大道匆忙树立的大字报栏，贴满了大字报。同学们的狂热、兴奋程度，超过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武昌的工人给大学生运来了白纸和墨汁，他们的洗脸盆盛满了浆糊；人与人也好像一下子亲近了很多。感情冲动，思潮澎湃，激情与热泪相融。尽管李凤祥组长仅仅是中南民族学院的一位处级干部，但他代表了省委来领导运动，不少同学去找工作组，去述说党委领导运动的不得力，去述说自己的怀疑。尽管院党委没有靠边，但已有人写出大字报，说张院长、张书记、副院长是“张家村”，主抓教学的副院长，自然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特别是党委宣传部胡部长，鉴于他的工作属于性质敏感范畴，多年来在干部、学生中，又颇有不良印象和一些颇为出格的言论，自然成了众矢之的。当时学生并不真了解学校的历史、人事内情，所列举的领导罪状，无非都是“抵制毛泽东教育思想”、“抵制文化革命”之类，许多问题确实是捕风捉影。党委领导在公开场合，什么也讲不出来。而且有口也似难讲清白。

6月13日，武汉大学召开“声讨珞珈山三家村反动罪行大会”。先让李达在家听实况广播，散会前，保卫科让人把他揪到会场示众斗争，3次按下头，并被摄像。当天，武汉市118个单位十几万人来武汉大学声援和声讨，人流长达数里。接着又有数十万群众，夜以继日，敲锣打鼓来到武汉大学，持续半月之久。美丽如画的珞珈山校园成了节日盛宴场地，武汉大学作为湖北省委在这次运动中的样板，挖出27名“黑帮分子”，内部掌握91人；武大党委常委有13人，其中9人被斥为

“黑帮”。与此同时，湖北各地、市、县也召开各种声讨大会。

6月13日这天，《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向社会公布武汉大学揪出“珞珈山三家村”，发表报道和社论，同时发表王任重6月7日对武汉大学的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截至15日晚上20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武汉大学的师生员工的共达2000多个单位近30万人，送来声援书10万多张，声援信5500多封，从全国67个县市来电784份。

6月13日，就在南京大学批斗校长匡亚明的同一天，南京发生了“613事件”。

这天，江苏省报《新华日报》登出了一篇《坚决支持南京大学师生的革命行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江苏省委文革小组审定的。但是，南京的少数大中学生对这篇文章提出很多批评和责问，认为文章把揪出匡亚明的功劳加在省委头上，说是省委及时发现的，从而给省委定下不容怀疑的调子。他们还对这篇文章中的“匡亚明在六·二事件中走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句话不满，认为这个论断掩盖了匡亚明长期以来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包庇黑帮”的嫌疑。

6月13日中午，南京农学院两位同学给《新华日报》贴了第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这里有鬼》。不到两小时，报社内外贴满了大字报，要求《新华日报》和江苏省委对这个问题加以澄清，承认错误。报社部分工作人员虽然手拉手筑成好几道人墙，也阻挡不住到报社内贴大字报进行辩论的群众。江苏省委认为这纯粹是无限上纲、无理取闹，采取了坚决措施。于是，公安局的人员来了，很快增加到几百人，他们同报社的工作人员一起，把到报社内贴大字报和进行辩论的群众赶了出去，然后关上铁门，惟恐进来一个学生。门内外严阵以待，如临大敌。继而又组织了100多名便衣混杂于人群之中。接着，外边的公安人员和便衣不时从外边拉进一些认为是领头闹事的学生和青年工人。

事件延续到第二天，6月14日，逸仙桥小学一位少先队辅导员因爬墙贴大字报，被公安人员拉进报社，最后用吉普车把他押到公安局。和这位辅导员同时被拉进报社、遭到围攻、被扣上“反党”帽子的人很多。

当晚，江苏省委召集南京高校党委书记会议，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冲在会上说：“南大有人怀疑省委，怀疑《新华日报》。省委是正确的，《新华日报》也是正确的。谁怀疑省委、怀疑《新华日报》，要开除党籍。”

在省委的高压政策之下，所谓“新华日报事件”在3天后黯然收场，少数参与闹事的人回到各自单位后受到相应处理。凡是贴出和送进的大字报，不管内容、作者，报社都组织人整理了，贴在街上的大字报全部拍了照，照片洗出后，用放大镜一张张把内容整理下来。这是自觉地运用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对待群众。

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江苏省委于6月15日向南京大学派出了由中共江苏省委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汪冰石任队长，江苏省军区副政委梁辑卿、南京军区国防工业部部长杜方平、南京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吴大胜、原南京医学院党委书记林克任副队长的工作队。同日，省委工作队和南京大学党委发出《关于改组溧阳分校党总支委员会的通知》，赵复华、胡才基等人被任命为溧阳分校党总支负责人。

第二天，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向全国宣告“南京大学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紧接这篇社论的，是新华社长篇电讯《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闹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份子匡亚明 江苏省委决定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受到热烈拥护》，该电讯报导了6月12日南京大学批斗匡亚明的情况，并对南京的“六二事件”做出了简要说明。霎时间，地处东南一隅的南京大学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成为路人皆知的“牛鬼蛇神”。

第64回：人大反，孙泱辞职仍被斗 评校长，重庆大学闹翻天

6月14日，回到北京的刘少奇、邓小平又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听取情况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此时，全国各大城市也都相继派出了工作组。

文化大革命的风潮也影响到部队，有些连队也出现了大字报。6月14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做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6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部队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中央在转发批语中指出：“部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高度的戒备和集中统一。”

《请示报告》的主要内容有：在连队和师以下的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各大单位党委要着重抓好宣传、文化、报刊、院校、出版、科研部门的文化革命，进行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整顿；凡是确定要夺权的军以上机关的个别单位，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声讨大会；总政设立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及文化革命办公室。

这份文件发至全国团级以上单位。同一天，叶剑英还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关于建立军委常务会议的请示》。经批准后，凡涉及军队的重大问题，由军委召开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以加强军委的集体领导。

6月8日，人民大学经济系教研室罗肇洪及经济系毕业的7个研究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揭发校党委常委、经济系主任宋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这张大字报的贴出，在全校引起强烈反响。人民大学热闹起来了。各系的大字报迅速像雪片一样贴到墙上。历史系党总支“揪”出了何干之、何洛、冯其庸等“资产阶级学者权威”；新闻系老师甘惜芬被当作“叛徒”揪出来了；研究所贴出党委宣传部长朱真与廖沫沙有联系的大字报；新闻系的一张大字报更令人触目惊心，说前北京市委负责

人借口加强民兵工作,通过北京卫戍司令部调一个团进驻西郊,一个营驻北大,一个营驻人大。真相如何?请校方回答……

大字报越来越多,但都没有指向校领导。校务部派人挖坑埋柱铺席,准备让更多的大字报上墙。

终于,6月11日,共同政治理论课麦农等29人贴出了关于孙泱副校长的大字报,说:“孙泱8号晚上的报告是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的翻版和发展。”“我们对孙泱领导不信任。”国际政治系以党总支书记为首的教工整理出孙泱的言论,说“贯穿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黑线”。

文革初期,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郭影秋调任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人大的工作由副校长、副书记孙泱主持。

孙泱是烈士孙炳文的儿子。当年,孙炳文动员朱德脱离军阀,一同前往上海找陈独秀要参加共产党,遭拒后又一起赴欧洲寻找共产党,周恩来是他们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孙炳文在上海“412政变”中牺牲。因为这层关系,孙泱曾任朱德的政治秘书,其妹孙维世被周恩来收为养女。孙泱1964年春调来人民大学任副校长。见到同学们总是笑嘻嘻的,很和蔼,水平也很高。他看了群众给他贴的大字报后,于当天到市委找到郭影秋,主动提出辞职。

郭影秋经请示北京新市委后获准。6月13日,北京新市委正式发文,撤销了孙泱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天上午,人大的一些人突然把孙泱抓了起来,给他戴上高帽子,架着手臂,拎着衣领,时不时敲着他的脑袋,拖到文化广场。随之高呼“打倒黑帮分子孙泱”等口号。事发突然,崔跃先副校长立即赶了过来。一些人上台发言,会开了一个多小时解散了。由于事先没有准备,决定下午再开斗争大会。

下午,全校开斗争孙泱大会,孙泱低着头在台上站了3个多小时,会场群情激昂,学生的革命热情完全被鼓动起来了,“打倒孙泱”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但此事还是引起了人大师生的种种猜疑。当天,刘梦溪、魏凯等中文系25人即贴出了题为《这是一个绝大的骗局——评新编丑剧“孙泱罢官”》的大字报。

6月14日,人大函授学院的5个人贴出了反对人大党委书记郭影秋的大字报,震惊全校。大字报说郭影秋和陆定一联系密切且深受陆

定一的信任。还说郭影秋是孙泱的后台等。

人大校长是吴玉章，因年事已高，日常工作都是由郭影秋负责，是人大实际上的一把手。郭影秋听说人大贴出他的大字报后，自己写了一份自我检查表明态度的大字报，说自己“犯了很多错误，执行了前市委和陆定一的很多指示，请同志们揭发批判。”

6月15日上午，人大全校的工人自动行动起来，为了表达对郭影秋、新市委及党中央、毛主席的拥护和爱戴！把6月14日贴郭影秋大字报的5个人拖到主席台上，弯腰90度，强迫他们向全校师生员工承认错误。参加社教运动的师生也纷纷上台发言，以大量事实来说明影秋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是贫下中农的贴心人。

此时，西南的重庆大学也已经热闹不堪。自1966年5月4日，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郑思群，向全校作了批判“三家村”的动员报告，点名批判了吴晗及其作品《海瑞罢官》以及北京市的邓拓等人后，政治激情被发动起来的学校师生，很快就将大字报贴满校系各大楼及学生宿舍，矛头指向邓拓、吴晗等“黑帮”人物。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样在重庆大学引起强烈反响。6月8日，以重庆市四清工作总队队长张种玉为首的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大学。尽管他们率先肯定“重大不是北大，重大党委的主流是好的”，但同时强调：“揭发问题不得划框框，任何人的问题都可以揭露。”一时间，干群之间，师生之间，教职工之间，以大字报相互攻讦愈演愈烈，被点名者一时多达170余人。

这期间，校长郑思群赴北京高教部开会，回来又在成都参加了省委“文化大革命动员会议”。当他6月12日返回学校时，看到校内的混乱状况，心急如焚，认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状态绝不可再继续下去了，运动虽然要搞，但正常的工作和教学秩序也要维持。于是他召集党委成员和系、处干部开会，议定立即采取相应措施，把各个办公室内外的大字报转移到指定地点张贴，校园因此有了几天平静。

6月17日黄昏，在学生三宿舍门前出现了一张针对郑思群的大字报，大字报提到的唯一事实是：郑思群1965年到铜梁县去看望当兵训练的学生，带了一头猪，这是腐蚀学生纯洁的心灵。因为学生当兵锻炼是学习艰苦奋斗，带猪肉去给他们吃是物质享受。大字报在提出几

个捕风捉影的疑问之后断然宣布：“以郑思群为首的校党委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黑帮！”

在此之前，学校无线电系揭发出校党委背后整学生材料的事情，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愤慨。尽管如此，但郑思群在重庆大学的威信很高。他1926年参加革命，13岁加入共青团，15岁转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奉命留学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九·一八”事变后回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工科长，曾任著名马列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秘书，冀鲁豫军区宣传部长兼军法处长。解放战争期间，任解放军二野一旅、三旅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重庆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及西南人民革命大学总教育长。1952年10月，以省军级、行政七级干部之尊，奉调来到刚刚进行院系调整的重庆大学，比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行政级别还高一级。

郑思群在重庆大学一干就是15年。在他任职期间，重庆大学日新月异，发展迅猛，短短几年间，便将重庆大学从5个系、8个专业、1000多学生、200多教师发展到6个系、15个专业、7000多学生、900多教师。

他经常到学生宿舍楼里一间一间看望学生，嘘寒问暖，从不摆架子，绝不骂人；上课时，同学们会看见他悄悄坐在后排听讲，有时还掏出手绢擦拭玻璃窗上的灰尘；他还在食堂里当着许多学生的面，把饭桶边上的饭捡起来吃；他走在校园里的时候，会主动跟每一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师生员工打招呼。当时在重庆大学，流传着许多关于老校长的佳话，其中一段是：

电机系67级有位叫郑志胜的学生，家穷没钱买鞋，只好赤脚上课。一天正好在教学楼阶梯上遇上老校长。老校长端详他片刻后，问他为何不穿鞋？又问他在哪个系？哪个班？哪个寝室？脚有多大？第二天，像奇迹发生一样，一个和蔼的陌生人来到郑志胜的寝室，给他送来一双崭新的解放鞋。这位陌生的送鞋人，就是老校长的秘书。

炮轰郑思群的大字报顿时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关注，很快便被惊诧万分的学生围得水泄不通。张贴郑思群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冶金系四年级学生余国华，趁机跳上三宿舍前一棵榕树的石台上大发演讲，重复大字报上那几条的捕风捉影的疑问，反复号召大家对郑思群

黑帮,要“狠狠地打!狠狠地打!”他说话舌头有点大,口齿不清,人们只听他在那里不停的说:“狠狠尼拉!狠狠尼拉!”

余国华是学生干部,预备党员。很明显,大字报的作者是想学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鸣惊人。

那一夜,全校师生无眠。那一夜,整个重庆大学校搅翻了天。有人认为,既然校长都是黑帮,整个学校岂不已危若垒卵?于是一群一群地冲到学校武装部,要夺取枪支保卫学校。

动力系食堂门前,学生们扛出饭桌搭成高台,该系 67 届学生周兴福站在台上痛心疾首地发表演讲,反复动员大家:“同学们哪!大家快回到自己的系班去呀!你们看这么乱糟糟的!怎么搞文化革命呀!”那动作和口气,很容易让人想起抗日时期北平的救亡青年。

机械系二年级 7 个学生还连夜徒步进城,要求市委书记任白戈接见。

那天晚上,重庆大学真正的舆论焦点是余国华所在学生五宿舍。几乎各系各班都有学生涌到他房间要求公布郑思群黑帮的“钢鞭材料”。“钢鞭材料”是重庆土话,即“过得硬”的材料,有确切内容的材料。

由于去的人太多,以致该宿舍的学生不得不派人举着棍棒把守大门,问明来人身份和政治面貌,即家庭出身、是党员或者团员后,方可放行。

余国华被前来走访的同学追问得无以对答,只能无可奈何地搪塞道:“48 小时之内,保证向大家公布郑思群黑帮的钢鞭材料。”

这时,余国华的中学同学、机械系 67 级学生、时任校文工团乐队队长的吴庆举发现:余国华大字报的 5 个作者,全是校团委和校学生会的干部。吴庆举想:这篇大字报的出现,会不会是学校宣传部副部长邓时泽和团委书记刘稚民“金蝉脱壳”,为保护自己而让余国华等人写这张大字报以将祸水他引呢?想到此,他似乎茅塞顿开,感到异常兴奋。

当时,重庆大学的文工团员和体育队员是集中居住的。吴庆举深夜从冶金系宿舍质询余国华后回到文体大队,满面红潮地找到住在隔壁的文工团美术队队长周孜仁,情绪激动地将自己的想法对他说了,并坚信:“余国华绝对没有任何资料。”

周孜仁立即表示赞同，忙问吴庆举：“那我们怎么办？”

吴庆举接着说：“等到 48 小时他拿不出东西，我们就写大字报揭露他的阴谋。”

说干就干，当天晚上，便由周孜仁执笔，起草好了一篇大字报，题目是：《千万，千万，千万警惕更大的阴谋》。

6月18日，对于吴庆举和周孜仁，是非常难熬的一天。一方面，他们跃跃欲试，急于向全校同学公布他们的发现，同时，又必须等待 48 小时的到来。这一天，余国华的大字报已经把大学生的革命激情歇斯底里的激发起来，整个学校躁动不安。

6月18日上午，无线电系的同学听说电机系的一些同学因揭发校系两级的问题受到围攻，马上组织全系同学排着队伍冒雨前去声援。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出来接见同学，他说：“你们的热情是好的，但是，这么多人，乱糟糟地来，解决不了问题……电机系的问题，他们自己解决，你们还是回去学习文件吧！”

同学们没有理他，而是诵读了给电机系同学的声援信，和电机系的同学一起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现场群情激愤。

当天中午，重庆市委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专程来到重庆大学，向正在召开的党委扩大会宣布市委决定：重庆大学的运动不再由党委领导，而由市委工作组领导。

市委的决定没有让亢奋的重庆大学生安静下来，反而使重庆大学的舆论大哗。声援电机系的无线电系的同学又去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要求他对 6 月 16 日晚电机系反映出来的校党委整学生材料的问题表态。何正清认为工作组副组长张海亭上午对学生们讲的话是正确的。于是，学生们联系工作组到校后的一系列表现，认为市委工作组和校党委是串通一气，镇压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当天中午，有几个班的同学分别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出加急的联名求援电报，其中，有些电报被邮局截下来，未发出。

6月18日下午，张海亭代表工作组给全校党员和团干部作了一个报告，认为“共青团员要坚信市委，坚信党中央，对于上级组织的决定，即使是错误的，也必须坚决执行。”

这个报告被学生们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泼冷水的报告。

第65回：麻雀方，动荡中不乏幽默 六一八，郑州大学起风波

6月18日晚上，重庆大学无线电系1968届学生徐光明也贴出大字报：《向郑思群黑老头开火！》

这天晚上，重庆大学无线电系召开团员大会，传达下午张海亭的报告。在传达过程中，许多同学纷纷递上字条，对报告中的许多观点提出疑问，并要求发言对其进行批判。报告传达完毕，就有人跳上台去，准备发言。但遭到主持会议的系团总支书记高老师和工作组的拒绝。于是，在要不要继续把会议开下去，要不要批判这一报告的问题上，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恰在这时，有人切断了电源。工作组的人跑到台上，指责同学批判张海亭报告的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有人打电话请示住在松林坡的重庆大学工作组组长张种玉，问怎么办？张种玉十分不满地回答：

“你们实在要开就开吧。叫工作组成员全部回来开会！”

在场的人都知道事情变得严重了。一些胆小的人离开了会场，但仍有机智勇敢的三、四百名坚定分子留了下来，大家推选出了几个人组成了会议临时主席团。主席团中的绝大多数是同学们上午推选出的学生代表。有人搬来了录音机，为大会录音，有人自动维持会场秩序，大会继续开下去。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跳上台，对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的行为进行揭发和控诉，提出了“不信任工作组”、“在党中央毛主席没有派人来之前，自己组织起来闹革命”等口号。还有人提出：鉴于工作组和校党委串通一气、压制群众，为了保证文化革命运动的正常进行，必须“接管广播站”、“接管武装部”。最后，会议决定：“要把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汇报，第二天要在全校公布大会材料，用放录音、大字报、演讲等方式揭露市委工作组。”也有人提出：“有人要切断我们和党中央毛主席的联系，电报发不出去，我们要杀出校门去，到工农兵中去宣传，争取工农兵对我们援助。”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会场的气氛越来越热烈，等待上台发言的人在台后排成了一条长蛇阵。电机系、机械系、冶金系和其他外系的同学也来声援，也要求发言，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两点钟。大会派人去邮局及当地驻军 7788 部队联系向北京发电，请求中央直接派工作组来校，均遭拒绝。

大会之后，学生们在校内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揭穿市委工作组的大阴谋、大骗局！”“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等口号响彻夜空。汹涌澎湃至天明方止。

就在同学们自发继续会议的同时，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正清也在党委礼堂宣布：“无线电系的正在进行的会议是反革命事件。”何正清和张种玉当时就研究制定了两项措施：

第一、调军队来，如果学生上街游行就镇压；

第二、立即把机械系的工人集合起来，拿上工具去“保卫”无线电系集会所在的第一教学楼。

重庆大学“618”集会的消息很快就传到重庆市委大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和其他几位书记通宵未眠，共同商议解决的办法。工作组亲自布置对无线电系师生进行围攻，指定两个同学各筹一篇稿子，声讨无线电系“反革命事件”。

那一晚，吴庆举、周孜仁及重庆大学文工团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同学集中在周孜仁的宿舍，他们看着无线电系游行的同学在宿舍外喧嚣而过，心情极其复杂紧张。余国华承诺的 48 小时早已过去，他的“钢鞭材料”显然是没有了。但是，如果在这种气氛下张贴出为郑思群开脱的大字报，显然是逆流而动，其结果会不会和余国华本人一样，遭到全校同学的反对甚至围攻呢？他们希望有更多人一起共担风险。当游行队伍过去后，他们马上拿着那份“警惕更大阴谋”的大字报征集签名。

开始，签名只在文工团内部秘密进行，后来，美术队队员代玉松自告奋勇，主动回到他所在的电机系宿舍挨户敲门，像地下工作者一样宣传观点，征集签名。那一晚，他很快征集到几十个同盟者，大家信心大增。

6月19日天将破晓，吴庆举、周孜仁他们壮着胆将大字报贴上一

块木板，然后横架于九宿舍和二、三宿舍之间的路的正中——这是学生们吃早餐必经之地。他们躲在房内窥视动静。

不久，曙光放明，打早餐的同学果然很快聚集在木板前叽叽咋咋，不少人还当场取出钢笔批注：

“坚决支持你们的观点！”

“我们受骗了！”

“找余国华算账去！”

于是，吴庆举、周孜仁他们以胜利者的身份从宿舍里走到了大字报前，得意洋洋地公开自己的观点。

感到被嘲弄了的学生纷纷走访余国华，人们开始围攻他，贴他的大字报，称他是“余伟人”，可见大家晓得他是为了出名、想当伟人才写郑思群大字报的。其中有一组漫画《余伟人跳梁记》，把他的三角眼画得惟妙惟肖，在梁上跳着，大脚拇指又大又圆。他的那间斗室又成了新闻热点。不过，余国华却逃遁了。为躲避围攻，余国华班上团支部的人帮助他藏匿在偏居一隅的学校实验工厂轧钢车间里的楼上。余国华的室友无法招架纷至沓来的质询者，睡觉时候也不得不在自己的身上盖一张纸，上书：“我不是余国华，请不要叫醒我！”

对徐光明，群众也极尽讽刺挖苦，认为他是疯子，还给他开了一剂处方：

狗阴二两、狗阳一只、墨蚊一钱、麻雀卵三个、蟋蟀一对要原配，阴干，碾末制丸，黄豆大，每服一粒，日服三次。

之所以麻雀配方，是因为 1965 年徐光明的班级去铜梁县驻军当兵锻炼时，徐光明提出要吃麻雀肉，炊事班长学雷锋，拿起弹弓赶到铜梁县城南门外豹子沟，满山遍野寻麻雀，为他炒了一盘麻雀肉。

火烧到徐光明身上来了，他倒坦然，也不在乎大家对他人身攻击，又写大字报呼吁：“停止打横炮！”

6月19日凌晨起，无线电系的学生在宿舍、在路上到处受到围攻，校园内贴满了“愤怒声讨无线电系一小撮人非法集会的反革命罪行”等巨幅标语和声讨大字报，这是工作组和校党委组织的。晚上，工作组和校党委又组织了斗争会，对“618”集会的参加者和支持者进行批斗。重庆市委、省文革小组专门为此事发了“情况简报”。

虽然大家已经认同“倒郑事件”是宣传部和校团委合谋的一桩诡计,水落石出,但是,郑思群也没有因此而躲过此劫。6月21日,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辛易之亲自到重庆大学宣布郑思群停职,这是西南局的决定。同时,市委决定撤回第一个工作组另派出新工作组进校。

当天,《重庆日报》头版头条正式刊登了重庆市委关于让郑思群停职检查并派工作组进驻重大的决定。

22日,辛易之亲率以副市长余跃泽为组长的高规格工作组开赴重大。

23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市委决定郑思群停职检查。余跃泽下车伊始,踌躇满志地发表演说,声称:“我们到你们学校来,就是抓郑思群黑帮的”,摸“郑老虎”屁股的。“重大运动的主攻方向是校、系两级领导干部”。就这样,郑思群由“遇到新问题的老革命”升格成了“黑帮”,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成为了“革命的对象”,其中90%左右的人立即靠边站,有些被看作是郑思群线上的人物进行审查、揭批。

郑思群停职再次把重庆大学的学生们搞懵了。不是才弄明白所谓“郑思群黑帮”是某些人的阴谋吗?为什么市委甚至西南局也跟着起哄呢?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结论只能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市委工作组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没有调查,为什么就匆匆忙忙宣布郑思群是“黑帮”,这中间莫非又有什么阴谋?

于是,质问《重庆日报》、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再次蜂拥而至。在报纸上表态拥护市委决定的“左派”学生受到普遍奚落。工作组驻地成了同学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他们天天围着工作组质询,辩论。

工作组员中的干部虽然级别高,但文化也不很高,有些人是从土改队起来的,讲话常前言不搭后语,但都是党领导惯了,自以为了不起,喜欢打官腔、作指示、指手画脚,讲话霸气。

大学生对报纸社论等的理解力肯定超过一些工作组员,因此很看不起工作组那些人。重庆大学是工科,向来比较野,这些年轻人又是出风头的年龄,就把工作组干部当靶子,抓他们的语言辫子。比如,当郑思群停职时,学生们问余跃泽:“你想不想当重庆大学校长?”

他说:“是共产党员,一切服从党安排。”

学生就风传余跃泽想当重庆大学校长。后来,余跃泽听到议论他整倒郑思群是想当重大校长风声,又说,自己现在是管几百万人口的副市长,意思是他的权利比重大校长还大得多,不想当你这个矮校长了。

余跃泽副市长常被学生抓语言辫子,没办法,用“言多必失”来为自己辩解,于是,“言多必失”又在重庆大学广为流传。

余跃泽在市里是分管财贸商业的,在重庆的工作很有成绩,没想到来到重大,被这些学生每天搞得晕头转向。学生们调侃他管钱、管商业,所以营养充足,身宽体胖,说话才中气十足。

工作组办公室接待小组组长孟凡均是工作组中难得的精明能干之辈,但每天面对满屋子能言善辩、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的大学生,他除了用一些历史暗示对无知的年轻人进行威胁恫吓外,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工科学生在工作组大门口贴了一幅对联非常有名:

曲率半径处处相等

摩擦系数点点为零

横批:又圆又滑

重庆大学校园,这时已经是一团烈火。工作组成了救火队。为了领导这样一个大学的运动,工作组提高了级别,增加了人数。除了副市长余跃泽任工作组组长外,增加了驻渝的54军副政委钟池为工作组政委,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崔成礼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工作组,由地方的处级干部和军队的团职干部挂帅。整个工作组成员达300多人。其中,地方干部200来人,军队干部100来人。指定54军政治部的赵处长为办公室主任,市政府农财科张光明科长和市供销社的殷青锋为副主任。下设政工组、秘书组、专案组、接待组。54军赵处长分管政工组和专案组,市政府的张光明分管秘书组并与市委联络,殷青锋分管行政和接待组。

工作组一再要求学生们把斗争矛头对准校、系两级领导,而到现在为止,学生们的矛头偏偏对准了市委及其工作组本身。

工作组成竹在胸。他们有理由相信这次动荡不过是过去某次政治运动的翻版而已,面前这些跳得很高的糊涂虫,很快就会明白共产

党在 1957 年使用过的手段：“引蛇出洞”“后发制人”。他们抓紧在学生中“依靠左派，团结中间派，孤立右派”，始终把斗争锋芒指向以郑思群为首要目标的校、系两极领导干部。他们到机关各部、处和各系发动群众，组织写大、小字报，找人个别谈话及挑选积极分子等，抓“郑思群黑帮”。

但是，揭发郑思群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无非就是：

1、到铜梁去看望当兵锻炼的学生，带了一头猪，去腐蚀学生纯洁的心灵。

2、1966 年 6 月 12 日从北京高教部开会回来，晚上身边工作人员陪他看了大字报，他说“弄得乱糟糟的”。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3、1965 年高考结束，参加监考的马列主义教研组老师向郑思群汇报工作，说他们为考生赶跑考场外面吵闹的“知了”，郑思群很满意；当汇报到他们在考场上为考生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时，郑思群大为不满，说：“你们这是脱了裤子放屁——多事！”工作组上纲上线，说郑思群攻击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毛泽东思想是“放屁”！

4、搞独立王国。郑思群是重庆市委委员，当重庆市委和高教部开会时间发生冲突时，他不参加重庆的会，而到北京参加高教部的会。

还是没有什么“钢鞭”材料。工作组决定调看郑思群的档案。

郑思群的级别高、资格老，档案不在学校里。要到上级组织部门查阅档案，不是一般工作队员所能胜任。工作组特地把机械系工作小组长张忠良抽出来做专案组组长，专门汇总郑思群的材料。张忠良是重庆市商业局人事科长，审查干部有经验。

一段时间，工作组控制了局势，师生们每天坐下来学习，揭发郑思群，写大字。可哪有那么多大字报写？于是，只要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大家争着签名，往往一张大字报签名比内容多，有人为盥洗间写一张不要倒剩菜饭的告示，也有人去签了一长串名。

我们暂且将重庆大学放一放，再来看看此时中原大地上的郑州大学。

6 月 18 日，郑州大学行政楼前又出现声讨工作组的巨幅标语：“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党若平！”一整张白纸一个字。贴

大标语的是中文系学生党言川,在他的带动下,整个校园内反对省委工作组的大标语、大字报又到处张贴出来,一霎时,形成了反对工作组的高潮。

当晚,在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的带领下,部分学生去找系党总支书记,又到校领导住处“高干院”找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均未见到,于是就自动聚集到王相海跳楼身亡的文科楼前,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郑州的“6·18”事件。当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第二天,郑州大学政治系四一班邵维钧、贺长有、李春兰等11位同学向中央发电报,说郑州大学党委镇压学生运动,学校领导王培育组织反击写大字报的师生,造成4人跳楼自杀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来调查。这下捅了马蜂窝,6月20日,省委对郑大工作组加派力量,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亲自坐镇,先后在郑州大学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采取种种手段,对邵维钧、贺长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进行反击。工作组对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翻查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3同学档案;开辟专栏大字报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召开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参加的会议,号召全校揭发他们的“错误”。工作组组长党若平甚至说:“对邵维均等同学,什么时候有空隙,就踢他们几脚……”不少同学受到株连,全校4名团支部书记被撤职。

第 66 回：蒯大富，清华质疑工作组 要改革，下通知废除高考

此时，清华大学也出现了质疑工作组的大字报。6月16日，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6902班，简称“化902”班的蒯大富和孟家驹贴出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往哪里去？》批评工作组：“我们要开斗争会，你们不准；我们抓黑帮戴高帽子游街，你们阻拦；我们画漫画写对联，你们不许。你们举起先立后破的大棒子压制群众！”

大字报认为，工作组进校后，学校大字报的数量急剧下降。清华园内一片冷冷清清，运动大有趋于尾声之势，因此提出：“运动向左转了还是向右转了？”的质疑。

大字报批判了“我们无限信赖工作组”的口号，称：“我们无限信赖的是党中央，无限信赖的是毛主席、是毛泽东思想。在工作组的性质未搞清楚之前，提出这样的口号是不负责任的，不曾有人说‘我们无限信赖校党委’？事实是怎样呢？是黑帮。我们学校的工作组究竟怎么样，还不能下结论，此时就提出‘无限信赖工作组’不能不算是阴谋。任何人都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经受考验，工作组尤其这样。”

蒯大富是班上的文革小组组长，共青团员，父亲是老党员、老新四军战士。他一直在政治上要求进步。文革刚开始，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保清华党委和蒋南翔的，题目叫“捍卫清华党委，就是捍卫党的领导；捍卫清华方向，就是捍卫社会主义”。

但是，很快他就感觉自己不对了。当时《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社论连篇累牍，都是说资产阶级统治教育领域……修正主义分子就在我们身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要大家擦亮眼睛等等。同班同学孟家驹和他商量说：“我们这种态度对不对啊？万一校党委真有问题怎么办？应该抱着对革命负责任的态度，考验考验清华党委吧。”

于是，他们写了“也向校长质疑”的大字报，对校党委提出了质疑。

当时蒯大富还在清华广播台工作，他给校党委贴了大字报以后，广播台的台长很快就通知他：“蒯大富，你回班上去参加文化革命吧。”让他离开广播台了。

工作组进校后，校党委靠边站了，蒯大富很得意，杀回广播台，临时写了一个稿子，欢迎党派工作组来清华大学。他还播放“毛主席派人来”那首歌，非常欢欣鼓舞，非常拥护工作组。

工作组让蒯大富当上了班文革小组组长。

可是，很快蒯大富他们就觉得工作组的做法，和他们理解的“毛主席放手发动群众”的做法相距甚远。工作组强调领导，强调秩序，说不能这样搞、不能那样搞。蒯大富等同学认为工作组对群众运动的理解和态度不对。这时，不知从哪传出一阵风，说工作组是旧北京市委派来的……

6月14日，力学系学生王铁成贴出《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大方向错了》的大字报，刘泉等人也贴出题为《现工作组不可信任》的大字报。虽然也有不少人起来为工作组辩护，但是，6月15日，蒯大富和同班的十几个同学开会，依然决定与工作组抗衡。这就有了6月16日《工作组往哪里去？》的大字报。

在此之前，自控系学生张根旺在三号楼也贴出一张大字报，其中提到工作组的人批评学生说：“你们大学生觉悟太低了，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你们可以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做法一点也不高级，不懂党的策略”，“组织性纪律性太差了”。工作组的人还说“戴高帽子是国民党作风，农民可以这样做，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能的表现”，“说明你们主席著作学得太差了”。

大字报对此表示了不满，并上纲上线说：“我们要告诉这位同志，你骂我们，我们不在乎，但是你骂我们贫下中农，我们不答应；你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就要和你拼命！”

请工作队领导同志立即核查此事是否属实，如果属实必须马上开除这个工作队员，并向全校作检讨。”

蒯大富6月16日的这张大字报贴出时间不长，他就被叫到学校工作组办公室。工作组的领导人十分严肃地指出蒯大富最近反工作组的行为，要求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不要再继续与工作组作对。

开始,蒯大富静静地听工作组领导的指示,但听着听着,他就不耐烦了,向工作组负责人表示:“我们是革命学生,我们的行动是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向我们施压,是压制学生,不让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

蒯大富能言善辩,他与工作组负责人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一言我一语竟争吵了起来,一时间,双方僵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次谈话以极不愉快的结果结束。

革命的年代,出人意料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6月17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二(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两封信,以及《人民日报》第二天要发表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同时播发的还有5天前,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已经下发的《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通知指出:“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

此时,距离当年的高考只有半个月了。

《人民日报》的社论中说:“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学生和教师,早已对旧的招生考试制度,表示无比愤慨,迫切地要求把它彻底扔到垃圾堆里去。今天本报发表的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和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学生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两封信,以及没有发表的大量群众来信,提出了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的强烈要求。这两封信,反映了广大革命师生的心愿,代表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呼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群众的要求,决定废止现行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从今年起实行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的招生办法,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把德、智、体三方面条件较好的学生推荐出来,从中择优录取。高级中学的招生考试也采取这种办法进行。”

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高三(四)班学生的信是6月6日写的。信中说:“我们是中学生,是即将高中毕业的学生。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砸烂旧的高考制度的责任,首先落到我们肩上。我们想说说对于现行升学制度的看法。我们认为,现行的升学制度,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旧科举制度的延续,是一种很落后的、很反动的教育制

度。现行升学制度是和毛主席给我们制定的教育方针相违抗的。毛主席说。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并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的。实际上是在扩大并延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工人和农民、城市和乡村这三大差别。”

她们建议,废除旧的升学制度,高中毕业直接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

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学生的信写于6月11日,信中说:“我们看了女一中同学给您的信。我们非常赞成她们的观点。经过讨论,我们又补充了几点意见。这些意见在全校广播后。得到了全体革命师生的热烈响应。并一致决定,将它作为向全市师生的倡议。我们给您抄送一份,我们热切盼望您给我们指示。”“我们建议:一、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二、高中毕业生先到工农兵中去锻炼,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得到工农兵的批准,取得他们给予的‘思想毕业证书’。三、大量从工农兵中吸收在阶级斗争中经过考验的坚强的革命者入学深造。四、加速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教育制度,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方向。五、从应届毕业生中挑选在文化大革命中立场坚定、表现积极的同学升学。”

信中还说:“现在北京四中全体革命师生向全市革命的同志倡议: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高考不作彻底的改革,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的命令,我们坚决不进考场。”

当晚的电视台上,北京四中的学生王倩倩和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一个女同学,双双还在中央电视台上宣读了他们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的这两封信。

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的信,是在他们班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孔丹带领下,联名写的。

孔丹的父亲孔原,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许明,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在6月8日声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自行车行列中,就有孔丹和他的弟弟孔栋兄弟俩的身影。

6月的一天,北京四中初二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悄悄搁在了父亲刘

少奇的案头。

信是四中高三(5)班的两位学长托送的。这两个当时的优秀学生,把信交给刘源的时候很郑重的对他说:“旧的教育考试制度让白专的学生留下来了,把闹革命的、工农兵都挡在学校外面。”

刘少奇有规定,不允许子女、亲戚给刘少奇捎信。刘源不敢把信直接交给父亲,但对学长们重托的革命事业又责无旁贷,只好悄悄地搁在父亲的办公桌上。

当时,学生中要求废除高考招生制度的呼声甚高,早在6月6日,广州六中高三乙班全体同学就给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要求取消高考制度。信中称:“一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中,我们实在是一刻也坐不下去了!可是,却有一些老师,要我们坐下来静心复习,准备高考。斗争正在剧烈进行,工农兵在奋勇战斗,敌人在张牙舞爪,负隅顽抗……我们能脱离这火热的现实,能脱离这尖锐的阶级斗争吗?”他们称高考制度是封建科举的变相,是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大黑线。

《人民日报》6月18日的社论,等于向全国昭告中央绝没有在短时间内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如果说,在此之前,各学校的校园里还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学生躲在某个角落里偷偷复习功课的话,那末,从此以后,学生们,尤其是中学高三的学生,就对参加高考彻底死心,他们全副身心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来了。

6月17日晚上关于废除高考的消息,让全国上下再次沸腾。

本来,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南京大学批斗校长匡亚明的消息已经引起北京大学一些同学的不满,他们说:“南大斗了校长,北大为什么还不斗?何况北大领导是第一张大字报点的名!”言外之意,认为北大工作组太右了。从6月17日早晨起,北大校园里,愤怒的学生就到处围斗“黑帮”分子,高呼口号。当晚,关于废除高考的广播让北京大学又是一片欢腾,热烈支持,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两点钟,喧嚣声才逐渐平息。但仅安静了3个小时,6月18日清晨5时,一阵阵无节奏的铜锣声又在古老的北大红墙校园内响起,只见一队队“黑帮”、“牛鬼蛇神”的队伍在校园里被游街,他们每个人的胸前都挂着两尺见

方的黑牌，头上戴着高帽，第一顶帽子写的是“牛”字，第二顶是“鬼”字，第三顶是“蛇”字，第四顶是“神”字，合起来便是“牛鬼蛇神”。

这天，北京大学校园内到处红旗飘扬，人山人海。上午，北京大学全体工作组成员都集中到教学区开会，布置学生们自己在学生宿舍区学习、开会。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的学生利用工作组不在期间，在学生宿舍区先后斗了40多名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的教师、党员干部和两名学生干部，其中就有西语系的学生吴然。吴然是烈士子弟，系团支部书记。他的父母牺牲后，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吴子牧抚养成人。此时吴子牧已被打倒，他马上也受到株连。

青年大学生们的情绪渐渐失去了控制。以一、二年级的学生为主，开始在39楼设了“斗鬼台”，后来，在哲学楼、大饭厅、三十二斋、三十五斋、三十八斋、校医院、二院、南阁的前面，凡是有一块空场地的地方都设立“斗鬼台”，拉来“黑帮”分子就斗。这一天校系两级和学校附属各单位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统统被揪出来斗，人数多达五十多人，有的人一上午被揪斗了几次，他们有的挨打、有的罚跪、有的反剪双手“乘喷气式飞机”，有的用墨汁涂面、剃阴阳头、揪头发、往身上涂糨糊，其手段之多，真是令人叹为观止。以北大中文系为例，几十个学生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等口号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揪斗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程贤策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工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又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学生不听，把程贤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那一天，学生们把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抓来，用拳头和棍子殴打他们。一个学生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后来，又有学生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大便纸篓，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之后又朝向景洁身上倒了几瓶墨水，他的白衬衫变成黑衬衫。

化学楼前斗的是化学系党总支委员桂琳琳，……几个女生架着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任凭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地吼叫。

38楼东门被斗的有历史系20多人，其余是哲学系师生。被斗者有历史系团总支书记、年级党支部书记或辅导员，还有调干生等，罪名则是“修正主义苗子”、“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类。

这一天,乘坐“喷气式飞机”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向达,几个学生架住被迫剃光了头的向达跪在三院二楼外晒得发烫的房檐瓦上“坐飞机”,一跪就是几小时……

那些“黑帮”、“牛鬼蛇神”们有的木然地任人摆布,有的挣扎反抗着,有的大声抗议,然而,当时的青年学生们都发了狂,反抗只能带来更可怕的报复,有的被吐了一脸的口水,有的挨了响亮的耳光,有的女教师衣服被拉脱了扣子,露出了雪白的胸脯……

事件发生后,有同学赶快报告工作组。

“说理斗争不要打人!”还有的高年级同学站了出来,制止这些学生的行为,但无济于事。

听到消息后,工作组立即停止了会议,让各系工作组迅速回去制止混乱。张承先也立刻赶赴现场,在两处斗得最凶、最集中的地方讲了话,制止住了乱揪乱斗的现象。随后,张承先开车在校园里巡视。校园内秩序这才趋于稳定。11时以后,情况缓和下来。

第67回：六一八，未名湖施暴疯狂 批大富，薄一波辨证清华

当天，张承先命工作组抓出4个打人最凶和侮辱女人的人：

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此人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解放军俘虏后隐瞒身份又混入北京大学，前几天曾带头打过3个人，这次又是他带头打人。

还有一个人在38楼前乱打乱斗，工作组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随即散去，此人却又揪来几个女教师又打、又斗。工作组赶到后制止他，他却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到附中调查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后，一直没有正当职业。

另外一个是“打鬼台”打人的主角，自称是东语系姓黄，带头打了8个人，还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

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上台扯掉被斗女教师的裤子，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经调查，这个人也是一贯有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校察看处分。

虽然工作组一直在大力鼓励学生和“黑帮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斗争，并多次组织各系学生批斗原系里的领导，但是对于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出现的这次不受工作组领导的大规模暴力行动，工作组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这次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下午13时，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发生的事情，提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决定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要求19、20、21日连续3天组织学习、讨论、对照、检讨。

当晚,张承先又召开工作组全体会议,研究处理白天发生的暴力事件。晚上22时,工作组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张承先作广播讲话,首先表示工作组坚决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但是,避开工作组进行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是违反党的政策的,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张承先揭露了当场被抓住的几个坏人的情况。并要求全体师生员工组织讨论。工作组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讨论、批准,等等。

会议结束后,张承先又召集各系工作组主要成员会议,强调要加强革命秩序,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少数人钻空子,强调“文化大革命”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

这天晚上,李雪峰接到刘少奇打来的电话,刘少奇说:“我考虑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李雪峰回答后马上作了部署。

原来,刘少奇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上学的女儿刘平平晚上回家说,她们学校有人正在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其他几个学校也出现反工作组的苗头,而且这些人私下串连,有可能酿成风潮。

刘少奇听到后,若有所思地说道:“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他对王光美讲:“你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了解一下那里的运动情况。”

说完,他就给李雪峰打了电话。

刘平平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文革开始后,她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是学校中最早贴出批判学校领导刘超大字报的学生。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支持了刘平等同学的行为,并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

刘平平被选为该校文革委员会的负责人。

很快,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77%的班主任被斗争。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被

迫进行“劳改”和体罚。

与此同时,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也出现了质疑工作组的大字报。

工作组进校后,对教师进行排队、整理材料,挑起了群众之间、师生之间的对立,有的学生在教研组门上贴上“鬼斋”、在教师宿舍区贴上“狼狗窝”。6月17日,该校高三4班李黎黎等13个人贴出了大字报,题目是“工作组把我们引向何方?”认为工作组开展运动的方式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一样,阻碍了运动,质问工作组“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

工作组当然认为大字报是错误的。你想,工作组一进校就组织批斗学校领导怎么能说是保皇派呢?按照毛泽东杭州讲话的精神批判那些旧社会留下的知识分子、老师,怎么能说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呢?

面对学生“为什么还不召开揭批校领导大会”的质问,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当天的广播中说:“现在转入重点批判的条件还不成熟……仍要进行广泛的、普遍的揭发”,同时他检讨了自己有“怕乱”思想,“还不够放手”,表示欢迎继续提意见。

李黎黎等13个人的大字报引起了全校各班的辩论。当晚学生自发聚在大操场宿舍楼的高台前,不少学生跳上台大喊:“在学生中也有5%,也有右派,现在牛鬼蛇神在表演,反工作组就是反党!”等等。

刘进的同班同学梁二同等学生上台支持反工作组的大字报,说工作组压制了革命师生的积极性,把学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支持者为她大声叫好,反对者也毫不妥协。双方争先恐后爬上高台,慷慨陈词。场面非常激烈。

工作组呼吁同学们不要再辩论了,没有人听得进去。辩论一直到深夜12点才散。

事后,邓小平的女儿邓榕赶回家向邓小平汇报,问他:“反工作组对不对?”

邓小平说:“反工作组不对,这符合了社会上反工作组的逆流。”

第二天,6月18日,师大女附中出现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一是批判围攻反工作组的少数派学生,二是斗争所谓“出身不好、有问题”的学生。高二2班率先在同学中揪出12个“牛鬼蛇神”,第一个就是她们班

的班长,说她是“反革命黑帮的大红人”的帽子。因为校领导是“反革命黑帮”,那么,“大红人”的帽子顺理成章的也就扣到班长的头上。这位班长为了证明自己忠于毛主席,把毛泽东的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

还有一位自己承认是“反革命”的同学,其父母姐妹多在演艺界,她本人也面容姣好,多才多艺,据说因此受到一位干部子女的羡慕嫉妒恨,被划入牛鬼蛇神。

这个班的同学孙行玲的家离学校非常近,每天中午回家吃饭。那天饭后她返回学校,推开教室门,就见大家的目光齐刷刷地一齐射向门口。她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午休同学们都老老实实坐在位子上?为什么这么安静?为什么表情都如此怪异?这时,突然听到从讲台边传来一个同学的命令:

“进来吧!”

她这才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坐在位子上,前边还站着几位,一脸严肃。

不等她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又有人以命令的口气说:“你对这张大字报什么看法?”

毫无疑问是问孙行玲,她这才发现黑板上贴了满满的大字报,说是揪出了班里 12 个牛鬼蛇神。

看到大字报上点的 12 名同学的名字,她只觉得脑袋“轰”地一声,心脏一下抽紧了,完全是下意识的回答:“我不觉得她们是反革命,平常没发现有反革命言行。”

她的话立刻遭到猛烈反击,有人说她是自己跳出来的小右派!

她吓哭了。有个同学说:“你爸爸是右派,所以你当然也会同情反革命,出身决定立场。”而说这话的人自己就出身资本家。过后班领导小组划定“左中右”,她是“中右”。

6月19日,北京大学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呈递了《北京大学文化大革命简报》(第9号),简报讲述了北京大学“618事件”的详细过程及工作组在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措施。

这天,几辆红旗牌高级轿车驶进了清华大学的校园,走下车来的是位华发苍苍的老人,他是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男女大学生们都不认识他,一见从小汽车里下来个老头,不用问,肯定是首长,立刻围

了上去，争相和他握手。

薄一波看了蒯大富、孟家驹 6 月 16 日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便问：“这张大字报谁写的？”

蒯大富正好就在旁边，马上有人回答说：“蒯大富写的，唉，就是他，就是他。”他们指着蒯大富回答说。

薄一波便问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啊？”

蒯大富回答说：“我叫蒯大富。”

薄一波说：“大富？这个名字不好。”

蒯大富反问道：“这个名字有什么不好？”

薄一波说：“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富？你想发家致富啊？”

“不对！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蒯大富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薄一波老道成熟，临危不乱，反问说：“为什么工作组方向错了。”

蒯大富：“15 日以前工作组什么工作也没干，我们要游街，工作组都干涉。”

薄一波：“噢！那你说说怎么办，工作组在清华园下了车，站在校门口就喊，大家斗啊！这不解决问题，毛主席说：‘下车伊始，哇喇哇喇，’你知道吗？”

蒯大富：“我知道，但工作组来了后 15 日前不让我们斗人等等……所以大方向错了。”

薄一波：“你是左派？”

蒯大富：“这我自己怎么好说呢。”

薄一波：“革命者应该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

蒯大富：“我以为自己是左派。”

在场的清华大学学生吕述祖问：“你认为错了，那么错在哪儿？你认为的大方向应该是什么？”

薄一波：“这同学说的有道理，你叫什么名字？”

吕述祖：“吕述祖。”

蒯大富：“我们还有很多理由说明工作组方向有问题，我们信赖党中央、毛主席。”

薄一波：“信赖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对的，但毛主席不是孤立的，他有头发，有手，有腿……他做事情是通过这些做的。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基层执行贯彻的，我们认为工作组是可信赖的，难道你连毛主席派来的人都不相信？”

蒯大富：“我们是有理由怀疑的。”

吕述祖：“你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我也希望斗他们，但我觉得是当时自己没跟上形势，斗争会要有‘孕育期’，这就是调查研究，调查是毛主席思想关键一点。”

薄一波：“对！来到清华园，说一声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出来，只把右派留在清华园里，用机关枪一扫，这不解决问题。真正革命左派不仅要敢于革命，而且要善于革命。”

蒯大富：“是的！我知道这一点。”

薄一波：“好！蒯大富我给你提三点建议：一、希望你能站在左派群众中来，站在工作组一边去，不要作左派中的左派，如果作左派中的左派，那就是带引号的左派，也就是右派了，一个圆分左半圆和右半圆组成，如果过左了就成了右了。”

说这句话时，薄一波形象地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大家都笑了。

薄一波接着说：“二、希望你能好好学习主席著作和语录，多在用字上下功夫，毛泽东思想不仅对黑帮是照妖镜，对自己的错误思想亦是照妖镜。三、噢！上面两点就已经够了，希望你今天学了语录以后，明天贴一张大字报，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澄清一下错误。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否敢于写，我是怀疑的，你如果不写，就会像他们处境一样尴尬，”他用手指着爬在芦席上听他们讲话的同学继续说：“受到大家的围攻，起码他，”他又用手指着吕述祖说：“就会写大字报攻你。你能把我说的这三点重复两遍吗？”

蒯大富重复了两遍后，依然倔强的说：“被多数人反对的不一定是错的。”

薄一波：“这话对！但是陆平还不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

蒯大富：“我觉得这个比喻是不恰当的。”

薄一波：“我认为是恰当的，难道你让我举中国受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围攻的例子吗？恐怕在这儿的同学都不会答应，那他们不都成了修正主义了吗！”

蒯大富：“你叫什么名字？”

薄一波：“这个我懒得说。”

蒯大富：“那你告诉我个姓吧！”

薄一波：“我有我的自由，不一定答。”

蒯大富：“我也有我的自由，但是我刚才把我的名字告诉你，你们应该告诉我。”

薄一波：“好！我走了！至于我的名字，我走后你们就会知道。”

薄一波走了几步，又问蒯大富：“6月9号和10号两天清华园形势大不一样，是什么原因？”

蒯大富：“我觉得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

薄一波：“那么难道9号以前主席思想就没有威力了吗？我认为取得成绩其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其二是由于工作组进校了。”

这时，又有一个学生说起基础课教研组李世权写了反动标语，薄一波问：“他写了什么标语？”

学生答：“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

薄一波：“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好！好！让他写嘛；你们不懂策略，我就比你们多读一些，应该让他们先放出来……。”

当天下午，王光美也来到清华大学。开始，她准备坐小汽车去，后来一考虑，这样太显眼了。骑自行车吧？可是路太远，也不安全。贺龙听说后给王光美搞了辆卡车，让她把自行车放在卡车上，跟在小轿车后面。到了清华大学附近，再下来骑自行车进了清华园。

王光美到了清华大学工作组办公室门口，正巧碰上刚出来的工作组组长叶林。

叶林怔了一下，立刻反应过来，急忙迎上去说：“王光美同志，哎呀，想不到您骑自行车来了，这种精神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快进办公室吧！”

第68回：到一线，王光美亲临清华 六二〇，北京轰赶工作组

叶林已经知道王光美要来，是薄一波在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时告诉他的。当天晚上，王光美和各系工作组的负责人见了面，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叶林说：

“现在，反工作组的声浪基本上得到了控制，但有几个代表人物是死硬派，其中最顽固的是蒯大富。他是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今年21岁。父亲是江苏省滨海县的一个农民，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共产党员。对这样一位青年堕落成为右派势力，我们很难过。”

“这不奇怪。”王光美说，“根正苗红的好人最后变成反革命的例子多得很，这样才能从实质上理解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这个叫蒯大富的学生我早就听说了。他连薄一波同志都敢顶，薄一波是国务院副总理、工交党委第一书记，今天和蒯大富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认识错误，他就是不听。”

接着，王光美提出要到校园里看大字报，叶林立即安排。

刘少奇的女儿刘涛和贺龙的儿子贺鹏飞等人陪着王光美看大字报，当她看到一篇刘才堂同学写的大字报后，就问刘涛和贺鹏飞：“这篇大字报写得好不好？”她认为这篇大字报写的是有问题的。

清华大学的师生听说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来看大字报，都很兴奋，纷纷围了过来，很快就把王光美等人围在了中间。王光美很高兴，她对同学们说：

“是少奇同志派我来清华大学看大字报的。少奇同志很关心清华的运动。”

人们兴奋得鼓起掌来，“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党中央！”的口号声四起。

工作队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将王光美从人群包围中解脱出来。王

光美兴奋的将这次被围称为“拉合尔式”包围。

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文化和艺术中心,素有“花园城市”之称。1966年3月26日,王光美随刘少奇到巴基斯坦访问,拉合尔市居民几乎倾城上街欢迎。刘少奇他们乘坐的汽车刚跑到街道上,立即被从四面八方拥来的群众围住了。黑压压的人群,把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沉浸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和鼓掌声中,他们的车子几乎是被数万群众抬担架似地抬到国宾馆门口。这种欢迎场景给王光美留下了深刻地印象。显然,她对清华师生对她的包围,感觉也是很好的。

晚上,在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对工作组进校10天还不能控制局势表示不满。她说:“现在乱子多,说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要找出幕后人”。

清华大学工作组得悉蒯大富所在的化工系902班第二天要召开会议,便打电话给化902班说:“王光美要来参加。”

6月20日上午,负责化902班的工作组成员曹欣通知蒯大富说:“今天下午王光美同志要参加你们班的座谈会,你们准备一下。”

化902班的同学听说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要来参加他们的班会,听取大家对工作组的意见,兴奋异常。他们将三院的教室打扫干净,课桌围成一圈,准备好开水,等候王光美的到来。

下午,工化系工作组副组长、时任化工部某研究所所长的张茜薇和曹欣领着一位带黑框眼镜、40多岁的女士走进教室,说:“知道化902班的同学对工作组意见较多,特来听取意见。”大家热烈欢迎。蒯大富主持了会议,同学们噼噼啪啪就讲开了。

会议结束,那位戴黑框眼镜的女士说:“我是强斋秘书组的,姓崔,大家叫我老崔好了。”说完站起来就走了。

强斋是学校工作组所在地。

“讲了半天,原来的她不是王光美!”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在同学们心中涌起。本来就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化902班学生觉得事情蹊跷,就问张茜薇:“为什么王光美同志没有来?”

张茜薇回答说:“电话不是我接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

有人十分气愤,认为这里面“可能有阴谋”,冒充王光美将他们班的“底”差不多都摸去了。于是认为“王光美要来参加会”是一则

谣言。

工作组进校后为了加强领导,稳定局面,曾有一则“谣言必追”的指示,蒯大富们就本着这条指示去追查“谣言”,追查的对象却是“工作组”。工作组以“接电话的听错了”为由搪塞,蒯大富等人认为“那怎么可能呢”?于是继续追,从晚上18时多一直追到23时多。工作组不理睬他们,蒯大富等人就坐了5个多钟头的“冷板凳”后,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宿舍。这一晚,这一班青春躁动的大学生们睡不安稳了。

第二天一早,以蒯大富为首的班里10个同学贴出《叶林同志,这是为什么?》的大字报,长达3000多字,将事情公布于众,认为工作组到化902班开会,是套取学生的情报。这张大字报点到了工作组组长叶林的名,牵涉到国家主席夫人王光美。这还得了,清华园立刻沸腾了,大字报前围了里三层,外三层,满园子都在议论这件事:

“原来工作组骗人呀!”

其实,当时王光美还没有正式到清华大学工作组报到,当然也不方便以工作组的身份前去参加座谈会。这些,工作组不好向学生们解释。6月21日,王光美带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悄悄地来到清华园,正式成为工作组成员。

这天,蒯大富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下这样的批语: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很快转到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

当天晚上,王光美就在她召集的工化系部分同学座谈会上,拿出蒯大富在大字报上做过批语的照片向同学们介绍说:“大家要注意,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这是一场阶级斗争。”

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

当晚,工作组就作了安排,要将蒯大富等人作为右派一网打尽,并且提出了“反蒋(南翔)必先反蒯(大富)”的口号。

此时,6月20日,北京各学校反对工作组的活动进入了一个高潮。

首先是北京地质学院。6月16日，地质部派到北京地质学院的工作组宣布该院院长高元贵停职反省，限期做出检查。工作组的做法受到许多干部、师生的反对。6月20日凌晨，北京地质学院院党委常委李贵和部分干部、教员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指责工作组“起了黑帮们起不到的作用，强烈要求夺回我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他们的行动得到很多学生的支持，当天上午，数百名师生在校园内游行支持“李贵的革命行动”，并包围了工作组驻地教13楼，矛头直指工作组组长邹家尤。

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党吗？国务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陶鲁笳、地质部副部长兼党委书记何长工断言地院有个“地下司令部”，指示工作组“要沉着顶住”。

第二天，6月21日，地质部调来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协助邹家尤工作组。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胥光义和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李人林等人亲自到地院讲话，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批评少数人闹事、围攻工作组是“右派”翻天，并组织地院的师生、家属和孩子游行，支持工作组，批判李贵等人。

第三天，6月22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对地院“620事件”做出批示：

人林同志并长工、光义同志：

应该明确答复学生，李主任讲的话是对的。工作组是上级党委派去的，它是代表党组织工作的，要号召左派起来跟工作队一起进行文化大革命，如果院党委有问题了，派工作队去行使党委职权，这就是等于夺回了党的领导权。如果再有人非赶走工作队不可，那势必是夺工作队之权，亦即夺党的领导权，那么谁来掌权呢？工作队有缺点、错误，可以改正，但不能给工作队随便加上什么“保皇派”之名称。

薄一波

6月22日

他在地院工作组整理的李贵的材料上批道：“看来李贵至少是个右派，可能还是个反革命头子。”

薄一波的这一批示工作队没有公布，反工作队的师生对薄一波的批示一无所知。6月23日，王大来带着王大宾等47人签名贴出大字

报《大骗局、大阴谋、大出丑、大暴露！》在学校引起极大反响，同时也成为工作队围攻的重点。所有参与这张大字报签名的师生都成了重点批判的对象。

随之而来的是组织全校教职工，在教工之家对反工作队的教职工进行批斗。批斗会的声势很大，被批判人被强制性地按头接受批斗。

6月25日，地质部副部长胥光义来到地院，先开会，将师生员工分支持工作组的，中间态度的，反对工作队的三批传达薄一波6月22日的批示。

薄一波的批示遭到许多学生的反对，还没念完，一些人就公开骂起来：

“放狗屁，薄一波是什么东西，他是不是黑帮还有待考察呢！”

“他和彭真的关系必须追查，我们不听他的，他倒是应该滚回来，听听我们的！”

不仅是在地院。6月20日早上6时，在北京师范大学北饭厅北墙，数一学生高树奎等17位学生贴出了《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三点批评，主要讲工作组进校后就把校党委一批干部集中在主楼办学习班，将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了，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一石激起千重浪，在短短一、二个小时内获得了500多张大字报的支持。

上午10时，工作组组长孙友渔很快向全校师生发表了20分钟的广播讲话，肯定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告诫人们警惕上坏人的当，严厉指责所谓“二月兵变”是造谣，是“要流解放军的血！”指出高树奎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革命！都是要孤立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提出“反工作组就是反党”，认为大字报“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号召师生们斗争这些学生。孙友渔的讲话简短有力，铿锵有声。

讲话刚结束，学生高树奎即被揪斗。

物理系64级的学生李庆林、赵惠中、武世文等5位同学也贴了一张支持高树奎的大字报。这5位同学就在自己贴的大字报附近听了

孙有渔讲话。孙有渔话音刚落，以教育系为主的一群人就在物理系 64 级同班同学的引领下，把赵惠中 5 人推上一个木台进行了批斗。

6月3日率先给校党委贴出大字报的政教系五年级调干生谭厚兰组织起一支游行队伍，她走在队伍最前面，高呼支持工作组的口号，在校内游行。随即，坚决拥护工作组和批判反革命造谣的大字报不断贴出。

中午，在东饭厅墙上又出现《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反工作组大字报，大字报的作者是中文系 64 级（2）班王颂平和李先华。

李先华，同学喊他“李克思”。安徽人，瘦高个，喜欢背两个书包，穿梭于教室、图书馆和宿舍之间。小组发言，他总是出口不俗，有逻辑，富哲理，居高临下，“鹤立鸡群”。

毫无疑问，他们二人立即遭到围攻。

中文系 64 级（2）班骨干们在一间男生宿舍写大字报，批判“反革命小爬虫”王颂平、李先华，誓死捍卫工作组，旗帜鲜明。执笔者宣布：“在场的姓名都往上写啦！”

这时，在场的该班的女生孙碧琼却举手声明：“不写我的名。”

王颂平被孤立。她睡的下铺，多层大字报帐幕似的圈围起来。上床掀开大字报，不敢损坏。本班有女生随意训斥，外班有女生光顾批判。她去组里有人斗争，去食堂吃饭，会遭人辱骂，被吐唾沫，还要当心扔来的石子，真成了“过街老鼠”。

当天下午，因为支持高树奎大字报而被批斗的部分学生跑到北京新市委告状，但新市委说工作组是新市委派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他们无功而退。但内心不服，就又到《红旗》杂志社告状。《红旗》接待站的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他们，说：“工作组就是工作组，新市委是新市委，党中央是党中央，不能混为一谈。对工作组有意见，贴大字报是你们的权利，怎么会是反革命呢？”还给他们引见了林杰。林杰也明确表示支持他们。

当天晚上，北京新市委郭影秋、武振平、袁智平赶到北师大调查，看大字报，同时应围观的师生员工要求在露天的场地上讲话，大意是：希望北师大的师生员工按照中央的部署，在以孙友渔同志为首的工作组领导下，摆事实，讲道理，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

批评,可以帮助。但也要提高警惕,防止少数人混水摸鱼,扰乱阵线,把运动引向邪路,并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这个讲话,被反工作组的学生批判为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宣言书”。

同日,有学生转抄了北大以《二月兵变》为题的一张大字报。

这天,北师大还有人贴出《郭影秋你是什么人》的大字报,揭发北京卫戍部队准备在暑假期间进驻人民大学,质疑此举是否彭真的阴谋?郭影秋就是当时的人大校长。

6月20日这天,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学生撵走了一轻部政治部主任张万合为首的工作队。薄一波闻讯赶到该校,发表讲话,说“不要怕学生……”当他看到该校师生“反张”群情激昂,只好撤了张万和,另派两名工作组组长。但是轻院师生们依然不饶,说薄一波的讲话是“三大”;加大了革命阻力,大泼冷水,又跳出来一个大保皇派。

到了6月20日晚上24时,北京铁道学院师生也掀起驱赶工作组的风暴,学生们自己成立了革命师生委员会。

而在6月20日这天,有数百名北航同学分别到国务院、国防科委、北京市委反映、汇报工作组的情况。

以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是6月8日进驻北航,取代北航学院党委,领导全院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进校后,首先支持干部子弟刘克府、李明清、赖锐锐等人的大字报,罢了党委书记王恒、副书记周天行的官,交群众揭发、批判,带高帽子游街,号召全院师生揭院党委的盖子。不久,又将以沈元副院长为首的一批航空专家、教授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6月17日下午,赵如璋在全院大会上提出:“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谁有问题就揭谁的问题”的口号,出现了“全面开花”的局面,纷纷把矛头对准基层干部、辅导员、学生。

有同学开始怀疑工作组的做法,他们认为: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工作组号召“谁有问题就揭发谁,有什么问题就揭什么问题”,这是把矛头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大方向肯定错了。6月19日晚上开始出现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很快形成了炮火齐轰工作组的局面。6月20日同学们开始上访,反映工作组的问题。6月21日晚,3511班学生、班里的文

革组组长石兴国贴出一张大字报:《一条“无头”黑线》,分析了当时学院的运动形势,希望能发动群众揪出与北航有关的黑线及其后台。同时指出“工作组领导不力”,并提出工作组是揭盖子还是捂盖子、查黑线还是护黑线、靠群众还是怕群众,矛头直指工作组。

这一下,北航又开了锅,支持的、反对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工作组如临大敌,立即组织人马批判,围攻。这又激起了更多学生的不满:“彭真、陆平都能批判,你工作组为什么就不能批评了?”于是,3511班学生、烈士子弟戴维堤又贴出了“鉴于赵如璋同志为首的工作组把矛头指向了群众,大方向错了。赵如璋同志已不适宜继续领导北航的文化大革命,建议国防科领导另派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这是北航“赶走工作组”的第一张大字报。一时间,“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革命!”“打倒戴维堤的嚣张气焰!”“揪出反革命分子戴维堤示众!”的大字报、大标语铺天盖地贴满北航全院。

就在6月20日前后几天时间里,北京市有39所高等院校发生工作组被群众轰赶事件,工作组和群众的对立情绪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第69回：压不服，各地纷纷出事端 武汉市，“墨水湖中学事件”

仍然是6月20日，这天早上，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两名学生陈永康、何芳芳也贴出了一篇《揪出钻进我们肝脏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指出：

“自从6月9日工作组来了以后，我校斗争形势急转直下。无产阶级左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倍受压抑。刘超之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现在斗争几乎处于停滞状态。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的到来，非但没有改变这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反而变本加厉，充分地暴露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目。勾德元之流是我们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不共戴天的阶级敌人，是披着人皮的豺狼！他们窃取党的名义，利用工作组的职权，进行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运动刚刚开始，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勾德元之流就刮阴风、造谣言、煽风点火、挑拨分裂，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群众。”“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坚定地依靠革命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群众，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而是千方百计地制造纠纷，煽动、挑拨，好像对待敌人一样‘审讯’‘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的斗争视线。斗争革命同志，转移群众斗争的视线。”

大字报还说：工作组是“和他们主子一样玩弄一场假批判真包庇，假斗争真掩护的大阴谋。这绝对办不到！”“斗争起革命左派和革命群众，面孔板得这样凶，调门却喊得这样高，牙齿却露得这样长。你们和谁穿一条裤子，难道不是再清楚不过了吗！”

很明显，大字报的矛头直指工作组。

在陈永康、何方方大字报贴出的同时，该校高三四班范光义等7名同学也贴出了批评勾德元工作组的大字报，指责工作组入校后的做法不符合中央团结大多数人的方针。这张大字报是头天晚上，何方方

找范光义交换了对工作组的看法和意见，达成了共识后，约定第二天一起张贴针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其实，以勾德元为首的工作组已是第二批进驻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了。6月9日，曾有第一批工作组进师大一附中。他们进校后，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要求各班推选两名学生代表参加，商谈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座谈会是在教务处的一间大房子里召开的。工作组组长根据四清的政策说明座谈会的目的后，同学们一时哑然，没有人发言，一时间出现了冷场。

这时，高三三班的范光义打破了僵局，首先发言说：“根据中央四清文件精神，既然干部队伍中95%以上的干部是好的，而犯错误的干部中，95%以上的是可以教育好的，那么，学校的干部和老师绝大部分也应该是好的，是应该团结的……”

他还没有说完，只见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一位高一的女生腾地站了起来，大声的驳斥他说：“你说的不对，你说哪个老师是好的？”

范光义一愣，随口说出政治老师任允珍等几个老师，说明对他们的看法是错误的。

那位女生当即反驳道：这个老师出身不好……那个老师是右派……她还举了另外一些老师为例子，最后说：总之，老师中没有好的。

这位女生就是刘平平，刘少奇的女儿。接着，一些高一的学生代表纷纷发言支持刘平平的观点。

这时，工作组组长总结说，他同意并支持范光义的意见，干部、教师队伍中不可救药的坏人还是极少数的。

这期间，刘平平等同学揪出了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刘超。

但是，北师大一附中第一个工作组入校仅3天就突然撤走了。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第二批新工作组进校，他们进校不到10小时，就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我们已经掌握了你校反革命集团‘三家村’的全部资料，师大一附中，四类学校，党支部是黑党支部！”

这就是陈永康、何方方大字报中提到的“6月9日工作组来了以后”，“6月17日以勾德元为首的新工作组的到来”的缘由。后来人们纷纷说，刘少奇就是通过刘平平，直接掌控着北师大一附中的运动。

接着，该校将近90%的干部被打成“牛鬼蛇神”和“黑帮分子”。

77%的班主任被斗争、被围攻。这些干部、教师被剥夺了参加运动的权利,甚至进行非法的“劳改”,排队用鞭子抽打。邓小平的小儿子、初一学生邓质方还恶作剧的在暖壶中撒了尿,令老师喝下。

工作组的作法引起了一些师生的不满,于是有了6月20日陈永康、何方方等人的大字报。

写大字报的这两人均是中共预备党员,陈永康出身革军,何方方出身高知。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夜里,刘少奇在中南海家中接见了该校工作组组长勾德元和刘平平等几个参加工作组的学生。他说:

“校长刘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基本可以定了。”

针对陈永康、何芳芳两人贴出的大字报,刘少奇说:“出现了你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工作组长,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你去了三天,和他们无缘无故,怎么知道是好人坏人呢?……为什么要斗你呢?是因为你靠近左派,要好好看一看,现在多数不同意他们了。”

“写大字报的人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大字报谁都可以利用。”

“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

“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我们和你们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先跟左派,积极分子商量,再跟群众商量商量之后再斗。”

刘少奇又谈到学生代表参加工作组的情况,他说:“高一、高二的同学不能骄傲。高一高二参加工作组的人多,现在高三没有人,现在你们受到信任人家不服气,不服气是有道理的。他们比你们高,被高一领导有意见,怕丢面子,要理解人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们是高三,他们是高一高二,他们领导你们,你们也不服气嘛。高一、高二的人不要骄傲,不骄傲才能使他们服气。工作队可以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没有高三的人?因为你们当时选不出来人嘛,等以后选出来人再抽调。”

原来,师大一附中第二批工作组进校后,从学生中选了5名代表

参加工作组的工作。其中高一的学生 3 人,高二的学生 2 人。高一的学生刘平平就是那 3 名高一学生代表中的一位,是人气很高的学生领袖。工作组说:这是他们的全国首创:让学生参加工作组。

何方方、陈永康的大字报在北师大一附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于 6 月 24 日又对工作组做出指示:

“两方面都在争取群众,你们要驳,他们到底对不对?什么人在指挥,不听党的话,听谁的话?肯定听黑帮的话,搞地下活动,非法地煽动群众,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

“辩论好,一条条地驳,他出 50 张,我出 500 张,但是在搞地下活动,违反工作组指导,利用群众情况(不明)乱斗一气,把文化大革命搞乱。”

他指示:要“揭露何方方反动面目,你是谁指使的,把她孤立起来,不要打人,让大家驳,大家出大字报,他们那边一定有刘超、前市委或高级干部,他们利用群众对黑帮的气愤情绪,把文化大革命搞乱,背着工作组、革委会搞地下活动。”“可以讲,何方方为坏分子,……”

“向大多数人讲清楚,以前打人是坏人捣乱,不要上坏人的当,向所有的人讲,打人是何方方捣乱,要宣布一条,一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不许乱说乱动,如动就是现行反革命。”

6 月 20 日清晨,北京林学院学生蒋书铭、曾宪均 5 人根据访问新市委接待站大学组许克敏后的记录,整理成大字报《与新市委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也称《二十二个问题》。这份大字报回答了当时运动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深受群众欢迎,广为传抄,不胫而走,到 6 月底,就贴遍了哈尔滨、呼和浩特、上海、广州、武汉、重庆、西安、长沙等 34 座大中城市。但是,很快《二十二个问题》就被薄一波和北京市新市委打成“反革命黑纲领”、“大毒草”,声言要“消除流毒,肃清影响”。薄一波还把林学院定为“反干扰”的重点学院之一。大字报的作者、林学院的 5 位学生被打成“反党小集团”,遭受长期的残酷斗争。尔后的一段时间里,4000 余人因传抄这张大字报而被打成“反革命”,4 人被逼自杀身亡。7 月 9 日,工作组召集 12 个院校 4000 余人参加的“批判反动的二十二个问题大会”,斗争蒋书铭等人达 8 小时之久,并宣布“取消蒋书铭等的预备党员资格”。同一时候,清华工作组把清华大学转

抄这份大字报的3个人打成“小三家村”、“反革命”，一位教师因翻印《谈话纪要》被打成反革命，忿忿服毒含冤而死。

轰赶工作组的事件不仅在北京。6月20日，吉林大学师生将大字报贴进市委工作组组长李一平办公室，勒令其退出学校。随之，学生开始驱逐工作组。

6月20日，大连工学院发生揪斗教员、党员干部的“6·20”事件。部分学生围攻、污辱、殴打该院造船系政治辅导员，并将其捆绑游斗，喊出“一切权力归学生”、“打倒党总支”等口号。接着又绑架5名党员干部游街，对其进行殴打。

6月20日上午9时左右，湖北大学政治系师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敲锣打鼓送到学校行政大楼，其内容是要求当时驻校工作组彻底揭开校党委阶级斗争盖子，彻底解决四清运动中的问题。当天，湖北省委向湖北大学派出以曹金祥为首的工作组，并向全校师生传达了湖北省委关于召开全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紧急指示，宣布了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

政治系学生要求增加政治系教工代表名额，减少党群、人保部门代表名额。他们敲锣打鼓给校党委、校文革送去大字报，贴满了行政大楼门前的墙壁。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说学生们的行为是无理取闹，要求送大字报的同学在组织部干部拿出的名单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还追问“你们谁是头头？”未曾想，送大字报的63年级10名同学毫无畏惧，勇敢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为此，政治系张维荣和一批青年教师写了一篇题为《不准压制革命的大字报》的大字报，认为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的做法是压制学生革命。而且这一事件发生在南京大学匡亚明镇压学生事件后，发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革命大字报的社论以后，问题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要求省委工作组严肃处理这一问题。

当天下午13时左右，政治系学生发现他们写的大字报被人用水冲掉了，其中一名学生蒋汉洲马上跑回政治系。当时同学们正在午休，蒋汉洲边跑边喊：

“革命的学生起来，找校党委评理去！”

学生们一听到自己写的大字报被人用水冲掉了，都很气愤，蜂拥

来到行政楼找校党委和工作组理论，他们把行政大楼围得水泄不通，同学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求严惩冲掉大字报的人。情绪激动的同学们还向省委派来的工作组提出要求：“举行校内游行，反击当权派粗暴压制学生的嚣张气焰！要求撤销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的职务、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广大革命师生！”校内形势非常紧张。

工作组和校党委拒绝了同学们的要求。于是政治系学生一面在学校中心场地，校邮局旁搭起台子，向全校师生疾呼他们大字报被毁的事情，并要求严惩肇事者及向省委反映情况。他们还跑到校广播站，要求向全校广播校党委当权派压制学生的罪行，遭到校广播站负责人的拒绝，只好派人到各系呼吁全校师生支持他们的行动。一时间，很多同学都写了支持政治系师生的大字报。

与此同时，学生们还向省委打电话，找王任重，要求允许学生们在校内游行，抗议学校当局对学生的组织迫害。省文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要湖北大学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工作组与省委联系后，同意政治系派代表到省委反映情况。于是，政治系按照家庭出身好，政治表现好，和共青团员三条标准在全系各班推选了马兴林，田海兰，柴玉本，蒋汉洲等 15 名学生代表。政治系党总支为防止学生代表到省委出现过激行为，派总支副书记陈嘉陵和团总支书记张维荣带队。他们于下午 18 时，由学校派交通车前往省委反映情况。

张维荣等 17 名师生代表来到省文革接待室，向省文革接待站负责人汇报了当天上午学校发生的事情，提出了 18 条要求，其中包括改组校党委、改组校文革、要求湖北大学校刊和广播站交由革命师生领导、省委派调查组调查湖北大学情况等。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扶生和省委秘书长曹建国来到接待室，听取了湖北大学政治系师生们的意见后说：“赵抱一同志是王任重相信他才调来的，你们反赵抱一，还不是针对省委来的吗？”

赵抱一是湖北大学党委书记。

他们又说：“你们要夺权、夺枪、夺广播站，并向王任重同志发出最后通牒，这与 57 年汉阳一中事件有什么区别？”

陈扶生还说：“政治系有个核心小组，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核心

小组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

同时,他们表示,会认真考虑学生们提出的严惩毁坏大字报者的要求。于是请愿师生满载希望乘车回校。

谁知他们回到学校刚下汽车,学校就将带头人张维荣、陈嘉陵和请愿的代表抓到了大礼堂的主席台上,此时,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早已将全校师生集中在大礼堂,只等请愿师生回来,召开批判大会。

就在政治系的师生代表离开学校后,省委派往湖北大学的工作组长曹金祥指挥工作组和校党委,对湖北大学的“反革命闹事”组织反击。曹金祥向师生宣布了省委镇压学生的命令,说:“政治系要夺权、夺电台,向王任重同志发生最后通牒,他们要游行,要斗争陈立国(校文革办公室负责人)。根据省委指示,权不能夺,电台不能交!陈立国是好同志,好党员、不能斗!政治系的事件是一小撮坏人操纵的,我们要揪出政治系的坏人!”

接着,食堂工人开始撕大字报,辱骂、殴打学生。同时学校还派出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驱散了辩论的师生,包围政治系教工住地24号楼和政治系学生宿舍,学校实行武装戒严,发动全校师生写反击政治系右派的大字报,组织反对“政治系坏人”和“右派学生”的示威游行,通过校广播台,不停地播送“省委指示”。

批判会上,学校工作组和校党委将6月20日这天发生的事情称之为反革命事件,并号召全校师生进行反击。开完会后,将张维荣和陈嘉陵分别关在学校一号楼旁边的一栋三层楼一楼的小房间里,并由校防空连的民兵轮流看守。当天晚上,校武装部给民兵发了枪枝和子弹袋,当然里面没有子弹,并要求他们都将子弹袋挂在身上,一副全副武装的打扮。

20日晚上,一个班的学生民兵被派往政治系学生宿舍,监视政治系学生。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学生必须在夜晚12点以前回宿舍睡觉,防止闹事。由于天气比较热,到晚上23点左右,政治系学生还在宿舍前的广场溜达。学生民兵劝政治系的同学回宿舍睡觉。一个学生对他们讲:“心里有事,睡不着,我们到省委请愿,怎么会是反党呢?我家是贫农,我参加反党活动对不起毛主席。”

这就是发生在湖北大学的“620”事件,被称为“小匈牙利事件”。

此后，工作组以“620事件”为分水岭，以师生们对“620事件”的态度和立场进行区分。因为政治系师生代表到省委请愿前很多学生都写了大字报表示支持，一时间，学校师生人人自危，人人过关，被要求对“620事件”表态。写了支持大字报的同学纷纷检讨，唯恐被打成右派。一场刚刚燃起来的烈火被扑灭了，再也没有人敢写批判校党委的大字报了。

“620”事件第二天，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树成在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反党反社会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知识分子”，在全省范围开展“反右”运动的总动员，湖北大学第一批 11 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分子”，14 名政治系教工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点名批判即将被打成“右派”的学生 40 多名，写下血书、准备自杀的学生 15 名。

与此同时，武汉还发生了“墨水湖中学事件”。6月初，武汉墨水湖中学萧维业等人写大字报揭发学校领导压制学生革命的行为，遭到学校领导的威胁、恫吓，后来工作组进校，冲突进一步发展。6月16日，墨水湖中学出现了“616”打人事件，王任重在“情况反映”里批示“这不是一般的打人事件，这是比 1957 年汉阳事件更为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关于安静街中学和人民中学事件的“反映”上，王任重极为气愤地批示说“工作组无能，流氓学生这样猖狂，无产阶级专政到哪里去了？”

王任重认为这些就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反革命暴乱的典型”，要中南局批发文件到基层，并上报中央。6月21日，墨水湖中学工作组接到市委的指示，第二天就把那些起来造反的群众打成“反革命”，分别看押起来，组织群众斗争。7月21日，公安局逮捕了他们，关进武汉监狱。不久，他们就被分别判刑，其中有的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最小的 3 个 16 岁的中学生，也被判刑五年和三年。同时，工作组根据王任重的指示，举办了“武汉墨水湖中学现行反革命罪行展览”，把这些群众说成是“假左派、真右派”、“法西斯暴徒”等等。这个展览会展出了两个星期，在武汉市造成很大影响。王任重还亲自指示，要为这件事写社论和报道，武汉市长亲自审稿，市委机关刊物《支部生活》已排了版，《公安报》抢先登载，还计划 8 月 5 日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开公

审大会。

不仅在大学里抓“右派”，还在中学里大抓“右派”和“反革命”，王任重说“中学生的右派分子，是指那些流氓学生，这样的人要立即逮捕法办。”在 1966 年 6、7 月间，全省中学生至少被逮捕 180 多人，大的 14、5 岁，小的 13 岁，多数是因为给领导写过大字报。

第70回：发简报，陈伯达意见被否 女附中，卞仲耘屡屡被打

6月20日，刘少奇以中央名义批转了北京大学工作组的第9号简报，并加上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该简报在政治局传阅，康生、陈伯达都画了圈。曹轶欧20日晚上回到家里，将北大所发生的情况以及中央的批语向康生作了汇报。康生听罢老婆的情况汇报后说：

“这样吧，你们北大工作组首先拟一个报告，呈报北京市委及中央，主要讲半月来的革命大好形势及运动过程，然后再讲一下‘六一八’事件经过，并且要说明原因，要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要强调这次事件，完全是由校内外敌人内外结合，对我们实行的突然袭击，制造混乱，企图打乱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同时，要表明你们的决心，号召全校师生起来揭发，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办事。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要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斗争……把黑帮分子和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明天，我再给伯达同志讲一下，要他对北大的工作给予支持。”

曹轶欧说：“你这个方案好是好，可是由谁来写呢？”

康生说：“找张德华，他既是工作组的成员，又是团中央候补书记，今后还要进步嘛！”

第二天，工作组的笔杆子们在曹轶欧的授意下用一天的时间写出了报告的初稿，且也真的由工作组成员张德华把关通过，最后张德华在这个报告稿上写道：

“请承先、大姐（指曹轶欧）审阅后印发。”

曹轶欧看到这个报告后，即作了如下批示：

“德华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在策略运用上，很下了一番工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曹轶欧，6月21日。”

工作组拿到曹轶欧的批示后，没有再给张承先审看，也没有请其签名，便将这个题为《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报告》送到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

以后，北大运动趋于平稳，工作组加强了对群众的控制，北大校门戒备森严。各系、级之间不准往来，同学外出买东西，要两人同行，向工作组请假，回校后要汇报。来北大的外校师生一律被拒之门外。

6月20日，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通知胡启立，一起去见邓小平。胡启立吓了一跳，不知像邓小平这样的人为什么突然叫他去？

到了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对他们说：“那13个人并非积极分子。积极分子不同情那13个人”。

又说：“中学生也有反革命，最近枪毙的杨国庆就是中学生，只有19岁。对这种人就是要反击。”

杨国庆并不是中学生，其父解放前是地主，并且还做过国民党还乡团团长，解放后被枪毙。杨国庆认为，是共产党搞得他家破人亡，所以他成年后一有机会就搞破坏并以此宣泄仇恨。从1965年7月后，就策划偷越国境、投靠外国大使馆、刺杀外交人员和国外贵宾等阴谋。1966年4月29日11时50分，在东城区友谊商店内，他突然砍伤来自马里的新闻工作者代表团团长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使馆秘书的夫人，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起伤害外国人重大案件。1966年6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判处杨国庆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邓小平说的“那13个人”是指北师大女附中6月17日给工作组贴大字报的高三4班李黎黎等13名同学。他的这几句话就给那13位批评工作组的同学定了性质。胡启立回来后，赶快通知工作组：“那13位同学不是积极分子，要坚决依靠支持工作组的大多数，打击反革命。”

6月20日，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2名高中学生给江青写了封充满革命豪情的信并附上控告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材料。信中说“从现在我校及别的一些学校情况看，有很多理由猜测：这是一个新的有组织地、有计划地反对文革、反党的阴谋……而且我们更焦急、更深切地感到毒蛇就在主席身边。”

面对各地纷纷出现的反工作组浪潮，特别是北京6月20日发生的驱赶工作组的风潮后，6月20日晚，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提出一个书面建议：《中央文革小组的两项建议》。具体内容是：

一、建议全国大中学校、机关单位在适当时候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文化革命运动。小组成员名单由群众提出，经过群众充分酝酿，进行选举。票选或举手表决，由群众决定。

二、在最必要的地方，最必要的时候，可以由上级派工作组。工作组名单必须经过认真审查。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不是资产阶级保皇派。工作组的工作方法，必须认真地走群众路线，不能包办代替，独断专行。

军队按中央批准的办法办理。

由于与会的大多数都是赞成派工作组的，会上没有讨论陈伯达的这个建议。那天深夜，陈伯达开完会回到钓鱼台，唉声叹气，满腹牢骚的说：“我这个小组长不能干了。今天晚上邓小平同志主持会议，我在会上写了一个条子，提出取消工作组。他对我的意见根本不理，把字条往旁边一扔，不在会上讨论。我这个组长还怎么当？我非辞职不可。”同时他还指责刘志坚说：“他是副组长，却不支持我。”此后一连几天，陈伯达在钓鱼台逢人就发牢骚，还说要到天津“休息”几天。

6月21日，刘少奇提出：特殊情况下，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这不能允许，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邓小平也在会上提到了关于工作组工作方法的意见。

6月21日上午，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全校大会上做了进校18天的小结，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在讲话中说，“进校18天了，学校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昨天我们对工作进行了群众性的总结，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将运动推入一个新的高潮。”他宣布，当天下午召开揭发卞仲耘的大会。

工作组进校后，卞仲耘在北京饭店参加新市委组织的集中学习。工作组叫卞仲耘回学校参加揭发批判她的大会，新市委开始不同意，

后来经工作组再三要求,说工作有困难,这才让卞仲耘回来了。

6月21日下午14时30分,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进校后的第一次揭批会在大操场召开。那天天气很热,卞仲耘一个人站在台上,身后是手持体育课用的体操器械木枪的几个从高三学生中专门挑出来的“贫下中农子弟”。副校长胡志涛(女)、刘致平,教导处主任汪玉冰(女)、副主任梅树民4个人站在台下。高三4班反工作组的13个人被单独安置在学生队伍后面,也有学生持木枪站在她们身后。

文化革命以前,卞仲耘主管党的工作,日常教学工作由胡志涛副校长主持,普通学生对卞仲耘不是很了解。

大会开始,卞仲耘首先作了检查,然后由群众揭发批判。

师大女附中英语丁老师的前妻袁淑娥第一个上台发言,手里还拿着一张照片,乍一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丁老师的一张合影,说卞仲耘生活作风有问题,破坏了她的家庭,动情处声泪俱下。除了揭发卞“乱搞男女关系”之外,还说卞过去曾对她说过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话,说卞仲耘是“漏网大右派”等等。

随后,袁淑娥又叫她在上小学的儿子上台念发言稿,控诉卞仲耘要“谋害”他的妈妈。袁淑娥的弟弟,也是一名高中学生跳上台去,按压卞仲耘低头。台下,学生群情激愤,振臂高呼口号,场面一度失控。卞仲耘身后手持木枪的学生,你一枪、我一枪就把她捅倒了。年届五旬的卞仲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平时身体就不好,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暴力?当时就发生了呕吐。

袁淑娥是大连工学院的俄语老师,1959年与卞仲耘同住一所医院时相识。1963年女附中缺英语教师,袁淑娥的丈夫当时在北京空军,也有转业到女附中的意愿,经卞仲耘介绍,学校领导讨论通过,她丈夫调入女附中教英语。这期间,袁、丁夫妇经常争吵,卞仲耘从中做过一些调解,但袁、丁最终还是离了婚。袁淑娥多次向女附中领导提出要求,希望扣丁的工资补贴她的家用,卞仲耘认为应该按照法院判决书执行,没有答应她。于是,她开始向有关方面控告。1966年5月,她将上万言的揭发信,复写多份,给毛泽东、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等寄去。揭发信把个人的所有怨恨都上纲上线到政治高度。

其实文革开始后不久,袁淑娥就经常来学校活动了,她的控告信

也转到工作组手上。

批斗会前,她曾找过工作组要求参加大会,工作组不同意,可她还是带着儿子和母亲来冲进了会场。她手里拿着的那张照片,粗看是卞校长和她前夫的一张合影,实际上是卞校长夫妇和袁淑娥夫妇四个人的合影,剪去两边的人,就成了卞、丁的合影。

袁淑娥此后一直在学生中间活动,包括学生去卞校长家贴大字报,都是她领的路。

袁淑娥的发言前后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学生的愤怒情绪一波又一波。除了袁淑娥,又有六、七位师生代表上台发言,其中一位管过人事的老师上台发言揭发说,卞仲耘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假党员,包庇原语文教研组长,并说语文教研组长是中统特务。一个说卞仲耘有生活作风问题,一个说卞仲耘是假党员,还包庇国民党特务,这就如同两颗重磅炸弹,在学生中激起了强烈的愤怒。

工作组组长张世栋会前去团中央开工作组组长会,胡克实说:“如果发生武斗,你们一定要挺身而出,坚决制止!”他赶回学校时,批斗会正在进行。面对突发的暴力行为,他说:“今天大家很愤慨,这是可以理解的,应该支持的。打她几下是不对的,今后注意不用打她,因为揭发就可以打倒她。为了继续斗争,要好好准备炮弹继续打,提高警惕,准备全歼,取得最后的胜利!要好好贯彻党的政策。……光荣、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

最后,工作组做了小结,认为“卞仲耘的问题,根据大家的揭发,是非常严重的,大家要提高警惕,她的检查根本不是检查,她想蒙混过关,想滑过去。我们绝不能让她滑过去!为了彻底清算她的罪行,我们请示了上级,决定从现在起停她的职。为了彻底弄清楚,为了清算她,我们要开大会,继续下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我们的主要矛头是牛鬼蛇神,不是同学们,一切革命的师生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会后,有些学生自动押解卞仲耘回家,一路对她继续辱骂,往她身上吐唾沫,在公共汽车上有些乘客见到这种情形,都很惊恐。

胡志涛校长对袁淑娥参加学校的批斗会十分不满,散会后,工作组把她叫去,问她:“今天的会开得怎么样?”

胡志涛沉默了一会儿说:“群众发动起来了。但是,你们让校外一

个女人来控诉卞仲耘，这对吗？”

工作组长没说话，胡志涛走了。

反对工作组的老师和学生认为，让校外身份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袁淑娥几乎独占了女附中革命群众发言的讲台，而李黎黎等同学的发言则数次被强行制止，以致使李黎黎等退出会场。她们认为，工作组迅速把斗争矛头转向卞仲耘是为了掩盖斗争群众的罪行，欺骗群众。

6月22日下午13时30分，批斗会继续，与会发言者继续揭发卞仲耘追随前北京市委反党集团的种种耸人听闻的“反革命罪行”。譬如把学校的各种备战措施说成是搞军事政变的反革命活动等等。会场气氛较前一天更加白热化，口号声此起彼伏，逼卞仲耘即刻交代现行反革命活动。卞仲耘被戴上高帽子、被强迫弯腰低头，一时间，她被身后看押的学生用木枪捅来捅去，发言者和临时跳上台的人们，对她推搡、罚跪、拳打、脚踢、吐唾沫……场面几度失控。

卞仲耘又回北京饭店开会，并向上级反映她被批斗的情况。她给上级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检讨自己的“错误”，包括那些不是她的错误的东西。她也表示自己拥护文化大革命，然后她请求不要对她使用暴力。她在信中写道：

“在群情激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罚跪，拳打、脚踢，手掐，用绳索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沫。”

卞仲耘事后在给上级的信中说，她从58年起就不断患病，几度长期住院，动过手术，患有心脏病（主动脉硬化症）、高血压等疾病，在批斗会前几天她刚查过血压，是180 / 110毫米汞柱。突然遭受殴打折磨，身体实在难以支持，头昏眼黑，几度晕倒在地。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袁淑娥不仅两天都参加了会，还上台直接揪她的头发。

6月23日，袁淑娥带领几个学生，去卞校长住处进行“调查”和“发动群众”。她还动员卞家从前的保姆去学校揭发和控诉，遭到拒绝。6月24日上午，女附中的学生一批又一批来到卞家所在的宿舍楼搜集材料，把大字报贴在大门上和楼道上，语言粗暴恶毒，画的不堪入目。

第71回：六二一，吉林省“红旗事件” 出奇文，造反精神万万岁

6月21日，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东北人民大学，即吉林大学，发生了“红旗事件”。自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被揪出的消息公布后，东北人大大的大字报开始揭发党委第二书记陈静波与原东北人大校长兼第一书记匡亚明的关系的大字报。6月14日，吉林省委派长春市委书记处书记李一平带领市委工作组进驻东北人民大学。此后，省、市工作组相继进驻吉林省各大专院校。

工作组进校后，与那些给校党委提意见的群众发生了各种冲突。6月21日，在一片“李一平滚蛋”的声浪中，市委工作队召开东北人大全校党员大会。会上李一平号召党员表态支持工作队。市委第一书记宋洁涵对工作队员讲：“往外赶工作队，说明有坏人捣乱。要准备斗争。”会上决定，晚上开群众大会，把市委工作队扩大为省、市委工作队，仍由李一平任队长。

全校党员大会的消息传出后，很多群众义愤填膺。当晚，大家从四面八方向校大礼堂聚拢，参加晚上工作组召集的群众大会。人们纷纷涌入学场，打破了工作队“凭票入场对号入座”的规定。群众进入礼堂后，发现台上无国旗，仅有毛泽东像，还歪挂在那里。同学们上前与工作队交涉，要求把毛泽东像摆正，挂上国旗。工作队的副队长说：“得请示省市委。”这一下激怒了师生，近300名学生涌上主席台，他们自己动手摆正了主席像，又登台扛起国旗。工作队对大会局面失控。

晚上23时，省市委紧急从郊区公安分局调来两汽车公安人员，帮助“维持秩序”，又由各工厂、机关、学校临时抽调270多名四清干部，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韩容鲁为首组成工作队。全体队员进入会场后，强行登台，轰赶台上学生，这就是当时轰动长春市的“红旗事件”。

“红旗事件”被省市委定性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右派捣乱反革命事件。事后，宋洁涵指示工作队要详细调查“红旗事件”的参与者，

整理材料。省市委工作队对学生进行排队，把数名带头的学生打成“反革命”。

这天，吉林省不仅是在吉林大学发生了“红旗事件”，省体校也出现学生给主管体育工作的副省长张文海贴的大字报。同一天，长春市四中还发生师生揪斗本校领导的事情，这在过去都是不可思议的。四中的事情，被中共吉林省委与长春市委定为“匈牙利式的反革命事件”。

6月22日，北京师范大学带头贴出大字报的谭厚兰突然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评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从支持工作组转而反对工作组。她当即受到围攻，而且愈演愈烈。

谭厚兰的这次翻跟斗使她的威信骤然下降，原来跟着她支持工作组的那些人感到受了愚弄和欺骗，而反工作组的一方说她翻云覆雨，一副投机政客嘴脸，骂得她狗血喷头，就连最初和她一起写大字报的那几个人都背叛了她，从此销声匿迹。

6月22日这天，刘少奇、邓小平再次致信毛泽东：“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准备在“七一”党的45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阅后说：“在党内发表就行了。暂不公开发表，再等一年。”

鉴于北京学校反工作组的风潮兴起，6月23日，北京市新市委书记李雪峰在北京饭店召开市委工作会议，作了著名的“623”报告，提出“抓游鱼”。

他说：“情况复杂，反革命、黑帮、保皇派，资产阶级的权威及其拥护者、右派学生跳出来，趁机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与工作组争夺领导权”。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利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对黑帮的仇恨，企图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李雪峰在报告中指出：“在现阶段，拥护新市委还是反对新市委是拥护党中央和反对党中央的标志。多数人反工作组是人民内部问题，但是确有坏人。对右派赶工作组一定要清理。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一定要站起来保卫党，不站起来，纳吉就要上台了。”

他说：“毛主席早就说过‘一个游鱼三尺浪潮’，有几个反革命分子并不可怕，抓出来就是了。现在我们对文化革命一定要加强领导，绝不能让各种‘游鱼类’制造混乱。党员干部要挺起腰杆来，加强党的领导。我们不可一日无党的领导！党组织垮了的那些单位，要像救火那样迅速派出工作队！”

北京各学校传达了李雪峰的报告后，先后开展了“反干扰”，局势开始稳定下来。据记载，在“反干扰”时期，仅在北京 24 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把 10211 名学生打成“右派”，把 2591 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6月23日，中共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抓学生中“牛鬼蛇神”的请示报告送到了刘少奇的办公桌上，刘少奇当即做出了批示：

“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

“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不管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

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 年反右不就是这样干的么？1964 年“四清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他在批转一系列中央文件时多次指示，要准备再打“几十万右派”。例如：他在《中央转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批示：

“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分子（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来，但应放在运动后期进行；打击应当小些，一般控制在百分之一以内，高中应届毕业生，是打击个别最坏的，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子。高中二年级以下和初中学生中，一律不进行反右派斗争，不划右派分子，如发现行反革命或坏分子，可依法处理。”1966 年，全中国有一百多万大学生和数千万中学生，再加上数百万教师，如果按 1% 的“右派指标”，将有近百万青年学子被打成“阶级敌人”。

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清华附中，自工作组进校不久，与红卫兵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承认独立于党组织之外的学生组织，在共产党当权时代还从来没有过。所以工作组虽然表态支持红卫兵是左派，仅仅是指这批以“红卫兵”署名的学生而已，但从未把红卫兵作为一个组织来承认。这一点他们得到过上级的指示，态度始终是非常明确的。

6月21日，清华附中工作组召开清华附中全校师生代表大会，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上，红卫兵与工作组发生了分歧。工作组要求革委会有广泛的代表性，应该吸收一些红卫兵以外的左派参加。红卫兵认为那是“拉夫”，会使革委会背“包袱”。结果，清华附中文化革命委员会的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任主任，张晓宾、卜大华任副主任。通过这件事，工作组发现并认为，红卫兵领导核心对工作组的领导和团结大多数的问题上，存在不正确的认识。

在此前后，一些红卫兵违背工作组布置的学习、讨论内容，自己另搞一套；一些班级不顾工作组的劝阻，开了“整”右派学生的会；有的革委会成员在同学中公开谈论与工作组的矛盾。当时社会上也很混乱，有传言说“团中央有问题，三胡完蛋了。”“三胡是指当时团中央的三位领导：第一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是胡克实，候补书记是胡启立。

6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在文化大革命中团结大多数的问题。清华附中红卫兵认为这篇社论只讲团结，不讲斗争，是折中主义。红卫兵决定公开进行反击。6月24日，一篇题目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彻底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的左面，文章说：

“《中国青年报》6月23日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是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的文章。它出来之后，立即受到我校右派的赏识，把它当作打击左派的一根大棒。”

6月24日这天，红卫兵在教学楼一楼门厅的正面还贴出一张名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后来传播之广，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他们那篇批判《中国青年报》的大字报。

大字报产生于6月23日下午，清华附中骆小海等同学在二楼办

公室聊天，说到了要发扬造反精神的问题。那天，他们谈得太兴奋了，一直聊到天黑，甚至忘记了开灯。最后，在场的两位女同学意犹未尽的：“讲得太好了，太精彩了，如果能写下来就好了。”于是，大家把任务交给了骆小海。

当时中国人的一般思路是不能说“造反”的，那可是大逆不道之极，简直就是罪该万死！在封建皇朝时是如此，在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里，更是如此。虽然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但那是为了保卫共产党的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这时你说“要造反”，那是要造谁的反？造共产党的反？夺共产党的权？那不是右派又是什么？

但骆小海之所以敢说发扬“造反精神”，那是因为他知道，毛泽东曾经说过“造反有理”。出于一种戏弄或恶作剧的心理，骆小海他们决定暂时不提毛泽东曾说过的这条“造反有理”这段话，先写一张大谈特谈“造反”的大字报，看看工作组和其他人的反应。于是，就有了6月24日这张标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该文全文如下：

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说，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有些大胆的反对造反的人，今天突然变得忸怩起来，絮絮叨叨，吞吞吐吐。什么太片面了呀，什么太狂妄了呀，什么太粗暴了呀，什么太过分了呀。

这统统是谬论！要反对就反对，何必羞羞答答的呢？

我们既然要造反，就由不得你们了！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厮杀。什么“人情”呀，什么“全面”呀，都滚一边去！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片面了吗？你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全面呢？看来你们的全面是“合二而一”，是折衷主义。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狂妄吗？我们就是要“狂妄”。毛主席说：“粪

土当年万户侯”。我们不但要打倒附中的反动派，我们还要打倒全世界的反动派。革命者以天下为己任，不“狂妄”怎么行呢？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粗暴了吗？我们就是要粗暴！对待修正主义怎么能缠缠绵绵，大搞温情主义呢？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你们不是说我们太过分了吗？老实说，你们所谓不过分，就是改良主义，就是“和平过渡”。这是妄想！我们就是要把你们打翻在地上，再踏上一只脚！

还有些人，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对造反害怕得要死。你们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缩在修正主义的蜗牛壳里，一有造反的风声，你们就神经紧张。这些日子，无情的斥责声天天送入你们的耳中，你们天天心惊胆颤，你们不感到难受吗？你们怎么活得下去呢？

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

果然，这份战斗檄文似的红卫兵宣言一经贴出，迅速引起了巨大反响，立刻产生了轰动效应，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看这张大字报，连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和大学生也纷纷赶来看附属中学学生的这张“造反”奇文，与此同时，也招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对这张竟敢在共产党天下“造反”的大字报的反对和批驳。

正如红卫兵所料，工作组看了大字报，觉得难于理解、不可思议。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造谁的反呢？他们认为“造反”这个口号在社会主义中国不适用，是不确切的或者说是错误的。工作组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这张大字报，“实际矛头是指向工作组的”。他们立即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清华附中工作组将红卫兵与他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归纳为：“一是主攻目标的问题。

我们认为要首先集中火力打击极少数的牛鬼蛇神，而他们借口‘触及人们灵魂’、‘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清除一切旧思想’，想整同学，有的班已整了三次同学。二是团结绝大多数的问题，我们认为经过斗争，要逐步做到团结 95% 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们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说：‘我们班上起码有 30% 的人不能团结’。三是党的领导的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通过工作组来体现，他们却提出：‘只相信毛主席’，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实际上是不要工作组的领导，搞红卫兵专政。”工作组当时确立要采取的方针是“保护左派的积极性，在旗帜鲜明、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以最大的耐心来教育左派，提高警惕，仔细观察动向，注意左派核心是否有假左派真右派混入。”

第72回：难抵挡，工作组辩论败北 不堪辱，江隆基命陨兰州

6月24日，清华大学贺鹏飞、刘涛等人向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汇报工作，王光美指示，要让知情人检查、交代、上阵。还让干部和群众背靠背揭发。工作组提出：要在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是斗黑帮，一条是批判蒯大富等人的问题。

很快，清华园出现一批反对蒯大富的大字报。这天，工物系一些同学在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安排下，围着蒯大富进行辩论。蒯大富倒是毫不畏惧，大声说：“你有什么事情讲，就贴大字报吗。”

“不行！一定要辩论！”工物系的同学不答应。

蒯大富发现前来和他辩论的人越来越多，知道这是有来头的，索性说：“辩就辩，我们晚上开全校大会辩论，看谁有理。”

“好，晚上辩论。”

大家约好晚上辩论的时间、地点。蒯大富还特别贴出大海报，说：今晚要召开辩论会辩论“电话事件”，请大家参加，并特别指名要张茜薇和工作组组长必到。

王光美马上指示说：“开辩论会好嘛，人家要向你们夺权了，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了，你们也应该说说话了。”

当天下午，叶林把贺鹏飞、刘涛等几个学校文革的主要负责人找去，布置了批判蒯大富的重点，又匆忙地把刘涛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王光美在那里对他们又如此这般的讲了一番。

晚饭刚过，全校师生像潮水般涌到大礼堂听取辩论会。当刘涛、贺鹏飞他们赶到大礼堂时，门口已经挤满了人。

他们见安排的人进不去，又和工作组商量，是否取消晚上的辩论会？但是，来了这么多人，群众不答应。

辩论会按原计划进行，由校文革主任贺鹏飞主持。蒯大富这边出3个人：蒯大富、孟家驹和鲍长康，对方也是3个同学上台。工作组组

长叶林没有去，只由张茜薇一个人前去应付，王光美则在甲所听实况转播。

蒯大富首先上台，高声朗读毛泽东的语录：“最高指示：‘共产党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接着他讲了6月20日，他们班开座谈会，工作组通知王光美来却没有来的事情经过，然后质问张茜薇：“这是怎么回事？！”

台下的群众非常亢奋，立即报以一阵雷霆般的掌声，并纷纷督促张茜薇赶快澄清事实，张茜薇一个人面对如此场面，十分紧张。她慢慢地走上台，支支吾吾地说：“电话是我接的，……”

她刚说到这里，底下就大哗起来：“那你上次撒了谎，说电话不是你接的。”

待人声稍静之后，她又道：“电话是强斋打来的，说有人要来参加化九班的讨论会，我听成了王光美同志要来参加化九班的讨论会了。”

台下的学生仍然不依不饶，她只好再次上台解释说：“是我听说有人要来，我就理解为王光美要来了。”

但是，在场的群众仍然纷纷提出质问，张茜薇上台三、四次，一人难敌众口，愈澄清，疑问愈多。张茜薇，这位领导过海陆丰起义的烈士张太雷的女儿，实在有点招架不住了。

工作组几个副组长杨天放、周赤萍一看形势不妙，分别上台，想把蒯大富他们压住。但他们都当惯大领导了，已经不会以平等的身份参加这种辩论会了，上台后讲的话，就更没水平了。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周赤萍说：“我们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我们是代表毛泽东思想的……”

说到这儿，台下哗然大乱，倒彩四起，嘘声大作，学生们质问他说：“你怎么能代表毛泽东思想呢？”

是啊，连彭真、罗瑞卿都有问题，被打倒了，你一个副部长就跑到这里来说代表毛泽东思想，凭什么呀？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周赤萍无以为答，只好在一片哄笑声中下了台。

坐镇甲所的叶林见大势不好，只好亲自来到礼堂，他没有正面回

答学生们的提问，而是蛮横的定调说：“我们工作组是新市委派来的，是代表新市委的，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这就是夺党的权，就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

他要求全校学生表态，要么站在蒯大富一边，要么站在工作组一边。

叶林的讲话更加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感，大家认为，蒯大富写的批语和大字报，只是表明他对工作组的不同意见，最多不过是缺点、错误，怎么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工作组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势压人，乱扣帽子，大家不同意工作组将蒯大富打成反革命。同学们哄起来，硬把叶林给哄下了台。

这时，化 902 班王大定跳上台说：“蒯大富这个大字报我是不赞成的，而工作组这种作法也是错误的，是挑动学生斗学生。”

虽然，拥护工作组的学生也组织了反击，如刘涛和贺鹏飞，纷纷上台表示应该拥护工作组的领导，但无济于事。刘涛在激烈的唇枪舌箭中甚至脱口而出：“我母亲也认为工作组是正确的。”

她的母亲就是身份显赫的王光美。但是，这种以势压人的做法更加引起学生们的反感。本来群众对工作组仅仅依靠高干子弟进行文革的做法从心里就不服气，刘涛的话一出口，立刻招来一片嘘声。

这时，主持大会的贺鹏飞和蒯大富商量说：“蒯大富，快 11 点了，明天晚上再接着辩论怎么样？”

蒯大富同意了。他在台上说：“贺鹏飞同志讲，今天晚上比较晚了，到此为止，明天晚上继续辩论。”

辩论会以工作组的失败告终，学生们兴奋异常。当蒯大富从台上走下来后，一个扎两个小辫的小姑娘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说：“蒯大富，向你祝贺！我们胜利啦！”

蒯大富问她：“你是谁啊？”

她说：“我叫刘刚。”

两只翘起的羊角辫年轻朝气的刘刚是清华附中的学生，她给了“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蒯大富强烈的印象。但他不知道，刘刚在清华附中也是人们追捧的“英雄”。她作为清华附中排球队的主攻手和女排队长，在深受清华竞争精神熏陶的清华附中，高高跃起，带领她的

球队夺得海淀区排球冠军。那一刻，崇拜者躺倒在地，为她抓拍镜头。

蒯大富他们很兴奋，一屋子人，谈了两个多小时。

由于蒯大富发言有理，而工作组反驳苍白无力，在甲所收听辩论实况的王光美气的说：“这简直了不得，像资产阶级议会一样。”

散会后，工作组匆忙把刘涛、贺鹏飞、李井泉的儿子李黎风、乔冠华的儿子乔宗淮等人送到刘少奇家里，听王光美的总结。

王光美说：“肺都气炸了，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典型。积极分子为什么跟不上去，不能把他驳倒？要学习农村四清的经验，要‘亮典型’，‘打活靶子’，要把蒯大富作为典型、作为活靶子来打。既要在理论上把蒯大富批深批透，还要把他的组织活动查清。”

蒯大富他们还天真地准备 6 月 25 日再接着辩论。可第二天早上，学校就广播了：“今天晚上的辩论因故停止。”

6 月 25 日这天，清华大学校园里反工作组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地贴出来，有一个班一共 30 人，有 26 人贴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

“624 辩论”造成了混乱，工作组已管不了人了。为了压下蒯大富为首的一些人的嚣张气焰，从 25 日开始，工作组利用传达李雪峰以北大“618 事件”为依据所做的“623 报告”的机会，根据群众对工作组的态度，将群众排成若干等，分成十几批，发票去听传达。反工作组、怀疑工作组的人都不准参加。这一天，校园里出现了“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标语、口号。学校内凡有怀疑工作组言行的人，都成了批判对象，被称为“蒯派人物”，被看管起来。一场大规模的追查“蒯式人物”运动在清华大学展开，打击面迅速扩大。化 902 班被分到化 9 年级各个班看管，蒯大富是第一号人物，由上年级的学生看管。学校成立两个“专案小组”，一个是“蒯大富专案小组”，另一个鲍长康等“十人专案小组”。“蒯大富专案小组”是重点，集中了全系的精力整他的材料。

清华大学展开了“反蒯斗争”，各系，各班都批判“蒯氏人物”，铺天盖地，成了运动的中心。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全系大会，批判蒯大富，说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说蒯大富是校党委留下来的定时炸弹，是校党委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

很多同学对这种做法都不理解，就在几天前，蒯大富还在写大字报反对校党委嘛，怎么一反对工作组就成了反革命呢？

6月25日,清华附中的刘刚和张庶平同学把《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转抄到清华大学去,用来支持蒯大富与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斗争,结果引来了清华大学一批学生对红卫兵的猛烈攻击。清华附中工作组则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针对工作组的,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中央把这篇大字报定性为“反动”。

6月26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听了刘晋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情况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没有政策水平”,“相当不懂事”。他提出“要跳出红卫兵的圈子,团结红卫兵以外的左派”。他在6月27日的汇报会上说:“我看就是要消化红卫兵,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对红卫兵的政策,采取教育提高方针,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不能团外有团。”

一心想将运动纳入“正规化”轨道的工作组与红卫兵发生摩擦是在所难免的。因为红卫兵是自发成立的、自主性很强的学生组织。他们宣称:“我们的领导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他们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忠诚和服从已经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理解,而不是像从前,或者像当时的一般群众那样,简单地把各级地方和基层的共产党的组织作为共产党组织来服从。有一个干部子弟在给同学的信说:万万想不到彭真、罗瑞卿这些老党员原来是这样一批危险人物。“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相信毛主席,只能相信党中央(我指党内),一切人都应怀疑,只要不符合主席指示,什么人都要攻。如果我们的心软(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心),要会亡党亡国亡头。”

6月25日,甘肃再传噩耗: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自杀身亡。

6月17日,正在西安参加西北局会议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给兰州打来电话,传达刘澜涛的话说:“江隆基不是自己人”。当天,兰州大学工作组支持的一些“左派”学生便到江隆基家中。李贵子将江隆基从家里揪出来,一直拖着跑到操场,把鞋都跑丢了。他们让江隆基跪在层层叠起的桌子椅子上,头戴重十几斤的铁笼子,拳打脚踢,逼他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此时,学校图书馆和体育教研室也在操场斗争了图书馆馆长刘佛吾、图书馆馆员满达人、靖钦恕等3人。操场上人很多,场面已完全失控。

这天夜里,兰州大学大操场形成斗争风暴,几千人涌向操场,批斗

黑帮。没有统一组织,各自为政、各自为斗,场面十分混乱,根本无法控制。一次就在大操场揪斗了 70 余人,打人、戴高帽、跪桌子、跪凳子、揪头发,大操场上跪满了被‘揪’出来的人,有人把鞋都跑丢了。

当天,李贵子等人给省委写了一份《就六月二日——六月八日我校文化大革命情况向省委作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们开列了在兰州大学“67 事件”中反对他们、反对工作组的同学名单,将他们打成“反革命急先锋”。名单上的人于 6 月 8 日以后,都在全校进行了批斗、辱骂和毒打。

第二天,兰州大学又批斗了 117 人。

6 月 22 日,甘肃省委告诉兰州大学李贵子,他们已经做出撤销江隆基职务的决定。第二天,在兰州大学又召开斗争江隆基大会,再次对他使用罚跪、戴高帽子、拳打脚踢、游街等方式,强迫江隆基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6 月 25 日上午,中共甘肃省委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撤销江隆基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当天下午,江隆基不堪侮辱,愤而自杀。

兰州大学当时在全国位列第四,仅次于北大、清华和复旦。兰州大学所以能在穷乡僻壤的大西北光芒四射,主要是因为教育家校长江隆基。

江隆基,陕西省人,1925 年考取北京大学,1927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 年留学日本。1931 年留学德国。曾任旅欧华侨反帝同盟书记。1936 年回国后,在北京、上海等地参加革命活动,两次被捕,曾参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任陕北公学副教务长、华北联合大学教务长、延安大学副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1952 年 10 月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59 年 1 月任兰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1962 年提出高等学校八条工作经验。

第73回：中科院，发生“应地所事件” 通情况，刘邓见民主人士

6月22日，聂荣臻和陈伯达先后来到中国科学院，目的之一是讨论根据周恩来指示起草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保护自然科学家的政策性文件，也讨论了“应地所事件”。

“应地所”是中国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简称。文革开始后，一些家庭出身好的年青人渴望追随伟大领袖干革命。在应地所，带头造反的是所里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复员军人王锡鹏，还有一些研究室里的年青研究人员，大都是这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在一种亢奋、猜疑的状态中，用审慎、怀疑的目光审视周围，察觉一切蛛丝马迹，希望发现和揭露任何可能是反党黑帮的政变阴谋。

很快，他们在所保卫科董如江科长身上看出了问题。当时董科长的神经系统发生一些障碍，经常说些不合逻辑的话，而且这些话还常常与政治有关。但在一些革命群众看来，这绝不是偶然的胡话。他们怀疑，董如江作为保卫干部，肯定知道某些涉及政变阴谋活动的内情，或简直就是参加者，而他之所以神经不正常，正是因为他作为知情人或参与者而受到压力或胁迫所致。他们推断董如江的生命安全正受到威胁，可能会被杀人灭口，于是就把董如江“保护”起来。

当时院里正在布置各所对人员作“政治排队”，院保卫部要求各所上报有问题人员，就是带头闹事者的名单，而董如江科长泄露了这件事。群众到院保卫部追问，院里否认此事，于是这也成了群众将董如江“保护”起来的理由之一。

恰在此时，中科院党委要求全体人员都下乡参加麦收。每年麦收，中科院都会派部分人员到郊区帮助农民干活，但是北京地区的冬小麦在6月上旬就已成熟，而这时已到20日左右，农村的麦子早已收割完毕，派那么多人去干什么呢？于是，王锡鹏等人怀疑这是院里的阴谋，企图用麦收对抗文化大革命。实际上，院党委也确实想通过麦

收使运动“冷一冷”。

应地所位于北京西苑。在 6 月 19 日这天,王锡鹏等人在所内擅自撬开了保险柜,控制通讯设备和交通工具,监控保卫干部董如江。接着,他们 30 余人乘卡车来到研究所集中的中关村,敲锣打鼓,宣传麦收是个大阴谋,号召大家抵制,并贴出了矛头针对该所所党委的大字报,这就是当年全院闻名的“应地所事件”。

他们的这些行动被院党委认为是不可容忍的反党活动,中科院连夜通知各所,说应地所有 200 多名右派上街闹事,要各所防范。当夜院党委扩大会议上,将王锡鹏等内定为反革命。

6 月 22 日这天,在文津街科学院的小会议室里,陈伯达对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张劲夫说:“你要把权夺回来,不然一切后果你要负责”。

陈伯达批评张劲夫说:“王锡鹏把有原子弹爆炸资料的保险柜都撬开了,你还不抓他? 要当反革命来抓! 你太软了,你失职了,你要坐牢!”

张劲夫把陈伯达的指示编成了运动简报上报下达,并且把王锡鹏作为反革命进行了行政看管。

6 月 23 日,中国科学院领导向李富春、聂荣臻两位副总理汇报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两位副总理也做出了指示。

当晚,应地所一位普通的行政干部吴智诚在所里贴出一张揭发王锡鹏等人的大字报。24 日,科学院的《科学报》出版一期《号外》,除登载吴智诚的大字报外,还发了《应地所反革命复辟》的报道和一篇社论,说应用地球物理所发生了反革命事件。该所王锡鹏、赵子善、章公亮、范天锡、田淑清、吴蓉璋等 6 人不相信所领导,反革命夺权,非法扣压所保卫干部董如江。号召全院职工反击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反党活动。

24 日,王锡鹏等人在地球物理所门口被斗争,然后被行政看管,就是监禁。同时派工作组进驻应地所,接管各级党团组织的领导权。

25 日,又在中关村召开声讨大会,声讨化学冶金所的反革命事件。这个所远不如应地所影响大,但是其领导人物李亚男家庭出身不好,有典型性,所以在全院范围内予以声讨。

27 日前后,科学院参加麦收人员陆续回所,发现形势大变,大字报

铺天盖地，已不再针对领导，而是反击前一阶段给领导提意见的普通群众。周末不休息开会，学习《科学报》号外，讨论应地、化治两所是不是反革命事件，麦收是不是大阴谋。在前一阶段给党委贴大字报的人全都遭到批判，大批群众被打为反党分子。

事后，科学院党委给陈伯达写了报告。陈伯达看到院党委的报告后，于6月28日亲自到应地所，当着群众的面责问科学院党委成员说：“你们为什么抓人？我接到你们的报告，说是根据我的指示进行了反击。我什么时候发过指示？”陈伯达要求将王锡鹏等放出，用辩论解决问题。他说：“他们的做法不对，你们也不对嘛！人家扣了你们一个人，你们就扣了人家6个人嘛！”但他到办公室听取院党委和工作组关于应地所运动情况的汇报时，又重申应地所这些人是反革命。

对文化大革命，群众是打心眼里欢迎的，因为可以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把自己对领导的不满、意见说出来了，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但是，对学校中出现的混乱现象，特别是打人，学生打老师，很多人不理解。6月25日，陈毅在外事口讲话时，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他说：

“文化大革命历史上是没有的，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敢于发动这次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许多问题，是成功的。可以看出牛鬼蛇神不认为头子揪出来了，就不出动了，出动的不少。”

文化大革命马、恩、列没有预料到，历史上没有的。斯大林晚年也没有这样做。这么大规模的，触及到每个人的灵魂。假如斯大林晚年也搞这样一个大革命，彻底革命，就完全可能把赫鲁晓夫揪出来。也有些身居高位，老弱无能了。

这次大革命对每个干部都是一个考验。用火烧一烧，把毛病烧掉。主要干部有了锻炼，群众有了锻炼，思想改造了，这就是最大的胜利。”

对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他说：“从运动中暴露的情况看，不仅有他们的死党，还有地富反坏右兴风作浪。所以运动真正的对象就是这些人，就是这些牛鬼蛇神。他们有的钻进党内，钻进机关高校。”

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干部有一部分脱离群众相当严重，官僚主义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群众不

满。因此给牛鬼蛇神一些借口，机会可以利用煽动，兴风作浪。有些同志与黑帮并无牵连，就是因为对黑帮五类分子丧失警惕，加上自己身上的灰尘又多。平时领导还不错，反动分子一煽动他就下台了。客观存在这个问题。如果说有些干部不脱离群众怎么能这样呢？有些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特殊化，不民主。”

他认为，当时形势的混乱，就是因为群众对以上问题的不满，所以“有一股莫名其妙的怨气，所以要觉察到了立即改正。不要因为运动中被整倒就背起包袱。有的人不是黑帮，要保护过关。但这次过了关，不改，以后还会吃亏。有的人停职反省了，认为吃了亏，就是因为你不能领导运动。所以要多看大字报，多与积极分子谈心，多与群众商量，不要运动一过，万事大吉。”

对工作组的问题，他说：“有些单位提出撤销党组，赶工作组。赶工作组无论如何要顶住，有意见可以提，权在上边。怀疑中央负责同志是错误的，根本不对的。”

他特别告诫：“不要整群众，不要整一般干部。这个运动最多只能整科级以上，科级以下只能是牛鬼蛇神。在群众中不要鼓励互相贴大字报。如果要，劝说在小组会上谈。不要压，要说服，一定要贴就贴，要逐步把运动引导到正常化，……对牛鬼蛇神与一般有缺点、错误的干部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不能不让批评，也不能一批评就得罢官。”

6月27日，中共中央召集民主人士座谈会，介绍中共党内揪出彭、罗、陆、杨的情况。邓小平主持会议。他开宗明义的告诉大家：“中共中央今天约请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内发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大家已经看了党内的五个文件，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就请刘主席同大家谈这个问题。”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少奇开始了他的讲话，他说：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

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因此，应当让我们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负责人，知道一下党内的这个情况。前几天，徐冰同志已经同各位谈了，并将党内的五个文件送各位看了，各位也举行了座谈。今天我就文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况谈一下。”

他说：“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付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人大、政协他也都有负责的位子，并且也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经常参加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公安、政法，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还有统战部）的事务，都归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去研究。”

刘少奇历数了彭真在历史上的错误后说：“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也提不出。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

“他在同外宾接触中，有多次讲话是丧失立场的，送外宾礼品，外交部是有规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礼品，却超过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表现了北京的特殊地位。我和周总理合送三千，他却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

“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

对罗瑞卿，刘少奇说：“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

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一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

邓小平插话说：“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

刘少奇继续：“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做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

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了，很难讲。现在还查不清楚。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窃听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变成风吗？亚非拉地区自 60 年以来发生 60 多次政变，其中有 50 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就是用政变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亚、捷克等也都是政变性质。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

“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个难题。从中国的形势看，大概是这样，各民主党派自己来搞政变是不可能的，谈不上的，”

这时，陈毅插话说：“章伯钧、罗隆基是想搞政变的，但是没有力量。”

刘少奇接着说：“是没有力量，搞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党内有人搞政变，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你们如果同他们搞在一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

“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完整的新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同一个体系，是在马列主义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的思想体系还会有发展，还没有完结。马克思死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以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体系。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第74回：六二七，北航组织大辩论 陶铸忙，不断指导中南局

6月27日下午，北京航空学院召开全院大会，工作组组长赵如璋传达李雪峰报告，部署在全院开展大辩论，对象就是3511班学生石兴国写的那张《一条“无头”黑线》的大字报。他说：“《一条‘无头’黑线》是棵大毒草。毒就毒在无头，……，就是落实到军委、落实到中央，这才是大字报的出发点和真正的目的。”

这天，北航开展了“627”大辩论。石兴国、戴维堤被许多人轮番批判、围攻一直到深夜。戴维堤说话结巴，本不善言谈。但是，此时此刻，他也顾不了许多，“困兽犹斗”，被迫自卫，声嘶力竭地同众人辩论、争吵，一直到口干舌燥，声带失音。天快亮的时候，同班同学把他架回了宿舍。

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出现了奇迹，同学们突然发现戴维堤说话不结巴了。困扰他多年的口吃毛病一夜之间没有了。

6月28日，北航3421班学生曹伟康贴出大字报：《几点粗略的看法》，公开反对赵如璋的意见。这张大字报当然也被工作组定为大毒草。

从6月27日至7月6日，在工作组亲自组织下，在3511班先后召开了三次辩论会对石兴国进行围攻。7月2日，赵如璋找石兴国谈话，说：“同学中和你持有同样的观点，怀疑工作组的人是不少的，你的文章正代表了他们的意见。”他要石兴国作检查并承认三点：一是反军委反党中央。二是主观上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三是他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行动。

这三点当然被石兴国拒绝。7月3日以后，工作组又接连组织批斗会，北航一下子点出了十几篇“大毒草”，石兴国、曹伟康、戴维堤和许多学生被工作组定为“反动学生”、“牛鬼蛇神”。7月6日，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赵如璋作总结报告说：“大辩论性质是夺取文革领导

权。”“扫出了石兴国之流牛鬼蛇神。”会后，工作组在全院师生中进行“左、中、右”排队，按其对待工作组的态度，将师生划分成4类：好的、犯错误的、犯严重错误的、右派。有200多位同学被划进4类——右派。还有更多的人被划进3类——犯严重错误的。

我们继续看看北师大女附中的情况。6月25日，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布置了关于批判斗争校长卞仲耘的“十天计划”，但是被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讥讽为闭门造出的“功课表”。她们认为，在分析学校当前的任务时，工作组不强调党的群众路线，而是说什么“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欢迎问题性质严重的人起义。”这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她们还认为，工作组一进校就收集了卞仲耘等人的材料，在14日已归纳为七大罪状。既然工作组已归纳好卞的问题是七大罪状，是“心中有数”了，又怎能发动群众打人民战争？只能是运动群众，工作组所说的“发动群众”根本就是假话！

6月27日上午，工作组向全校公布了“卞仲耘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八大罪状。而以高三3班梁二同为首的18位高中学生当天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直指工作组部署的斗卞“十天计划”，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我们与工作组的矛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与资产阶级保皇派争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梁二同的父亲在空军机关任职，她们的大字报都在梁家讨论、定稿，有时梁二同的父亲还亲自修改，这给了她们很大的鼓舞和自信。与梁二同住一间宿舍的三位同班同学，也都力挺她。

邓小平对梁二同等18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十分恼火，他让卓琳打电话给刘志坚，要他了解梁二同父亲的情况。

邓小平还进一步下达指示，要求运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打击反工作组的少数民族学生。

6月28日，邓榕向工作组传达了父亲邓小平的意见，主要精神是尊重工作组的领导，对反工作组的少数“顽固分子”可以展开“辩论”，如果她们要坚持就让她们“放”，就让她们“暴露”，要恢复党团生活，团的组织可以改组。

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订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邓小平还提议8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三分之一。后来,刘少奇讲: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情况下,“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

小道消息不胫而走,“要抓右派学生,严惩捣乱分子”,“对于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8月份结束运动,不要影响9月1日开学”之类的首长讲话,在学校也开始产生影响。

一时间,沸沸扬扬的大字报、大批判浪潮不再汹涌澎湃。不少人开始转向,向工作组靠拢,特别是消息灵通的高级干部子女,从他们的家长那儿得到某些消息,立即改变立场。星期六离校时也许还是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气势睥睨天下,星期天返校时就变成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当文化革命的顺民了。

6月28日,浙江大学1861名师生联合署名起草了给毛泽东、中共中央的电文,并集队到省委大院静坐,要省委予以转呈。电文指责省委派出的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强烈要求撤销工作组。对此,江华代表省委明确表示拒绝。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八条指示”的精神,提出全省党政机关的运动“要分期分批进行”,“大字报不提倡、不组织、也不反对”但也“不能上街”,要“内外有别”。就在同一天,江华、李丰平、陈冰分别约见杭州市委有关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部署问题等,强调指出:杭州市要全面部署,一定要分期分批、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要根据各系统、各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具体的研究部署。如公安机关就可以收一收,一些机密不能泄露,公安人员不能上街,武器弹药库要严加保管;关系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水厂、电厂、交通公司等,时刻不能停;报纸广播电台等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决不能让坏人利用,等等。

南粤广州,到了6月7日,各学校的情况也发生了急剧变化。

当时,广东各大学的政治辅导员根据上级的指示,都在秘密地整理学生的“黑材料”。6月7日,中山大学各系党总支召集左派核心小组开会,决定在学生当中抓右派。

抓谁？事实上，在学生中抓右派，无论抓谁，都必然引起剧烈的震动和分化。数学系四年级学生代表黄意坚，对党总支提出的右派名单有异议，会上发生争吵。随后党总支召开紧急会议，认为抓右派抓不下去，是因为核心小组的领导权被右派篡夺，必须把四年级的权夺回来。于是，黄意坚被清除出核心小组，从左派变成了右派。

当晚，二年级的学生先闹起来，抄了党总支，吵着要去游行。

此时，很多学生对揪由党委点名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感兴趣，而关心揪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矛头直指校党委。学生们在食堂，在校党委会门口贴了炮轰党委的大字报，和政治辅导员也冲突起来，有的还提出要上街游行。

在一张以校党委名义贴出的大字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权威》前，围满了抄写的师生。与此同时，校园内还出现了大量“坚决捍卫中大党委”的大字报。两派学生形成尖锐对立。

这天，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得知北京工作队已经进驻北京大学，从湛江打电话给省委书记区梦觉，十万火急地催促：“北京已派出了工作队，看来广州也要迅速派工作队，加强领导，不要使运动没有领导。”同一天，省委发出《关于组织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立即从省级单位抽调九百人，组成一支高质量的工作队，分赴各高等院校帮助领导这场斗争，坚决把这些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

陶铸在同一天以电话指示中南局，“学校现在主要搞文化革命，不能代替四清。”“重点是大专学校和高中，初中不发动，起来了就搞。小学，肯定不搞。”对城乡运动，陶铸指示：“县以下，先搞一下声讨，教育，仍以学毛著为中心。同意紫阳意见。面上学毛著，搞一段。点上搞一段，结合四清搞。”“城市集中搞一段文化革命，长期还是搞四清。抽点人，不要影响四清。”

在谈到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的问题时，陶铸说：“王匡，是否正式停职反省，请给中宣部写一报告，把王匡现有的材料汇集一下，中南局讨论提出个初步意见（性质问题）。”

这时中南局后院已经起火了。中南局直属机关政策研究室在 6

月7日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有如巨石投入水潭，立即掀起层层浪花。机关内的群众纷纷互相串连，内查外调，准备材料，烈火逐渐逼近中南局书记处。

6月8日，中南局把宣传部长王匡的秘书从花县“四清”工作组调回，专责照顾王匡，其中一条任务，就是避免“刺激”王匡。用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南局文革小组组长吴芝圃的话来说，“不要老对王匡谈政治，可以聊聊家常，让他脑子有休息的时间也可以嘛。”吴芝圃还特别关照：“你回去要好好鼓励王匡站起来，你对他说：‘希望你站起来，不要想到绝路上去，要同错误思想决裂，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你过去的工作我们是清楚的，要好好注意身体，问题是问题，生病是生病嘛！’你就说是我讲的。”

6月9日，广东省委做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此时，广东省委已经意识到，“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威力之大，来势之猛，范围之广，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省委认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尤其是文教战线各部門，大大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要求，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异常危险的。”指示对运动作了非常详细具体的部署。

6月11日，广州市委召开全市中学教师大会，要求教师们行动起来，和学生们一道，横扫教育界的一切牛鬼蛇神。广东省委常委、省政协主席雍文涛在动员报告中说：“这次运动的矛头，就是指向大大小小的邓拓之流。”雍文涛要求“市委、市人委赶快提出名单，调一些质量高的干部”，组成工作组。并规定每个中学都要有工作组，组长要由正县或副县级干部担任。随后，工作组进驻中学。

6月12日，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署名“千钧棒”、“红色观察家”的大字报，公开向全台号召抓真的“黑司令”，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王匡的妻子田蔚成为批判的靶子。

田蔚解放以前就在新华社总社广播部工作，解放后她一直在广东广播电台，后来又筹建了电视台。可以说广东的广播、电视都是在她主持下建立的。”

6月12日，陶铸通过电话，对小学的运动，作了一个补充的指示：“小学，起来贴大字报，也不要阻止，记下来，将来四清时解决。”同一天

下午，他又匆匆指示中南局：“学校中提‘保卫校党委’口号是错误的，只能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校党委是正确的，只能提‘拥护校党委’。”

省委在6月12日召开工作队队长会议。区梦觉一再强调，“领导有问题的可以通过背靠背揭发，需要面对面斗争时，也要经过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批准。”这是搞“四清”的办法。“大字报不要贴到别人家里去”，“要恢复党团活动，发挥党团员的作用”。区梦觉还要求，“一部分院校、厅局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原党委领导，工作队协助。”

第75回：反压制，广东学校大动荡 急戒备，《北京来信》惊羊城

随着群众斗争不断升温，广东省委吃惊地发现，在基层单位中，自杀的人数，正在急剧增加。6月12日，省委紧急发出《关于防止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自杀事件的通知》：“目前，我省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群众运动高潮，形势很好，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但连日来广州一些高等院校和其他个别单位，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出现自杀事件。这是值得引起注意和警惕的事情。”通知指出，“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坚决放手发动群众，大力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的同时，教育群众正确地采取文斗的办法，不要采取武斗的办法，并且严禁打人等非法斗争。”

6月13日深夜，中山大学几名学生向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中山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副校长李嘉人提出，他们研究了区梦觉几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之后，认为区的讲话违反报纸社论精神，要求批判区梦觉。

中山大学的学生认为校党委压制运动，要求“反压制”。而且这呼声愈来愈高，压力愈来愈大，愈闹愈凶，无法控制。在政治辅导员、党、团总支书记、党委委员、文革办公室工作人员会议上，李嘉人希望“进一步把问题揭开，扭转运动局面，不要使运动老是纠缠在压制问题上。”这个问题，把他闹得身心俱疲，他哀叹“反压制是无底洞。”李嘉人对中大的党委和总支书记们说：“你们顶不住，校党委顶不住，我顶不住，省委顶不住，就是中南局也会顶不住。”

6月16日，广东省委常委、文教部长王阑西来到中山大学，指示李嘉人要赶快改选学生代表。6月17日，王阑西又打电话对李嘉人说：“群众如要求处理政治辅导员，就停职反省。”同时省委授权李嘉人，对中山大学干部停职反省可用个人名义宣布。

6月中旬，省委又匆匆增派了将近一倍的工作队员进驻中山大学，

十几名中大的政治辅导员被停职反省，并关进了管教队。全省以“压制运动”的罪名，处分了 120 多名干部和政治辅导员。

6月21日，省委召开文教战线文化大革命经验交流会。出席会议的有各高等院校的总支书记、部分中学的支部书记和文教厅局的负责人，工作队也派了代表参加。区梦觉在会上赞扬了广州市第十中学的经验。这所中学在 100 多教职工中，揪出了 20 多个“牛鬼蛇神”。区梦觉说：“十中的经验很好。我们要学习他们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经验，要打破框框，有什么揭什么，全面揭发。”

6月22日，由王阑西主持召开的文教厅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传达了相同的信息。华南师院工作队汇报说，师院总支书记 19 人，揪出 17 人，其中重点对象七人；系主任 10 人，全部被揪出来，其中重点对象五人；政治辅导员 26 人，揪出 17 人，其中重点对象五人；处级、副教授以上 60 人，揪出 52 人，其中重点对象八人；科级干部 31 人，揪出 11 人，其中重点对象三人。华南师院的工作队建议，在批判斗争中，要抓住三种人：一、老右派；二、反党反社会主义突出人物；三、政客。王阑西传达了省委决定，各厅局（除广播电台外）运动，一律由原单位领导，工作队协助。围攻重点，党内党外都要搞，反正是要广泛揭。

于是，广州 1000 多名中学教师被关进“牛栏”，600 多名小学教师被斗，400 多名一般干部被“重点批判”。许多教师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有的残废，有的自杀，有的被迫疯，甚至一人捱斗，全家受害，或三代人遭受歧视，不论在精神上、身体上都受到极大的痛苦和冤屈，时间长达数月之久。

中学的工作队进校后，也开始在学生里面排左、中、右，引起了学生的反对。

6月中旬以后，受工作队压制的学生，在中山大学张贴了许多“穷追王阑西”、“猛揪区梦觉”、“工作队滚蛋”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广东省委在 6 月 24 日接到中央批转北大工作组第 9 号简报和刘少奇的批示，当天夜里，王阑西打电话通知各工作队长到文教战线听宣读传达，并指示今后应按北大工作组的方法，处理“乱斗现象”。

王阑西又马不停蹄地到各大专院校解释：“工作队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一百个放心，一切权利归工作队。”他告诫学生，“无

限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具体表现在相信工作队，不然，就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他又严厉警告说：“工作队是绝对的领导，任何人不得干涉，任何不通过工作队的会，都是非法的。”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来信》又将南粤羊城广州搅了个不亦乐乎。

6月23日，华南工学院五年级学生高翔，收到他妹妹高眉扬从北京医学院寄来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话：

“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斗争矛头应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高翔出身于高干家庭。工作队进驻华工后，高翔是有名的左派学生，直到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时，他还是工作队依靠的学生骨干之一。但他对学校斗教授一直有不同意见，认为运动应该整党内走资派，不应整教授，整教授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他妹妹的这封“北京来信”正好道出了他的想法。于是，高翔等学生在6月24日将这封信抄成大字报，在校内张贴，同时还贴出了一份《告全院学生党员书》，呼吁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革命同学联合起来，互相串连，互相支援。

这封信顿时让平静的华工校园沸腾起来，同学们奔走相告，争相传抄。很快，7059班同学贴出倡议书，呼吁在广州地区建立一个由党中央和毛主席直接领导的联合指挥部。

工作队连夜将这封《北京来信》抄录送到广东省委，并汇报说：“工作队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了解各系情况，封锁消息，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当晚召开工作队员会议，进行布置，串联骨干活动，同时将原信抄送王兰西（副省长）和文教政治部”。

赵紫阳看到信后，大吃一惊，立即派张云到华南工学院了解情况。这时学生队伍的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对《北京来信》，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形成水火不容的两种意见。校方组织反击，把《北京来信》指为“反革命暴动的宣言”，“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原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66届毕业典礼，因担心高翔在会上发表演说而临时取消了。高翔被开除出左派领导核心。这些举措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省委派到华南工学院的张云在学院受到学生的围攻，有的学生提出要成立学生组织，有的学生组织大家上街

游行。

赵紫阳在6月24日白天召开的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工作队队长会议上已明确表态：“上街游行，我们坚决不赞成。要向学生讲明，根本没有此需要。游行的矛头是对准谁呢？游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牛鬼蛇神在学校里，你为什么要上街呢？上街游行，搞大民主，就是矛头对准政府，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张云好不容易摆脱了学生的包围，赶紧找到华南工学院工作队长叶向荣，对他说：“今晚学生要暴动，立即做好准备。”

工作队紧急动员，院保卫处副处长邱盛花马上到广州警备司令部报告请求支援；叶向荣命令全院所有武装警卫人员全副武装，一等战备，通宵守候；三个工作队长也身带手枪，如临大敌。

当晚，省委书记区梦觉彻夜未眠，守候在电话机旁。

到了凌晨1时左右，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把学生中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从床上叫起，开紧急会议，对他们说：“敌人已冒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反击，必要时要付出鲜血和生命。”

在工作队布置下，同学们连夜赶写大字报，说“《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等等。

天亮后，反击《北京来信》的大字报已经是铺天盖地，对高翔等人的大规模的围攻持续不停。同时，工作队还布置对一些同学跟踪，盯梢，偷听电话，防止他们串联，组织“暴动”。

第二天，6月26日，华南工学院5名学生上北京告状。省委得知消息后，立即打电话给沿途单位，赵紫阳也亲自布置对这5人的拦截和监视，下令省公安厅打电话给湖南、湖北公安机关，希望中途拦住这些上京的学生。

省公安厅副厅长白云起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广州有5个反动分子要去北京闹事，请求派人跟踪，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在当天的会上，赵紫阳说：“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部位以外，

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

他承认工作队派得太仓促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的就是领导跟不上去。对这种大的革命风暴，中央通过报纸社论直接同广大青年学生见面，学生闻风而动，而我们感觉迟缓，行动得慢。学校党委跟不上，不敢革命，怕乱，怕引火烧身，顾虑重重，诸多限制。工作队一下子又组织不起来，组织起来了，也不够强，完全没有经验。总之是仓促上阵，看来这种形势很难避免。前一段时间，学校党委不敢革命，工作队仓促上阵，所以前一段情况比较乱。”

赵紫阳给大家打气：“今天开会，是有意义的，大的框框统一一下也好。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些是非界线也划得不清楚。前一段学校党委对学生的革命行动限制多，不敢领导；当然，《人民日报》6月24日《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我们又不要忘记了总的方向。今天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处于被动状态，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才能扭转过来。”

但这“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局面很可能还会趋向恶化。对运动的领导权，赵紫阳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我们党所领导，这是我们要争取做到；二是自发、半自发状态，如像现在许多院校的情况那样；三是为个别坏人所操纵。自发久了，也势必被别人所操纵。对这些，我们要有所认识。”

赵紫阳说：“学生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定会有很大提高，一定会锻炼出真正的左派，但必然要经过曲折的斗争，不仅要靠正面教育，也要靠反面教育，跌了跤子，上了当，有了教训，辨别能力就高了。有些地方出现曲折、混乱现象，如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一个时期，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那是可能的，这也是反面教训。”

省委认为，《北京来信》说明，确有一部分学生“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

6月28日，赵紫阳在自己家里和主管政法口的省委书记尹林平、省公安厅长王宁碰头。赵紫阳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出头的人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广州各大专院校可能会出现乱的情况。”他指示尹、王二人：“对乱后暴露出来的明显坏人，可及时揭露，一般的记下一笔账，很恶劣的，公安部门要配合。”

6月29日,公安厅侦察处向厅党委写了个报告,题目是:“广州市大专院校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意见”内容说“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拟在石牌成立一个临时侦察组,对六间大专院校进行侦察。”

6月底,经赵紫阳同意,王兰西,焦林义,白云起等签名向广州公安局交办:要控制华南工学院高翔的《北京来信》。

华南工学院萧玉祥等18名学生写了一篇“各兄弟院校联合起来”的信件,提倡串连,也被定为反动信件进行追查。

7月3日,公安厅《关于对华南工学院七种人进行侦察工作的报告》,提出对200名对象进行技术侦察,有学生,教师,干部等。

华南工学院把贴《北京来信》的1016班和呼吁建立联合指挥的7059班档案逐一审查,认为里面有“反革命”,工作队特别对1016、1026、1038和7059班进行严密控制。

他们还了解高翔父母的政治情况,把高翔的材料送到公安厅,列举了高翔六大罪状。

第76回：斗韦力，天津一中带头干 齐动员，津城声讨十六中

北京的门户天津，自6月2日各学校听了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后，也开始给学校领导写大字报。但多数学生还是号召团结在党支部周围，保卫共产党，保卫毛主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霎时间，一切可贴大字报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

接着，各学校纷纷召开声讨邓拓黑帮的群众大会。

6月2日早晨，天津十六中学的广播站，重播了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第一节课后校园内即出现了高中同学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质疑为何十六中也有聂元梓大字报所提到的压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这张大字报立即在学校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节课后，学校前院各教学楼的墙上已贴满了各班同学的大字报，锋芒直指学校党支部，批判学校党支部“压制文化大革命”的行为，并且质问学校党支部所提出的“四项原则”的由来。

“四项原则”是指十六中学党支部根据1966年5月14日，天津市委宣传部发出了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四点注意事项”的通知，制订的四项具体落实措施，内容包括：不贴大字报，只写小字报；不开大型声讨会，只开小型座谈会；加强领导；不用文艺形式声讨反革命黑帮等指示精神。

到了第三节课后，整个十六中就已经全都停课了，无法再上下去了，所有学生和老师都自觉地投身到文化革命的运动中。

天津市其他一些中学也出现了类似十六中这样的情况。天津市委高度重视。此时，市委主要领导都到北京参加中共华北局召开的“前门会议”了，留在天津主持全面工作的天津市委组织部长马瑞华于当天上午，即在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参会者主要是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负责人。会后，市委文教部部长王金鼎又在天津市幼儿

师范学校召开了天津市完中领导干部会议。中午，马瑞华再次召集十六中、一中党支部以及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负责人会议，分别汇报了十六中、一中、女三中、女六中及二十中等学校出现的情况。当天下午王金鼎、柳宗祥、沙小泉等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的负责人又到十六中、一中、河北大学附中等学校亲自去做学生和领导的工作。

到了6月4日，全市的学校基本都停课了，大字报、漫画、讽刺诗贴满了校园，尤其是图书馆、老师饭厅等处，大字报的矛头开始指向老师，指名道姓，十分尖锐。

天津市一中揪出了校长韦力。

韦力是1952年调到一中任校长。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使这所普普通通、毫无声名的中学，变成一所在天津闻名遐迩的学校。1960年，天津一中被评为全国文教群英会先进集体。所以，韦力被揪斗在全市中学引起较大的反响。

6月5日开始，天津一些中学的校长、老师被戴高帽、挂牌子批斗、游街，有的身上还贴满了标语，脸上涂满了印油、墨汁。



子朱强与几个部队干部子弟也给学校领导贴了大字报,但受到学校有组织的围攻。6月6日早上,天津市一中的学生听到这一消息,立即给十六中送去声援的大字报,并同朱强“反对派”的一些学生交流了情况,认为十六中党支部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至少是个右倾机会主义,怕同学起来,怕“乱”,就是怕革命。

当天,十六中的学生李罗力等人找到市一中的学生王端阳、胡国清,了解一中的情况,王端阳让他们到一中参观。

6月6日这天,天津市委成立了由市委文教部、市教育局和团市委负责人组成的天津市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和卫生系统“文化革命办公室”,并对一些学校派出工作队或观察员。是日,一批学生到“周家食堂”、“森记稻香村”等商店贴大字报,要求改变商店名称。

社会开始混乱,人们对学生的革命行为既觉得新奇,又有些惶恐,不知所措。当天,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紧急会议。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混乱现象,提出:要劝阻学生不要上街贴大字报,工厂不能停产,医院不能停诊,学校不能停课,机关不要停止工作。

天津市委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并没能起太大的作用。相反,在要“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激情鼓动下,中学生们投身运动的热情越来越高涨,行动也越来越“无畏”。

6月8日上午,天津市委向十六中派去工作组,解除十六中党支部的一切职务。天津市委秘书长李定也随工作组一同前去。这天,十六中的学生自发选举成立了以李罗力为首的由学生组成的“十六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各班和各年级都相应选举成立了本班和本年级学生组成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终止了校领导和党支部对学校文化革命运动的领导,自此学校运动进入了“学生自己管理自己、自己领导自己”的新阶段。不仅原来的校领导没有了领导权,而且市里派出的工作组也形同虚设。

李罗力就是时任天津市市长胡昭衡的儿子,此时他父亲正在北京经受批判的煎熬,不过他还一无所知,正全身心的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波中。

6月7日和6月8日这两天,天津市委不仅向十六中派出了工作组,还分别向十八中、十九中等学校陆续派出了工作组,并且工作组人

员的数量不断增加。6月9日上午,天津市委在天津体育馆召开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市委组织部长马瑞华在大会上做了报告。

到了6月13日上午,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专程从北京赶回来,在体育馆给干部和各校学生代表作报告,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社论,在风雨中锻炼成长,学习阶级斗争,作革命接班人。斗争要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青年有革命热情,敢于革命,这很好,但是要沉住气,斗争是长期的等等。另外市委决定发给天津学生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顿时搏得全场的热烈欢呼。

在传达万晓塘报告时,有学生指出万晓塘报告中有错误的地方。

进入6月中旬后,天津十六中的部分学生又贴出《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工作组的几点意见》等大字报,追究《四项原则》的“幕后黑手”,批判工作组的所作所为,矛头直指天津市委。随着中央宣布废除高考制度的决定公布,学校运动进入高潮,校园内贴满了“要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要揪出天津市一条又粗又长黑线”的大字报。

十六中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引起了天津市委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每天都有大批“陌生人”到十六中校园内来看大字报,学校周围也出现了便衣公安人员。不仅校园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社会上对十六中学生运动也开始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言。

6月21日下午17时,共青团天津市委和市学联在民园体育场召开“庆祝改革高考制度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十六中学生向在场的各中学分别散发了《致全市中学生的一封公开信》,批评天津市委、《天津日报》和正在主持天津工作的马瑞华。信中主要列举了天津市委各种“压制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认为天津市委像北京市委一样“存在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呼吁全市中学生团结起来,“用生命和鲜血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甚至还有十六中的个别同学要冲上大会主席台,受到阻止,并被警告:如市委没问题,“你们要记住这次行动”。

许多学校对十六中的信提出抗议,说十六中的学生李罗力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

其实，会前在民园体育场外已布满了警察和便衣公安人员。

这天在民园体育场发生的风波，被称之为“十六中事件”。

当晚，天津市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将十六中这封《公开信》定性为是“反党黑信”，并要求严肃追查指使十六中学生进行“反党活动”的“幕后黑手”。

半夜24时，十六中所在的和平区召集工作队和平分团指导员、队长紧急会议，齐国俊在会上传达区委付书记李兆先从市委打来的电话说：

“十六中工作队不能领导了，十六中学生到处煽动讲演，矛头指向市委，说市委是黑帮，讲万晓塘、马瑞华报告不对，到一些学校后被顶了回来，看起来他们是不会罢休的。十九中到处发抗议书，抗议昨天大会是压制革命，最近几天可能闹凶一些，有的把工作队关起来，扬言上街游行，可能后面有人，这不是一般问题……”

“我们说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不是照北京办事，而是按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们要讲。他们声讨，我们要保卫；他们要喊口号，我们也要喊；如果到我们学校，我们要站出来，如果挨棍子也要顶得住……。”

齐国俊在会上还说：“如果赶工作队，我们要讲文化大革命是三个横扫。我们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为什么要赶我们？要工作队走这是什么意思？”

他还说：“……十六中学生要求去北京，多数是干部子弟，现在他们起来要革市委的命，说劳逸结合是阴谋……，我们工作队要说服教育，向群众讲清天津市是在党中央、省委领导下，并不是黑帮。北京烂了，我们天津市委没烂，因为北京不是领导天津，天津是在党中央领导下。”

他还提出：“他们贴大字报轰我们就是不能走，一定要顶住。”“敌人出来是不奇怪的，可是我们干部子弟反市委这是可惜的……。”

6月22日，天津十六中又召开大会，团市委组织许多学校的师生前去围攻，市公安局还去了两位局长。

当天下午，天津团市委召开了全市各中学学生代表和工作组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由团市委副书记王仁主持，从下午15时30分开始，

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5 时左右才结束,主要是批判十六中《公开信》的观点。在会议过程中十六中学生和团市委组织的其他各校学生的人数都不断增加,并针对《公开信》中的观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为了抓十六中事件的“幕后黑手”,会议还进行了秘密录音。会议进行到半夜 24 时后,参加会议的各校代表在会议组织者的授意下开始高呼“横扫十六中一切牛鬼蛇神”“揪出十六中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口号,并对《公开信》和十六中学生的“反党活动”进行了猛烈批判。凌晨会议结束时,王仁讲话,宣布《公开信》是“反党黑信”,指出十六中“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并且要求各校组织力量去声讨十六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团市委对各校团组织提出要求,要求团组织大抓活思想,通过组织了解不同人的思想问题及时向上级党委、工作队反映汇报情况,要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包括民兵、游泳、各种体育活动,大唱革命歌曲,同时加强对少先队的领导。

就在团市委召开的会议正在进行过程中,当晚 20 时左右,天津市教育局负责人于抗已经传达了市委的紧急通知,要求全市各中学 23 日起都要到十六中去进行声讨,贴大字报,并且要点名批判李罗力,要揪出“以李罗力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集团”。

与此同时,6 月 22 日晚 20 时到 23 日凌晨 3 时,还有部分十六中、十九中学生前往《天津日报》社,询问 21 日民园体育场大会情况和质询 22 日《天津日报》第四版刊头的事情。报社副主编、主任、记者、招待员、工人和女六中学生冒着大雨齐聚《天津日报》社,与十六中、十九中学生辩论,不时有人出来念:

“刚才接电话,十四中要倾校出动,来和你们辩论。”

“你们都受蒙蔽了。”

“变啦!形势变啦!八中精神来啦,干劲冲天,一夜写成 600 张大字报!”

“师院、八中已去你校声讨啦!”等等。

到了晚上 24 时,有人在十六中点了天津市市长胡昭衡的问题。

6 月 23 日 6 时左右,天津市八中果然组织了几百名学生浩浩荡荡列队前来十六中进行声讨,由于他们估计可能会要打破大门,冲进校

园,与十六中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因而不少男生还手提大棒,头戴安全帽。没想到十六中大门完全敞开,十六中的学生们不仅没有对他们恶语相加,大打出手,反而对他们的“声讨”列队鼓掌欢迎。

市委、团市委工作人员,工作队亲临现场观,《天津日报》记者李夫、林逢源刚参加完《天津日报》社前与十六中、十九中学生的辩论大会,又赶到了十六中现场。外校给十六中送来更多的大字报,点名批判李罗力。其中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就是:“看!李罗力等一小撮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干了些什么?”到了上午,外校给十六中送来的大字报越来越多,说李罗力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野心家。各校来到十六中的人也很多,互相发表演说,场面激烈。32名公安人员来到学校。十六中校门前的南京路那时是墙子河,一直到晚上21点多钟,十六中对面的墙子河桥上还都站满了人。

此后几天内,天津市各中学几乎全部都到十六中来进行了“声讨”,不断高呼“打倒十六中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到处张贴“揪出以李罗力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集团”的大字报和标语,但是十六中学生始终保持平静有序,没有与外校学生发生任何激烈冲突。

这时,天津市委也对十六中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是撤换了原来派入十六中的工作组,派出了以市委财经委负责人耿忱带队的人数多达170人的工作队,十六中的每个教学班都有一至两个工作队的人员进行负责。二是废止了学生自发选举的“十六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各年级各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耿忱在工作队刚刚进驻学校时就宣称:“我们是来夺权的,要一个班、一个班的把领导权夺回来。”此后由工作队重新组织安排进行了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各年级及班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选举,把学校领导权重新控制在工作队的手中。三是向市有关各单位下通知,凡是十六中学生的家长,都必须把自己的子女看管好,不但要与“十六中一小撮反党分子”“划清界限”,而且要把那些长期住在学校里搞运动的“积极分子”都领回家去。否则这些家长本人都将会受到“十六中事件”的牵连和影响。

6月25日,工作队和平分团付团长李彤布置围攻学生的工作说:“目前形势好转,十八中、市师、八中反对十六中,左派起来了,李罗力被打的头破脸肿,越墙逃跑,我们要有组织地声讨十六中,要有组织地

给贴大字报，如果有十六中的学生到各校要‘粘住’，辩倒他们。”

至此，十六中“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压制”下去。与此同时，市委也下了很大决心和力量要揪出十六中学生“反党活动”的“黑后台”。由于所有调查结果都证明十六中学生运动是自发组织和自发进行的，没有受任何“反革命黑帮人物”的操纵和指挥，这项工作最后不了了之。

第77回：上措施，清华反击蒯大富 多数人，同意开除其团籍

我们再回到北京清华大学。自从清华大学6月25日开展“反蒯斗争”后，第二天，6月26日，清华大学大字报区又是一片对工作组的赞扬声，同日，又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大游行，高喊：“无限信赖工作组”、“拥护以叶林为首的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等口号。

26日，蒯大富在给吴浩汀等人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好！

我在这儿，不得不说几句心里话。

现在的斗争形势特别艰苦！希望你们绝不要考虑个人，一丝一毫也不能考虑，豁出去！

在别人把我们当着“反革命分子”的时候，我们绝不能一丝一毫的退缩。在“反革命分子”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们绝不能向什么人承认错误，我们退一寸，他们就要进一丈！他们现在抓不住我们什么把柄，千万不要把关键性的“把柄”送给他们，这样，他们气势更高了，更能蒙蔽群众，就将给文化大革命带来巨大损失！

我先走访新市委，再走访华北局。如果此二处得不到满意答复，加上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处我们就无处说话。那时，我将采取强硬措施，坚决求见中央高级首长。不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誓死不回学校！

这天，蒯大富等人到党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上访，反映学校的情况。他先跑到北京市委，后来又到中共中央人民来信来访接待室，反映问题。回来后就住在孟家驹在北京市里的家里，不想再回清华大学。后来，工作组通过孟家驹给蒯大富传话，通知他回校，并说，绝对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和自由。于是，蒯大富回到学校。刚进校门，就有4个人从两边强行贴上来，以后不管蒯大富到哪里他们都跟着。

27日，工作组召开大会批判蒯大富等人。在批判会上，蒯大富发表声明说：

(一)不管怎么样，这次大会起码在客观上是一次政治迫害大会。我希望这是由于工作组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但愿不是预谋的政治迫害。建议大家好好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文，对照我校目前情况，再认真分析、思考。

(二)我非常体谅、非常理解大多数师生员工对我采取的态度。如果对待反革命，应该这样。你们现在对我恨之入骨，骂我，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三)昨天晚上大会的发言者(除我以外)，采取了捏造事实、无中生有、造谣撒谎、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小事化大、乱下结论等各种卑鄙手法。我将逐个澄清。不过这表明了他们是非常软弱的。

(四)高压政策，本身就是软弱的表现。不过，我再一次表明，对我的效果为零！要我承认我是反革命分子，这永远也办不到！就是上了绞刑架，我也将宣布，我是革命者，我是坚决革命到底的！

(五)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我们身边。我有一千条理由、一万条理由相信，这股黑风将被压倒。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终会弄清楚。

(六)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群众的觉悟水平是很高的。我们的叶林同志，不要错误估计形势。

(七)再诚恳进叶林同志一言，这样的大会，从根本上来说，是否对文化大革命有利？望您考虑。很可能起着很大的压制作用。

王光美强调批判大会要开得很有声势，发言人要层层选拔，会前要练兵预演。王光美按照她“四清”的经验，亲自主持斗争大会之前的预演会，亲自动手修改发言稿。在她的导演下，“上纲”愈上愈高，一时，清华园内“反革命”、“反党分子”帽子满天飞，人人自危。但王光美还认为不足，她对工作组的几位领导说：“我看你们一个副主任，两个副部长还斗不过一个小小的蒯大富。”

工作组为了落实刘少奇、王光美的指示，斗倒蒯大富，想尽了办法。他们利用干部急于要“下楼”、“解放”，的心情，动员干部“反蒯”，

说这是干部“触及灵魂”“将功赎罪”的“大好机会”。曾老师是蒯大富的班主任，因“反蒯”需要，工作组让他提前“下楼”。为了“反蒯”需要，王光美要干部以实际行动表示支持工作组，要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要党员表态，“下楼”。如不“反蒯”，就让干部长期“挂着”，不能“下楼”。

28日，蒯大富再次发表了《关于六月二十七日大会声明》。

这天，清华大学又举行了斗争蒯大富等学生的大会。从此，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长达20天的“反蒯”时期。在“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无限信赖工作组”等口号下，蒯大富等人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是，此时的蒯大富依然不屈不挠，与工作组顽强的对峙着。6月29日，他致信工作组组长叶林，并在信中写道：

“说实在的，我压根儿没有想到，‘小小的’蒯大富竟有如此‘威力’，不得不使工作组要集中全部精力来把他‘压’下去。声势之大是空前的，全校写大字报对付一个人，游行、示威，开全校大会，广播等大手段都使上了。这样的声势对蒋南翔都没有使过，不能不使我感到‘幸福’。”

殊不知蒯大富‘又臭又硬’，死不屈服。你大概有点心虚了吧？如果心中还很踏实，还有手段没拿出来，那很好，我等着。顺便说一句，我将用我使得出的一切手段应战。”

“你说过：‘向工作组夺权，这不是向无产阶级夺权吗？’‘向无产阶级夺权就是反革命行为’，‘蒯大富要夺工作组的权’，言下之意，蒯大富就是反革命。在您的启发下，‘打倒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口号满天飞。

我想，您是老革命了。什么是反革命，您一定很清楚。那您凭什么说我是反革命呢？‘向工作组夺权’这句话我从未说过，是您强加的。那么凭什么呢？就凭我把毛主席关于政权的思想具体应用到学校来吗？难道就凭我提出‘要’考验工作组吗？难道就凭我提出‘工作组的大方向有严重的错误’吗？等等，就凭这些我看不能给我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吧。

何况，你们并没有用大量事实和充分道理来证明你们的‘大方向

完全正确’，是‘毛泽东思想的方向’，反而让那些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胡说八道的人大放厥词，对我进行无耻的攻击，我不能不表示遗憾。

但愿这是您由于调查不周所犯的错误，而非常不希望是你安排的政治陷害。”

他不无调侃的对叶林说：“处于目前我们学校这种情况，叶林同志，我真替你担心，如果你不慌报的话，你怎么向北京新市委交账？怎么向党中央毛主席交账？”

“我希望你好好抓一抓工作组。尽快‘统一思想’。已有可靠的迹象表明，在工作组内，有同志支持和同情我们。要抓就抓在前面，抓晚了后，怕到一定时刻，工作组内真正的革命同志，要起来揭发你们领导所犯的严重错误。

敬爱的叶林同志，时间紧的很哪，赶紧安排好计划，准备下一步吧，我耐心地等待着。不知怎么的，我的信心越来越足。拿起毛选，就像毛主席在身边似的！”

和北京大学一样，从6月底开始，清华大学工作组也实行封校，不准教师学生自由出入学校。

工作组又召开团组织领导干部会议，研究蒯大富等人的情况，决定先由团干部找蒯大富谈话，然后再开团组织会议，帮助蒯大富。6月末的一天，在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参与下，蒯大富所在班级的团支部召开全体会议，他们讨论了蒯大富近日的行为，然后，直截了当地对蒯大富进行批评，并且要求蒯大富服从团组织的意见，收敛自己的行动，不要再做驱赶工作组那样的事情。

蒯大富根本没有把学校团干部们放在眼里，论口才，论知识，蒯大富觉得自己比这些团干部们要高明得多，于是，蒯大富给他们上起了政治课，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讲起，说青年人应该与“修正主义分子”斗争，应该当革命先锋等等。只听他口若悬河，一会儿谈起当前的政治形势，一会儿谈起修正主义问题，一会儿又谈起校党委的修正主义路线，中心意思是：“我们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革命行动，没有错。”他还在会上做参加会议的团员的工作，要求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会议开到这份儿上，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蒯大富，只好动用组织表决的方式，来决定蒯大富还能不能留在团组织里的问题。

表决结果，班级团支部的团员中，多数同意开除蒯大富的团籍。

这个结果大大出乎蒯大富的意料。他当场在会上提出抗议，并表示仍然要和工作组斗争到底，即便被关押也不怕。

6月30日，蒯大富贴出《告全校人员书》：

全校革命的师生员工，

工作队同志们，

今天，我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1. 差不多全校人员都说我是反革命。什么是反革命呢？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叫反革命。这五“反”我一“反”也沾不上。外面大字报上、广播内容中，叙述我的“罪行”，全是捏造事实、歪曲事实以后强加的。许多同志，见此信以为真，对蒯大富是反革命分子，坚信不移。

同志们，我要严正指出，如果你是真正革命者的话，如果你真正对党中央毛主席彻底负责的话，把话说绝，如果你还有一个普通中国人的良心的话，那末，我衷心地希望你们，（你们也有责任这样做）好好作一番深入地调查研究，按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不能只听一面之词。带着“蒯大富是反革命”的框框去调查也是无济于事的。

我还请你们中一些人再次走访中央，反映学校详细情况，并把我的大字报抄稿交给中央。我是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

孟家驹曾对我说过：“哎！上天无门哪！”我立即反驳他：“胡说八道！在北京如听不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中国岂不完了？你是怎样无限信赖党中央、无限信赖毛主席的？”中国永远不会完！中国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天天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那么宏亮有力，又是那么亲切！

一方面，我相信，叶林同志他一定能如实地向新市委和党中央反映清华情况；另一方面，即使万一叶林同志歪曲反映情况的话，那么他也不能一手遮天，倘大清华，岂是叶林同志一手能遮住的？请同志们切不可低估党中央和毛主席在群众中享有的极大的不可动摇的威信。我十分坚定地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全盘了解清华情况。蒯大富是什么样的人？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定能作出绝对正确的判断！

2. 同志们，你们注意到目前学校情况没有？现在，在全校范围内

大肆制造舆论，一方面，他们公布蒯大富莫须有的“罪行”，另一方面，他们又说，蒯大富“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又臭又硬”，“反革命分子不会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的”等等。

而且，我再一次严正要求，在没有判我是反革命以前，你们要坚决执行北京新市委指示，和履行你们自己的诺言：绝对保证我人身安全！

3. 有同志说：“不管你过去怎么样，起码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把运动引入歧途，对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

我说，何为歧途？望大家慎重考虑！我早说过，在运动中考查工作组性质本身，就是文化大革命一部分。我校目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势，完全是工作组所作所为造成的，要工作组负全部责任。如果说，这妨碍了打校党委黑帮，那大家去找运动领导叶林同志算账。我不负任何责任！

但是，我再一次声明，工作组是否是黑线的组成部分，这要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包括革命的工作组员，在运动中考查！我相信，只要他姓“修”，他就不会说出姓“马”的话来！

同学们，同志们，在这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每个人必须坚定地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能丢！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我一个，

自有后来人！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六月三十日写成大字报贴出）

7月2日，蒯大富再致叶林的信，冷嘲热讽，决不屈服。

第78回：不屈服，蒯大富绝食抗议 庆七一，《造反歌》传唱北京

7月3日，薄一波再次来到清华大学。在与学生们的对话时他谈到蒯大富，他说：

“他不是要夺清华蒋南翔的权，而是要夺工作组的权，工作组是党派来的，因而是夺党的权，现在，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的天下，要夺党的权就不对。

他大字报上写道：‘眼睛里看的，脑子里想的都是夺权……’同志们，你们看，我们的社论上是怎么写的？我们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他和我们站得不一样，眼里看的不一样，他是念念不忘要夺权。

这一次，我们已经夺了权，清华大学以叶林同志为首的工作队一进校就改组前校党委，这还不叫夺权？蒯大富现在总想夺权，夺共产党的权，这叫什么？”

一同学答道：“反革命！”

薄一波：“他这个人不错！有点反革命的顽强精神，刚才举手赞成蒯大富的一个人也没有，怀疑的人就是蒯大富。”

当他看到蒯大富给师大女附中写信时，便问大家：“我问你们，工作组能否代表你们，怀疑的请举手。”

蒯大富举手。

薄一波：“他自己对自己怀疑，但他还要坚决顽抗，蒯大富这些人是不足为奇的，自己对自己怀疑，但是他还要坚决顽抗，这种人就是不虚心一点。”

他又说：“那天我看到蒯大富说：我不认识你，碰到你也感到不错，告诉你几句话，他这个人不虚心，说我胖老头，我不反对我是老了，胖不是自己要的，其实当时他要问我名字，我说我不愿意告诉他，我很愿

意交朋友，我很愿意做你的朋友，如果你承认了错误，写大字报贴出来，下次来时我就可以和你作朋友。”

“今天为什么还来呢？因为上次我讲过一些话蒯大富给我贴了大字报，今天我有点空就来了。我想再看一个。对蒯大富同学不够礼貌，我看也不要过分地礼貌，蒯大富要挑战，那我们就挑吧！不这样不行。

工作组进清华只 24 天，我看工作搞的还算不错，好不好？”

一同学答道：“很好。”

薄一波：“很好还不能说，但工作组进校还是不错，你们说得好，那我就更高兴了。但蒯大富说还在怀疑，蒯大富说他最能夺权，我说你吹牛，有什么本事？六月十日以前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大发表了聂元梓大字报，清华怎么样呢？清华处在压制反抗的情况，左派刚一露头，贴了七百多张大字报，牛鬼蛇神就出来反扑了，写了一万张大字报反扑，蒯参加了没有？”

一同学插话：“参加了！”

薄一波：“你吹什么牛皮，当时你是保皇派，你夺什么权！你并没有夺黑帮的权，你是保皇派而不是右派！工作组进校后，6 月 9 日进来的，6 月 10 日夺的权，你现在怀疑了，你想夺权了，你想夺共产党的权，6 月 9 日你不夺权，6 月 10 日你要来夺权了，错了一天，英雄做不成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能算什么？大家说。”

一同学说：“反革命！”

薄一波：“大家作了结论，6 月 9 日以后我们夺权了，你倒出来夺权！你这个逻辑倒很清楚，这是什么逻辑。”

同学回答：“反革命逻辑。”

薄一波：“我们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工作组一进村就支持左派，站在左派一边，反对保皇派，反对牛鬼蛇神，工作组作的是对的，当然工作组刚进校情况不熟，他们都是从上海东北来的，一进校他们就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教导去作，起来调查研究，不能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蒯大富就抓住这一点说工作组来了以后不马上斗他们，蒯大富之流所说要斗保皇派，实际上要斗我们所说的真正左派，工作组没答应他们的要求，说要调查研究，调查清楚了才能斗。蒯大富不允许，我说

这不对,他就说一切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当时我问他,他说都揪出来了还说自己是左派,当时我说:蒯大富同学你可能就是牛鬼蛇神,那天我是开玩笑,但是说对了,我说工作组基本上是好的,但一下子没把局势铺开,工作组是有些缺点,有些人提意见是对工作组的帮助,可你(指蒯)这是反扑。

我看清华现在的大辩论会很好,现在的局面是好的局面,只准蒯大富写,不准左派起来反击,那是不行的。左派可以起来斗争嘛。同志们不要把蒯大富估计的过高,把他估计的过高是要上当的,他不过是一个到处奔走的小卒子而已,他没本事。我们左派一定要把真正的黑线揪出来,不要把他看的了不起,他刚才跟我说的(指看大字报时和蒯的辩论),就是无理取闹。

今天我不是以胖老头资格,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资格讲的。欢迎你们贴我的大字报。蒯大富不赞成,我就高兴。蒯大富不高兴,我就落实了。如果大家都不赞成我,只有蒯大富同意,那我今天就出不了清华园了。“

蒯大富说:“信任蒯大富的还有一二百人。”

有同学立即反驳:“没有,吹牛。”

薄一波:“一二百没有,五六十总有吧!”

同学答:“没有。”

薄一波最后说:“今天,我给蒯大富抹了黑,但还要作保黑派,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甚至斗争,再达到新的团结,蒯大富我是对的起你了,把你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对你的斗争才是真正对待矛盾。

对阶级敌人就不能这样,对阶级敌人要斗争,要专政,要逮捕。

我看他(蒯)的论点也不是很难驳倒的,他说了一些反面的话,这样欢迎他。如果这里没有蒯大富,我就认识不了你们,你们这里运动搞的好,就是由于你们这里出了蒯大富,这个反面教员是不易多得的。我们要这些人。将来斗他不要给他戴高帽子,也不要揍他,向他这个反面教员学习。这是政治课,白天跟你们讲政治课,多讲马列主义,毛主席的著作,有时还教育不过来,就是要有一些象蒯大富这样的反面教员。

讲的多了……(不清)今天就讲到这里,两个星期以后再来,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

清华大学在反蒯斗争中,有700多名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蒯大富曾跑到清华火车站,用卧轨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为了防止意外,工作组决定单独关押蒯大富一段时间。从7月3日开始,工作组开始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把他关在新斋862号——蒯大富住的宿舍,不让他出门。但是,总有人来探访。于是工作组又把他挪到一号楼的四楼上,单独看押。搞了4个人一班,分四班看守,白天晚上都盯得死死的。为抗议关押,蒯大富开始绝食。

7月4日,蒯大富发出《绝食抗议非法政治迫害!》的公开信:

清华大学工作组: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现在享有不可侵犯的人身自由权!

而现在呢?

我出门,你们跟踪监视;

我打电话,你们不准;

今天出新斋门,你们不准;

上强斋,你们不准!甚至动武,流血!

我要去中央,你们不准!

你们要犯法吗?你们要封锁中央吗?

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现在我提出一个要求;

誓死明天去中央

你们可以派人跟着,但没有限制我行动的任何权利。

如不答应,我于一九六六年七月五日晨六点零分起,绝食抗议这种非法的政治迫害!

蒯大富

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二十三点

绝食第三天,北京市委副书记马力到清华园来看他,对他说:“蒯大富,你绝什么食啊?你写的信我们都收到了,你要转到中央的信我

们也都转了。不吃饭身体垮了,那你还斗什么?赶快吃饭!”

此时的蒯大富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听了马力的话后,7月6日,蒯大富写出《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文中写道:“采取绝食斗争的方法是严重错误的,我准备长期斗争”。于是乎,复食。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北京大学附中受工作组支持的左派学生,邀请在北大附中的海淀区各中学左派学生代表,参加他们组织的庆祝晚会。据宋柏林日记记载:“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清华附中红卫兵去了几个人。在那里,他们大开眼界。首先北大附中左派都是清一色黄军装,耀武扬威,与清华附中红卫兵的百姓装束,形成鲜明对比。另外,他们个个都是干部子女,清华附中虽然也以干部子女为主,但是毕竟还有一批非干部子女的元老。而且,在晚会上,北大附中把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隔离在观众席外围,大大突出了阶级界限。询问之下,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得到了工作组的支持。

在晚会上演出的《造反歌》从此跨出校门,在社会上广为传唱,并在传唱过程中被定名为《革命造反歌》,还配上肢体语言,成为简单夸张、热烈煽情的街头群舞。

7月3日,北大工作组副组长张德华在北大附中召开座谈会,说“红旗”小组有“方针性”错误。提出用分化中间,先拉群众,孤立少数的方法打垮“红旗小组”。7月11日,张承先在北大附中召开部分师生座谈会,批评红旗小组是“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红旗”小组几乎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人数由300多人锐减为100多人。

风靡北京的“造反歌”作者,北大附中学生严恒公开宣布退出反工作组的“红旗小组”,并把“造反歌”火药味很浓的歌词改得符合工作组的要求。

“造反歌”最初的歌词是: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敢想、敢说、敢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后来加工定型、显得更加完整的歌词由三段构成:

“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大革命当闯将！”

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们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

在实际演唱时，通常要在结尾处加上呐喊声：“杀！杀！杀——嘿！”以渲染加强气势。

7月3日，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分别给邓小平、李雪峰等领导写信，详细地讲了她挨打的情况。附文是关于袁淑娥破坏女附中文革的情况，希望上级派人调查、处理。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贴出已经10天，他们觉得戏已做足，于是卜大华等人又贴出早已准备好的《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并在文中转引了1966年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则国际评论《汉弗莱的哀叹》中引述的，毛泽东1939在延安各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上讲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他们还强调，他们提倡的造反是有阶级性的，“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

一看到“造反”二字竟是最高领袖说的，那些正在气势汹汹地批驳、斥责“造反”的人吓坏了，赶紧偃旗息鼓，溜之大吉，工作组更是楞住了，紧急派人去查证核实，结果证明那条语录是真的。

北师大女附中在批斗卞校长大会后，反对工作组的李黎黎、梁二同等学生还去广播电台告状。她们送去揭发材料，要求反映给党中央毛主席，要求康生、江青、王光美接见。她们的材料，转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手里，胡克实转交胡启立处理。胡启立了解到，反对工作组的学生虽然基本上都是革命干部子弟，但也有例外，譬如李黎黎的父亲在反右倾中自杀，高滨滨是高岗之女、俞慧声是前北京市副市长范瑾之女、杨团是前北京市委常委、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杨述之女。黑帮子女混入其中，他觉得问题很严重。必须对反工作组的学生认

真过细地做工作,整体上去分化瓦解,团结教育大多数,孤立极少数。

胡启立亲自组织反击,部署左派力量分头出击。毕竟,大多数人都站在当权者一边。工作组几位干部每天分别找反工作组的学生谈心,以关心、爱护的态度,启发他们具体谈一谈写大字报的过程。如果是革命干部或者军队干部之女,就通过组织找家长,让家长做女儿的工作。他们认为带头的学生,主要是高三年级的梁二同、李黎黎、王南芬3位。分化的结果,就是把她们3人孤立起来。经过十多天的分化瓦解,反工作组的许多同学都被迫放弃原来的观点。

7月5日上午10时左右,一辆团中央的小车开进中南海,车里坐着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西城区工作队负责人胡启立、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长张世栋和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和副主席宋彬彬。后两人是邓小平点名邀请的,他虽然不认识她们,可是和她们的父亲很熟。解放初期,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工作时,刘进的父亲刘仰桥是西南局副秘书长,当时秘书长空缺。而宋彬彬的父亲宋任穷当时则是云南省委书记。

到邓小平家当面汇报工作,这让张世栋真有点紧张,因为那是他第一次见到地位这么高的中央领导。好在有上级胡启立同行,他若有遗漏,胡启立可以帮他兜着。

进到屋里,邓小平的夫人卓琳给大家倒水让座,一一自我介绍。当邓小平听到介绍刘进后,就对她说:“刘仰桥是个好同志。”一句话,让刘进激动了半天,以致以后张世栋汇报的话她基本上没有听进去。因为高教部自6月初部长蒋南翔停职后,就由刘仰桥主持工作。但是仅一周后,6月15日,刘仰桥也成为黑帮被停职了。虽然学校和她家只一路之隔,可工作组来后,刘进跟着他们忙得天天团团转,根本不回家。有一天,有个同学告诉她:“你爸爸出问题了,赶快回去看看吧。”她回家一看,高教部大院小院里铺天盖地都是打倒刘仰桥的大字报,她大吃一惊,不明白父亲怎么转眼成了黑帮。几个认识她的人揪住她,要她当即表态。她说:“我相信组织,父亲的问题由组织审查、做结论,他是他,我是我,我还要革命呢。”现在,邓小平都说父亲是好人了,刘进怎能不激动?

第79回：邓小平，接见女附中领导 群情奋，吴法宪四面楚歌

汇报由张世栋为主，胡启立补充。邓小平详细询问了工作组在校开展工作的情况，张世栋一一作答。

张世栋在汇报卞仲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天的问题时，举了卞仲耘对待学校两个特级教师的例子。邓小平说：“究竟教得好不好呢？如果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至于提级的问题，那不是他们的责任，中央也提倡过。中学教师名誉地位不高，教学有成绩，这种人要团结。要实事求是了解这些人究竟好不好？”

宋斌斌回答说：“她俩教学还不错。”

邓小平说：“她教学不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要逐步解决。”

接着又说：“师大女附中数学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你们学校干部子弟多，左派力量大。运动搞起来，搞的快，另外一方面也要看看突出的是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老师问题要慎重了解一下。如一些新老师，学生最不欢迎，因为他们没有经验，要教几年才会积累经验。老师是真好，还是专门捧资产阶级权威？每件事都要分析一下，要善于分析，不要只被一般冲动，冲啊！要学会战略、战术、政策、策略。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冲容易，冲得好就不容易。每弄一条错误时，都要加以分析。如真有本事就不要弄一条了……”

“大红人、有本事的，就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也要保护，因为他们教课教得好么。”

邓小平对刘进她们说：“不读书了？你们要毕业了，毛毛还要读书。读书是学生自学？数学、物理、化学都自己读？不要老师？半工半读还有个半读，业余学校也要有教员……”

“毛毛”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的小名。

邓小平询问斗了卞仲耘几次以及是否打了她。工作组汇报打了

时，邓小平强调不要打人。他谈到了卞仲耘的求助信，说：“卞仲耘只给我寄了一个信，承认她执行了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路线，说学校运动6月13日以前正常，以后就不正常了，主要是提出两件事：一贴了男女关系大字报，二打人了。说袁淑娥是个资本家女儿，领着学生到她家贴大字报。你们查袁淑娥怎么回事？本身不是好人，做出适当处理。学生里注意，不要被袁淑娥领导。”

他说：“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不要牵扯的面太广。要不然欠下的债太多，我们还不起。老师们都是好的，哪里有那么多修正主义呀？若有那么多，我们17年的人才是如何培养出来的？！毛主席的女儿不也是女附中培养的嘛！难道都是坏老师教的？”

邓小平说，要尽快恢复党组织的正常工作，要依靠学校的党组织，不能离开党组织。他说：“党员应当开会，党员在党内可以批判。党团组织要过生活。总支书记工作组代理。党团生活要恢复起来。把党搞垮怎么行，把团搞垮怎么行。如运动把共产党、共青团都打倒是胜利么？总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么。

恢复党的作用是逐步的，最后要保证党的领导、团的助手。要在运动中恢复党团作用。恢复生活不等于恢复作用，最后目的恢复党的领导作用，团的助手作用。

革命委员会要好好讨论运动的目的，方针和政策。老师、学生要结合起来，没有运动领导的统一语言怎么行……”

因此，邓小平不允许在学生中成立党团以外的组织。那会儿海淀区中学已经有了红卫兵这种学生组织，处于地下状态。邓小平说，一定要由党、团组织来取代类似红卫兵这样的非法学生组织，要把学校里学习好、思想好，有威望和组织能力强的学生，吸引到团委或学生会里面，让非法学生组织没有领头人，没有市场，他们就闹不起来。

对学校里的反工作组学生，邓小平再一次指示要组织辩论。当刘进和宋彬彬说：“反对工作组的人都不愿意参加辩论了，怎么办？”

邓小平说：“他们不辩，你们自己辩，缺席辩论也可以。目的是为了大家懂得道理，受教育。他不在也可以辩论、讲道理。”

邓小平又问：“多少人反对工作组？”

同学答：“还有20来人。”

邓问：“你们全校多少人？”

答：“1600 多人。”

邓小平说：“1600 多人对 20 人，没关系嘛！”

邓小平还讲了在学生中间是分左、中、右的，运动后期都要排队。

7月5日下午，北师大女附中工作组组长张世栋召开全校大会，遵照邓小平上午的指示，动员和部署“在师生中开展要不要争夺工作组的领导权”的大辩论。辩论对象高三4班李黎黎（代表13个同班同学）、高三1班王南芬（代表9个不同班级的高中生）、高三3班梁二同（代表18个高中生）。7月6日，在工作组的布置下，校园内贴满了全校师生批判、指责梁二同3人的大字报。

7月7日、8日、9日，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召开了3天的辩论会，约80人现场参加，全校则以听广播为主。结果是，高三4班13位干部子女集体认错，她们反对工作组，完全出于共同的认识，与外界无关，也不曾受到海淀区中学的影响。但是，辩论会后不久，李黎黎成了哭笑无常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王南芬曾经是学校学生会主席，学生党员，有很高威信。此时，她只身战群雄……

3人中，唯梁二同不到学校，拒绝参加辩论。此时梁二同在空军大院因反工作组已赫赫有名。空军大院也因她反工作组的做法而发生争论，机关内分为两派，各部门只要一开会就会说到师大女附中反工作组这件事，讨论梁二同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该支持她？这一切，使梁二同她们更加坚定，不怕被孤立，觉得很光荣。她们对工作组的劝告置若罔闻，梁二同干脆就不到学校，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自己干革命，经常去海淀区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等中学活动、交流。7月初，受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的影响，她们成立了女附中最早的学生组织“红旗”。

辩论会后，师大女附中学校开始部署下一个任务：老师集训和学生军训。把大多数学生集中起来赴邢台军训，把全体老师集中起来在“马神庙小学”集训，同时还把不符合军训条件的少数“有问题”的学生送到郊区劳动。然后就准备复课了。

我们再看看部队的文革运动，首先还是空军。

话说吴法宪在西北接到叶群的电话后，立即赶回北京。刚进家，就接到叶群给他打来得电话，将她在刘志坚家看到徐深吉告他状的事情告诉了吴法宪。

吴法宪不敢怠慢，回京后的第二天，6月4日上午，就召集空军党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贯彻执行中央《516通知》的问题。与此同时，还准备将他和成均这次西北执行氢弹空投任务的情况，以及检查空军部队发现的一些问题，一起向常委会作一个汇报。

谁知会议刚一开始，空军副司令员刘震首先向吴法宪提出：“你作为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对《516通知》不主持开会，不组织学习、讨论，躲到外面检查工作，迟迟不回北京，不抓‘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按兵不动，是什么态度？”

吴法宪迎头一棒，当时就懵了……

接着，空军副司令员曹里怀、副政委王辉球也相继发言，指责吴法宪，上纲上线。特别是成均，本来和吴法宪的关系是很好的，在西北时，两人也配合得很好，可是此时，他也突然加入了指责吴法宪的行列，说“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空军按兵不动不行”等等，弄得吴法宪不知所措，赶紧分辨说：“据我了解，驻京的各部队机关和军委各总部，包括我们的邻居海军机关，都没有动。”

这下更热闹了，不仅徐深吉、成均，连副司令员谭家述、常乾坤、也都跟了上来，相继对吴法宪展开了轮番攻击。

参加会议的10名常委，7名攻击吴法宪，还有参谋长张廷发1人不表态，但是也不想和吴法宪靠在一起，常委中只有政委余立金和吴法宪两人是一致的，十分孤立。

刘震要求第二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

吴法宪说：“来不及呀！空军党委委员有50多人，就是连夜用电话通知都来不及呀！要开也起码等到6号才行。可以要求参加会议的人5号晚以前赶到北京报到。”

于是决定6月6日召开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当天下午，吴法宪即向中央军委报告，获得批准。

6月6日上午8时，按照空军党委常委刘震等多数人的意见，空军党委第三届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在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礼堂正式召开。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空军党委委员 32 人,各军区空军的主要领导和空军领导机关二级部部长以上领导 30 人列席了会议。

会前,已有两位副司令员给上级写信,其中一位给林彪写信告吴法宪,另一位则到叶剑英那里状告吴法宪。叶剑英给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打来电话,向他了解情况,并嘱咐何廷一,不要卷进他们的矛盾。

在这次全会上,吴法宪的开场白讲了大约有 10 分钟,刚讲完,刘震就上台发言,然后是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徐深吉、王辉球和常乾坤,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抢着上台发言。基本意思都差不多: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搞迟了;吴司令在西北躲风,迟迟不回来,迟迟不作讨论,不作决定;对中央的指示,对《516 通知》按兵不动,耽误了空军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等等。此时,会议秩序大乱,有的对吴法宪、余立金义愤填膺;有的对刘亚楼痛心疾首;有的常委在说到刘亚楼一言堂、一长制、飞扬跋扈、压制民主时,竟痛哭流涕。会议一开始大家的矛头就异常集中:揭发批判刘亚楼、吴法宪、余立金的“罪行”或“错误”。7 个常委齐上阵,搞得吴法宪、余立金狼狈不堪,根本压不住阵脚。

为什么又批判到刘亚楼?因为 5 月 16 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提到 1965 年 2 月间刘亚楼分别向叶群、林彪转达了罗瑞卿“四条意见”,然后称:“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并向刘亚楼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同志的思想情况、恶劣倾向及近年来对罗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表示他过去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

这个报告所附的肖华 3 月 25 日在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中说:“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

刘亚楼是个干事的人,作风强悍,也有脾气,对人对事要求甚严,批评人不留情面。空军这几个常委,在刘亚楼生前颇感压抑。现在看到中央文件说刘亚楼“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于是将矛头指向空军中与刘亚楼走得最近的、能对他忍气吞声的吴法宪和受刘亚楼器重的余立金,那几个常委也满有理由怀

疑他们与刘亚楼关系同样“极不正常”。此时，中央刚刚改组了北京市委和北京大学党委，还下发了《516通知》，要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究竟空军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是不是吴法宪也有问题？空军的领导班子是否也要改组？空军共有11名常委：书记是司令员吴法宪，副书记有政委余立金、副司令员王秉璋、成钧，其余副司令员刘震、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张廷发和副政委王辉球7人是常委。王秉璋兼七机部部长，没有参加6月6日的空军全委会。

下面各军区本来对刘亚楼也有意见，见几个常委这么一闹，于是，大家也跟着一块儿起哄，像沈阳军区空军的黄立清、南京军区空军的聂凤智、广州军区空军的吴富善，都是些老资格，再加上成都指挥所的高厚良、武汉军区空军的傅传作、廖冠贤等人，和8位常委一起，哄啊、闹啊……

会议一开始，几个常委就要求军委派工作组来。军委没有派。后来，以总政的名义，由总政组织部副部长胡友之为组长，包括青年部副部长萧麦萍和叶剑英的秘书李文芳3人前来参加空军党委的十一次全会。住在空军招待所。叶剑英嘱咐他们：“只带耳朵，不带嘴巴。”

6月9日，叶剑英为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专门给空军常委写了一封信：“空军党委领导核心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党委要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经常思想见面，相互间要经常提意见。对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要当作某种资料去收集，看到同志有了错误，要随时提出来，不要使问题成堆。希望你们这次会议是在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胜利的会议，是团结的会议。”

6月14日，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说：

“用中央军委立空军为标兵的三条理由衡量，显然不够。一是抓两头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实际上，‘上头’就没有抓好。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期间，毛主席的许多指示，如关于未来战争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大军区传达了，空军都听不到；有时传达了，又用自己的话讲，让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是刘亚楼自己的东西，搞得思想十分混乱。因此，空军党委并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四个第一’也更谈不上‘落实’。二是党委班子团结好，有个好班子。什么好班子！党委常委内只有刘亚楼的‘一言堂’，根本没有其他成员的应有地位，本身就没有搞好团结。三是要求严格，雷厉风行。其实是打着严格要求、雷厉风行的旗号，通过生硬粗暴的做法，大搞惩办主义，形式主义，使得空军内部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互吹捧，弄虚作假的不正之风。加上刘亚楼本人有些问题也影响极坏。”

“如果放到下面”，聂凤智最后结论说：“任何一级党委，都应属于烂掉了的单位！”

与会者对刘亚楼，特别是对吴法宪的作风问题、生活问题、工作问题、干部问题等等，列举了大量事实，提出了许多意见。吴法宪在会上是一副可怜挨整的模样，只是低着头在本子上默默地作记录。会下，他急得上蹿下跳，到处活动，希望拉拢一些人为他“保驾”。一天，他把空军政治部的王平水、王静敏两位副主任、军校部部长陈熙、直属政治部主任徐又彬、副参谋长何廷一找去，吴法宪对众人说：“他们拉了一帮人，我也要拉一帮人。我不怕他们，我要和他们斗……”在座的谁也没吭声。

一次，副参谋长何廷一去理发，恰巧吴法宪也在理发室，他见了何廷一，十分热情地说：“你的汽车太旧了，我准备给你要一辆红旗车。”

红旗车是大军区正、副职坐的，何廷一是副参谋长，还没有资格坐这种车。吴法宪又对他说，已给林彪汇报，准备直接提他当副司令员。面对吴法宪的公开拉拢，何廷一没有表示积极的响应。

与此同时，下面的部队，如武汉军区空军、广州军区空军、沈阳军区空军等，也纷纷打来电报向空军党委表达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当然也是炮轰刘亚楼。

第 80 回：联名信，要撤换空军领导 竟相同，海军开会批肖、苏

6月19日晚，空军党委在研究如何答复下面部队的意见时，大多数人认为精神是好的，是贯彻和执行中央指示，应该表示鼓励。只有空军党委委员、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说，电报中有许多严重的不健康因素。

聂凤智站起来大声说：“不能同意刘锦平的看法！以前刘亚楼主持空军工作，下面不敢对空军党委提意见；谁提意见，谁有一点个人独立的见解，谁就会遭受打击。现在刚刚提了一点意见，就说人家是不健康因素，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是无法让人信服的！”聂凤智甚至提出，刘亚楼不能“盖棺论定”，而应“盖棺重定”！

晚饭后，成钧、黄立清、傅传作、廖冠贤等几个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到贺龙家里，贺龙问及空军党委全会情况，成均说：“空军的问题很多，到现在，已经乱糟糟地开不下去了，吴法宪已经不能主持会议了。”

贺龙说：“这个会，吴法宪、余立金他们不能开，你们就组织起来继续开嘛。有话就说，有问题就揭嘛。”

“看来，空军这个标兵是有些问题。过去不但你们受了蒙蔽，我们也受了蒙蔽，林副主席也受了蒙蔽。有问题揭开来好。有问题不揭，将来捂出大事来，那损失就大了！”

7月初，南京空军空四军所辖的驻江苏盐城的空31师和盐城基地，突然给空军党委发来一份电报，列举了刘亚楼的许多错误，以及提到刘亚楼就无法避开的空军党委其他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电报措辞极为强烈，最后向空军党委提了三条要求或建议：“撤消刘亚楼的讣告和悼词，重新评价；将刘亚楼的骨灰搬出八宝山；改组空军党委现有的领导。”

于是，由刘震牵头，成钧、曹里怀、徐深吉、常乾坤、谭家述、王辉球署名，正式向中央军委递交了一封信，罗列了25条意见，基本上概括

了大家在会议上所提出的问题，其中有 10 条是对着吴法宪的。

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收到了空军刘震等人的信，是刘震打电话到大连，找到“林办”的秘书，将信的内容转告了林彪。

林彪在得知信的内容后，于 7 月 3 日晚上与叶剑英通电话说：“空军这个情况不正常。刘亚楼、吴法宪有缺点、有错误，应该批评，但是这种作法不对头。这是有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罢官夺权。”

叶剑英同意林彪的意见，并指出：“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来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

林彪说：“此风不可长。”

在电话上，叶剑英还向林彪汇报了海军的问题：

5 月 27 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体会议召开，海军政委苏振华主持。这就是后来海军历史上有名的“三·三会议”。按照预定的议程，会议有三个议题：一是按照中央的要求，学习讨论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二是传达 65 年 12 月上海中央工作会议和 66 年 3 月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的精神，批判罗瑞卿的错误，肃清其影响；三是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指示和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会议分党委会、党委扩大会、党委全会三个阶段进行。军委派叶剑英办公室副主任莫阳、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刘德润、总政干部部副部长朱光 3 人组成军委联络小组，参加了会议。

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此时正在庐山养病。在 3 月份京西宾馆召开的批罗会议上，李作鹏曾写了一个书面发言稿，送给会议秘书组，请求印发。过了几天，秘书组负责人通知他说：“你的书面发言稿，经领导小组审查，认为其中埋伏有四根刺，不能印发”。

李作鹏不知道这“四根刺”指的是什么？但他认为，海军党委常委中，王宏坤、李作鹏、张秀川与司令员肖劲光、苏振华之间，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有分歧，可能在他的书面发言中，某些言辞旁敲侧击涉及到了苏振华，所以主持会议的叶剑英不同意印发。

叶剑英在 1965 年底上海会议上看到过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 3 人写给林彪的那份揭发罗瑞卿的材料，其中涉及到苏振华。叶剑英曾就苏振华的事专门向李作鹏打过招呼，说“苏振华是好人。”这次京西会议，李作鹏的书面发言又暗指了苏振华，李作鹏猜想，可能是因此不

准印发他的书面发言稿。

后来李作鹏又想改为口头发言，可这样同样会得罪叶剑英。但又考虑：上海会议时他就没有发言，京西批罗会议再不发言，林彪知道后肯定不会满意，可能要责怪他旗帜不鲜明。发言还是不发言？两个老帅对苏振华的看法截然相反，涉及还是不涉及？这个分寸到底怎样把握？他左右为难。

这时，李作鹏的心脏病发作，住进了解放军301总医院。几天后，叶群到医院看他，要他安心养病。李作鹏当时向叶群谈到“四根刺”问题。在医院里，他曾写信想见叶剑英一次，请求批评指示，结果叶剑英没有答应，只批准他离开北京到外地休养，“愿到南方就到南方，愿到北方就到北方”，由李作鹏自己选择。

于是，5月中旬，李作鹏决定去庐山休养。5月下旬，他与夫人到达武汉，并于6月初上了庐山，因此没有参加海军的“三三会议”。但是他的意见都通过信件转达到了会上。

在“三三会议”上，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和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严厉的批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和政委苏振华不突出政治，肖劲光多次检查均没有通过，原因是上“纲”不够，检查不深刻。

在此期间，有人反映，张秀川背着多数常委，会外开会，找了若干人谈话，散布肖、苏问题严重，跟罗跟得紧，海军争论问题是路线问题，甚至违反会前党委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说“团结问题一定要扯，杀头也要扯。”

下边还有人给中央和军委写报告，要求扩大传达范围。为此，肖劲光在领导小组会议上拍了桌子，中途退出会场。

6月15日，海军“三三”会议领导小组开会。会上有人提出全会不要再延长了，因为常委思想不交锋，文件再改也只能作些修修补补，不会产生好文件，不如把党委检查材料作个“引子”、作个“线索”、作个“资料”，印发扩大会议。同时做了撤销原来常委会议关于不扯团结问题的决议，认为该决议是压制民主，是错误的。提出在下一步的党委扩大会议上，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不管什么问题，不管对谁的问题，都可以大胆揭发批判，要突破一切框框，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提倡有什么说什么。

6月16日,海军党委三届三次全会结束。

6月17日,海军党委全会转入党委扩大会议,除参加三届三次全会的代表外,增加了军、师一级的领导干部参加会议。扩大会议在传达中央上海会议和中央工作小组会议精神的同时,继续揭发批判罗瑞卿问题。

6月18日,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领导小组以海军党委名义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根据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和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的意见,写了这样一段话:“海军内部长期存在着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虽然1963年1月党委扩大会议和1965年12月三届二次会议等多次批判斗争,但始终未得解决……问题不解决与罗瑞卿的影响干扰有极大关系……海军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一定要在这次党委扩大会议上,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彻底地揭盖子、摆问题……不论是谁,不论错误有多大,是什么性质,都要彻底查清楚,明辨是非……”

会上,有人在揭发批判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军事冲击政治”时,联系海军的工作实际,或不点名的,或指名道姓的提到在过去几年中,海军也执行了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海军也存在军事冲击政治,搞军事大比武等问题,作为海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有责任的。也有人提出去年秋,海军党委召开三届二次全会,讨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三年工作基本总结”时,海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振华不参加会议,海军党委常委内部对“突出政治”存在思想不统一,工作不团结现象。有人也提出海军党委常委在纠正“军事冲击政治”问题上争论的根源在于罗瑞卿和苏振华。

在扩大会议上,肖劲光作了表态性的发言,提出:“为了节省时间,集中解决主要问题,这次会议重点是检查我们海军党委,特别是肖、苏我们两个一把手的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通过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之后,肖劲光、苏振华都在会议上做了书面检讨。

肖劲光和苏振华结合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检讨了自己和罗瑞卿“特殊关系”以及执行罗瑞卿“错误路线”的问题。

随着会议的进展,肖劲光与苏振华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被动。肖劲

光所作的多次检查均没有被通过,说他上“纲”不够高,检查不深刻。

以后批判的热度越来越高,甚至在简报上刊登这样的语录,要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会议也追究了海军参谋长张学思的问题,批他执行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还要他交待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起因是1952年,国家因建政协礼堂,张学思的二母亲卢夫人以张家全体成员的名义,把北京顺承王府卖给政府。她把这笔钱平均分成18份,张家成员每人1份。当时,张学思说服母亲许夫人,把他们母子兄妹所得的5份,共八亿五千余万元旧币全部捐献给国家。1953年,张学思由大连调北京海军机关工作,他的母亲许夫人用自己的私蓄在北京买下一座四合院居住。张学思作为一名海军的高级干部本应享有一套公房,但他看到许多干部住房紧张,便主动提出他不要公房,自己全家和母亲住在一起。到1966年,他在这所私宅已住了十几年,一切费用完全自理,就连修缮费也没有用公家花一分钱,此时在会上追究的就是他这套房产从何而来?张学思气愤地写了一份关于自己房产问题的说明材料,拿到会议上散发……

7月2日,有3个小组提出肖劲光、苏振华是批判重点,要王宏坤出来领导会议。王宏坤提出让因病未出席会议的李作鹏回来领导会议。这个情况登在了简报上。军委联络小组莫阳、刘德润、朱光3人小组立即向叶剑英作了汇报。

第二天,7月3日,叶剑英给肖劲光打电话,提议会议暂停一天,并重新印发毛泽东1963年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批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

7月3日晚,叶剑英在电话里与林彪交换了对空军问题的意见后,又将海军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

听了叶剑英的汇报,林彪说:“海军现在领导不能改变,肖、苏两同志的领导不能改变。”“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把肖、苏撤了,全军就会乱了,此风不可长。”

并说:“海军每个人”,“要自己洗澡,互相擦背,提高思想,但不能夺权。”

另一方面,他又说:“李作鹏、张秀川同志3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

工作上是好的”，“如果撤换李、张，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因此，他在电话中告诉叶剑英：“肖、苏要支持李、张去工作，李、张要维护肖、苏的威信。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两个直接用电话讲的。”

叶剑英听了林彪对海、空军党委全会、扩大会议的意见后，当晚就报告了邓小平，邓小平说他完全同意。随后，叶剑英把海、空军的情况又报告了毛泽东主席。第二天，7月4日，又在刘少奇那里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海、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军委常委贺龙、聂荣臻、陈毅和叶剑英参加。会议由邓小平亲自作记录，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意见，作了三条指示：

一、党绝对不能允许搞地下活动，刘少奇特别指出，犯错误，路线错误是第二位的错误，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肖劲光、苏振华、吴法宪、余立金四同志，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不够的，以后还可以再讲。常委其他同志要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的挖一下。

三、用党委全会和党委扩大会议这种方式撤换领导的做法是错误的。

7月7日下午15时30分，军委第52次常委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贺龙主持，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陶铸等人出席，海军9名常委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海军领导班子团结问题。会上，叶剑英传达7月3日林彪的指示和7月4日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并作了长篇发言，指出：

“肖劲光、苏振华两位同志，在海军工作十多年，对他们的成绩和缺点如何看？这几年，海军一开会就搞这个问题。……一个人，除非他不做什么，只要做工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会有错误。”

“但是，有人想把肖、苏推到黑帮里去。要是按照这种搞法搞下去，就是要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是黑帮分子就要罢官，而且包括有人公开提出肖、苏是批判重点，应该由王宏坤同志来领导这个会议。这样肖、苏还能当司令员、政治委员吗？肖、苏罢官，王宏坤上台，黄袍加身，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肖、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的个别同志。你们利用群众的压力罢了肖、苏的官，这说明了什么呢？今天我不是说王宏坤同志想伸手夺权，我不这样说。刘少奇同志在中央常委会议上指出，伸手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是第二位的。我看你们的会议已经到黄河边上了。这不怪群众，因为领导上有人在引导。在这种情况下，让你们休会一天。”

贺龙表态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嘛，不要搞阴谋。”

第 81 回：军委会，解决空、海军问题 烽烟起，毛泽东回到故乡

7月8日，叶剑英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亲自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林彪的指示以及军委52次常委会议精神，提出：

- 一、肖劲光等是好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
- 二、军队不能罢官夺权，会议本身作决议撤换领导是错误的；
- 三、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办事，不准搞地下活动，强调分清是非，搞好团结，批评了某些人“抢班夺权”的错误。

他在传达中，连林彪说的“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两个直接用电话讲的”都作了说明。

同时指示肖劲光和苏振华要高姿态，注意掌握会议，不要矫枉过正。

在以后的会议中，肖劲光和苏振华都主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对前一阶段会议向异常方向发展承担了没有挺身而出的责任，并指出：“个别同志想把党内斗争搞成敌我矛盾的斗争，这是不对的。我们不能‘以牙还牙’，重复他们过去的错误。要坚持原则，要吸取这个经验教训，对他们采用党内斗争的方法，防止再来偏向。”

但是，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由此发生转折，在此后的40多天里，会议也由开始批判罗瑞卿及肃清罗瑞卿在海军的影响，转向一边倒的揭发批判王宏坤和张秀川搞地下活动、罢官夺权的问题。例如，揭发他们找了各舰队的领导个别谈话，打招呼，在张秀川家和其他一些地方开会、串联，用暗语打电话，操纵简报组等等。

会上揭发的所谓“地下活动”，是说当时的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南海舰队航空兵政委周志先等几个参加会议代表，带着从海南岛运来的西瓜，到张秀川家看他，边吃西瓜，边议论会议情况，后来被冠以“西瓜会议”。

于是，王宏坤、张秀川做了检查。

王宏坤在检查交代中说：“要不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挽救，我就要从悬崖上跌下去，掉进黄河里去了。”“我越想越觉得问题严重，越想越觉得对不起党，对不起肖、苏。”

张秀川也检查交代说：“那些不正当的作法，这次会议发展最严重，去年‘三·二’全会有，平时也有，李作鹏等议论过肖、苏，没有议论怎么能写出‘十条’。”这些检查，尽管一再避重就轻，也还是暴露了他始终在窥测方向，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立场，他说：“本来有多少次应该放弃自己认识上的错误……上海会议，肖、苏参加了，求应放弃，中央工作小组会议我参加了，中央打招呼不提肖、苏问题，而后彭真问题一揭，又加深了对问题的看法。当中央指示不扯高级将领问题，自己还不改变。本来中央有指示，‘十条’不向下传达，自己也没有放弃认识。”

“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挽救了我，把我从斜路上扭回来了，否则就要掉进黄河里去了。我对不起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同志。”他还表示：“今后永不再犯。”

会议也把矛头指向李作鹏。有人说：“李、王、张地下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62年李、张到海军就开始了。”有人说：“海政是李、王、张地下活动的基地。”有人说：“三届二次全会常委内部争论和对苏振华、刘道生的批评是错误的。”有人说李作鹏是“摇鹅毛扇的”，“搞非法活动”，“在庐山幕后指挥会议”等等。总之，王宏坤、张秀川的后台是李作鹏。

因病未参加会议的李作鹏给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李、王、张在过去几年的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此时，在地方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影响下，部队有些单位也跃跃欲试，尤其是机关、院校，个别师、团甚至也出现了大字报。情况反映到总政，7月8日，叶剑英在总政的《部队文化革命动态》上批示：同意军队文化大革命在23所高等技术学校中进行。于是，军队院校的学生闻风而动，堂而皇之的贴出大字报，开始文化大革命。

7月11日上午8时，中央军委第53次常委会议在北京三座门军

委办公厅召开，集中讨论空军问题。军委常委到会的有叶剑英、聂荣臻、贺龙、徐向前、陈毅，中央书记处陶铸参加。根据军委指示，空军党委常委全体成员参加了这个会议。

会议由贺龙主持。他首先说明：“最近中央常委召集军委常委同志开了一次会议，陶铸同志也参加了，专门讨论了海军和空军的问题。先请叶帅进行传达。”

叶剑英说：“今天这个会议，是专为解决空军问题而召开的。空军建军以来，据说已经开过六十多次全会了。中央、军委是很信任你们的，从来没有像这次会议这样来抓。”

他批评空军前一段会议，不像个老干部开会，像个小孩子开会，讲了些错话，作了些错事，弄得军委不能不出来过问。他说：“等到你们陷下去了，再要我们这些老年人来抬你们，就抬不动了。因此，这个会是非开不可的。”

叶剑英引用三国人物的典故，批评空军常委中有人搞小动作，企图撤换空军领导的问题时说：“真是‘天下英雄谁敌手，可惜今日无曹刘。’”

“可惜今日无曹刘”中的曹刘，既指三国时的曹操、刘备，也暗讽空军中的曹里怀、刘震。

叶剑英讲完后，贺龙和徐向前也各自批评了自己的老部下。贺龙还特别批评成钧说：“你成钧对吴法宪不支持，站在对立面，想干什么？”

徐向前也批评徐深吉说：“人家空军想要有四方面军的领导干部，才把你从华北调到空军去，你为什么要在空军里搞这些活动？”

聂荣臻说：“你们搞的这些都错了。”

空军常委 11 人先后表态发言，一致表示拥护中央、军委和叶剑英的意见。多数人主动检讨自己的错误。刘震说：“我们有错误”，成钧也跟着说了一句“我也有错误”。

张廷发在发言中，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说有人搞“串连活动”，批评徐深吉说：“徐深吉同志说他受到刘亚楼的害最深，其实刘亚楼对你和小姨子的问题，处理得是对的。”

最后，叶剑英说：“这样吧，明天召集空军党委全体会议，我到会讲

话,你们去准备吧。”

第二天,7月21日,叶剑英来到空军党委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并在会上讲了3个小时的话。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常委和军委常委的指示,指出了空军党委常委七个人的错误,并告诉大家,这个会议要转过来,不能再这样开了。

大家都表示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叶剑英的讲话。

叶剑英在会下个别对吴法宪说:“法宪,你应该先作一个检讨,这样才好将会议转过来。你不可能没有缺点错误,你这样一检讨,就主动了。”

吴法宪经过一个星期的准备,在会上作了一天的检查。林彪也给吴法宪打了电话,要求吴法宪作好空军内部的团结工作,对刘震等人的批评也要适可而止。

会上批评了广空的吴富善、沈空黄立清、福空李世安和南空聂凤智,说吴富善是“摇羽毛扇的”,聂凤智、曹里怀是“跳得最高的”。还说聂凤智有野心,“想当空军司令”,除了“罢官夺权”,还企图挑起军内一、四方面军的历史纠葛,并责令他迅速查清盐城电报。

就在北京及全国闹得热火朝天,烽烟四起的时候,毛泽东却在湖南韶山冲他老家附近的一个山洞里静静地思考着问题。

山洞叫滴水洞,是毛泽东童年时代常去玩耍的地方。山梁上,埋着毛氏宗族的祖坟。1959年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陪着他走到滴水洞的山梁上时,毛泽东说:

“小舟啊,这个地方倒很安静,我退休后,在这儿给我搭个凉棚好吗?”

“那有什么不可以的!”周小舟回去后向省委作了通报,又向中南局书记陶铸汇报了情况,大家一致同意为毛泽东在滴水洞盖幢房子。可是,曾经给毛泽东当过秘书的周小舟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随即而来的庐山“神仙会”上,他遭到政治生涯沉没的厄运。

周小舟调离了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毛泽东要“搭个茅棚”的想法也就搁置了下来。很久之后,毛泽东巡视湖南,与接替周小舟的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闲聊,又谈到了“茅棚”一事,毛泽东说:“韶山有个松林招待所,可是那个地方不安静。”

张平化奇怪地问：“主席，韶山还有更安静的地方吗？”

毛泽东说：“有个滴水洞，很安静，在那里修房子很好。”

张平化立即带人去滴水洞考察。

滴水洞在崇山峻岭中的一道苍翠的山沟里，位于韶山冲西南约5公里，从龙头山到牛形山、黄蜂山，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幽深峡谷，占地约5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林立，龙头山山脚有一股山泉流出，蜿蜒成溪。溪上曾建有小桥，桥头边有一石洞，洞内滴水，四时不竭，即使是大旱，洞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滴水洞由此得名。这里不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而且便于警戒。

湖南省迅速拨款，组织班子，为毛泽东造“行宫”。当时被称为“203”工程，对外是绝对保密的。1962年底竣工。1964年初，滴水洞别墅开始接待中央领导人。

滴水洞别墅参照毛泽东在中南海居室的建筑式样，朴素，大方，实用。宽敞的房间，俭朴的家具，没有帝王行宫的奢侈派头。毛泽东曾很得意地对汪东兴说：“你看到这几所房子了吗？这是我让他们盖的，等我退休以后就住在这里了。”

1966年6月15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杭州，向西驶去。途经江西时，列车停靠在南昌站，他在车上接见江西省委几个负责人，谈到当时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

“这次运动，是一次反修防修的演习。我们的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缺乏政治经验，应该让他们到大风大浪中去经风雨，见世面，让他们得到一个锻炼的机会，使他们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想通过运动，练练兵。”

6月16日，毛泽东专列直奔湖南长沙，当天，在九所3号楼住了一个晚上。

6月17日下午15时，湖南的气温高达摄氏35度，在湖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文礼、省委接待处处长肖根如陪同下，毛泽东一行离开长沙，直奔毛泽东的故乡——韶山滴水洞而来。4辆汽车紧紧连成一线，奔驰在长沙至韶山的公路上。高文礼和接待处长肖根如坐进前卫车，毛泽东坐在一辆灰色吉姆车上，另一辆白色吉姆和一辆吉普车上，坐

着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和新华社记者钱嗣杰等。他们把毛泽东的吉姆车夹在其中。

在滴水洞的万绿丛中,有一座青灰色的四屋脊平房,那就是被称作1号楼的房舍,是毛泽东的下榻处。汽车进了滴水洞,在1号的大门口停下。毛泽东下了车,一股清风吹来,他深深地吸进了一口清香的空气,沿着1号楼边走边看,望望葱绿的群山,他很高兴,对随行人员说:

“这个洞子天生一半,人工一半,怕是花了不少钱哪!既然修了,就要管理好,不要破坏了。”



滴水洞1号楼

毛泽东领着大家在那不太宽敞的水泥坪里绕着圈子,一个劲地仰视两边的高山,双手指指点点的。他用手指着右边的山脉说:

“那里是牛形山,山的形态像只水牛,小时候,我到外婆家去,就是走的这条山沟;东北边那个高山上有个大石鼓,过去常有老虎到石头上乘凉,所以叫虎歇坪。我的祖父母就葬在那块地方。”

毛泽东用一口地道的韶山话作介绍,把大石头说成“大晒鼓”,水牛说成“许牛”,当地的服务员只好向随行人员作翻译。接着,

他又以主人的姿态给大家摆起了龙门阵：

“这是个好地方，我小时候在这里放过牛、砍过柴、割过草，还和小伙伴们打过架。我们《毛氏族谱》里说：‘一沟流水一拳山，虎踞龙盘在此间；灵秀聚锤人莫识，石桥如锁几重关。’指的就是这里。喏，从这里上去是龙头山，龙头山过去是黄田坳，以前以黄田坳为界，山那边是湘乡，山这边是韶山，所以黄田坳又叫湘潭坳……”

毛泽东走进了1号楼。时值盛夏，气温较高，滴水洞别墅没有冷气设备，为此肖根如亲自跑到长沙，用卡车拉来几个大木桶和几块冰（每块重200斤），分放在木桶里，用电扇把冰块吹化变成冷气，使室内温度降低。毛泽东看了高兴得很，说“这种土冷气不错”！他喝着滴水洞龙口的泉水，品味着韶峰茗茶，觉得既甜又香。

喝完茶，毛泽东走进为他安排好的卧室。卧室里有一张木板床，长2.1米、宽1.5米。毛泽东不喜欢“席梦思”之类的软床，一直爱睡木板床，即使在中南海菊香书屋里的床，也是如此。他的床上放满了从北京带来的书和文件。毛泽东叫服务员将原先准备好的床罩、睡衣、毯子、拖鞋等撤掉，换上随身带来的旧床单、旧被褥和一双旧拖鞋……

毛泽东住进1号楼，高文礼、张耀祠、警卫住2号楼，8341部队住3号楼。滴水洞外围高山要道，由湖南负责警卫，内围警卫由8341部队负责。

这是毛泽东继1959年后第二次回故乡。但这次毛泽东住在滴水洞，任何外人都不见，是绝对保密的。外国情报机关想尽各种办法，也一直未能探测出中国的头号人物此时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就连刘少奇等也只知道毛泽东到了湖南，却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只有周恩来明白实情。在这段日子里，周恩来每天从北京派专机为毛泽东传送文件到长沙，然后用汽车从长沙将这些文件送到韶山请毛泽东审阅，其中新华社有印着大红字的《内部参考》、各种报刊和红头文件、各种请示报告，也有中央文革小组送来的各种报告，又从毛泽东处带回批阅过的文件。因此，毛泽东在滴水洞小住时，消息仍然是非常灵通的。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陪同毛泽东南下，与他形影不离。

毛泽东与韶山人之间，隔着戒备森严的警卫，看不到1959年那种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看不到他与韶山人频频握手、与乡亲们亲切交谈。尽管他几次越过警戒线，想走进老乡家，却都被随从人员搀扶回来，与1959年那次形成鲜明对照。但保密工作还是出现了一点意外。平时，从韶山冲到滴水洞很少有车经过，那天，蓦然出现一支由3辆轿车、1辆客车组成的车队，引起了一个在山脚下打柴的小女孩的注意。她好奇地朝行驶在中间的轿车瞥了一眼，恰巧毛泽东正拉开窗帘向外张望，小姑娘兴奋得差点喊出声来。她一溜烟跑回家，对父母说：

“我看见毛主席了！毛主席住进滴水洞了。”

消息传开，淳朴的乡亲像过节一样高兴，等待着毛泽东再次来到他们中间。但是，很快就有公安人员找到了小女孩，郑重地告诉她：

“你看错人了，车里坐的不是毛主席，再不准你乱讲了。”

山村又恢复了平静。为了毛泽东在滴水洞期间的绝对安全和保密，有关部门还对工作人员规定了十不准：

不准主动接近主席，以免影响主席的休息与工作；

不准主动和主席握手；

不准主动和主席交谈；

不准直接向主席提出问题；

不准向外打电话与通信；

不准违反安全规定到自己工作以外的地方去；

不准随意出走，外出要经过批准等等。

另外，还把湖南省、地、县部分负责干部会议安排在韶山招待所举行，以分散人们对滴水洞的注意力。

第82回：滴水洞，冷眼向洋看世界 望神州，热风吹雨洒江天

住在滴水洞里的毛泽东寡言少语，不经常与工作人员交谈。每天除了看书和批阅文件，就是静思。他有时拿着书躺在床上看，有时又像烦躁不安。就是散步，时间也很短。住在滴水洞的毛泽东工作人员也生怕打扰他的思绪，连运送东西都尽量绕道走。不过有时毛泽东兴致来了也与工作人员打一打乒乓球。一号楼外有一水池，池中养了许多小金鱼，毛泽东见了很有趣，他向服务员说：“捞一个上来看看，看谁捞得到？”

一个服务员俯身用手去捞，怎么也捞不到。有个服务员机灵，拿来一个“捞子”一下子就把一条金鱼捞上来了。毛泽东笑着说：“捞上来了，不自由了，把它养在盆子里，供大家观赏。”

他每天凌晨4、5点钟睡觉，上午9点钟左右起床，一天仅休息4个多小时，只吃两顿饭，第一餐在下午一两点，第二餐在晚上11时左右。每餐不超过四菜一汤。韶山滴水洞的冬笋、香椿、蕨苗、地菜、马齿苋这类最具乡土味的菜，毛泽东更喜欢。一次，工作人员采到一点马齿苋，在韶河里捉到几条小鲫鱼，又在塘里捞了些小虾，毛泽东吃了很高兴。还有一次，厨师石荫祥特地为毛泽东做了一盘青椒炒鲜菌，端上桌后才发现菌子里藏有白蛆似的小虫，他想马上端走倒掉。不料毛泽东已走进餐厅，一切都来不及了。石荫祥歉意地说：

“主席，这个换掉吧！”

毛泽东却一边夹菜，一边说：“为什么，不是蛮香的吗？”

情急之下，石师傅只好以实相告：“真对不起您，菌子没洗干净，有小虫子。”

毛泽东笑了笑：“没有关系，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再说，菌子中有小虫子，说明这菌子没有毒，吃了不会死人，不要换。”

石师傅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偶尔也出来散步，但走得不远，都是从一号楼走到三号楼，然后折返。有次他想上龙头山看看，走到山边，一条小路又陡又窄，长了许多荆棘。工作人员怕他摔倒，连忙阻止。毛泽东有些不耐烦地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嘛！”

有一次，毛泽东无论如何睡不着觉，便走到门口，看见卫兵陈长江在执勤，便问他：“你们哨兵带枪和子弹没有？有坏人，要提高警惕！”陈长江回答：“我带几十个人，能对付一、二百敌人。”毛泽东点点头，表示满意。

一天，他叫来张耀祠说：“耀祠，你去看看青年湖能不能游泳？”

“好，我现在就去。”张耀祠答应说。

张耀祠一个人去了青年湖。那里其实是一个大水库，在两山之间筑起一个大坝，储了很深的水，水面很清。张耀祠在这堤岸上边走边看，迎面走来一个中年农民，扛了一把锄头，他见张耀祠观看水库，以为他是大干部，便叹着气对他说：

“修这水库，把上面大片的土地淹了，这些土地都是很好的土地，如果毛主席知道的话，他是绝不会同意的。”

张耀祠回到滴水洞，对毛主席说：“青年湖可以游泳，水深，水面很清，是个游泳的好地方。”

张耀祠接着说：“我在那里碰见一个农民……”于是他把这个农民所讲的话学说了一遍，讲到“毛主席是绝不会同意的”时，毛泽东“嘿嘿嘿”地笑了。

一向爱好游泳的毛泽东，这次却没有去游。

22日上午，毛泽东从房里走出大门，看见大门口旁摆着一个轮椅，感到好奇，想坐一坐。毛泽东刚坐上轮椅，高文礼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处长曲琪玉两人推着就向外走，张耀祠和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跟在后面，毛泽东坐在轮椅上，有一种天真的童趣。

马路左侧紧靠大山，上不去。马路右侧是一条20米宽的深沟，沟里一条小溪流过，水很小。再往右，仍是大山，大雨滂沱时，山洪直泻而下，汇入这条小溪，轰轰作响，直往韶山奔去。

毛泽东坐在轮椅上，左看看，右瞧瞧，都是青山和大沟、溪水。群山依旧，溪水如常，他没有多少兴味了，说：“哎，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于是,4人推着毛泽东,原路返回滴水洞,最多不过300米远。

回来后,在滴水洞口,钱嗣杰给毛泽东和张耀祠、曲琪玉、高文礼合了一个影。

滴水洞内宁静安谧,戒备森严。洞外却是另一番景象。毛泽东旧居、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前人潮涌动,欢声笑语。一天,一号楼外停了辆客车,一行人准备上车,毛泽东问身边服务员:“他们要去什么地方?”

服务员说:“去瞻仰您的旧居和陈列馆,您去不去?”

“你们去吧,我不去。”毛泽东回答道。

参观归来,大家感慨良多,特别对毛泽东一家6位烈士的事迹印象很深。毛泽东知道后,对湖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王延春说:“韶山的烈士很多,不要只宣传我一家,要宣传韶山党支部。”

在滴水洞,繁杂的批阅公文之余,毛泽东依然改不了他爱读书的习惯。那段日子,他又重读了一遍《西游记》,美猴王孙悟空大胆、敢斗和藐视一切的所作所为是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十分赞赏的。他愿意当那个美猴王:拔根毫毛,吹口气,刹那间就能变出成千上万个小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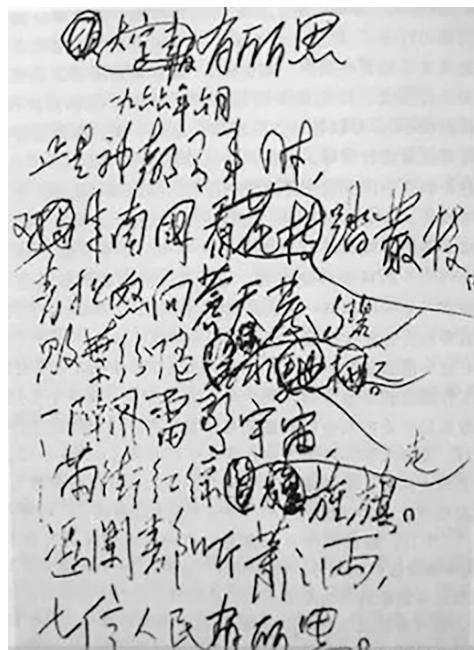
在南方这段时间,他写下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根据201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第5卷记载是这样的: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但是我们从毛泽东的手稿上看，第五句应是“一阵风雷惊宇宙”，最后两句，应是“凭栏静听潇潇雨，七亿人民有所思”。不知《毛泽东年谱》所录是不是毛泽东后来修改的。

此时的神州首都北京正经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从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处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到6月1日公布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而他却回到南方的家乡，似乎在做着“逍遥游”。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当时揭发出来的或将被揭出来的那些黑帮人物的心情，而“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则是当时中国国内形势的真实写照。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既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也可以体会到毛泽东对国人、对中国老百姓的殷殷期待之情。

毛泽东在南方6月的潇潇雨中，想得很深很远，他坚信，他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因为他是在

与人类的痼疾，人性的基本弱点——“私”作斗争，说到底，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代表的就是“私”：在平庸的世俗生活的包围下，一些共产党人对发展生产的兴趣远远超过了对发扬革命精神的兴趣，而在发展生产的背后，则是与资产阶级精神相通的那些因素：追求舒适，追求物质，追求享受。毛泽东就是要和这种“退化”作斗争，他相信，“公字当头”的新社会是可以设计的，人性是可以改造的。当然，他所面临的对手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强大不仅是力量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他们都是曾经和他一起为了新中国出生入死、立下过汗马功劳的革命家，他们都是各级手握实权的一方领导，他们是否能真正理解毛泽东的用心？他们是否能紧跟毛泽东过好文化革命这一关？这场革命最后能否胜利，这些都还难以肯定，自己被打碎也完全有可能，将来的革命是否也将取得胜利，现在更不知道，然而这一切都不能阻挡他的不容拂逆的意志，那些顾虑暂且放在一边，也许几百年后，人们会认为今天的这一切都是可笑的，但那是以后的事，眼下要考虑的是具体问题，即：这场革命将以何种方式来展开？

在滴水洞的十几天里，毛泽东似乎找到了领导这场革命的具体形式，他决心暂时将党的机器搁置一边，因为这台机器已经官僚化了，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他要重组党的宣传媒介，再建立一个领袖与人民直接对话的新渠道。在这个新形式中，将实现领袖与人民的直接交流，而他将以人民的化身来指导革命。他的力量就是一个巨大的集合名词——“人民”。当然，毛泽东十分清楚，人民是不会自发产生正确思想的，惟有人民的化身——毛泽东，才能给人民以正确的思想。

毛泽东住在滴水洞，湖南省委有意把工作会议安排在离滴水洞较近的韶山宾馆召开。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得知毛主席 28 日要走，便请主席跟他们开会的同志照个相，毛主席欣然同意了。

6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滴水洞1号楼前接见全体参加湖南省委工作会议的同志，并合影留念。接见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以前我带你们长征，现在，我又要带你们‘长征’了。”

这时，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也向张耀祠提出：“我们大家都想和毛主席照个相。”

张耀祠向毛泽东转达了省委接待处工作人员的这一要求，毛泽东

说：“好嘛。”

6月28日，毛泽东离开了韶山。原定是28日下午走的，那天清晨，他突然通知张耀祠上午8时离开滴水洞。

按照张耀祠的安排，毛泽东先和省委接待处的工作人员照了相。照完相，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走吧！”说着他又转过身来往回走，步子迈得很大，很缓，边走边用韶山乡音低低地念叨：“我还不想走呐，我还要再住一夜呐！”

他回到1号楼内的办公室，坐下来，点上烟，凝神沉思……服务员见毛泽东又折了回来，便急忙端上茶。他呷了几口，把烟灭掉，慢慢地从1号楼走出来，和随从人员、省地负责人、工作人员握手告别。

警卫员打开了毛泽东的车门，他似乎还不想离去，走到车边，他又走了回去，对其他人说：“你们走，我还要坐一下！”

张耀祠、李强、高文礼等急得满头大汗，因为保密电话已经拆掉，毛泽东的行装也收拾好了。毛泽东在客厅的长沙发上一屁股坐下，东看看，西瞧瞧，一句话也没说。服务员立即给毛泽东递上一杯茶，毛泽东一口一口地品尝着家乡的韶峰云雾茶。服务员又洗了几个水蜜桃，毛泽东说：“我不想吃。”

服务员说：“主席，您老人家不吃！？这是从您房子东头桃树上摘的，下次就难得吃到啊！”

毛泽东听后欣然吃了好几个，还吩咐服务员摘了两脸盆带去长沙。

这时候，工作人员又走到毛泽东身边，小声说道：“主席，一切都准备好了，走吧！”

毛泽东不耐烦地说：“还是要走，真是身不由己！”

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慢悠悠地站起身，一步一步地走出1号楼，步伐显得很沉重。

9时许，汽车马达响了，毛泽东离开滴水洞。汽车拐过一道弯，他朝祖籍地——东茅塘深情地望了一眼。汽车开到韶山毛泽东纪念馆门前，毛泽东叫司机赵师傅停了一会儿，他掀起窗帘，贪恋地看着小时候十分熟悉的毛氏宗祠。过了这段路，毛泽东就再也没有左顾右盼。

汽车开到长沙大托铺铁路支线后，上了专列，毛泽东自言自语地

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

6月28日，毛泽东在张耀祠等人陪同下，经长沙到达武汉。当晚，住在东湖宾馆梅岭1号楼。

这天，王任重在武汉起草《目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我们的建议》报告，强调了工作组的作用和在知识分子、群众中抓右派的重要性，试图作为指导运动的文件。

6月30日，毛泽东为他在1962年1月30日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是否发表一事，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说：

少奇、小平同志：

来电早已收到。经过考虑，那篇讲演现在发表，不合时宜。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过去之后，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那时再议是否发表不迟。王任重同志也不赞成现在发表。另外，请告伯达、康生、陶铸同志，将指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十二条草案，扩成为廿条左右。因为十二条草案中有许多条混淆不清，有若干条，每条可分为两三条，使每一条只说一件事，明白晓畅，读者易懂，较为适宜。希望在一星期内，在北京讨论几次，并草成第二稿，给我送来两份为盼。另外，华东局廿一日给中央报告华东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部署那些方面，值得参考。

毛泽东

六月卅日二时

毛泽东信中说的“那篇讲演”就是他在7000人大会上的讲话。

信中说的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草案十二条，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曾一度扩展为二十三条，最后确定为十六条。

毛泽东抵达武汉的第三天，6月30日，武汉大学校长李达被湖北的报刊、电台公开点名揭发和批判。当日《湖北日报》头版下半版，在通栏标题《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之下，发表“编者按”说：“今天本报发表两个材料，一个是《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一个是《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各地出现反工作组的情况反映到毛泽东那里，6月下旬，江青从上

海给北京打来电话,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文革小组要积极活动,要直接去看大字报,支持群众起来革命。于是,文革小组全部人马浩浩荡荡集体去看大字报。

7月1日,王任重在向毛泽东呈报的《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上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

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他又把写好了的这段“请批示”用红铅笔划去了。此后的几天,尽管他每天都能见到毛泽东,却始终没有向毛泽东递报这份材料。

7月3日,王任重给湖北省委常委写信,认为大中学校运动处于三种情况:“1、像武大,左派队伍初步形成,右派面目已被群众识破,开始向右派大批判。这种单位中学也有,但不多。2、水利电力学院,正处于大暴露阶段,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中间派在摇摆,左派领导尚未形成,右派还没有孤立。目前这种单位占多数。3、前几天的农学院,少数右派挂帅,转移斗争目标,企图把运动搞乱。有的中学也有这种情况,但不多了,也不难解决”。

从王任重原来在武汉掌握情况和后来省委汇报看,他认为“多数学校像水利电力学院类型,左右派正在争夺领导权。目前着重研究解决这一类型单位,暴露牛鬼蛇神,彻底斗倒斗臭右派分子”;“首先打击最猖狂最凶恶的敌人……有的是干部、教师或大学生中的反革命分子。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抓住根挖下去,把上上下下的根子都挖出来。水院可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这一基本估计和方法,决定性地指导了全省的运动。

在此影响下,武汉大学工作组的负责人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的最高阶段”。在这个思路指导下,工作组将武汉大学总数为1242人的全校干部和教师中,232人被打成“黑帮”、“黑线”,党支部副书记和教研室副主任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黑帮”的108人;有4个单位总支的一般干部被100%打成黑帮或靠边站。工作组抛出武大“三家村”以后,又在各系各单位大揪小“三家村”,有的单位硬性抓出三个来凑成一个“村”,全校有大小“三家村”十多家,总务处一个单位就有四个“三家村”,修缮组、机械厂的工人也成了所谓“三家村”的大老板。

王任重 6 月 28 日的报告《建议》和 7 月 3 日的信文《意见》，都被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陶铸转批到全国各省市，作为开展文革的指导性文件。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他们以为毛泽东对这两份报告是首肯的。

7 月 2 日，毛泽东看了刘少奇、邓小平 6 月 30 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草稿)》。刘少奇、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在京同志讨论后认为，在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教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交、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这是一个重要决定，请主席考虑决定。拟了一个通知稿，请审核。”毛泽东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当天，中共中央发出这个通知。

第 83 回：抓右派，王任重屡出经验 反鲁迅，任白戈《红旗》点名

7月上中旬，武汉各高校先后展开了类似北京“反干扰”的，以打击学生、教师群众为主的“反右斗争”。

华中工学院抓“孝子贤孙”，扫“歪风邪气”37天，383人被划为“右派”。

武汉水院由省委批准批斗4名学生，其中以“杀人未遂”罪名逮捕一个团支部书记，全院点名批判百余人，两名教师自杀；一学生对院党委和运动有怀疑，不听工作组劝阻，先去省委找运动领导小组，既而自己买票上北京找王任重反映情况，也打成“反革命”。

武汉医学院，被斗学生62人。

华中师范学院被斗300多人，仅外语系就达64人，某小班批斗12人，发生被逼写血书和试图自杀的严重事件。

武汉邮电学院被斗23人。

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共1400学生，就批斗200多人，“反右”长达23天。

在武汉医学院，批斗学生62人，已确定性质的29人，一位讨过饭的贫农儿子被逼写血书。

在建筑工程学校，全校500多人逮捕18人，批斗30多人。

省委重点抓的（一类院校）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水运学院、钢铁学院、一冶一中，有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如“6.10”（化学系）、“6.11”（外文系），“6.18”（哲学系），“6.20”事件，涉及一大批师生。

这些活动，多是在工作组和原党委的组织下进行的，由学校各级组织和工作组拟定出左、中、右名单，通过组建“工作组保卫组”、“动态反映组”或原来的单位保卫科、“治保组”和内定的左派影子结构，监视、跟踪师生群众，收集、整理材料，冷落和边缘化部分群众，疏远打击一些因认识不同的学生干部，剥夺这些学生参加横渡长江和声援越南

游行的权利,以至公开批判斗争群众。

武汉全市以镇压“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名义,批准逮捕学生和工人群众400多人,其中中学生159人。这些做法引起群众的恐怖和不满。本来群情高昂的政治运动,弄得十分恐怖。原来并肩一致参加文革运动的普通学生,从此被人为地划分为所谓“革命”与“反革命”的两大派,出现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混乱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学校中普遍出现了对于形势的争论,各级领导和积极拥护共产党的大多数群众,根据湖北省委和王任重的指示精神,认为1966年是“57年加58年的形势”,就是要与“右派”进行斗争;但是,情绪逆反的少数学生坚持认为:文革是1966年的形势,是“23条”说的主要斗争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形势。二者针锋相对。

当时,毛泽东正住在武汉东湖客舍,但他好像对武汉高校发生的这些事情全然不知。

7月5日,湖北省以武汉钢铁公司工人庞玉来动手打伤贴他大字报的人的罪名,判处他死刑。

武钢综合经营厂有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黄连生,响应厂党委的号召,将自己在“四清”运动中了解到的本车间工人、33岁的二级钳工庞玉来曾被资本家收养过的事情写成大字报,贴了出来。庞玉来很生气,扬言:“谁写我的大字报,我就和他拼了!”6月20日下午上班后,庞玉来到那张大字报前,要撕掉那份大字报。黄连生等人闻讯赶来制止。两人发生争吵。庞玉来手指着黄连生喝道:

“你他妈的写的什么东西?你给我念出来听听!”

黄连生等人纷纷制止说:“这是革命大字报,你要敢撕就是反革命!”

庞玉来气得大叫:“你他妈的,写老子一千张一万张老子都不怕,老子要和你们拼了!”说着,就去搬地上二十多斤重的大铁块,一下没拿起来,便又捡起旁边的石头,疯狂地向黄连生扔去,黄连生慌忙躲开。

随黄连生前来制止庞玉来撕大字报的另一位积极分子蔡先梅见状,赶紧上前拦住庞玉来,庞玉来又拾起另一块石头向蔡先梅的头部猛击,蔡先梅当即被打昏在地,鲜血直流,当即送医院抢救,庞玉来当

场被大家制服。

这本来是一起民事纠纷,但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湖北省委却将此认定为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案件,应该“要血债血还”。按照王任重“枪打出头鸟”的精神,做出枪毙庞玉来决定,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1966年7月5日,在武钢、一冶召开万人宣判大会,将庞玉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7月5日这一天,本来是烈日高照、晴空万里的天气,当大会宣布判处庞玉来死刑时,突然狂风大作、惊雷滚滚、暴雨倾盆。

6、7月,武汉大学工作组在批判李达“三家村”的革命旗号下,在知识分子和干部中进行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武汉大学群众要求五十年代的二刘书记,刘仰峤、刘真,回学校参加革命。刘真得到省委通知,从汉阳杜家台的四清第一线回到武汉,王任重正在东湖宾馆,见面对他讲“你们是左派!”遂派往武汉大学,加强工作队。不久,刘真发现武汉大学执掌运动者并不真正欢迎他回来,在学校无事可做。7月上旬,代理第一书记、省长张体学让他立即去水利学院抓“三家村”,反击群众中的右派分子。7月10日,新组成的工作队在刘真的率领下进入水院。

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成员穆欣署名文章《国防文学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口号》。点名批判中宣部负责人周扬和他的“一些追随者”曾在30年代“围剿鲁迅”。在说到“周扬的另一个追随者竟然攻击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罪恶’”时,穆欣在注释中写明,这个“周扬的追随者”是任白戈。

任白戈,四川南充人,1925年参加共青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左联”执行委员、秘书长。1935年夏因国内政治形势恶劣而避居日本,团结在东京的中国左翼文化人,建立了左翼文化总同盟。1937年回国,“七七事变”后到延安。先后担任过抗大总校政治主任教员、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十八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等。建国后先后任重庆军事接管委员会委员兼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长、西南文联和重庆市文联主席等,文革爆发时,他正担任着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兼重庆市市长,是重

庆这个当时西南最大工业城市的“首席执行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了穆欣的文章，重庆立即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纷纷打电话询问市委：被中央点名的任白戈是不是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

重庆市委不了解上面的意图，《重庆日报》没有转载这篇文章。市委也无法回答下面的询问，只能请示四川省委。

7月4日，重庆市副市长、重庆大学工作组组长余跃泽召开全校团干部及左派学生的秘密大会。会上，他再次重申必须集中火力对准校系两级干部，同时大义凛然地宣布：“重庆市委是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堡垒，书记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是经过考验的好班长！任何怀疑都是错误的！反动的！”演讲说到激昂处，他拍案而起，险些把茶杯震翻在地。

7月6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的这篇文章。

7月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穆欣的这篇文章。

很快，批判任白戈的文章、大字报或揭发批判材料纷纷寄往重庆市委及有关部门。重庆大学电机系6个二年级学生于7月9日写了批判任白戈1959年1月7日发表在《重庆日报》上的文章《创造出更新更美的作品》，寄给《重庆日报》。

穆欣的这篇文章，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事先都不知道。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马上与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商量如何处理此事。他们打电话询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陈伯达答复是罢官。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等下午中央书记处开会后再答复。

任白戈是继彭真之后第二个被批判的大城市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不同的是，任白戈是在尚未被撤销职务并且其所在地区党组织及上级领导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中央权威刊物公开点名的，而这时彭真虽已遭到批判但尚未在报刊上公开点名，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也没有点彭真的名。

李井泉决定，廖志高立即赶到重庆，了解那里的情况，同时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

晚上,陶铸给李井泉回电话说:“邓小平的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一下。”

李井泉当晚即将陶铸的电话转告了廖志高,并安排人按照陶铸电话精神写了报告上报中央。

7月8日,已经赶到重庆的廖志高,在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召开市委会议,传达由陶铸通报的、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任白戈的错误是30年代的问题,60年代的工作还是好的。并要求把这个意见用座谈会的方式传达到17级以上的干部中去。随即,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

被安排“请假检查”的任白戈,和省、市委领导从市委办公厅、宣传部和报社抽调了几位干部和“笔杆子”,一起住进重庆潘家坪高干招待所,帮助他查阅资料,上纲上线“提高认识”,以便写出像样的检查“过关”。但用了近一个月时间,他的认识仍然未能“提高”,他始终认为,自己当年在日本得知国内文艺界发生“两个口号”之争后,写文章宣传“国防文学”,是因为那是党提出的口号,他那时年轻,在日本看不到毛主席的书,不知道党内有毛主席这条路线。那时周扬是代表党的,是领导人,而鲁迅是党外的,听周扬的,在组织上没有错。他还坚决否认自己有“攻击鲁迅”的错误,认为自己对鲁迅从来就很尊重、崇敬,鲁迅逝世时,自己在东京组织了追悼会,还写了诗进行悼念……他的认识无法“提高”,最后只好由“笔杆子”们按照当时报纸批判的调子帮他拼凑了一个检查上报中央。

余跃泽听了廖志高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后,认为应当给重庆大学的师生适当透露廖志高内部讲话的精神。他的想法得到了工作组其他领导的认同。

7月9日,工作组召开全校大会,余跃泽讲话。他讲得兴高采烈,讲到对任白戈评价那一段时,他说:“任白戈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任白戈是中央决定的,是省委任命的,是党代会和人代会选举出来的,是值得信赖的。任白戈在重庆当了十多年的领导,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成绩,不是想抹煞就可以抹煞掉的。任白戈参加革命几十年,一心一意为革命,是坚强的革命派。谁要想打倒任白戈,那是痴心妄想!”等

等。态度明确，语气激愤。

当天中午，余跃泽召集各个系的工作组长开会，布置观察师生听了报告后的反映。当天晚上收集反映时，发现不少的学生跑到图书馆去了。工作组中有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学生到图书馆读书，正是工作组要求把运动引入学术讨论的大方向。

但是，为什么学生们一下子喜欢起读书来了？有人还是纳闷。散会后，余跃泽布置各个系工作小组派员到图书馆去观察，看看他们查阅些啥子资料。去的人返回来汇报：学生们不是在查阅图书，全都在查阅报纸、杂志。他们分别借出解放以来，中央、四川、重庆的各种大报和小报，包括各行各业各个部门内部办的报纸、杂志。按照年级、按照班组摊派任务，逐年逐月逐日翻阅、摘抄。图书馆内外，阅览室里，院坝里，路灯下都是查阅报纸的学生。有很多学生把报纸拿回教室、宿舍去查阅，态度非常认真。

工作组认为，学生的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值得进一步观察。

第二天，7月10日，重庆大学校园里就出现了大量揭批任白戈的大字报。学生从各个报刊上，摘抄出刊载任白戈的文章、讲话、报道，按照当时的习惯做法，有目的地挑出一些字句来，上纲上线，以此来反驳余跃泽对任白戈的肯定。

第三天，学生们将校园贴过的大字报重抄出来，浩浩荡荡地送到市委去张贴，市委大院铺天盖地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有些大字报学生还派人送到成都，贴到了省委机关和西南局机关内，质问省委和西南局：为什么工作组要给任白戈打包票？指责工作组为任白戈辩护是对抗中央的行为。要求省委、西南局表态：“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准了任白戈，指向市委、省委和西南局。责任追到余跃泽头上。

重庆市委大院搭了若干席棚，让学生贴大字报。学生为了“保护”这些大字报，占据了市委办公厅大楼的一些房间，在那里安营扎寨。一时间，来张贴大字报的，来看大字报，人群川流不息，市委机关不得安宁。市委领导进出大院时，人们拦车，要求答复“任白戈是不是坚强的马列主义者？”在省委，在西南局机关，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省委、西南局要求迅速查明这股风是怎样刮起来的。市委分别找余跃泽、钟池、崔成礼谈话，找学校干部谈话，在学生中了解情况，这才知道，事情是余跃泽的讲话引起的。

出于政治形势的需要，市委要求余跃泽做出书面检讨。中共中央西南局驻在重庆的代表刘文珍、燕汉民，就地催促余跃泽检讨。面对这样的形势，余跃泽不得不作检讨。但是他认为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讲话的内容并没有错误，只是时间和场合的问题。

第84回：华北会，乌兰夫真难过关 打游击，云成烈欲上青山

社会上，文化大革命搞得是热火朝天，前门饭店内，华北局会议开的是紧张非凡。6月1日，李雪峰专门到前门饭店向内蒙古小组全体会议传达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精神，接着华北局常务书记解学恭在会上指出内蒙古自治区问题的要害是：在四清中，不是“自始至终狠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狠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而是“宣传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的本质”，“反大汉族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各小组随即按解学恭的调子“揭盖子”。但是，人们所揭的多是以生产冲击四清等表面现象，甚至还有些人“捂盖子”。

为了统一认识，揭开盖子，华北局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几个文件和内蒙古《农村工作队报》最近发表一些值得注意的言论，印发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在《内蒙古历史研究参考资料》上译登的日本、苏联、蒙古的一些文章，尤其是抓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四清”期间重印《三五宣言》一事。

《三五宣言》是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以毛泽东名义于1935年12月20日发出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简称《三五宣言》。

该宣言主要是揭露当时日本侵华的“满蒙政策”，揭露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省置县，是为了抢占蒙古民族的土地牧场，以消灭蒙古民族……宣言阐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工农红军“要为解放其他的弱小民族而斗争，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内蒙古民族的问题”，提出内蒙古应该实行民族自决。

时过境迁，到了六十年代，乌兰夫又重印《三五宣言》，并在内蒙反对大汉族主义，这显然为中央政府不能接受。

前门会议上重新印发了《三五宣言》是作为批判材料，将乌兰夫“反对大汉族主义”等错误上纲到“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的高度。

学习了这些材料，各组反映强烈，会议开始进入“挖根子”阶段，那

些曾受到过排挤的东蒙干部和汉族干部，如：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再天、权星垣，党委常委雷代夫及宝音巴图、高万宝扎布、刘键等许多人开始揭发批判乌兰夫错误，指出区党委 1966 年上半年工作要点是修正主义的；批转呼市民族问题的报告是修正主义的纲领；印发“一九三五年宣言”是搞民族分裂活动；《农村工作队报》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工具。

此时的乌兰夫一方面为自己辩解，一方面向批判者提供证据，证明要求印发《三五宣言》的是另有人在，不是他。同时给李雪峰、解学恭写信，承认《内蒙古日报》不提阶级斗争犯了错误。

即使是在这种形势下，替乌兰夫说话、坚持反大汉族主义是正确的依然大有人在，如：呼和浩特市委书记李贵、土左旗旗委书记云瑞及陈炳宇等人。李贵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就呼市的情况，大汉族主义是客观存在，而且是主要的，甚至小孩子也有大汉族主义。”“呼市郊区生产上不来，主要原因是存在大汉族主义，民族矛盾尖锐而得不到解决。”

6月7日，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上，除在北京饭店的北京市委外，在前门饭店的其他各省都热闹非凡。内蒙古批判乌兰夫，河北省批判林铁，山西省委批袁振，天津批胡昭衡，异常激烈。

这天，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常委会，中央、华北局工作组李雪峰、解学恭、华北局财贸办公室主任李树德出席会议。李雪峰将《5·16通知》和林彪反政变的讲话与内蒙古的现实联系起来，代表中央向与会者指出：“内蒙古党委的错误相当严重，强调反大汉族主义，不强调反修、反民族分裂主义；强调民族问题，不强调阶级斗争为纲；强调学习《三五宣言》，不强调学习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对乌兰夫的批评。闹民族分裂主义就是闹独立王国，就是反共。政治上有错误，组织上必然有错误。我怀疑内蒙党委有一帮修正主义分子在那里操纵。有一些组织变了。在会议上要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揭露。”

会上，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做出决定：“停止浩帆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的职务。”

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于凌晨 3 时电报通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办公厅：“谁要销毁档案，一律开除党籍。”

第二天，6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决定：取消代理常委，对代常委讨论决定的问题重新审查。

6月10日，区党委常委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一、停止浩帆一切工作，实行隔离反省；二、要浩帆交出所有文件、工作笔记、资料等。片纸只字不准损失；三、立即拆掉浩帆家里的电话；四、收缴浩帆的所有大小枪枝。”

随着压力的加大，前门会议上的调门提高，乌兰夫的人马分化瓦解。有人公开反水，有人暗地倒戈。自治区党委代常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郭以青，揭发乌兰夫包庇他的地主老丈人、打击贫下中农的罪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明，揭发乌兰夫要权术、搞阴谋、推行宗派主义组织路线等问题；中共赤峰市委书记方炎军揭发乌兰夫包庇他的反革命岳姑夫；乌兰察布盟盟委书记赵军揭发乌兰夫采取两面手法印发“三五宣言”的阴谋；包头的杨鸿文揭发呼市规定以反不反“大汉族主义”为依据的干部排队标准。浩帆则交待了从5月20日到6月7日这17天中，乌兰夫、云丽文、陈炳宇3人给他来过20次电话。其中乌兰夫14次，云丽文5次，陈炳宇1次。

在批判乌兰夫的“民族分裂”问题时，他的“宗派主义”和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等也受到猛烈攻击。同时，有人提出：对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乌兰夫当年为何不按反动党团处理？这是文革中第一次将内蒙古“内人党”的问题提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乌兰夫满腹怨愤无处倾诉，与偷偷来看他的老友王铎、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人委副主席刘景平抱头痛哭。此情此景恰巧被内蒙古自治区书记处书记权星垣看到，即刻汇报上去，乌兰夫等人又多了一条罪状。

6月14日，乌兰夫忍气吞声地做了第一次检查，给自己扣了两项帽子，第一，有民族偏见。第二，有自卑感。

这种检查与会议的要求显然差之千里万里，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人们的更大愤怒。大家继续揭发指出：“乌兰夫把大汉族主义当成敌我矛盾，提出控诉大汉族主义，还把大汉族主义所谓揭深、搞臭、用心甚毒。与邻省划界寸土不让，用‘1935宣言’争地盘。”

乌兰夫在北京挨批被整的消息不胫而走，不几天就传遍了呼和浩特。这时，内蒙古军区正在呼市召集会议，军区各师和军分区的首长都到了。

那时，全国设有 13 个大军区，内蒙古军区也属于大军区之列。

昭乌达军分区副参谋长云成烈在呼和浩特开会期间，听说了乌兰夫在北京挨整的消息，不禁怒从心头起！云成烈也是土默特左旗人，是乌兰夫的远房侄子。他在呼市遇到几个土默特籍的蒙族干部，一同悄悄商议。他们猜测是华北局的李雪峰和内蒙古党委的高锦明等人联起手来整治乌兰夫。

李雪峰在三十年代担任过北平地下党的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又做过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和太行军区政委，算得上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高锦明的老上级。两年前，即 1964 年的夏天，李雪峰到内蒙古检查工作，在呼和浩特市做了三个半天的报告，狠批了内蒙古领导，说内蒙古不抓阶级斗争等等。

“李雪峰不是好东西，两年前，他从北京跑到呼市，开了 3 天会，大批乌兰夫的地方民族主义，不许他反对大汉族主义。说他破坏了‘四清’。但是乌兰夫并没有被他整下去。如今这‘枪崩货’又联合‘灰烂哥抛’（土默川老乡骂人的话）高锦明整治乌兰夫。不行，我们蒙古人得说话，土左旗得说话！”

经过一番秘密商议，自治区公安厅副厅长云世英等土左旗的同乡们决定：委托云成烈在回昭乌达军分区途经北京时找一下乌兰夫。

从呼和浩特到昭乌达盟军分区，每次往返都要从北京转车。而且，云成烈的妻子原就是北京人，所以他对于北京十分熟悉。6 月 16 日，云成烈到了北京，他找到另一位女同乡，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的老婆，请她设法转告在前门饭店的乌兰夫：“土默特旗人要顶住，让乌兰夫也要顶住。”“革命是有反复的，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革命！”

周仁山妻子闻听此言，如同晴天霹雳：这可是要谋反哪！她一刻也不敢耽搁，马上就去找人。但是，她并不是把云成烈的话捎给乌兰夫，而是直接去找了华北局副秘书长刘谦汇报。刘谦立即报告李雪峰，李雪峰上报中央！

前门饭店会议上，空气骤然紧张。

大青山是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呼和浩特北面的一座巨大山岭，紧靠京包铁路的呼包线北段，东西长四五百里，南北有四十至六十里，峰峦起伏，山势险峻。每至春夏之际，山区遍长青草，一派葱绿，大青山便因此而得名。抗日战争初期，1938年，中共中央曾派遣120师358旅政委李井泉和参谋长姚喆，率队来大青山开辟抗日根据地。大青山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蒙汉杂居，人烟稀少，又靠近呼和浩特、包头这两个边城要塞，也的确是一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林彪的“5·18”讲话人们还记忆犹新，果然，在内蒙古就应验了！人们似乎真地嗅到了火药的味道。

中央的指示很快就反馈回来，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马上指示华北局采取紧急措施。华北局立即召集内蒙党委开会，当然没有让乌兰夫参加。会上决定：权星垣“临危受命”，星夜赶回呼和浩特，掌握内蒙古局势。同时，决定内蒙古军区的领导们立即随权星垣返回内蒙古，稳住军队，并通知各“四清”点上的团以上干部，火速返回各自部队。决定中还有一条：乌兰夫的妹夫、军区副司令员孔飞不准回军区。

前门饭店会议上并未正式通报云成烈事件，但参会代表们却私下获得了消息，窃窃议论。

再说云成烈，事办完了，他转赴昭乌达。谁知，刚一下火车，就被拘押、隔离审查了。

内蒙古军区动作迅速，与此同时还隔离审查了其他几名土默特旗籍的军官，他们是骑兵第5师师长云一立、军区作战部部长李存义、独立第2师副师长李自勉。审查结果，没有发现他们和云成烈之间有什么串通谋反的活动。

说起来，云成烈也是从小参加革命的。他在延安读书上学，旋即参军入伍，当了一名小八路。在部队，他向来性格火爆、偏激。其实，云成烈在北京说的“上山打游击”，不过是在当时特殊环境和情绪下冲口而出的一句气话。他并没有做什么实际准备和部署，比如打游击必需的人员、武器、给养之类，都没有考虑过。他说完了气话，就自己回军分区了。可是，云成烈的这句话却引起了内蒙古地区的紧张。

6月17日，内蒙古自治区常委会结束，内蒙古党委在北京前门饭

店召开全体大会批乌兰夫。

6月19日,与会者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李雪峰第二次传达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对林彪“518讲话”的阐释和发挥,使与会者受到极大的启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就是防止政变的斗争,与乌兰夫的斗争也是如此。于是,内蒙古党委书记处书记王再天、内蒙古党委常务委员雷代夫等人认定“乌兰夫是政变头子”,杨鸿文更煞有介事地证明,“呼和浩特市已经实现了反革命政变。”呼市市委书记“李贵就是反党黑线的急先锋”。在大会发言中,乌兰夫几次插话、辩解,均遭到当场驳斥。

从6月22日到6月25日,大会发言共21名,书面发言29份。会议印发了中央民委参加土旗四清的代表揭发乌兰夫反大汉族主义的材料,权星垣揭发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副主席刘景平进行背后活动的材料,即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友王铎和刘景平在看望乌兰夫时抱头痛哭的事情,以及区党委常委吉雅泰在4月常委扩大会议上恶毒地攻击党的发言、区党委常委克力更向土左、土右旗部分四清工作人员就反大汉族主义做的报告等等。

6月27日,自治区党委书记处决定,撤销李贵的大会呼、包二市组副组长的职务,此职务由积极揭发乌兰夫的杨鸿文担任。李贵、陈炳宇、石光华、墨志清、奇峻山、李文精、云瑞等乌兰夫死党的错误也受到了“系统的揭发批判”。

第 85 回：做工作，刘、邓亲自出面谈 文革火，熊熊燃烧在青城

6月28日，陷入了“人民战争”大海中的乌兰夫第二次在大会上做检查。

大会开罢又开中会，6月29日，在有盟、市委书记参加的常委扩大会议上，人们对乌兰夫进行了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发言者众口一词：6月28日乌兰夫的检查是“假检查真进攻”，“在要害的问题上避而不谈”。与会者七嘴八舌又揭出了乌兰夫历史、作风等方面的问题。如：

同反党分子李维汉志同道合，提出社会主义民族的反动观点，反对党的平叛方针。

抗战前，乌兰夫在国民党的新三师，执行王明路线使党组织蒙受重大损失。

解放战争时期与习仲勋关系密切。

乌兰夫的儿子与习仲勋的干女儿结婚。1960年，乌兰夫请习仲勋到内蒙古过春节，光招待费就花了一万多元。

另外，与会者还要他交待同杨尚昆、习仲勋、张闻天、李维汉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关系。

乌兰夫实在满足不了这些揭批者的胃口，索性退到原来的出发点，只承认自己有民族偏见，有自卑感。其他如：修正主义呀，宗派主义呀，民族分裂呀，“一言堂”呀，索性统统都不提了。

大家的愤怒可想而知。经过一番严肃斗争，乌兰夫像一头执拗又无奈的老牛又被拴到了“修正主义”和“民族分裂”的木桩上。拴牢之后，更多的罪名加在他的头上：

1946年贪生怕死，和小老婆跑到内蒙古避难，从来就没有上前线。

1958年与邻省划界时寸土不让，暴露了领土野心。

推行斯拉夫文字是为统一内外蒙古，是为建立大蒙古帝国做准备。

1962年大量发给土旗“民族补助费”，人均20元。

大量印发乌兰夫领袖像，并和毛、马、恩、列、斯像挂在一起。编写《乌兰夫选集》、《乌兰夫言论集》、《乌兰夫领袖歌》。

像挤牙膏一样，第二天乌兰夫交待了他提拔自己的老婆云丽文及云世英等人的内幕，他的新班子也纷纷交待各自的“非法活动”。但是真正使乌兰夫在思想认识上产生飞跃，决心向讨伐者投降是在他受到刘少奇、邓小平的召见之后。

7月2日，刘少奇、邓小平代表中央找乌兰夫谈话。当时在座的还有区党委书记处书记奎璧、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兼国家民委副主任刘春等人。刘少奇和邓小平对乌兰夫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他们指斥乌兰夫不搞阶级斗争，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严重错误。

刘少奇说：“同志们这次揭发了你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很突然。是你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民族问题，中央历来是注意的。但不同于你所提出的民族问题。在内蒙你强调的是地方民族主义。中央强调的不是你所说的那个反大汉族主义，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问题，不外是地方民族主义、大民族主义。这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都要肃清。特别是要在干部、党员中肃清。解放以来，我们历来都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内蒙也是反大汉族主义。全国都反过地方民族主义。新疆、西藏、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搞过。差不多都是反过的。你们内蒙就没有搞过？

内蒙应该反地方民族主义，搞民族分裂那是不允许的。应该在几年内把地方民族主义作重点反一下。……在机关中、干部中不认真反地方民族主义，一定要犯错误。事实上现在已经犯了错误。搞地方民族主义，不可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你是不搞阶级斗争的，特别是不在蒙族中搞阶级斗争。”

邓小平说：“牧区阶级划分问题，内蒙落后于新疆、宁夏、青海、四川、还会落后于西藏。……不搞阶级斗争，生产是不巩固，经不起风浪，会退下来的。你们的纲落后了，什么纲？阶级斗争的纲。你不如赛福鼎同志，他还站起来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你现在走的路是包尔汗的路，刘格平的路，扎喜的路，达赖、班禅的路上去了。有这个危险。你

拼命强调地方民族主义，那里是前线，面对苏修、蒙修，不搞阶级斗争，你把内蒙引向什么方向？你不从这个地方深挖，是极其危险的。”

刘少奇：“在民族问题（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在阶级斗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乌兰夫同志犯了错误。过分强调民族主义，不能团结汉族，少数民族也团结不了。因为地方民族主义只能代表百分之五的人的利益。到底大汉族主义压迫了你们没有？内蒙现在不是被压迫的，在国内是平等的。用民族问题代表阶级斗争问题，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代表蒙古地主、牧主、资产阶级利益，不是代表蒙古工人、农民、贫苦牧民的利益。”

邓小平：“去年下半年以来，正是我们揭苏修揭得很厉害，泽登巴尔进一步反华时，你们不提反修了，把反修的旗帜降了下来。”

乌兰夫比刘少奇小8岁，比邓小平小两岁。同是老革命家，同是中央级领导，同是一代人，在刘少奇、邓小平面前，乌兰夫大气不敢出，唯唯诺诺，点头称是，带着满脑袋的疑问，吞下满肚子委屈，违心地做了检查：

“我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

“我从延安开始就接受了李维汉的思想。”

“我懂得了，这次回去，把地方民族主义思想好好整一下，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叛国案件。自从1953年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地方民族主义不由自主就冒出来了。”

“这次要好好挖深。”

“检查不深刻再检查。过去思想不清楚。”

乌兰夫决心听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话，洗心革面，争取中央宽大处理。他经过5天的准备，在7月7日至7月10日的区常委扩大会议上，做了更彻底的“交待”，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搞了宗派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打起了地方民族主义的旗帜，走上了与党中央、毛主席相反的道路，发展下去必然走到反党叛国的道路上去。他还承认他在人事安排上搞了阴谋，他的贤内助“好名、好势、好权、没改造好。”他建议，党委把他提拔上来的人，包括他的儿子、老婆全部撤掉。与以前和以后的任何一次检查交待一样，这第三次检查照例引起了“同志们的极大愤慨”。王再天要求与乌兰夫“短兵相接”。区党委代常委兼宣

传部长、内蒙古大学党委副书记郭以青勒令乌兰夫“缴械投降”。

像跳高运动员一样，乌兰夫每次都以为拼命一跳就能跳过批判者高举的标竿，然而每次他都无功而返，他痛苦地发现，批判者在他起跳前一齐踩上了高跷。

7月9日到11日，高锦明全面揭发、批判了乌兰夫的“路线错误”。

7月12日，乌兰夫做了第四次检查。这一回，他豁出去了，共检查了7个方面的错误：

- 1、错误的性质及其历史根源；
- 2、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 3、在阶级斗争方面的错误；
- 4、组织路线上的错误；
- 5、党内民主生活的问题；
- 6、改正错误的决心和办法；
- 7、我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造成的罪行。

此时，已经换了高锦明主持会议。

高锦明原名叫敖白枫，是辽宁省义县满族人。“9.18”事变后，他流亡到北平，参加了北平中共党的地下活动。从1946年起，他就一直在内蒙古地区工作。

人们对乌兰夫的上述检查仍旧极为不满，各小组一致认为他在抵赖、在顽抗、在继续要权术、安钉子，准备反扑。与会者的这种不合常理的极端反应其实是历次政治运动在中共党内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任何对被批判者的同情、宽大，都是对党的危害。任何对被批判者检查交待的认同，都意味着革命立场的丧失。在这一心理驱使下，人们对乌兰夫的检查“异常气愤”，又向他提出了10个匪夷所思的问题：

- 1、搞加盟共和国、独立国以及印发《三五宣言》的目的和具体活动。
- 2、反大汉族主义的真实目的何在？搞了哪些阴谋活动？
- 3、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权术。
- 4、同高岗、习仲勋、李维汉等反党集团的关系。
- 5、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华北局的具体活动。

6、1947 年至 1951 年间,为什么允许蒙修情报员留在内蒙古?

7、对以哈丰阿为首的“内人党”这个反动党派,为什么不按反党动派论处?对其骨干分子不做处理,居心何在?

8、为什么长期重用、颂扬旧官僚和民族上层人物?

9、积极推行斯拉夫文字,与蒙修成立“统一名词术语”的 43 人委员会,是何居心?

10、为什么对区内许多民族分裂案件和叛国案件不做处理?

听着这些连珠炮式的发问,乌兰夫瞠目结舌,更让他无言以对的是全区各地寄来的揭发信和高锦明对他的控告:乌兰夫想搞大蒙古帝国,想做当代的成吉思汗!

到了这种地步,乌兰夫已经十恶不赦,罪恶滔天,不齿于人类了。

7 月 15 日,在前门饭店的大会上,高锦明做了系统发言。他说:“我们现在没有把你当敌人看,你犯的是严重错误。你如果改正错误,我们仍然拥护你。如果你坚持错误,我们就坚决打倒你!”

7 月 18、19 日,解学恭总结:乌兰夫的错误是全面系统、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其性质是民族分裂主义、修正主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其错误的要害是歪曲、篡改、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成体系,积极推行民族分裂主义,妄图建立一个以乌兰夫为首的独立王国,在呼和浩特市已经实现了政变。以李贵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党政领导权。改组内蒙古党委办公厅,控制组织部,在人委五大委中安插亲信,搞地下书记处,大体上可以看出以呼市、土旗为点,向包头、伊盟伸手,已经实现了部分政变,现正在继续扩张。

翌日,各组讨论解学恭的讲话,一致拥护。

7 月 25 日,旷日持久的前门饭店会议终于结束了。

两天之后,7 月 27 日,李雪峰就把一份《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递给了中央。报告“根据揭发出的大量事实”,确认乌兰夫犯有五大错误: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另打旗帜,自立体系;

2、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革命;

3、对修正主义卑躬屈膝;

4、以《三五宣言》为纲领,进行民族分裂活动,搞独立王国;

5、安插亲信,篡夺领导权。

报告给乌兰夫下的结论是:三反分子、民族分裂分子、修正主义分子、内蒙古最大的走资派、埋在党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乌兰夫错误问题的报告》递上去后,内蒙古党委一直在等着中央批发华北局的报告,因为中央不发话,内蒙古“文革”的下一步就不好走了。

这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已经换成陶铸了。他刚从中南局调到北京,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长,走马上任才两个月。陶铸接到《报告》,对李雪峰说:报告需要修改。李雪峰不敢怠慢,连忙组织解学恭、高锦明等三人在北京饭店加紧修改。改过的报告对乌兰夫上纲更高,火药味更浓。改毕报送陶铸,从此石沉大海,被陶铸压下了。

当乌兰夫还在北京“前门会议”上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交待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也随着北大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发表,烧到了内蒙古的阴山南北。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蒙语中是“青色之城”,此时也和全国一样,很快就被红色风暴所席卷。6月3日,内蒙古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内蒙古师范学院校园,题目是:《评纪之5月18日的动员报告》。

纪之原任高教司副司长,1959年“反右倾”时被贬到这里任党委书记。

大字报出自外语系俄语专业教研室青年教师高树华之手,署名还有刘朴、刘真、楼基立共4人。大字报指责院党委书记纪之用四清“查物资、查财务、查浪费”的“三查”压制文化大革命,批评他仅仅把运动限制在写批判文章范围内。

一时间,师院的师生议论纷纷,赞成和反对的大字报迅即铺天盖地。当晚,中文系汉三班贴出《揭穿一个大阴谋》的大字报,矛头直指高树华等人的大字报。纪之和院政治部代主任张学尧急忙布置,把大字报抄下来,漫画要临摹、记下名字以备后用。但究竟该如何应对?他们一时也手足无措。

这张聂元梓式的大字报引起了内蒙古师范学院以至整个内蒙古首府的震动。大字报矛头明显地指向了院党委,这是非同小可的事,领

导慌了手脚,按照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看,这是典型的反党行为。但按照北京大学的情况看,这种大字报显然已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支持。自治区文委主任赵戈锐、文委副主任布赫、韩明、文委干部人事处处长孙培卿立即赶到师院与纪之他们开会商议,尚未撤职的内蒙党委办公厅代秘书长浩帆也来院视察。

转天,师院团委在大字报贴出的转日召开全院团总支书记会议,肯定了中文系保卫院党委的大字报是对的。当晚又召开了全体党员大会,以求稳定局面。当天,内蒙古党委在呼和浩特召开自治区高等院校领导干部和部分师生代表会议,紧跟北京形势,动员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

纪之是“老运动员”,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使他很快就在6月5日做了检查。多数学生被他的诚恳、谦逊所感动,报之以长达5分钟的热烈掌声。但这并不起任何作用。

6月6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按照《5·16通知》的精神,号召全区各族群众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

6月7日上午,高树华等4人又贴出题为《不能掩盖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评纪之6月5日的初步检查》的大字报。与此同时,以古东为首的4人工作组进驻内蒙古师院,公开与群众见面。师院师生热烈欢迎工作组进校。有毛泽东对聂元梓的赞扬在先,古东对高树华的大字报也只能肯定,但是,师生们很快发现,工作组在与他们见面前已与纪之、张学尧、肇那斯图等校领导先行接触,本来这也是正常的工作程序,但有人认为,这是工作组与院党委勾结的表现。外语系召开会议,韩桐同学义愤填膺,发动全班同学写了血书,表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将此血书当日递交内蒙党委和文委。

工作组组长古东束手无策,去找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王逸伦,王逸伦指示文委又增派陈觉生等19人来师院,前后共23人组成工作组,以古东为正组长,陈觉生为副组长。当天下午,全院师生在院内游行,要求撤纪之的职,罢纪之的官。

工作组做出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撤销纪之党委书记的职务。但在

此时,这种泛泛的肯定和决定已远远不能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几天之内,反工作组的情绪日渐高涨。

学生们情绪激昂。这时已无法上课了,为谁学、学什么还没弄明白,怎么上课呀?很有可能学的都是些反动、错误的东西,越学越反动。更何况,面临国家安危、政权掌握在谁手里这种头等大事,学习与生产都显得无足轻重了。大字报栏在校园里赫然亮出一道道风景线,它让人兴奋,让人热血沸腾,让人燃起愤怒的火焰与反抗的力量。它同时带来一种赌博的诱惑,看你押对了哪匹马,你就可以享受到胜者的欢欣。热心政治的人勇敢地上阵了,全国六亿人民都卷入了事关祸福甚至事关存亡的政治旋涡里,那些敢于亮出倾向总还是个坦诚,即使夹进某种目的也无可厚非。但仍有不少同学处在观望之中,不敢轻易下注。

第 86 回：外事口，工作组四处被轰 分歧大，康、陈顶撞刘少奇

中国政治是深不可测的一门学问，事情绝不像它的表象那么简单。正当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率先起事的时候，智者用大字报棒喝人们：不要忘了 1957 年反右前的大鸣大放，那是引蛇出洞，等蛇们都出洞了好一网打尽。这一警示确实让人一身冷汗，不得不想想坦诚的后果。

6 月 21 日，高树华等四人贴出大字报《一切革命的同志要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摧毁“浩家店”》。同日，郭是海同学贴出《抓住黑帮，穷追莫舍》的大字报，进一步揭露工作组与黑帮的关系。《吉东向何处去？》《陈觉生是何许人？》等大字报很快出现在师院校园。6 月 25 日高树华等 4 人又贴出《工作组执行的是“浩家店”的修正主义路线》，中文系教师董文等贴出《要求派新的工作组或改组现有的工作组》等大字报。万炮猛轰工作组，工作组几近瘫痪。

高树华等激进派胆敢反对工作组，自然激起了多数学生的反对，他们或出于对党的信赖，或出于对 1957 年“反右”的恐惧，或出于随大流的安全感，纷纷聚集到保卫工作组的旗帜下。少数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人少志坚，他们无路可退，只好拼死一搏。高树华也由此步入政治舞台。

其他院校的情况基本相同，在与党委、与工作组、与保守派的对抗中，一批造反组织脱颖而出。一批青年学生，如工学院的王金宝、农牧学院的那顺巴雅尔和师院的高树华一样，都先后登上了他们认为可以驾驭的战车，成为名重一时的领袖人物。

7 月 8 日中午，中文系学生李福生贴出《陈觉生给我院黑帮分子的“再战动员令”》。有人向工作组报告说“生”字中有文章，认为是反动标语，因而工作组把李福生扣留。下午，支持高树华的 200 名师生写了一条巨幅标语，“支持高树华等革命同志，识破迫害左派的阴谋家”

和“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往主楼上贴。还未贴完，便有数百人围在楼前，声称压了“七一”的红字标语，已构成“反革命事件”，对贴标语的同学刘鸿印、韩桐进行围攻、殴打。有人带头高喊：“打倒反动学生韩桐”、“打倒反动学生刘鸿印”的口号，当场还有人照了相。工作组长古东责令贴标语的师生们撕下标语，直到晚上 21 时。这就是内蒙师院的“78 事件”。

进入 7 月的北京乃至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市委到各大、中学校，甚至到工厂、单位都在为工作组的问题争得你死我活。7 月 1 日，周恩来刚刚从阿尔巴尼亚访问回来，7 月 2 日，陈伯达将一封反映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机关运动、揭发以张彦为首的工作组的来信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周恩来的办公室在最高峰时曾一天收到来自北大、清华、地质、北师大等大专院校的 20 多份措词激烈的报告，纷纷要求驱逐工作组。

7 月 4 日，周恩来约陈毅谈话，了解国务院外办和对外文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外交部党委也动员大家写大字报，起来揭发本单位的牛鬼蛇神，并保证“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辫子”，但同时又布置各级党组织和积极分子注意发现有“出圈”言论和大字报的，马上立案审查，有的立即打成“反革命”，有的准备“秋后算账”。很快，一批部、司、处级干部被定为牛鬼蛇神，组织大家揭发批判。这些人中有部党委成员、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副部长王炳南和陈家康等 30 多个人。他们也被关押或看管起来，随时接受批斗。像王炳南、陈家康等当权派或有现行问题的，则被集中关押在地下室，吃饭时排队进食堂，只能站着吃饭，不准坐。

外交部还派出工作组进驻几个部属单位，如北京外国语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等。

对外文委是外事口最早派去工作组的单位。这里，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量大，期刊杂志多，与文化联系紧密，几千号人。文革一起，群众就纷纷给党组书记李昌及宋一平等几个副主任贴出大字报，要求撤换他们。陈毅很快抽调张彦、孔筱担任对外文委工作组正副组长。在张彦、孔筱二位下去前，陈毅特地找他们谈话。

孔筱刚从“四清”工作队回来，她一进门，陈毅就问：“孔筱同志感冒好点没有？眼带倦意，气色欠佳。真有点对你不起，刚参加四清回来，应该让你休息几天，无奈任务紧，只得劳你立刻走马上任了！”

孔筱略显为难地说：“陈总，我身体没啥大问题。只是在乡下呆了整一年，刚回北京三天，文革是怎么回事，一点也不了解，就怕……”

“边干边了解吧！”陈毅接口说，“其实，我们都是仓促上阵嘛！”他略微耸耸肩，随即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开始对张彦、孔筱二位布置任务：

“对外文委摊子最大，几千号人，一日无人发号施令，就会影响外事交往，影响国家声誉。”

“你们这次去，第一要稳，要把情况搞清楚，不要轻易表态。李昌、宋一平都是老同志，又是候补中委，对他们不可轻率。都是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嘛，有缺点错误，可以批评帮助，‘洗洗澡’，自己‘下楼’。第二，群众的积极性不要挫伤，你们要在群众中冷静地多听，多观察，多动脑筋分析问题。文化革命是第一次搞，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新问题，要有思想准备。

这次由你们二位担任组长和第一副组长，你们既要大胆领导，又要谨慎行事。运动的情况及时给我通气，拿不准的问题，要及时请示。我相信你们能胜任这个领导工作！”

对外文委工作组在欢腾的锣鼓声中，被群众夹道迎进对外文委的大门。谁曾想，仅隔一天，因为在欢迎工作组的大会上，对外文委副主任李昌和宋一平上了主席台，一部分群众就刷出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理由是“死保当权派”。

第三天，对外文委又有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彻底批判陈毅六二年广州话剧、歌剧、儿童剧编剧座谈会上的讲话》，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工作组副组长孔筱再一次走进陈毅办公室，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交给陈毅陈老总。

陈毅戴上花镜，将大字报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坦然一笑，说：“写得不错嘛，就这样转报中央。”

“怎么？”孔筱很觉意外，“这种通篇污蔑谩骂的大字报还报送中央？”

“怕什么！”陈毅直率地说，“这算客气的嘞！你没看见外语学院贴

出的大字报，那才叫惊心动魄嘞！说什么外交部是个黑帮窝子，陈毅是个黑帮头子，是个大头子嘞！我原封不动地报到中央去，我怕什么？！我对那些娃娃们说：听说你们贴了不少的大字报，你们最好贴一张不要我当外交部长的大字报，这样，我就可以以此为据，向中央提出辞职了。搞外交工作太累人了嘛！”

孔筱和在场的其他同志都被陈毅乐观风趣的答话逗乐了。

“话是这么说，不过，群众提出意见嘛，还是应该给个回音的。”陈毅说着，自己摊开纸笔，刷刷刷写了一页半，递给孔筱说：“喏，这是我对文委同志的答复，请你转交一下。”

孔筱接过来一看，在“高价征求意见，欢迎同志们批评”的标题下，陈毅的真诚恳切地向大家征求意见。她被陈毅镇定的情绪、坦荡的胸襟深深打动了，进门时忐忑不安的心情一扫而光。当夜，她找了两张大红纸，将陈毅的公开信整整齐齐抄好，紧挨着批判陈毅的大字报贴了出去。

陈毅的表态使他在外交部的威信更增，但并没有丝毫减缓反对工作组的浪潮。不到一个星期，外交部系统派出的各工作组就先后遭到群众的轰赶，大字报上一片反对之声。如对外文委，工作组整了一批“牛鬼蛇神”，李昌是大的，还有些小的。工作组同意批判对外文委副主任、党组书记李昌，但张彦的夫人杨纯是对外文委副主任，就没有事。所以有人说张彦去对外文委是保杨纯，不准给杨纯贴大字报，不准查对外文委的“黑线”，群众要揭发领导，受到工作组打击。陈老总非常恼火，他召集群众大会，说张彦经过长期考验，是好干部，这是领导的看法，你们群众说他这样那样毛病，是群众的看法，这不对，要以领导的看法为准，不能轰走张彦，并说：“张彦是我派的。”

陈毅召集各个工作组的负责人交流情况，给他们鼓劲：

“工作组是中央决定派的，我是投的赞成票。你们一定要挺住，坚信党中央的领导。”

“路线斗争不是好玩的东西，不要乱猜，不要搞投机，不要今天猜这个下台，明天猜那个上台，不要做墙头草，哪边风大往哪边倒！在路线斗争中搞投机，是要犯大错误的！我再重复一遍，工作组是受党中央的领导，不要因为群众贴几张大字报，某个说句话，就跟着猜疑起来，动摇起来！与群众不要硬顶。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中央的

八条规定,一定要坚持贯彻落实!”

听说对外文委的群众要批判他们那里的工作组,陈毅闻讯后赶紧前去解围。当他来到批斗会场,看到一些人给工作组成员挂牌子、戴高帽子的过火行为,就禁不住登台仗义执言:“派工作组的错误是当时局面造成的。我是支持工作组的。……张彦有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但我们无权把他整死——要帮他改正错误!”

台下有人高声指责:“陈老总你包庇工作组!你又在和稀泥!”

陈毅立即针锋相对地回答说:“哦,你说对了!我硬是要和稀泥嘞!人民内部不和稀泥怎么行嘛!把少数派压下去,我不赞成!把多数派压下去,我也不赞成!把工作组整死,我更不赞成!”

他越说越生气,禁不住冲着台下近乎喊叫地说:“你们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你们不如把我打成反革命,打成黑帮。拿来高帽子,我马上就戴!”台下顿时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陈毅扬起手摆了几摆,掌声戛然而止。他停了停,随后降低调门,语重心长地说:“总之,要成为一个革命者,就要随时准备挨斗或斗人家。毛主席过去也挨过斗,大家斗他,他受了委屈不报复,不急于澄清。遵义会议前批斗毛主席,那时鬼都不上门,到遵义会议后,他照样团结大家一道工作,他没有这样宽阔的胸怀,就不可能胜利!”

全场鸦雀无声。

忽然有人喊道:“陈毅!我问你!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

陈毅毫不示弱,冲着台下丁是丁、卯是卯地说:“有人向我提了一个问题,问我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我可以当众回答:过去我是一向跟毛主席走的。我决定今后还继续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

会场上顿时出现了骚动与不安,有的瞪大了惊愕的眼睛,似乎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有的指名道姓地喊“打到陈毅!”

陈毅不为所动,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讲下去,讲得更缓慢更清楚,几乎使用了记录速度,说得极为恳切:“我陈毅,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不用费事,一抓一把。但是,我这个人有一个好处,就是情愿犯错误,不怕犯错误,非把问题讲透不可!你让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钝刀子割肉,讲那种长不像瓠瓜、短不像葫芦的话,只求明哲保身,

恐怕这辈子也不会了！”

中央文革小组集体到对外文委找人谈话，群众对工作组有很多意见，贴了不少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康生、陈伯达都去看大字报，支持反工作组的人。

7月5日，陶铸、张平化给毛泽东写信，汇报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信中提出：

- 一、彻底改组中宣部的领导。
- 二、今后中宣部最根本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宣传毛泽东思想。
- 三、计划在七、八两月，组织对处长以上重点对象的批判，把文化革命搞深搞透。同时，抓好九月召开的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和一些日常工作。

7月10日，毛泽东这封信上批示：“陶铸同志：同意你们的意见。请中央常委最后决定。”

7月11日，周恩来陪尼泊尔王子比兰德拉到武汉见毛泽东。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毛泽东让他再在武汉留一天。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和王任重去见毛泽东，毛泽东把7月8日写给江青的一封信给他们看了。林彪“518讲话”中央准备下发，请示毛泽东。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谈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并对当时的国内形势及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自己与共产党的未来做了展望。这封信是徐业夫誊写的抄件，有些字抄错了，毛泽东修改过来。

周恩来阅毕，向毛泽东建议：“此信可否给林彪看一下？”

毛泽东说：“可以。”

周恩来先到了上海，将这封信转交给在上海的江青。14日，周恩来从上海乘飞机到达旅大市，即现在的大连市，向林彪转达毛泽东7月8日信件中的意见。林彪听了吃了一惊，表示接受“主席的意见”，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

后来叶群对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

江青就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

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

理。江青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那就烧了吧。”

于是江青把叶群叫到钓鱼台，当着她的面，叫戚本禹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江青和叶群就站在窗前看着他们烧。

7月15日，周恩来在旅大市听取党政军负责人的汇报，就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指示。同日乘飞机回到北京。同刘少奇谈了到武汉和旅大的情况。

7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国人民大学7名学生给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这封信建议实行“崭新的文科大学学制”，信中列举了现行教育制度的“十大罪状”，建议现有学生一律提前毕业，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运动中去锻炼改造，长期地、无条件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今后要招收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和复员军人中的优秀分子入学，不一定非高中毕业不可。

7月13日，刘少奇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共青团中央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的汇报。在讨论中，刘少奇对中学进行文化革命的目的、要求和政策等作了指示：

(一)我们的教育，是从资产阶级教育沿袭下来的，所以，不能对所有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数代表人物，大多数人从中受到教育，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二)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起，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作为一条任务。

(三)清经济。政治清了，组织清了，思想也清了，趁这个机会把经济也清一下。

他还提出：第一段工作，初中在8、9月底搞完，争取10月上课，高中在9、10月搞完。

会上，为工作组事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几十年来一直对刘少奇笑脸相迎的康生、陈伯达，与刘少奇发生了顶撞，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情况。陈伯达批评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等认为工作组有错误可以批评、整顿，不同意撤工作组。

第 87 回：访广院，一切权力归学生 转弯难，北大重评“六一八”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从 6 月 24 日到 30 日，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有计划地组织召开了 3 次大规模的“辩论会”，实际上是对反对工作组的陈永康、何方方等学生的斗争会，每次都有几百人参加，仅第一次斗争会就开了 8 个小时。当时负责向中央汇报中学文化革命情况的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石琪，亲临现场，宣布何方方为“牛鬼蛇神”，“反革命分子”，“假左派，真右派”……

三次斗争会后，全校 1000 名师生中，被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的就有 150 名之多。高三（3）班还被打成了“右派班”，该班“只有一个左派，一个中间偏左，其余全是右派。”该班的范光义同学被邓小平的小儿子邓质方带着几个初一的小学弟围攻达一两个小时，吐了他一脸唾沫。

被斗的学生在学校遭到极端的歧视，一天到晚谁也不和他们说话，何方方蹲在教室里的一个角落里学毛选，一蹲就是半天，7 月底串连开始以后她去北大看大字报，竟被人告密说她是“反革命头子”，把她赶出了北大。

在这种情况下，何方方等人被迫检讨。7 月 11 日，刘少奇又下达指示

“不要相信，只要不捣乱就行，开大会检讨，可以吆！让大家知道吆！（后台）能问出来就好，问不出来，就算了，让他们保留。看调查情况怎样，不会不跟外校联系，后边定有人，她说用意好的，不可能……。”

“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不能几个人准备，大家没事，要提高警惕，何方方的检讨就是麻痹你们。反革命分子经常在红旗下进行更恶毒的活动，这次反下去了，下次可以起来，胜利了，不要骄傲，你大意了，他们就更精明了。”

刘少奇指示要追何方方后台，他把高三（3）班学生牛德龙当作何方方的后台了。他说：“危机已经过去了，那个问题基本上平静下来了，后台揪出来了吗？”

工作组组长勾德元汇报了总后勤部宣传部柳副部长和牛德龙情况，说正在追查中。

刘少奇问：“牛德龙是学生还是老师？”

答：“学生。”

刘少奇说：“跟何方方、陈永康是一起的，没出面就是后台，幕前幕后吗。他承认不承认是后台？他父母都是干什么的？陈永康、何方方承认不承认他是幕后？给他们出主意就是后台吆！你们没有斗他们这些人？没有打他们？他们现在还在学校？”

工作组勾德元汇报说：“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德龙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3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

刘少奇说：“绝食，让他母亲劝一下，学校里没办法，他在家里绝食有什么办法？告诉他不要到学校来了，来了也可以，要认识错误，青年人嘛，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他们都检讨，假的不要紧，下次再来吆，他们是高二的……”

工作组说：“已经高三了。”

刘少奇：“快毕业了，毕业了还留在你们学校里，反动的交给你们学校几个，反正开除他也不行，到外边去，他还是要捣乱，没人管，就这几个办法，没有地方去，还是留在学校……只要争取了多数群众，把他们孤立起来，就可以了。孤立起来，可以不做什么处理。他们闹也是好事吗！可以教育大家，看看有多少人受骗。”

7月14日，刘少奇的女儿根据她对刘少奇指示的领会，在日记中写到：

“老师不许秘密开会。同学也不许。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只许开一种秘密会，就是北京市委传达指示（只许党员的），工作队革命委员会的给群众排队，可以秘密，这是必要的，但也要少数组学生

参加,告诉他们保守秘密。”“可以让大家学毛选,社论,准备材料,不要让大家没事,没事就会闹事。”

这时的清华附中红卫兵仍然人数不多,没有明确的负责人,不具有完整的组织形态。北京其他各大、中学校虽然出现了很多战斗队之类的学生群众组织,但除了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四中、六中、八中、二十五中等学校成立了红卫兵,大部分中学基本还没有红卫兵组织。

而北京二十五中以李冬民为首的“东风战斗组”,因为写了一份《呼吁书》,说工作组不符合毛泽东提倡的“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工作组召开斗争大会批判“东风战斗组”,并将其强行解散。李冬民则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遭到连续20个小时的批斗。

矿院附中红卫兵的杨冀平,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的次子。他哥哥杨小平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刘春的儿子、矿院学生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因此,杨冀平和刘歌也很熟。受杨冀平的影响,刘歌于6月18日在矿院发起成立了大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矿院红卫兵”。不久,地质学院附中的红卫兵也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强行解散,大批红卫兵被戴上高帽子游街。随之,煤炭部工作组把矿院和矿院附中的红卫兵,都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刘歌、杨冀平不服,相约到煤炭部,求见部长张霖之,说明红卫兵的实际情况,得到张霖之部长的支持。在张霖之部长的干预下,矿院红卫兵不但被平了反,而且院党委还专门拨给了办公室和电话,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发展到100多人。

清华附中工作组为了转变红卫兵的观点采取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他们多次召开红卫兵骨干会,进行思想工作,他们还发动一些红卫兵家长来教育红卫兵。但都收效甚微。秉承团中央负责人关于恢复党团组织的要求,在工作组一手安排下,工作组成立了一个并未包括红卫兵全部负责人参加的分团委,但在红卫兵的坚决抵制下,未能发挥任何作用。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关系日趋紧张,但始终没有与工作组公开决裂,总是尽量取得工作组的支持;而工作组也一直力争通过诱导来解决红卫兵的问题。

这时,清华附中红卫兵内部又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发

起人之一的王铭，他的父亲、时任青海省委秘书长王仲方，因为在罗瑞卿任公安部长时曾任罗瑞卿的秘书、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此时正受到批判。而王铭的爷爷、老同盟会会员、教育部参事王肖山也因此在公安部宿舍被批斗。王铭闻讯，跑回家，即公安部宿舍，阻止揪斗他爷爷的批判会。胡克实要求刘晋借王铭的事情，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刘晋没有执行。在公开场合，红卫兵和工作组还是保持着比较正常的关系。虽然双方的争执，摩擦不断，却也没有立即反目为仇。

工作组为了分散红卫兵的力量，于7月17日把卜大华等大批红卫兵骨干分子调出北京，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清华附中的运动也一时冷清下来。

7月14日，陈毅、陈伯达、康生到对外文委讲话，宣布撤销以张彦为组长的工作组。这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报经毛泽东同意，国务院系统撤销的第一个工作组。陈毅在讲话中宣布了这一决定。

据后来戚本禹回忆，这期间，很多人向他反映学校打学生打得很厉害，于是他就拿着光明日报社的记者证到很多学校去看，然后将看到的情况用红机子电话向江青或毛泽东秘书徐业夫汇报，并通过中央文革小组编辑的《快报》将汇总上来的情况向中央汇报。有些材料则是专送毛泽东和刘少奇。后来学校不让校外人员进了，对他说：“你是党报记者，那还可以，《光明日报》不行。”于是戚本禹又换了《人民日报》的记者证才能进去。

7月5日下午15时，北京广播学院学生贾冀豫、杨逸鹏、高世英、肯定元、焦永刚、陈建文六人，在广播学院一号楼东头楼梯背面贴出大字报，题目是：“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一时在广院引起了轰动。围攻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甚至贴到了他们的床头。什么“反党”、“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从7月5日到7月15日，广院对“一切权利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提法，展开了大辩论。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65级学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典桃的女儿、学院筹委会主任、共产党员邓良宝与其他几个同学，对广播事业局派到广院当工作组长的一名副局长压制学生运动的做法十分不满，就联合朱武成、贺亚生等同学写了一封告状信，通过国务院信访室将信递了上去。7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接见了

丁莱夫和工作组长李哲夫、王殿举。

康生开门见山问：“广播学院是一派学生同另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还是工作组同一派学生之间的斗争？……现被围的是什么人？工作组站在哪一边？”

工作组答：“被围的人，多数是首先发动进攻党委的人，工作组站在多数派一边。”

康生生气地说：“过去左派，现被当成反党的！”

丁莱夫解释：“这个问题我表示过两次意见……”

陈伯达说：“这样一个办法好吗？一部分群众围攻一部分群众不好。这样如何搞大辩论。要走上轨道，脑子放灵些。不对的话可以收回。组织群众打击一部分群众是不正当的。这不是正常的！对外文委29个积极分子，被打成反革命。到处说是中央谈的，假盗中央名义。”

康生说：“你们回去立刻出一个大字报，说明你们工作组不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来的，给我们贴大字报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陈伯达重复说：“反对工作组就说是反对党中央，这是错误的。要保护少数。”

陈伯达还说：“共产党毛主席开始也是少数，正确的有时可能是少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是列宁提出来的。《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写进毛选的。”

康生问：“‘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谁说是反动的口号？”

丁莱夫答：“是张彦说的。”

康生说：“你们为什么对张彦那么感兴趣？他是犯了错误撤了职的。”

陈伯达说：“‘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不能说这是反革命口号。这是群众革命运动中创造出来的。文革小组权力，就是帮助群众嘛！党领导革命委员会，党组织要经过运动考验，要受群众监督，不能骑在人民头上。”

康生说：“你们要解围，不能再打击报复！丁莱夫，不罢你们的官，就要犯错误。过去你们给戴的高帽子都不算！所有过去戴的帽子都不算！不得再斗，不能受监视。如果有监视，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

击。工作组要表明态度，不要在群众中搞阴谋。你们有上方宝剑，所有被监视围攻的一律释放。要向全体同志宣布，不许监视，不许盯梢，如果这样就是犯法的。不要对这些人实行专政。不管是谁这样办，工作组要坚决反对！你们工作组在群众中有反感的，要公开撤掉。”

陈伯达说：“回去出安民告示，说工作组是广播局党委派来的。来此学习的，同群众在一起，坚决执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对工作组有意见，可以贴大字报。现在有苗头，有些工作组有意无意地领导学生斗学生，所谓排除干扰这是错误的。”

“广播学院与某些学院情况有相同的。运动开展得很猛。工作组对文化大革命没有准备。对中央方针政策了解很差，5月16日《通知》，有必要很好地学习。从四清立即到学校，不懂得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只有向毛主席著作学习。学习毛主席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

他接着说：“这次你们运动主人是谁？是广大群众还是工作组？这1400余人（指广院同学）有什么权力，他们欢迎你们去，很热烈地欢迎。工作组考虑没有，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可以罢免你们，让你们滚蛋！这个权力归他们，不归你们。人大常委委员长可以罢，你组长副组长就不可以罢吗？！”

“另外，学生斗学生，大、中学都发生。形式上是学生斗学生，实际是工作组同一部分学生结合起来，斗另一部分起来的学生。结果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放松了。不少地方如此，你们广播学院就是一个。”

北京大学自“618事件”后也变得冷冷清清，与6月初的火热情景大相径庭。7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5名同学，在大饭厅东墙北侧贴出了《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在运动中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提出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

陈必陶的大字报，如一枚重磅炸弹，立刻惊动了当时的北京市委。15日上午，北京市委领导吴德、郭影秋来到燕园，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等人大字报辩论情况汇报。工作组汇报完后，吴德说：“‘618’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是少数，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和左派的意见不敢提了。”

吴德还说：“主要原因是工作组控制比较紧了些，运动就死板了，（现在）正确处理陈必陶这张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起来的关键，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变成过去北大党委那样的性质。”

这天，在钓鱼台 8 号楼会议室，康生主持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书记处联席会议听汇报。首先由北京市新市委的秘书们汇报北大情况。陈伯达未等秘书说完，就站起来大发牢骚说：

“我是政治研究室的主任。政研室人少，人家看不起，没有人找我们。人微言轻，我讲话人家不听。我要到天津去。”

他要李雪峰代他向陶铸转达他去天津的要求。

李雪峰觉得陈伯达是话里有话，其实是在批评北京市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不把中央文革小组放在眼里。

没等陈伯达讲完，关锋就接过话头，系统、有论有据的述说北京市委及其派出的工作组不到中央文革谈情况等等。

接着，康生也发了一通脾气。他谈了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问题，并且很不满地说：他说话、文革小组的人说话不算数，没有人听，等等。

原来，自 6 月 20 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高树奎贴出孙友渔的大字报后，反工作组的同学就受到了打击和批斗。他们不服，多次到《红旗》杂志社上访，每次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一次，北师大物理系 64 级的学生赵惠中在物理楼被批斗后，一人逃出校门跑到《红旗》杂志社找林杰投诉，林杰也问得很详细。谈话结束时已是凌晨 2 时左右了，林杰问赵惠中：“现在已没公交车，你怎么回学校去？”

赵惠中说：“那就走回去。”

林杰说：“隔壁有个老大姐是个老革命，年龄这么大了，还在斗争，还在革命。我去问她一下，能否把你捎到学校去。”

在回校的路上，这位老大姐也向赵惠中详细询问了北师大的情况，当赵惠中说到他们到北京新市委上访遭到冷遇时，那位老大姐插话说：“你们找错地方了。”

赵惠中愣了一下，不知她说的什么意思。车到小西天离北师大还有一站路时，那位老大姐说：“为了安全，你就在这儿下车吧。”

这位老大姐其实就是康生的夫人曹轶欧。

7月12日,中央文革小组派曹轶欧到北师大调查“620事件”。7月13日,孙有渔被叫到钓鱼台,被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七嘴八舌的批了一通,然后让他回北师大向全校师生检查。孙有渔是从工交口调出,经文教口派到北师大的。他从来没听说过自己在北师大究竟有什么错误,因此,回到师大后,他拒绝检查。

7月15日晚上21时,从钓鱼台回到北京市委的吴德再次把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叫到北京市委谈话,传达北京市委对北大工作组的批评,让他回去召开全校积极分子会议,对北大“618事件”的定性问题进行检查,把北大的运动搞起来。

按照北京市委的布置,次日,北大工作组召开北京大学积极分子大会,张承先在3000人参加的大会上作动员和检查,但对“618事件”,他依旧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他说:“618”事件中,确实发现了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插手运动,破坏运动,当场抓住4个。尽管这样,还是极少数坏分子混水摸鱼搞“618”反革命事件……发现了破坏,反击是必要的。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要革命就应服从党的领导。

张承先的讲话于当天下午传到了北京市委。吴德听后甚是生气地说:“张承先如此冥顽不化是要栽跟头的。”

17日凌晨1时30分,吴德给张承先打电话,传达李雪峰的指示说:“对‘618’事件要重新估计。”同时,吴德又对张承先说:“你上午8点到市委来,我有话要跟你谈。”

上午8时,张承先准时来到北京市委。一见面,吴德就劈头盖脸地大加训斥,说:“你的立场哪里去了,你的党性哪里去了,竟然如此地顽固不化,如不改正,你是要栽大跟头的。”

此时,北京大学学校广播台已经全文播发了张承先在16日所作的检查录音,中午12时30分,张承先回到燕园即赶至北大广播台,又作了补充检查。

这天,下着瓢泼大雨,师生们冒雨来到大饭厅,听张承先做紧急报告。陈必陶大字报在北大引起极大混乱,对工作组持不同观点的群众,一直盼着工作组对陈必陶大字报明确表态。

“同志们,我今天的报告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运动推

向更高阶段，”张承先在报告中，首先总结了前段运动，然后布置了今后的工作，点名批判了陈必陶等5人大字报，他用了很长时间，对陈必陶大字报罗列的工作组“五大罪状”，一一地予以批驳，说陈必陶等人的大字报完全是别有用心，北大的运动只能在工作组的领导之下，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部署和要求进行，决不能让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去左右，从而走偏方向。

北大工作组接着发出《通知》，宣布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名单：由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处书记张承先任组长，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彭林、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杨以希、国科院文教办公室秘书长武振志、北京军区政治部郑希文、团中央候补书记张德华为副组长，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曹轶欧、中央监委研究室主任李芳林、海军后勤部副部长杨文漠、北京大学原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北京大学原党委常委崔雄、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蔡润田为组员。

但这个名单的宣布，不仅没有起到工作组预期的任何良好的作用，相反，却给他们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负面影响。18日凌晨，吴德再一次打电话给张承先，以命令的口吻说：“你们工作组要组织学习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要对照检查工作。”

上午，工作队领导小组即进行学习，并对照检查，然而，与此同时，北京市委书记处召开会议，就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问题进行讨论。会上，李雪峰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北大6月18日乱打人，被打的人都不是好人，有些人问题不大，但打人的有好人，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整个估计这个事情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18天轰轰烈烈，1个月来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同时指示张承先必须向北大师生承认：

- (1) 陈必陶等同学的大字报是革命的，是好的。
- (2) “六·一八”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
- (3) 工作组的估计是错误的，“六·一八”事件是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热情的表现。

第 88 回：游长江，壮志豪情贯苍穹 闻“收尾”，毛泽东颇为惊讶

7月18日下午，列席北京市委书记处会议的北大工作组武振声副组长向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传达了李雪峰的批评。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多数对重新评价“618事件”思想不通，张承先随即找到吴德提出不同意见说：“处理‘618’乱揪乱斗事件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并通报了全国，怎么能一下子又说成是革命事件呢？！”

吴德解释说：“你要转好弯子，‘618’以后，北大的运动冷冷清清，是跟对‘618’事件的处理有关系的。‘618’事件中好人还是多数吗。这样检查有利于争取主动。”

张承先最终还是接受了吴德的批评，他于晚上22时30分回到北大，立即按照吴德的布置，召开全校广播大会，代表领导小组做动员检查报告，历时30分钟。他说：

“‘618’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了混乱；但对我们对敌情估计过高了，对群众的革命热情估计不足，并采取了一些限制和束缚群众手脚的措施，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工作组决心进行整改，用3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领导的缺点错误。”

张承先沉重地说：“前两次检查都不很深刻，有几个根本问题没有从本质上认识、检查。”

但他还是固执地认为：“关于‘618’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混乱。”同时，他又客观地说：“但我们分析时，把敌人估计过高，对群众革命热情没有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样对整个‘618’事件的估计就发生了错误，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并采取了限制、束缚群众手脚的一些措施。这就影响了运动生动活泼的局面。”“使我校前十七八天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自18日以后，陷入了一个月的冷冷清清的局面。”

张承先在广播讲话中说陈必陶的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他当场宣布：“从现在起工作组实行‘618’事件后的整个运动就地整训，战前整训。用3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组的领导。”

张承先“醒”了，但为时已晚矣！

此时，已来到武汉的毛泽东，在黄鹤白云的故乡，又作一次惊人之举。

7月15日，毛泽东对张耀祠说：“你们去看看武汉大学，看他们现在干什么呢？”

张耀祠来到武汉大学，看到好多学生在扎木排，便问他们：“你们扎木排干什么用呀？”

一个学生说：“明天要横渡长江，这个木排用于插彩旗的。”

7月16日是武汉民众为亚非作家会议举行的横渡长江比赛。

回到东湖宾馆，他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没有讲什么。

7月16日早晨6时许，毛泽东说：“上午8点去游长江！”

张耀祠马上通知湖北省公安厅徐耘云副厅长和警卫部门分头进行各种准备工作，很快一切就绪。

上午8时42分，在王任重的陪同下，毛泽东穿着睡衣，乘坐卧车到了长江边，下得车来，他举目四望，当天是一个好天气。他迈步登上武汉警备区的一艘快艇。

9时整，横渡长江游泳比赛开始，毛泽东站在甲板上，高兴地向横渡长江的游泳健儿挥手致意。首先是武汉大学学生游泳方队，他们推着彩旗，迎风飘扬，向前游着，江水哗哗，伴着那时最时兴的革命歌曲。毛泽东站在船头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着他们，感到他们是祖国的希望，他的脸上充满了笑容。

突然有人看见了毛泽东，直喊：

“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果然是毛主席！”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十分高兴，一会儿走到快艇这一边，一会儿走到快艇那一边，向大家频频招手，并高呼：

“同志们好！”

“同志们万岁！”

当200多小学生组成的游泳队伍簇拥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语录牌向快艇游来的时候，毛泽东显得特别高兴，不断地向他们挥手致意。当小朋友们看到是毛主席时，激动地举手高呼：“毛主席万岁！”刚一举手，头就没进了长江的波涛里。过了一会儿，头刚伸出水面，又继续高呼“毛主席万岁！”

这时，长江两岸红旗飘扬，锣鼓喧天，汽笛长鸣，向毛泽东致意。顿时，整个江上欢呼起来。长江的潮水激动了，长江的两岸激动了，高音喇叭里的革命歌曲更加热情荡漾。口号声，欢呼声，汽笛声响彻云霄，整个江面一片欢腾！

在汉口等待毛泽东接见的三批外宾也感受到了来自长江的欢呼声。他们在外办廖承志、外交部韩念龙的陪同下也乘船观看了学生横渡长江。当外宾看见毛泽东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毛泽东转过头来也向外宾挥手致意。

看完学生渡江后，毛泽东乘船向长江上游驶去，渡船到达武汉大堤时，他说：“我最喜欢今天这样的游泳，走吧，我们都下去，都感受一下长江的浪涛。”

说着，身边的几名工作人员已跃入江中。毛泽东也兴奋地下水了，他仰着身体跷起双脚，双手交叉放在胸前，像躺在床上休息一样，动也不动地随着波浪一起一伏地飘着走，非常自由自在。有人以为毛泽东累了，哪知道他忽然一个侧身，冲破波浪，挥臂向前赶着，波浪叠起，把小伙子们撇在了后面。

游泳健儿们赶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说：“游泳是很好的休息，轻松自在，没有其他任何杂念，一切都顺其自然。”

他又说：“长江又宽又深，水流湍急，是游泳的好地方。”“横渡万里长江，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更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要到大江大海中去游，到大风大浪中接受锻炼。”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这句话很快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政治口号。

随行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摄下了这个历史性镜头，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轰动了整个中国和世界。



跟随毛泽东一起下水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几次请毛泽东上去休息,毛泽东问:“游了多长时间?”

周围的人回答:“45分钟。”

毛泽东说:“还不到一小时嘛。”说着,继续向东游去。

毛泽东在汹涌澎湃的长江里,舒适自若地畅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王任重再一次请毛泽东上船休息,毛泽东笑笑说:“你是这里的省委书记,我听你的命令。”

毛泽东上了汽艇,和王任重谈笑风生。

王任重说:“主席的身体真好,我真不敢相信,您能游程近30华里!游了1个多小时。”

毛泽东说:“我知道有人一直盼望我死,但我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去见马克思的。因为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所以马克思不要我的。”

王任重笑着说:“主席万寿无疆才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呢。我看,中国的右派分子成不了气候,当前形势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是一派大好的。”

“现在不说那样的话。”毛泽东摆了摆手,站起来,走出汽艇大舱,这时江里的游泳健儿和岸上的群众一下子认出了毛泽东,大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确信这位身材魁梧、满面笑容的人就是自己的领袖时,大江水面顿时欢腾起来:

“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和我们一起游泳来了!”

毛泽东频频招手,向身旁那些欢欣雀跃、争相竞看的健儿们高呼:“人民万岁!”

现场那种人民无限崇敬领袖的场面,就是再大手笔的作家也是难以形容的。这里既有群众意识的作用,也有领袖威望的力量,还包含着人们渴望一睹领袖风采的那种心理和欲望。汽艇在警卫人员的催促下,很快地开走了。

毛泽东对王任重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我们顶了它一下,也没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终于放弃了自己归田园兮的最后梦想。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正以这次畅游在检验着自己,检验自己已然老迈的身躯之中,还有多少仅存的生命。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然“上了梁山”。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已经破釜沉舟。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最终做出了自己的抉择。

在他步入长江,开始自己一生之中最后一次的长江畅游之前,面对长江两岸千千万万的民众,他高呼:“人民万岁!”

他将把他仅存的一切、死后身名,以及,73岁的自己最后仅余的生命,全部的、彻彻底底绝无反顾的奉献给他的人民。

武汉全城的老百姓倾城出动,在长江两岸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在长江中畅游的伟人形象。尽管离得太远,根本看不清楚,但是人们仍然非常兴奋。

当时的《人民日报》报导了这次畅游长江活动:

“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沿江两岸大堤上,无数彩旗,巨幅的标语,欢呼的人群,呈现出一片无比欢腾的节日景象。

“武汉全城男女老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样健康,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人民的最大幸福!’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从船舷的扶梯上走下来,先在水里浸了一下,然后便伸开双臂畅游起来……在浩瀚的江面上,他时而挥臂侧泳。拨开层层波涛,破浪前进;时而仰卧水面,看万里碧空。”

回到下榻的东湖宾馆,王任重看到毛泽东还无倦意,就坐在他的对面想说什么,没等他开口,毛泽东就问:“你对形势怎么看?能否具体谈一谈啊?”

“主席7月8日致江青同志的信我看后,产生了这种感觉。主席说:‘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主席的这个估价是对的,但我总觉得中国不是这样,也不会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王任重说，“不过，我还是同意主席的断言和预见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90%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主席的这些活，写得非常精彩！”

毛泽东听着，暗暗为王任重的记忆力吃惊。自己的这封信写好后，正赶上周恩来到武汉汇报工作，便把信让他和王任重看了一遍。没想到这位秀才书记过目不忘，记得如此熟悉，几乎连字句都没什么错误。

“听说武汉也派了不少工作组。你把它撤出来吧。”毛泽东说，“让学生娃娃们闹腾一阵子嘛，不要怕乱。乱一阵子有好处。”

“乱不得呀，主席。”王任重说。

“噢？”毛泽东不动声色地问：“那你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个搞法呀？”

“根据中南各省报上来的情况看，我们这里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可以收尾了。”

“收尾？”毛泽东一怔，“你们都取得些什么样的胜利啊？”

“目前，各地已经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面人物，例如广东省作协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柯麟、副书记兼副院长刘志明，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副校长何定华、前党委书记朱劭天、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程云、文联副主席武克仁，湖南省文联副主席康濯，河南省郑州大学副校长、省社联主席郭晓棠，广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陆地，等等。随着运动的深入，可能还会有一些黑帮黑线人物落网。”

“我看有些人不一定是黑帮，将来要平反。”毛泽东说。“你是主张派工作组的吧？”毛泽东突然问道。

王任重并不知晓毛泽东的用意，他很诚恳地点点头说：“是啊，没有工作组不行。事实证明我们党搞群众斗争，离开工作组就会出偏差，这是成功的经验。当然，文化大革命来势凶猛。工作组出些偏差是难免的。正如少奇同志讲的：运动的主流是健康的，前进途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曲折和错误，但这毕竟是支流。”

毛泽东笑了笑：“你倒是很会用辩证法来看问题哪。看来你这个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还没有深入到学生中去多了解些情况，可以多和伯达、康生同志交换一下思想，然后再表态好不好呵？”

第89回：历史所，少数派意外平反 回北京，刘少奇求见未成

7月17日，陈伯达和戚本禹等人再次来到广播学院了解情况。陈伯达在座谈会上讲了话，赞扬了广院学生的革命精神，提出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下午，戚本禹和关锋等人又来到社会科学院的历史所。

6月4日，学部在吉祥剧院组织了一次关于杨述“青春漫语”的批判会。会议发言不久，忽然哲学所部分青年学者打破惯例，冲上主席台抢夺话筒，强行发言，当场指责坐在主席台上的党组书记关山复、刘导生等人搞假批判、真包庇的把戏，一时间会场乱成一锅粥，争吵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有人高喊冲击会场者：“滚下台！”有人则支持冲击会场强行发言者。最后，主持者只好宣布暂时休会。

第二天，在学部大院贴出第一批大字报，一部分人反击冲击会场者，维护党组领导；另一部分人则揭批党组，揭批“保皇派”。以哲学所和《新建设》杂志为首的一批年轻人最为激烈。而学部机关一些党员则写大字报予以反击。其他大部分人持观望态度。

6月中旬，吴传启、林聿时推出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掌握学部文革的领导权。

潘梓年是潘汉年的哥哥，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9月，在上海北新书局主编《北新》、《洪流》等进步刊物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真话报》。1930年任社会科学家联盟的负责人，后调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曾主持丁玲、田汉等人的入党仪式。1937年12月，根据中共的指示以社长的身份赴南京筹办《新华日报》的出版，抗战时期任《新华日报》社社长，被誉为中共第一报人。潘梓年还是很有名气的哲学家，是最早将形式逻辑引进中国的学者之一，他弟弟潘菽是中国现代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1954年调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任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在学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圈子里,人们都尊他为“潘老”。

6月26日,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陶铸,向学部派出了以国务院文办主任张际春为首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进驻学部后,即与吴传启、林聿时、潘梓年相结合,共同领导学部的运动。

6月下旬,在学部召开的一次全体工作人员参加的批斗会上,张友渔夫妇双双被推到台上批斗。在群众质问他们的时候,张友渔夫人韩幽桐,一个“一二·九”运动时参加过卧轨栏截火车的蜚声学林的女战士,新中国成立初任宁夏高级法院院长,“文革”爆发时任法学所副所长,跳着脚愤怒据理反驳,毫不示弱,犹如一只好斗的公鸡。而张友渔则态度恭顺,从容应对。他还拍着怒不可遏的夫人肩头连声劝说:“正确对待群众”。

随着社会上革命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报刊电台都是鼓励群众起来革命的文章。历史所当初给尹达贴大字报而受到批判的几个年轻人越来越不服气。7月16日深夜,傅崇兰、孟祥才、周绍泉、黄秉枢、栾成显、彭邦炯等6人在学部办公大楼门厅最显著的位置贴出大字报,批判历史所发生的斗争他们的事件,认为这是镇压革命派。大字报在学部大院引起轰动,这几个人的大字报立马又引来对他们更残酷的批斗,硬逼他们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年轻人终于还是屈服了。傅崇兰又在学部大楼贴出大字报,检讨自己的错误。

检讨的大字报刚刚贴出,第二天,即7月17日下午16时左右,历史所的秘书瞿清福突然找到孟祥才,说有要事。他们一起赶到学部大楼的潘梓年办公室。进门一看,孟祥才吓了一跳,只见里面坐着张际春、关锋、戚本禹、曹铁欧和毛泽东的女儿李讷。

孟祥才脑子一大:“坏事了!肯定是有人将我的情况反映到戚本禹那里,他今天来肯定是批评我的。”

他僵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戚本禹大声说:“孟祥才这边坐,有人说我是他的后台!”他拍着靠近他的沙发,招呼孟祥才去坐。

孟祥才见戚本禹对他的态度不错,心里稍稍宽慰了一点,就走过去,坐在了他的旁边。戚本禹小声问孟祥才:“受苦了?检讨了吗?”

孟祥才说:“检讨了。”

戚本禹说：“检讨收回。你们革命是对的，重新起来跟他们斗！”

这时，关锋与张际春商量了一下说：“据我们了解，这几天历史所发生了严重的镇压少数派的事件。今天我们将按陈伯达和康生的指示，到历史所为少数派平反。请张老为首的工作组协助做好工作。”

张际春随即检讨说：“我对历史所的运动关心不够，认为尹达是中央文革成员，他领导的单位不会有大问题，结果是少数派受了镇压。工作组要转过来，一起做好善后工作。”

这时已到晚上 19 时左右，关锋宣布晚上在历史所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要历史所有关人员负责通知，说完他们就到食堂吃饭去了。

约 20 时左右，在历史所小礼堂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关锋、戚本禹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小组人员、张际春为首的学部工作组都坐在主席台上。关锋当场宣读了陈伯达的三点指示：

- 一、郦家驹立即停职反省；
- 二、立即释放一切被关被斗的群众；
- 三、切断尹达与历史所的一切联系。

关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为历史所的少数派平反，要求大家一起揭露历史所学术秘书室负责人郦家驹等人镇压群众的罪行。他说郦家驹是个坏人，解放初曾因倒卖黄金被处罚。从此，尹达，这位早在 1931 年便已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发掘的历史学家，1938 年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曾多次受到毛泽东表扬的左派，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就使他靠边了。

7 月 17 日这天，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三批外宾。接见完后，他即乘专列离开武汉，经郑州于午夜到达邯郸。

7 月 18 日凌晨 2 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邯郸，上午回到了离开有半年之久的北京。当他走进丰泽园，发现园内的房子已经修葺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这样未经他同意的修缮，毛泽东认为实在是耗费国家钱财。为了表示他的不满，他很快就搬了出去，住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游泳池旁的房子里了。后来，人们把这里统称为“游泳池”。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

房兼客厅。后来在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镜头，就是这间大厅。他在那里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后十年。

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立即接见了康生、陈伯达，听取陈伯达等人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

刘少奇18日白天在怀仁堂主持会议，讨论教育革命等问题。听说毛泽东主席回北京了，晚上，他驱车赶往毛泽东住处，打算汇报前一段的工作，只见毛泽东住所门前停着几辆小轿车，屋内灯火通明，显然，毛泽东家里有客人。门卫进去通报之后出来了，告诉刘少奇：“毛主席刚刚回到北京，很疲劳，现在已经休息了，不便打扰。”

刘少奇吃了闭门羹，怏怏返家。

第二天，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他便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来又盖起来，这种情况不能允许。这是方向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条条打个稀巴烂，给群众定框框不行。北京大学看到学生起来，定框框，美其名曰‘纳入正轨’，其实是纳入邪轨。”

19日至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

陈伯达在19目的会上率先提出撤销工作组。他说：“工作组起了坏作用，应当撤离。应当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让他们自觉起来革命。”

陈伯达还书面对工作组的问题提出两条意见，认为工作组起了“坏作用”。他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

陈伯达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康生、陈毅、陶铸的支持，但仍然遭到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邓小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

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支持多数人的意见，他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学生中间认识不一致，行动不一致，可以再辩论。”

刘少奇在会上还说，大学里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是从当时怎样实现党的领导方面考虑的，派工作组比较机动。个别工作组的领导有缺点、出了毛病，但多数基本上是好的，现在还是帮助教育的问题。刘少奇汇集了在京的中央负责人对工作组的看法，并做出“工作组有三种类型”的结论。他认为，工作组一种是实行“三同”，同左派一起斗牛鬼蛇神；另一种是当官做老爷，脱离群众；第三种是更加脱离群众。然而，这么大的运动，来势又如此猛烈，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去实现，这个形式就是工作组，有了工作组就比较主动。大部分工作组还是好的，因此对工作组不能采取消极撤换的办法。

与会者还就如何开展大辩论、辩论中如何领导、斗争的范围、如何明确斗争目标以及大学生能否串联等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最后，刘少奇宣布：“主席已回到北京，这里的汇报会停止，今后直接到主席那里汇报。”

当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出席。毛泽东听取汇报。

7月19日这天，北京地质学院工作组原定晚上开大会斗争13名反对工作组的干部和教师，这些人都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并准备当场抓走两人。但是当天晚上，没有开会，平静地度过了。

这天，清华大学工作组原准备批斗蒯大富的大会也紧急刹车，改为批判黑帮大会。

头天晚上，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对北大“618事件”的处理做了检查，这种引火烧身的行动，在全校引起很大反响。北大的师生全都让张承先搞糊涂了，尤其是对陈必陶那张大字报，他17日还定性为“别有用心”，18日晚竟然又说它是“革命大字报”，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陈必陶大字报的人，听了都大骂张承先简直在开玩笑。19日这天，北大掀起了批判张承先工作组的高潮。继陈必陶等五人大字报后，历

史系学生、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贴出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应当做保姆。”历史系王复兴和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等人在38楼北墙贴出支持胡德平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但也有许多学生表示支持工作组，说工作组是革命的，是在革命中出现的缺点错误。全校运动再次活跃了起来，连教授冯友兰都出来贴了大字报。

晚上，一些哲学系的学生征询聂元梓的看法，聂元梓称“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晚23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聂元梓的话再一次在北京大学引起震动，为工作组问题，大饭厅里通宵辩论。

已吃过安眠药睡下的张承先突然被叫醒，他得知了聂元梓讲话的内容，立即召开领导小组紧急会议。大家对聂元梓的做法非常气愤，说聂元梓曾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工作组所有工作情况她是清楚的，处理“618”事件时她也是表示同意了的，为什么又跳出来反对工作组。杨克明气愤的说：“聂元梓本身有很多问题，需要向领导反映，让领导了解聂元梓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人是不能依靠的”。

关于聂元梓曾任工作组办公室主任一事，是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于进校后的6月10日研究确定的：由工作组副组长、团中央候补书记张德华负责办公室、资料、简报工作。办公室主任聂元梓，副主任杨克明。但是聂元梓没有接到参加工作组工作的通知，她一直都在哲学系自己的办公室里工作。到了6月29日，北京大学工作组确定的工作组负责人的名单已经是：

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主任：李芳林，副主任：任小风、刘寄久、张恩慈。

大家认为，聂元梓的行为太无组织纪律性了，领导小组决定将这个新情况迅速向市委汇报，看看市委的态度。

7月19日晚召集的工作组领导小组紧急会议结束时已是20日凌晨，张承先赶到北京市委向李雪峰汇报此事。李雪峰听了汇报后却说：“你们不能把聂元梓的讲话简单看成是违犯组织纪律问题，要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要考虑工作组本身工作上有什么问题。工作组听取聂元梓的意见，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争取主动。”

邓小平也很快知道了这一情况，他急忙让妻子卓琳给在北京大学

上学的女儿邓楠打电话，指示她：“多给工作组提建设性意见，不要提破坏性意见。”

20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习的李雪峰校女儿李丹林和同班同学王海治等贴出大字报，提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接着，邓小平的女儿邓楠、贺龙的女儿贺小明、冶金部副部长吕东的女儿吕宏等6个干部子弟也在大饭厅东墙贴出《爱护工作组，保护工作组》的大字报，基本态度是保护工作组就是保护党的领导，不少人响应。很快，在这张大字报下边，又贴出历史系学生罗志刚、王复兴、徐森、张文虎、王渊涛、俞政、杨桂香、钱凤娟、虞赛莲、郑维生、李延龄等人联名大字报，针锋相对，批判工作组。许多人围观、议论这两份一上一下、对立的大字报。

21日，校园内的大字报，大多是要求聂元梓澄清事实、回答问题的。还有不少学生找到工作组反映对聂元梓的意见。

已经从李雪峰、吴德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的张承先劝告这些同学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经毛主席肯定的，你们贴她的大字报，就把阵营搞乱了，决不能这样搞，希望大家还是帮助工作组进行整改。”

7月20日，清华大学蒯大富他们班的团支书到关押蒯大富的一号楼四楼对他说：“唉，蒯大富，你回班上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要在这里了。”

蒯大富说：“不关我了？”

“没人要关你。”团支书说。

蒯大富出来后，不相信工作组真的会放他，故意绕清华园的围墙走，四面围墙他走了半圈，走到西北围墙时，看后面确实没人跟踪，这才放心了。

7月20日这天，中共中央下发文件：

(1)《关于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的通知》，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副主任康生、陈伯达、陶铸。

(2)中宣部已改组，陶铸任部长，陈伯达任顾问(仍是副部长名义)。

第90回：是危言？要准备杀头坐牢 责任大，少奇雨夜莅清华

7月20日，听了各方汇报后的毛泽东与中央领导人谈话，他说：

“5月25日聂元梓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巴黎公社宣言书，意义超过巴黎公社。这种大字报我们写不出来的。”

“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共产党怕学生运动是反马克思主义。有人天天说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实际却是走资产阶级路线，为资产阶级服务。”

“团中央应该站在学生运动这边，可是他们站在镇压学生运动那边。”

“谁反对文化大革命？美帝、苏修、日修，反动派。”

“借口‘内外有别’是怕革命。大字报贴出去又盖起来，这样的情况不允许，这是方向性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得稀巴烂！”

“我们相信群众，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现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能不能，敢不敢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一关是最后消灭阶级，缩短三大差别。”

“反对，特别是资产阶级‘权威’思想，这就是破。如果没有这个破，社会主义的立，就立不起来；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

“靠你们引火烧身，煽风点火，敢不敢？因为是烧到自己头上。同志们这样回答：准备好，不行就自己罢自己的官。生为共产党员，死为共产党员。坐沙发、吹风扇的生活不行。”

“有的学校给学生戴反革命帽子。（外办的张彦跑到外面给人扣了二十几个反革命帽子。）这样就把群众放到对立面去了。不怕坏人，究竟坏人有多少？广大的学生大多数是好人。”

当有人问“乱的时候，打乱档案怎么办？”时，毛泽东说：“怕什么？

坏人来证明是坏人，好人你怕什么？要将‘怕’字换成一个‘敢’字。要最后证明社会主义关是不是过。”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7月20日，江青从上海回到北京。她也没有住丰泽园，而是直接住进钓鱼台。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就在北京西郊的钓鱼台国宾馆15号楼办公。开始没设办公室，只是从中央联络部调来矫玉山一人做秘书，忙得几乎24小时马不停蹄。6月末，又从马列研究院调来王广宇做秘书，仍然忙得不可开交。其后陆续又调进来一些人，开始形成办公室。

随着调来的工作人员逐渐多起来，15号楼住不下，7月初将办公室搬往11号楼，由康生主持在11号楼开会，正式成立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决定由穆欣、戚本禹、曹轶欧负责，穆欣为召集人。下设文电组，由穆欣兼管；简报组，由戚本禹兼管；调查组，由曹轶欧负责。第一任办公室主任是穆欣，副主任为戚本禹和曹轶欧。

江青回到北京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建立文革小组的办公机构和制度，筹办文革小组刊物《快报》。她将中央文革办公室又从11号楼搬到16号楼，会议室也设在钓鱼台16楼，陈伯达、江青、康生和其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在16楼议事、开会。这次指派王力任办公室主任，戚本禹、曹轶欧、穆欣为副主任。江青要王力和肖华、刘志坚商量，从部队调100个团以上政工干部到中央文革办《快报》，向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反映文化大革命的动态。《快报》暂时在《解放军报》印刷。这100人公开名义是《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记者，实际是作为文革小组的联络员、巡视员，到各地、各部门了解情况。文革小组人少，不准配专车，需要人临时调。

接着，江青又建立了文革小组碰头会制度，规定每天下午15时碰头，小组全体成员参加，另外需要谁就通知谁，稍微重要的事就通知周恩来和陶铸。后来几乎每次都通知他们二位。

在江青的一手操办下，中央文革小组有了办事机构的雏形。尽管陈伯达一直感叹人们不了解他的行政管理能力，不给他实际权力，但是，在江青回到北京之前，文革小组在他这个组长的领导下，也确实没有看到太大的作为。

接着，江青在一次文革小组会议上对大家说：“这次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同志们就要做好杀头、坐牢和开除党籍的准备。愿意革命的请跟我们走，不愿意革命的现在离开中央文革小组还不晚。”

当时关锋、王力都说江青是在开玩笑，康生对他们说：“不，绝对不是开玩笑，完全有这种可能。我们的毛主席曾经准备好了被赫鲁晓夫那样的人赶下台的准备，他和林彪等同志谈话的时候，几次掉泪。同志们，是哭了啊。这场文化大革命可是史无前例的，要触动许许多多的人的既得利益，这些人不抵触那倒是千奇百怪的了。所以，斗争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很可能要流血，要发展到武装斗争。”

他甚至说：“脑袋掉了不过是碗大的一块疤，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用我康生的血能换来群众斗争的胜利的话，我情愿马上去死。”

陈伯达把这话反映到毛泽东耳朵里后，毛泽东问他：

“你这个老夫子怕不怕呀？康生讲的这些是可能的。我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习惯了。党内走资派要造反，我就上山和他们打游击去。这场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就是第二次革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你没有这个思想准备是不行的。说是文化革命，也就是政治斗争。”

7月末，王任重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住进了钓鱼台2楼，刘志坚也住进2号楼。当时王任重身兼中南局第一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加上不久前陪毛泽东畅游长江，名声显赫。他在中央文革的四位副组长中，排名仅次于江青。来北京时，王任重将自己的一套工作班子从武汉带来，在钓鱼台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所以，他的一切事情都可以由自己的办公室办理，平时一切活动都在2楼，无需往16楼跑，只是在开中央文革小组会时才到16楼去。

毛泽东让王任重过问北京的大中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因此，在钓鱼台2楼的王任重工作非常繁忙。清华大学是王任重关注的重点，他派了两批联络员进驻清华大学指导运动，后来，他用“北京新市委大学工委”联络员的名义，把他从湖北带来的秘书等派驻清华，又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12名干部共同组成清华大学和清华附中的联络员，这些联络员由他直接掌控。

7月21日，中央文革小组派王力、关锋到清华大学调查了解情况，

他们来到蒯大富的宿舍找到他，王力自我介绍说：“我们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他叫关锋，我叫王力，请你讲讲你对工作组有什么意见？”

此时的蒯大富还没有听说过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机构，也不知道关锋、王力是谁，有些茫然地看着他们，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王力很健谈，他滔滔不绝地对小伙子介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趋势，越说越兴奋，甚至透露了伟大领袖在 18 日返回北京后对中央文革的表态内容。他的嗓门也越来越大，召来同学在门口偷看。关锋不时轻拍伙伴的肩膀提醒他。

蒯大富还是不大信得过他们。他简单地讲了一下情况后说：“对工作组的意见，我写一个材料给你们。”

中央文革小组派人探望蒯大富的消息闪电般传遍了清华园。左派激进学生欢欣雀跃，他们都预感到：一场新的暴风雨就要降临了！

王光美听到后说：“就这么谈一两次活，也不到群众中做更多的调查研究工作，就能认为他是革命的？”不久，王光美专门找蒯大富班上的其他同学座谈，说蒯大富是错误的，应当批判，继续“反蒯”。

后来，中央文革小组找王光美谈话，王光美坚持“反蒯”斗争是对的。接连几天，她亲自组织人整理关于蒯大富的材料，又写大事记，又写报告，而且亲自修改。报告有了一个初稿，她马上送给刘少奇看，希望能够证明“反蒯斗争”是正确的，“反干扰”是必要的。

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

这天，毛泽东继续关于工作组的谈话：

“开两天会，讲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工作，主要讲工作组要撤，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前几天讲工作组不行，前市委烂了，中宣部烂了，文化部烂了，高教部也烂了，《人民日报》也不好。‘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革命就得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你去，不了解情况，两个月也不了解，半年也不了解，一年也不行。如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能看？能批判？只有他们能了解情况。我去也不行，只有依靠革命师生。现在总是怕字当头，总是怕乱。现在停课又管饭吃，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事干什么？只有依靠他们搞。照目前办法搞下去，两个月冷冷清清，搞到何年何月？昨天说，你们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呢？一起阻

碍作用，二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我也不行。现在无非是搞革命，一是斗坏人，二是革思想。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权威，陆平有多大斗头？李达有多大斗头？翦伯赞出那么多书，你能斗了他？群众写对联讲他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搞他你们行？我不行，各省也不行。什么教学改革，我也不懂，只有依靠群众，然后集中起来。

工作组改成联络员或是叫顾问，你们讲顾问权大，那还叫联络员。工作组一个多月，起阻碍革命的作用，实际上是帮了反革命。有的工作组是坐山观虎斗，看着学生斗学生。西安交大限制人家打电话、打电报，限制人家上北京。要在文件上写上，可打电话，可打电报，可派人到中央。党章早就有了嘛！南京《新华日报》被包围，我看可以包围，三天不出报，有什么了不起？你不革命就牵引到你头上来。为什么不准包围省市委、报馆、国务院？好人来了，你们不见，你们不出去，我去见。你们又派小干部，自己不出去，我出去。总之，是怕字当头，怕革命，怕动刀动枪，都不下去，不到有乱的地方看看。李雪峰、吴德你们不去看，天天忙具体事务，没有感性知识，如何指导？南京大学三次大辩论，我看不错。所有到会的人都要到出乱子的地方去。有人怕讲话，叫讲话就讲几句：我们是来学习的，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召之即来，随叫随到，以后再来。

你叫革命的师生一点毛病没有？搞一、二个月一点感性知识都没有？你去就是叫围吗？广播学院、北师大打人问题，有人怕挨打，叫工作组保护自己。没有死人嘛！左派挨打受锻炼。总之，工作组是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科书年年编不出来，我看可以去繁就简，错误的去掉，加来不及了，加要加中央社论和通知，那个是方向、指南，不能当了教条。如：处理广播学院打人，哪本书上有？哪个将军打仗还翻书？现在这个阶段要把方向转过来。

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包括左、中、右，右派也要有几个。如翦伯赞可以被右派用，也可被左派用，是个活字典，但不能集中，像中华书局那样。可搞个训练班，活字典，只要不是民愤极大的。代表会，革命委员会都要有个对立面，常委就不能要了。

除你(李雪峰),那个市委,人员不要多,多了他们就要‘革命’。打电话,出表报。我这里就一个人嘛,很好嘛。现在部长很多人都有秘书,统统去掉。我到延安前就没有。市委机关可搞个收发。你夫人不要当秘书了,下去劳动嘛。国务院的部有的可改为科,庞大机关,历来没有用。

有些人不想想,一不上课,二管饭吃,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工作组出来后,有些要复辟,复辟也不要紧,我们有的部长就那么可靠?有些部、报馆是谁掌握呀!我回北京四天后还倾向保现成的,许多工作组就是阻碍运动,如清华、北大,文件要马上写上。行凶、杀人、放火、放毒的才叫反革命。骂人、写反动标语的不能抓。有人写‘拥护党中央,打倒毛泽东’,你抓他干什么?他还拥护党中央嘛!历史反革命留下用,表现不好的斗嘛!不准打人,叫他们放嘛!贴几张大字报、几条反动标语,怕什么?!

有人讲团中央‘三胡’糊里糊涂。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什么糊里糊涂?团中央不但不支持学生群众运动,反而镇压学生群众运动,应严格处理。”

《516通知》虽然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但并没有具体解决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因此,各地的党政领导,包括中央的刘少奇等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群众风暴,不知如何应对。毛泽东曾指示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一个具体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由陈伯达、康生、陶铸主持,陈伯达执笔,原为中共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文件草案,最初为十二条。根据毛泽东6月30日给刘少奇、邓小平信中的意见,7月16日,陈伯达报送毛泽东审阅的印发稿已将内容扩展为二十三条,题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草稿)》,共19页。

7月21日,毛泽东在陈伯达7月16日的送审稿上批道:“伯达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工作组开一二次会,然后经政治局会议(有各中央局及上海、北京两市负责同志参加)开两三天会,讨论通过,即可用中央委员会名义公开发表。以在八月一日发表为好。后两页有点修改。”

毛泽东在批示上说的“工作组”,是指文件起草小组,即中央文革

小组。

在陈伯达送审稿的第 18 页,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一句,改为:“文化大革命,就是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多、更快、更省。”

在第 19 页,毛泽东将“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将“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最高指示”改为“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一句,改为:“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取得伟大的胜利。”

这天的深夜,雨淅淅沥沥地落着,偌大的清华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白日的喧嚣一下子变得如此沉寂,那大字报栏上的不计其数的红红绿绿黄黄的大字报都被一条条银线似的雨点打湿了,那上面的字迹湿得有些模糊起来。忽然,有两辆黑色红旗牌轿车沿着湿淋淋的光滑如镜的水泥石径缓缓驶来,一直开到一排大字报栏架跟前。只见车一停定,两边车门同时启开,跳出几个身穿干部服的魁梧青年,他们敏捷地将黑色洋伞撑开来,接着,熟练地把后座门拉开,从车里引领出一个满头白发的男人,他宽大的厚嘴唇紧抿着,脸上布满了许多饱经风霜的皱纹,脸色有些苍白,神情显得疲惫、忧虑,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这位老人就是国家主席、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一个撑伞的警卫员搀扶着他,来到大字报栏的面前站住脚,默默地观看起大字报来。这些日子,焦躁和烦恼扰乱了刘少奇的心,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是反对派工作组的。虽然,派工作组的决定在京的其他中央领导、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北京新市委、各地方的领导也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应该由他来承担,这一点他的心里是很明白的。今天,他深夜冒雨来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是想亲自了解该校的运动究竟是什么情况,以便加深自己的认识。

第91回：撤与留，常委会争论不休 要决议，确定文化大革命

刘少奇从清华园走后不久，7月22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百万人集会，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学校的学生都去参加集会了。这时，在北京大学西门，又开来了三辆红旗牌轿车，那几辆车也开到大字报栏前停住，在几个警卫人员的护卫下，从车里钻出了引人注目的一男一女，女的年龄约莫五十开外，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而那男的看上去年龄比她大几岁，身穿浅灰色衬衣，个子较矮，背略有些佝偻，戴着一副深色胶框眼镜，这二人正是江青和陈伯达。他们一下车，就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些正在大字报栏前浏览的师生们不约而同地都把目光投向他俩的身上。

“是陈伯达、江青。”人群中不知谁脱口而出。

群众围住了他们，其中有一个喊道：“欢迎陈伯达、江青同志亲临北大指导文化大革命！”随即掌声四起。

接着，有人呼喊“向中央文革致敬！”“毛主席万岁！”等口号。

江青也跟着高呼：“党中央万岁！北大同学革命万岁！”

这时，有人提议：“请江青同志给我们讲话！”

“请江青同志讲话！”许多人都齐声附和。

面对大家的要求，江青说：“同学们，我没有多少话可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江青的讲话博得雷鸣般的掌声。

陈伯达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讲，因为情况不太了解。我是来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工作方针，要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要听大家的意见，你们看到昨天《人民日报》社论没有？”

同学们答：“看了！”

陈伯达接着说：“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多倾听群众意见，你们有很多不同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这是很好的现象，还是要回去辩论，把问题弄清楚。我就说这些。”

江青点头微笑。

陈伯达接着说：“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

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陈伯达的讲话也博得雷动的掌声。

“毛主席万岁！”同学们热泪盈眶地高呼着。群情沸腾，呼声震天。

约11时，江青、陈伯达在燕南园召集部分同学座谈，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并作简短讲话。

这时，生物系三年级的学生樊立勤递进条子要求见江青，很快就听传叫“樊立勤”的名字，他进去了。

屋中人很多，江青问：“你是樊立勤，你写条子说你有意见，要向上反映。”

樊立勤说：“是的，我是有话要讲，我讲给您，希望您向主席反映一下，这是我的意见。”

江青说：“好，请讲。”

樊立勤说：“我认为现在的运动有问题，方向不对。中央指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可又把矛头对准我们学生了。不是中央号召广大群众和学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吗，不是《人民日报》号召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吗，怎么又扫到我们头上来了。我们算什么，凭什么又整我们。我认为这不符合中央精神，整学生是错误的。我很不理解，我绝不接受。我希望您向毛主席反映我的意见，有过火行为制止了就行了嘛，谁打人找谁，决不能一概抓。压制学生，再打反革命这怎么行。中央让搞就搞，不让搞就不搞，这事决抓不到我们头上。我对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是我希望您传达给主席的话。”

江青说：“樊立勤，你很敢讲话，思想很解放，讲话也没框框，真有

意思。”

樊立勤说：“班干部带我们去批，我们就批，不批会犯错误，会成右派；批了又错了，还打右派。我们怎么都是错，让我们怎么办，我认为工作组的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搞文化大革命不是主席的意见吗？这还搞不搞文化大革命了？”

下午，樊立勤在校内贴了关于江青等来北大的“号外”。

这天，北航的学生也都去天安门广场参加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百万人集会，但是，戴维堤等十大“牛鬼蛇神”没让参加。晚上，戴维堤站在北航六系楼顶上，遥望中南海，心里百感交集：“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烈士的后代，全家被敌人杀害的孤儿，怎么一夜之间成了反革命了呢？不就是给工作组提了几个意见吗？提点意见就打成反革命，这是哪家的逻辑？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为了红色江山不变颜色，为了中国不出修正主义，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给工作组提点意见，有什么错？不知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这些情况不？我要让毛主席党中央知道我们的情况，我要自己救自己。”于是，他割破了手指，写了一份血书：“誓死忠于党，誓死忠于毛主席，永远不变心！”并连夜写了万言书大字报，公布了自己的家史，呼吁工作组和全院师生不要把矛头对准他。

第二天一早，戴维堤推开工作组长赵如璋的办公室门，把血书交给了他，并让他转交党中央和毛主席。赵如璋眉头一皱，似乎有所感动，收下了戴维堤的血书，安慰了他几句，并把血书交给了身边一位女军人。此人正是毛泽东主席的大女儿李敏，她当时也是工作组的成员。

戴维堤的万言书大字报和写血书的消息又一次轰动了全院。许多干部、教师、同学纷纷到宿舍来看望他，并写大字报对他表示支持和声援。

7月22日晚上，刘少奇继续在怀仁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坐在前排，开始是汇报会，会议先是听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运动情况汇报。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让大家讲讲学校的情况。吴德汇报了大学情况，胡克实汇报了中学

情况，陶鲁茄具体汇报了林学院的情况，薄一波同意陶鲁茄的意见，陈毅汇报了外文委的情况。谢富治没有说话。周恩来因为有外事活动，参加了1小时就走了。

会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意见。接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发言，批评北京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

刘少奇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辩解说：“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

这时，康生说：“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接着，他列举了一些学校师生来信，反映工作组镇压学生的情况。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和刘少奇顶起来了。

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说：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急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

“派工作组是政治局会上决定的，你们也是赞成的嘛！”陈毅说。

“陈毅同志，你要知道，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也是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的。”陈伯达说。

“北大没有个党委代替，撤工作组我不赞成。”一直保持沉默的邓小平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伯达，当即表示反对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他又说：“要教会工作组做工作。有的学校没有工作队恐怕不行。”

刘少奇也讲：“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帮助教育，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现在工作组还是要的。实在不行的，撤了。撤了还要换，因为没有其他力量领导。”

代表军队参加会议的叶剑英、刘志坚也明确反对撤工作组。

这个会议没有设专人记录。会议进行过程中,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她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少奇打招呼。江青看到了争吵的场面。她没有记录,只是听。

23日凌晨,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约见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此时,他已决定召开党的十一中全会,将文化大革命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确定下来。为此,他指示陶铸在文革小组起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基础上,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他将各大区书记召来,就是要同他们一起讨论这个《决定》,做他们的工作,统一思想。他说:

“今天各大区的书记和文革小组的成员都到了,会议的任务是搞好文件。主要是改变派工作组的作法,由学校革命师生及中间状态的一些人组成学校文化革命小组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学校的事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学校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斗和改,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我们能斗能改吗?像翦伯赞写了那么多书,你还没有读,怎么斗?怎么改?学校的事,‘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本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工作组能否改成为联络员?改成顾问权力太大,或者叫观察员。工作组阻碍革命,也有不阻碍革命的。工作组阻碍革命势必变成反革命。西安交大不让人家打电话,不让人家派人到中央,为什么怕人到中央?让他们来包围国务院。文件要写上,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派人。那样怕能行吗?所以西安、南京报馆被围三天,吓得魂不附体,就那么怕?你们这些人呀,你们不革命,就革到自己头上了。有的地方不准围报馆,不准到省委,不准到国务院,为什么这么怕?到了国务院,接待的又是无名小将,说不清,为什么这样?你们不出面,我就出面。说来说去,怕字当头,怕反革命、怕动刀枪。哪有那么多反革命?这几天康生、陈伯达、江青都下去了,到学校看大字报。没有感性知识怎么行?都不下去,天天忙于日常事务,停了日常事务也要下去,取得感性知识。南京做得比较好,没有阻挡学生到中

央来。”

康生插话说：“南京搞了三次大辩论：第一次辩论新华日报是不是革命的；第二次辩论江苏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辩论的结果江苏省委还是革命的；第三次辩论匡亚明是否戴高帽子游街。”

毛泽东接着说：“在学校，革命的是多数，不革命的是少数。匡亚明是不是要戴高帽子游街，辩论的结果自然就清楚了。

开会期间，到会的同志要到北大、广播学院去看大字报，要到出问题最多的地方去看一看。今天要搞文件，就不去了。你们看大字报时，就说是来学习的，来支持你们闹革命的，去那里点火，支持革命师生，不是听反革命右倾话的。搞了两个月，一点感性知识也没有，官僚主义，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 100 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左派挨右派打，锻炼左派。派去工作组 6 个月不行，一年也不行，还是那里人行。一是斗，二是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教材半年改过来不行，要首先删繁就简，错误的、重复的砍掉三分之一到一半。”

王任重插话：“砍掉三分之二，学毛主席语录。”

毛泽东说：“政治教材，中央指示、报纸社论是群众的指南，不能当作教条。打人的问题，通知上没写也不行，这是方向、是指南，赶快把方针定下来，改过来。要依靠学校的革命师生和左派，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就是有右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用的，可以当反面教员。右派也不要集中起来。北京市委不要那么多人，人多了就要打电话，发号施令。秘书统统砍掉。我在前委的时候有个秘书叫项北，以后撤退的时候，就没有秘书了。有个收发文件的就够了。”

康生说：“主席谈了四件事：一是改组北京市委，照办了。二是改组中宣部，也照办了。三是取消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也照办了。四是有一些部改成科，没有办。”

毛泽东说：“是啊！部长管事的可以不改，称部长、司长、处长。不管事的就改，改成冶金科、煤炭科。”

有人插话说：北大进行四次大辩论。“六一八”事件是否是反革命事件？有人说是因为里边有流氓；有的说不是，工作组有错误。附中有 40 多人要提出撤销工作组长张承先的职务。

毛泽东说：“有许多工作组阻碍运动，包括张承先在内。不要随便捕人。什么叫现行反革命？无非是杀人、放火、放毒，这些人可以捕，写反动标语的暂时不捕，树立个对立面，斗了再说。”

由于毛泽东曾两次提到广播学院的问题，7月23日上午11时，陈伯达、康生代表中央文革来到广播学院，该校有100多人被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并被限制人身自由。他们接见了这些学生，对他们表示慰问。

7月23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南海继续主持召开“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会”。会上，对于是否派工作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关锋等人与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等人形成了巨大的分歧。邓小平同志说：“党的领导被打倒了，下面的组织瘫痪了，没有党的领导，运动怎么进行。因而，应该派工作组协助党委、党组织进行运动。”

周总理这时插话说：“我们年轻时搞运动，也没有什么组织领导，学生自己可以搞运动。”

刘少奇对周恩来说：“学校运动起来了，发生那么多问题，谁能办得好呀，让你去也解决不了。”

刘少奇认为：“这么大的运动，依靠谁去抓？党的领导总得通过一定的形式。工作组大多数是好的，问题是方法不当。现在谁也没有经验，新工作拿不出章程，对工作组是帮助问题而不是撤换问题。工作组不能不要，人不要那么多是可以的。”

会上自始至终对于是否应该派工作组的问题争论不下。

接着又开中央扩大会，包括华北局的书记、北京市委的几个书记，李雪峰、吴德、郭影秋、高扬文、马力等都参加了。会上依然为工作组问题发生了很大的争执。陈伯达在会上生气的说：“我陈伯达没有派过一个工作组，我派到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广播局的都是学习组，不是工作组，我是请他们去学习的。”

他这么一说，许多人都不说话了。

这时曹轶欧写了个条子交给康生，上面写道：“我和戚本禹同志都建议北师大罢孙友渔及翁世功两人的官，伯达同志同意”，字条旁边有陈伯达写的“我也同意”。康生看后交给华北局宣传部部长黄志刚，黄志刚看后又交给郭影秋和吴德，吴德把这个条子又交给李雪峰，李雪峰又在条子上批了一行小字：“还要考虑派人到北师大工作的问题。”

第 92 回：再走访，文革组又临北大 微服行，周恩来深入二外

中央扩大会会后，北京市委开会研究北师大的问题，确定再派人到北师大，人员由三方面的人组成，一是北京市委，二是国家经委，三是教育部。而对于罢孙友渔官的问题，李雪峰没有明确布置，只是指示郭影秋对从三个单位抽调的人员进入北师大一事进行动员。郭影秋因为要到中宣部开会，就让李雪峰改派黄志刚去动员。

郭影秋正在中宣部开会，突然接到吴德急如星火般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即回去，他在电话中说：“康老很有意见，请你快回来。”

郭影秋一听，知道事情大了，立即赶回市委，与吴德见面后话都没有说，立即上车赶到康生那里。到了那里，康生十分生气地对郭影秋和吴德说：“孙友渔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是为什么？我看孙友渔有后台，有后台！后台之后还有后台！”

吴德他们立即赶往北京师范大学，代表新市委宣布撤销了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吴德在讲话中说：

“我代表北京新市委公布一个决定，撤销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办公室主任翁世功的职务。因为孙友渔，没有贯彻中央的方针，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力量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害怕民主，压制民主，拒绝革命同志的批评，打击了革命群众，把锋芒转向革命同学。”

6月20日早6点，高树奎等17位同志贴出一张大字报，对工作组提出三点批评，这张大字报是正确的。孙友渔同志没有听取批评，检查自己工作组中的缺点，错误，反而把这些同学和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使这些同学受到委屈，实际上是压制民主，拒绝批评。22日谭厚兰等同志贴出大字报要求重新估价高树奎等人的大字报，这是正确的。但立即受到孙友渔指使的围攻，对这张大字报仍采取不正确的态度，使谭厚兰同志同样受到委屈，甚至发展到打骂，监视，扣押，被迫写

检讨。

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付革命的同志，这是非法的，上级指出后仍然没有改。今天我指出应立即恢复他们的自由，有一些同学在孙友渔的蒙蔽下，围攻另一部分同学，这两部分同学都是革命的。同学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但发生这种不正当的事情，责任不在这些同学身上。还有些同学是受孙友渔错误思想，错误办法的影响，把他们当作党的领导。出现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责任应由孙友渔来负。我们的工作组不管来的人职位多高，官多大，都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工作组有毛病，都是可以批评的。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拥护，不按中央指示办事，我们就反对。我们同学有责任提出意见，甚至罢他的官。即使我们新市委在工作中也常出错误，同学发现了也可以批评指出。孙友渔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中央很关心文化大革命，也关心师大的文化大革命。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 13 号知道后就找师大工作组主要负责同志去汇报，汇报后指出了他的错误。回来后孙友渔思想搞不通，不肯承认错误，没有执行中央指示，一直到现在对一些同学的压迫还没有解除，这就是错上加错。过去，市委也曾对孙友渔的这些做法提出了意见，6月 28 日找孙友渔谈过话，指出问题所在，提出了市委的意见。孙友渔表面接受，实际上并不传达下去，按新市委的指示把这件事办好，而且还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用工作组名义给市委及康生同志写信，其他一些工作组员都不知道。根据以上理由，决定撤除孙友渔工作组组长职务，决定刘作级为工作组党委书记兼组长。”

7月 23 日，毛泽东在钓鱼台 12 号楼听取李雪峰、吴德汇报北京市文化大革命情况，陶铸、康生等参加。毛泽东说：“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感到北京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我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现在工作组起了什么作用？起了阻碍作用。领导干部都不下去，不到有乱子的地方去看看。你们不去看，天天忙于具体事务，没有感性认识，如何指导？”

23 日晚，周恩来、邓小平继续在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

当晚 21 时，江青、陈伯达再次来北大调查。大概师生们事先得到了消息，近万名师生拥挤在大饭厅门前。聂元梓亲自打开车门，将江

青和陈伯达接下来。江青笑吟吟地握着聂元梓等人的手说：

“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的，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来看看你们的大字报。”

陈伯达和他们边走边谈，询问了有关工作组的许多问题。聂元梓和孙蓬一的心情处于紧张的顶点，一边回答他俩的提问，一边汗流浃背地扇着扇子、走到饭厅门口，黑压压的人群中爆发出掌声，学生们不时向陈伯达、江青提出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陈伯达说：

“我们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研究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发展过程情况的，来看看你们提了什么不同意见，看看你们怎样提问题的，来向你们学习，研究一下你们怎样进行辩论。”

我是你们的学生，你们的热情非常好，这种革命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可是我们在看大字报，你们一围，大字报就看不成了，你们要给我们一个学习机会嘛！”

任何工作要做好，文化大革命也一样，都必须先做学生，再做先生。我们也是这样，在大辩论中互相做学生，互相做先生。先做学生，再做先生，才能把辩论搞好，要讲事实，摆道理，讲道理。

北大同学要从主席的学习工作方法中吸取力量，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现在我要当学生去了！”

江青和陈伯达走向临时搭成的讲台前。这里什么样的大字报都有，他们不时地猫着手看大字报。

“你是支持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的？”江青握着一位满脸稚气地姑娘亲切地问道，那位女大学生热泪满腮，激动地说：

“我仅仅是和学生们贴了工作组的一张大字报，就被打成了右派，连写四次检查都过不了关。”

江青竭力控制着内心的冲动，却又身不由己的说：“我和你们是同样的观点，你们在下面斗，我们在上面也斗呢，斗得可厉害哪！”

在听取了聂元梓等的汇报后，江青提出召开座谈会。

此时已是夜里12点，大饭厅内外人如潮涌，口号声、呐喊声交织成一片，人们在向主席台拥挤……江青显得十分沉静，她好像特别喜欢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在聚光灯下她的才华得到了最好的发挥，她接过麦克风，热情洋溢的说到：

“革命的同学们，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是和他一块儿来听同志们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懂点事，少犯错误，与同志们一块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是一块的，不会脱离你们！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所了解的还不够多，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但现在是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方面。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我听说你们一夜没有睡，在辩论，今天还在辩论，本来是想听一听你们的辩论会的，可是来了就不行了，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睡好觉，要吃好，睡好才能打好这一仗。好，现在来请陈伯达同志谈几句。”

每个在场的人几乎都被她的魅力吸引住了。那些年轻的学生，激动得呼喊、跳动，陶醉在这轰轰烈烈的浪潮里。整个人群溶为一体，只要这位女人一声令下，真可以把任何人撕成碎片！

在一阵掌声中，陈伯达也用他那难懂的闽南普通话讲道：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这是我们文化革命小组给大家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饭厅内掌声四起。

陈伯达接着说：“我们想，还要继续来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斗争的经验。在这个文化大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我想你们一定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继续前进。”又是掌声。“我表示个人的意见，就是对‘六·一八’这件事情说是反革命事件，就是不对的、错误的。”掌声再起。“但是我给大家说这么一点，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运动中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他怎样分析阶级，怎样分析情况，把我们中国一步一步地引到胜利的道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们最要掌握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他怎样领导革命的，我们应怎样在运动中做工作。这个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曲折的，是会有一些反复的。像你们就有一些反复，‘六·一八’以前，‘六·一八’以后，一直在最近几天就有几种反复，是不是吗？有一些变化。革命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曲折的，总得斗争、总得

胜利！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江青最后讲：“我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再见了！”

7月24日是一个星期日，清晨4时，周恩来到第二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当同学们早晨起床后，走出宿舍时，被民警拦住……

有人看见了周恩来，大喊了一声“周总理来了！”于是，大家不顾民警的阻拦一涌而下，冲出了楼门。开始人少，同学们给周恩来留的空间较大，后来人越聚越多，几乎把他紧紧地围了起来。周恩来看了看手表，又看了看周围的同学们，微笑着对大家说：

“看来今天我是看不成大字报了。你们这里有没有礼堂啊？”

同学们回答说：“有教工食堂，开会都在那里。”

周恩来把手一挥说：“走，去教工食堂，我给你们讲话。”

同学们立即自动拉起两道人墙，让周恩来从中间一直走到教工食堂讲台。

周恩来到了讲台那里，转过身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坐下来，不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吗？坐下来要有好的秩序……

今天早晨我看了一个半小时的大字报，你们的大字报贴在外面，我只能趁你们睡着的时候，天亮了，你们起来了，就不让我看了。我不能坐在办公室里乱发议论，我要来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

我把你们学校当作试点，我要来连看三天，你们每天让我看一个半小时。到六点三刻大家到礼堂去，我和你们讲几句话，你们不要打电话给其他人，这也是保密。不是我怕见人，我们还是不‘自由’的，我又不能化妆，丁国钰也来到调查小组加强工作，大家要听毛主席的话。最后，我建议一起唱个歌《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好不好？”

周恩来指挥大家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很快离去。

回来后，周恩来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谈了对工作组的看法：“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他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

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点感性知识。”

之后几天,周恩来天天到二外看大字报。他看得很认真,不仅看完了大楼墙上贴的每一张大字报,就连贴在杂草丛中烟囱上的大字报,也趟过没膝的杂草认真地看一遍。

7月24日,关锋致信江青。信中说:“我认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实际上存在两条路线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逆流”。江青接到关锋的这封信后,十分重视,马上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十分赞成关锋的观点,并把关锋这封信转给了林彪。林彪看后,也十分赞赏关锋的“眼力”。

这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同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规定高校招生,取消考试,改用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新办法。通知指出:“从今年起,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等学校选拔新生,必须坚持政治第一的原则”。这个通知的发布,标志着从1952年以来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取消。

同日,中央、国务院还批转教育部《关于改革高级中学招生办法的请示报告》和《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中央批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

第93回：听呼声，一行人再访广院 答疑问，陈伯达盛赞江青

7月24日下午15时，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再次来到广播学院。这次，他们召开大会与广院的师生员工见面，陈伯达说：“我们来过一次，找几个同学了解一下情况，文化革命的情况，江青同志建议我们今天再来看看大家。下面请江青同志和大家见面。”

江青在群众热烈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欢呼声中，说道：

“同学们！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曾经到学院来过一次，给你们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提了很好的意见。我刚从上海回来，仔细地看了你们的建议，听了他们的意见，我完全同意他们两位的意见，另外副组长张春桥同志也同意，姚文元同志也都同意他们两人的意见。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当小学生的。我们要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不是来做官当老爷。你们革命热情是很好的。革命热情应该更高地鼓起来。我们不是来泼冷水的。我代表毛主席来看望你们。”

下面群众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

江青接着说：“他很关心你们的革命事业，希望你们坚决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头，进行这场伟大的文化革命斗争。你们一定很关心他的健康吧？——我可以告诉你们：他的身体很健康！”

全场欢腾，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

江青继续说：“你们的情况，我们还要继续了解，还要继续做小学生，要向你们学习。你们之间有分歧应互相谅解。你们之间的意见是可以统一的。你们之间不会有很大的冲突，不许采取围攻，迫害。现在有的同学不被谅解，以后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不要采取这种迫害

手段。有人把我们的子弟看成特务一样,搞围攻、盯梢、迫害我们的子弟,我很气愤,我反对!这只能怪背后的人。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你们不同意可以给我贴大字报,用斗大的字贴!

你们大门关得紧紧的,门口贴着条说什么、什么人不准进来!你们广播学院的大门比中南海还要紧,比进中南海还要难。我要来放火,我要提出强烈抗议!如果你们不改,我就把你们的红门涂成黑门!”

陈伯达:“请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谈话好不好?”

众人高声说:“好!”

康生笑着问大家:“同志们!你们欢迎不欢迎我讲话啊?”

众人齐声喊道:“欢迎!”

康生说:“同学们,现在我有几个问题问一下大家:在广播学院文化革命运动中间,谁是主人?是你们呢?还是李哲夫?”

下边有人说:“我们!”

有人说:“工作组。”

康生:“有两种意见,一种说工作组是主人,一种说你们是主人。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对工作组有什么权力?比如说,工作组来了,你们有没有欢迎的权力?”

众答:“有!”

康生继续问:“你们有没有贴大字报的权力?你们有没有批评他们的权力?”

众答:“有!”

康生接着说:“实行这个权力没有?有的实行过,有的没有实行过。有没有绝对相信工作组的权力?”

下面又是两种回答:一种说“有”,一种说“没有”。

康生继续问:“工作组有错误有没有批评他们的权力?”

这次的回答一致了:“有!”

康生肯定了工作组的错误,他说:“工作组有错误很严重。有的说严重,有的说不严重,总之,有错误,这是事实!是四两还是半斤,一斤,你们研究一下定。严重不严重,你们研究,因为你们是主人,你们要做主,我说了不算。”

他又问：“工作组不好，你们有没有罢免他们的权力？”

下面一致回答：“有！”

康生：“你们怕不怕这个权力？”

下面异口同声：“不怕！”

康生继续：“别人说你们反党，反社会主义，是黑帮，怕不怕？”

有同学答：“不怕！有党中央毛主席撑腰！”

康生问：“‘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口号对不对？”

下面有两种态度，开始争论。

康生：“有不同意见，平心静气地讨论一下。毛主席说过：‘一切权力归农会’，也是不要党的领导？列宁说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这时，下边同学发生争吵，康生说：“当然了，我说的不对，你们可以反对，可以贴我的大字报，如果我们有不对，你们可以驳么！口号是你们提的，要向你们学习，你们不要骄傲，也不要瞧不起自己，工作组要好好向你们学习。”

毛主席说，从群众中来。我们不向你们学习，怎样从群众中来呢？在这个屋里，你们就是群众。我赞成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因为你们是革命的。你们有没有毛主席著作甲种本？”

众答：“有！”

康生：“毛选甲种本有一篇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你们说你们的正确思想从那里来的？”

下面答：“从三大革命运动中来，从实践中来！”

康生：“你们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中来，辩论一下，真理越辩越明，要大胆地辩论。我向你们了解一个情况，说给工作组贴大字报都要规定一个地方贴，是不是？”

众答：“是！”

康生：“开辟专栏对不对？我觉得过去也好，现在也罢，既然你们有权力，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力，有人不让贴是不对的，不叫你们贴不行，地方小也不行，你们就说我说的，要让往院子里贴。贴有两个贴法，工作组好得不得了，一定要你们贴，有没有？检查一下。如果工作组违反中央指示，违反文革政策，违反群众路线，压制群众，打击群众，

你们尽管贴，房子里院子里尽管贴。

中央文革小组建议，不同的意见，上来讲！不能压制少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也许是真理。

现在澄清三个问题：

(一)有人说国务院有的同志认为‘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是造谣！没有这回事。那一个讲的，要追查他，质问他，问他为什么这样造谣？为什么拿国务院来压同学？是什么行为？是什么目的？要他回答。

(二)有的同志说，北京新市委反对这个口号。我代表李雪峰同志、吴德同志、新市委声明：新市委没说这口号是反动的，没有！不错，其中有几个人是认为这个口号是错误的，有个叫杨羽的到你们学校来，说口号是错误的，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当然新市委接待室里也有人说这口号是错误的。不管是谁讲的，谁这样讲都是错误的。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赞成这个口号，拥护这个口号。广播局不管谁，丁莱夫也好，认为这个口号不对，他就完全错了。要质问他们，要他们回答，要贴他们的大字报，要他们公开承认错误。

(三)毛主席没有关于文化革命的‘六条指示’，根本没有！”

这时，江青说：“有人递条子，说有的人有张彦的报告，有人拿着胡克实的十三条指示。张彦是犯了错误的。他带着工作队，在对外文委，陈伯达同志去看大字报，张彦就追，一直追到家里，打电话追，陈伯达同志连看大字报的自由都没有了？有29个人在陈伯达看大字报时跟陈伯达同志谈过话，张彦就把这29个人说成是反党骨干分子，并对他们实行轮番作战，有一个神经失常，眼睛都歪了。康生同志去看他时，他痛哭流涕。这是相当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中央发现了，就把张彦撤走了。因此，张彦讲的话都是不正确的，都是错误的，不要听了上了他们的当。有胡克实的什么十三条指示？没有，他不是我们这个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他的十三条我们不承认，你们也不要听，不要上当。不少人递条子要姚文元同志讲话，我们开了一个小会，会由陈伯达同志主持，要求姚文元同志讲话，可以。但是，今天时间很少了。我建议改天由姚文元同志来给你们做专题报告好不好？”

这时，陈伯达让几个同学上台讲话。

陈伯达：“听了大家的发言，撤回广播局派来的工作组，由你们这里的学生、革命师生员工自己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你们的上级机关、党委派联络员、观察员，他们只有听取意见，了解情况，如实反映情况，而不是站在你们的头上。你们赞不赞成这样做？”

众答：“赞成！”

陈伯达：“你们的班、系、校的各单位，大家充分讨论文化革命委员会名单，酝酿后，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选举。不要性急，要大家通得过的名单。当选的人如果他不好，不称职，可以罢免撤换。党信任你们，信任群众。你们一定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文化革命是革灵魂的命，革资产阶级灵魂的命，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的命，只有群众自己起来才能革得好，不是外面可以包办代替的。文化大革命中，相信你们能自己教育自己，互相教育，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使中国不出修正主义，不让修正主义当权，使我们的国家不变颜色，永远是红色的。”

“以上提出的建议，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开了会提出的意见。不是我个人意见。”

接着，陈伯达开始回答下面递上来的纸条。其中一张条子揭发有人诽谤江青，陈伯达说：“我的意见，对中央负责同志的各种各样诽谤，我们要驳斥。今天就有人递条子，说有人诽谤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九一八就参加了革命。30多年来，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她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江青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好的党员。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来不愿意出头露面，所以很多敌人都诽谤她。江青同志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天津入党，我认识江青同志入党的介绍人。

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京剧改革，是文化革命很重要的开端。京剧改革的成绩，外国人也不能不承认，好人宣传这个事，坏人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而江青同志就是这个京剧改革的首创者。（热烈鼓掌）京剧改革以前，在北京很少有人看京剧，京剧改革之后，有了很大变化，很多人爱看京剧。卖票也要定座了，要定到好久才能看到戏，这是我们文化生活一个很大变化，现在只是一个开端，不能小视这个开端。这个改革对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

系,差不多每个人都要看京剧吧!京剧的改革引起了一系列文艺的改革,京剧改革引起对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批判问题,这就引起了要检查我们的文艺究竟执行不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规定的路线,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是执行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还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革命经常是由一个地方打开一个缺口的。文化革命就是由京剧改革打开缺口的。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很感谢江青同志。

这个条子使我想起了历史上的革命者,没有不受诽谤,不受迫害的。你们不是有一百多人受了迫害,被当成了反革命,被限制了自由,被围攻了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是要在这样的围攻中站得住。刚才又递来一个条子,是揭露诽谤江青同志的。可见有的人在这里散布流言蜚语,散布诽谤,要警惕!

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很高兴听到被围攻同学的讲话。很多同志递了很多小条子要讲,没能讲。今天讲不完了。今后还有时间、有机会讲。有人说你们不要听一面意见,要听两面的意见,这个我们接受。今天已经来不及听了,因为他们已经讲得很多了,将来他们还可以讲,这不算不公平吧?时间不早了,耽误了很久,现在散会。希望同志们很好地前进,(掌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运动中,在触及人们灵魂的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每个人都能得到锻炼。我们一定会得到胜利!(掌声)耽误大家时间,谢谢大家!”

大会结束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

第二天,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广院的讲话传遍了北京城,学生们竞相传抄。

第 94 回：下决心，阻碍者统统驱逐 是与非，北大万人辩论会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继续在钓鱼台12号楼召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部分大区书记谈话，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参加了。

毛泽东先让李雪峰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当李雪峰说到“北京大学7个人的大字报，现在7个人有分裂”时，毛泽东插话：

“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李雪峰没敢再多说。

毛泽东接着讲：“没有反映，没有报告。”

康生检讨说：“我们的汇报也不多。”

毛泽东说：“什么不多，没有！”

他说：“不要搞工作组，可以搞点观察员进行调查研究，不要发号施令。整风，关门整风才不行哩！过去《人民日报》不在我们手里，中宣部不在我们手里，文化部不在我们手里，北京市委不在我们手里，这些东西都不在我们手里，不发表聂元梓那样的大字报，那才不行哩！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害怕群众，共产党员害怕群众那还了得？你们都要下去，下去搞两个钟头也好，不要老坐在屋里嘛！下去头脑就清醒一点。”

“把工作组一撤，把黑帮停职反省就完了，这样可以快点。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以后。根本撤出来，另外派几个人去当观察员。……由学生、老师的左派组成革命委员会，自己来搞。……现在搞文化革命斗争，一斗二改。斗什么？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些是你们清楚一些，还是学生清楚一些？还有斗争学术权威，对翦伯赞这些人谁了解？”

“这不只是一个北大的问题，而是一个全国的问题，如果照原来那样搞下去，是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会议快结束时,陶铸请示:“主席,是否找少奇、小平同志谈一下”。

毛泽东口气非常平和的说:“你谈,你去传达。”

散会后,陶铸立即来到刘少奇家,向刘少奇和邓小平传达毛泽东刚才的讲话精神。李雪峰正好有事请示刘少奇,到他家里一看,陶铸刚刚开始和刘少奇、邓小平谈起毛泽东晚上的谈话。刘少奇一见李雪峰,就让他坐下,一起参加他们的会。李雪峰忙说:“我有事,马上要去处理。”谈完事就走了。

第二天,7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再次和各大区第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主要讨论修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会上有人讲到:“工作组的同志是从全国来的,多数是好的,有从解放军来的。”

毛泽东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学校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所以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要斗要改,都得依靠学校本单位,不能依靠工作组。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学生们停课,吃饭,就是要叫他们闹事的,闹斗、批、改的,不能怕闹事。”

“主要是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员会,不那么革命的中间状态的人也参加一部分。谁是坏人?坏到什么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们懂得,工作组不懂得。他们到了那里,不搞革命。”

“学校里的问题,一个叫斗,或者叫批判,一个叫改。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起坏作用,阻碍运动。”

“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力,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他坐山观虎斗,学生跟学生斗,拥护工作组的一派,反对工作组的一派。群众对工作组有意见不让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电话,打不得电报,写信也写不得,西安交大就是这样。要允许群众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写信给中央!”

“我们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总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头上来。”

“现在到了这么一个阶段,要赶快改变方针了。文化大革命一定

要依靠各学校、各单位的基本群众，左派，包括中间派。

有一些部门，工作组，没有想一想：中央宣布了大学、中学停课，事实上初中也停了，又给他们饭吃。他吃了饭不上课，他不闹事才怪啦！……一斗二改，凡阻碍一斗二改者，统统驱逐之。你阻我驱，我们提出撤销工作组，代表广大群众的意见。”

“我到北京一个星期，前四天倾向于保张承先，后来不赞成了。各单位、各机关的工作组是起阻挠作用。张承先工作组、清华工作组，都起阻挠作用。”

这天上午，陶铸匆匆向刘少奇建议，“要考虑工作组怎么撤法”。他的意见是“高中撤，初中不撤”。晚上，他再次和刘少奇商议，“看来要变，变了再说。主席批示北京市的文件时没有讲中学，但主席是倾向于高中、初三不派工作组。”

7月24、25日，陶铸开始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决定》，陈伯达具体负责执笔，中央文革的人参加。

7月25日，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关于中宣部举行会议声讨周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电讯稿上的批道：“陶铸同志阅后，退张平化同志：此件看过，可用。在第五页上将‘最高指示’改为‘指导方向’。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

这天晚上，天空黑沉沉的，一颗星星也没有，而在北京大学广阔的东操场上却是灯火辉煌，那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尽是万头攒动，这是汪洋浩荡的人头大海。今晚20时，北京大学将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辩论工作组错误性质问题。此刻，主席台上依旧空空如也，这意味着今晚可能有重要人物将出场，全场的人，高唱着革命歌曲在等候。

不久，一辆又一辆小轿车驶入北京大学校门，在夜幕中鱼贯驶进北京大学燕南园64号前停下，一个又一个大人物从轿车里钻了出来：朱德、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刘志坚、王任重、李雪峰、吴德等。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在门口迎接他们的到来。

在燕南园休息时，孙蓬一看见张春桥在座，便对张春桥说：

“春桥同志，六月份，我们给上海市委转去一份常溪萍的材料，不知道收到没有？”

坐在一旁的江青把脸转向张春桥也问：“春桥同志，你们收到了吗？”

“收到了，正在市委领导中传阅。”张春桥回答。

“我们给常溪萍写了一张大字报，中央文革的领导能不能帮我们转一转？”孙蓬一又趁热打铁地问道。

“可以帮你们转，你们把大字报拿来吧。”江青脸露笑容答应说。

于是，孙蓬一急忙离开燕南园，奔向哲学楼，从办公室里拿了一卷早已写好的大字报，那大字报 17 个人签名，聂元梓打头。当孙蓬一风风火火地赶到燕南园时，那些大人物们已登上大操场的主席台上就座。孙蓬一奔上主席台，将那卷黄纸头的大字报塞到张春桥手中说：

“春桥同志，你是上海的，就托你转给上海市委。”

张春桥接过大字报说：“好的，保证转到。”

李雪峰事先并不知道北京大学今天要开辩论会。这天下午，他在北大历史系学习的二女儿李丹林打电话给李雪峰的秘书小黄，问他：“学校的大喇叭广播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市委到北大开会，听两派意见，你知道吗？”

黄秘书此时正在北大工作组办公室同张承先谈事情，他说：“不知道呀，没有听说。我问一下张承先同志。”

张承先说他也不知道。黄秘书赶紧给正在钓鱼台开会的李雪峰打电话，告诉他这件事。

李雪峰闻讯，立即和吴德、陶鲁笳商量参加北大晚上召开辩论会的事情。当李雪峰他们赶到北京大学东操场时，看见康生在外屋坐着，李雪峰就问他：“今天是开什么会？”

康生说：“我也不知道。”

提前进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大区的书记今天也都来了。这次的中央工作会议是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做准备的。从 1962 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 4 年没有召开全体委员大会了，这次召开全会，毛泽东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讨个说法。为了让各大区书记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端正对工作组的态度，毛泽东特地让他们也来参加今天北京大学关于工作组的辩论会。

来的人很多，一些省的第一书记也来了，他们纷纷在主席台上就

座，近百米长的主席台上挤得满满的，三、四排座位都坐不下，不少人站着。

大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首先是朱德朱老总讲话，他说：

横扫旧的习惯势力，要夺权，必须横扫一切旧的习惯势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总是利用这种势力，孤立革命左派，保护自己，而旧的习惯势力也恰恰起着保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恶劣作用，陆平黑帮，张承先都是利用这种习惯势力欺骗群众，组织对左派的围攻。

我们要打倒折衷主义。折中主义是冒充辩证法，其实抽掉了辩证法的革命灵魂。这个月的事实证明，折衷主义影响很广，在需要夺权的时候有人站出来摆成绩大讲“一分为二”，实际上是“合二而一”，反对夺权。折衷主义是机会主义，不敢造反，忘记了革命中心问题——夺权问题。

我们要打倒奴隶主义。奴隶主义不分敌我，对敌人也讲服从，讲拥护，不敢反对，被那套资产阶级专政的“组织”、“纪律”死死地束缚了。奴隶主义也是机会主义，被奴隶主义俘虏的没有革命人民的思想了。他总觉造反无理，不敢造反，安分守己，成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奴隶。旧的习惯势力往往影响很多人。因此左派往往处于一时的孤立地位，成少数派，革命派决不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革命派不要怕暂时的孤立，形势对他们暂时不利的情况，他们顶得住，用自己不倦的斗争，排除万难，争取群众。被暂时的少数与多数所迷惑放弃原则立场，就意味着向旧的习惯势力让步，这样习惯势力，一百年也肃清不了。

打倒折衷主义！

打倒奴隶主义！

打倒旧的习惯势力！

接着，康生介绍了中央文革的几个成员，他说：“我们是受毛主席的委托向大家问候。现在我介绍一下几位同志：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同志、刘志坚同志、王任重同志、张春桥同志，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戚本禹同志……”，他还介绍了几位大区书记，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曹轶欧。

随后，江青讲话，她对着麦克风话筒说：

“同志们：毛主席向你们问好——”她的这句问候，引来的是阵阵激动人心的欢呼声和口号声。

她接着说：“同志们，毛主席要我们做你们的小学生，就是说，做革命派的学生。革命派的同学，教职员如果需要我们来，我们召之即来。我们小组如果有什么都不正确的，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直接写信给毛主席，也可以直接去见他。我们是革命派的勤务员，革命的跟我们一块走，不革命的走出去。我听说你们有几派不同的意见，有争论。现在请他们来讲讲，我们听听。”

接着，康生说：“同志们，刚才江青同志讲了，毛主席叫我们来向你们学习，这话不是谦虚的话，因为主席说过，一切革命的正确领导，都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只有先做群众的小学生，然后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文化大革命靠谁来做呢？北大的这场文化革命不是靠我们，首先是靠你们，同志们，同学们、教员们，你们大家一起来做的，因此我们想在你们这个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习、学习、再学习！

我们听说，同学们在若干问题上有各种不同意见。这是很好的现象，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真理通过辩论更清楚了。比如‘6·18’，有人说是反革命的事件，有人说是革命的。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是革命的，反革命的？还是既是不革命的，也不是反革命的？比如对工作组，有人把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说成是党中央派来的，毛主席派来的。你们不要听他那一套！你们别听那套！毛主席一个工作组也没有派。你们的工作组是新的北京市委派来的。从6月1日到现在快两个月了，工作组怎么样？听说有各方面的意见，有的说是好的，有的讲有错误，有的讲有严重的路线错误。到底是什么错误？你们大家敞开讲，不要害怕，什么都可以讲，不要有顾虑。有的说工作组在这里好，有的说不在这里好。文化大革命怎样搞？靠你们搞还是靠工作组‘包办’？文化大革命怎样做法？陆平、彭佩云又怎样斗法，剪伯赞、冯定之类的又怎样斗？怎么做法？可以辩论、研究。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

今天晚上你们讲也好，共同讨论也好，我关照你们一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工作组不是主人，我们也不是主人，你们要做主

人的。这正是毛主席要我们来首先要讲的一个重要任务。我的话不多讲，我们不能下去就下车伊始哇啦哇啦的讲话。你们不是批评张承先作报告讲 4 个钟头吗？讲话也要精兵简政，所以我这话暂时结束。”

第95回：争论急，风雨中无人离去 小太阳，彭小蒙备受赞扬

会场上的人已经站得满满的，不仅有北大全体师生员工，还有闻讯赶来的外校师生。现场气氛异常热烈，辩论激烈紧张，扣人心弦，常常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高潮迭起，宛若电影《列宁在十月》演讲场面的再现。台下的人不断地递条子，台上的人走来走去，熙熙攘攘，热闹非凡。7月盛夏，酷热异常，个个是大汗淋漓，主席台上不少人都扇着纸扇。台下的群众反倒比较安静，个个仰着头，看着台上的一举一动。

当有人发言不赞成说工作组犯了路线错误时，康生有时插话批评。下面就递条子批评说：“你们说民主，为什么插话压制我们？”

康生说：“民主嘛！你们能讲，我们不能讲？！”

突然，天上下起雨来，那雨虽然不大，但却很细，很密，像花针一样密密地斜织着。师生们和来开会的中央大员们都有没有带雨具，大家就这样淋着，任雨打湿衣服，会议坚持开到深夜一点半，就连平时怕风怕声音、失眠泻肚的江青也在风雨中呆了几个小时，与会群众谁也不想散去。最后，还是江青说：

“为了关心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宣布暂时休会。”

台下向主席台上递的条子太多了，江青离开时，用报纸足足包了一大包。

散会后，张春桥回到了钓鱼台，打开孙蓬一给他的那卷大字报，题目是《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张春桥将大字报浏览一遍，便陷入于沉思之中：这张大字报该如何处理呢？

正好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也来北京参加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张春桥拿着大字报找曹荻秋商量，曹荻秋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为好？最后，张春桥建议说：“还是去请示一下康老吧，听听他的意见。”

当天,曹荻秋见到康生,正谈这张大字报如何处理时,康生又临时被别的人找去,没谈成。

曹荻秋感到聂元梓他们的大字报老搁在自己那里不是办法,想到北大社教问题是邓小平同志处理的,决定去请示他,8月1日上午8点多,他让糜秘书给邓小平的秘书挂电话,将近11点,邓小平的秘书回电话说:“请曹荻秋同志马上去中南海。”

11点多,曹荻秋来到邓小平家,邓小平抽着烟,听着曹荻秋讲述那张大字报情况说:“小平同志,对北大关于常溪萍的这张大字报,我想请示您应该如何处理?”

邓小平猛地吸了一口烟,回答道:“北大社教问题已经中央书记处作了处理,这个问题不要再挑起,大字报不要再送回上海。”

“那康生同志那里呢?……”曹荻秋显得有些犹豫。

“你不要再去找康老,我会告诉他的。”邓小平颇果断地挥挥手。

邓小平的意见,很快就从康生那里传到江青耳朵里,江青恼怒地道:“上海市委不贴这张大字报,我去贴!”

那时正值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有一天散会,曹荻秋和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老刚走出会场门外时,江青就从后面赶上来,对曹荻秋说:“荻秋同志,北大写给华东师大常溪萍一张大字报,如果不在华东师大很快地贴出来,你们上海市委就要被动。”

曹荻秋回到北京饭店后,赶紧嘱咐糜秘书说:“把那张大字报交给机要交通员带回上海,在教卫部和华东师大两个单位贴一贴就行了。”

曹荻秋还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那一天,曹荻秋又收到了张春桥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

荻秋同志:

北大的斗陆平计划,有一条要把常溪萍揪回斗争,已经贴出去了。据康生同志告诉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也说要把常溪萍揪回来斗。此事,请你回去后同市委同志好好议一议,不然很被动。

春桥

12/VIII

曹荻秋一回到上海，就和上海市委的常委们议了常溪萍的事，同意常溪萍去北京，但要住到上海驻京办事处。不久，中央文革来通知说，常溪萍不用去北京了。

7月26日晨，陈伯达再次将修改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党的若干方针问题》稿子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送审稿上批示道：“七月二十六日修正稿。供讨论用。”并在这次修改稿第七页“各单位党的领导要善于倾听群众的各种意见”和“党的领导要同群众一起”两句中的“党的领导”后面，分别加上了“和革命群众中的骨干分子”11个字。此外，在其他地方还有个别文字的修改。

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由陶铸传达毛泽东前两天的谈话内容。会议最后决定撤销工作组。第二天，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撤销工作组的决定。

北京轻工学院的学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和同学、朱良才的三儿子朱新民等人作为轻工学院的代表，这天到国务院信访室上访，状告轻工学院的工作组镇压学生运动，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

当天，江青、戚本禹会见北京轻工业学院反工作组的学生代表。

江青说：“这里都是自己人，谁也不会传出去。你们来的信，我们都看了，你们这样做，是热爱党中央和毛主席！我们有你们这样的接班人，中国不会变颜色。向你们说两点：

(1) 你们是受迫害的，他们那样做，只有反革命才干得出来。要是再对你们进行迫害，就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对你们是怎么迫害的？你们回去准备材料，准备控诉。

(2) 不应该死，应挺起腰杆革命，你们要是死了，问题就搞不清楚了。与其自杀，不如干革命，让敌人给一刀，这样还光荣。

你们学校是要夺权的！工作队、党委可以不信任嘛，反对工作队、党委，不一定是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本没派过这样的工作队，一个也没派过。

这样的工作队光撤了还不行，还要斗它。

你们来时，他们知道不知道？要是知道了，他们又要布置了，又想溜了。你们回去后要串联，要准备材料，简单扼要，要击中要害。

你们敢不敢控诉?”

学生们齐声回答：“敢！”

江青说：“我们给你们撑腰！我们要排着队去。你们讲话后，我们还要讲话。

你们要注意斗争策略，你们之间的分歧是工作队挑起的。不要把群众放在后边，不要光靠你们几个人。不要互相斗争，要争取中间群众。工作队员也会起义。同学说了一两句话错话，做了一两件错事，没关系。那些大人物说了些错话不算，为什么要对同学抓小辫子呢！”

戚本禹说：“前一个工作队包庇黑帮，被他们赶走了。后一个还是这样。他们说开门整顿 10 天，实际想蒙混过关。邓是个不小的官儿呢，可这个人糊里糊涂，连话也说不清楚。上次做了报告，想把责任推到同学身上。上次我在那儿看大字报，点名的全是学生，有几十个，实际上都是他们指挥的。”

江青：“你们回去，把精确数字统计上来。他们不是要找‘后台’吗？我做你们的‘后台’。毛主席给你们撑腰！”

戚本禹：“你们学校还有‘党委领导万万岁’大字报，连这样的党委也保卫？！连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院党委也要保卫？！”

江青：“你们回去要好好干，你们是主人嘛！”

7月26日晚上，北大的万人辩论会接着召开。会议开始前，北大附中的“红旗战斗小组”排着纵队，打着红旗走进会场，会场响起一片掌声。

会议由江青主持。康生、陈伯达、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关峰、戚本禹、穆欣等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及李雪峰等参加会议。

江青说：“文化革命小组成员都来了！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我们的顾问康生同志，副小组长王任重同志，副小组长刘志坚同志，副小组长张春桥同志，组员：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戚本禹、郑季翘，还有三个组员没有来，他们有工作。

我们今天来继续昨天的调查，继续听你们的发言，有同学递条子让我讲讲，希望有不同意见的人都能说说，这很对。什么意见都听，我

们不抓你们的辫子，希望你们百花齐放，最后，达到在毛泽东思想上万众一心。有同学递条子说‘让陆平、彭佩云滚蛋！’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听着！让他们靠边站着！现在请同学们发言。”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首先上台讲话，她揭发附中工作组压制他们，不让他们革命，他们几次找张承先反映意见，有时静坐半天，张承先都不见他们，最后见了，不但不支持他们革命，反而批了他们一顿。

这时，江青插话说：“大家看看张承先的官架子有多大，我来北大，他就不见我。”

当彭小蒙说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时，江青说：“你们是太阳，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从此前后，彭小蒙被戏称为“小太阳”。

彭小蒙口才很好，做了充分准备。她的发言引起全场热烈的掌声。当她准备走下讲台时，江青把她拉回来，热烈握手，久久不放，最后还热烈的拥抱了她。

彭小蒙和台上诸位领导一一握手。后来，江青把彭小蒙 7 月 26 日在北大的讲演稿交给毛泽东。

这时，法律系一年级的刘昆林走上台，控诉工作组对他们的迫害，讲着讲着，由于过于激动，讲不下去了。

接着，技术物理专业的刘青华作了题为《彻底批判以张承先为首

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发言，并控诉技术物理系工作组对他的迫害。

康生说：“有人送条子给我，叫我说一下，叫各种意见上台来讲，我们一万多人可以达到千言万语，可以达到万花齐放，达到万众一心。”

江青说：“有人建议今天的辩论会应将专题出一下，我们今天就辩论张承先进校后所犯的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赶走他还是不赶走他？同志们讲话要短，不要长篇大论。下面是聂元梓同志讲话，她昨天很谦虚，很想听一听大家讲话，放在下面好不好？”

台下众人答：“好！”

江青接着说：“反对聂元梓的贺晓明、雷俞平可以上台来讲，哲二有5个同学想发言，可以派一个代表，把你们鲜明的观点精炼地摆出来。”

这时，工作组组员、秘书处的孔立明上台说：“张承先是不革命的，应该赶走。”

康生说：“一个同志写血书说《我有苦、我要诉》。”

江青说：“一个写血书的同学，叫耿佩荣，叫她优先上台讲话。”

东语系越四班的耿佩荣来到台上，揭发工作组在“618”问题上对她错误的处理。她最后说：“张承先是怕死鬼，是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我们要踢开他。”她刚一讲完，台上的首长们就热烈鼓掌。耿佩荣走下台时，首长们招手目送。

接着，大字报《舍得一身剐，敢把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张承先拉下马》的作者、西语系法一班的宋晓明作了发言。

这期间，也有不同的意见上台发言，如：生物系一年级的学生申叔南就说：“工作组成绩是主流，犯了错误正在改。”

另外，地球物理系二年级的同学崔建昆提出，不同意罢官论，对千篇一律一边倒的发言进行批驳。他认为，工作组安排坐下学文件是必要的。错误是由于没有经验，结论是：成绩是主流，还是有缺点的。

法律系牛忠林针对申叔南和崔建昆的发言上台反驳说：“我反对上述意见，我要控诉工作组对法律系工农子弟，和革命干部子弟的迫害。”他读了《告北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女的公开信》，最后说：“张承先不是我们的领导，让他滚蛋。”

这时，江青说：“有人建议把工作组领导介绍一下。”

台下一片反对声：“不同意！”

“618事件”后，北京大学有31名干部子女组成的讨论会。他们的一致意见是，北京大学是“延安”（共产党的天下）不是“西安”（国统区），不应当使用暴力，应该拥护工作组。

他们听说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支持北大工作组，于是这天开会时，她们几个女同学悻悻地躲开，没有去参加。当她们正呆在宿舍里时，一位女生突然急急忙忙骑车从会场赶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江青说有不同意见，希望也上来阐述，她特意让人找我们去发言。”

这几个女生顿时精神焕发，以为江青是站在她们一边的，呼啦一下都跑进东操场。其中李扬扬和雷俞平被推举为代表，十分兴奋地走上台去，慷慨激昂地演讲起来，她说：

- 1、工作组犯的不是路线性错误，只是严重的右倾思想；
- 2、对工作组功过评价，她们认为，工作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举得不高，不是没举，更不能说是反对，突出政治不够；
- 3、“初步发动了群众，还存在严重问题，不能说是镇压运动”。工作组夺权夺得好。

4、斗陆平问题，他是犯了战略步骤上的错误，一直拖延是由于客观原因；

5、“工作组错误的性质”：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延安不是西安，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的，是革命党，不是保皇党；

6、错误的根源，认识与实践的必然差距，是新兵出现了老问题。

发言结束前，李扬扬还郑重地念出她所代表其他29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毛泽东的儿媳张少华（即邵华，毛岸青妻子，当时在北大中文系学习）和她的妹妹张少林。

李扬扬刚走下台，江青就站了起来，她向会场问道：“同志们，同志们！刚才那个李扬扬，把‘工作组’当成救世主，我们需要救世主吗？”

台下纷纷喊道：“不需要！”

“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

“打倒工作组！”

江青接着念条子：“郭来舜、刘昆林要与李扬扬辩论。”

台下有人喊：“好！”

物理系的石小阳上台说：“不能将陆平与张承先同志一起相提并论。”

东语日二班的郭来舜上台表示：“反对李扬扬的讲话，要求罢张承先的官。”

彭小蒙上台表示：“反对李扬扬的讲话，坚决要求罢张承先、张德华、沈宁的官。”

康生手里拿着纸条说：“好，请大家先看看这张条子，说，张承先妄图控制北大的革命师生，妄图把北大当作自己的根据地，可是，张承先！我们要告诉你，你想错了，我们早已看清了你的真面目，坚决把你这个‘保皇派’——人民的敌人赶下台，张承先滚出北大！滚出去。”

7月26日那天，张承先出席北京市委召开的各工作组组长会议，听取了李雪峰传达毛泽东于24日至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精神。李雪峰说，前天和昨天开了两次会，总的主要讲“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几乎讲的都是大学工作组要不要撤退、要不要改变工作组的政策的问题。李雪峰传达毛泽东的话说：“文化大革命无非是革两个命。一个是斗坏人，搞黑帮；一个是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搞他们（指‘学术权威’），你们（指与会者）行啊！我看你们不行，省委也不行，我也不行。”“要改变工作组的政策。现在工作组起的什么作用呢？两个作用。一个作用，阻碍的作用；一个是不会，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工作组一不能斗，二不能改，半年不行，一年也不行，只有他们本单位的人才能斗、才能改，斗就是破，改就是立，有破有立，只有依靠他们才行。”在谈到北京大学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回北京的前4天（毛泽东于7月18日回京），我是倾向保张承先的，但是有许多工作组是阻碍运动的。”当有人谈及工作组是从全国调来的，多数是好的，有的还是从解放军抽调来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什么海军、空军、陆军，什么张承先，你行？你行？（指与会者）我也不行。”在有人谈及贴第一张大字报的7人中现有四五人反对聂元梓现在的行为，并出现了分裂的情况时，毛泽东又说：“分裂就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第96回：张承先，会后急往北大赶 动真情，江青忘情诉家事

张承先听完报告，往回赶。路上，张承先觉得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放手发动群众，不怕乱，在乱中暴露问题，然后一分为二地解决问题。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张承先觉得应当改变北大工作组前一段强调的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运动的方针，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争取得到党和群众的谅解，顺利撤出北京大学。然而，他没有想到，回到北大后，发现江青等人正在组织召开北京大学的万人师生员工大会，他刚到会场，就遭到了一阵猛烈的口号的声讨。张承先不知所云。

哲学系二班的代表董小结上台提了两个建议：1、保留工作组；2、成立以聂元梓为首的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

接着，江青念下面递上来的条子，她说：“有同学递条子说毛主席今天来看大字报。我从早到晚忙着看文件，接见，还没有见到他呢。我了解，他没有来。但是同学们的每个条子，每个意见他都看的。你们看我不是装了一包吗？”

全场沸腾，“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

江青接着说：“有同学递条子说‘首长同志们’，我们不是什么首长，我们是来向大家学习的，这个条子是错的。他说：‘你们对不同意见为何不鼓掌？’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观点，我们同意的就鼓掌，不同意就可以不鼓掌嘛！为什么非要我们都鼓掌呢？再说我们都是学生，是来学习的。就你们看书也得一页一页地翻，你们有的观点我们还没有听清楚，我们也得慢慢学嘛！所以，有时候就不鼓掌了。”

康生也说：“有人写条子写‘首长’，我们是你们的小学生，不是你们的首长。问我们为什么不对双方的意见都鼓掌。我们有自己的观点，叫我们都鼓掌是不行的，我们对双方都鼓掌，岂不成了中庸主义了吗？”

这时,请陈伯达讲话。他说:“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我请一位翻译。”

他请王力出来为他翻译。

他说:“今天在会上听到各种不同的意见,争论得很激烈,很尖锐,这是正常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关于对待工作组的态度问题,这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个问题上,争论这么激烈不是偶然的,这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赞成许多同志的意见,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这是一个阻碍文化大革命大路上的障碍物。我们应该撤掉这个障碍物。”

顿时,台下群情激奋,雀跃欢呼。受到压制的学生有一种终于拨开云雾见太阳的感觉,一种翻身感、解放感在全身涌动。当场有不少人激动地哭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北大的学生星夜奔赴各个兄弟院校传播这个消息,学校、机关纷纷到北大进行串连,北京市大中学校反工作组的高潮再次兴起。1966年不同寻常的50天至此结束。

陈伯达接着说:“这里好像有一些同志替工作组辩护,替张承先辩护,给他擦胭脂,不过除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可以说,在我们同学中,对工作组有一些迷信,就是说得像没有工作组,同学就不能进行革命了,实际上这个工作组是你们的盖子,我建议北京新市委把这个盖子揭开。”

“我们很多同志受了一种旧社会的影响,由于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受了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好像没工作组就不能革命。我们要破坏这个习惯势力。任何革命都不能由别人包办代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在我们脑子里还存在残余资产阶级灵魂的命。正如毛主席所说:这个革命是触及灵魂的大革命,要自己动手来革这个资产阶级灵魂,革一切剥削阶级灵魂。”

陈伯达接着说:“我们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商量了一下,大家觉得在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产生这样一些新事物,新东西,新问题,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有许多地方还成立了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种组织形式才是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群众管理自己，由群众起来革命的。

我们第一个建议是：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第二个建议是：在你们这里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革委员会，在全校成立文化革命总委员会，或者叫文化革命代表会议。

这个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革总委员会，文革代表会议是文革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些成员不是由谁来指定，要由群众来选举，应该在群众里面充分酝酿候选人名单，酝酿它多少次，多少天，不要忙，酝酿以后可以把名单贴出来，大家再无记名投票。我同意这种做法。我们成员都是你们勤务员，要为大家服务的，不是骑在大家头上的。……这些成员、代表选举了以后，是不是要一辈子当下去呢？不是的。今天发现了他们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由群众来撤换，由群众重新选举别的人代替他。

.....

我们这些只是建议，第一是向北京市委建议，第二是向你们建议。这些假如走得通，假如你们对工作组有不同看法，还可以继续辩论。我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了呢？是不是不公平呀？是不是你们有同学递条子说我们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指示呀？可以不可以呀？

现在关于‘618’事件还在争论，有人说‘618’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这是错误的。反过来说，‘618’事件是一件群众的革命事件。有很多同学说得对。我们党的标志是党中央的领导，是毛主席的领导，这是重要的，谁代表党的领导呢？党中央。同学们说‘618’就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根据毛主席领导的精神，群众起来斗牛鬼蛇神的。我想这种说法是妥当的。

我们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就讲完了。很对不起，我不会讲普通话。”

康生说：“同志们！昨天我提出三个问题供同学们讨论，听同学们的意见：第一个问题，‘618’事件，同学们怎样看法？我们听了各方面的意见，我们小组组长也谈了我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请同学们考虑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到底怎样？要呢，还是不要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听了多方面的意见，我们的小组长也谈了我

们的意见和建议。第三个问题，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做法，我们表示了我们的建议，我赞同我们小组长的建议，不晓得同志们怎么样？同志们，我们是一个建议，再重复一次，是个建议，不是命令，不是指示，不是强加于你们，一切赞同不赞同的权利不归我们，而在于你们大家。

昨天我们问过，也调查过，在文化革命中，谁是主人呢？我听到两种意见：大多数说革命师生是主人，也就是说你们是主人；也有人说工作组是主人。

今天有很多条子，说很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一笑一鼓掌，似乎我们一鼓掌，问题完了。不是的，同志们，问题在你们，鼓掌不鼓掌有看你们，对不对要通过你们的头脑来考虑。你们不要看我们的态度，这样很危险，要是我们鼓错了，那你们不是也错了吗？”

他讲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错误，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走群众路线”，“50多天中，北大整个学校连个文化革命委员会也没有组织起来，各系有的也是在工作组包办代替下进行工作的，不是真正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此，他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康生还特别提到：“刚才有个叫李扬扬的同学讲了话，我很注意。好象我们北大离开了张承先就不能革命了，好象张承先是个‘诸葛亮’，你们都是‘阿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你们不是天天唱《国际歌》吗？想想《国际歌》是怎么说的？要依靠自己救自己！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中不依靠自己救自己，而是依靠别人呢？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是口头讲的，是要依靠行动来体现的。张承先口头上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际上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无数的事实，北大运动的事实证明了掌握毛泽东思想，按毛主席指示办事，那就能达到目的，达到胜利；若是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主席指示，就会犯错误，遭受挫折，遭受失败。”

他说：“有的同志也这样讲，你是不是不要党的领导了？陆平不是垮台了吗？那怎么办呢？你们北大是独立王国呢？还是接受新市委的领导，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呢？真正接受党的领导，就要真正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如果不执行，就是张承先在这里也没有党的

领导。”

康生建议同学们学习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他说：“斗陆平要靠你们大家，”“斗了他们，下一步干什么？要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权威，要斗翦伯赞、斗冯定。”“把资产阶级权威斗倒了，那下一步干什么呢？整个计划想过没有？下一步就要搞建议改革。学制怎么样？课程怎么样？专业怎么样？教科书怎么样？这些东西都要靠你们了。是不是我随便说的呢？不敢。现在我解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同学写了一个条子，没有签名，不赞成我们在会上质问张承先。条子上问我们：‘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有头脑没有？逼供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是有损于文化革命的，有损于毛泽东思想的。我警告你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会脱离群众的。’

他还要我谈谈我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很简单，我坚决反对这种看法。张承先在这里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们不能问问吗？难道这就叫逼吗？为什么他们把人逼死，你们不说一句话，而我们一问就是逼呢？”

江青：“有胆量的就站出来讲嘛，我们不怕！”

康生：“同学们让我把话说完，一个逼，一个供，我们问他应不应该答复我们？”

台下众人答：“应该！”

康生：“这叫什么‘供’？还有一个‘信’，我们恰恰不相信他哩！他上次检查你们信不过，这次检查还是通不过，我看你们不相信他嘛！他才是喜欢我们相信他，我们就不信。当然，写这条子的有两种人：一种思想糊涂；一种是不赞成我们，想保护张承先。你糊涂，别让我们糊涂！你出去讲讲。一种是想保护张承先，也可以，也允许嘛！这么多人还不允许有几个保留他们错误的？他们保留意见也就好嘛，这是教员，是你们的反面教员，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你们会打麻将吗？有方子，有条子，有一万、二万、三万，世界上没有清一色的方子，总是一分为二的。他的意见是片面的，错误的，我们坚决反对。但也有好处，他是反面教员，我一念这条子，你们大家不是兴奋了吗？有好处的，从这点上讲，你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大右派章乃器、章伯钧还请他们吃饭，

住房,还留在那里,如师大教授黄药眠还留在那里吃饭、睡觉、聊大天。那是我们花钱请的教员。所以,同学,你观点糊涂就上来讲,观点不糊涂就给我们上课,今天不愿讲,明天讲。”

已经是晚上23时10分了,江青:“刚才我跟要发言的同志商量,是不是今天发言就到这里,我们是日以继夜地干,他们也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大家都要早点休息。伯达同志昨天上夜没睡觉,今天又来了!”

场上群众激动不已。

江青接着说:“有人说我们偏听偏信,我讲几点事实好不好?”

众人答:“好!”

江青说:“关于‘618’是革命事件,陈伯达同志已代表我们小组发表了意见,这是革命事件。”

场上再度沸腾。

她说:“我到北大有4次了,我们认为了解得不够全面,张承先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没有见过,他也不来见我们。刚才他给我们来了一封信,也不签名,也不是亲笔。这是极不严肃,极不郑重其事的。21号我到了北大,找了聂元梓、郭兴福(东语系朝鲜科)谈了一个钟头,有5个同学在外面听着,后来这5个要找我谈话,说聂元梓、郭兴福不能在座。我说,刚才他们讲话,你们听了,现在你们讲不让他们听,这民主吗?最后聂元梓、郭兴福二同志只好退席。他们代表31人就是今天李扬扬代表的29人。20日张承先给他们开了会。我觉得他们是受欺骗、受蒙蔽。还以为张承先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们是上了当。

下面我来讲讲张承先的干部路线。在他的干部名单里有个叫张少华的。这个人我是知道的。她是核心小组领导人物。她的母亲张文秋是一个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手。她欺骗了中文系五年级同学。我不知道她用什么办法没到外地搞社教留在北京了。跟着郝克明反攻倒算。我的一个孩子有病,一个护士同志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护理我的孩子,后来张文秋、张少华他们赶走了护士,跟他结婚!是骗他和她结婚的。”说到这里,江青又加大音量:“我从来不承认她是毛主席的儿媳,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认。”她边说边哭,气得说不

出话。

这时，下面有人喊：“把张少华揪出来示众！”

张少华当时就在会场上，她一看势头不对，赶紧悄悄地离开会场，接着和妹妹张少林，连夜骑着自行车离开了北京。后来，还是刘松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保护了张文秋和张少华母女。

会后的一天，李讷来到政治学院看望集中在这里整顿的国防科委工作组成员李敏。李敏问李讷：“是谁叫你来的？”

李讷回答说：“爸爸。”

李敏问：“爸爸叫你来看我，有什么事情？”

李讷说：“爸爸怕你卷进北大工作组里边去。”她向李敏讲了邵华在北大被江青点名的事情。

李敏回答说：“我知道了。”

再说此时的北京大学辩论会上，江青还在台上讲她的家事，陈伯达走到她跟前，想提醒她别把话题扯远了，江青却视而不见，又转而攻击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松林是张少华的姐姐。陈伯达不得不上去碰了碰江青的肩膀：“这些事不要在这里说了。”

“我的确非常烦恼。”江青泪水迷离地昂起头，放低音量说：“这10年来我一直受着这个女人和她一家的气，这是我烦恼的原因。”

“还有一个郝斌，是现代史支部书记，也成了积极分子，这个人到乡下搞社教2个月搞不起来，跟地主右派勾搭。李讷给和另外一些人提意见，前市委派人攻李讷，这就是前北京市委的反攻倒算！李讷毕业后，我叫她作自我批评，对郝斌讲清楚，郝斌嚣张得很，李讷作检讨时他竟不见，他们说我的孩子态度不好，我容忍了好几年了。要不要我说一说？”

台下众人答：“要！”

“那天谈话的5位同志贺晓明、雷俞平，我讲得对不对？贺晓明来了没有？我们的子弟不能盛气凌人。我们的子弟如果不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工农子弟可以批评，但不能笼统地对待。我痛心，这是张承先搞的鬼名堂！这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革命同志们，教师们，4年来我们受尽了气，我是受他们害的，本来我没有病，我的心脏病就是被他

们逼出来的，我讲不下去了，现在请陈伯达同志讲几句话。”

江青虽然是在讲她的家事，但她讲得声泪俱下，让在场的许多师生深受感动。尤其是听说居然有人敢在毛主席家中装窃听器，这是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可见阶级斗争的尖锐和激烈。很多人觉得江青到底是毛主席的夫人，她能和群众坦诚相见，一般人还做不到哩。

第97回：刘少奇，与康生激烈争论 赴师大，解决工作组问题

会快开完时，江青走近李雪峰问：“你讲不讲？”

李雪峰忙摆摆手说：“我不讲了。”

江青说：“你讲讲吧。”然后转身回到主席台，冲着麦克风说：“请新市委书记讲话”。她带头鼓掌。

身材清瘦的李雪峰只好将手中的扇子折起来，站起来，依然是风度翩翩走到麦克风前说：

“同学们，同学们，我首先声明我完全赞同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的讲话，我认为他们的讲话对同学们的辩论会作了严密的分析，他们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了当前存在的问题，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做出的结论是正确的。他们总结了运动中群众创造的新形式：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会议，这是一个创造性的结果，这样的结果由他们总结了，这是科学的总结，今后将要把这些总结写进我们的文件里。其次，谈一谈工作队的问题。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是坏的工作组，主要是他们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妨碍了运动的发展。他没有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反而采取种种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的手足，50天没斗陆平，彭佩云，没打击黑帮。实践证明是坏工作组，既然是坏的就要罢官撤职。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对工作队敢于批评，也是个新的经验。派工作组原是老传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派工作组是不适当的。伯达同志，康老不仅批评了北大工作组，他还总结了全市工作组的经验。同志们问，坏的工作组你们负不负责任？我们有错误，我们用人不当。一个人怎样，要在实践中考验，即使在历史上做过工作，也要在新的情况下考验？江青同志掌握的材料比我们多，有些我也是才听到的，我们发现慢，斗争慢，拖延下来，我们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党中央，毛主席没派工作组，这是新市委的责任。……我们没有像江青、陈伯

达、康老一样到群众中来，难道我们比他们还忙吗？

关于5月25日的报告，5月25日新市委还没有成立，就我一个人，当时我讲了两条，一条是内外有别，一条是不要上街，当时有点怕乱子，经验证明，当时主观想法是不对的。第二天6月3日，新市委宣布成立，6月4日那几天敲锣打鼓，声援北大，还不是上街吗？关于批评新市委，6月4日我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我说一般不能这样讲，当时讲是因为在中央决定我来组织北京新市委时，6月20日市委大楼出现大字报，党中央叫我来当市委书记，他们要赶我走，所以我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批评新市委可以，我们说过大字报可以贴，将来也可以贴，当时讲这样的话是有特定的环境，我又是光杆司令。

关于‘618’事件，革命师生斗争了黑帮分子，但张承先颠倒黑白，说是反革命事件，也有的地方叫‘618’事件。北大派了工作组后，各地纷纷报警，又要我派工作组，当时大学有，中学有，工厂也有，当然有的地方报的是假的，当时有点乱，后来开了会，叫领导引火烧身，结果很多单位没有传达到引火烧身这句话……

6月20日前后，工作组报告的多起来了，北大也是其中一个，开始发现班与班，系与系不能互通情况，23日开了会，总结了经验，要互相支援。6月1日后，到北大支援的不是很多的，我总结了经验，互相支援是必不可少的。过去我们在学校，城市也搞过，现在一当领导就忘了。北大工作组没有发扬四大，20日以后，个别地方发现了这种情况，以后别的同志讲过应该注意，以后改了。7月10日报告没有改变这样冷冷清清的局面，陈必陶的大字报贴出来了，来得快，我是见事迟，转得慢，是犯了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工作组现在看来不管好坏都不行。究竟谁了解情况？还是学生。黑帮分子的脑袋上又没有刻着字，搞教育改革，学术批判都要依靠群众。刚才康老的讲话不仅总结了北大的经验，也总结了全市的经验，今后怎么办不说了。工作队不一定三天都走完，郊区社教还要搞，等同学们将高等学校的文化革命搞完，还要去帮忙。那时你们更有斗争经验，就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

最后是聂元梓讲话：“我怀着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无限感激来讲

话。从北大长期的尖锐的、激烈的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中,我深深体会到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我们50多天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尖锐斗争中,再一次证明了没有党中央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的一切,今天康生、陈伯达同志都讲了话,提了建议,我完全拥护他们的讲话。”

27日,聂元梓倡议建立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并宣布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十天,并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选举制度和民主程序可借鉴。第二,巴黎公社只有人民才有选举权,北大师生近两万人,敌我的界限是什么?谁有资格鉴别、决定呢?第三,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出现权力真空。中央文革小组希望北大成为全国的典型,以点带面,指导全国运动,必须在一天之内产生新的权力机关——校文革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在当时情况下,最简单办法就是各系出一个人组成校委员会。根本来不及召开全系大会选举。于是,经济系里选了社教中的左派教师杨勋,技术物理系选的是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历史系是吴惟能……聂元梓是当然的校筹备委员会主任。

28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由聂元梓出任主任委员,白晨曦、聂孟民(学生)任副主任委员,牛皖平、徐运朴、廖淑明(均是学生)及戴新民任委员。同时,北大校文革筹委会也倡议建立了校园“劳改队”。“劳改队”这一形式立刻被确立,而且马上风行全国。前一阶段已经被工作组“揪出来”的人都被强迫进入“劳改队”,被迫与其他人隔离开来,在学校里“劳动改造”。

北京地质学院水文地质系四年级51621班学生朱成昭与51622班学生郑文卿于7月25、26日到北京大学听了那里万人辩论会的情况。7月27日,朱成昭与郑文卿共同成立的“爆破战斗队”贴出大字报《彻底清算工作队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锋芒直指工作队。

这天上午,探矿工程系学生王大宾与11632班的周永璋、伏庆是,11622班的殷维候,15632班的蔡新平、杜金山、庄一龙相约,一起到北京大学找聂元梓取经,了解中央文革小组对工作组的态度。在他们心中,聂元梓是一个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的大左派,她的话,她介

绍的情况应该是可信的。他们想亲自见见聂元梓，当面听听她的意见。他们翻过学院西面的围墙，逃出地院后，在约定的地点会合，然后来到北大。

在北大找聂元梓的人非常多，一拨接着一拨。聂元梓听说王大宾他们是北京地质学院的，非常热情，立即将他们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认真地听了他们介绍北京地院的文革情况，然后向他们讲了陈伯达、江青到北大参加大辩论，支持批评工作组，号召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的情况。还表示支持他们反对工作队的行动，并答应他们的请求，将北京地院文革运动的情况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汇报。王大宾他们深受鼓舞，回校后即贴出《走访北大的声明》的大字报。

当天下午，聂树人也贴出“李贵等十三名教员干部是革命的”长篇大字报。

工作队和一些人立刻组织围剿。据工作队统计共有 750 张大字报对此进行围攻。

7月27日这天，刘少奇找康生单独谈话，他对康生说：“你应该在中央起团结作用，能够使中央求大同，存小异。”

康生回答说：“可我们之间的分歧又无法解决或变得一致起来，比如在清华大学的问题上，我们尖锐对立。我认为，蒯大富是革命的。”

“是吗？”刘少奇皱起眉头：“蒯大富对党中央，对我们许多老同志没有一点点阶级感情，动不动就骂人是‘黑帮’，这能是革命者吗？我看不是。”

“你们对人家实行镇压政策，人家不反抗行吗？特别是薄一波同志和蒯大富辩论时，开口闭口说人家是‘右派’，这能换来一个学生对他的尊重吗？”康生显得非常激动：“对薄一波，我想多讲几句，已经有揭发材料，说他和阎锡山的关系不正常。我看过他在抗战时期的一些文章，是露骨地宣扬阎锡山的反动理论的。比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说：‘目前主客观的形势都要求我们执行这样一个任务，就是，加紧司令长官的理论学说的研究，决心培养出一些精通司令长官的全部理论学说和政治主张的专家，这对我们组织有特殊的作用，培养出一批山西通来。’他的这些观点和有些行动已经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刘少奇说：“你们说对蒯大富实行了镇压，这就不对，不是镇压！”

康生问到：“不是镇压是什么！是辩论？世界上哪有这样的辩论！把人家关起来，把团籍搞掉了，这叫辩论？”

“反正，清华工作组没有定蒯大富是反革命，肯定没有定，不过，工作组这样做法是不好的。”刘少奇说。

“不许蒯大富上中央告状，起码是不符合国法，违反宪法的。”康生坚持。

“当然，清华工作组是有错误的，叶林同志是有错误的，王光美同志也有错误，但是，事实决不是你们所说的那样危言耸听！”刘少奇说。

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作了修改。这天，毛泽东两次召开会议，会后，周恩来到刘少奇处与他谈话。并约邓小平、陶铸谈话。周恩来审阅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做出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7月27日到30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集中传达、讨论了毛泽东于7月24日、25日批评工作组的讲话。会上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草稿），征求意见。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为了使大家开阔眼界，还组织了两次参观活动。一是到北京师范大学参观大字报。那里从校园到课室楼梯，已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内容主要是围绕着学生谭厚兰反对工作组展开的争论，多数是揭发批判，少数给予支持。另一次是到清华大学参加给蒯大富平反的大会。

在传达、讨论了毛泽东于7月24日、25日批评工作组的讲话后，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与会者都表示拥护毛泽东撤销工作组的意见，赞成“打破旧框框”，“由群众自己选举文化革命小组或文化革命委员会来领导运动。”当时，不少人认为工作组的问题，仅仅是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派工作组的愿望还是好的。会上也有人提出撤销工作组后，怎样体现党的领导，党、团员如何活动等问题。

会上还讨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决定》几经修改，在7月29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时，已由原来的23条压缩为16条。讨论中，华东组提出：“最好把党组织是领导的核心力量、党员应当认真实行三大作风的内容也加进去。”西北组提出：“在文件中对

党的领导问题单独写一条，说明什么是党的领导和怎样领导。”

吴德7月23日宣布撤销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职务，北师大3000多师生签名要求孙友渔留下来。7月27日晚上，陈伯达、江青、康生又带着文革小组来到北京师范大学。东操场，全校师生员工夜间集会。

陈伯达主持大会，他说：“你们现在不要搞保姆了，这么大了，保姆又不好。”他建议通过巴黎公社式的选举来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

江青讲得就更明确了：“工作组是石头，阻碍你们前进的道路。斗争矛头不是对准黑帮分子，对准地、富、反、坏、右，而是对着革命的师生，这是错误的。”她点了工作组组长孙友渔的名字，说他们在同学中制造分裂，号召同学们斗争他们。还说：“你们同学要求撤消工作组，我们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建议，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陈伯达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档案这个问题的发生是有道理的。现在来查这些人的出身，这些人的历史，就是什么家庭出身，过去干了些什么事。修正主义者有它的社会基础。北京大学的陆平黑帮，你可以把他们的家庭、社会关系列一张表出来就可以清楚了，原来是这些人在这里掌权。为什么陆平这个黑帮要排挤工人、贫下中农子弟，照顾地、富、反、坏、右子弟？就是因为他们有社会基础，有了这个社会关系。所以，查黑帮的档案是很有道理的。查档案要有一定的手续，你们文化革命委员会可以订出条例，按照正确的手续、条例查档案。武器要保管好，有一些重要的技术资料要保管好，不要随便动。”

康生对学生说：“首先，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黑帮的亲信，师范大学斗黑帮分子程今吾斗得好。我们经过调查，孙友渔这个组长，没有把程今吾这个黑帮分子紧紧抓住，而是把矛头指向了我们同学。”

康生在会上说：“今年2月、3月初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阴谋策划政变，阴谋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计划之一就是要往北大、人大每个学校派去一个营的军队，这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并在北大、人大看过房子的。这件事包含着极其大的阴谋，这件事，北大团委组织部长亲自参加过他们的黑会，陆平黑帮给他们修房子，修食堂，人大校长郭影秋完全知道这件事，并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这是一件明显的事，6月

1日后，北大的同学用大字报揭发出来的，这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师大的一位同学叫王运民的，回去在6月20日贴出一张大字报本来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这个大字报，被工作组孙友渔歪曲了。孙友渔在6月20日的报告中认为，这张大字报是造谣，煽动同学说这张大字报是要使人民解放军去流血，胡说这是要孤立党中央和毛主席。在他5000多字的报告中，4000多字要讲这个问题，为彭真辩护，有些同志不了解，被孙友渔蒙蔽，被孙友渔麻痹了，认为高淑奎、谭厚兰……等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你们说孙友渔到底站在什么立场？同志们想想，这样的工作组能不能领导你们进行文化大革命呢？你们再想想，这样的为彭真大黑帮辩护的人，要不要罢他的官？”

康生说的政变，就是当时盛传的“二月兵变”，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6月1日后，林彪的“518讲话”开始在学生中广为传抄，于是，有些人开始四处寻找“阶级斗争”的蛛丝马迹。一天，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说，2月间曾要在北大住一个团的部队，还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是要搞政变。”会后，北京大学团委丁健将这些师生议论的内容整理归纳，写出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认为在2月份时有外地部队调到北京来，是“彭真、刘仁企图搞政变的准备”，从此开始有了“二月兵变”的说法。北师大的学生王运民看见后，联想到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大联系借房，也贴出大字报，质问原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郭影秋知不知道在学校驻兵搞政变的事。

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康生问郭影秋：“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

郭影秋说：“没有看过大字报，这件事我知道。”

康生问：“你知道，汇报过没有？”

郭影秋说：“没有汇报，我认为大字报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

康生“嗯”了一声，随手从包里拿出个材料给郭影秋看，原来是他的联络员给他写的一个汇报。材料中说：北大某某大字报揭发北大、人大都曾有过驻军，是要搞兵变。康生用红铅笔在材料上划了大杠

杠,他指着材料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为此,郭影秋不得不把事情的经过与原委向他说明。

1966年2月,郭影秋正在海淀苏家坨搞“四清”时,北京卫戍区曾派人到人民大学借过房子。据来人说是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该团组建后,一时没有营房。北京卫戍区便派人到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子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先到大兴、房山、丰台等地,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后来海淀区武装部介绍,有些大学的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是否可去联系暂时借用。于是,卫戍区又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处联系。当时,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都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人民大学在学校的工作人员还向郭影秋汇报过此事。但是,当时的卫戍区政委刘绍文知道此事后,认为部队住在学校不适宜,放弃了这个方案。让那个团组建后,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这就是“二月兵变”的全过程。

第98回：工作队，各领导接连被撤 义愤起，人大揪斗郭影秋

这时，康生继续说孙友渔的问题：“孙友渔要揪谭厚兰的后台。谭厚兰的后台是谁呢？是《红旗》杂志的编辑，革命的左派，你们的校友，林杰同志。今天我把他带来了。请大家认识认识。”

林杰从后台走到前台，戴着眼镜，个子不高，几乎没有停留，又退回后台。

康生继续：“林杰的后台是谁呢？《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关锋的后台又是谁呢？一个是《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另一个就是我啰。”

北师大的这次大会，让支持谭厚兰、反对工作组的人们真正感到重见天日，高呼“万岁”。

会后3天，政教系教师李春秋等人贴出大字报：《拥护还是反对谭厚兰等革命左派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要人们“恭恭敬敬地做谭厚兰的小学生”，“跟着谭厚兰，彻底闹革命！”这时又有人贴出了《拥护还是反对李春秋大字报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的大字报，一下炸了锅，立即引起一场大辩论。

因为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早已明确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青年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相结合”。而“分水岭”的大字报将是否拥护谭厚兰真假革命的分水岭，显然与毛泽东的“最后分界”格格不入。李春秋大字报帮了倒忙，这是这个大学政治教员始料未及的。欢喜老鸹打破蛋，他干了蠢事。

愤怒的，嘲笑的，失望的气氛笼罩着北师大。“踢开黑党委”、“踢开工作组”的拥谭口号犹言在耳，“踢开保姆闹革命”的反谭大字报、大标语铺盖了师大校园。

林杰亲自到师大压阵。在中南楼下面，他和谭厚兰被群众围住辩论，“分水岭”大字报成了他们的癞疮疤。在众人斥责、诘问、嘲笑声

中,他俩都透过镜片阴阴地盯着,沉默不语。留给人们的印象,只剩下“后台”硬,有“保姆”而已。林杰没能逆转李春秋大字报给谭厚兰带来的颓势。谭厚兰臭不可闻,她垂头丧气。

7月27日,海淀区中学工作队在北京展览馆召开“革命师生代表大会”。北大附中“红旗”的彭小蒙在发言中介绍了江青等人7月25日晚在北大群众大会上的讲话内容,引起与会者的轰动和会场的混乱。正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杰,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消息传来,清华附中红卫兵决定将与工作组的矛盾公开。当晚,由清华附中革命委员会主任兼红卫兵负责人王铭匆匆写就的声讨工作组的檄文贴了出来,题目是《向清华附中工作组的错误言行猛烈开火》。王铭同时还起草了《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强调造反精神永远需要,由骆小海修改后发表。瞬间,党的化身工作组成了过街老鼠。同学们觉得红卫兵又对了。校园里出现了“永远跟着红卫兵”的大标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又活跃起来。

就在几天前,7月24日晚上,在清华附中学校办公室召开了有工作组全体成员和革委会大部分成员参加的会议。工作组和清华附中革委会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会议进行了整整一夜,会上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气氛非常紧张。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工作组长刘晋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打击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地团结,一点名,局势必然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作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守住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

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克实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晋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这天，彻夜未眠的刘晋终于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胡克实命令他在清华附中召开的与红卫兵彻底翻脸的辟谣大会。

7月28日这天，周恩来仍然早早地来到了二外，看完了尚未看过的大字报后，视察了学生食堂。当他走进食堂时，一位工人师傅正在和面，周恩来伸出手与他握手时，那位师傅举着两只沾满湿面的手不知所措，周恩来没有犹豫，仍然紧紧握住了他那沾满面粉的手。那位师傅激动地哭了，其他在场的人也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中午吃饭时，周恩来没有去可以点菜的教工食堂，而坚持在学生食堂就餐。开饭前他先是到厨房里找窝窝头，食堂的师傅告诉他，北京市民已经一个多月不吃粗粮了，周恩来又说，二外南方学生多，他们喜欢吃米饭，我早已习惯了北方生活，我吃馒头吧。吃完饭，他坚持按学生就餐的最高标准交了0.3元的饭费。

周恩来参加了二外两派学生的辩论会。在主席台上坐了几分钟后，他便拿了一个小板凳坐到台下学生们中间。

听完辩论会后，周恩来作了长篇讲话，他说：

“同学们，同志们！

我第一次来时见了你们一部分人，第二次见了你们全校师生员工，我讲了三件事，今天我就扼要地重复一下：

一、我谢谢你们给我自由和机会看了三天大字报，今天又给我机会听了你们的发言。

二、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重新温习了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三、我是来支持你们革命的！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凡是原意革命的就有前途。

当然在运动中，在这过程中，在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同样，能够革命还是有前途的。今天再补充两点：

四、只看看大字报，听听几位同学的讲话还是不够的，还要分别谈话，交换意见。我通过表面现象，看到了一些本质问题。……六条那样的提出是不对的，毛主席没有那样说，中央及陈毅没有授权张彦那

样说，张彦这样宣布是错误的。今天所做的仅是我工作的开始，我还不能多说，我想把这里当作典型。

五、确实在你们当中，大致有两类意见，但决不单只两类意见（一、三、五类，二、四类）其实一、三、五中间也不一样，二、四中间也不一样，任何东西都是一分为二的。百分之百的对是没有的，我就不保险，但毛主席的话是经过周密思考研究提出来的。我们都承认他是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代没有一个超过毛主席的。

你们拟定每系推出两个代表，也不太好，一个多数，一个少数，或许还有三类，要允许少数人的代表讲话。一个系如果少数只有两个人，那就不好推举代表，但是其他代表应该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出来。

我今天下午不能来，我的事情都订满了，我准备看你们的笔记，明天上午来继续听。”

7月28日，西城区召开的革命师生代表大会，江青派人去罢了西城区工作队队长胡启立的官。

由于康生7月27日在北师大的讲话中点了郭影秋的名，第二天晚上，7月28日，人民大学部分师生兴师动众到北京市委去揪郭影秋。当晚22点多钟，吴德到郭影秋的房间说：“经与李雪峰商量，看形势你还是回人民大学吧！”就这样，郭影秋被学生们押回人民大学。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郭影秋的车刚进入人民大学的大门，他就被人从车上拽下来，不由分说地推到一个会场进行批判。

时已深夜，人大的师生都已入睡，大喇叭把大家喊醒。全校师生立即赶到新饭厅。会场上群情激昂，“打倒郭影秋”的口号声震天动地。郭影秋被押上主席台，站在话筒前，低头弯腰，做“喷气式”。

主持人宣布：“斗争现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帮头子郭影秋大会开始！”

先是一阵口号，然后勒令郭影秋交待在人民大学犯下的“滔天罪行”。其中被质问的一个重点问题，就是让他交待“二月兵变”。郭影秋只好再原原本本予以说明。

接着，郭影秋对着话筒，微微躬着身子，开始交待自己的“罪行”。他说：“人民大学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块重要阵地，一直有三条黑线在争夺这块阵地，一是旧北京市委，二是旧高教部，三是旧中宣部。”

接着他说，来人大后，首先进行调研，发现人民大学存在诸多矛盾。接着逐一讲每一对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次要方面是什么？他的看法是什么？解决的办法是什么？结果是什么。

整个会场鸦雀无声，近3个小时的“交待”，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吐字清晰，语言流畅，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这那里是在交待“罪行”，分明是在给大家讲哲学，作报告。雄辩的口才，大量的事实、数据，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许多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大会结束时，主席台再领头喊“打倒郭影秋”的口号，几乎没有人举手了。

郭影秋的批斗大会长达4个小时之久，一直开到天亮。随后，部分同学强行把郭影秋拉到东风三楼一层法律系学生宿舍，手脚都被捆绑起来，就像一个罪犯囚徒。另有一部分学生自发地涌到楼门口，不断高呼“放出郭校长”的口号，强烈要求放人。

外面的人越聚越多。里边的人终于顶不住了，把郭影秋放了出来。当他走出楼门时，许多人夹道欢呼，目送他离开。

郭影秋，战争年代是刘邓第二野战军第十一纵队政治部主任。二野打到湖南时，他受命率部剿匪，出发前誓言：不剿灭土匪，决不生还。结果大获全胜。建国后任云南省省长。后调至南京大学任校长。1962年，人大第一副校长胡锡奎调任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此时，中央拟调郭影秋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吴玉章得知消息后，特地找周恩来，要求郭影秋来人大工作，周恩来答应了吴老的要求。1963年，郭影秋调任人大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主持工作。

郭影秋不仅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干部，而且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的专著《李定国纪年》在史学界颇有影响，被称为明史专家。1964年8月，毛泽东接见加纳意识形态学院高级讲师，郭影秋被邀参加。接见完毕，毛泽东单独和他合影。这幅照片一直被郭影秋放在家中的客厅中央。

他的诗词也写得非常好，其中一首《满江红》词是他40岁生日之作：

四十年华，随逝水，无端抛掉。回首处，云烟往事，空余涕笑。学剑不成书误了，拔毛未净神难肖。遥望天，独自立黄昏，心如绞。青山在，柴已少，黄花瘦，骨犹傲。怕秋虫夜语，孤灯斜照。蒲柳漫头摇落

感，烛火偏向黎明耀。挟长铗，纵手斩妖魔，风狂啸。

而且，郭影秋在学校里口碑甚好，不仅关心老师、学生。而且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工人师傅也十分关心。平时，上面发给他的营养票证和节日参加晚会的门票，他经常送给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逢年过节，亲自到普通工人家庭中慰问。他虽为高干，但生活简朴。红卫兵抄他的家，五间平房，就在校内。家中陈设非常简单，会客室中间放着他和毛泽东的巨幅合影。红卫兵本想去抄一些封、资、修的东西，结果一无所获。抄家后反而增加了师生对他的敬仰。

7月28日，中央决定由新市委做出《关于撤消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中学)》，规定“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之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组织，负责领导。”并决定在29日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这个决定。

这天晚上，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海淀区中学革命左派揭发批判工作组大会。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和邝桃生等人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看见江青也在会场上，就商量要将“一论”、“二论”大字报托江青转交给毛泽东。正好邝桃生笔记本上还抄有《一论》和《二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底稿，于是便撕下递给江青，还匆匆给毛泽东写了一张条子，意思是：“请毛主席看一看，我们的大字报对不对？是不是反动的？”

江青扶扶眼镜，点着头说：“小将的要求我一定办到。”

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彭小蒙在会上作了控诉工作组的发言，她在讲演中引用了北大附中初三6班的刘京扬在6月写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江青插话说：“基本如此嘛。”

刘京扬当时写的横批是：“代代相传”，后来就无人提及。

江青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她说：

“其实我要讲的话彭小蒙已经都讲了。我要讲的是文化革命小组对你们的态度，我坚决赞成你们这个造资产阶级反的精神，我们也相信你们自己组织起来，能够自己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你们想想看，谁最了解你们，是你们自己，我就不敢说我了解你们，”

下面有人说：“毛主席、党中央最了解我们！”

江青说：“你们这么多人，毛主席党中央只了解你们这种革命精神、革命干劲，具体事情他不能一个一个了解的，太多了，国家很大，对不对？”

众答：“对！”

“世界上也有很多事情要办，对不对？因为我们相信你们，刚才我听到许多同学的发言，我觉得工作组不了解你们，他们都是五湖四海凑起来的，我们同意你们的意见，建议撤销工作组，罢周杰的官。你们自己完全可以成立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者文化革命代表会议。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牢固的，我们不怕乱，乱与治是不可分割的，那是墨守成规，乌龟爬，把你们束缚在小天地里头，思想也不能解放，那是不好的。很多人递条子说：什么集训、军训，要求那些同志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们完全赞成，许多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派来的，并说：‘你们反对我们就是反对党中央毛主席！’这是不对的，据我们知道，没有派，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派的工作组也不可以拿这些吓唬你们，但对工作组的成员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他们有数是好同志，但不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做了不妥当的事情，错误的事情，成了运动的绊脚石，对待这样的同志我们要说理，说服他们！我们不要提倡打人，但打人没有什么了不起嘛！以后不打就是嘛！对于工作组另一部分人犯了严重错误或钻进我们党里或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要斗争他，要说理，你们说对不对？”

众人齐声回答：“对！”

周杰是团中央派到海淀区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

江青接着说：“人的错误思想打是打不掉的，但革命风暴中，出现打人的事情不是坏事，毛主席说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今后不要再打人了。’

许多同学要求放假的同学立即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以为这是对的。你们想想看，放假吃饭这是两条，还有什么呢？就是要造资产阶级的反，现在有一些工作组和一些成员有意挑拨起一派学生斗另一派学生，我认为这是不对的，真正的左派善于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有团结，也是在斗争中逐渐团结 95%，有人说要团结 95%，这个问

题的提法,一开始绝不能团结 95%,有人利用团结 95% 这个大帽子扣在左派的头上,说你们搞宗派,不团结别人,这是不对的。任何一个革命者都要讲究策略的,这就是坚定的左派要团结广大的中间派,孤立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分子,我的话就这样,完了。”

陶铸在会上说:“我们建议大家串联,班与班,系与系,甚至到外校去串联。群众运动就是要运,要动。说不运,不动,几个人蹲在屋子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是不行的。学生运动历来是各校串联,互相通气。”

第99回：乱打人，团中央谎报军情 做决定，北京撤销工作组

就在北京展览馆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的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杰等人来到胡耀邦家探望老领导，同时也述说他们心中的不满。

海淀区66所中学的工作组都是由中央团校派出的。这几天，从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的几次讲话，已经让他们清楚地预感到：工作组的末日到了。海淀区的许多学校已经发生了驱赶、殴打工作组人员的现象。打得最惨的是十九中工作组组长缪子玲。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血浆凝住了衬衣，衬衣根本脱不下来，只能一条一条地剪下来，在场的医务人员一边剪一边流泪。中央团校副校长马石江组织人员起草了给中央的信，报告了因王力罢周杰的官而引发学生打、撵工作组的情况。马石江还让被打的工作组成员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华北局三处告王力的状。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胡克实立即向邓小平汇报。

后来，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也向邓小平报告了中央团校老师被中学生殴打一事，邓小平又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派人调查后，向毛泽东报告“查无此事”，毛泽东因此批评邓小平“谎报军情”。

8月1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找胡耀邦、胡克实谈话，批评他们“谎报军情”。

7月28日的晚上，毛泽东看了江青转给他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和“两论”造反精神的大字报，当即批道：“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陈）伯达、康生、（王）任重、王力、关锋、戚本禹、李雪峰、吴德、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各同志阅，请考虑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后来，7月31日，他又将原所列名字尽行划去，代之以“各同志”三字：

“各同志：请考虑此件及附件是否正确。有错误，请指正。毛泽东

七月卅一日”

从7月27日开始,清华大学再次掀起反对工作组的浪潮。这天,清华大学学生,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的女儿雷蓉、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率先贴出大字报:“向工作组错误路线开火”。接着,一部分同学陆续贴出许多大字报,指出清华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另一部分同学,特别是作为各系文革委员的干部子弟则贴大字报表示反对,认为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反对工作组的同学与拥护工作组的同学形成了尖锐的对立,一场关于工作组大方向的激烈辩论在清华大学展开了。

7月28日,清华大学召开群众大会,王任重、关锋在大会上讲话。

王任重说:“有人说北大有股风,什么风我不知道,北大7月26日的会议我参加了,陈伯达、江青、康生、雪峰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方针,代表毛泽东思想的,我本人完全同意他们的讲话,当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清华和北大的情况是否一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方针来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彻底闹革命,这个方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关锋说:“回答一张条子。我把条子念一下:‘王任重、李雪峰同志:我们工作组说,北大会只适合于北大,请示了新市委后,我校不放录音。而且领导人讲话要取得本人同意才能放,可是我愿意放,我认为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有普遍意义。二物系一同学’。工作组请示了新市委没有?新市委如何答复的?我不知道。我不是李雪峰,我是关锋。我回答下面一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同志同意放他们的讲话录音,当然,什么地方不愿放也可以,如果你们愿意放那就要求工作组拿来放吧!”

清华大学工作组这天撤出,指定各系文革会主任联席会议代行校文革临时筹委会大权,领导清华的文革运动。“文革临时筹委会”选举贺鹏飞任主任,刘涛为副主任。

7月28日,蒯大富连续贴出《致“保蒯派”的信》、《澄清几件事实》、《对学校从前几点异常现象的看法》、《三致叶林同志》、《向党、向全校革命师生承认和检讨错误》5份大字报。

当晚,当刘少奇听说女儿刘涛在贺鹏飞等人的一张批评工作队的大字报上也签了名时,异常激动地从客厅的这头走到那头,一个劲地

说：“你们出卖了我，你们出卖了我！”

王光美和刘涛都哭了。她们从来也没有看见刘少奇这么激动过。

刘少奇对王光美和刘涛说：“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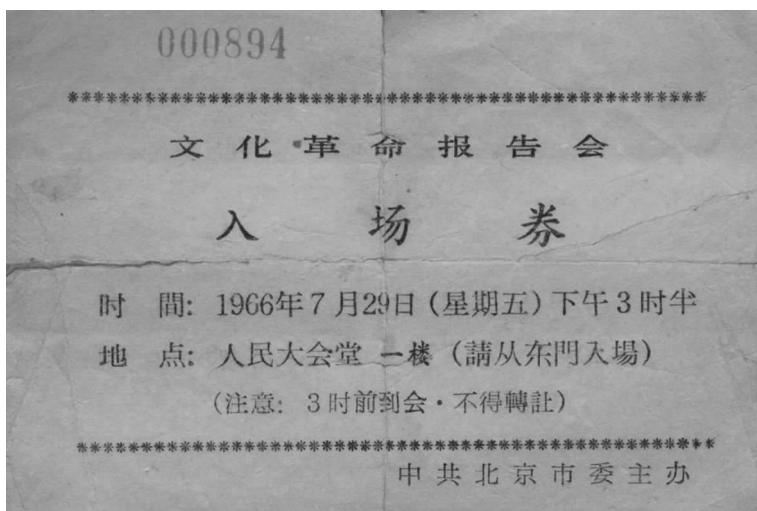
“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

“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吗，怎么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

他嘱咐刘涛：“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

7月29日凌晨，毛泽东在谈话时说：“明天召开北京市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学也可以参加，比如说清华大学的蒯大富。”

康生立即指示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下午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当贺鹏飞将这个消息告诉蒯大富时，他兴奋得不行，因为当时他的反革命帽子还没摘呢。



这是当年北航同学石兴国的入场卷

7月29日下午，人民大会堂里灯火辉煌，中共北京市委精心安排和准备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终于召开了。

蒯大富走进大会堂时，所有认识他和闻其名的学生无不为之惊讶而又敬佩。他今天能参加这样的会，本身就说明了他的胜利。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英雄当然是聂元梓了。她走到哪里，哪里都会围上一群慕名而来的学生，许多青少年都以为她也是一位豆蔻年华的小将，涌上来一看她原来是位中年妇女时，不禁稍有失望。不过，大家还是七嘴八舌地问长问短，听她介绍经验。

紧接着人声嘈杂起来，原来主席台上出现了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李雪峰、吴德等人的陪同下走向主席台的座位坐了下来。李雪峰举起手让大家安静下来，显然，他是大会的主持人。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这个决定同时适用于中等学校。在工作组撤销之后，大专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全校师生员工分别选举、成立各级文化革命的群众组织，负责领导。”

李雪峰宣读完决定后，会场上既惊愕又振奋，立刻舆论大哗，说什么的都有。接着，李雪峰宣布撤销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郭影秋的职务，也撤了张承先、孙友渔和周杰的工作组组长的职务。

接着，邓小平开始讲话。他说：“我本应站着讲，但是大家都坐着，和大家一样平等，坐着。”

他告诉大家，文化大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出现在新中国，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青年人一定要积极参加这场运动；并作为首当其冲的先锋来保卫文化大革命。他强调说：“同志们，我以中央工作者的名义讲几句话。现在市委宣布从大中学校撤销工作组。必须说明：在党的北京新市委建立以后，以新市委名义向各大中学派出工作组，这是根据中央的意见办的。”

“现在市委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撤销工作组，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经验证明，工作组的形式不适合大中学校文化大革命形势要求，必须加以改革。”

“北京市大中学校掀起了伟大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声

势浩大,猛烈地冲击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当权派,冲击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冲击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冲击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这是很可喜的现象。在这样大的群众的自觉的革命运动中,不可能是温文尔雅的,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我们对待这样新出现的问题,采取了派工作组的办法,我们这个决定是比较仓促的……”

“有的同志说‘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确是这样……”

“在一个多月中,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有的学校甚至搞得很糟糕,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也是一个很大的经验。”

他认为:“工作组撤销后,北京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能恢复运动开始时的轰轰烈烈的局面。”

接着,周恩来讲话。他说:“刚才小平同志已经代表我们中央工作同志讲了话。我现在根据他讲的话补充几句,特别是站在做政府工作的这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这个礼拜下去,向群众们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想讲几句。

这两个月来,我们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在毛主席号召下,在我们报纸上社论的鼓舞下,群众干文化大革命的劲儿很高,特别是我们北京,在我们最接近的地方出现了高潮。但是刚才小平同志说了,就是运动起来两个月了,有些曲折,就是说,开始是轰轰烈烈,中间有点冷冷清清的现象,也有些地方转为各个学校或各个机关内部群众斗群众这样的现象,那么,现在又在转,又转到新的高潮。”

他说:“今后我们首先是下去学习,学习,再学习。跟着就是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学习你们的创造,……中央工作的同志,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同志,北京市的领导同志,要到学校去接触,到学校去学习。只有学到东西,支持你们,才能说得上对你们有帮助。”

他最后说:“总之,这一个新的事情,新的运动,我们过去都不熟悉,我们离青年时代远,要到你们中间去学习,取得新的经验,老革命做新工作就年轻了,革命工作就能做得更好!(鼓掌)只有这样才能算

得上毛主席的战友和学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

“现在请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讲话。”李雪峰话音还没落，掌声已经爆发了。这时刘少奇走向讲台，周恩来、邓小平首先起立鼓掌，全场都一起站了起来，掌声经久不息。

刘少奇十分注意在大庭广众场合下的形象，尽管内心很痛苦，表情却很自若，讲话的口气依然居高临下，具有不可抗拒的威严：

“同志们，刚才小平、总理的讲话，我完全拥护，完全同意。广大师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热情，党中央包括我在内，都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我们一定要支持你们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许多革命的师生，对这场文化革命很不理解，说不知道怎么办，怎么进行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们问我们，怎样革命？想让我们给你们想办法，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的成员也不晓得……”

刘少奇继续讲话：

“……过去我们闹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不知道具体怎么办，就知道要闹革命，在实际中学。现在的革命是在新的情况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进行，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就是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除了这一条我也不知道。中央决定全国的大专院校和中学半年不上课，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通过两个月的斗争，你们比我知道得多。学校不上课，就是为了干革命，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至于在运动中遇到具体问题，就请教毛主席著作，希望你们在运动中更好地学习毛著。”

刘少奇正在讲话的时候，一位年轻军队干部匆匆走上来，俯在李雪峰耳边悄声说：“毛主席来了，在休息厅喝茶呢。”

李雪峰急忙说：“请毛主席上来给大家作作指示嘛。”

“不用了，毛主席等刘主席讲完话后出来接见全体代表。”

“好，好！”李雪峰冲着那位军人点点头后，急忙凑到周恩来、邓小平旁边，向他们传告消息。他还写了一个条子传递给正在讲话的刘少奇，可是刘少奇讲话比较激动，没有注意到。

“……这次文化革命的任务，一是斗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三是改革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这些任务我们不会做，叫你们去做，只能做好。”刘少奇说到这里，眼睛向下扫了一遍，转了话锋：

“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现在看来工作组的方式已经不适应于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撤出工作组。对工作组，你们要他们走，他们就走，如果不要他们走，就留下进行批判，给他们做出结论。搞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工作组留在那里就是听取你们的意见和批评。文化革命需要你们进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支持你们，中央能帮助你们就尽量帮助你们。对我来说，进行一段学习，能提出意见再提，你们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了，我们想到你们那里去，但不发表长篇讲话。我有一条小小的要求，就是我们这些人下去的时候，大家不要围看，不要都涌了上来……”

“我们是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文化大革命是伟大的，但我们用老眼光看待了新问题，工作组起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发展不利的作用，我代表中央向红卫兵小将作检讨……”

说着说着，刘少奇动了感情：“有时没犯错误，人家也说你错了，是不是？连自己也莫明其妙。”

第100回：苦难言，老革命遇新问题 红绿灯，工作组撤离北航

尽管刘少奇竭力使他的口气充满着自信和幽默，但坐在台下的叶林敏锐地感觉到，他的精神全面崩溃了，音调里隐含着凄凉和悲哀，完全没有了往日讲话时的那种风采。

刘少奇端起茶杯呷了口水，润润嗓子继续说：“我们提倡辩论，但不要把辩论会弄成斗争会，有时很难区分，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体验，今天是少数，经过辩论，明天就可能是多数；正确意见，也可能是少数，不要强迫别人改变观点，他们可以参加辩论会，也可以不参加，也可以允许会上、会下、会内、会外辩论。这样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但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因为他们虽坏们但还不是反革命，让他们充分暴露嘛。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大家认为不得了了，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动的标语。一揍他，那么多的人揍，公安部门只好暂时拘留，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拘留。如果你们暂时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就放回来。不妨大局嘛。保护几个月再作结论。不论是对于黑帮，对于牛鬼蛇神，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后期来做结论。在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活动一下。活动一个时候，我看没有坏处。我看没有什么可怕的，他起不了作用，搞不乱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保护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嘛。”

刘少奇显然要结束他的讲话了：“总之，写反动标语，不是坏事，是好事，只要不是对群众有危害的活动都不要制止，让他们先行暴露和活动，当完全暴露了，可以作结论了，就对他们施行无产阶级专政。好了，我的话完了。现在呼几句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就在大家跟着刘少奇呼口号时，毛泽东突然从舞台东侧走上主席台，刚一露面，就被暴风雨般的掌声和万岁声震惊，瞬时间，整个人民

大会堂沸腾了，就像刮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暴，会场全体代表起立，群情激昂，不断地高呼着：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身穿灰色中山装的毛泽东在陈伯达、康生、陶铸等人的陪同下，没有和主席台上的任何人握手，径直走到主席台前朝代表们招手、鼓掌。他来回在主席台前走了两圈，最后站在中央频频招手、鼓掌……

整个台下掌声雷动，齐声欢呼，最后变成了有节奏的“万岁！万岁！万岁！”的轰响……鼓掌长达 10 分钟，毛泽东的眼睛湿润了，他一生中得到的欢呼和掌声太多了，但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使他感动：眼前都是一些 15、6 岁，18、9 岁的青年学生呀！

一位参加会议的中学生在 15 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事先没通知毛主席来，一看到毛主席，人们都疯了，又喊又叫，我站到了椅子上，喊的嗓子都哑了。”他说，他看到毛主席用手背拂了一下眼睛，但没有看到流没流泪。

毛泽东被这些孩子们疯狂的爱感动了。他几乎享受不了这太热的爱了，加快了脚步，从舞台西侧消失了。

毛泽东走了，全场还在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

最后，大家一起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周恩来站在主席台的中央，打着拍子，指挥全场高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

群众对毛泽东的感情和狂热崇拜是发自内心的。50 天惊心动魄的经历，使一大批青年亲身领会了毛泽东代表着反压迫、反迫害，代表着翻身解放，代表着“造反有理”这一中国革命的心灵体验。一位文革亲历者后来这样写到：“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血统论压制的造反派把毛泽东作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作为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这就是为什么‘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首歌在那一时代一旦唱起，在场者几乎无人不流泪的原因。”

会议结束后，负责大会纪录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陈宽宏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返回中南海，看到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正在北门内的一个电话机旁给团中央打电话，要他们赶紧撤销工作组，心情显得十分着急。

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所以，他主张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中央的名义正式就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做出决定。

7月29日晚上，陈伯达、江青率中央文革部分成员到北京轻工业学院参加他们的师生大会。在会上，汪延群念了孙宝鼎，恽国桂，苗宗奇三位同学写的血书。

“轻工业学院革命的同学们，教员们，职工们：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来看望你们来了！”江青站起来刚说了这几句，会场立即响起一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江青接着说：“问你们好！我们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向你们问好！”

又是一片口号声。

“现在请我们的小组长陈伯达同志给同学们讲话。”

陈伯达说：“中央文革小组对轻工业学院所发生的问题，很早就知道了，就调查过几次。晓得你们这里发生了一些迫害的行为，工作组对同学们进行了迫害。”

这时，会场上有人喊：“没有！”

马上又有人喊：“有！”

陈伯达接着说：“你们可以有不同意见，有不同看法，现在我来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两种不同的意见，或者几种不同的意见，都可以上台讲讲你们自己的意见，我们就是来听你们不同意见的。现在是不是就开始讲话？”

有人问：“有些同志刚才已经递条子要讲话了，现在是不是开始讲话？”

陈伯达：“你们有很多条子，说的又长又没有东西，只是空话，写很多的条子。现在有一个同学，写到他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请我们的副组长江青同志给大家读一下。”

江青读条子后说：“据我看，这个条子是一个人的笔迹，但是他不说他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这样的人完全可以站出来讲话。同学们！刚才汪延群同学所说的这样的事情是不是政治迫害呀？”

台下众人答：“是！”

江青：“可以容忍吗？”

众答：“不能！”

江青：“他讲得对不对？”

齐声答：“对！”

江青：“他讲的时候，我难过了，我掉眼泪了！你们哪？”

台下有人答：“也掉了。”

江青：“我们来了，我们坚决站到你们这边，坚决站到革命派这一边！”

口号声起……

江青：“他们这种做法是违犯党纪国法的。他们迫害 3 个青年人写了绝命书，还要说他们是反革命分子。这有没有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

众：“没有！”

江青：“工作队长叫万一东一哲。”

江青一字一顿地说出万东哲的名字后，接着说：“这个名字也很怪。刚才汪延群同学在这儿读这 3 份绝命书的时候，他笑嘻嘻的，你们要不要认识他？”

众：“要！站出来！”

江青：“我们不要武力，你们要认识他。”

有人喊：“低头，低头，低下头来！”

江青：“革命的主力应该是广大的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职员，你们不应该上他们的当！他们挑拨离间，挑起一批学生来斗另一批学生，这是非常不能容忍的事情，做出这样的事情来！我 20 号回来的，没有一天停止，这是不能容忍的！”

大道理，今天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已经讲过了，应该有录音，你们都听一听。但是严重违犯党纪国法的人，应该有所交待，你们说对不对？”

台下齐声答道：“对！”

接着，掌声四起，长时间呼口号：“毛主席万岁！”

江青：“革命的师生应该团结起来，认清是非，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坏家伙作斗争！（掌声）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思想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一定要专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人的政！
请同志们原谅，我非常激动。我很早，20号以前我就知道你们的情况了，我非常难过，我现在不能说话了。”

台下又是口号：“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陈伯达讲话：“我们现在会议继续进行。万东哲要向大家交待，现在请同学们继续发言。”

接着由受工作组迫害的杨文昌同学发言。

万东哲是中共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副主任，北京轻工业学院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

从7月27日开始，北航工作组就宣布不再领导学院的运动文革，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

听说中央批评工作组犯了错误并要撤走的消息后，北航被工作组整过和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学生和教职工欣喜若狂，学院里再一次掀起反工作组的高潮，许多大字报要求赵如璋为首的工作组向全院师生做检查，为被打成“反革命”、“反动学生”、“一小撮”的师生们平反。这天，3312班学生肖淑桃等贴出大字报《清除大辩论的后遗症》，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北航少数派几次集体前往中央接待站上访。

7月29日，北航召开全院大会，工作组传达撤销工作组的决定，工作组组长赵如璋在会上指定孔令华、苏晓前等12人组成筹委会，毛泽东的女婿孔令华为主任。

部分师生贴出大字报，指出筹委会没征求广大师生意见，是非法的，要求改选。有人说工作组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工作组留校检查并听取群众意见。校园里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数量倍增。

北航筹委会上台的第一道通令就是让中层干部去挖游泳池，不准参加运动。也不允许看大字报。有的中层干部劳动过后路过大字报栏，想停下来看看，脚未站稳，就会有一只手从背后伸来突然抓住你的

肩膀，“戴草帽的？是不是中层干部？大字报不是给你们看的。”

之所以叫他们“戴草帽的”，是因为他们参加劳动，都戴着草帽。这样一来，就是劳动完了，这些中层干部也只好绕道回家，连大字报区也不能经过。

一天，石兴国、戴维堤等几个被工作组整得较厉害的学生，即所谓北航“十大牛鬼蛇神”被接替工作组的文革筹委会集中到北航六系楼开会。当石兴国等“十大牛鬼蛇神”来到北航六系楼不一会儿，几辆军队轿车开进了学校，从车上下来的是国防科委的钟赤兵中将、罗舜初中将、刘化清中将、陆杨少将等领导。他们来到会议室，亲自召见这些被国防科委工作组打成“反动学生”和“牛鬼蛇神”的学生。钟赤兵大发雷霆，一口咬定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让这几个学生好好检讨，不准抓着工作组不放。他说：“聂老总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国防科委也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国防科委没有任何问题，更没有什么‘黑线’，谁要胆敢反对国防科委，我就枪毙了他！”

钟赤兵是老革命，他在长征中娄山关战役时被敌人打断了一条腿，是有名的独腿将军，打仗时用担架抬着指挥战斗。长征途中，敌机轰炸，李敏的母亲贺子珍为了掩护钟赤兵，被炸成血人，浑身受伤17处，有的弹片陪了她终生。但他同样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对文化大革命并不理解。

那些反对工作组的群众当然不服。他们认为自己是响应中央的号召起来革命的，不是反革命，他们要求工作组为他们平反。

工作组没有给他们平反，但是也不能在北航继续呆下去了，他们要撤走。可是，对许多被他们打成“黑帮”、“反革命”的师生，工作组没有一句交待就走了，学生们当然不干。他们认为：工作组不能走，筹委会是工作组指定的，解决不了北航的问题，反对工作组的师生们也不同意。于是反对工作组的学生、教师亮起了真正的红灯。他们中的许多人制作了各式各样的红灯笼，挂了出来。从学院大门一直到院内，到处是红灯笼，意思是工作组不把问题解决完不能走。而拥护工作组的人们，大部分是老工人、炊事员、司机、还有很多教师和高干子女们也不甘示弱，纷纷挂起了绿灯笼，为工作组放行。“红灯”派和“绿灯”派互相冲突了起来，这就是当时北航有名的“红绿灯大战”。

7月30日,北航工作组在院内集中学习。8月1日,工作组写出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大字报,欢迎提意见。院文革筹委会承认自己产生程序非法,决定重选。8月2日下午,工作组突然宣布,根据国防科委决定立即撤离北航,没有做任何检查,也没有重新选举筹委会。保工作组的人挂出了醒目的大标语“热烈欢送工作组!”，“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真不简单!”有的人甚至高喊“工作组万岁!”北航文革筹委会和尚未正式对外宣布成立的北航“红卫兵”,把工作组送到南校门,在学院路南口依依惜别。以苏晓前为首、以高干子女为核心的北航“红卫兵”给工作组成员带上大红花。

以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就这样离开了北航。

7月29日这天,清华大学蒯大富又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站住!叶林,把帐算清再走》。他还给关锋写了一封信:

关锋同志:

请你把我这份大字报转给党中央。并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人下来,依靠清华广大革命师生,严格审查清华工作组、叶林同志和我本人。

致

敬礼

蒯大富

七月二十九日

29日,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布置周恩来过问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

29日这天,王光美突然来到清华,说:“我不能在工作组困难时期放手不管。”

她这次来到清华园,一反常态,坚持要在公开场合露面,她原来是从来不到食堂吃饭的,但那天晚上,她一定要同别人一起到食堂去吃晚饭。

晚上,大礼堂开工作组问题的辩论会,她又一定要到大礼堂去,有人几次叫她不要去,她最后还是跑去了,她一跑上台就大讲她和刘少奇的生活上的关系,说群众“热爱”刘少奇。接着又大讲工作组是有成绩的,也有错误,她对工作组有她自己的看法,但现在不讲。

从那天以后，王光美就住在女生宿舍，到食堂参加劳动，为学生们打饭。回到工作组仍然坚持说：“不少同学还是有认识的，还是能肯定工作组成绩的”，又说：“让蒯大富上台也好，他上了台实行残酷镇压，可以教育大家。”

第101回：亲约见，周恩来会蒯大富 开全会，文革再掀新篇章

30日，周恩来约请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随后约请两批清华学生谈话。谈完话，周恩来又急急忙忙去参加科学院的大会。

这天，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科技界大会，主要是科学院、国家科委两系统，哲学社会科学部也有人参加。科学院的“反革命分子”王锡鹏、科委的“反革命分子”、时任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张本不但出席了会，还讲了话，控诉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领导镇压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

“730”大会以后，围绕对待科学院党委和“应地所事件”的态度问题，在群众中形成尖锐对立的看法，不久又形成了对立的群众组织。

7月30日，中央撤消了郭影秋北京新市委文教书记的职务。消息传到人民大学，许多同学们纷纷涌向市委问为什么？统战部副部长张经武出来接见了他们，讲了四点：

- (1) 同学们都拥护中央决定。
- (2) 郭影秋有哪些错误，市委不讲。
- (3) 郭影秋错误性质同学们要辩论，可请示中央文革。
- (4) 尽速成立校、系文革小组。

张经武的这个讲话比较原则。后来，同学们又和市委一位工作人员交谈，他说：

- (1) 郭影秋对北京师范大学工作组组长孙友渔问题的处理上有错误。
- (2) 近一个多月来，北京市文革运动冷冷清清，与他有很大关系，领导不力，不能继续任职。
- (3) 他本人原来有些问题，背思想包袱。

根据上述原因，再加上在人大犯了错误，故撤消市委文教书记职务。

7月31日，贺鹏飞通过广播通知：“请蒯大富同学晚饭后到甲所来。”

甲所是清华大学接待外宾的地方。晚上19时，吃完晚饭，天还没黑，蒯大富就来到甲所。他见到贺鹏飞，便问：“什么事？”

贺鹏飞说：“有人找你谈话，你等着吧。”

蒯大富在甲所北门外等候。后来，与他同系的901班三年级学生、团支部副书记、中共候补党员刘才堂也来了，他也是被工作组打成的反动学生。有人通知他晚饭后到甲所，说是有首长要见。

蒯大富和刘才堂俩人就在甲所门前徘徊，等待，互相间也没说什么话。一直到深夜，才突然有人开门出来让他们进去。一进门，他们就看到灯光下有一个高大的身影迎过来和他们握手，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二人当即高兴得叫了起来：

“周总理！”

周恩来与他们握手后，就将他们让进屋里。这是小院左侧的一个房间，里面有沙发、茶几。周恩来说：

“你们坐。”

蒯大富不敢坐，因为这反差太大了，此时他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还没平反呢。

周恩来又说：“请坐，请坐。”

蒯大富还是站在那里。周恩来的秘书孙岳说：“总理叫你坐你就坐嘛。”

蒯大富这才坐下，也只是半个屁股欠在沙发上。

这时，学校保卫部的工作人员领着工程数学力学系05班学生、中共候补党员、时任班级共青团支部书记的刘泉进来了，他也是晚饭后接到通知的。

周恩来站起来，听了学校保卫部干部介绍后，和刘泉握手。刘泉激动的说：

“周总理好！”

周恩来说：“你好！”接着提议说：“我们到桌上谈吧。”

于是大家都围坐到与沙发垂直的长条桌旁的长沙发上。

周恩来逐个问了蒯大富他们每个人的姓名，所在系、班级、年龄、

是否党团员、担任学生干部等等情况后，说：“主席和中央派我来，想听你们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请你们把6月1号到今天，正好两个月，你们所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跟我讲，我保证，听你们讲完最后一句话。”

几个学生觉得蒯大富当时受压制最厉害，斗争最坚决，于是都等他讲。

此时，蒯大富大脑一片空白，他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他要珍惜这次机会。

稍微镇静了一下，蒯大富开口说：“总理，我向毛主席和中央保证，我下面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我的真实的想法，亲眼看到，亲耳听到。”

周恩来说：“你开始吧。”

这时，蒯大富基本平静了下来，他打开笔记本，滔滔不绝的讲了起来。周恩来的秘书孙岳削好很多铅笔，坐在刘才堂旁边做记录。刚讲了两三分钟，周恩来也拿出本子来记，他有时会打断一下说：“这个再重复一下。”

一会儿，数力系的沈台平进来了，他也是接到通知过来的。

贺鹏飞进来了，他对周恩来说：“周伯伯，我想进来听蒯大富汇报。”

周恩来没有同意。

过了20分钟，贺鹏飞又进来说：“周伯伯，我们还想听蒯大富说。”

周恩来说：“我都跟你说过了，你不许进来了。”

从31日凌晨2点到5点，蒯大富汇报了3个小时，始终没有停顿。不知不觉天都亮了，直到周恩来说：

“我们这次交谈，就先到这里吧。还有没谈完的，还有同学没谈的，我们晚上安排时间再谈。”

晚上，学校派车将蒯大富、刘才堂、沈台平、刘泉四人送到人民大会堂。他们在河北厅的一个长条桌子边坐下。不一会儿，周恩来带着谭启龙和江渭清进来了。学生们一见，都站起来说：

“周总理好！”

周恩来说：“大家好！”并示意大家坐下，然后说：“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这位是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同

志,我和他们一起来听听你们的意见。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都要学习啊!”

然后周恩来又逐个询问几个学生的个人和家庭情况及所在系、班级等情况,大概是为了让两位省委书记也都了解一下。

他先问蒯大富:“你家在什么地方?”

蒯大富说:“我在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大三读书,老家是江苏的,滨海县,属于盐城地区的。父亲、母亲都是农民。”

周恩来说:“你们家在江苏啊,我们是老乡啊,我家在淮安。其实我13岁以后才搬到浙江去。”

他又问:“父亲、母亲干什么的?”

蒯大富回答说:“父亲、母亲都是农民,政治面目都是中共党员。我父亲是1944年入党的,母亲是1945年的党员。”

周恩来说:“你们家是革命家庭嘛,盐城是我们新四军总部的所在地。”

然后又问刘泉:“你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刘泉答:“是干部。”

周恩来:“在什么机关当干部?”

刘泉说:“在浙江的省级机关。”

周恩来:“担任什么职务吗?”

刘泉:“我爸爸当副省长,妈妈当省妇联主任。”

周恩来:“哦,你爸爸,副省长,是哪一位啊,叫什么名字?”

刘泉:“叫刘剑。”

周恩来:“噢,我认识呢!”然后转头问谭启龙:“你认识吗?”

谭启龙点头说:“认识,认识。”

周恩来再转头问江渭清:“你认识吗?”

江渭清也点头说:“认识的。”

随后,周恩来又问了刘才堂和沈台平。

都问完后,蒯大富又继续开讲。周恩来说:“你们几位随时可以补充,因为蒯大富同志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你们在外边知道的就可以补充嘛。”

蒯大富从19时多讲到22时多,又讲了3个小时。

夜深了，一阵凉风吹过，大窗户边上垂下的长长的薄纱般的窗帘摇动起来，发出轻微的声响。周恩来回头望望，招呼服务员说：“服务员同志，请把玻璃窗关上吧，有穿堂风啊。”

一位女服务员过来关上了部分玻璃窗，未关玻璃窗的，也拉上了窗帘。

刘泉好奇地问：“穿堂风？什么是穿堂风？”

周恩来微笑着说：“就是穿堂而过的凉风，你们穿得少，容易引起感冒。”

刘泉明白了，说：“噢，是这么回事。”他感到周总理生活经验真丰富，而且关心体贴人那么细微！也觉得自己太孤陋寡闻了！

蒯大富讲得差不多了，语速放慢了。刘泉心想，这次可以发言了。谁知蒯大富发言一结束，周恩来就说：“现在十点多了，我们后面还有安排，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谢谢你们了。时间很晚了。给你们准备了夜宵，你们吃了夜宵再回学校吧。

蒯大富问：“那总理你们呢？一起吃吧。”

周恩来：“我们后面还有会，不和你们一起吃了。”

蒯大富马上说：“谢谢周总理！”

周恩来、谭启龙、江渭清和蒯大富他们四人握手后就走了。

一个穿白大褂的女服务人员，带蒯大富他们到旁边的小屋子，一人一碗鸡丝汤面。

刘泉马上问女服务员：“要多少粮票？要多少钱？”

蒯大富悄声对他说：“哪里会要呢？不会要的。”

果然，女服务员说：“都不要。”

刘泉说：“我们吃公家的饭要交粮票，要付钱的。”

女服务员和另一位男服务员互相对笑一下，说：“周总理自己给你们付了。你们放心吃吧。”

7月31日，贺龙派薛明到人民大会堂向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问题的周恩来反映他的意见：“解决清华问题，不要采取北大的方式，一定要慎重，要照顾党内的团结。把王光美负责的工作组说成是反动的，就等于向刘少奇开刀。”

周恩来问薛明：“这都是谁的意见？”

薛明说：“贺龙、李井泉、王任重他们一起研究的。”

周恩来记在本上，脸上毫无表情，见薛明说完，做了个让她走的手势。

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态度开始对各地的文革运动产生了影响。7月28日左右，王任重一个紧急电话打回武汉，湖北各院校的工作组虽然未撤，但所有的批判、斗争群众的活动，都紧急刹车！7月30日，湖北省委常委按当时的认识也认真地讨论和回顾了前段运动。显然，他们业已感觉到运动出了问题，但又原由不清，处于矛盾和被动，举棋不定。

8月2日，湖北省委召开第二次文革积极分子代表会，听取了7月29日北京市第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上中央领导的报告录音，正面地总结了前一段运动的成绩，表彰了各学校产生出来的运动积极分子。武汉市委决定逐步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并开门整队。

7月30日，鉴于毛泽东对工作队问题已经表态，到北京准备参加八届十中全会的赵紫阳、区梦觉从北京匆匆写信给广州的林李明、张云、王阑西，对撤退工作队，作了紧急布置：

“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工作队多的，逐步调出一些，或集中到工作队部学习，大学的一个系，留一两个人就可以了。”

7月29日至31日，郑州大学工作组即将撤离之际，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工作组在3天之内，仓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校文革”没有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而是由工作组主要领导人商量之后提名通过。

7月30日，中共吉林省委确定：应尽快撤出大、中学校的工作队，对少数群众意见多的工作队，可留下听取群众意见；在学校中选举文化革命小姐或文革委员时，要充分发扬民主；工作队撤出时可留联络员、观察员、巡视员。

7月30日，辽宁省委撤出工作队。截至7月25日，辽宁大学有409人被打成“右派”，哲经系陈玉凤被逼疯住进精神病院。

7月31日晚上召开“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刘春，接到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请柬后，不想参加。于是，他儿子，矿院学生刘歌自告奋勇替父亲出席。

刘歌到了军事博物馆四楼平台，碰到老同学朱佳木，一问他也是顶父亲的名字来的。朱佳木的父亲朱理治，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他也不愿出席“八一”招待会，因此，将请柬交给朱佳木，由朱佳木替他出席。这时，他们已经风闻刘少奇、邓小平可能犯错误了。朱佳木对刘歌说：“毛主席、林彪向来不出席‘八一’建军节的招待会，刘少奇、邓小平应该出席，这是惯例。如果他们不出席，那就真可能出事了。”

对朱佳木的分析，刘歌深信不疑。朱佳木是刘歌弟弟小学的同班同学，这时已是人大党史系 65 级的学生，他们在八中上高中时的校友。

建军节晚会正在进行，解放军的许多著名将帅都已到会。天气虽然很热，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都穿着整齐的新军装。叶剑英元帅到了，他没有穿军装，上身只穿了一件白色短袖衫，正热情地和各位老将打招呼、握手，然后在前排就座。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也没有穿军装，和谁也不打招呼，就大大咧咧地在叶帅身边坐下。朱佳木小声对刘歌说：“黄永胜不会为了建军节到北京来，中央一定有重要的会在召开。”

这时周恩来走出了电梯，看上去非常地疲劳。他向旁边的服务员要了一块热毛巾，在脸上敷了好一会儿，这才步入会场。这时，人们看到的周恩来，又是容光焕发的周恩来。一时，军乐齐奏，镁光灯闪烁，场面十分热烈。

刘少奇始终没有露面，邓小平虽然出席了招待会，但非常低调，远不如其他领导人那么活跃。难道他们真的出了什么问题吗？

8月1日这天，刘少奇和李雪峰研究商定，刘少奇到北京建工学院参加那里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少数派 200 多人在这天成立“八一战斗团”。第二天上午，学院的多数派 1100 多人也成立了“革命团”与之抗衡。北京建工学院是北京市高校中最早形成两派组织对立的学校。随后，在工作组去与留的问题上，及对领导干部批或保的态度上，北京乃至全国各单位都出现了互相对立的两派群众

组织。

8月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成立。发起人是刘克府,北航第一批贴大字报造院党委反的人,也是北航筹委会委员之一。他和矿院红卫兵刘歌是中学时的同学,听刘歌介绍了矿院红卫兵的情况,非常赞同,于是和北航的几个干部子弟,也都是第一批写大字报的同学,于8月1日组织起红卫兵。随后,北航红卫兵各系组织也纷纷宣布成立。8月3日,北航红卫兵总部成立,以高干子女为核心,并发表了宣言和纲领。

北航的红卫兵一成立,工作组马上表态支持,还把小白楼二层拨给红卫兵使用。相比其他学校的红卫兵,北航红卫兵的处境无疑是最好的。

8月1日,轻院红卫兵正式成立。

8月1日下午15时许,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厅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1人,列席会议的有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北京高校的工作组组长和“革命师生”的代表共47人。如: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曹轶欧、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叶林、北京体育学院工作组组长黄中、北京机械学院工作组组长王丰、文化部文革教育分组政委李光辉、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杨克明、学生高盛清、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清华大学教师王博文、清华大学学生贺鹏飞、花春荣、北京广播学院学生邓良宝、北京邮电学院学生王柏松、北京工业大学学生陆彩云、北京戏剧学院教师梁恩泽、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孔丹等。

至此,神州大陆已风雷滚滚,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第一部下卷 各地文革章回索引

北京：

第49回；第50回；第51回；第56回；第66回；第73回；
第86回；第89回；第90回；第91回；第92回；第93回；
第94回；第97回；第98回；第99回；第100回；第101回；

中央文革小组：

第48回；

北京大学：

第48回；第51回；第52回；第54回；第62回；第66回；
第67回；第70回；第87回；第88回；第89回；第91回；
第92回；第94回；第95回；第96回；第97回；

空军：

第48回；第79回；第80回；第81回；

“首都工作组”：

第49回；

红卫兵：

第52回；第53回；第60回；第71回；第72回；第78回；
第87回；第98回；第101回；

北京航空学院：

第52回；第68回；第74回；第91回；第100回；第101回；

工作组：

第53回；第54回；第60回；第62回；第67回；第68回；
第69回；第70回；第71回；第74回；第78回；第79回；

第 86 回;第 87 回;第 98 回;第 99 回;第 100 回;

北京师范大学:

第 57 回;第 68 回;第 71 回;第 87 回;第 91 回;第 92 回;

第 97 回;第 98 回;

清华大学:

第 61 回;第 66 回;第 67 回;第 68 回;第 72 回;第 77 回;

第 78 回;第 89 回;第 90 回;第 99 回;第 100 回;第 101 回;

彭真、叛徒:

第 63 回;

人民大学:

第 64 回;第 98 回;

北京地质学院:

第 68 回;第 89 回;第 97 回;

海军:

第 80 回;第 81 回;

韶山:

第 81 回;第 82 回;

“二月兵变”:

第 97 回;

“对联”:

第 100 回;

天津:

第 76 回;

华北地区:

山西:

第 57 回;

内蒙：

第 84 回;第 85 回;第 86 回;

东北地区：**吉林：**

第 71 回;第 101 回;

辽宁：

第 101 回;

西北地区：**陕西：**

第 57 回;第 58 回;第 59 回;

甘肃：

第 60 回;第 72 回;

青海：

第 55 回;第 56 回;

西南地区：**四川：**

第 64 回(重庆);第 65 回(重庆);第 83 回(重庆);

贵州：

第 59 回;

中南地区：**河南：**

第 56 回;第 65 回;第 101 回;

湖北：

第 63 回;第 69 回;第 83 回;第 88 回;第 101 回;

广东：

第37回；第74回；第75回；

华东地区：

江苏：

第55回；第57回；第63回；

浙江：

第74回；